



看懂世界经济的 第一本书

普通人读懂社会和生活的必备书

人人都能懂、人人都会用的经济课堂，全面提高你的财商和幸福指数
认清经济大势，把握致富商机

张卉妍/编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用中国的视野看世界，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

看懂世界经济的 第一本书

张卉妍◎编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懂世界经济的第一本书/张卉妍编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113-5001-5

I. ①看… II. ①张… III. ①世界经济—通俗读物 IV. ①F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0296号

看懂世界经济的第一本书

编 著: 张卉妍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白 豫

封面设计: 李艾红

文字编辑: 胡宝林

美术编辑: 吴秀侠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张: 28 字数: 650千字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5001-5

定 价: 2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58815874 传 真: (010) 58815857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I

世界经济今天走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某些问题的严重性跟我们过去 30 年中所碰到的难度是不同的。自 2008 年以来，经济危机带来的世界各国的政治动荡加剧，世界经济大势风起云涌。当今的世界格局与未来的发展趋势都不容乐观。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再起，特别是欧债危机久拖却无治理良策。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给世界经济缓慢的复苏进程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保持着较高的速度，但令人不乐观的世界经济毫无疑问使其下行的风险增加。从微观面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就业者发现工作岗位变少了，竞争更激烈了；贸易商发现生意越来越难做；房产商发现房子不好卖了；投资者因为股票不断下跌蒙受损失；决策者发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了，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余地变小了……大家难免感叹：难道是好日子到了头？难免追问：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有人说，是华尔街金融家的冒险游戏，把全世界都拖入了经济的冬天；有人说，是美国为了自身的核心利益，滥用霸主的权利，用美元绑架了世界经济；有人说，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早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有人说，世界经济本身就遵循着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期定律……答案五花八门，使本次经济危机成为了一场充满悬疑的罗生门。要想获得比较客观公正的答案，就需要看懂世界经济，弄清其来龙去脉。尤其要弄明白我们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世界各国经济的运行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我们读懂世界经济就意味着读懂我们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及其来龙去脉，不仅我们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需要弄明白，我们正在奔向世界各地的商人，还有我们千千万万怀着理想的年轻人，同样希望弄明白。进而言之，所有关心自己前途和命运的中国人，都希望弄明白。因为这件事情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政府官员需要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与教训，提高经济学素养，维护改革开放的果实。而对于年轻的创业者而言，看懂世界经济，了解当前形势，有助于自身找准正确的创业方向，抓住创业路途上珍贵的机遇，在世界范围内学习优秀

企业和成功创业者的商务模式和前沿理念，形成自己的法则，让自己和企业保有战斗力。任何和国计民生相关的事情，都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世界经济的大乾坤里，也装着普通老百姓的小世界。世界经济的风吹草动，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我国的经济格局，进而影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工资、学费、房价、医药费等的涨跌均牵动着老百姓敏感的神经，甚至操纵着民众的喜怒哀乐。管中窥豹，我们从物价、汇率变化、利息调整中可以反推出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甚至可以把出世界经济的脉动。

世界是平的，作为地球村的村民，经济全球化浪潮让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于世界经济大局之外。然而，经济变局宏大艰深，国家博弈真假难辨，令人眼花缭乱。全球经济向何处去，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格局如何，骨子里积淀着家国情怀的中国人渴望对此有清晰和深刻的了解，也希望在后金融时代守住自身的财富，创造更多的财富。为了帮助人们全面系统地看懂世界经济这盘大棋局，我们特编写了这部《看懂世界经济的第一本书》。本书将当今世界格局及其历史渊源娓娓道来，并从源起、主导因素、影响范围以及未来走势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和介绍，希望能使读者掌握看懂世界经济的理论、方法，能客观公正地看待当下经济形势、社会热点。本书适合所有对经济热点问题感兴趣的读者阅读。通过阅读此书，读者能看清各类波谲云诡的经济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真相，了解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发展脉络和未来走向，以便更有效地规避风险，把握机会，找准自身的位置，作出有利于自身的抉择。



目录 I

第一章 世界经济现在走到了哪里	1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可能二次探底	1
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与深刻调整	3
债字当头，财政恶化成发达国家普遍难题	6
全球流动性泛滥，新兴经济体持续通胀	8
金融危机系统性风险尚未根本消除	11
发达国家结构性失业问题难解	13
第二章 当前世界经济的格局	16
美国经济：不稳定的复苏	16
欧元区经济：复苏中蕴藏不确定性	19
日本经济：延续危机后的增长周期	21
俄罗斯经济：复苏道路仍不平坦	23
拉美经济：快速复苏	26
非洲经济：回升向好	28
中东经济：步入复苏阶段	30
第三章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33
信息革命：世界成为“地球村”	33
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和国内金融界限模糊	35
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大发展	38
区域经济集团化：区域一体化组织大发展	40
合作与共赢：国际组织的大发展	43
市场经济成为涵盖整个世界的经济体制	45
资本流动已成全球化趋势	47

第四章 谁都逃不掉的通货膨胀.....51

通货膨胀：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	51
通胀在敲门：通胀预期形成的前因后果	52
通胀效应：通货膨胀带来的财富再分配	54
深入通胀的内核：剖析通胀产生的原因	56
美元大泛滥：通胀，让全世界人埋单	58
发达国家如何应对通胀：美国的“放任”策略	60
欧元区：政府对通胀“高度警惕”	61
日本：通胀与紧缩并存之下“心有余而力不足”	63
亚太地区：通胀重压促使“加息潮”出现	65
德国：超级通货膨胀思考	66
通胀危害：动荡与冲击随之而来	68
治理通胀：各国政府的不同措施	70

第五章 欧债的成因、酝酿与历史演进.....73

危机根源：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制度	73
欧债的爆发：背负巨额贷款而无力偿还的希腊	75
葡萄牙：主权债务信用恶化或成下一个希腊	77
西班牙经济危机：贸易大幅缩水	79
爱尔兰：经济局势骤然紧张	81
法国艾菲尔铁塔笼罩阴霾之中	83
意大利：挤入全球最高赤字国	86
7500 亿救市“强心剂”不惜一切捍卫欧元	88
德国引擎：危机中能否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89
中国：债务危机升级，将会“受灾”	91

第六章 诸元之战：汇率背后的国家博弈.....94

卢布外交：苏联经济援助的真实目的	94
世纪豪赌：英镑阻击战	96
亚洲货币绞杀战：中国未来的寓言	98
狙击欧洲货币的“危机弧形带”	101

第二波风暴：东南亚再掀飓风	102
日元国际化，有利也有弊	104
狙击中国：汇率大战，中国为哪般	107
地位提升：人民币如何走向世界	109
美联储“量化宽松”惹怒了全世界	111
“棒杀”欧元：做空、再做空	114
第七章 热钱战争：保卫财富，共反热钱.....	117
“野狼群”来自何方	117
经济杀手：热钱的真实面孔	119
英镑贬值：热钱给英国带去的打击	121
日本失去十年：热钱对经济的影响	123
“宠儿”到“烫手山芋”：越南经济从天堂到地狱	126
反热钱：驯服“狼性”是根本	128
国际热钱撤出：阿根廷比索三天贬值 2%	130
组合出击：反击热钱绑架人民币	132
热钱警报：高筑墙能挡住热钱洪流吗	134
热钱监管：预防为主，让“热钱”变“冷钱”	136
第八章 风雨飘摇的全球股市.....	138
墨西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38
泰国：“坏小子”一发威，东盟小虎成病猫	140
中国香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43
韩国：大马不死，不攻自破	146
日本：无情泡沫，引火烧身	148
越南：最高的利率，最差的股市	151
欧盟：再次出手，股市能否止泻	154
大盘总体走势：低位震荡下行	156
跌声一片：A股也难独善其身	159
养老基金对股票市场实行打击	162
救市效应：能否推动股市短暂上行	165

第九章 悄然上演的黄金储备战..... 168

金本位制：金本位统治下的黄金世界	168
黄金博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财富角逐	170
黄金价格产生机制：五大行聚首“黄金屋”	173
德累斯顿银行带来的金市震动	175
20 世纪 70 年代黄金牛市的结束	177
20 世纪 80 年代的黄金生产	179
20 世纪 90 年代后黄金价格下跌的原因	181
黄金战：争夺日益恶化	183
南非：“黄金之国”能否赢得黄金战争	186
中国与印度：成全球黄金最大买家	188
日本：为何国民排队去卖黄金	191
罕见行情：黄金和美元同涨	193

第十章 产业转移的第四次浪潮..... 196

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世界工厂大挪移	196
世界工厂：让人欢喜让人忧	198
产业主导权：新帝国主义掠夺矿业	201
原材料价格上涨：浪潮背后的财富转移	203
产业链定位悲剧：识破跨国集团阴谋	205
美国：创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就业	207
欧盟：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	209
日本：优势产业与新领域增长战略	211
印度：班加罗尔的国际科技园	214
中国：走服务外包的集群之路	216
越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目标	219
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不容乐观	221

第十一章 全球化进程中的贸易冲突与合作..... 224

金融风暴改写世界贸易格局	224
贸易保护主义阻碍国际贸易	226

一波三折的多哈谈判	229
现代帝国主义的掠夺：索马里海盗的真正原因	231
解读奥巴马访华的礼物：贸易与成本大战	233
希拉里和“同舟共济”：经济飓风下的贸易拉锯战	236
二十国金融峰会与贸易战争防御	238
中美贸易保护争端：轮胎特保案	240
美欧牛肉争端：贸易争端解决程序	242
香蕉大战：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效率	244
第十二章 跨国公司占领全球市场“制高点”	247
跨国公司在没有国界的世界上角逐	247
中石油以 54 亿美元购加拿大能源资产	249
谷歌 7.5 亿美元收购一家手机广告商	251
松下正式并购三洋：电池行业垄断地位将形成	253
新时代跨国公司的文化软竞争	255
借跨国公司的眼睛看中国市场	257
面对危机，跨国公司强化社会责任	259
新兴跨国公司如何占领全球化利益的制高点	261
跨国服务外包的动因与危机后的发展趋势	264
第十三章 南北失衡的粮食问题	267
粮食危机：国际市场粮食供求矛盾加剧	267
粮食战争中发达国家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269
世界粮食交易与跨国粮商的垄断	272
生物能源战略加剧世界粮食危机	274
警惕美国用粮食做“武器”推高粮价	277
中国粮食消费刚性增长	279
粮食危机使俄罗斯地位增强	281
高粮价下哭泣的非洲	282
山雨欲来，各国纷纷出招救市	285
第十四章 石油变局下的世界新秩序	287
石油：威力无比的超级核弹	287

世界大战：为油而谋，因油而战	288
谁是油价飙升的“幕后推手”	290
石油纷争：不宣而战的能源战争	292
日本：为油奔波，夹缝中求生存	295
伊朗：挟油气锋锐，能源外交亮剑	297
美国：“我是老大，我怕谁？”	299
中国参与国际石油贸易面临的挑战	302
高油价是 OPEC 操纵的吗	304
石油储备：争夺石油定价权的强力武器	306

第十五章 大势所趋的低碳经济模式..... 309

绿色建筑：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超级引擎	309
新能源车：助推低碳经济跑起来	311
群雄逐鹿：谁有权掌握碳交易定价权	313
低碳真相：碳交易的玄机	315
碳交易：清洁发展机制双赢机制的出现	318
节能减排：不仅仅是责任，更是利益	320
美国的“低标准”：减排目标遭非议	323
欧盟缺乏诚意：减排责任不只是个数字游戏	325
伞形国家：企图把自己的减排目标与其他国家挂钩	326
小岛国联盟：激进减排方案导致发展中国家阵营分化	329
发展中国家：决不接受强制减排	331

第十六章 资源为王的大国追逐战..... 334

资源争夺战：世界进入资源为王的时代	334
资源博弈：揭秘资源角力中复杂利益链	336
铁矿石之争：储备资源就是储备财富	338
水资源争夺战：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340
稀土角逐战：谁来保卫中国的稀土资源	342
冰雪覆盖的北极成为大国争夺的新战场	345
南极注定是一个让大国为之争吵不休的地方	347
欧美强国加紧争夺非洲石油资源	349

日本挑战海洋，努力加强海洋资源大国的规模	351
资源争夺战是中国输不起的“最后战争”	353
非洲买矿记：获得海外资源何其难	355
印度：非洲大陆上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358
第十七章 世界能源的现状、危机与开发利用.....	360
日益激化的全球能源问题	360
巴基斯坦出现严重的“电荒”	362
欧盟的日子也不好过	364
美国能源的“新生命线”	366
俄罗斯用能源“套牢”欧洲	369
谁在散布“中国能源威胁论”	371
能源危机下的各国应对之策	373
加快完善能源储备机制	375
能效时代，节电势在必行	377
北冰洋暗战升级的醉翁之意	380
中亚国家与周边大国的双边能源合作	382
开发新能源：人类最后的抗争	384
能源民族主义逐步升级	387
第十八章 新世纪的新型战争.....	389
新世纪战争新趋势：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竞露锋芒	389
警钟：中国，我们所认知的信息战	391
金融资本大战：一个华尔街的幽灵——高盛	393
产业资本大战：世界很小，必和必拓很大	395
转基因大战：来势汹汹的产业资本孟山都	398
焦炭大战：“焦炭出手，打击矿石”的幻象	400
汇率大战：美国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402
汽车大战：美国版《潜伏》	404
文化大战：当孔子遭遇阿凡达	406
第十九章 世界经济大趋势将去向何处.....	409
纸牌预言，经济危机还将持续 10 年.....	409

美国当老二，谁敢当老大	411
中国的经济成长持续到 2022 年	413
危机过后，欧洲辉煌难以再续	416
崛起中的强国：地缘政治的图景在变化中	418
人民币会不会成为基轴货币	421
过度虚拟将主导 21 世纪金融危机	423
第四波科技浪潮下的国力竞争	425
传统思维已不适应全球化时代	427
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与全球治理的再选择	430



世界经济现在走到了哪里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可能二次探底

老施到西班牙已经十几年了，刚开始时是在教会工作。来西的第4个年头因为一些变故，停止了教会的工作和妻子儿子在瓦伦西亚开办了一家糖果店。开始生意一直都不错，据他介绍：“之前没有金融危机西班牙真的不错，有很多拉美移民来到这里，而且因为当时西班牙经济还可以，所以工资待遇也不错。拉美人赚得多就花得多，每次来买东西都选相对贵的。但现在比如酒都挑最便宜的，以前全要贵的。你看现在因为经济不好这条街上的拉美人也少了，都回自己的国家了。这经济越来越差。”

从2008年开始，西班牙的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至今已经有3年时间，在这3年里，经济持续低迷，未有好转，虽然身处西班牙的海外华人所受到的冲击较小，相比其它国家移民甚至是本国国民来说，境遇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西班牙华人所从事的各行各业也都多多少少受到一定损失。因此，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很多华人纷纷卷起铺盖走人，而这些返乡的人群中，不仅仅只有那些生意艰难做不下去的侨胞，还有很多工作稳定，甚至是生意做的还不错的老板，都纷纷准备离开西班牙，回国发展。

2011年上半年，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在内的多数发达经济体都出现经济增长减速。尤其是在欧洲债务危机持续恶化、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遭降的背景下，市场开始担忧发达经济体将陷入衰退，并导致世界经济二次探底。

美国商务部2011年7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实际增长1.3%，低于市场预期的1.7%；同时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也由原先预测的1.9%大幅下调至0.4%，创下经济衰退结束后的最低季度增幅。

2011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速远低于2010年2.9%的增长。美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然不足,2011年7月,美国有超过一半的州失业率继续上升,消费和工业生产疲软,住宅市场仍萎靡不振,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信心不断减弱,这些不利因素恐将推动美国经济今后进一步走低,二次衰退的风险不断上升。

欧洲方面,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第二季度,欧盟与欧元区经济环比均增长0.2%,同比均增长1.7%,比第一季度增速有所放缓,欧元区两大经济体增速也大幅下滑,德国第二季度经济增幅从第一季度的环比增长1.3%下降到0.1%,法国经济增长速则从第一季度的0.9%下降到零,英国第二季度经济环比仅增长0.2%,经济复苏几乎陷入停滞,欧洲经济二次衰退的风险也在提升。日本经济则已陷入技术性衰退,目前仍未恢复,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去除物价变动因素并经季节调整后,第二季度日本实际GDP环比下降0.3%,按年率计算下降1.3%,这是日本经济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结合物价变动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名义GDP环比下降1.4%,按年率计算下降5.7%。

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都出现回落;一些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增大,引起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上升。这些都表明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这是普遍看法。权威人士认为,大的经济体目前特别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非常敏感复杂,很可能继续恶化,并很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可能这一次不是到底,还会继续走向衰退,如果解决好这这也是一个平底锅的锅底,一个长期的、持久的、缓慢的复苏。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会引起另一次新的经济危机。”

由于目前欧盟并没有行之有效的应对债务危机的措施,南欧的主权债务危机将很可能导致欧洲经济的全面崩溃。他说,尽管欧洲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却缺乏整体的财政政策,各国自主借债违约后产生的风险由欧盟总体经济埋单的行为,导致整个欧洲经济的下滑。

与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不同,发达国家政府提振经济的手段已越来越少,被称为“末日博士”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努里尔·鲁比尼指出,直到2010年,政策制定者还能以零政策利率、量化宽松、财政刺激等各种手段刺激资产价格膨胀和经济复苏,但现在他们已没有什么刺激手段可选。

在欧洲,不但欧元区外围国家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务问题突出,核心国之一法国也遭到市场对其主权信用的质疑,而标普调降美国信用评级更是将市场信心拖入低谷,引发连续两周的全球股市下行震荡,尽管从安全性、流动性等综合指标考察,美债依然是长期投资者资产配置的主要选择,但长期

而言美国信用固若金汤的观念将发生变化。

摩根士丹利认为，美国以及欧元区正濒临再次陷入衰退的险境，2011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速将仅为1.5%，近期一些国家的决策失误，尤其是欧洲对于主权债务危机反应迟缓以及美国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的政治闹剧给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损伤，并影响了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未来几年内，欧美经济将持续低迷，疲弱难振。摩根大通中国区全球市场业务主席李晶亦坦言：“10年低增长我不敢说，但未来2~3年，欧美的经济增长率肯定是比较低的，而且也看不到有什么刺激经济的方法。”

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与深刻调整

中国商务部长在法国巴黎与工商界人士见面时说，中国要用8亿件衬衫才换得一架空客380飞机。这位部长的言论传回中国，让国人十分震惊，但却是严酷的事实。

严酷在哪里呢？可以解读的地方很多。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这两种商品的价值量肯定被扭曲了。而多年来，发达国家就是这样，利用种种游戏规则和实力优势，对新兴经济体的剩余价值进行毫不留情的攫取，但因此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写了《亚洲的复仇》一文，在解析华尔街金融危机时，提到一个很特别的理由，就是“储蓄过剩”问题。由于新兴经济体特别像中国这样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与石油输出国的总储蓄过剩，为高收入国家的高负债消费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这场金融危机在高收入国家爆发。

国际经济大环境从上世纪70年代就一直处于不稳定的失衡状态，近年来演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了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全球外汇储备失衡。数据显示，全球外汇储备自2000年起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大幅超过国际共同认定的三个月进出口需要的合理水平，亚洲各国外汇储备平均水平增长更大。2000年全球外汇储备1.936万亿美元，2010全球外汇储备达到8.986万亿，是2000年的4.5倍。2001年开始外汇储备逐年以超过18%速度快速增长，其中半数以上年份增长超过22%，远远超出全球同期3.93%的贸易增长和全球同期2.5%的经济增长水平，带来全球外储的空前失衡。

第二方面，国际贸易失衡。全球贸易失衡始于上世纪70年代。历史数据研究显示，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占GDP不到1%的贸易逆差主要对应德国、日本以及南美各国的顺差。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美国逆差扩至占GDP的3%左右，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成为对应美国贸易逆差增长的新的贸易顺差国。进入21

世纪，美国贸易逆差最高扩大至 6% 左右，中国成为美国新的贸易顺差国。2007 年，美国贸易逆差占 GDP 比重达到 5.85% 的最高纪录，全球也达到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最大贸易失衡。

第三方面，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脱节日趋严重。目前，制造业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但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对外交易中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进行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风险将越来越多地由新兴市场国家承担。2007 年 12 月 27 日，国际清算银行公布，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全年规模达到 596 万亿美元，十倍于全球 GDP 总量。资产价格泡沫迅速膨胀，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快速扩张，最后把失衡推向了危机。

第四方面，全球债务国与债权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布的失衡。由于这种贸易分工与金融分工的失衡直接导致的全球债务与债权分布的失衡。当前中国占全球外汇储备约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 10 大储备经济体中，有 8 个是新兴经济体。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的债务分布，全球十大债务国排行榜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强国，排名前 10 位的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 82%，而美国外债余额已达 13.6 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余额的 23.9%。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深刻背景，就是全球经济发展过度失衡。一些国家以过度的财政赤字、金融部门衍生化和居民负债为支撑，走上了高福利、过度消费的发展道路，造成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另一些国家则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居民消费不足，积累了过多的外部盈余，并向赤字方提供融资支持。

全球经济失衡与金融危机如影随形。例如，上世纪 80 年代日美贸易失衡，导致日元升值、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触发了日本经济危机和日本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当然那一次经济失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

失衡首先是全方位的，不仅是贸易失衡，而是全球商品贸易、金融资本、货币债务等多方面失衡的相互交织。资本、金融和债务的失衡比贸易的失衡更严重。贸易失衡也不只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失衡，而是美国与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失衡。

受危机影响全球消费市场萎缩，全球经济失衡现象持续。2009 年第一季度全球贸易负增长，受刺激经济计划影响，第二季度贸易大幅反弹，危机导致贸易骤降骤涨更不稳定的态势；全球流动性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流入和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大幅上涨，泰国外储超过 1300 亿美元，4 倍于亚洲危机时的水平；韩国外储较 2000 年增长近 3 倍；印度增长了 7 倍；中国外储 2007 年危机前较 2000 年增长 10 倍，危机后的 2010 年，较 2000 年增长 16 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疲软，但金融资产价格已

快速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为拯救危机，发达国家主权债规模空前扩大，美国 2009 年和 2010 年国债规模分别增 18.8% 和 17.61%，大大超过前 10 年平均增长水平 8.72%。2011 年美国国债达到占 GDP98% 的水平。欧元区主权债 2009 年和 2010 年分别增长 8.34% 和 10.24%，是前 10 年平均增长水平的两倍。用泡沫救危机，用新的失衡救危机，会否再次陷全球于更大的危机之中，令人担忧。

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深刻地冲击着旧的经济格局，全球经济处于再调整、再平衡之中。世界迫切需要新的增长动力，引领经济走出危机。

全球经济要走上强劲、可持续的复苏道路，就必须在再平衡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各国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开发，找到新的增长点，而不是重回过度发展虚拟经济的老路。一国无能为力，那么就需要全球性的协调机制大力推动。

遗憾的是，危机后各国在再平衡上难以达成共识。发达国家重振经济的手段，依旧是老一套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赤字危机从居民转移到了政府，欧美主权债务风险大幅上升，进一步传导到金融部门和居民消费领域，经济复苏陷入迟滞。

面对失衡的挑战，未来仍需各国大力协作。应对举措至少包括：

第一，对过度的全球失衡设定约束指标，要求各国采取切实的改革措施，否则将给予强制惩罚。美国率先提出了经常账户余额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4%，但目前看来实施难度较大。

第二，世界各国应在维护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复苏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对发达国家而言，要削减债务，巩固财政；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进一步扩大内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第三，以政府投入为主导，推进新一轮产业革命。在上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之后，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开发和利用可望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突破点。发达国家应充分利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先发优势，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技术转移力度。新兴市场国家则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强力推行新技术的运用，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后危机时代，全球各方需要深入研究失衡的最主要的原因，以找出最有针对性的、最合适的解决方式，方能走出失衡——危机——汇率纷争、贸易摩擦、货币战争——更大的失衡——新的危机这样的恶性循环。

以美国为代表的赤字国一直在经济失衡问题上耿耿于怀，一方面敦促德国、日本等主要“储蓄国”进一步采取措施提振国内消费，另一方面不断逼人民币升值。事实上，早在去年韩国 G20 会议上，美国就抛出了量化全球经济平衡的操作方案，

但没有通过。而今 G20 会议再次把矛头指向全球经济平衡，有关国家试图制定量化经济失衡的共同指标，重订“经常收支的调整方式”，让失衡的责任更多地由创造真实财富的国家来承担。

全球经济失衡是国际分工的失衡，这就决定了纠正全球失衡的措施必须是全球性的、长期的和复杂的，而不是短期的政策性调整能够改变。纠正全球失衡需要各国从解决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入手，进行更加广泛的结构性调整和经济转型，而非通过量化失衡指标就能够根本解决。

债字当头，财政恶化成发达国家普遍难题

日本时任首相菅直人在国会发表就任后首次政策演说时警告：日本财政已成为发达国家中最糟糕的情况，过度依赖国债已让财政持续恶化，就像希腊给欧元区带来的混乱一样，日本若再坐等，将有破产之患。

在此之前，日本都还很乐观地认为，日本国民储蓄率很高，国债的持有人都是日本国民，所以即使国债依赖度高过希腊，应该不至于像希腊一样带来全球的金融危机。

但是菅直人没有这样想。他说，日本如果再无限地发行公债，将在国债市场上失去信赖，导致财政破产。

到 2010 年 3 月，日本多年来累积的债务数额，包括国家和地方的长期债务，已经高达 949 万亿日元（约 10 万亿多美元）。以日本现在 GDP 总额 500 万亿日元来计算，日本债务已经是 GDP 的 1.97 倍，每一个国民一出生就要负担约 750 万日元（约 8 万多美元）债务，是发达国家中的劣等生。经济评论家浅井隆在“日本在 2014 年破产”中严重警告说，一般国家破产大约是债务为 GDP 的 2 倍，日本已濒临破产边缘。

主权债务不仅是欧洲的风险，当前债务问题和财政状况恶化在发达国家同样具有“普遍性”，并成为二战后发达经济体政府负债率上升最快、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中鲜有达标者：美、英、德、法、日五国 2010 年预算赤字分别达到 GDP 的 11.0%、11.4%、5.7%、8.2%、9.8%；而五国截至 2009 年年底的公债余额占 GDP 比例分别为 83.2%、68.2%、72.5%、77.4%、217.7%，财政赤字水平较危机前都大幅提高，负债水平普遍比危机前的 2007 年提高了 15% ~ 20%。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法案。法案内容包括：提高美国债务上限至少 2.1 万亿美元，并在 10 年内削减赤字 2 万亿美元以上。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 2011 年 8 月 5 日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这是自 1917 年以来美国政府信用评级首次被下调。

标普指出，调降评级主要由于美国政府与国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缺少标普所预期的举措以维持中期债务稳定。同时，标普维持美国短期主权信用评级“A-1+”不变，评级展望负面。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中的另外两家惠誉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先后宣布，维持美国的 3A 主权信用评级不变。

美国主权债务问题更需高度警惕。美国财政部在年度财政报告中表示，美国政府 2010 财年赤字为 13.5 万亿美元，高于 2009 财年的 11.5 万亿美元和 2008 财年的 10.2 万亿美元。随着美国 8580 亿美元减税计划的实施，还将不断加大联邦赤字水平，预计 2011 财年预算赤字可能再破 10 万亿美元。

造成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负担攀升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府对金融业的救援力度大且占比高。发达国家政府在 2009 年承诺的融资支持占这些国家 GDP 的 5.7%，而 G20 新兴成员国家的融资支持仅为 GDP 的 0.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发达国家政府落实的融资支持占承诺比例的 44%，收购不良资产占承诺比例则约为 26%。如果政府已宣布的支持政策完全兑现，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则会糟糕得多。

其二，税收收入下降。政府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着重反映在所得税和增值税方面的减征。同时，由于经济活动的下降，如企业经营效益、进口规模的下降，税收基础收缩，从而降低了政府的税收收入。此外，由于经济不景气，一些税收规避行为相对增多，也影响了政府的税收收入。

其三，金融危机造成社会福利开支增加。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普遍上升。例如，西班牙 2009 年底失业率高达 20%，美国的失业率接近 10% 的水平。失业人数规模的扩大自动增加了政府失业保险开支，同时也加大了政府的社会救济开支。

其四，多个发达国家本身存在着结构性财政问题，财政支持政策是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负担高昂成本的无奈之举。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在危机初期的赤字水平和债务存量较高，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财政支持政策，无疑加重了政府进行财政结构调整的难度，例如希腊、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一些国家同时存在着财政结构性问题，与金融危机无直接关系，例如日本、美国等国家。另有一些国家的财政本身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金融危机使债务状况恶化，例如爱尔兰、西班牙、英国等国家。

主权债务危机已动摇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内稳性，甚至开始干扰市场对风险资产的有效定价和资源配置。债务违约风险给金融市场存量风险资产带来了明显的风险敞口，并加剧了风险定价的不确定性。未来各国漫长的财政重建过程，可能使主权债务风险对风险资产定价的扭曲和干扰不再是一个短期效应。

第一个层面是政府去杠杆化。政府应该减少投资，据 IMF 估计，要在 2030 年把国债比例减少到 60%，需要在 2010 ~ 2020 年间，作出几乎是 GDP 九个百分点的预算调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政府也开始了“去杠杆化”的进程。例如，作为欧债危机的始作俑者，希腊政府正积极致力于制定大幅度的财政紧缩方案，减轻财政负担，缓解其严重的债务危机，防止其国民经济、国家信用和政府崩溃，以期能够使自己继续留在欧元区。然而，希腊等债务危机国家的财政紧缩计划，将会降低社会福利、增加税负，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制约社会总需求和经济增长。

第二个层面是金融系统去杠杆化，加强金融监管，防止资产证券泡沫化。美国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导致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杠杆放大。10 年前，美国金融产业的杠杆化是 GDP 的 70%，5 年前是 100%，2007 年则是 137%。金融危机，美国金融提出了去杠杆化。截至目前，美国金融部门杠杆率已从 2008 年初的峰值下降了 26% ~ 20.6%，回到 1979 年第三季度的水平，大幅低于 30 年来历史平均杠杆率。尽管 FRB（美联储）释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银行业拆借市场已有所企稳，但由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银行借贷意愿不足，信贷标准趋紧，信贷市场在零售层面上仍处于紧缩状态，货币乘数缺乏显著改善。

第三个层面是家庭去杠杆化。部分美国家庭也采用杠杆化消费和投资。对于家庭来说，“去杠杆化”就是一个家庭减少使用金融杠杆的过程，即把原先通过各种方式（或工具）“借”到的钱偿还给债权人。家庭去杠杆化，即减少家庭债务。为了减轻债务，家庭消费减少，储蓄增加了。

全球流动性泛滥，新兴经济体持续通胀

与欧美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经济衰退风险不同，新兴经济体需要应对的则是日益高企的通货膨胀。新兴经济体的通胀状况取决于全球的利率环境即美国利率。

2009 年 3 月和 2010 年 11 月，FRB 先后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投放 2 万多亿美元。虽然 QE2 招致来自 FRB 内外的批评，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仍认为

QE2 是成功的。

FRB 8 月 30 日公布的最近一次货币政策决策例会纪要称,最近一轮美国经济衰退比原先预计的程度要深。截至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还没有恢复到本轮经济衰退以前的水平。同时,FRB 的决策者还讨论了其他一些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工具,并准备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

FRB 理事在是否采取新的刺激性货币政策问题上产生分歧。在参加投票的 10 位 FRB 货币政策决策者当中,有 7 人投了赞成票,3 人投了反对票。这种情况在美联储历史上是少见的。反对者担心进一步的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未来通货膨胀加剧。

美联储像是个水龙头不停向池子里注水,这些水大部分被其他国家吸收。有人认为,各国的紧缩政策只能拖延时间等待美联储宽松政策的退出。

当前发达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尤其是对于美国债务型经济体制而言,要想举债就必须提高债务上限,而未来继续增发货币以及“弱美元政策”赤字融资无疑是债务削减的必然选择。

美国将由此大量印钞,美元维持弱势甚至继续贬值的趋势将更加明显,而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泛滥引发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将使通货膨胀问题“雪上加霜”。

2010 年以来,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美元和欧元“轮番”贬值,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3.1% 左右,人民币对欧元升值 11% 左右。

美元和欧元轮番贬值。弱势美元和流动性过剩,将推动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因此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要警惕“输入性通货膨胀”。

同时,由于美欧经济复苏乏力且投资机会少,加上美国超长时间的超低利率政策,巨量投机性资本(俗称“热钱”)将持续涌入复苏情况较好的新兴经济体寻求更好的回报,因此新兴经济体还要严防资产泡沫的风险。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将推高金融资产和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而为日后更高的通货膨胀埋下伏笔。另一方面,“量化宽松”将推动投机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导致这些经济体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

2011 年,中国前 7 个月 CPI 同比上涨 5.5%,巴西前 5 个月通胀率累计达 3.71%,印度前 5 个月批发价格平均涨幅为 9.25%,已连续 17 个月超过 8%,俄罗斯 5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9.6%。此外,越南等“新钻国家”也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为管理通胀及通胀预期,新兴经济体纷纷开始收紧货币政策。2011 年以来,中国央行连续 6 次提高准备金率了,3 次加息,巴西央行连续 4 次加息,印度央行更是从 2010 年 3 月至今已经 10 次加息。

为了消除物价上涨的货币条件，中国自2010年以来共12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冻结银行资金大概在4.2万亿左右，而从9月份开始，保证金将纳入存款准备金提取范围，初步测算在8000～9000亿元。在20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蓄水”逾5万亿人民币。而这些资金主要是用于对冲外汇占款。

2011年10月7日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巴西综合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31%，为2005年5月以来新高。同时环比上涨0.53%，超过8月份0.37%的环比涨幅。

但就在新兴经济体国家紧缩货币政策效果日益显现，通胀率有望在触顶回落之际，由美债引发的这场经济风暴很可能将这些国家抗通胀的努力吞噬。自美债评级遭标普下调以来，恐慌情绪弥漫全球。美、欧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

美国疲弱的经济数据再次引发投资者恐慌，全球股市普跌；受避险情绪影响，国际大宗商品跟风回落，原油期货重挫近6%；金价再受追捧连创新高，1800美元大关已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说：“当前，新兴经济体总体而言都面临通胀压力。”他认为，新兴经济体物价上涨，首先是由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现在全球流动性比危机前还要高，主要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比危机前成倍增加。”

食品价格的攀升是新兴国家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攀升过快的重要因素。食品价格在印度的CPI中占58%，在印尼和泰国占40%，在中国占34%。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称，由55种粮食商品组成的食品价格指数在6月份攀升至234点，同比涨39%。据荷兰合作银行统计，食品约占亚洲国家CPI权重的30%，在印度和菲律宾，食品占比甚至高达45%。

朱民强调：“更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大多处于经济转型期，劳动力、土地、污染控制成本上升很快，也增加了通胀压力。”

当前新兴经济体物价上升仍是一个长期趋势。中国应当在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下，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对通胀的“消解力”。

2011年8月初召开的央行上海总部年中工作会议强调，当前货币条件正向常态回归。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宏观调控的取向不能变。同时，必须根据形势变化，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切实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

货币政策不收紧，通胀难控；而此时货币政策收紧，又无异于“自杀”。在全球经济不明朗以及美元持续走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滞胀风险将越来越明显。

受流动性推动，经济增长较快以及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进入2012年，新兴经济体通胀整体抬头，开始成为全球面临的一个新风险。因此，“外堵热钱，内防通胀”是新兴经济体的头号大敌。

金融危机系统性风险尚未根本消除

从直接原因看，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美国房地产价格下跌波及到金融市场，导致金融机构持有的大量次贷支持证券大幅缩水，但问题的背后是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下所形成的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失衡，以及建立在这个失衡基础上的华尔街投行模式的制度性缺陷。

《断层线》作者借用了地质学的一个概念：断层线。地震往往是沿着断层线爆发的，因此，沿着断层线的痕迹去追溯，可以为把握金融危机及其演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对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解释，而是发达国家贫富悬殊与政治压力之下的过度宽松房贷政策、新兴国家出口导向政策与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金融监管上的尺度不一以及不当的政府干预措施等因素形成了多条“断层线”，这些深层次的不平衡相互作用，阻碍了各自功能的正常发挥，并由此打破了各国为抑制金融膨胀而建立的制衡体系，在积累了巨大的泡沫之后，整个世界金融体系便出现了深度的调整。

作者从社会变迁、政治制度、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货币体系等宏观视角入手，层层推进，并结合对不同体系的微观分析，尝试从系统的角度道出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和演进根源。

作者认为，新世纪以来，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推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现了大量结构性失业现象，导致收入水平的严重不平衡。在政治压力之下，政客们极力推动以扩大住房信贷为代表的宽松信贷政策，以使低收入阶层提前消费，改善生活质量，其后果就是助推了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构成了第一个“断层线”。

与发达国家过度消费相对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过度储蓄，由于内部市场狭小，新兴国家对出口型企业的补贴政策会抑制家庭消费，使国内市场受到进一步压制，其巨额的外汇储备又只能以低廉的资金价格流回发达国家，助推了资产泡沫，这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第二个“断层线”。

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加上较高的失业率，使得政府倾向于制定减税、增加支出、降息等宽松的经济政策，一方面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推高了资产价格，形成了第三个“断层线”。

在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加上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的监管放松，使得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彰显，倾向于大规模扩张业务，制造了大量的衍生证券，而各国廉价的资金涌入美国又进一步刺激了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扩张，这是第四个“断层线”。

作者所谓的断层线就是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分析。

过去 10 年，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资本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众多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金融市场网络，不同投资主体持有同质的投资工具。而随着与次贷相关的结构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兴起，上述市场参与主体的联动效应进一步增强。

次贷危机之所以最终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仅是因为相关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结构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而且与金融机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导致风险在金融市场网络中的传播放大密不可分。

在 2008 年中，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AIG（美国国际集团）以及其他一些重要金融机构濒于倒闭，造成很高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金融机构不但规模庞大，且与其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它们一旦倒闭，将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瘫痪，使实体经济陷入萧条。因此，美国政府在当时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以便使这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不能关门。

当地时间 2010 年 9 月 8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俄亥俄州发表演讲。在公布 500 亿美元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及扩建计划后，奥巴马呼吁国会通过一项总额 2000 亿美元的减税措施。

纵观全球几大经济体，复苏前景变数犹存。日本经济毫无生气，经济地位被中国赶超；欧洲债务危机阴霾未散。刺激政策成为抵御危机的法宝。2008 年，世界各国拿出了总计高达 10 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G20”取代“7 国集团”，大国协商“同舟共济”。

曾几何时，随着金融海啸的远去，市场开始倾向于认为全球经济进入复苏通道，但急剧升温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将这一美梦击得粉碎。标普调降美国信用评级后，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哀鸿一片。

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世界经济还没有进入稳步增长的

良性循环，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仍然比较突出，要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并统筹考虑当前和长远的发展，在继续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通过经济结构性的改革，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作为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始作俑者的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并没有改变。众所周知，美国金融扩张是通过推行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政策实现的。美国的赤字经济不仅表现为政府的双赤字，也表现为不断增长的美国公司、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负债和透支。美国过度滥用金融信用，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生产力的增长速度。

国际社会应继续推进全球金融结构调整和改革，加强金融创新、资本流动的监管，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流动性的合理稳定，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还应重视对各国财政金融的监测分析，根据不同情况采取调整措施，降低财政金融的失衡度，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断层线》的作者给出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路线图也是清晰的：减少政府不当的市场干预，制定适应经济周期的监管规则；终结对金融机构的补贴和特权，鼓励金融竞争，变革金融机构的薪酬体系，降低道德风险，消除大而不倒的难题；减少对金融债权的过度保护，逐步淘汰储蓄保险；建立良好的危机缓冲机制，完善金融机构的破产机制等。

简单来说，就是要在继续推行金融市场化的同时，确保金融系统的风险被有效控制和释放。这些建议大部分已被人们意识到，但真正去修补金融市场的断层需要国际社会、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多方势力的博弈，推行起来还是会受到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挠，系统性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既复杂，又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

发达国家结构性失业问题难解

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当地时间 17 日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示威，示威者们扬言要“占领华尔街”。示威组织者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

纽约警方不敢怠慢，当天不仅早早将华尔街完全封锁，就连华尔街的标志——铜牛塑像也被完全封锁起来，内外均有众多警察镇守，警车和警用摩托更是遍布华尔街周围，气氛格外紧张。

不少示威者对警方完全封锁华尔街恼怒不已，但尚未与警方发生对抗。记者看到，不少人选择到华尔街的街角静坐，并带来了帐篷和铺盖卷，意欲打“持久战”。

华尔街附近的保龄球草坪一时间成了示威者们的聚集地。群情激昂的人们在高喊“现在就革命！现在就革命”的口号，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一位匿名示威者说，要通过这次示威“显示民众的力量”，迫使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吐出他们“霸占的人民财产”。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则对形势发展忧心忡忡。他说，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就业，美国国内可能会发生类似于埃及和西班牙的街头骚乱。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了总额 4470 亿美元的就业刺激计划。当前美国民众正翘首企盼政府重整低迷的就业市场。

美国失业率从 2010 年 12 月开始曾经出现过连续 4 个月的下降，市场似乎看到了经济复苏的曙光。然而好景不长，从 2011 年 4 月开始美国失业率终止下降势头，出现了小幅反弹，如今已经连续 3 个月处于 9.1% 的高位。此轮经济衰退期内，美国共损失近 850 万个就业岗位，为二战以来美国历次经济衰退中就业岗位损失数量最多的一次。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复苏势头缓慢、企业增加雇员信心不足，要想在短期内降低失业率难度很大。

欧洲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失业是当前欧洲人的头等“心病”。在这份调查中，受访对象需要从犯罪、失业、物价、医疗、教育、环境、住房等十几个选项中挑出两个自己最关心的事项，结果 48% 的人选择了失业，在所有选项中比例最高，表明失业问题已引起欧洲民众的普遍焦虑。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8 月份，欧元区失业率已连续 4 个月维持在 10.1%，这是自欧元区 1999 年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整个欧盟的失业率也连续第七个月保持在 9.6% 的历史高位。其中，形势最为严峻的西班牙更是高达 20.5%，相当于每 5 个人中就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增添了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成为经济复苏的一大隐形杀手。与此同时，失业大军的不断扩大也增加了政府用于失业救济的支出，加重财政负担。

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门前，数万名来自欧洲各地的示威者举着标语和气球，高喊“不要紧缩政策，优先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口号，市中心道路全面瘫痪。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工会组织了几十万人参加的大罢工，地铁、公交和高速铁路全部停运，巴塞罗那部分示威者还与警察发生冲突。

而在两年前，也就是金融危机即将爆发之际，欧洲民众对于失业的担忧远没有如此严重。欧洲人对于失业之所以变得更加恐惧，主要是因为当前欧盟国家的就业形势正处于最糟糕的时候。虽然欧盟经济自去年第三季度开始迈上复苏轨道，但依然受到主权债务危机威胁，复苏前景变数犹存，这导致企业普遍持观望态度，不敢

贸然招人以扩大生产。因此，就业形势不仅没有随着好转，反而在继续恶化，无就业复苏成为当前困扰欧盟经济的一道难题。

由于失业率高企、工资减少和部分社会补助被取消，中下阶层遭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富裕人群更为严重。西班牙 2010 年的基尼系数为 0.339，为 1995 年以来的新高，贫富差距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媒体分析指出，在此轮经济危机的前期，受影响较大的是那些最为弱勢的群体，这部分人的就业大多集中在建筑业。但随着危机的持续，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也开始感受到“拮据”两字的含义。

正处于经济缓慢复苏的美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促进就业。事实上，美国面临的失业问题主要为结构性失业：有很多工作岗位空缺，却没有合适的人才填补。

劳动技能供需失衡，劳动者技能的更新速度远远落后于技术进步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也成为美国就业市场面临的一大结构性难题。全球著名猎头公司万宝盛华今年 5 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即便在此轮经济衰退周期中，就业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仍有 14% 的美国企业表示找不到具有合适技能的员工。而美国目前持续的失业长期化现象还在损害着劳动者的工作技能，对其就业前景造成长期影响，加剧结构性失业难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1 年公布《世界经济前景半年报告》指出，在全球经济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之时，对抗失业仍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关键性的政策挑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虽然各国政府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仍可能是提振就业市场的主要工具，但尽快重建全球金融业及鼓励增加工人薪资弹性，对提升就业或将起到不可小视的促进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对于那些宏观经济仍有不确定性、但劳动生产力强劲的国家，针对那些特定的目标及临时性的聘雇岗位，采取给予适当经济补贴的措施，或许有助于改善全社会的就业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在那些具备大量短期就业岗位的国家，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及时设计、推出相应的就业保险计划，或将可以促进劳动力市场跨行业流动。”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其会员国的高失业率有何看法？秘书长葛利亚表示：“以宏观政策因应这些复杂挑战的施展空间已经严重耗竭。”他呼吁各国从“结构面”下手，亦即着重于无法明显影响当前就业局面的长期改革。



当前世界经济的格局

美国经济：不稳定的复苏

2007 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应对衰退。从 2009 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扭转了负增长的局面，开始正式步入复苏；但是从 2010 年末 2011 年初以来，复苏势头有所放缓。

在 2011 年下半年已经出现明显的复苏迹象。商业活动变活跃，企业开始增加雇工数量，增加工人工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 8.6%，这些都是积极的经济复苏信号。这一系列经济数据，给正在遭受暴风雪侵袭的美国民众带来丝丝暖意。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增长乏力和失业率高企的困局，复苏前景向好。

企业投资强劲，消费者也开始动员，从汽车购买升温即可见一斑，11 月汽车销售年率达到 1360 万部。汽车销售和旅游业推动消费者支出增长。由日本地震所造成的供应中断影响消退，汽车供应量增加，进而提振了汽车销售，旧金山和纽约地区的汽车销售增幅最大，一些地区的汽车供应商表现强劲。野村证券经济分析师艾伦·曾特纳预测，基于人口趋势及车龄老化，汽车生产及销售将持续扩张，目前美国民众用车的平均车龄为 10 年，达到纪录高位。

美国 11 月份新屋开工数较上月增长 9.3%，折合成成年率为 68.5 万套，好于市场的预期。当月新发放的建筑许可较上月增长 5.7%，折合成成年率为 68.1 万套。此外，NAHB（全美住房建筑商协会）编制的 12 月份住房市场指数也连续三个月实现上升。美国房地产市场可能接近触底，因房产抵押利率处在历史记录低点，加上政府的购买优惠措施，吸引诸多买家进入房地产市场，建筑商信心攀升至 2010 年 5 月以来最高。

美国银行业也开始放贷，上季商业与工业贷款大幅增长，创雷曼兄弟 2008 年 9

月破产以来最大增幅。纽约决策经济学首席全球经济策略师艾伦·斯纳德指出，“美联储祭出经济利好措施时，我们总是会作出反应。美联储的刺激措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认为终究会在某些领域发挥效果。”他表示，如今情况或已有所改变，因美国家庭与银行业在重建资产负债表方面已有所进展。

尽管经济数据喜人，多数经济学家仍只是持谨慎乐观态度。一方面，正如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所显示，失业率下降的部分原因在于大约 31.5 万人主动离开了就业市场。换言之，实际增加的就业岗位数量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多。另一方面，美国经济 2011 年第四季度较快增长和就业增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年一度的假日消费。有统计数据显示，感恩节期间的美国消费市场较往年更加火爆，很多零售商在“黑色星期五”的销售额几乎占到全年销售总额的 1/4。

美联储 2011 年公布的褐皮书报告显示，美国经济复苏步伐仍然缓慢，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动在 9 月仅略有升温，美国民众支出增加，但就业市场缺少改善迹象。报告指出，多数辖区表示经济复苏的步伐仅仅是温和或者轻微，企业前景更加不确定。就业市场依旧疲弱，美联储 12 个辖区 9 月份就业市场状况依然疲软。

伯南克曾将美国经济 2011 年表现欠佳，归咎于“运气不好”，这包括中东油价狂飙，以及欧债危机持续恶化重创股市。

欧元区债务危机肆虐，严重阻碍了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标准普尔首席经济学家贝斯·安妮·波维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在 2012 年仍旧面临诸多挑战，经济增长将在 1.6% 左右徘徊。不过，基于 2011 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显现出的复苏迹象，有可能经济增速将会接近 2%。目前市场中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美国经济总体依然偏弱。由于欧洲债务危机有蔓延的趋势，美国银行业很可能受到外围影响，进而对美国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虽然欧债危机不会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但市场信心依然相对较为脆弱，基于各种不确定性、潜在风险以及低通胀率，美联储仍有可能在 2012 年推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最近，尽管我们看到美国经济有复苏迹象，但是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且十分脆弱。特别要提的是消费问题。美国经济有超过 75% 靠消费提振，一旦消费者停止消费，复苏动力会立即减弱。

投资者的忧虑在于，一旦美国国会决定实施财政紧缩，并且执行过快，力度过大，将会使得消费力大大被削弱，这同时也会打击信心。从目前来看，市场信心依然相对较为脆弱，处在衰退期中。信心在缓慢重建中，一旦信心再度崩溃，你将看

到人们会呆在家中，不愿去外边消费。

奥巴马多次敦促国会共和党议员尽快通过延长工资税削减方案至明年底。奥巴马更警告，若国会不采取行动，则平均家庭税负将增加 1000 美元。可以看到，若然工资税削减方案得以通过，对消费好转态势有支持作用。

“只要我们持续就业增长，推升总体收入，消费者便愈来愈有能力及意愿消费，”曾特纳称，“但月度新增就业岗位必须超过 10 ~ 15 万，才能让经济动起来。”

美国亚特兰大联储主席丹尼斯·洛克哈特表示，当前美国经济增长仍然脆弱，仍不足以彻底解决高企的失业率，高油价和疲软的楼市也为复苏增添了风险。

洛克哈特还表示，尽管当前较高的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短期内推高了消费者价格，但供给冲击带来的通胀影响仅为暂时性。

2011 年 11 月制造业 PMI（采购经理指数）升至 52.7，较 10 月 50.8 高。过去 12 个月，PMI 平均值为 55.6，2011 年 11 月最高，到 8 月陷入最低潮。虽然扩张动力不强劲，但经济总算是以缓慢速度爬行，在扩张与收缩分水线边缘上蹒跚前行。从公布的非制造业指数看，美国经济虽露出多项改善信号，但要整固复苏步伐，仍有明显不确定性和逆转因素。

2011 年 11 月份所有行业工人平均工资减少 2 美元，至 23.18 美元，过去一年，平均小时工资仅上升 1.8%，低于通胀。由于美国经济高度依赖内需推动，消费动力不足，意味美国经济增长也缺乏持续扩张动力。洛克哈特称最新的就业数据反映了过去五年内最好的私营企业雇佣状况，但当前状况还不足以彻底扭转 2008 ~ 2009 年间衰退时期产生的 800 万失业人口。

2011 年 11 月失业率意外下降和零售销售更加强劲都表明，经济逐渐改善。但是，消费者信心并未增强，经济的复苏力道依然有限。

美国企业高管和华尔街分析师也都认为，美国经济仍易受冲击，虽然所受冲击没有欧洲那么大，后者已经滑向衰退，美国第三季经济仅温和增长 2%，缺少强劲的国内动力。

无论是控制欧洲债务危机，还是大幅收紧美国预算，只要有一项失败，美国经济便可能脱离复苏轨道。

“根本不需要多大力气，便能让美国经济脱离正轨。”美国运通首席执行官、兼白宫就业与竞争委员会主席肯·切诺特称。

另外，受大选政治影响，美国国内党派斗争日益白热化，政治僵局将导致政府决策不力，挫伤经济脆弱复苏苗头。近来，美国国会两党围绕薪资税减税和长期失业者救济金政策延期的激烈交锋就是例证。

欧元区经济：复苏中蕴藏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人们曾相信国家是不会破产的，把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向外借的钱称为主权债务。但上世纪 80 年代席卷拉美多国的债务危机，改变了世人这一看法。而如今在欧美闹得沸沸扬扬的债务危机，又让人明白了：富国也可能还不起钱。

2011 年，一轮接一轮的债务风波便接踵而来。严重的债务危机，正在大西洋两岸同时上演。

1 月 14 日评级机构惠誉便将希腊债券降为垃圾级，5 月 9 日，标普将希腊债券评级连降 2 级，从 BB- 降至 B 级，6 月 13 日更是降至 CCC 级，为世界各国之最。7 月 5 日与 12 日，穆迪分别下调了葡萄牙与爱尔兰的债券评级。进入最后一个季度，意大利、西班牙国债收益率再度攀升，其中意大利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甚至超过 8% 的警戒线，意味着这个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很可能陷入类似希腊、葡萄牙与爱尔兰同样的境地。

在整个 2011 年中，应对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几乎成了欧洲政策制定者天天要学的“必修课”，而已呈“双速”之势的欧元区经济蜕变为易碎品，在内部主权债务危机升级、外部经济复苏放缓的双重压力下，逐步滑向“二次衰退”的边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元区经济陷入衰退，2009 年 GDP 同比下降 4.1%。此后，受大规模刺激政策影响，欧元区经济逐步企稳，并于 2009 年第三季度触底反弹，四个季度 GDP 环比分别增长 -2.5%、-0.1%、0.4% 和 0%。

2010 年欧元区实现 GDP 增长率 1.7%，与美、日等国相比，经济复苏缓慢。第一季度环比仅增长 0.4%，而同期美、日复苏力度强劲，分别增长 0.9% 和 1.5%；第二季度美、日经济复苏放缓，而欧元区触底后实现环比增长 1.0%；第三季度受全球贸易增长放慢影响，欧元区环比增长 0.3%；第四季度欧元区投资大幅下降，出口放缓，环比增长 0.3%。

从 2011 年初到年末，从整体上看，欧元区经济复苏一直难有起色，特别是步入下半年后，形势更为严峻。欧盟统计局 2011 年 12 月初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受债务危机拖累，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经济环比仅增长 0.2%，与二季度持平，低于第一季度的 0.8%。同比来看，欧元区第三季度经济增长 1.4%，低于第二季度的 1.7%。经合组织 11 月末发表的公告也称，欧元区经济 2011 年第四季度将环比下滑 1%，明年第一季度环比继续下滑 0.4%。

欧元区经济各项主要指标在年末均呈现明显下滑态势，对外出口回落、产值萎

缩、企业订单大幅减少、社会消费零售额下降，而失业率却攀升至欧元启动 13 年以来的峰值。

欧元区经济前景依然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下行风险巨大。欧洲金融市场紧张状况加剧，正继续打压欧元区经济活动，前景依然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和大量的下行风险。

但欧洲经济也有亮点，北欧国家经济恢复增长，特别是德国等核心欧元区国家表现强劲，而南欧国家深受债务危机困扰，将持续衰退。以高端制造业为主的德国经济增速预期却升至 2.9% 和 0.8%。与深陷债务危机而艰难跋涉的欧元区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德国各大制造企业高调发出扩大生产规模及增加员工计划。

欧元区经济整体不振，主权债务危机自然是主要祸因，各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纷纷采取了紧缩措施，导致政府支出与公众福利下降、失业率上升。

为了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的负面溢出效应，确保欧元区的稳定与发展，欧洲国家领导人付出了巨大努力。从 7 月 21 日峰会的希腊第二轮救助、扩大 EFSF（欧洲金融稳定工具）规模，到 10 月 27 日峰会的希腊债务减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杠杆化方略，再到年终得到英国以外 26 个欧盟成员国支持的“财政契约”，欧洲开出了一张张“药方”。但在悲观预期的影响下，市场似乎并不买账，主要欧元区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仍居高位，而欧元兑美元的比价也勉强维持在 1 欧元兑 1.30 美元一线。

为应对欧元区的疲弱境况，新上任的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可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上任后连续两个月降息，将基准利率下调至 1.00% 的纪录低位。

值得警惕的是，主权债务危机正在欧洲境内演变为银行信贷危机，10 月份德克夏银行被迫拆分，已经向欧洲政策制定者发出强烈的预警信号，而救助银行业由此也上升为与救助“欧猪五国”同等重要的地位。官方数据显示，欧洲银行业持有大规模的欧洲主权债务，其中法国的风险最大，仅国内四大银行就持有 4190 亿欧元（约 5599 亿美元）。进入 10 月以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接连对法国提出降级警告。

高盛集团曾对欧洲可能陷入“死亡螺旋”发出警告。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哈丘斯则制作了一张图，解释了所谓的“死亡螺旋”，即更高的负债率与更深的衰退之间通过债务本息、政府税收、公司利润及银行偿付能力等途径形成的恶性循环关系。欧洲知名智库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所长让·皮萨尼·费里也说，当前的最大危险是银行业危机与债务危机的“恶性互动”，欧洲各国的银行持有大量本国的主权债务，而各国政府又承担着救助各自银行的“重担”。他说，这一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危机将继续蔓延，甚至有可能失控。

比利时著名智库“Friend of Europe”（欧洲之友）主任吉尔斯·梅里特表示，当前面临最严峻的问题是，欧盟领导人给出的信号不够明确。虽然在 12 月初的峰会

上达成了一个“财政契约”，但对市场来说仍缺乏明确信号。

圣诞节第二天，摩根士丹利驻伦敦首席全球经济师费尔斯带领的全球经济研究团队公布了 2012 ~ 2013 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进一步下调了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如果欧元区分裂，2008 ~ 2009 年的危机也将相形见绌。

虽然欧元区面临重重危机，但欧元和欧元区不会在顷刻间陷入崩溃。欧元的基础是欧洲一体化，只要欧洲一体化不发生根本逆转，欧元就不可能崩溃，欧元区各国会“誓死”捍卫欧元，只是还没有到“千钧一发”的时刻。

欧元区各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德国，已经制定了诸多备选方案，现在的“固执己见”主要是为了逼迫一些国家作出改革，关键时刻会出“绝招”。正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所言，解决欧洲债务问题无法一蹴而就，欧洲国家要走出困境并重振经济需要耗时 10 年，“欧洲的每个成员必须努力，按要求实现指标”。

欧元区国家加强合作和治理，通过改革而逐步迈向联邦化，这将在欧盟范围内造成强烈冲击。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欧元区核心国家联系更加紧密，而欧盟外围国家则有可能逐步被边缘化。

日本经济：延续危机后的增长周期

对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这都是一个残忍的故事。1980 年代，日本制造的汽车和电器在全世界通行无阻；东京 225 指数达到了惊人的 38915 点；东京地价达到顶峰；银行开始追着企业放贷；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三菱公司以 14 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但泡沫，在 1990 年 3 月开始破灭。

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在这一泡沫破灭不久后就死去了，他在绝笔——《为了给日本创造明天》（1996 年 2 月 12 日）中如此描述在泡沫经济中舞蹈的日本人的狂热姿态。“银座的‘三爱’附近的地价……在昭和 40 年（1965 年）的时候还只有 450 万日元一坪，而 22 年后的昭和 62 年（1987 年），却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 1.5 亿日元。”

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始于 1990 年 3 月地价的突然下跌，这继而导致了日本经济整体的滑坡，因为地价的下跌会导致金融危机。1990 年代“失去的十年”，正是银行受制于大规模的不良债权导致资金不足——即深陷金融危机的结果。从那时候起到 2003 年，日本经济仅停留于每年 1% 的低增长率。不，可以说直到今天，2010 年，这一低成长状况依然在持续。

泡沫经济的破灭，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各种问题都涌了出来。日本经济陷

入了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至今尚未彻底摆脱。

2010年，以4000多亿美元的优势，中国GDP总量超越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终结了日本40多年的“经济奇迹”。

这十几年来，零利率的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债务与GDP的比例已达到令人畏的180%——轻松拔得全球富国中的头筹；人均国民收入已经下降到世界第十九位，而且是一个存在巨大贫富差距的社会。

回顾2011年，对日本经济来说是艰难曲折的祸不单行的一年：一方面是受国际大气候影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下滑，世界经济减速，导致日本出口受到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自然灾害祸不单行，“3·11”东日本大地震使日本经济遭到沉重打击，企业生产链中断、电力不足严重掣肘日本企业的生产，经过6个多月努力，日本企业好不容易恢复正常生产，但10月泰国洪水又泼了一瓢冷水。

日本12月21日发表的贸易统计数据表明，11月日本贸易逆差为6847亿日元，创11月单月逆差幅度最大纪录，而且是连续两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具体说来，日本11月出口额同比减少4.5%，为51977亿日元，连续两个月同比下降，除对中国、泰国的半导体出口下降外，对美国和欧洲的数码相机等影像设备出口也大幅减少48.5%，对欧洲汽车出口也在下降。

日本11月进口额同比增加11.4%，为58824亿日元，连续23个月增加。受核电站停止发电影响，火电发电燃料天然气进口增加76%，从中国和韩国进口手机等通信装置增加42.7%。对泰国的贸易出口减少24%，从泰国进口减少11.9%。

另外，设备投资的先行指标机械订货10~12月时隔4个季度变为负增长，住宅投资9月份开工户数环比减少20.2%，民间消费下降，日本7月电视改为数字播放，此前很多家庭都更换了电视机，7月以后电视机消费连续3个月环比下降。

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指出，日本国内使用的零件自泰国进口约占33%，国内汽车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泰国洪水可能导致日本2011年第四季度GDP较上一季度减少0.3个百分点。

日本经济专家松原知基认为，由于震灾过后急速恢复局面结束，日元升值，海外经济低迷，出口不振，2011年10~12月虽然经济为正增长，但增长幅度会大幅下降。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则认为有可能出现负增长。

有报道称，日本经济出现井喷式的反弹，日本经济将在2011年末开始进入“活跃增长阶段”，其实不然，7~9月日本经济环比增幅较大，其中部分原因是因4~6月受地震影响经济大幅下滑，和2010年同期相比并没有增长。

日本央行2011年8月4日决定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将资产购买以及有担保

市场操作的资金规模从 40 万亿提高至 50 万亿；该央行还于 10 月 27 日决定将资产购买规模扩大 5 万亿日元至 20 万亿日元，扩大的 5 万亿日元将全部用来购买公债。因日元升值且欧债危机解决过程进展缓慢，令日本经济前景蒙阴。

日本银行（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预计，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潜力仍在，只要政策得当实现软着陆，海外经济将在新兴经济体牵引下重拾增长势头，日本国内震后重建的内需也将逐渐扩大，因此日本经济暂时减速后有望重新回到缓慢复苏轨道。

展望 2012 年度日本经济，日本似乎相对乐观，虽然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但日本政府 2011 年度通过四次补充预算，投入灾后重建复兴预算资金为 18.5 万亿日元，政府预测前三次补充预算（为 16 万亿日元）对 GDP 的贡献度加起来为 2.6 个百分点，民间预测第四次补预算（2.5 万亿日元）对 GDP 的贡献度为 0.3 个百分点，经济效果在下一年度才能真正显现。据《日本经济新闻》21 日报道，日本政府已进入最终调整阶段的预测是，2012 年度日本实际 GDP 增长可能达到 2.2%。

日本电视台指出，日本已出现复苏迹象，且日本的生物、节能、信息技术依然是中国最需要的。2012 年，日本不仅可以从中国市场赚到钱，还能趁中国经济放缓之际，一举夺回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

俄罗斯经济：复苏道路仍不平坦

1985 年 3 月，当戈尔巴乔夫被推举为苏共最高领导人时，苏联已经面临诸多问题：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大量资源被用于维持军备竞赛、经济依靠大量出售原料维持、粮食和日用品消费极度依赖进口。在经历二战后的迅猛增长并完成国家工业化之后，苏联经济在 1975 年左右开始出现停滞。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首先提出了“加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总路线——为此需要大量投资和提高劳动者的效率，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制造业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建设的关键环节。

从 1985 年开始严重下跌的国际油价导致苏联外汇储备大幅减少了 2/3。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亚美尼亚大地震额外增加了预算开支。为提高劳动效率而进行的“反酗酒”运动不仅导致私酿酒泛滥，还因酒类贸易减少而导致预算收入损失。在“加速发展”路线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决定进行市场化改革。

苏联经济开始剧烈的变化，中央丧失了对经济的控制。到 1991 年 7 月，苏联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被解散，计划经济解体。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最大的独联体国家。随后，普京担任了俄罗斯总理，到 2000 年，俄罗斯已经基本摆脱 1998 年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在普京的第二任期

内（2004 ~ 2008 年），俄罗斯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居民收入也快速增长——这是高油价、高投资带来的。同时，俄罗斯未能避免高通胀——年均通胀超过 8%。

2008 年，梅德韦杰夫在普京的支持下成功赢得总统大选。作为总统，梅德韦杰夫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国家制度的全面完善（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司法制度）。但是，俄格战争、金融危机和森林大火严重阻碍了这一进程。

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 8.7%，大量资金外流，以汽车生产为代表的制造业下跌超过 40%。尽管稳定基金注入银行业和实体经济避免了类似 1998 年那样的崩溃，但受影响程度严重暴露出俄罗斯经济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缺陷，诸如对油气价格的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效率低、私有财产保护不力、垄断行业膨胀以及腐败横行等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有加剧的趋势。

在 2011 年愈演愈烈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危机中，俄罗斯经济逆势走强。

首先，2011 年俄罗斯 GDP 总量指标将恢复到危机前最好水平，预计全年增长约为 4.6%，这将填平 2009 年经济下跌 8% 造成的缺口。

其次，预算扭亏为盈。2011 年 10 月联邦预算盈余 1.4 万亿卢布，预计全年盈余约占 GDP 的 3.5%。俄罗斯的预算状况是 2011 年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好的。而且，目前俄罗斯国债占 GDP 的比例只有约 12%，这一比例比所有发达经济体要好得多。经济中高速增长、联邦预算盈余以及合理的国债比例，表明未来 5 年内俄罗斯不存在债务风险。

再次，在 2011 年粮食丰收条件下，俄罗斯通过行政调控、控制货币供给和调节外汇占款等措施，有效降低了通胀率。1 ~ 10 月消费物价指数增长 5.2%。考虑到 10 月份增长了 0.5% 以及新年效应，预计全年约为 6.5%，这将是俄罗斯近 20 年来的最低通胀率。

最后，2011 年俄罗斯失业率由此前的 9% 降到了约 6%，与危机前基本持平。全年商品进出口总额预计将超过 8000 亿美元，增长 32%，进出口规模将超过危机前最好水平。国际储备充裕，仍保持相当的财政储备。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并且持续增长的潜力增加。但俄罗斯经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过度依赖能源出口、吸引外资的规模较小以及国内需求弱仍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瓶颈。

2011 年，国际油价尽管出现起伏调整，但整体处于高位。俄罗斯石油主要品牌——乌拉尔原油的年出口均价同比大涨约 40%，达到每桶 109.35 美元。2011 年初，俄经济发展部曾乐观预计，受益于国际油价大涨，当年将实现资本净流入。不过，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拖累俄罗斯股市和汇市，大量资金撤离俄罗斯市场，全年资

本净流出约 800 亿美元。

但高油价除了使油企的股票表现差强人意外，未能成为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稳定增长的驱动器，更不能阻止主要股指的急剧下跌和改变股市全年走熊的现实。2011 年对俄罗斯金融市场来说是动荡和艰难的一年。

这一年，俄罗斯股市先升后降，全年跌幅达到约 20%，成为全球股市的重灾区。2011 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俄罗斯两大股指——俄罗斯交易系统指数和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指数均以超过 1% 的涨幅收关。然而，从全年情况看，俄罗斯交易系统指数年终收盘点位与 2010 年末时相比暴跌 22%，仅为 1381.20 点，而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指数的跌幅也达到 17%，年终收盘点位为 1402.23 点。

俄政府为抑制通胀，2010 年年初两次上调再融资利率以收紧信贷，直到年底才采取降息措施，这加剧了俄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短缺，金融股由此大幅下跌。

2011 年 11 月 10 日，俄罗斯入世谈判工作组在结束了最后一次正式会议后“功成身退”，宣告解散。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贸易谈判司司长、俄罗斯入世谈判代表团团长马克西姆·梅德韦德科夫宣布，俄罗斯将在 2012 年夏天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俄罗斯结束了长达 18 年的马拉松式谈判，正式获准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迎来了对外经贸合作和自身经济发展的崭新起点。在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危机甚至衰退的时候，俄罗斯得以世贸成员国的平等身份，倚仗绝对资源优势 and 相对资本优势进入欧美市场，从而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从时机上看是非常有利的。同时俄罗斯也将利用加入世贸的机会，既可积极并购欧洲的高科技资产，也会有选择吸引外国投资，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基础设施、加工业和高科技领域。此外，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也标志着俄罗斯在加速经济一体化进程。

俄罗斯政府重视改善投资环境，简化外资进入俄罗斯多个行业的手续，大局吸引外资。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仅 2011 年上半年外国对俄罗斯投资总额就达到 876.98 亿美元，同增长了 1.9 倍。

此外，俄罗斯积极打造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即俄版“硅谷”），为经济现代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兴建俄版“硅谷”是俄罗斯经济转型计划的重要一部分。由于俄罗斯经济过度依赖油气出口，因此俄罗斯政府迫切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经济转型。

到 2011 年底，俄罗斯不仅主要经济指标恢复到了危机前水平，其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 2012 年俄罗斯国内不出现重大的意外情形，未来 6 年内俄罗斯经济非常有可能以 GDP 年均 4% ~ 5% 的增长加速崛起。

拉美经济：快速复苏

30年前，拉美深陷债务危机，美欧为首的西方债主为拉美开出了“新自由主义”药方，拉美国家先甜后苦；1999～2001年，巴西、阿根廷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社会全面危机，标志新自由主义之路碰壁，拉美左翼力量东山再起。

经过10年摸索，以巴西为代表的温和左翼路线逐渐成为拉美各国仿效的模式。而政治理念共识、利益需求接近、发展问题近似，促使拉美国家在地区一体化之路上携手并进。

正当美国和欧洲为庞大的赤字及其对脆弱的经济复苏造成的威胁烦恼时，拉丁美洲却展现出惊人的复苏势头。世界银行预测，该地区2011年的经济将增长4.5%。

“在我的有生之年，竟然还可以看到秘鲁的繁荣。”70岁的马里奥·萨莫拉说。他拥有6家药房，雇用数千来自秘鲁高原的贫困移民来到利马北部繁华的地区工作，帮助他们解决了温饱。

他的药房周围充满了活力和竞争。一家多米诺比萨饼店与秘鲁中餐馆正在争抢顾客。还有许多摩托车和的士，等着把乘客载到夜总会。最近，他的药方旗舰店旁边，新开了一家连锁药店。

较小的拉美国家也在快速增长。如秘鲁，不久之前似乎还是一个恶性通胀、经济低迷、充满暴力的地方，20年来的战争造成了7万人死亡，但2011年4月，秘鲁GDP同比猛增了9.3%。

墨西哥2011年一季度经济增长4.3%，本财年的经济增长可达5%，墨西哥政府表示，该国的经济增长可能超过美国。

自2009年衰退以来，巴西领导了区域经济的复苏，2011年一季度较2010年同期增长了9%。巴西央行表示，巴西经济增长达到7%，创24年来最大增幅。

近年来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不仅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效地一体协调。2010年巴西超越意大利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2011年巴西GDP预计将达到2.4万亿美元，可能超过英国，再次上位。

拉丁美洲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和亚洲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关系。亚洲对大宗商品如铁矿石、锡、黄金有强劲需求。巴西有如铌、钽、石墨、锡等重要矿产资源，其中铌的储量占世界96.4%。铁矿石蕴藏量也极为丰富，且大部分是富矿，可供开采数百年之久。石油储量则排名世界第15位，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8.2%。

拉丁美洲几个经济体的政策也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智利曾批准了一项经济刺激计划，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保护了铜出口的收入，并帮助它从2月地震中复苏。智利经济2011年4月同比增长8.2%，创1996年来新高。

拉美增长还在于国内民众收入的大举增长。最近8年，巴西贫困人口下降2400万人，中产阶级增加1800万人，富裕之后的民众买手机、换电器、购汽车、置房子，带动经济不断繁荣。目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其他大部分拉美国家也都在5000美元~1万美元之间。这种由内需推动的经济增长，使拉美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隔绝来自美欧的债务危机冲击。

拉美经济在恢复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呈现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投机资本大量涌入。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为缓慢，率先走出危机、物产丰富的拉美已成为国际游资青睐的地区。由于投机资本的不断涌入，拉美不少国家的货币普遍升值，这势必会对该地区出口产品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拉加经委会的报告认为，拉美国家应在财政和金融领域采取措施，规范短期资金进入，同时通过加强国际政策协调遏制由此产生的失衡现象。

对原材料出口依赖程度高。目前，不少拉美国家在出口结构上仍以原材料为主，经济增长极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拉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拉美地区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就必须致力于长期性经济结构改革，逐步转变增长方式，增加生产性投资，通过出口结构多元化，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秘鲁前财政部长佩德罗·巴勃罗·库钦斯基表示，外国投资纷纷涌入秘鲁，主要是采矿业。但是，这项投资也有缺点。秘鲁矿业占经济总量的8%，但占税收的一半，一旦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就会产生风险。

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就业形势好转，2011年拉美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较2009年有所下降，但仍有贫困人口1.8亿，其中极端贫困人口近7200万，分别占总人口的32.1%和12.9%。拉美国家需要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商务部官员大卫·罗特科夫表示，“正如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巴西需要改善基础设施，培养更多的工程师”，他说，“但它体现了新兴大国的崛起，这是本世纪的一大主题。”

目前，拉美各国正积极开拓欧美以外市场，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扩大双边经贸合作，努力化危为机。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8月访问巴西期间曾明确表示，应对危机的最佳策略应是贸易多元化，并强调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有巨大潜

力待发掘。随着国际金融环境改善，大宗商品价格的逐渐回升，拉美各国对外出口也有望得到恢复。

整体而言，拉美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只有发达国家摆脱了危机影响并扩大内部需求，拉美的出口和经济才能得到彻底恢复。8月24日，成功预测了这次金融危机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撰文指出，全球经济正在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和金融危机中走出低谷，美国经济将在2011年底正式复苏。这对开始复苏的拉美各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

非洲经济：回升向好

在2007、2008年，从南部非洲到大湖地区的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甚至在遭受旱灾的非洲之角，GDP保持了高速增长。2009年，在全球经济衰退当中，非洲GDP增长率约2%，与中东地区持平，仅次于中国和印度。2010年非洲GDP增长率达4.5%，2011年达到5%，上述增长速度仅次于亚洲，高于巴西、俄罗斯、墨西哥、东欧的经济增速。

事实上，非洲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印度，有10多个非洲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中国。非洲经济发展出现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下列因素：

第一，外部经济拉动。近年来，国际社会对非洲商品的需求持续攀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实施了经济刺激政策，同时通过二十国集团机制加强了国际合作。全球贸易的恢复性增长、海外投资的重新活跃、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原材料价格的回升，对非洲经济复苏起到了拉动作用。

第二，非洲政局空前稳定，推动了非洲经济复苏。在投资领域，非洲国家的产业政策更加宽松，并稳步发展基础设施。结果，有些非洲国家如肯尼亚、博茨瓦纳等已拥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私立医院、收费公路、学校。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改善电信基础设施给非洲人均GDP带来的变化比调整货币或财政政策带来的变化大，它使非洲人均GDP增长了1%。在非洲股市上，近来私有化的当地航空公司、货运公司、电信公司股价攀升。与此同时，许多非洲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构建了光缆通讯，加强了技术合作，提高了本国的劳动生产率，使本国居民增加了收入。

其三，海外人才纷纷回归，导致非洲一些国家的企业家素质有所提高，进而推动了非洲大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例如，在经济迅猛发展的非洲国家如加纳、博茨瓦纳和南非，出现前所未有的人才回归现象。2009年有约一万名专业技术人员回归尼日利亚。尼日利亚的归国技术人员已建起黑非洲第一个私营电力公司，并投资4

亿美元建设了向尼日利亚阿巴市供电的电厂。

第四，非洲的消费群体正在扩大，拉动了相关国家的内需。在非洲 10 亿人口中，中产阶级人数已达 3 亿人之多。尽管他们不可能人人都像亚洲人和西方人那样拥有大量可支配收入，但非洲的会计师、教师、女招待、出租车司机、街头商贩等，对本国超市物品、通讯、银行业务和房地产等商品与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非洲消费群体迅速崛起，正推动非洲的城市化进程。例如，尼日利亚拉各斯市现有人口已达 1800 万，在维多利亚岛的商业中心，房地产价格与纽约曼哈顿一样高。非洲大陆许多城市已成为办公楼、道路的建设工地。在拉各斯附近，已填海建造了一座拥有 50 万人口的新城。

第五，外国直接投资拉动作用。一项对 2000 年 ~ 2007 年间 954 家非洲上市公司的调查表明，这些公司的平均收益率比中国、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同类企业平均收益率高 65%。例如，非洲的移动通讯运营商获取的利润率在全球移动通讯业中是最高的。联合利华、雀巢等跨国公司在非洲利润增长最快。2008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下降 20%，但海外直接投资流入非洲数却比上一年增长了 16%，达到 619 亿美元。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准备将部分制造业转移到非洲。

第六，区域经济一体化。2011 年 6 月，来自东部非洲共同体、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 26 个国家政府领导人和高官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发表联合宣言，正式启动三方自由贸易区谈判，远景目标是建立单一共同市场，在未来 3 年内先期实现三大地区集团内货物自由贸易。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望为本地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非洲国家普遍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信贷向实体经济倾斜，以刺激消费和国内投资。非洲国家还加大了对交通运输与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2011 年非洲经济受地区局势、主要经济体通胀率上升、货币贬值以及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曾表示，“高价食品、贫穷和动乱交织，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非洲之角这样，忍受着如此多的悲剧。”

饱受粮荒困扰。60 年不遇的大旱在整个“非洲之角”迅速扩散，很多地区出现严重的粮荒，超过 1300 万难民只能绝望地等待援助。包括首都摩加迪沙在内的 6 个地区相继被联合国宣布进入饥荒状态，中南部地区严重营养不良比例已超过 50%。粮荒导致大批难民流入周边国家和地区，给地区安全带来巨大隐患。6 月以来，索马里每天大约有 4000 人次因无法果腹而选择背井离乡，来自南部的灾民也不断涌入摩加迪沙，而位于肯尼亚和索马里边境的达达布难民营更是人满为患。

政局不稳。几内亚、科特迪瓦和马达加斯加等国都深陷政治危机。另外，据初步统计，明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约有 17 个国家要举行总统选举。选举可能造成的不确定性因素将可能成为左右这些国家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

虽然国际社会已加大对“非洲之角”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但地区局势长期不稳定、粮食供给缺乏规划、政府农业政策缺失、农业发展意识淡薄、粮价飙升等各方面因素夹杂，旱情好似一把尖刀，把“非洲之角”长期聚集而成的“毒瘤”戳破。

2011 年非洲主要经济体先后遭遇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加剧的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人民生活负担加重。

12 月 1 日，肯尼亚央行将基准贷款利率从 16.5% 提高到 18%，这距离上一次将基准贷款利率从 11% 大幅提高到 16.5% 仅相隔一个月。如此提高利率显示了肯尼亚面临严峻的通胀压力。据肯尼亚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肯尼亚通胀率连续 13 个月上升，11 月份升至 19.72%。

而另两个经济大国南非和尼日利亚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据南非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由于食品和油料价格上涨，南非 10 月通胀率达到 6%，创 21 个月来新高，已达到南非央行 3% ~ 6% 的通胀预期上限。而受煤油和柴油价格上升影响，尼日利亚 10 月通胀率达到 10.5%，超过 9 月的 10.3%，迫使尼央行大幅提高基准利率，以抑制通胀。

伴随通胀而来的是货币贬值。2011 年 9 月南非兰特对美元汇率大幅贬值，由此前的 6.5 : 1 贬至 8 : 1。而肯尼亚先令对美元汇率从年初的 80 : 1 也一路走低，在 10 月中旬一度达到 107 : 1 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非洲经济还面临着世界经济低迷的挑战。一是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风险。如果发达国家需求继续减少，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将对非洲出口收益造成冲击。二是如欧债危机不能尽快解决，其财政紧缩政策将继续对非洲出口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就整体而言，非洲经济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2012 年非洲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向好。

中东经济：步入复苏阶段

目前，世界剩余储油量的 60% 在中东地区，2008 年中东地区的人均 GDP 超过 10000 美元，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和沙特分别达到了 81861、43857、30041、22809、15402 和 14656 美元。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东诸国的经济发展也无一例外地蒙上阴影，这种影响尽管不

像拉美、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那样强烈，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乐观。

当时钟指向 2010 年，中东地区经济开始复苏。沙特等海湾国家是中东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已经成为带动中东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海湾国家的经济增长带动了整个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海湾国家内需增强，进口增加，带动了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突尼斯等国家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出口。同时，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雇用了更多的劳动者，使中东地区劳务出口国的外汇收入大幅提高。

从 2010 年底开始，中东北非地区局势动荡正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场出乎许多人意料的动荡将对这些国家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局势动荡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已大幅放慢。中东动荡国家的经济已因此遭受了严重损失，无一例外出现了急剧减速。IMF 9 月下旬公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埃及经济增速 2010 年达到较快的 5.1%，而 2011 年增速将急剧放慢到 1.2%。突尼斯 2010 年经济增速为 3.1%，2011 年增速为零。而目前仍动乱不息的叙利亚的经济增长则将从 2010 年的 3.2% 急剧下降为 2011 年的负 2.0%。持续动乱的也门经济也遭遇严重打击，2010 年增速达到 5% 左右，2011 年则大踏步后退。

首先，各国支柱经济产业均因动荡遭受严重打击。利比亚和也门是以石油生产为主要支柱的经济结构，2011 年以来的动荡已使利比亚石油生产和出口一度陷入停顿状态。旅游业在埃及、叙利亚和突尼斯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埃及 2010 年的旅游收入高达 125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 11.3%，旅游业创造的就业岗位约占全国就业总数的 1/10。而由于社会动荡，2010 年该国旅游收入预计将不足 100 亿美元，同比减少 25 亿美元以上。

其次，外来直接投资急剧减少。根据总部设在科威特的阿拉伯投资和出口信贷担保公司最近公布的预测，埃及 2011 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将从 2010 年的 64 亿美元剧降至 5 亿美元，降幅高达 92%；利比亚 2011 年的外国直接投资降幅也将高达 87%，叙利亚的降幅预计达 65%，突尼斯的降幅将为 21%。此外，中东一些国家社会动荡也推动物价飞速上涨，失业率迅速攀升，从而又为今后的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要使乱局逐渐平定下来，那就要发展经济，使经济走上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走出校园的青年能够有工作做。在这里，有以下挑战必须克服：

第一，增长必须是普惠性的，特别是就业岗位创造。2008 年，阿拉伯国家年轻人就业与总人口比率为 27%，东亚是 53%。此外，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剧，全世界财富向最高端人群集中的状况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中尤为显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前总裁卡恩认为，中东地区的非产油国在未来两年内需要约 1000 亿美元资金援助。他认为，埃及、突尼斯等国的大部分人口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如果这些国家想实现包容性增长，就不能只看经济数据，而要更多考虑民众的实际生活。

第二，技能发展也是一次挑战，在这一点上，必须以公开为导向的教育体系为重中之重。许多阿拉伯国家已对教育投入了巨资，但问题是这些投资回报甚微。

第三，是民族团结。中东北非地区发生动荡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多数国家没有爆发内战，各派势力正在通过和平方式进行较量。这些发生动荡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发生动荡之前，各国反对派力量都比较弱。而今天，各派势力跃跃欲试，都有心掌握更多的权力。

中东地区是全球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世界对该地区的能源、资源的依赖性是很强的。大家都希望这个地区稳定，都希望能源供给不要中断。



世界经济的新特征

信息革命：世界成为“地球村”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不仅传统经济活动走向全球化，而且生产、服务和技术创新也明显全球化。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兴起，与此相应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出现全球化的趋势，整个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

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不断前进的，信息革命是一种高科技革命。而高科技除信息科技外，还有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开发等各种高科技，而信息科技就是其中最成熟、发展最迅速的高科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网络时代的来临引发了新的信息革命。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微电子、计算机、通信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了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发展最快、渗透性最强、应用最广的关键技术。

微电子技术发展越来越快，芯片的运算能力和性能价格比呈几何级数增长，功能日益强大。软件技术迅猛发展，成倍地扩大了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和功能。宽带移动通信、卫星通信技术等也取得突破性进展。IP 技术及其他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网上信息流量的增长每 9 个月就翻一番。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融合，促使数字化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传统电信网也开始向新一代综合信息网演进。

这场信息革命在经济领域的伟大成果就是产生了信息经济。所谓“信息经济”，它是以现代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为物质基础，信息产业起主导作用的，基于信息、知识、智力的一种新型经济。

信息技术正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甚至思想观念，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信息产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融合度最高、潜力最大、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成为世界各国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支

柱产业。纵观而言，当前世界信息经济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产业规模大，增长速度快

据德国有关部门统计，1997 ~ 2000 年间，信息与通信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总量增长了 50%，达到 20120 亿欧元。与此同时，欧洲区域内的这一总额增至 5760 亿欧元，占全球 29%。

2. 国际化与多极化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区域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企业集团和信息机构都在不断完善其遍布全球的信息网络，将信息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输入、输出，信息产业走上了立体多维的国际大舞台。

3. 数字化与网络化

1993 年，美国宣布实施其“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计划，世界各国也纷纷制定了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已成功地带动了信息产业的发展，而且这种牵引力作用将越来越大。

4. 关联性与带动性

信息产业具有关联性、感应性和带动性极强的特点，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带动了微电子、软件、计算机、通信、网络、激光、超导等关联产业的发展，加速着生物工程与生命科学、新材料与能源、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并促进光学电子、汽车电子、航空电子等产业的兴起。

5. 政府主导性

在高度信息经济时代，信息产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一国能否在世界科技、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要克服信息服务领域“弱肉强食”的无政府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信息市场的失灵，就必须借助于政府部门的权威性管理行为。

那么，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信息产业会朝着哪此方面发展呢？主要有两个方面：

1. 数字化与标准化

计算机的出现是信息数字化时代的开始，数字化实质上是计算机技术在信息领域的全面应用，在信息产业发展上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在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社会信息化进程中，标准化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基础因素。如果没有协调、可靠的标准，很难想像世界范围内使用的不同操作系统、不同语言及不同标准的计算机网络能在一起互联、互通。

2. 国际化与渗透性

信息产业的国际化趋势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技术开发的国际化、生产销售的

国际化和人才流动的国际化。另外，渗透性也是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一个潮流，通过企业之间的重组和合并实现业务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尤其表现为在全球电信业界并购合作之风盛行。

信息技术作为现时代最突出的一种技术力量，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表面的和偶然的，而是本质性的、必要的，信息经济的发展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在全球的兴起和应用，经济的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趋势：

随着各国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建设和互联，不论发达国家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信息化的世纪风暴中，大大加快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促进了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跨国生产经营和跨国信息交换的发展。

从政府、企业、商店、学校、医院到家庭，人类进行生产、管理、流通、科研、教育、医疗、娱乐等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都将逐步实现信息化，网络化将成为现实空间。

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一场新技术变革，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和信息产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

其次，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界的计算机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电视、电话、计算机连为一体。这样就加快了人们对知识的编码整理，并通过计算机和网络迅速传播，由此更多的人可更廉价地获取知识。知识作为一种市场化的产品，它的扩散转化着其他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创造着新的产品市场。

信息经济或称知识经济的来临，给人类带来的是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说蒸汽机、电和电力机所引致的种种发明是人类自然力的扩张，那么计算机所引致的一系列发明则是人类思维能力的飞跃和升华。

人类进入 21 世纪以来，信息通信可以以无间隔的速度传播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例如，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共同瞩目 2003 年伊拉克战争的全过程。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铺设了一条运输商品和资本的新“管道”，使整个世界更加迅速、紧密地联成一体，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和国内金融界限模糊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可以说，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高级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贸易一体化和生产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同时，金融全球化又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将经济全球化推向前所未有的

广度和深度。综观几十年国际金融发展的历史，金融全球化已成为最重要、最显著的特征。

现今，由某个家族或者财团控制国际金融体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从 13 ~ 17 世纪统治佛罗伦萨长达 4 个世纪的美第奇家族，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前期势力遍布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 19 世纪中期开始起家，到 20 世纪初达到顶峰的摩根财团，等等。如今全球大型金融机构无一例外都是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除了欧洲大陆的一些金融机构是国家控股之外，单个股东的持股比例少之又少，由于股权分散，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的结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是人们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名词，抽象而且涉及面广泛。那么，究竟什么是金融的全球化呢？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尚无统一的定义。归纳起来，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核心论、趋势论、过程论和一体化论等。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认为，金融全球化是指各国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金融自由化和放宽管制的结果，但并没有取消各国的金融体系，它们只是以“不充分”或“不完全”形式使其一体化并形成整体。

由此可见，金融全球化具有广泛的内涵，它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金融业跨国境发展而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是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日益紧密关联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

如果说在过去，跨越国境的金融活动通常与各国的国内金融市场相对割裂开来，采取一种相对独立于各国金融体系的形式来进行，并同时受到本国管理法规和国际惯例两套并不完全一致的规则制约的话，那么，如今的跨国金融活动，则是在相同的游戏规则下，采用相同的金融工具，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者和筹资者的过程。

国际金融和国内金融界线日益模糊，金融便全球化了。

那么，金融全球化主要有哪些表现形式呢？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进行分析。

金融全球化的微观表现：

由于金融活动是投资者和融资者通过一定的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进行的资金交易活动，因此金融全球化就是金融活动的全球化。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主要包括资本流动全球化、金融机构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的宏观表现：

(1) 金融机构全球化。包括本国金融机构的准出和外国金融机构的准入两个方面。表现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逐步放宽了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限制，鼓励本国金融机

构积极开展国际业务，设立国外分支机构，从而推动了跨国金融机构的蓬勃发展，形成全球范围的经营网络。

(2) 金融业务全球化。如放松资本流动的限制和外汇管制；在全球范围内调度资金，经营各种业务；开放国际银团贷款，允许国外银行发行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等。

(3) 金融市场全球化。各地区的金融市场相互连接，形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市场。各国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和交易工具日趋全球化。

(4) 金融监管与协调全球化。形成了“巴塞尔协议”及“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等。

由此可见，金融全球化从整体上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发展，带来了众多的利益。但是，现代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传导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金融动荡已成为一种常态。同经济全球化一样，金融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客观上会产生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效应。

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可以通过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来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其次，促进全球金融业自身效率的提高。促进金融机构的适度竞争降低流通费用；增强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和金融发展能力。最后，加强了国际监管领域的国家协调与合作，从而可以适当降低并控制金融风险。

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1) 增加了金融风险。金融全球化加深了金融虚拟化程度。衍生金融工具本身是作为避险的工具产生的，但过度膨胀和运用不当，滋生了过度投机、金融寻租和经济泡沫，剥离了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血肉联系，反而成为产生金融风险的原因。

(2) 削弱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当一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使国内金融市场利率提高时，国内的银行和企业可方便地从国际货币市场获得低成本的资金，紧缩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会下降。

(3) 加快金融危机传播速度。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增加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另外，金融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对发达国家来说。发达国家是金融国际化的主要受益者。发达国家拥有充裕的资金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业的竞争中拥有绝对的优势；但在宏观管理的难度、税收、培养起许多竞争对手等方面有不利影响。

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比较充裕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即发挥后发优势；催生一批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从而改变了单纯依

赖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局面；壮大了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中的力量，有利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是，一旦经常项目连续出现赤字或国内经济出现问题，国际资本匆匆撤离，会严重冲击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发达国家转移夕阳产业和过时技术，也影响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欠发达国家由于经济落后，对国际资本缺乏吸引力，使这些国家金融市场国际化的步伐远远落后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尽管金融全球化带来了部分资金，但许多现代经济部门却被外资牢牢控制，容易变成发达国家的组装工厂。

很显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体系的成员很难置身于危机之外，所以，大家不仅要互助共赢，而且要同舟共济化解风险。

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大发展

目前，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突出特点，是市场经济体系和资本循环突破国界不断扩展的趋势。跨国公司作为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流动的载体，数量和规模也持续扩大，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都不断表现出新的特征。

国际直接投资是生产国际化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纽带。19 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直接投资不断增大，但是其规模、结构、流向等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大变化主要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主要体现在：

1. 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大

1960 年世界对外投资总额累积为 677 亿美元；1970 年达到 1584 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 2.16 倍；1980 年增至 551 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 3.3 倍；1990 年达到 1.76 万亿美元，十年间又增长了 2.16 倍；2000 年增至 6.06 万亿美元，十年间又增长了 3.42 倍。这种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其他一切经济活动指标的增长速度。

2. 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重有所下降。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1997 年发展中国家吸收国外直接投资占世界直接投资流入额的比重为 37.1%，其中亚洲国家占 20.6%。2000 年全球近 80% 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达到 6170 亿美元，占 53%，美国达到 2810 亿美元，世界 49 个最不发达国家仅吸引了全球直接投资的 0.3%。

3. 发展中国家也不断增加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为主体是跨国公司，它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数量大幅度增加。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全球范围跨国公司母公司数为 3.7 万家，所属国外分支机构为 24 万家。到 2000 年，全球跨国公司母公司总数已达到 6 万多家，拥有 80 多万家国外分支机构。另外，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化生产与销售规模空前扩大。1992 年跨国公司在国外的销售额约为 5.5 万亿美元，而到 1998 年已超过 11 万亿美元，大大超过同期全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1999 年，跨国公司海外附属企业的货物和服务的销售额为 135640 亿美元，超过同年世界货物和非要素服务出口规模（68920 亿美元）。

目前世界上 100 个最大经济实体中 51 个是跨国公司，已超过主权国家数量（49 个）。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0 年全球 6 万多家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 14 万亿美元，控制了全球产出的近 50%、世界贸易的 60% 和技术转让的 70% 以上。

跨国公司的跨国投资与兼并活动的扩展，不断改变着国际经济分工协作关系，使生产资本国际化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分布于不同国别和区域的生产过程之间建立起高度依存的关系，并且把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推进到了空前紧密的程度。

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前景一片明朗，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可能会进一步增长。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2005 年在地区层面开展的调查发现，FDI（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是由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带动的。短期内，全球 FDI 流量会增加，但是不同区域的各种预期各不相同。长期而言，FDI 会继续保持其上升的趋势，尽管在 FDI 流量达到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可比的水平之前还需要一些时间。

第二，亚洲和东欧直接投资前景最好。

亚洲和东欧是直接投资前景最为看好的两个地区。拉丁美洲很可能会保持其近期的恢复性增长态势。流入非洲的国际直接投资预计仍将稳定在低增长水平上。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虽有恢复，但短期内仍起色不大；预计美国仍是发达国家中最具吸引力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而主要欧洲国家的前景却并不那么光明。

第三，中国市场最具吸引力。

在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区域选择方面，87% 的跨国公司和 85% 的专家认为中国是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国，至少高出排名第二的美国 30 个百分点，其他排名依次为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前 5 位国家中有 4 位是按照专家和跨国公司的反应综合做出的评价，印度尽管比中国低近 30 个百分点的回应率，但仍然排名靠前。

第四，美国在短期内仍将是全球 FDI 来源国。

美国在短期内仍将是全球 FDI 来源国，其次是英国、德国和中国。除中国之外，排名前 15 位的国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南非、印度、巴西、马来西亚和韩国。其中一些国家仅仅对于邻国而言是重要 FDI 来源国。

第五，并购将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并购将会成为未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新增投资项目非股权投资，如通过战略联盟和特许，预计仍然保持强劲。并购将占发达国家 FDI 流量的最大比例。

第六，生产是最有可能对外转移的环节。

多数生产活动将会被转移到海外。同时，服务业的离岸外包将会继续增长。物流服务是第二个最有可能被转移到海外的企业功能环节，紧随其后的是分销和销售。

第七，服务业的 FDI 前景仍然超过制造业和初级产业。

关于服务行业的 FDI 投资展望比制造业和第一产业的展望要乐观。绝大多数的专家预计，大多数服务行业的投资期望较高。那些有望位于服务业 FDI 投资前位的是计算机、公共事业（诸如发电和电力输送，水和天然气）、运输以及与旅游有关的服务行业。

第八，世界各国会竞相促进投资。

大多数投资促进机构都打算在未来两年里继续增加相关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多数投资促进机构都试图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来促进投资。

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反映出了世界经济的微观基础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对世界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目前，由于 95% 以上的投资促进机构期望利用新的不同的政策措施来竞争 FDI 投资，各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吸引 FDI，其中包括额外的刺激政策、进一步自由化以及其他促进措施等。这表明，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对于 FDI 的竞争在加剧，而且未来会进一步加剧。

区域经济集团化：区域一体化组织大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或集团化是战后世界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现象，一些地缘邻近的国家或地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了谋求本地区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在彼此自愿地约束自己的部分经济主权甚至相互对等地分享或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条件下，通过签订协议、规章组建国际调节组织和实体，使部分或全部生产要素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使资源在成员国内得以优化配置，实现产业互补和共同经济繁荣的过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首先出现于西欧，即 1958 年 1 月 1 日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

体。其后拉丁美洲、非洲、北美、亚洲和大洋州相继出现了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截至 2000 年 5 月 1 日,在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登记的区域性协定达 120 个,其中 70% 是 1990 年以后登记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升级的。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一些地理相近的国家或地区间通过加强经济合作,为谋求风险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了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或国家集团。

欧盟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合作之初,欧盟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实力大大的增强。

进入 21 世纪以后,区域经济发展延续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迅猛发展态势并有所加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各种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集团数量大量增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果明显,许多国家为了谋求自身利益发展,积极参与了许多不同领域的区域经济集团。脱离区域经济集团的国家最终将在国际竞争中失去自身应有的地位。

其次,一些区域集团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区域经济集团的成员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超大区域集团为中心的格局,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南进、欧盟东扩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制度化,世界经济的三足鼎立局面将会更加明显。

再次,区域经济集团之间跨区域经济合作日益频繁,出现了一些跨洲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各区域经济集团采取了开放政策,一方面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加强与非成员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在区域经济集团之间加强合作。北美自由贸易区带动拉美地区经济发展,与欧盟形成跨大西洋的泛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更是地跨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跨洲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正在成为主流。

区域经济之所以迅猛发展,与经济的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一直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联系紧密,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普遍落后于发达国家,彼此分化加剧。

发达国家为了防止竞争优势的丧失,都在寻求区域集团的保护。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难以发挥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也不得不站到区域一体化的保护伞下。

近年来,由于世界上加入各种区域集团的国家越来越多,国际关系也越来越带有区域集团的色彩。在各区域经济集团内部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集团(组织)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加强跨区域经济联系的活动日益频繁。

超越地缘界限的区域合作以及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合作也有扩展的趋势,区域

一体化打破了狭义的地域相邻概念，出现了跨洲、跨洋的区域合作组织，区域集团开始向跨洲域集团方向发展。另外，区域合作出现了多层次性，区域集团的成员身份交错重叠。

随着区域经济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它对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其中，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积极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区域经济的形成，使各国在经济方面都能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但同时也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旦区域一体化形成，国有企业将面临出口和外来竞争的双重压力。

其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让更多的地区经济能均衡发展，防止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越来越大，对区域之间经济交流和发展更有利。

消极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1) 区域外的国家和地区面临更高的壁垒和更大的保护主义，更难以进入该市场。或原有的市场份额被转移到区域内其他生产效率并非全世界最高或成本并非最低的国家了，这个叫贸易转移。

(2)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一方面是相对竞争力更弱了；另一方面一些想进入一体化区域市场的公司为绕开壁垒而将原来投资发展中国家生产再出口贸易的方式变为直接在区域内投资生产。

(3) 不利于多边一体化的建设。在 WTO（世界贸易组织）中多边主义的原则也不适用于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政策，就是说它们之间的相互优惠是别的成员国无法同样享受的。

(4) 各成员的经济政策自由度受到约束，因为要协调一致，总会牺牲到某些成员的部分利益。

由此可知，从表面上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悖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损害了世界经济整体性，但从本质上讲，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走向经济一体化的过渡步骤和形式，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新世纪，各种类型的区域经济集团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掀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浪潮，区域经济的发展新趋势表明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特征。

随着大多数国家参与了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域一体化组织，区域经济集团化作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必将增强世界经济的活力，导致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区域经济集团化将会进一步发展。

合作与共赢：国际组织的大发展

“国际组织”是由两个以上的国家组成的一种国家联盟或国家联合体，该联盟是由其成员国政府通过符合国际法的协议而成立的，并且具有常设体系或一套机构，其宗旨是依靠成员间的合作来谋求符合共同利益的目标。

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发展，国际组织最先出现在了经济领域，继而产生了政治性的国际组织。主权国家的出现和对跨国界交往的制度化需求是现代意义上国际组织出现的基本前提。

19世纪后，独立主权的国家体系形成之后的国家间多边交往需求的增加为国际组织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二战之后，随着国与国之间依存关系的加深，国际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联合国的建立，成为了国际组织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欧洲最早出现了如莱茵河、易北河等国际河流委员会。19世纪后半期，在通讯、公共卫生和经济贸易等方面，出现了“国际行政联盟”的组织形式，如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等。这种以专门业务和行政性的国际合作为目的的组织，成为现代国际组织的雏型。20世纪后，出现了以政治和国际安全为中心的综合性的国际组织，其中有全球性的如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也有地区性的如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国家统一组织等；还成立了各种专门业务性的国际合作机构，如联合国专门机构。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推进，国际组织快速扩张，它们不仅数量上数以万计，而且覆盖广泛，已成为左右世界局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909年，全部政府间国际组织有37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有176个，所有类型的国际组织共有213个，而到1951年，全部政府间国际组织有123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有832个，所有类型的国际组织共有955个，分别增幅在2~4倍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至20世纪80年代末。

这是国际组织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1989年，各类国际组织共有24131个，比1951年增加了24倍多，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数目为4068，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有20063，比1951年分别增加了24倍和32倍之多，其中20世纪80年代10年间各类国际组织共增加了12383个，几乎相当于此前一个世纪国际组织数目的总和。

冷战结束后至今。

这是国际组织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阶段，也是国际社会组织化程度大幅度增强的阶段，2004 ~ 2005 年，包括所有类型的各类国际组织共有 58859 个，比 1991 年多 1 倍以上，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数目为 7350 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有 51509 个，分别比 1991 年多 61% 和 109%。

然而，当代国际组织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的增长和地位的上升，还在于它们的权威性和协调能力的增强，主要有 4 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国际组织具有独立的国际法地位。

国际组织由主权国家所组成，依据主权国家所签订的正式国际条约而成立，得到了主权国家的认可和接受，在此基础上进行独立的活动；同时，要使复杂的国际关系得到必要的规范和有序化，国际组织必须具有必要的缔约权，获得必要的外交特权和豁免，赢得处置管辖范围内事务的权力和从事诉讼的行为能力。

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组织一切权力的来源和授予者。

几乎所有国际组织确立的基本原则都不能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不能违反国家主权原则，不能干预本质上属于成员国内部管辖范围的事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主权国家对国际组织承担规范国际秩序功能的疑虑。

第三，国际组织依据条约或协定而成立。

只有那些自愿接受并在条约或协议上签字的主权国家才能加入该组织，并接受其规范和原则的约束。另外，国际组织拥有能够承担一系列持续职责的常设机构。国际组织要从事经常性活动，随时体现自己的存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功能，都需要一个常设的机构来承担，没有一个常设机构，就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组织。

第四，国际组织拥有采取行动所必须的自主权。

作为国际法主体之一的国际组织能够直接参与国际关系，与各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建立经常的、持久的正式关系，在各国派驻常设机构和代表，与各国或其他国际组织进行谈判和协商，调解国际争端等。

在国家间交往合作愈加频繁的态势下，当代国际组织的发展呈现出了以下几个趋势：

第一，当代国际组织在种类以及活动范围上大大超过历史上的国际组织，它们之间的协调不断得到加强，使 21 世纪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组织的世纪。虽然现代意义的国际组织起源于 19 世纪，但真正为国际组织的兴起提供肥沃土壤的却是 20 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的半个世纪。而恰恰是这个时期，国际组织的种类、活动范围在不断拓展。可以这么说，上至外层空间，下到海床洋底，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教育、卫生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有相关的国际组织存在。

第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龙头的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日益凸现。世贸组织包括其前身关贸总协定的成立，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除了世贸组织，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等国际金融组织，也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这些经济性国际组织，经济全球化就根本无从谈起；它们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标志。

第三，区域性国际组织蓬勃发展。当今世界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有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这些区域性国际组织有的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第四，出现了以欧洲联盟为代表的含有“超国家”因素的国际组织。所谓“超国家”国际组织的成员仍然是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只不过其主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些组织毕竟还只是主权国家的创造物，短期内还不能替代主权国家的角色。但从欧盟的实践来看，一体化发展有加速的趋势，或许欧盟的未来实践将为超越主权的政治实体的出现提供一个区域性的范例。

第五，国际司法机构的不断涌现。以 90 年代建立的国际司法机构为例，在海洋法方面，成立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审理国际犯罪方面，继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之后，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已于 1998 年 7 月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已于 2002 年 7 月 1 日成立。

第六，现代国际组织的表决制度趋于多样化。现代国际法上的表决制度基本上是以一国一票，多数表决为原则，其例外主要是，否决权制度、协商基本一致制度和加权表决制。

从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来看，国际社会组织化的趋势得到了强化，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正越来越离不开国际组织，而我们生活的国际社会也必须有国际组织的存在，这样才能协调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市场经济成为涵盖整个世界的经济体制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资源的品种扩大到世界范围，产生了市场经济全球化。

事实上，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经开始，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

市场全球化，使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得到的合理配置，对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也是世

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世界各国的经济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途径相互交织和融合的过程,从本质上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过程。那么,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成因是什么呢?

第一,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从人类历史的实际演进过程来看,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首先是在西欧产生、具备和完善的,因而经济全球的过程首先也从西欧开始,具体表现为西欧国家的国内市场首先向国际市场拓展,海外国际市场的开拓又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了西欧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此后的进一步变化演进过程也表现为,哪里有市场经济,全球化就扩展到那里;全球化延伸到哪里,那里就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世界上已有99%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全球化也发展到了空前的程度。没有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谈不上经济全球化。

第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导向经济,其核心范畴资本的本质就是在运动中不断增值。资本为了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增值,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利润,就不会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国内,它必须使自己的活动范围跨越国界,使自己全球化。商品、资本等范畴,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它们从产生起,就以特有的动能与势能向全世界进发。

第三,市场经济通过市场配置资源。

现在,全球70%的资源是通过市场配置的。其中跨国的生产要素流动十分迅速,除了原材料、半成品等要素通过国际贸易大量跨国流动外,近年来还突出表现在资金、技术、劳动力通过国际市场的大量跨国流动。

第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活动是市场经济的内容。

贸易活动就是市场交换活动,国际贸易活动就是国际市场上的交换活动,是各国在国际市场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产品价值、采购比国内更物美价廉的生产要素的活动;国际投资实际是国际贸易的深化和拓展,是各国为了更多、更好、更直接地占领国外市场以销售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利用国外生产要素而做出的英明选择,是不仅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商品、而且要在国际市场上直接生产商品的活动;国际金融是应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且国际金融本身就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

第五,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实践主体。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它们先是国内公司,在国内进行商品生产、商品

交换,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推动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 当企业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便继而进行跨国的生产和经营, 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公司。截至 1998 年底, 全世界有跨国公司 6 万多家, 它们在全球的分支机构达 50 多万家。这些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 占世界总产值 GDP 的 60%, 国际技术贸易的 60% ~ 70%, 对外直接投资的 90%, 国际贸易额的 2/3。正是跨国公司穿梭于世界各地的生产经营活动, 把世界各国经济从根本上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可见,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使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跨国界延伸了。伴随着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国的不断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深;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不断扩展。

然而, 透过亚洲金融危机等经济事件, 人们看到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和应对不当可能产生的破坏性,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受市场力量、市场经济规律支配的, 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面性。市场机制从来就有两面性, 即利益和风险并存, 机会与挑战同在。而全球化更是放大了市场机制的这两个作用, 使其产生乘数效应: 一方面, 以各种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 使得市场机制产生的利益和机会倍增, 如若搞得好, 经济可能迅速腾飞; 另一方面, 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市场机制产生的风险、挑战倍增, 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源、市场等的竞争更为激烈, 若搞得不好, 经济可能突然下滑。

从这个角度讲, 经济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是利弊并存。但是, 这个利与弊对于各个国家是不对称、不均等的。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 由于市场经济全球化是在旧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市场经济全球化虽然可以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 加速发展, 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但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 经济全球化可能更多地意味着挑战。

资本流动已成全球化趋势

资本流动就是大笔资金在国与国之间流动, 从而寻求较高的回报率和较好的投资机会。而资本的国际运动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产物。

资本输出是指资本家、垄断组织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 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利息, 向国外进行直接投资或提供贷款。

目前,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已经形成,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卷入了资本主义

市场体系。在许多国家，商品经济已有了长足的发展，铁路、港口、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有了保证，都具备了投资的基本条件。

那么，国际间的投资有哪几种形式呢？

（1）国际间接投资。是资本在国际间通过各种形式的贷款或购买有价证券的形式进行的投资。国际间接投资为不同国家的职能资本提供了融资渠道；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利率机制，引导资本的国际流动；派生出多种形式的金融资产；对发展中国家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意义。

（2）国际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的产生，跨国公司是以本国为基地，通过在其它国家直接投资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在世界范围内从事生产、销售和金融等各种经营活动，以获取垄断高额利润的大型垄断企业。

当今，资本流动已经形成一个全球化趋势，但是，资本流动全球化的程度还是很低。当今世界总投资额中，90%以上是投资在国内的，而对外国投资只占一小部分。

1998年，8个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占世界对外投资总额的83%，克里奇曾对该年这8个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额分别占其投资总额的数据做过统计。统计结果是：美国占5.3%，英国占9.0%，荷兰占12.7%，德国占7.2%，加拿大占6.2%，法国占6.7%，意大利占3.6%，日本占6.5%，平均为7.0%。

因此，虽然目前在总体上对外投资并没有占到一个很大的份额，但在某些行业、某些国家，对外投资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而且对外投资的增长也比较快。

从理论上来说，关于对外投资的利弊分析，一直以来是经典经济学的理论占据主流地位，但是随着对外投资的逐渐增长，支持“非正统”模式的人逐渐增多。

经典经济学派既提倡增加对外投资，也主张大力吸引外来投资。其根据就是从亚当·斯密到萨缪尔森的自由贸易古典理论，该理论认为：自由贸易会使得各国致力于发展自身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充分提高专业化程度；这样，全世界总的生产效率就会提高，而全世界的消费者都会因此而大大获益；能拥有更多的选择、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能获得比以前更高的实际收入。

经典经济学派也承认商品和投资的自由流动会带来一些弊端。一些企业会因为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而倒闭；一些工人会因此而收入降低乃至失业；一些拥有稀缺资源（比如资金）的公司会因为国外同类资源的涌入而好景不再，经营状况下降。但是，这些暂时受损的公司和员工可以转移到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

这样，总的来看，商品和贸易的全球性自由流动给一国经济带来的利大于弊。因此，美国国会在辩论是否应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同盟时，著名经济学家斯克特就提出：虽然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带来一些问题，但美国对外投资的增长对于美国肯定是

一件好事，因为美国的工作职位将会因此而增多，劳动力收入也会因此而提高。

而非正统理论和经典理论截然不同，经典理论认为全球化的资本和商品流动利大于弊，而非正统理论认为弊大于利。非正统理论相信，大量受雇佣者从资本全球化中体验到的是失业、收入降低、环境质量恶化以及社会福利下降。

当然，理论毕竟是理论；单从理论本身是无法判断孰是孰非的，资本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究竟是弊大还是利大，只能依据真实的经济状况来判定。

那么，在现实经济实体的经济活动中，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应有哪些呢？我们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两个方面来看。

发展中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二十年中，第三世界国家为了要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提高自己的独立性，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对外来商品和外来投资严加限制。但后来发现，这样做会使得本国经济发展迟缓。后来，它们改变策略，加强和发达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欢迎外国投资，到后来则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地吸引外资，并实行出口导向战略。

现在来看，那些吸引外资较多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东亚各国、中国、墨西哥、巴西等，经济发展都比较快，大量涌入的外资使这些国家较快地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不是要不要吸引外资，而是如何才能吸引到更多外资。目前，这方面的突出问题是，外资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极不均衡，非洲占的比例太小。

发达国家：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日趋走向全球化，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日益增多，而整体经济也在同步增长，就业率则同步上升。从 1964 年到 2000 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从 9% 上升到 26.5%，对外投资额占总投资的比重从 4.2% 上升到 5.8%，就业率则从 54% 上升到 64%。

这非常清楚地说明，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流动促进了美国整体就业状况的提高。但确实有一些美国劳动者因为进口商品的增加、资本的外迁而失去工作，但他们可以在新创造出来的工作需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现在可能是在制造某些出口商品，也可能是在从事某些出口型的服务业（比如金融业），也可能是在制造某些产品满足国内的新需求。所有这些新的工作岗位都是在经济全球化中新增加出来的，事实证明，一国的贸易和投资越对外开放，一国的整体经济状况就越好。

综上所述，虽然资本的全球化自由流动带来了种种弊端，如第三世界工人工作环境恶劣、第三世界污染加重、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者部分失业、政府对跨国公司

的控制力下降，等等。但是，它更促进了经济的向前发展——不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资本的全球流动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目前对外投资额占世界总投资额的比重较小，但其增长迅速，而且在某些行业，某些国家已经影响较大。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是利大于弊。

因此，不应去遏制资本的全球化流动，而是应采取各种政策设计，以使这种流动既能发挥出对经济的提升作用，又能减少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代价和阵痛。



谁都逃不掉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

如今，很多人每天都在抱怨物价上涨，自己的钱不够花。看起来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确实挺难。不过，早几年的时候，要想变成一个百万富翁很简单，只要一张飞机票。那时候，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机场豪华、现代、气派十足。每一个海外游客，甫一落地，马上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因为根据当时津巴布韦的官方汇率，每 10 美元就可以换到 10.1 万津元，而黑市价则可以达到官方汇率的两至三倍。也就是说，你只要有不到 1000 元人民币，马上就可以跻身百万富豪之列，但是你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这些钱也就只够一辆出租车的起步费。这就是通货膨胀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对于 2010 年全球性物价上涨，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分析称，除了与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有关外，石油、粮食、食用植物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对此轮全球物价上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粮食：2008 年 3 月 27 日，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戈布的报告显示，亚太地区各国面临的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将是未来几年内的最大挑战。报告称，2007 年农作物产品的价格涨幅达到 30 年来的最高点，如大豆价格达 34 年最高，玉米价格达到 11 年来最高点，小麦和油菜籽的价格也创历史新高。报告认为，亚太地区许多国家都面临着食品短缺的威胁，并且“食品价格膨胀”比“油价高涨”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就在报告发布的当天，泰国大米报价从每吨 450 美元涨到了每吨 760 美元，涨幅超过 30%，达到 20 年来的最高点。

铁矿石：以中国进口铁矿石的价格来看，年年都在上涨。2005 年上涨了 71.5%，

2006 年上涨了 19%，2007 年上涨了 9.5%，2008 年又创下了几年来的最大涨幅，力拓的 PB 粉矿、杨迪粉矿、PB 块矿在 2007 年基础上分别上涨 79.88%、79.88%、96.5%。

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同时，美元在同步下跌，或者说，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就是美元贬值的结果，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基本都是以美元计价的。

以欧元兑美元的走势来看：2000 年 10 月 26 日，1 欧元兑换 0.8225 美元。2008 年 7 月 15 日，1 欧元兑换 1.6037 美元。近 8 年间，美元的贬值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美元霸权地位依旧的今天，通货膨胀是任何国家都难以逃避的。正由于美元的无处不在，因美国滥发钞票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令人无所遁形。美元供给增加形成通货膨胀。当美元贬值时，国际市场通货膨胀变得严重起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就会增大，同时，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也失衡，表现为资本顺差过大。这样，进出口出现的贸易顺差与资本项目出现的资本顺差就构成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

除了货币供给因素，由于美元贬值导致的国际市场上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抬高了我国进口这些基础产品的价格，从而引起国内市场价格上涨，并最终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和上游产品领域。由于发展中国家产品大都属于低附加值产品，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位置，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成本。由于上游产业大都被国际垄断企业经营，进一步扭曲了分配关系，使得企业利润过于向上游集中。这种状况同样给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的竞争带来了不利的因素。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美国政府之所以放任美元贬值，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弱势美元促进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减轻美国的巨额债务，由于美国的外债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的贬值实际上即意味着债务负担的减轻。

不得不承认，通货膨胀的危机正在一步步向世界各国逼近。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本国货币大都在国内流通，而非像美元那样可以把通货膨胀压力向世界输送，因此，在美元霸权之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往往遭受着比美国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

通胀在敲门：通胀预期形成的前因后果

为什么现在人们感到恐惧？因为全民都在炒作通胀预期。

通胀预期是一种较为简便的算法，是把前面几年的通货膨胀率相加，再除以年限，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算术平均数。简单地说，通胀预期就是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率

的心理预期。人们已经估计到通货膨胀要来，预先打算做好准备要避免通胀给自己造成损害，然而防范通胀的措施本身就会带来资产价格的上升后果，即对通胀的预期本身就会加快通胀的到来，准备地越充分通胀越严重。

为避免中国经济大幅下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银行在2009年第一季度新增贷款4.58万亿，超过年初央行新增贷款5万亿货币政策目标的90%。3月M2达到创纪录的同比25.5%的增长。如果今年经济保证8%的增长，CPI增长1%~2%，那么17%的M2增长目标意味着，货币供应增长超过经济增长需要的货币需求，加上价格水平上涨需要的货币需求增长7~8个百分点。

如此创纪录的货币发行规模和速度，引发许多关于通货膨胀的担心，尤其是，已经形成新一轮通胀预期的观点也越来越强烈。

通胀预期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原因，但通胀预期往往比通胀本身更可怕。一旦消费者和投资者形成强烈的通胀预期，就会改变其消费和投资行为，从而加剧通胀，并可能造成通胀螺旋式的上升。比如，如果消费者和投资者认为某些产品和资产（地产、股票、大宗商品等）价格会上升，且上升的速度快于存款利率的提升，就会将存款从银行提出，去购买这些产品或资产，以达到保值或对冲通胀的目的。这种预期导致的对产品和资产的需求会导致此类资产价格加速上涨。而这些产品或资产的价格一旦形成上涨趋势，会进一步加剧通胀预期，从而进一步加大购买需求，导致通胀的螺旋式上升。

通胀预期不是真正的通胀，但它却能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者的市场行为，引导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加剧通胀。这样就会改变消费和投资行为，造成通胀螺旋式的上升，推动形成实际通胀，进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因此，管理通胀预期不能有丝毫松懈和麻痹。

通胀预期或者通胀心理预期的形成，严格说来，不仅存在对“不确定期限的未来”通胀的担心和判断，而且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已经切实影响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正常行为。

强烈的通胀预期会使消费者认为价格还将不断上涨，于是开始抢购一些并非必需的商品，人为造成需求的上升；生产商认为价格会不断上涨，便改变正常的销售行为，刻意囤积商品，以期随着价格上涨，将来用更高的价格出售，谋取更高收益，人为造成供给不足。需求的上升和供给不足，结果是推动价格进一步上升。价格上涨要求工资上涨，工资上涨使货币需求乃至货币供给上升，经济运行中的货币在更高水平上均衡，如此循环，通胀预期就变成了真实通胀。

管理好通胀预期是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之一。社会各主体应主动适应

政策环境的变化，改变非理性预期，管理好自身的资产和负债，有效配置资金和风险，共同营造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政府利用宏观政策管理通胀预期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管好通胀预期，应努力消除或减少引起通胀的体制性因素。

继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关注地方投资的扩张，增强区域政府投融资的透明度，防止出现区域性财政风险。防止和减少各地对金融机构正常经营活动的干预，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第二，应努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继续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尤其是扶持粮食、生猪、油料、奶业、禽类的生产，同时加强对农产品流通的管理和规范。特别是，应注重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管好市场，制止哄抬价格、串通涨价、散布涨价谣言等违法行为，保持市场的正常秩序和消费者的理性决策。重视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低收入群体不因价格上涨而降低生活水平。

第三，应保持融资总量的适度增长。既要密切关注融资总量的增长，又要积极促进融资结构的调整，推进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进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应密切关注经济金融发展趋势，把握好不同宏观政策目标的均衡，合理选择政策工具，调控市场中的流动性，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建立更加审慎的金融管理制度，适时调节和防范风险。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防止短期资本的冲击。同时，继续深化金融改革，积极推动金融转型，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综上所述，管理好通胀预期是国家通过宏观调控管理通货膨胀的重大任务之一。

通胀效应：通货膨胀带来的财富再分配

在日常生活中，物价飞涨就意味着财富缩水，每天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不经你同意就伸进你的钱包。你能够感觉到钱每一天都在少，却看不见那只手的影子，这只手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它是以什么方式转移了我们的财富呢？

在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所有人都真切地感觉到财富在迅速缩水，倘若财富总额是一个恒量，那么博弈的结果必然是此消彼长，有人赔就会有人赚；倘若社会的财富总量在增加，为什么多数人的感觉却是自己赔了呢？

通货膨胀的唯一根源是政府或者中央银行故意或者无意地创造了过量的货币供应，货币供应超出货币需求，货币当然贬值，价格必然上涨。但重要的是，价格上涨不是同步的，即不会在同一时间上涨，也不会以同一比例上涨。相反，不同商品

和服务的价格会陆续上涨，且上涨幅度大不相同。恰恰是由于这一点，通货膨胀具有一种逆向再分配的效应。

在金融生活中，总是有些人先得到了若干货币，在他人之前花销这笔钱。这些人会是谁，则取决于实现货币流增加的具体方式。第一批得到增发货币的人会将这笔钱花出去，或者用于投资，或者用于消费。这样就会抬高他们所投资或购买的商品、服务的价格。于是，后一行业的企业的收入增加，它们又增加投资或消费，再对它们所需要的投资品或消费品的价格产生影响。

这就如同向水中扔进一块石头，涟漪从中心向四周扩散。最早上涨的那些价格就必然会一直领先于其他价格，在特定的通胀时期，新增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行业。相反，越往后，价格上涨的幅度会越小，相关企业及其员工所能获得的收入增加就会越少。

不论在哪个国家，按照增发货币的模式，新增货币当然首先会流入政府部门，大量货币也会以政府投资的方式花出去。总之，被政府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行业，会最早得到增发货币。这些企业及其雇员的收入会首先提高。他们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会带动相关企业、行业收益增加。

相对来说，价格最晚上涨的，肯定是距离权力最远的企业和行业。而所有这些价格上涨会波及到较为重要的最终消费品——食品。应当说，距离权力最远者，比如农民，也可能因为猪肉、粮食价格上涨而享受到一点好处，但在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价格上涨之前，其他商品与服务价格早就涨上去了，而彼时，他们的收入却并无增加。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就已经成熟，政府必然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干预价格，于是，他们本来要得到的好处就流失了。总起来看，他们是通货膨胀的净损失者。

倘若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发生是温和的，那么通胀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不大。因为在这种可以预期的通胀下，各种名义变量即名义工资和名义利息率等，都可以根据通胀率来进行调整，这种通胀并不会带来太大的财富冲击。唯一的影响就是，人们将减少自己持有的现金量。

但是，在通胀率无法完全预期的情况下，通胀将会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和经济活动。因为此时人们不能准确地依据通胀率来调整各种名义变量以及他们应该采取的经济活动。通胀会造成财富的再分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信贷角度看，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通胀将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一般来说，借贷的债务契约都是依据签约时的通胀率来确定名义利息率，因此在发生了通货膨胀以后，债务契约无法得以更改，从而让实际利息率下降，所

以使债务人受益。

倘若这种关系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那么通货膨胀就会更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在中国，民间借贷大都发生在熟人之间，就算拉下脸要了利息，考虑到通货膨胀，最终还是债权人赔钱。通过通货膨胀，你可以占到熟人的便宜，可是不管怎样，你不能奢望从银行那里也能够捞上一把。银行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它早就已经意识到了通胀的威力，总是率先上调贷款利率，物价上涨 10%，利率便会上调 10%，甚至更高。

第二，对企业而言，在雇主和工人之间，通胀将对雇主有利而对工人不利。因为在不可预期的通胀下，工资增长率无法快速地根据通胀率来进行调整，从而在名义工资不变或者略有增长的情况下，让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会让利润增加，而利润的增加有利于刺激投资，这就是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以温和的通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理由。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种状况仅仅发生在温和通胀中。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企业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在这样的状况下，工人和雇主都不会从通胀中受益。

第三，工资总是会有所增加，伴随着工资的增加，达到纳税起征点的人数也随之提高了，有更多的人进入了更高的纳税等级，这样就增加了政府的税收。可是，公众纳税数额增加，实际收入却减少了。通过这种通货膨胀，政府所得到的税收叫做“通货膨胀税”。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这其实是政府对百姓财富的掠夺。通货膨胀税的存在，既对储蓄的增加不利，又会影响私人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总之，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一般来说，收入较低者所从事的行业通常是价格上涨最晚、幅度最小、持续时间最短的，而收入较高者所在行业的价格上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上涨幅度也最大。通货膨胀型价格上涨必然会使低者愈低、高者愈高。这也正是过去几年来人们亲身体会到的一种现象。

深入通胀的内核：剖析通胀产生的原因

最近几年，通货膨胀成为全球性大难题。美元贬值下的全球性通货膨胀，美国几乎是唯一的受益者，而相关国家则苦不堪言。全球通货膨胀，美国是重要根源之一，而通货膨胀正是劫掠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经济学家莫瑞·罗斯巴德对此有过系统的论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的国家和政府本质上都是通货膨胀主义者，各国政府和世界中央银行操纵某种世界通用纸币以同样的比率在各地膨胀。

2007年人们的感触尤其明显。这一年，粮价、油价、铁矿石……放眼望去，许多产品价格都创出了新高。直到次贷危机以不可遏止的速度恶化，全球性物价上涨的势头才止住脚步。

2008年12月4日，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一份统计显示，近几个月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普遍高位上涨，其中，中国10月份6.5%的CPI涨幅在全球二十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八。

我国CPI在9月份短暂回落后，10月份又反弹至8月份创下的十年来新高6.5%。而从世界范围看，物价上涨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不仅仅是中国一家。其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近两个月来的物价涨幅最为抢眼。据统计，9、10月份CPI涨幅超过5%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俄罗斯（10.8%）、南非（9.7%）、阿根廷（8.6%）、越南（8.1%）、印度尼西亚（6.9%）、罗马尼亚（6.8%）、印度（6.7%）、中国（6.5%）和中国台湾（5.3%）。

而发达国家在此轮全球性通胀中也难以独善其身。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10月份美国CPI涨幅达到3.5%。如果国际油价持续维持在目前的水平，年底美国CPI涨幅将达到5%。此外，虽然欧元兑美元升值降低了通胀压力，但10月份欧元区CPI涨幅还是达到了2.6%，比前一个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超过欧洲央行2%的预期目标。

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大家所熟知的它的原因之一就是印的票子太多了。通货膨胀和货币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无一例外都是货币现象。”在经济学中，通货膨胀一般是指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实际需要的货币量，引起纸币贬值的现象。

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这种观点认为，由于生产成本增加而引起的通货膨胀。资源价格上涨后生产率没有相应地提高，那么最终将导致产品价格提高。比方说，对一家汽车制造商来说，钢铁的成本便是钢铁制造商出售钢铁的价格，而当钢铁价格上升时，那么汽车生产的成本就会增加，由此带来整个价格水平的上升。

（2）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总需求过大而引起的物价水平上升，通货膨胀是由于总需求过度增长所引起的，由于太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或是由于产品和劳务的需求超过了现行价格条件下可能的供给而导致物价水平上升。

（3）需求和成本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在实际中，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不是

单一的，因各种原因同时推进的价格水平上涨，就是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假设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开始的，即过度的需求增加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又成为工资上涨的理由，工资上涨又形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4）结构性通货膨胀。这是一种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它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很多国家出现过。变化因素主要有：对外开放程度不同的部门因劳动生产率不同而引发工资差异，但各部门工资存在着看齐倾向，从而导致物价上涨；因技术进步不同而导致各部门产品成本与价格水平的不同变化，而低技术部门产品价格的拉动则会引发通货膨胀；因能源、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的上升而带动下游产品价格的上升，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美元大泛滥：通胀，让全世界人埋单

在西亚、北非地区蔓延的政治经济动荡，同美联储滥发美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通货膨胀有密切关系。根据美国国会的报告，自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财政部、联邦政府机构和美联储至少投入了8.5万亿美元资金来挽救美国经济，其中主要是美联储通过各种方式滥发信贷，收购美国国债和银行的有毒资产。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费用的总和，包括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泡沫经济破灭初期大量增发货币向金融市场注资，能够暂时取得缓解市场动荡和经济衰退的效果，但长期持续注资就会造成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由于美元是国际贸易的通用货币，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主要用美元进行交易结算，美联储不断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全球美元泛滥，势必引起这些关系民众生活的商品价格猛涨，导致各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元债券不断贬值。

近两年来，许多国家的食品、能源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两位数。由于在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消费支出中食品、燃料占更大比重，美联储滥发货币政策必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冲击，而国际局势动荡能够刺激避险情绪，有利于维护美元霸权，这样既能滥发美元又能避免美元急剧下跌并丧失购买力，通过制造、加剧国际局势动荡能获得千百亿美元利益。正因如此，美国一面积极输出天量信贷政策、美元和通货膨胀，一面竭力宣扬“普世价值”、输出颜色革命和政治动荡，通过向世界各国转嫁危机损失谋求多方面利益。

2011年，美元一反常态，不但没有反弹反而大幅度下跌。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元是世界通行的货币。如果你想要美元，那么就得用你生产的商品去

换。美元可以说是世界上的硬通货，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多存一些美元。如果你不储备美元，当遭受美国“金融部队”偷袭时，就没有武器可以抵抗。如果你把美元放在家里，那就没有利息，还不如放在美国这个大银行，还能有点利息。而对于美国财团来说，只要这个循环继续，他们就能继续安享奢侈的生活。

美国为了缓解本国的压力，对全世界输入通胀，将导致热钱流入一些国家，给这些国家的货币带来升值压力。但是，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并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12月3日，美国劳工部发布报告说，11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长3.9万人，远低于市场增长预期14.0万人。而美国失业率增加了0.2个百分点，达到9.8%，创下4个月来的新高。

随着美元贬值和国际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上涨，全球财富将产生重新分配。一是美元贬值，降低了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促进了其出口产业，抑制了进口，从而通过贸易渠道改变全球财富。二是随着美元贬值，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美元储备为主的外汇资产及美元债权将严重缩水，而美国自己的外债却会在无形中“减负”，导致全球财富重新分配。三是一些资金实力雄厚、拥有丰富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经验的投资基金将抓住资产价格波动的契机，以热钱的形式加大在新兴市场的投机力度，放大资产价格波动幅度，促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通过快进快速赚取利润。

当美国知道大家都不得不储备美元，就索性狂印钞票，让美国老百姓有足够的钱花，从而刺激经济发展。按理说，一般情况下，当某个国家的钞票印多了，就会出现贬值，原来5元钱能买1斤猪肉，现在5元钱只能买半斤猪肉，国家内部通货膨胀很严重。但是美国不同，因为美元的独特地位，其他国家往往都会存储美元，这就意味着被储存的这部分钞票就没有在美国流通，所以美国国内并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打个比方，如果美国向中国借100美元，不管中国是借他人民币还是美元，最终衡量的标准都是美元。如果中国借了100美元，那么美国只要多印些美钞就行了，借得越多只要再多印点就可以了，这样，美国很容易就可以把钱还上了。但是，由于美国多印了，自然美元就要贬值，那么此时他还是还你100美元，然而，这个时候的100美元和当初借钱时候的100美元就不等价了，可能就相当于原来的90美元或者更少，因此，在这场交易中，中国赔钱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美国人的生活是很奢侈的，住大House，开高排量SUV，用大冰箱，甚至很多人都拥有游艇。

美国就是这样，通过多印钞票的方式，让全世界人民为它的消费埋单。美国作为拥有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坐视金融泡沫破灭引发危机侵蚀其国际地位，不会容忍给其带来巨大利益的美元霸权走向衰落，为了转嫁危机并

维护霸权可能采取进一步的举动，包括先发制人引发新一轮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扩大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以充分控制其石油资源，在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制造战争危险局势，加大金融投机力度促使全球食品、能源价格暴涨，加剧全球严重通货膨胀来诱发各国民众的不满情绪，配合非政府组织、互联网宣扬“普世价值”并精心策划突发事件，甚至直接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历来将美元霸权视为维护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关键，为此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蓄意制造危机甚至发动战争。

当前美国迫不及待地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甚至不惜抛弃同美长期合作的中东亲美战略盟国，是由于美国经济正再次面临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前夕的危急形势。新自由主义的取消、政府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造成了虚拟经济投机泡沫脱离实体经济的无限制膨胀，美欧的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 680 万亿美元，比美国 14 万亿美元的 GDP 高出近 50 倍，比 50 万亿美元的全球 GDP 总和还高出 10 多倍。美国的巨额注资绝大部分流入虚拟金融部门而非实体部门，人为大幅度提升巨额有毒资产价值以避免华尔街破产，虚拟泡沫经济领域实际上已经发生超级通货膨胀，这意味着美国巨资救市后形势缓解只是“治标不治本”，美国经济随时可能面临新一轮泡沫破裂冲击的威胁。

发达国家如何应对通胀：美国的“放任”策略

在美元贬值、供求失衡与投机炒作这三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全球能源及初级产品价格迭创历史新高。2008 年 6 月 6 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创下每桶 138.54 美元的历史纪录。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轮值主席克利勒也表示，油价可能冲上每桶 200 美元，而 OPEC 对此无能为力。截至 2008 年 5 月 3 日，全球黄金价格达到每盎司 858 美元，达到每盎司 1000 美元也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由于钢铁制造商将铁矿石和焦炭的巨大涨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全球钢坯价格在 2008 年 4 月已飙升至每吨 900 美元，在过去一年内几乎上涨了一倍。2007 年全球谷物价格大幅上涨，其中小麦上涨了 112%、玉米上涨了 47%、大豆上涨了 75%。而从 2008 年 1 月到 4 月中旬，大米价格飙升了 141%。据统计，全球主要粮食价格自 2005 年以来已经上涨了 80%。截至今年 3 月份，大米价格达到 19 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 28 年来最高。

在 2007 年一年间，美国除能源和食品价格之外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基本保持稳定，维持在 2% ~ 2.5% 的范围内，但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在次贷危机爆发的前两个月内，CPI 从 2007 年 6 月的同比增长 2.65% 下降为 2007 年 8 月的同比增长 1.94%，降幅达 37%，主要原因是受次贷危机爆发的悲观预期影响，

全球原油价格在该时期内显著回落。从2007年9月美联储步入降息周期并导致美元开始大幅贬值起，美国CPI从2007年8月的同比增长1.94%上升到2007年11月的4.37%，增幅达125%。此后尽管美国消费和投资受次贷危机影响陷入低迷，CPI连续5个月均保持在同比增长4%的水平上。如果美国经济在2008年陷入衰退，美国政府试图继续通过美元贬值来应对危机，则美国经济不排除陷入滞胀的可能。

美国政府对本轮通胀的应对策略是“放任”。本轮通货膨胀与其说是次贷危机酿成的苦果，不如说是美国政府主动选择的应对次贷危机的手段。由于次贷危机通过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通过托宾Q效应和金融加速器机制对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拉动GDP增长的三大支柱中的两大支柱均已失效，美国政府急需通过美元贬值来促进出口，用净出口的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只能通过两种手段来应对危机：第一种手段是通货紧缩，即让危机本身成为改善美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契机，利用危机来压缩美国居民消费，提高储蓄率，降低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提高美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第二种手段是通货膨胀，即通过大幅降低利率和增发美元以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吸引美国居民继续扩大消费，通过美元贬值来拉动美国出口增长，以缓解消费与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率的负面影响。美元贬值客观上还可以降低美国的对外债务，将危机成本和调整负担部分转移给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

显而易见，第一种手段将会遭到美国民众和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在政治上不具备可行性，尤其是在美国大选的关键年份。从目前来看，美国政府选择了第二种手段来应对危机，那就是通过连续大幅降息与美元大幅贬值，促进净出口与降低债务负担，并通过制造全球性通货膨胀来迫使其他国家也不得不分担次贷危机的部分成本，并通过集体行动来最终克服危机。

美国政府之所以对通货膨胀采取放任策略，根本原因在于美元位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美国有能力通过操纵美元汇率来加剧或缓解通货膨胀形势，美国政府在本轮全球通胀中拥有唯一的“主动权”。

欧元区：政府对通胀“高度警惕”

欧元区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2007年9月之前一直保持在1.5%~2%的水平上，位于欧洲央行的目标通胀率区间内。然而，自2007年9月美联储降息并引发美元贬值起，欧元区CPI一路上升，从2007年8月的同比增长1.75%上升到2008年3月的同比增长3.58%，增幅达105%。

欧元区 CPI 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美元大幅贬值造成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的美元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欧元对美元的升值幅度。目前来看, 尽管欧元相对于美元显著升值客观上有助于抑制输入型通胀压力, 但是只要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飙升态势不发生根本性转变, 欧元区的通货膨胀依然有加速之势。

受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恶性通货膨胀历史的影响, 欧洲央行对恶性通货膨胀抱有根深蒂固的警惕, 从而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后, 尽管部分欧洲金融机构也在危机中亏损惨重, 但欧洲央行仅仅采取了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解决方案, 而没有选择降息。即使美联储连续降息造成欧美息差拉大, 美元对欧元大幅贬值已经对欧元区的出口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 欧洲央行依然顶住压力保持基准利率不变。个中原因可能既包括对 2007 年 9 月以来通货膨胀压力有所抬头的警惕, 也包涵了在美元贬值之际, 欧洲央行试图通过维持欧元币值坚挺来推动欧元进一步国际化的雄心。

欧盟统计局 2011 年 3 月 31 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欧元区按年率计算的通货膨胀率 3 月份攀升至 2.6%, 创两年多来的新高。欧洲央行自 2008 年 7 月宣布加息以来, 于 2011 年 4 月 7 日再次上调利率以应对日益攀高的通胀率。

欧洲央行 2011 年 4 月宣布上调利率 25 个基点, 为金融危机以来首次, 欧元区正式进入加息行列。由于此前市场普遍预期欧元区将加息 0.25 个百分点, 因此消息出台后, 欧元兑主要货币基本上没有出现变化。此次加息之后, 欧洲央行基准利率为 1.25%。这一结果表明, 欧洲央行目前更为关注通胀威胁。这标志着欧洲将从金融危机后的超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恢复为正常货币政策, 全球利率水平将向回归常态迈进。

对于这一轮的通货膨胀, 欧元区政府应对策略为“高度警惕”。欧洲央行此次加息是为了应对欧元区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数据, 最近的数据表明欧元区通胀率已经达到了 2.6%, 超过了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的目标, 并且有继续加速上行的迹象。2 月欧洲的通胀率只有 2.4%, 而 3 月的数据显示通胀在加速。尤其是近日来原油价格创下了 2 年多来的新高, 达到了 108 美元之后, 市场更加认为欧元区将会加息。

另外一个促使欧元区加息的因素就是利率的倒挂, 由于目前欧元区银行的再融资利率仍然保持在历史低位的 1%, 这就导致了短期贷款利率低于或者和通胀率持平, 这样的利率倒挂使得欧元区容易遇到一定的困难。此次加息对于修正已经不合时宜的利率政策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力度仍然有些不足, 分析人士指出, 若想有效控制住通胀, 欧洲央行今年至少需要三次这样的升息行动。

日本：通胀与紧缩并存之下“心有余而力不足”

据新华社电，日本政府 2008 年 8 月 29 日出台一揽子刺激经济方案，总额 11.7 万亿日元（约合 1070 亿美元），以应对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促升的通货膨胀压力。内阁府特命经济财政政策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与谢野馨说：“这不是一次性的刺激经济方案，而是旨在持续支持日本国民经济和民众生活的方案。”

日本共同社 29 日报道，刺激经济方案的内容包括改进国家信贷担保机制，以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向公路货物承运商、公共交通工具运营商、出租车运营商提供财政支持，以缓解高油价冲击；2008 年财政年度减少所得税和居民税；3 年内帮助大约 100 万名临时工找到固定雇主。另外，这笔资金还将用于在家庭、企业和公共机构内推广太阳能；减缓进口肉类产品批发价格上涨势头；降低高速公路收费。消息公布前，日本东京股市日经 225 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29 日上涨 2.39%，突破 13000 点。

日本的通胀形势远较美国和欧元区为轻，然而 CPI 增长速度同样不容忽视。由于整体经济尚未彻底摆脱长期萧条的阴影，日本的核心 CPI 基本保持在零水平上。但受美联储降息引发的美元贬值影响，日本的 CPI 从 2007 年 10 月起加速上升，从 2007 年 9 月的同比增长 0.2% 上升到 2008 年 3 月的同比增长 1.2%，增幅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欧元区。尽管总需求依然低迷，但由于日本经济对进口能源和初级产品的依存度远高于美国和欧元区，因此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继续上涨将会继续推动日本 CPI 的上涨。日本经济同样存在陷入滞胀的可能性。

据 2008 年 8 月 11 日共同社报道，在能源及食品价格高涨推升国内通胀压力的背景下，日本政府 11 日公布了其应对通胀的紧急经济刺激计划草案。

按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话说，该草案的制定“旨在保障国民的生活”，主要内容包括下调高速公路费、向农业和渔业领域从业者发放补贴以采购新型节能设备以及采取财政措施支持陷入信贷困境的中小企业等。

在当月初日本内阁大幅改组之后，福田康夫要求内阁府特命经济财政政策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与谢野馨负责制定该经济刺激计划，以缓解不断飙升的能源及原材料成本冲击国内企业和家庭的局面。

日本政府对本轮通胀的应对策略或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诚然，由于日本经济对进口能源和初级产品的依赖性很强，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飙升对日本经济是非常不利的。但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消费者的信

心迄今为止尚未恢复，消费和投资依然低迷。此外，由于近期日元相对于美元显著升值，抑制了日本出口的增长。鉴于当前日本的CPI依然低于1.5%，在宏观经济尚未彻底摆脱萧条之际，日本央行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胀加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美国、欧元区与日本的CPI的加速上升，都出现在2007年9月份美联储步入降息周期以后，这表示美联储降息和美元贬值所造成的全球能源与初级产品价格飙升，是造成美欧日通胀形势恶化的最关键原因。随着2008年末石油价格的大幅回落，各国的通胀压力也有所减缓。

2011年2月，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上表示，日本经济的上行和下行风险基本平衡，日本经济正在稳步向前迈进。央行公告也称，在新兴经济体和资源类国家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增长重新走强，日本的出口和生产也出现增长势头，设备投资反弹，就业和收入环境有所改善，住宅投资回暖，金融环境继续处于宽松状态，核心消费物价指数降幅缩小。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日本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门间一夫曾在1月表示，日本经济可能在今年第一季度重现增长；紧随其后，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龟崎英敏本月表示，日本经济的停滞期很快就会过去。

日本央行在其公告中表示，将维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日本度过通货紧缩，步入物价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但外界对此并不乐观。《华尔街日报》15日撰文称，还未除去通货紧缩顽疾的日本政府，有可能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随着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如果日元无法以同样的速度升值，日本民间消费可能受到损伤。瑞士信贷经济学家口野刚志预计，如果石油和食品价格1月份的水平持续至6月，实际家庭消费就有可能下降0.5%。日本央行当日发布的1月份企业物价指数出现2008年11月以来的最大幅度增长，也是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受石油、铁矿石和玉米价格带动，一月份同比涨幅达1.6%。

分析人士担心，日本对于对外贸易的高度依赖使其经济容易受到日元升值的影响，2010年日元的升值趋势一方面降低了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拉低进口产品价格，从而加剧通货紧缩。

三菱综合研究所高级经济分析师五田洋子指出：“如果日本借助通货膨胀提高名义增长率进而促进税收增长，那么负债负担就将减轻，但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她表示，日本应该依靠增长战略摆脱通货紧缩，同时从实际情况出发切实推进财政重建，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亚太地区：通胀重压促使“加息潮”出现

进入 2011 年以来，通胀重压使得一股加息热潮在亚太地区蔓延。韩国央行一月加息 0.25% ~ 2.75% 之后，11 日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野村证券分析师预测韩国央行将于 4 月和 6 月分别上调利率 0.25% 和 3.50%。

2011 年印尼央行意外宣布两年来首次加息决定，分析人士预计，印尼央行今年还将进一步升息 75 个基点，以使其货币政策逐步正常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预计未来数月该国通胀将加剧，今年晚些时候方能企稳。当地媒体报道说，新加坡央行在 4 月份加息的可能性较大。泰国、印度等国也纷纷宣布加息。分析人士认为，在未来物价上涨可能加速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在今后一段时间都将处于加息周期。

澳大利亚央行公布了 2011 年 2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该央行认为，该国消费支出增长仍然低迷，通货膨胀水平弱于预期，2 月份采用略具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仍然是适宜的。澳央行预测自然灾害将导致 2011 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放缓，但下半年将有所恢复，通胀率达到澳大利亚央行设定的 2% ~ 3% 目标区间的高端。

但外界对澳大利亚的通胀形势更为担心。14 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官员表示，澳央行在今年年底前很可能会收紧政策，因持续的矿业繁荣将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并消除严重洪灾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这是 IMF 首次就严重自然灾害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的影响发表评论，同时也表明抑制通胀压力依然是市场关注的首要问题。

同年 1 月 19 日，巴西央行将利率上调至 11.25%，以抑制严峻的通胀形势。印度同样如此，从去年 3 月以来 8 次加息。其他新兴经济体大同小异，今年新兴经济体集体抗通胀这一主旋律不会改变，因此，早加比迟加更具主动性。

面对纷乱的全球金融形势，央行加息稳定内部，同时严控热钱、维持汇率平稳是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年德国汇改成功而日本失败的关键所在。

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央行的利率政策较为迟缓。2011 年 4 月 5 日晚，中国央行宣布，4 月 6 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 0.25 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应调整。这次加息在预期之中，终端产品与上游产品价格节节攀升，国际油价屡创金融危机以来新高，通胀预期恶化，加息是必然之举，也是必要之举。此次加息还不算紧缩，央行的紧缩政策较为温和。

而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加息已经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一是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已经达到 3.19%，显示市场无处可去的资金过于充裕，流动性依然宽松；二是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调到历史新高，继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将使银行支付紧缩成本，同时黑市的资金交易会越来越猖獗；三是 3 月份的 CPI 可能突破 5%，通胀业已从终端产品到资源性产品形成自我达成的循环；四是外汇占款还有高位徘徊的势头，根据央行 4 月 2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 月份我国新增外汇占款 2145.23 亿元，环比下降 57%。但 1 月份我国新增外汇占款达 5016 亿元，是自去年 10 月创下的 30 个月新高 5190 亿元后的第二新高。总体而言，外汇占款仍然处于高位；最后，日本地震等天灾继续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

加息后一年期存款利率为 3.25%，如果以今年平均 4.5% 的 CPI 计算，仍有 1.75% 的空间，也就是说，即便央行的控制政策见效，CPI 下降，仍然存在 4 次以上的加息机会。不要担心加息会困扰企业的正常经营，事实上，目前企业尤其是很多民营企业基本上不可能贷到平价的资金。

紧缩流动性有两个办法：（1）发行国债尤其是与 CPI 挂钩的国债；（2）加息，通过资本市场吸纳货币的办法不可行，实质是把资金从居民的手中转到企业的手中，流动性依然。央行有必要加息、再加息，体现改变负利率的决心。

目前欧美虽然面临通胀压力，却迟迟不肯加息，尤其是美国，将国内经济复苏的指望寄托在全球通胀、改变美国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应对国际局势，惟有国内紧缩货币、抑制通胀稳定民心，国外据理力争、在欧美采取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之前，拒绝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忽悠，严防热钱流入。

德国：超级通货膨胀思考

人们的需求是无穷无尽的，经济社会中，我们的财产迅速积累，获得无数的幸福。中国人总讲，祸福相依，离不开它的收益我们自然也拒绝不了它带来的毁灭。经济市场自始就是个充满了各种诱惑和陷阱的大染缸，为了利益人们总是展开不可避免的博弈争斗，各种的价值冲突愈演愈烈。货币的发明就是人类利益驱使下的产物，恶性通货膨胀也是由此产生。一般情况下的通货膨胀都比较温和，只有发生特殊情况，通货膨胀才如同洪水猛兽，将你的财产一夜吞噬。

世界史上有记载的恶性通货膨胀都发生在 20 世纪。各发生于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 5 个国家奥地利、德国、匈牙利、波兰和苏联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中。1922 ~ 1923 年间的德

国最高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 29000%。另一轮恶性通货膨胀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希腊和匈牙利都陷入了货币混乱中，它创下了世界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记录——连续一年多物价平均每月通货膨胀率达 19800%。第三轮恶性通货膨胀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秘鲁等国的外债危机导致了金融混乱。

宏观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率在 100% 以上时，被称为超级通货膨胀。

所谓恶性通货膨胀，也称为脱缰的通货膨胀、急速的通货膨胀或者超速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一旦发生（一般达到三位数以上），唯一的结果就是导致物价飞速上涨，货币大幅贬值，人们对货币彻底失去信心。这时，整个社会金融体系就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正常的社会经济关系遭到破坏，引发全面经济危机，经济崩溃，政府垮台。

当急剧的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时，总体价格会以 20%、100%、200%，甚至是 1000%、10000% 的速度增长。发生这种通货膨胀的地区，在价格被竭力稳定后，会出现严重的经济扭曲现象，并且对本国货币会失去信心，会运用一些价格指数或外币作为衡量物品价值的标准。恶性通货膨胀，被称为经济的癌症，这种致命的通货膨胀以百分之一百万，甚至是百分之万亿的速度上涨，在短时间内摧毁市场经济。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经历了一次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超速通货膨胀。在战争结束时，协约国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这种支付引起德国财政赤字，德国政府最终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为赔款筹资。从 1922 年 1 月到 1924 年 12 月德国的货币和物价都以惊人的比率上升。例如，每份报纸的价格从 1921 年 1 月的 0.3 马克上升到 1922 年 5 月的 1 马克、1922 年 10 月的 8 马克、1923 年 2 月的 100 马克直到 1923 年 9 月的 1000 马克。在 1923 年秋季，价格实际上飞起来了：一份报纸价格 10 月 1 日 2000 马克、10 月 15 日 12 万马克、10 月 29 日 100 万马克、11 月 9 日 500 万马克直到 11 月 17 日 7000 万马克。1923 年 12 月，货币供给和物价突然稳定下来。

正如财政引起德国的超速通货膨胀一样，财政改革也结束了超速通货膨胀。在 1923 年底，政府雇员的人数裁减了 1/3，而且，赔款支付暂时中止并最终减少了。同时，新的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取代了旧的中央银行德国国家银行。政府要求德意志银行不要通过发行货币为其筹资。

随着持有货币成本的下降，超速通货膨胀的结束会引起实际货币余额增加。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德国的实际货币余额减少，然后，随着通货膨胀下降，实际货币余额又增加。但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并不是即刻的。也许实际货币余额对持有货币成本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许德国人民相信通货膨胀真正结束需要一段时

间，从而预期的通货膨胀比实际通货膨胀下降得要慢一点。

1923年，德国马克的价值接连暴跌，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1923年初，马克币值一度达到2.38美元，但是同年夏季，一个美国人能以7美元兑换到40亿马克。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每月上升2500%。工人们的工资一天要分两次支付，到了傍晚，一只面包的价格等于早上一幢房屋的价值。

别以为通胀总是过去的故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同样的恶性通货膨胀在美国也曾上演。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国1975～1978年通胀率均在5%以上。1978年2月到1980年3月，美国CPI同比涨幅从6.24%持续上涨到14.61%，此次恶性通货膨胀始终没有改变股市震荡走高趋势。CPI累计上涨25.4%，股市累计上涨33.6%。1980年5～9月美国再次出现负利率，短短5个月物价累计上涨2.6%，股市累计上涨25.1%。这次通货膨胀时间长，但物价涨幅不高，大部分时间属于温和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全过程股市仍呈现持续缓慢走高趋势，2004年10月至2006年8月，CPI累计上涨12.5%，股市累计上涨70.9%。回望历史，通货膨胀几乎在每个国家都发生过，所到之处便会给该国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

从第一场恶性通货膨胀开始，人类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泡沫奇迹。2006年，我国也接连创造了“兰花泡沫”、“红木泡沫”、“普洱泡沫”等等。我们的兰花2006年一年之内就涨了数十倍，单株兰花的最高价曾达到2000万元，不过随着媒体的披露，泡沫瞬间破灭。2004年开始，海南黄花梨、小叶紫檀的家具价格成倍地往上翻，上涨10倍以上的家具比比皆是，到了2007年下半年，泡沫破灭，许多红木家具的“身价”都被“腰斩”……

似乎所有泡沫的过程都是相似的：在狂热中上涨，似乎所有人都疯狂投入其中，直到发现荒谬，于是开始恐慌，最后噩耗此起彼伏……所有这一切，源头皆为利。通货膨胀？不是离我们很远么？其实恶性通货膨胀就近在眼前，历史似乎又重现。经济可以活跃社会，但同样也可以毁灭一个社会。

通胀危害：动荡与冲击随之而来

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严重的，对这些危害人们一般概括为物价上涨、社会动荡和人心不安等。但实际上，哈耶克认为，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后果，是对于市场机制的破坏。这种破坏首先造成了对资源的错误引导；其次导致了对劳工的错误引导。

当加速度的通货膨胀已把经济带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或是悬崖勒马，或是全面崩溃，没有其他途径。到达这种境地后，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出现大量失业都是

必然的，这是社会错误政策深为遗憾但无法回避的后果。

通货膨胀一方面通过破坏市场机制，导致供求失调，造成资源在极大范围内的配置不当，使大规模失业在所难免。通货膨胀对民众的生活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少有三大危害。

第一，通货膨胀将使得收入分配结构更加不平等。

人们都知道通货膨胀会降低消费者的实际生活水平。但是很多人并不十分清楚，通货膨胀对低收入民众的生活的冲击最大。土地、资本和其他财产所有者可以在轮番涨价的通货膨胀中通过提高土地和产品的价格来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甚至在通货膨胀中获得一些收益。由于低收入民众只有工资收入或者养老金收入，而工资收入的增长不仅总是落在通货膨胀之后，而且上涨的幅度永远也比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这就是为什么普通劳动者总是在通货膨胀面前感到完全无能为力。

第二，通货膨胀给投资和消费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将使得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加扭曲。商品的价格应该是市场对生产者发出的信号，生产者根据这个信号来掌握市场对自己产品的需求，从而相应地提高或者减少生产规模，以保证各种社会经济资源能够得到更好的运用。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并非是由于市场的真正需求的上涨，而只是由于生产者的投机冲动或者消费者对价格进一步上涨的恐慌造成的。由于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能掌握市场的全面信息，因此这种由不确定性带来的投机和恐慌很可能推动没有根据的进一步的投资冲动。

第三，通货膨胀给就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一方面，扰乱了相对价格和工资体系，产生许多错误的信息，将劳工引导到并不是真正重要的社会部门中，劳工错误地在部门间转移，实际上加剧了劳工市场的矛盾。因此，哈耶克认为，通货膨胀是失业增加的原因，而不是治理失业的药方。“现在的失业乃是过去 25 年实行所谓充分就业政策的直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许多人仍然错误地相信，总需求的增长，将消除暂时失业。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办法尽管暂时奏效，但在以后会带来更多的失业。”

另一方面，大量增加的失业反过来又加剧了通货膨胀，公众向政府施加压力，并随时有可能触发政治动乱。因此，当政府许诺承担充分就业的责任时，为了维持较低的失业率，只能继续增发货币并不断地提高货币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超过生产率增长的每一次工资提高，都必将使总需求增长，因此，货币数量的经常注入成为持续不断的过程，致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于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带来了更大的失业，而失业急剧增加又促发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哈耶克认为，“我们在通货膨

胀与失业之间并无性质，正如我们在吃得过饱和消化不良之间没有多少能够性质一样，虽然在吃的过程中饱餐一顿可能令人很愉快，但消化不良将随之而来。”

第四，通货膨胀将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

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在一个通货膨胀时期，最简单的牟取利润的办法就是涨价；而且是争取自己的产品以更快的速度涨价。虽然到头来轮番的价格上涨将冲销自己产品涨价所带来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收益，但是如果不涨价损失则将更高。这种俗话说说的“浑水摸鱼”的价格战略是企业通货膨胀中的唯一理性选择。既然直接涨价能够迅速地带来更多的收益，那么谁都不会花气力去从事新产品的研发、新技术的应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一种外延型经济模式中，技术的含量并不高，在国际上完全靠价格低廉来赚取微薄的利润。通货膨胀不仅将使得这类国家经济长期无法摆脱在国际分工中的这种低端地位，甚至有可能使得它在与其他劳动密集型经济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竞争中败北。

治理通胀：各国政府的不同措施

通货膨胀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多少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为解决通货膨胀苦苦思索，他们为理清这一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治理通货膨胀，必须逐步消除经济过热，切实引导扩大社会总需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下决心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严格控制公务消费，引导和扩大民生内需的增长。以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的通货膨胀为例：

1979 年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强力提升美元利率。高息的强势美元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将美国推入强势美元时代。沃克尔执掌美联储的前几年，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通胀达到了 13.5%（1981 年），沃克尔成功把它降到了 3.2%（1983 年）。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1979 年联邦基金利率，美国的同业拆借利率是 11.2%，1981 年被沃克尔抬到 20%，银行基准利率跟着涨到了 21.5%。但是利率飙升极大损害了美国的农业，愤怒的农民们开着拖拉机闯进华盛顿街区，堵住了埃克尔斯大楼（美联储所在地）的大门。

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事实证明，沃克尔的这一政策非常成功，三年后通胀被抑制，到 1983 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降到 3.2%，并在此后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上。最重要的是，即使在 1982 年出现经济衰退期间，美联储也坚持实行高利率，这种在面临通货膨胀威胁时大力加息、在通货膨胀比较温和时才下调利率的做法为

美联储赢得了声望。

不过，沃克尔最被人诟病的也正是他紧缩的货币政策。因为这一政策，美国失业率直逼 30 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并陷入一场经济衰退中，直到里根时代才有根本改观。然而此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 25 年高增长，这充分证明了其政策的有效性。那么在对抗通货膨胀的问题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第一，避免经济上的损失。经济增长速度与财政收入、企业效益和职工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着连锁反应关系。只有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速度，财政收入才能有保证，企业才能有效益，职工生活水平才能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以后上述问题便会暴露出来。同时，采取暂停政府财政性投入的办法，缩减政府平台项目，削减基建，势必造成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多数转为 BT（Build 建设和 Transfer 移交的英文缩写）、BOT（Build 建设、Operate 经营和 Transfer 移交的英文缩写）方式融资。2008 年以来在建项目停工待建，也会降低原来的社会福利水平，造成物质的大量闲置。从国际经济关系看，放缓经济增长，必将丧失许多竞争和发展机会，影响国际形象，减弱经济实力。

第二，信贷投放计量管理。从本质上看，目前的通胀压力反映了自 2009 年以来的货币供应增加，以及资源价格上涨的趋势。数据显示 2010 年 11 月份我国新增信贷达到 5640 亿元，人民币信贷余额 47.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8%，2010 年 11 月截止，当年新增信贷额 7.44 万亿元，为年初监督管理目标 7.5 万亿的 99.24%；据统计 11 月份 M1（狭义货币供应量），余 25.94 万亿，同比增长 22.1%，增幅较 1 月份降低近 18 个百分点。那么随着货币供应增速的持续下降，GPI 是否也会如期回落，对此信贷投放的增减决定物价的控制。

第三，加强流动性管制。今年以来央行 6 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已达 18.5% 的历史高位，充分显示了政府抑制通胀和收紧流动性的决心，预计 2011 年的年底之前准备金率还会有可能上调 3 ~ 4 次。应对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一定会通过某种形式带来资金的流入，国内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也非常宽松，在特定时期，提高准备金率有利于宏观调控。控制屡创新高的物价为目的，减少银行可用信贷资金规模，起到收缩流动性的作用，最终起到控制物价的目的，控制信贷需求，将信贷资金调整到实体经济，按需审查支付，防超边界使用。

第四，释放安稳压力。长期以来，社会制度下存在着就业刚性、个人收入刚性和财政支出刚性。人们可能忍受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痛苦，但很难容忍失业和实际收入的减少。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后，可能会有一批企业减产、停业甚至破产倒闭，失业人员会增加。整个市场的物质供求还是比较平衡的，物价保持基本稳定。

第五，货币结构回归常态。贷款需求和供给反映了发行货币的结构关系，分析认为不会出现较大的衰减。截止 2010 年 11 月末，M2（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已经达到 71.02 万亿元，比较 2009 年末的 61.02 万亿元，增长 16.04%，以年初监管部门的目标同比增长 17% 来看，12 月份的 M2 不超过 4000 亿元，运用 10 年的数据分析显示除 2007 年外，其余年份 12 月比 11 月份增加的 M2 量均高于这一水平，且自 2008 年以来更超过了 1.5 万亿元。不过将货币供应控制在今年 17% 的增速内，准备金年调整按货币乘数 4.32（3 季度）计算已能使货币供应量扩张减少 1.5 万亿元左右，而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对经济体的影响相对温和，就商业银行而言，盈利水平影响将不到 1%，新增信贷规模、货币供应结构，都将逐步向常态回归。

第六，经济滞胀的危险。在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都把主要目标放在需求管理方面，而忽视了改善供给，出现了滞胀的局面。谨防经济供给有余而有效需求不足、内需疲软的现象产生，它容易导致结构失衡，引发经济衰退。短缺型经济，有效供给长期不足，这是经济增长过热，容易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力压缩社会总需求是正确的，但收得太急容易出现扩大内需受阻，不但难以实现紧缩目标，还有可能严重影响有效供给，减少市场供应。治理通货膨胀要时间，需要长短期措施的配合，而对通胀日益加剧的形势，迅速采取措施是必要的，更需从长计议，不能顾此失彼，防止出现经济滞胀的可能，出台的政策应当适应未来的发展需要。

除此之外，通过调整货币政策也可以改变或改善通胀。比方说，财政政策要适时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降低企业税率，同时对受到通货膨胀影响较大的企业，如粮油面、石油、电力等给予财政补贴，以减轻这些企业由于成本上升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

通货膨胀还会对居民产生财富效应，尤其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最大。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政府要把财政支出不断地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领域倾斜，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更加合理化。这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而且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事实上，近年来，全世界的许多中央银行都在采用各种措施来抵制通货膨胀的威胁。



欧债的成因、酝酿与历史演进

危机根源：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制度

对于这次欧债危机，欧洲金融机构几乎一致认为：这次欧债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在欧洲的延续。近日，欧债危机像旋风一样席卷欧洲，“默科齐”一词语成为欧洲媒体最流行的时髦词。“默科齐”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的姓氏组合，意指德、法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中不经过民主程序，独断专行，与欧盟其他成员渐行渐远。

“默科齐”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欧盟及其他成员对德、法在应对欧债危机时“争权夺利”的不满和失望。有识之士指出，欧债危机早已不仅仅是债务危机，它更多反映的是欧盟的制度缺陷。

从全球的视角出发，全球金融危机是欧洲债务问题的外部诱因。各经济体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扩大财政支出是必然的选择，金融危机直接扩大欧洲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但是，欧洲债务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均超出欧盟的自我约束和市场的预期，其内在的根源和制度性缺陷发挥了主导作用。

第一，欧洲债务问题暴露了欧洲一体化的制度缺陷。

欧洲一体化不仅是要建立一个单一市场，更是要建立一个政治联盟。而欧元则是通向政治联盟的一个重要步骤，甚至是决定性的进展。但是，欧元计划的根本问题是野心太大。20世纪90年代，在未建立政治联盟的情况下，成立货币联盟的困难曾引起热烈讨论，但这些困难随后却完全被忽视——采用单一货币的风险或许是可控的。创立欧元的目的，原本是为了结束因汇率变动可能对单一市场参与国造成不利而引发的矛盾。当时认为，消除这些令人困扰的汇率变动，就会消除各方之间不和的深层根源。但事实上，欧元区内部汇率信息的缺失，导致各方并没有对竞争

力差异的显著拉大感到不安。在这个难以废止的货币联盟中，南部成员国本应加强财政纪律，北部成员国则应被鼓励稍稍放松一些，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第二，部分国家财政状况持续较差、财政纪律长期松弛。

从 20 世纪末以来，希腊的财政状况一直处于较差的状态。为了能加入欧元区，希腊提供了虚假的财政数据，1998 年财政赤字占 GDP 为 4.1%，而报告仅为 2.5%；1999 年赤字占比是 3.4%，而报告仅为 1.8%。美国高盛公司由于替希腊发行债券中存在隐瞒希腊真实债务水平的问题，而遭美国法院的调查。

第三，政出多门。

至少有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欧盟“总统”范龙佩、欧盟主席巴罗佐、欧元区主席容克、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和欧盟经济与货币委员雷恩等 7 位政要在负责应对欧债危机。正是欧盟各种力量在政治上的较量，使欧盟迟迟不能决策，平添了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欧洲银行对发展前景的担忧。一些欧洲大银行纷纷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又加剧了欧洲银行资金的流动性不足。

第四，二元结构矛盾。

在欧元区内部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而各成员国实行自主的财政政策。在应对经济波动中，与其他国家相比，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需要谈判协调，其政策的时效性较差，而且欧洲央行的政策框架主要来自德国央行，即通胀目标制。为了增强政策效果和提高政策的及时性，欧元区成员国就发挥财政政策的主动权，扩大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这相当于是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一条腿”被绑在一起，而财政政策“另一条腿”自行前进，最后造成“一条腿走路”的困境，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赤字大幅上升，进而出现债务累积和主权信用问题。

第五，欧盟内部经济结构不均衡是债务问题的结构性因素。

由于欧盟内部经济体经济周期、生产效率和全球竞争力存在较大差异，各政府面临收入降低和支出增加的双重困境，只能选择扩大财政赤字以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欧洲中央银行一项关于欧元区财政可持续性的研究指出，人口老龄化是欧元区财政状况可持续的重大风险，而在欧元区内部，各国的人口结构是存在差异的，而且针对人口的福利政策也是有差别的，这将导致欧元区各国对人口问题的财政应对是不一致的。

第六，欧盟的决策机制缺陷。

欧盟委员雷恩主张先改革欧盟预算和经济政策的表决机制，取消现行的“一票否决制”。否则，其他措施都不会奏效，欧盟在应对重大挑战时，仍不会有快速反应的能力；欧洲议会强调要按欧盟的程序办。应对欧债危机，理应先由欧盟委员会提出政策建议，再由欧盟成员国相关部长会议讨论通过，经欧洲议会批准后执行。他

们提出，雷恩应担当起“欧盟财长”的角色，并主持欧盟财政和经济部长会议，反对德、法提出的“建立经济政府”的主张，认为德、法提出的方案游离于欧洲议会的民主监督之外，所谓“经济政府”只是德、法主导下的“妥协机器”，在拿成员国的利益“做交易”。欧洲议会的主张得到波、匈、捷、保、罗、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东欧成员国的支持。波兰还利用其欧盟轮值主席的身份，召集上述国家开会协调立场，反对在欧盟内部形成“双速欧洲”，让一部分成员国在一体化方面先走一步。

希腊债务累计为 3700 亿欧元，仅为欧盟 GDP 的 2% 多一点。应对金融危机时，德国一家的救助计划就达 5000 亿欧元。从债务规模看，欧盟完全有能力扛起希腊。那么，为什么希腊债务还能将欧债危机搅成一团混水？其主要原因恐怕是欧盟的制度缺陷。因此，从欧债危机的内部根源来看，是欧洲货币一体化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对这一制度的不严格执行造成的。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制度设计中，最为严重的缺陷则在于欧元区各国货币统一，但财税不统一。一旦出现问题或危机，这些国家政府将无法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

欧洲债务危机是一场政治危机。如果处理得当，这场危机可以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契机。反之，欧盟则可能陷入倒退。

欧债的爆发：背负巨额贷款而无力偿还的希腊

谈到欧洲债务危机，我们不得不提起希腊，因为希腊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线。

早在 2009 年 10 月初，希腊新一届政府在执政仅半个月后就突然宣布：2009 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 12.7% 和 113%，远远高于欧盟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规定的 3% 和 60% 的上限。

2009 年 12 月 8 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宣布，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前景展望为负面，这是希腊主权信用级别在过去 10 年中首次跌落到 A 级以下。惠誉同时还下调了希腊 5 家银行的信用级别。惠誉称，这一降级决定反映了“对希腊中期公共财政状况的担忧”，加上希腊金融机构的信誉不良和政策面的负面因素，难以确定希腊是否可获得“均衡、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受消息影响，全球股市应声下跌，希腊股市大跌 6%，欧元对美元比价大幅下滑。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

自 2009 年 12 月希腊债务危机拉开序幕以来，希腊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希腊政府分 3 次成功发行了 195.6 亿欧元的国债，单次筹资额度从最初的 80 亿欧元，下降到了 4 月 13 日的 15.6 亿欧元，中标利率也逐步攀升，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债务危

机越陷越深的命运。

事实上，希腊的财政问题由来已久。一切要从 2001 年谈起。当时希腊刚刚进入欧元区。根据欧洲共同体部分国家于 1992 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0%。然而刚刚入盟的希腊就看到自己距这两项标准相关甚远。这对希腊和欧元区联盟都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欧元刚一问世便开始贬值的时候。这时希腊便求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 10 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

这一被称为“金融创新”的具体做法是，希腊发行一笔 100 亿美元（或日元和瑞士法郎）的 10 ~ 15 年期国债，分批上市。这笔国债由高盛投资银行负责将希腊提供的美元兑换成欧元。到这笔债务到期时，将仍然由高盛将其换回美元。如果兑换时按市场汇率计算的话，就没有文章可做了。事实上，高盛的“创意”在于人为拟定了一个汇率，使高盛得以向希腊贷出一大笔现金，而不会在希腊的公共负债率中表现出来。假如 1 欧元以市场汇率计算等于 1.35 美元的话，希腊发行 100 亿美元可获 74 亿欧元。然而高盛则用了一个更为优惠的汇率，使希腊获得 84 亿欧元。也就是说，高盛实际上借贷给希腊 10 亿欧元。但这笔钱却不会出现在希腊当时的公共负债率的统计数据里，因为它要 10 ~ 15 年以后才归还。这样，希腊有了这笔现金收入，使国家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 GDP 的 1.5%。而事实上 2004 年欧盟统计局重新计算后发现，希腊赤字实际上高达 3.7%，超出了标准。

目前该国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已高达 12%，远远超过欧元区设定的 3% 上限；希腊公共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则高达 110%。就像之前迪拜出事一样，这次希腊的危机又让一些人惊呼：希腊可能成为“下一个雷曼”。尽管现在还很难对这样的预言做出评判，但有一点却日益成为各界共识，即希腊等个案背后折射出主权债务风险，特别是在这轮危机中大举借债的发达经济体。

高盛深知希腊通过这种手段进入欧元区，其经济必然会有远虑，最终将出现支付能力不足。高盛为防止自己的投资打水漂，便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 20 年期的 10 亿欧元 CDS（信用违约掉期）保险，以便在债务出现支付问题时由承保方补足亏空。

到了这笔货币掉期交易到期的日子，希腊的债务问题便暴露出来。然而 2009 年 1 月底 2 月初出现对希腊和欧元的金融攻击，却远非市场的自发行为，而是有预谋的。这次攻击利用希腊多笔债务到期在即、炒作希腊出现支付能力问题，从而使市场出现大幅动荡。其结果是欧元下跌，希腊融资能力下降、成本剧增（借贷利率

高出一般新兴国家两倍以上)。

高盛在希腊未被怀疑有支付能力问题时大量购进希腊债务的 CDS，然后再对希腊支付能力信誉发动攻击，在 CDS 涨到最高点时抛出。为了打击希腊的金融信誉，高盛与两大对冲基金一方面大肆“唱衰”希腊支付能力（包括动力量将希腊信誉等级降低、传出希腊破产谣言等），另一方面则轮番抛售欧元，从而导致国际市场的恐慌而跟进。欧元在 10 天内跌了 10%。

2009 年底，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希腊政府的融资难度开始逐步上升，但是希腊政府当时仍然认为自己能够从金融市场上获得足够的资金。2010 年第一季度以来，希腊由于其债务水平比政府宣称的更高，而且欧洲债务问题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结果使欧盟整体陷入了一个债务的泥潭。

欧洲国家为债务融资的压力十分巨大，2010 年希腊需要融资的总规模超过 500 亿欧元，意大利需要为其总债务的 20% 在 2010 年提供展期。由于担心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陷入债务问题，投资者开始回避欧元资产，甚至开始大肆做空欧元和欧元资产，使得陷入债务问题的欧盟国家几乎陷入绝境。

自希腊开始，欧债危机迅速蔓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债务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的问题”，甚至是全球性问题。达沃斯 2010 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就认为，下一次危机最有可能就是主权债务危机，债务问题已经引起全球的重要关注。虽然，欧洲债务问题短期内可能难以演化为系统性的债务危机，但是，欧洲债务问题将深刻影响金融市场、市场预期和经济复苏，将是未来全球经济的一大重大不确定性问题。

葡萄牙：主权债务信用恶化或成下一个希腊

2010 年 4 月，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09 年末，葡萄牙政府债务余额超过了 1259 亿欧元，公共负债率（政府债务/GDP）达到 76.8%；政府财政赤字达到 154 亿欧元，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GDP）为 94%。而国民储蓄率在经合组织的 27 个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四。此外，葡萄牙债券已被列为世界上第八大高风险债券，地位不及黎巴嫩和危地马拉。2010 年 4 月 27 日，标准普尔公司将葡萄牙的信用评级由“A+”降至“A-”。

葡萄牙财政部长桑托斯此前曾经表示：“我们不会对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掉以轻心，因为其将有巨大的危机传导性，从目前危机的波及范围可证明这一点。”由于忧虑希腊危机蔓延的风险加快，葡萄牙 CDS 息差 4 月 27 日再次创下新高至

335个基点，这意味着葡萄牙的主权债务信用正在恶化。葡萄牙与德国10年期国债利差创下自欧元问世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债务阴影的笼罩下，4月底亚太和欧洲股市普遍下跌。欧洲三大股指低开低走，盘中跌幅均超过1%，而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爱尔兰等股市盘中跌幅较大。其中，希腊股市盘中跌幅超过4%，葡萄牙股市下跌超过3%。

2009年秋，掌握降级生死大权的穆迪与惠誉评级将葡萄牙主权债务评级设为“负面”前景，这意味着未来12到18个月其评级很可能遭下调。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高级主权风险分析师托马斯表示，葡萄牙面临评级下调，除非其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削减预算赤字。托马斯表示，葡萄牙需采取切实、可信的措施来控制赤字。

只是穆迪的措辞严厉的警示并未对葡萄牙的财政赤字产生直接性的影响。

葡萄牙国家统计局2011年4月23日上调2010年公共财政赤字，相对于GDP由先前宣布的8.6%升至9.1%。国家统计局向欧洲联盟统计局通报上调赤字的决定并作出解释：之所以调高赤字，缘于更高融资需求和政府机构债务，两项分别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5%和0.6%。统计局同时上调公共债务，总额接近1604亿欧元（约合2333亿美元），相当于GDP的93%。欧盟“财政纪律”规定，成员国公共财政赤字应控制在相当于GDP的3%以内。

葡萄牙政府背负沉重债务向欧盟委员会请求援助，希望获得“过渡性贷款”，而非全面援助。欧盟拒绝提供“过渡性”援助，力主全面援助，条件是葡萄牙收缩财政，着手结构性改革。

欧盟和IMF2011年4月18日开始评估葡萄牙公共财政状况，预计5月中旬结束。欧盟希望5月中旬由欧盟财长会议拟定对葡萄牙援助方案，预计援助总额800亿欧元（1164亿美元）。

对于葡萄牙并不乐观的经济未来，欧盟不得不伸出援手。“时间点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欧元区主席容克表示，将在2011年5月中旬完成谈判，尽快对葡萄牙给予救助；欧盟金融和货币事务委员奥利·雷恩表示，初步估计救助规模在800亿欧元左右。因此在8日的财长会议上，各国要求苏格拉底确保，葡萄牙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也对外部救助表示支持。会后的声明显示，最终达成的救助协议将是一个“跨党派的协议”。

奥利·雷恩的发言人称，一旦财政部长们同意施救，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联合小组将立即前往葡萄牙，对资金需求和贷款条件进行谈判，“而且我们之前与葡萄牙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已经掌握了相当的经济状况”。

技术上不成问题，但政治上障碍颇多。与早前救助希腊和爱尔兰不同，由若泽·苏格拉底领导的葡萄牙看守内阁，手中权力有限，在议会也没有多数支持。欧盟对成员国的援助需要议会最终批准，看守内阁负责谈判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这是葡萄牙自 1974 年推翻独裁统治确定目前民主多党制政体以来，第三次诉诸外部经济援助，这对一个国家是个不太光彩的事情；但对欧元区来说，这只靴子的最终落下则不啻为一件好事。欧盟官员认为这将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落幕。

此后，葡萄牙政府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减少政府赤字。葡萄牙政府宣布缩减公共部门规模的最新举措，以节省开支 1 亿欧元，还将对是否将平衡预算案引入宪法发出正确信号。

2011 年 9 月 15 日，葡萄牙政府宣布了缩减公共部门规模的最新举措，以节省开支 1 亿欧元。政府还称，随着希腊和欧元区稳定形势的不确定性加大，葡萄牙必须继续努力控制开支。葡萄牙总理科埃略表示，葡萄牙将对是否将平衡预算案引入宪法发出正确信号。科埃略表示，政府将裁减中央政府中 27% 的管理层职位，即 1712 个岗位。他还称，将关闭 137 个公共实体。这些措施将一共节省 1 亿欧元开支。

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与最大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主席帕索斯表示，两人将共同在国会投票，促进充满争议的政府紧缩政策推出。为避免步希腊后尘，葡萄牙政府制订了一揽子计划，并宣布将采取覆盖航空、铁路运输、邮政、能源、造纸及银行保险业的大规模私有化措施，确定到 2013 年将财政赤字水平降至 28%。但穆迪表示，葡萄牙政府财政实力在中期内继续减弱，有迹象表明葡萄牙债务情况在持续恶化。穆迪认为葡萄牙经济增长前景可能依然相对疲软，除非在中长期内经济结构改革初现成果。穆迪主权风险评估小组资深分析师安东尼·托马斯表示，葡萄牙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依然债台高筑。穆迪认为，在提高利率或经济增长疲软不能完全解决的情况下，葡萄牙债务状况会更加恶化。

西班牙经济危机：贸易大幅缩水

肇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引发一系列“蝴蝶效应”，远在东半球的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

西班牙时间 2010 年 6 月 8 日，新浪财经记者在马德里采访了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常务副主席，西班牙亚洲贸易中心总裁毛峰。他表示，从 2008 年下半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开始，到现在欧洲债务危机导致的欧元贬值，西班牙华商贸易的营业额出现了大幅度缩水，下降超过 1/3。但在西的华商们会以不变应万变，积极面对全球

经济危机之后的欧洲债务危机。

位于 Fuenlabrada（芬拉布拉达）市的 Cobo Calleja（科沃卡莱哈）工业区是马德里地区最大的华人商品批发区。不少华人公司就设立在这里。在这里记者看到，原本热闹的仓库区已经有不少空余的仓库在等待出租或者出售。

毛峰的西班牙亚洲贸易中心就位于这里。亚洲贸易中心也是一家以批发为主的市场，有着 60 多个店面，经营范围包括服装、饰品、箱包等中国人普遍经营的产品，因此极能反映市场的动向。但从 2008 年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华商的销售额出现了大幅度缩水，下降了超过 1/3。据毛峰的分析，这很可能与西班牙人民收入降低有直接的关系。

在众多商品中，以家用小商品类受到的影响较小。这很可能是由于这类商品属于生活的必需品。而服装和首饰类下降较多，可能在于这种商品具有较大的弹性：在收入高的时候，需求较为旺盛，而收入低的时候，需求则相对低迷。

不过销售额的降低还只是一个方面。经济危机中的欧元贬值也使得在西班牙华商损失了不少利润。在短短两年间，欧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从最高的 1 : 11，跌到了现在接近 1 : 8。对于在西华商来说，两年以来，以人民币计价进口的商品成本随着原材料价格的提升、国内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已经增加不少，而卖出的价格却跌了 25% 左右。这其中损失的正是华商的利润。

当经济危机来临，在选择是保证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还是购买非必需品的消费支出上，相信所有人都不会含糊。因此在经济不景气状况下，西班牙人在饰品类、礼品类等休闲产品的支出方面急剧下降。而这点在中国华人华侨企业那里也同样得到了验证，根据当地的华人报纸报道，服装服饰类、休闲礼品类用品营业额与危机发生之前相比大约有 25% ~ 45% 的下滑。

受希腊债务危机影响，欧洲多个国家已暴露出财政问题，西班牙是其中之一。西班牙央行 5 月 22 日宣布，接管一家已经陷入困境的小型储蓄银行 Cajasur，成为该国政府自西班牙房产危机爆发两年多以来，第二次介入市场援助银行，致使投资者不得不对欧洲金融系统再起忧虑。Cajasur 银行最近曾尝试与另一家小型金融机构合并但以失败告终。尽管西班牙央行称 Cajasur 银行破产不会对整个银行业体系造成影响，但市场信心仍然严重受挫。投资者担心银行业的问题会使西班牙经济增长停滞，并使欧元区债务危机扩大化。据初步估算，在西班牙与 Cajasur 银行面临同样困境的地区性储蓄银行占到整个银行业务的一半。

西班牙许多储蓄银行在过去 10 年因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蓬勃发展而增速迅猛，部分源于过去银行向房地产开发商大量贷款导致。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以及经济

陷入衰退，这些坏账以空前的速度增长。根据 2010 年 4 月公布的一项统计，目前，西班牙银行坏账达到了 14 年来的最高水平。

西班牙经济形势的恶化也影响了西班牙的华商生意，从新浪记者的报道可以看出，西班牙华商贸易营业额正在大幅缩水。

面临经济危机，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享受惯了高福利的西班牙人也开始精打细算，开始攒起钱来了。根据西班牙经济学家报报道，2006 年西班牙居民储蓄率仅为 9.3%，是 1999 年以来的储蓄率最低值，而 2008 年上升到了 15%，到了 2009 年西班牙居民储蓄率上升到了 20%，其中当年第 4 季度就达到了 24.7% 的储蓄率，这是西班牙的历史最高值。

西班牙的法律规定，在公共区域安装视频监视系统等安防产品，必须到当地的数据保护机构申请数据档案管理保护。而根据 2010 年 3 月西班牙数据保护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西班牙的视频监控设备正成倍增长。2009 年新增监视设备的备案文档达到 22305 份。而 2008 年只有 9426 份，2007 年只有 4876 份。而在 2010 年头两个月，就已经新申请了 5069 份。可以预见，2010 年的增长幅度还将大大超过 2009 年。

西班牙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其风险将延伸至整个欧元区，乃至更广泛的全球经济。不容忽视的是，西班牙一直都被市场视为继葡萄牙之后最可能成为下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欧元区国家。

爱尔兰：经济局势骤然紧张

自从希腊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达成救助协议之后，较美国相对安静的欧洲市场似乎开始慢慢淡出公众关注的视线。不过一场来自于爱尔兰的危机再一次把关注视线拉回欧洲，人们确信，债务危机的幽灵依然盘旋在欧洲的上空。

爱尔兰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 9%，比欧元区信用等级最高的德国国债高出近 7 个百分点，创下自欧元 1999 年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爱尔兰政府从金融市场筹资的借贷成本已经高得难以承受。爱尔兰形势骤然紧张，有关爱尔兰即将要求欧盟救助的消息甚嚣尘上。在金融市场一股非理性恐慌情绪的推动下，爱尔兰是否会沦为第二个希腊，在欧元区掀起第二波债务危机备受关注。

从很多方面来说，爱尔兰的近期表现都源于过去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良好记录——爱尔兰人口结构相对年轻，教育情况良好，同时企业税率也相对较低，这些对外国投资者很有吸引力。直到 2008 年初陷入衰退前，爱尔兰一直都是知名的海外投资目的地，任何希望深入欧洲市场腹地的外国投资者都会来到这里。Cisco（思

科)、Intel (英特尔)、Microsoft (微软)和其他大公司在爱尔兰都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办公室。因此,爱尔兰经济不同于希腊。

然而,爱尔兰的增长形势可能依然严峻,因为欧债危机很可能拖累全球增长。今年,出口推动了爱尔兰的增长。“特别是依赖欧盟、美国和加拿大作为出口目的地,凸显了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前景恶化可能给爱尔兰带来的风险。”Deutsche Bank(德意志银行)称。

爱尔兰本土的消费者不太可能有能力抵消潜在的出口下滑。与美国类似,几年前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带来的沉重债务令爱尔兰消费者们深受其累。“总体而言,今年爱尔兰国内增长仍为高负值。”俄亥俄斯里大学教授西恩·柯称。此外,穆迪国际评级机构将爱尔兰评级降至“垃圾级”。俄亥俄斯里大学教授西恩·柯指出,此举并非基于爱尔兰的经济表现,而是因为该国负债仍重,如果没有欧盟持续的金融救助,违约风险仍然存在。

和全球其他大多数经济体一样,在金融危机蔓延的大潮中,爱尔兰可能很难独善其身。爱尔兰形势骤然紧张甚至引起了正在韩国首尔开会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关注,因为它再次表明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依然充满着凶险。为了平息市场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欧盟官员近来纷纷站出来喊话,声言爱尔兰尚未要求救助,且欧盟有现成的机制可以随时向爱尔兰伸出援手。爱尔兰官员也强调,自己并不需要救助。这一幕不禁让人联想起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前的场景,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

2010年11月12日,欧洲主要国家在G20峰会期间发布了联合声明,重申目前欧洲国家国债持有人不会受到正在讨论的未来援助机制的影响,表示“新的机制直到2013年中期才会生效,不会对现有国债持有人产生任何直接影响”。声明发布后,欧元小幅上涨,爱尔兰国债收益率下降至8.48%,而爱尔兰股市也开始反弹上升。

虽然爱尔兰上月底持有224亿欧元的充沛现金,似乎短期间没有破产的危险,但彭博社援引一位德国匿名官员的话说,考虑到整个欧元区经济的稳定,抑制市场猜测与投机,爱尔兰有可能在11月16日欧盟财长会议之前被催促申请援助。除非目前市场对于爱尔兰债务问题的担心减弱,否则德方要求国债持有人承担更大风险的方案将会受到威胁。

不过分析认为,市场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么,爱尔兰是否真的到了绝境?

仔细分析,引发此轮恐慌的焦点无非有二:一是投资者认为爱尔兰无力解决本国严重的债务危机,唯一的选择就是靠欧盟救助;二是市场担心,在欧盟救助爱尔兰的过程中会选择让持有爱尔兰国债的私人投资者承担一定的损失,实行债务重组。由此,投资者开始抛售爱尔兰国债,导致爱尔兰政府融资成本骤增。

应该说,爱尔兰的债务形势相当严峻。国际信评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北京时间 2011 年 7 月 13 日凌晨宣布,将爱尔兰政府外币和本币债券评级由“Baa3”下调一档至“Ba1”的垃圾级,评级前景为“负面”。爱尔兰由此成为继葡萄牙和希腊后,第三个评级跌入“垃圾级”的欧元区成员国。

据外电援引欧元区官员的表态,鉴于当前欧债危机不断扩散,情势危急,欧盟成员国首脑计划在 15 日再度召开紧急峰会,商讨应对之策,并继续针对第二轮援助希腊方案进行谈判。其中,允许私营部门债权人参与援助以及欧元区回购希腊国债等措施的可行性都将被列入会议讨论内容。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欧盟短时间内确定第二轮援助希腊计划的可能性依然不大。

穆迪 13 日发表声明称:“下调爱尔兰评级的主要原因是,在欧盟和 IMF 援助计划于 2013 年底到期时,爱尔兰很可能需要获得进一步的资金才能重返市场独立融资,而额外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可能将是私营部门债权人参与援助,上述可能性正在上升。”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爱尔兰金融系统饱受重创,政府债务大幅增长。爱尔兰于 2010 年 11 月被迫向欧盟和 IMF 寻求援助,并达成总额为 850 亿欧元的援助计划。据欧盟委员会此前预测,2012 年爱尔兰债务在 GDP 总额中所占比例将由 2007 年的 25% 升至 118%。

另两家评级机构中,标普在 4 月将爱尔兰评级降至“BBB+”,评级前景为“稳定”。惠誉在 4 月确认了爱尔兰“BBB+”评级,并将其移出负面评级观察名单,但评级前景仍为“负面”。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其房地产泡沫破裂,进而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爱尔兰这个一度因为经济高速发展而获得“凯尔特之虎”美誉的欧元区国家如今却成了一只病猫,与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一道被戏称为欧元区债务问题最为突出的“欧猪五国”。

如果爱尔兰的形势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完全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掀起更大范围的债务危机。爱尔兰已经成为阻击第二波债务危机的最前线。

法国艾菲尔铁塔笼罩阴霾之中

“先是雅典,然后是罗马,下一个会不会是巴黎?”意大利这只“靴子”刚落地,美国《纽约时报》网络版 14 日就在头条位置提出这个问题。事实上,标准普尔给法国主权信用降级的假消息,已经提前刺爆了该国越胀越大的不安气球。中国学者丁一凡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降级真的来临,就有可能成为压倒法国的最

后一根稻草。对于欧洲来说，倒下一个希腊和倒下一个法国显然无法同日而语。奥地利《维也纳日报》称，“欧洲的命运取决于法国”。欧盟会不会就此解体？在有关法国的不安袭来时，这个已被猜测多时的问题，像被乘以倍数般迅速放大。当意大利债券市场几近崩盘，投资者不禁深表忧虑：法国是否将会成为下一个卷入欧元区蔓延漩涡的国家。

仅仅几个月前，这个问题还是不可想象的，可现在，它让投资者发愁：他们要不要在抛售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之后，也抛售法国债务呢？

全球一些最大的基金现在提出，欧元区只有一个国债市场值得买进：那就是德国国债。

Black Rock（贝莱德）欧洲固定收益部门主管迈克尔·克劳茨贝格尔表示：“许多市场参与者对欧元区外围国家的敞口感到越来越紧张，有些人甚至在质疑自己所持有的法国资产。”如果把法国与意大利作一个比较，你会发现法国经济基本面并不比意大利强多少，意大利之所以成为焦点主要还是因为政局不稳的问题。意大利的工业基础非常雄厚，出口导向性强。而法国的去工业化现象很严重。巴黎股市CAC40股指的40家成分股企业中，大部分都是跨国公司，纯粹的法国企业已经很少了。

如果问问过去两天谁的10年期债券利率上升更多，意大利还是法国？英国《卫报》称，答案是法国。该报说，法国银行比其他机构持有更多意大利债券，总额约3000亿欧元，政府批准的任何意大利债务削减都将令法国银行伤心欲绝。法国官方预计明年可取得1%的经济增长，欧盟委员会却不那么乐观，后者给出的最新数字只有0.6%。

“法国紧盯意大利乱局”，《纽约时报》以此为题报道称，虽然意大利取代希腊成为欧债危机的新焦点，但投资者日益忧虑法国前景。正在密切关注意大利局势演变的法国当局坚称，雄厚的法国银行资本足以挺过这场风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担心。

新加坡《联合早报》14日报道说，法国总统萨科齐仍不打算承认该国有可能被卷入危机漩涡，可事实上，法国早已弥漫不安情绪。上周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给法国降级，为巴黎投下一颗震撼弹。虽然事后澄清是误发消息，但围绕着法国的种种问题已一一浮现。

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阿塔里评论说，这是一个信号，就像一家报纸发了假消息，最后你发现其实这就是真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万军14日对《环球时报》表示，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危机潜伏的时候，市场信心尤其重

要，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致命影响。标普的乌龙事件以及引发的一系列后果说明，法国已经遭遇信心危机，这非常危险。

法国央行公布的7月调查报告显示，该行预计法国第三季经济增长0.2%，与对第二季的增长预估相同；凸显对法国经济在第一季增长0.9%后陷入停滞的担忧。调查显示，受运输设备部门支撑，7月工业活动略有增长。

数据还显示，工业及服务的企业信心指数都从99微跌至98，均低于长期均值；而7月订单数量延续6月跌势，但制成品库存仍处在正常水平。

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下，法国财政实力减弱，让该国债务衡量基准在AAA评级国家中最为脆弱。德意志银行也警告称，法国可能在今年年底前被列入降级观察。法国企业部门财务状况紧张，盈利能力差，并且有大量的借贷需求。

与意大利不同，法国已采取迅速行动，说服市场相信：该国正坚决执行相关计划，拟将预算赤字削减至GDP的3%。法国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出台了第二份补充预算，其中包括2012年节省70亿欧元的新措施，而五年期间将总共节省650亿欧元。此前，法国已在8月份公布节省方案，提出到2016年节省480亿欧元。

不过，法国财政部长表示，法国将竭尽全力维持AAA级主权信用评级。分析指出，如果法国因为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问题，导致AAA评级遭到质疑的话，那么目前制定的整个欧洲救助战略可能面临失败。

正是由于欧元区内部的这种恐惧蔓延，法国相对于德国的收益率息差大幅飙升。法德1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息差扶摇直上，已创下166个基点的欧元时代新高。鉴于两国都拥有AAA评级，这个息差相当大。自6月份以来，这个息差已增大5倍。同时，为限制市场出现不利于法国资产的行情，法国财长弗兰索瓦·巴胡安周四将适用于银行及金融业其它公司股票的空头禁令延长3个月，这一禁令是8月份上一波市场袭击浪潮涌来时出台的。但是，法国政府十分明白自己处于脆弱地位，原因是法国公共财政状况不佳，且经济增长乏力。

法国政府宣布，在未来5年内，将通过增税和减支实现减赤650亿欧元。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表示，已经到了要“采取行动保卫法国的时候，以免法国经历其它许多欧洲国家经历的严重困难”。菲永表示：“我们的民众明白，赤字和债务给我们的生活和未来带来了哪些风险。‘违约’这个词并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减赤计划推出前几天，世界领先经济体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G20）峰会刚刚在法国举行。峰会未能就欧元区危机达成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减赤计划反映出，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担心不能在大选前重振公共财政并保持法国AAA的主权评级。法国大选将于明年4月份举行。此举是为了平复一种恐惧：人们担心，法国

可能被卷入欧元区债务危机。

《法兰西晚报》宽慰民众说，法国不应过于悲观，自 1789 年法国大革命至今，法兰西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债务危机，每一次都通过改革获得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债危机未尝不是好事，以此唤醒法国人的危机意识，让他们意识到不忍痛改革不行。英国牛津经济研究所学者维尼撒·罗素 14 日对《环球时报》表示，与希腊和意大利相比，法国的公共债务累计较低，经济支柱也不是金融业，因此不会因银行业危机而全盘皆输，甚至动荡。唯一难以避免的是，欧元汇率不稳将带给法国不小损失。

意大利：挤入全球最高赤字国

正在所有人都聚焦欧盟如何应对希腊债务危机时，意大利又火上浇油地引爆了一枚“炸弹”。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3 月 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 年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缩水 5%，为该机构 1971 年成立以来所记录的最大降幅。此外，意大利财政赤字翻两番，占 GDP 的 5.3%，政府债务以占 GDP 的 115.8% 的高比例，让意大利正式“挤入”全球最高赤字国的行列。

2010 年意大利就业市场也愁云一片，劳工部长萨克尼表示，意政府当前的政策在未来几个月都会遏制企业雇工，很多失业者只能靠救济金维持生活，只有经济增长才能让失业率最小化，如果政策不调整，那么社会稳定必将受到挑战。受金融危机影响，意大利各经济领域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政府预计今年 GDP 可能增长 1.1%，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涨幅最多为 0.7%。

意大利政府至今对高债务经济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该经济体早已习惯了运行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意大利财政部长特雷蒙蒂说：“我们过去的发展一直都与赤字相伴，不可否认我们正在被巨额公共债务压着，但与其他高债务国家相比，我们的赤字水平还不算高。”而这样的态度肯定不是欧盟希望看到的。

5 月 31 日，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签署财政紧缩方案。计划在 2011 ~ 2012 财政年度削减政府开支 240 亿欧元（约合 259 亿美元）。7 月初，意大利政府宣布，计划出售本国的一些“财产”来募集资金偿还高额国债，以减轻国家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

希腊的乱局刚刚以放弃公投、寻求政府改组的计划而告一段落，债务危机的大火又烧上意大利，由于意大利政局不稳，市场担忧加剧。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们表示，意大利今年第三季度经济收缩，显示了该国已经陷入了 2001 年来的第五次经济衰退，另外该国的经济紧缩政策将进一步打击其经济增长。

意大利统计局周三公布数据显示，意大利第三季度 GDP 环比收缩 0.2%，前值为增长 0.3%。意大利今年第三季度经济收缩为 2009 年第四季度来首次，并符合中期预期。数据并显示，意大利第三季度消费支出环比下降 0.2%，投资环比下降 0.6%；意大利进口上升 1.6%，同时进口下降 1.1%。

作为意大利国债市场基准的 5 年期国债收益率，2011 年 11 月 8 日一度触及 6.675%，创下欧元诞生以来最高水平。意大利主权债务 CDS 费率也连创纪录新高，其 5 年期债券 CDS 费率一度上升至 530 个基点。这意味着，规模 1000 万美元的意大利国债的年平均保险成本已达到 53 万美元。

债券市场的惨淡表现显示了投资者对意大利独自解决自身财政困局前景的悲观预期。分析人士认为，意大利议会对于贝卢斯科尼内阁的信任投票结果将进一步显示对于意大利政府的信任程度，并将使市场持续振荡。

意大利下议院以 308 票通过了预算案，但不到半数的支持票意味着贝卢斯科尼将可能面临着进一步的辞职压力。尽管一个新的政府可能会得到议会方面的更多支持，并推行更多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前景不定，市场信心并未获得支撑。意大利政府利用国债来筹集资金的成本上升，原因是清算机构伦敦清算所昨天宣布提高意大利国债交易的保证金要求，而与此同时，意大利国债收益率已经接近于被认为是无法维持的水平。国债收益率突破 7%，意味着意大利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将难以为继，此前希腊、葡萄牙以及爱尔兰的国债收益率在突破 7% 以后，便一路飙升，融资变得极为困难，最后不得不寻求国际援助。

而就经济规模而言，意大利在欧洲仅次于法国和德国。如果意大利出现类似希腊的危机，对于欧洲而言，将是一个大灾难，世界其他国家也将难以逃脱负面冲击。

意大利尚未到期的国债金额将近 1.6 万亿欧元，债务规模比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希腊 4 国债务总和还大。经合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意大利债务占欧元区总债务的比重高达 23%，远超过希腊的 4%，以上 4 国债务之和为 17%，也不及意大利的水平。

有市场传言称，欧洲央行正持续购入意大利债券，以期降低意大利国债收益率。意大利一年之内到期的债务在 4500 多亿美元，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计划在实行 4 倍的杠杆效应后，规模扩展为一万亿欧元，意味着其实际资金规模只有 2500 亿 ~ 3000 亿欧元（约 4000 亿美元）。如果市场信心不足，私人投资者逃逸，则一个意大利就可以耗尽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而且其需求还得不到完全满足。

受意大利动荡局面影响，国际市场大幅波动，投资者避险意识强烈，欧洲股市开盘全线大跌，意大利股市盘中跌幅超过 4%。作为被先期警告存在主权债务风险

的“欧洲五国”之一，意大利国债市场近来愈发孱弱。

意大利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攀高，突破了 7% 的警戒线。市场人士分析称，国债收益率超过 7%，将意味着该国融资成本难以为继，将向国际求援。北美信托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詹姆斯·麦克唐纳指出，除非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开支削减，否则，意大利将很难降低该国债务在 GDP 所占比重。因此，在债务问题愈发凸显时，投资者很容易认为意大利将重蹈希腊国债收益率突破 7% 的覆辙。

从时间上看，帮助意大利国债市场摆脱当前窘境的最现实可能性，来自将于罗马当地时间 8 日下午 3：30 开始的意大利议会对于贝卢斯科尼政府财政预算改革方案的投票。只有该国议会通过改革方案且意大利财长特雷蒙蒂能够就此方案可行性说服欧元区财长，意大利国债市场及意政府财政前景才有望在不接受“外援”的前提下获得转机。

7500 亿救市“强心剂”不惜一切捍卫欧元

欧洲债务问题已经成为欧盟的普遍性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和恶化，最后存在引发崩溃式危机的可能性。根据目前的判断，引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欧盟不可能也不允许让希腊债务危机大范围扩散，甚至引发欧洲债务危机。因为如果风险（包括违约）蔓延至其他易受冲击的国家，以及由于欧洲银行大量持有周边国家债务，就会导致欧元区内爆。

20 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15 日闭幕。会上，各成员国财政领袖支持欧洲方面所列出的对抗债务危机的新计划，并呼吁欧洲领导人在 23 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对危机采取坚决行动。

为摆脱离欧危机，欧盟针对债务问题的救援经历了一个相对长期和不断升级的过程。2009 年底，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之初，欧盟认为，希腊是由于不遵守欧盟在《稳定与增长公约》设定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上限而出现债务危机的，希腊本身必须为此埋单。实际上欧盟当时贯彻的是“不救援”条款，以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2010 年 5 月 10 日凌晨，经过 10 多个小时漫长而艰难的谈判，欧盟成员国的财政部长终于达成一致。为了帮助被债务危机困扰的欧元区成员国并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扩散，他们制定出了一项总额为 7500 亿欧元的救助机制。这套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救助机制由 3 个部分资金组成，首先，为期 3 年的欧盟各成员国根据相互之间签订的协议提供 4400 亿欧元；其次，根据欧盟的《里斯本条约》中有关条款为基础，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 600 亿欧元；另外，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也将提供 2500 亿欧元进行援助，它和欧盟对希腊的援助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然而，并不是每个欧盟国家都愿意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救市措施，不满和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并已影响到多国政局。有的专家认为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务问题并不是靠高额的救赎金就能够彻底解决的。想要使这场来势汹汹的债务危机得到有效抑制，欧盟必须在各成员国中真正实现统一。例如，统一的市场、统一的预算、统一的财政、统一的税收，以及统一的就业市场等，统一的货币恰恰是需要在这些条件支撑下才可以稳固的。但由于更多的现实问题，所以欧盟实现其成员国真正统一还任重道远。

还有些市场分析专家对欧元未来的发展抱更加悲观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一次以希腊债务危机为导火线的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将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模式、合作原则，以及应对危机的能力的不足与缺点完全暴露出来，因此使投资者对欧元的信心遭到重创。这种重创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得以恢复；另外，7500 亿欧元看似不小，但目前欧元区仅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 3 国的负债总量就已经超过了 11000 亿欧元，显然用 7500 亿欧元来抵抗全球投资者对欧元的攻击是远远不够的。而对于欧元这种先天存在缺陷的货币，很难通过后天的弥补来达到健康生存。欧元即使这次逃过一劫，将来的前途也会因为充满了种种无法调和的因素而导致最终四分五裂的局面。由此可见，高达 7500 亿欧元的救赎金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此次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

在非欧元区英国，就在救市政策出台前一天，英国政府还表示不参与欧元保卫战。英国财政大臣达林 9 日在布鲁塞尔说，英国不会支持欧盟建立稳定欧元的基金来帮助欧元区债务缠身的国家，但他当时也表示，如果有正确的安全保护措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英国愿意支持欧元区国家稳定欧洲金融市场。

专家指出，本次救助机制是否有效，关键还要看各成员国政府是否有坚定的决心共渡难关，各国民众是否愿意同甘共苦，否则仅凭大规模投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形成的经济问题。

德国引擎：危机中能否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 年上半年，来自希腊和西班牙的劳工分别增加了 84% 和 49%。希腊和西班牙目前深受债务危机缠绕。希腊官方公布的该国失业率为 18%，而西班牙的失业率已接近 23%。德国在今年 5 月取消了对欧盟国家人员的工作限制后，今年上半年共接纳了 43.5 万外来劳工，人数比上年增

加了19%。除南欧国家外，还有不少来自东欧的欧盟成员国。

虽然外来劳动力不断增加，但移民的整体数字变化不大，希腊和西班牙在德的移民总数甚至略有减少，因此不能说明德国出现了新的移民潮。德国劳动力市场和职业研究学院的最新调查表明，新增外来劳力仅占市场需求量的0.5%，外来劳工仍旧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由于语言以及待遇问题，尤其是象工程师这样的高技术领域很难招到合适的外来人员。

在这次债务危机中，德国一反常态，成为南欧一些国家劳动力的“避难所”，并要求欧洲各国向德国看齐，力推“德国模式”。

“我们已经揭开了欧洲一体化的新篇章。”德国总理默克尔本月初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言时指出。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近日发表文章指出，德国充当“欧洲领导者”的时机已经成熟。德国执政联盟中的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不久前也称，欧洲人在应对欧债危机中正在“说德语”。

欧债危机触发了欧盟内部力量格局的重新洗牌。一方面，德国正在联合法国努力“化危为机”，推动欧洲向财政乃至政治一体化方向迈进；另一方面，英国作为欧元区的“局外人”，因日前在欧盟峰会上独唱反调，已在欧洲棋局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但德国得到的并非完全是掌声，疑虑和非议也不少。

欧元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是欧元区救助计划的最大出资方，对于从根本上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德国态度也最为强硬。德国相信法律的约束力量，认为只有欧元区各国统一标准、严守财政纪律，才能克服欧元区管理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在此之前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或让欧洲央行大规模救市，在德国看来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花招”。

德国《明镜》周刊近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德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的态度过于傲慢，似乎认为欧洲其他国家都需要德国开出的灵丹妙药。其他欧洲国家自然知道德国关于强化财政纪律等的提议是缓解债务危机的良方，真正让欧洲伙伴们不快的是德国提案的内容，而是德国政府咄咄逼人的态度。

二战结束后，法国和英国出于对德国再度称霸欧洲的恐惧，才推动“绑定”德国的欧洲一体化，以免德国在欧洲“做大”。对此，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不久前告诫德国政治家应当牢记历史教训，通过与伙伴国紧密合作来应对欧债危机，不要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否则德国将面临孤立的危险。

如今，欧债危机已使欧洲不少国家受困，欧盟机构一时也缺乏行动能力，欧洲不少国家虽然难免对德国“独大”心存疑虑，但也的确希望德国发挥良性的主导作用。正如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日前在一次讲话中所说：“相对于德国的强大，我更害

怕德国的无所作为。”欧盟峰会的角力，绝大多数国家最终站在德国一边，应该也是出于同样心理。

为了“化危为机”，德国政府显然已决心有所作为，为此甚至不惜打破以往禁忌，在推进欧洲一体化方面选择“能者先行，弱者跟进”的“多速欧洲”道路。如何善用实力，带领欧洲走出主权债务危机，取得共赢，对德国领导人是个重大考验。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最大的担忧，是债台高筑会影响德国 3A 的信用评级。

在此背景之下，朔伊布勒采取了中间之道，力促 EFSF 的规模扩容到 1 万亿美元，以此将稳定基金“变身”为债务发行商，他们认为这样或许可以承受“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包括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现在被称作“PIGS”）出现的第一批 20% 的损失。

即使如此，德财长的提议也已经在德国倍遭质疑。按照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首席欧洲经济学家雅克·卡尤的分析：20% 的损失已经远不能缓解投资人的紧张情绪，“这就如同一个保险，只保一扇门，而不是整个一幢房”。

中国：债务危机升级，将会“受灾”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日前表示，他不同意成立一个新的欧洲层面的经济主管机构来应对欧债危机。这意味着欧盟与德法领导人之前所提倡的危机解决方案发生重大分歧，欧债危机前景再添变数。

欧债危机不断升级，其对我国的影响也日益受到关注。虽然欧债危机对国内银行业造成的直接损失微乎其微，但因危机引发的外需压力则出现了上升趋势。

由于对希腊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担忧加剧，希腊或将有序破产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法国两大银行被降级更引发市场对银行业危机的担忧。一系列事件显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欧盟不但没能顺利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欧债危机更传染至更多国家，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存在着债务危机与银行危机并发的可能性，欧元及欧盟运作机制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鉴于希腊债务违约风险不断上升，未来不能排除破产甚至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我国应清醒认识局势，做好充分的应急预案。首先，如果希腊政府宣布违约，暂停债务偿付，中国此前购买的少量希腊债券将面临资产损失。

其次，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重新启用本国货币，其对各主要货币汇率将大幅贬值，全球汇率将面临难于定价的混乱局面。据了解，目前我国是希腊第三大贸易逆差国，今年一季度逆差额达到 9.2 亿美元。希腊货币贬值将使其对华债务大幅上

升，增加偿债风险。

更严重的是，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将对欧元成员国产生传染作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成员国退出，这对欧元区以及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全球将陷入“二次衰退”的困境，不排除国际上因债务问题升级而发生剧烈冲突的可能性。

欧债危机不断蔓延，受害最深的其实是银行业。就国内而言，由于商业银行持有欧元资产比例极小，而且多以贷款类资产为主，风险敞口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根据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说法，目前除中国银行有折合成 10 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欧债风险敞口外，国内其他银行几乎没有。

我国基本没有持有希腊国债，持有的意大利国债占意大利国债总量也仅 4%，规模较小，直接损失微乎其微。相比而言，更大的是对我国外需乃至实体经济的影响。

数据显示，自 2010 年 2 季度开始，我国对欧盟的贸易增速就进入了下行通道。2011 年 8 月份，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同比持平，环比仅为 -2.6%，低于 2000 年以来 5% 的平均水平。前 8 个月，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同比增长 18.5%，低于 2000 年以来 23.9% 的平均增速。

而事实上，欧债危机的影响还不只如此。一方面，欧洲债务危机冲击向实体经济领域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通过贸易领域向我国传导存在时滞；另一方面，日本的灾后重建和对新兴经济体贸易的高速扩张弥补了欧洲需求萎缩留下的外需短板，因而，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目前尚未完全体现。

欧债危机骤然升级——法国银行、意大利主权信用引发“降级潮”，希腊第二轮救助方案突然搁浅，欧洲银行业流动性断流。未来欧债危机会如何演进，对世界经济将产生什么影响，欧元区的命运又将如何？这一系列问题都引发人们的关注。

面对欧债危机，中国难以置身事外。中国应该如何做，才能既帮助到欧洲国家，又维护了本国利益？

援助欧洲应坚持务实、市场化的原则。中国拯救欧元的前提条件是，欧元区国家先要自己拯救自己，想自己少承担救援成本，而以“恐慌之术”逼中国等外部国家出手救援，这条路走不通；在中国等国家救援之前，国际组织必须表现出足够诚意，利用资源与规则制订的优势，建立健康、公平的全球金融市场；最后，投资的目标是赢利，其他任何战略目标必须围绕长期或者短期赢利这一核心目标。

中国具体应该如何做？

第一，多边渠道买债券。如果欧元区发行欧元债，以及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发债，中国可以购买，因为风险可控。或者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或欧洲央行合作，中国将资金划给它们，而它们进行担保。再或者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由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发债券救助欧洲，中国可以购买。

第二，鼓励中国企业进入欧洲，与欧洲企业合作或购买股权，“可以买优先股，不参与管理，避开政治障碍”。中国还可以购买长期具有战略投资的资产。意大利目前公共债务是 1.9 亿欧元，意大利官员称，中国持有其 4% 的债务。中国或可购买意大利电网、石油天然气公司等资产。

第三，在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中，一篮子货币中应增加欧元的权重。

可以预计，在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欧元区核心国家复苏减速几成定局。我国对欧出口在总出口中的占比高达 20%，根据欧元区领先指标 OECD 的走势及其与我国出口增速的判断，未来我国外需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从实体经济领域来看，欧债危机会对国际经济稳定形成一定冲击，并且欧洲将执行更加严格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市场需求，减缓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与此同时，面临金融和经济困境，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会有所抬头。由于欧盟已取代美国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如果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欧元区经济的整体下行必将影响我国出口形势。鉴于此，经济学家建议，我国应重新评估当前的从紧政策，结合国内通胀形势，积极进行结构性调整。



诸元之战：汇率背后的国家博弈

卢布外交：苏联经济援助的真实目的

当时的苏联通过在德国大规模拆卸重工业设备，席卷一切值钱的东西，“抢回了”大约 660 亿马克的战争赔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人没有忘记工业技术扩散中最具创造力的财富——人才。在没有美元的援助下，苏联依靠自身的努力经过短短的 5 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复苏，1950 年的工业产值就超过了战前水平。随着经济实力的康复，面对美国的“经济流放”政策，苏联开始了“挖墙脚”的反击战。从 50 年代初，苏联对一系列美元帝国版图中最薄弱的地区展开了经济攻势。对于美元帝国而言，苏联每次向另一个地区或国家扩张其经济势力，美国就会失去另外一个正常的市场。

苏联对埃及棉花的进口价大大高于世界市场价格，使得西方市场对于埃及变得失去了诱惑力。在大量囤积棉花之后，苏联拥有着抛售棉花扰乱西方市场、骚扰美元帝国正常经济秩序的能量。美国扛着维持世界市场秩序的负担，而苏联的市场游击战，搞得美国无比抓狂。高价收购的棉花，再由高价出售的工业设备利润加以弥补，苏联的经济小算盘打得并不亚于美国。

在叙利亚，苏联的工程师们开始忙着测量整个国家，为未来援建的飞机制造厂选址。苏联的石油专家们已经在为东北沙漠地区的石油开采作最后准备。更令中东人开心的是，苏联准备在该地区安装核反应堆，为将来的核电厂提供大笔卢布贷款。不仅苏联在行动，而且东欧国家也在紧跟苏联的卢布扩张战略。捷克为埃及建设了非洲最大的军火生产体系，在开罗近郊铺开了非洲最大的陶瓷生产企业的工地。在也门，苏联的工程师们正在建设红海最大的现代化港口，这是也门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公共工程。在苏联的协调下，中国也没闲着，帮助修建了贯穿也门萨那至

荷台达的公路。在约旦，甚至爆发了卢布与美元的直接对抗。

亚洲在美元与卢布的争霸中，地位举足轻重。亚洲不仅地域辽阔，人口多达世界的 1/4，而且还有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欧洲殖民地体系，其资源种类丰富，原材料富甲天下，既是美国防范英镑区死灰复燃的战略重点地区，又是抗拒苏联卢布经济渗透的前沿阵地。美国从战后重建开始，对亚洲地区可谓不惜血本，已大举砸进 10 亿美元的援助巨款。美国不仅提供经济援助，而且向亚洲国家开放本国市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紧紧绑在美元区之内。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亚洲成了名副其实的美元占领区。难怪当国民党撤离大陆后，美国发出“谁丢掉了中国”的惊呼，其实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谁丢掉了美元帝国的中国版图”。

新中国的建立，使得美国丧失了太平洋西岸最大的一块美元占领区。50 年代初，苏联大规模对华援助，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将会大大加速，从而形成了对美元帝国的潜在威胁。同时，苏联在中东的英镑区也开始发动颠覆性的进攻。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使英法在埃及的势力受到美国的严重削弱，美国对英法一切旨在恢复帝国殖民体系的企图，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严厉的制裁。但在打击英法之后，美元还没来得及进入，卢布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了进来。到 1958 年，苏联已经在埃及、叙利亚和也门打入了卢布的楔子。

对于埃及而言，卢布援助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埃及制订了自己的五年计划，涵盖了整个现代经济的各个领域，只要埃及需要，苏联就会提供帮助。苏联对埃及提供的是卢布长期贷款，价值上亿美元，时限长达 12 年，利息比西方商业贷款低一半。

卢布还将“黑手”直接插到了美国的后院——中南美洲。当阿根廷迫切需要 1500 万桶石油，而又囊中羞涩没有美元向美国采购时，又是苏联扮演了扶危救困的白马王子，它不仅答应出售石油给阿根廷，而且还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没有美元？不要紧，苏联接受原材料支付，而阿根廷正愁原材料卖不动呢。苏联简直成了阿根廷的大救星。

紧接着，在巴西再度上演了一出大戏：大选前，巴西首要出口商品咖啡突然滞销，库存大量积压，外汇收支急剧恶化。咖啡对于巴西，正如铜对于智利，羊毛对于乌拉圭的意义一样。而这些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都掌握在美国手中，如果中南美洲哪个国家的总统不听话，美国只需通过经济手段，就足以使该国经济急剧恶化，在大选中败下阵来。苏联通过用石油换巴西的咖啡、可可、棉花和原材料，一举扭转了巴西的经济困境。而此时巴西甚至尚未与苏联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自此以后，

而降低马克利率去帮助英国。

历史好像就是按照他的设想发展的。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不到一年时间，几个欧洲国家已很难协调行动。1992年西欧遭受了金融危机。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经济出现衰退。英国企图降低其利率，然而德国因国内通货膨胀问题不愿意降低利率，他们深惧通货膨胀会再次出现在德国，他们至今对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记忆犹新，正是那场通货膨胀导致德国的经济走向崩溃。如果德国不降低利率，其他欧洲国家也不会降低。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梅杰首相并没有足够的魄力和能力来解决这一复杂的经济问题，1992年夏季过后，英国政府只是表示要坚持在这次风暴中求得生存，不让英镑贬值，不脱离汇兑机制。

索罗斯认为，英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保持汇兑机制，英国政府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利率，但这将削弱英镑，并迫使英国退出货币汇率机制。同时，在伦敦金融领域内，投机商们正在投机英镑，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已开始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英国政府最不愿看到的情景出现了，1992年7月，德国国内利率不降反升，贴现率升为8.75%，如此高的利息率立即引起外汇市场出现抛售其他货币而抢购马克的风暴。这一行动再一次把英镑推向了贬值的风口浪尖之上。蛰伏了三年的索罗斯也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实践他理论的最高境界了，他建立了100亿美元的仓位卖空英镑，于是一场个人与一国央行之间的世纪豪赌拉开了序幕。

1992年9月10日下午一开盘，索罗斯率先攻城，大量抛售英镑买入马克和美元，并把外汇期货市场的空单一扫而光。他的操作手法非常复杂，简单说来就是：从银行借贷大量英镑，拿到外汇市场上去卖掉，换成德国马克和美元，巨大的卖出压力将迫使英镑贬值。如果计划成功，就可以用比卖出的时候便宜得多的价格再买回英镑，还给银行。“高价卖出，低价买进”之间的差额就是索罗斯的利润。

如果只是索罗斯一个人与英国较量，英国政府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但索罗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抛售英镑的行为，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跟风卖盘——全世界的外汇投机者都开始一拥而上疯狂卖出英镑。汹涌的卖空单把英镑汇率一直往下打压。由于德国抛弃英国的消息已经传开，空单的买者寥寥无几，所以大部分游资看到在外汇期货已经没多少利润就转到外汇市场，他们疯狂地抛售英镑买入美元等强势货币。英国政府面对攻城者的猛烈攻势只能硬着头皮防守，不断地买入英镑。收盘时，在英国政府的干预下英镑对马克的汇率稳定在1：2.88的水平上，比当天最高点下跌了1.7个点。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只是第一轮进攻，更强烈的攻势还在后面，而英国政府明知道这是个陷阱却不得不往里面跳，不然会造成英镑汇率的

崩溃，这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9月11日，外汇期货市场上英镑对美元只有空盘；而在外汇市场上，更多的机构和资金参与到英镑的狙击中，他们不断地卖出英镑，买入美元和马克，英镑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

在英国政府的苦苦支撑下，英镑对马克汇率跌了5个点。经过几轮的防守，英国政府的护盘资金也消耗殆尽，伦敦如何抵挡国际投机商们潮水般的进攻？英镑的末日眼看就要到来。不出世人所料，9月15日一开盘，英国政府已无力再救市，英镑再也支持不住，开始崩溃。

英镑危机可以说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由于体制运行中出现的机制及政治因素，使得本来运行良好的汇率机制出现了裂缝，于是被国际游资大炒了一把。研究英镑危机不得不涉及到整个欧洲。

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是欧洲统一货币进程中遭遇到的最大挫折，英国受到的打击最大，索罗斯赚到的钱等于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拿走了12.5英镑。至今，英格兰银行也无法原谅索罗斯对其的狙击行为。但是在一般英国公众眼里，索罗斯却是一位伟大的英雄，英国公众以传统的英国方式说，“保佑他，如果他从我们愚蠢的政府手中获得10亿美元，他就是一个亿万富翁了”，就连《经济学家》杂志也将其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亚洲货币绞杀战：中国未来的寓言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银行家们环顾四海之内，只有蒸蒸日上的东南亚地区的“亚洲经济模式”越来越不顺眼。1994年12月，格鲁曼的大作《亚洲奇迹的迷思》一文发表，文章预言亚洲经济必然会撞上高墙。从格鲁曼文章的效果来看，其作用相当于亚洲货币绞杀战的信号弹。

国际银行家的目标首先锁定在泰国身上。1994年以来，在日元贬值的挤压下，泰国出口已显疲弱，而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又被强势美元拖到了极为空虚的程度，危机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时，大量外来的热钱持续涌入，不断推高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与此同时，泰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有380亿美元之多，但其外债总额更高达1060亿美元，从1996年起，泰国净流出的资金相当于其GDP的8%。为对付通货膨胀，泰国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这一措施，更使深陷债务的泰国的处境雪上加霜。

泰国只有一条出路了，那就是主动迅速地让泰铢贬值。国际银行家们估算，其损失主要在于美元债务变得更加昂贵，外汇储备会减少100亿美元左右，但这种损

失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对其果断应对的肯定而得到迅速恢复。但是金融黑客们断定泰国政府必会拼死一战，力保泰铢，绝不会束手就擒。后来情况的发展果然证明了金融黑客的判断非常准确。但泰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死拼阵地战，战略意图完全暴露，战术缺乏灵活性和突然性，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

金融黑客在对付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战役中，主要打击方向是其货币本身，通过本币远期合约和股指期货形成钳形攻势，在6个月的时间里横扫东南亚地区和韩国。东亚金融危机同时也给中国的出口行业造成较大打击，1997年，中国的年出口增长率高达23%，但受危机的影响，1998年这一比率下降为7.2%。然而，东亚金融危机并没有阻碍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东亚金融危机后的10年，中国经济维持了9%的高增长率。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

金融危机促使中国政府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中国政府分别在2003年和2005年，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2005年7月，中国政府还实现了汇率体制改革。东亚金融危机为中国带来许多启示。不管是东亚金融危机根源模式本身，还是那些受到危机冲击的东亚经济体系争取经济复苏的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

如上所说，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小。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后的10年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实力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此外，中国政府还对其金融部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减少了金融部门的脆弱性。但是，中国是否会爆发金融危机呢？

事实证明，中国当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小。这主要得益于中国雄厚的财政力量和强有力的对外部门。从将近20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取得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预算赤字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始终在保持较低水平。除了在东亚金融危机及其之后的数年间，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了15%，其他各年这一比重都维持在10%以下。尤其是近几年，财政赤字所占的比重更有加速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中国的财力正日趋雄厚。

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间，中国几乎每年都能保持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许多境外“热钱”涌入国内，致使货币当局的外债逐步攀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从2000年开始，短期外债持续增加，并在2005年超过长期外债；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以更大的幅度增长。中国其实并不需要借外债。短期外债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许多中国企业预期人民币会升值，因此，从国外借短期外汇，再通过各种途径把其调回中国变为人民币，等待

升值。相比于其既有的外汇资产，这些外债尚不足以对中国整体经济和金融造成致命性的伤害，也不足以引发金融危机。但大量投机性“热钱”的涌入和短期外债的增长，增加了中国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不符合中国的整体利益。

但是，不论是良好的财政状况还是较好的对外部门状况都只能延缓危机的发生，中国金融体系仍然潜藏着爆发金融危机的隐患。这些问题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迟缓、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例较高、企业对银行的依赖性过高等。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从长远来看，中国还是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的。

(1) 银行信贷的隐患。自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以尼古拉斯·拉迪为代表的一批国外学者认为，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发生国内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

根据拉迪估计，在 2000 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高达 25%，大大超过 15% 的国际警戒水平。而且，这些资产的质量还在不断恶化，其程度已经大大高于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前的泰国和韩国的水平。同时，大多数信托投资公司和许多国企持有大量未对冲的外币债务，导致中国也可能面临债务危机。

然而，尽管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严重、企业又持有不少未对冲的外债，但中国银行业的信贷比例持续高速攀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 M2 与 GDP 比率较高的国家之一。虽然 M2 本身远不是不良贷款，但是 M2 的主体是储蓄存款，而储蓄存款所对应的是贷款和其他银行资产。于是，较高的 M2 与 GDP 的比率代表着较高的储蓄存款，从而预示着可能存在着较高的不良资产比率，至少意味着巨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得以出现的空间。因此，这一现象足以引起忧患意识。

(2) 金融监管的隐患。美国次贷危机表明，金融监管不力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金融监管应当与时俱进、顺应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虽然中国已经建立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但这种方式已逐渐难以适应迅速发展变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格局。一方面，1999 年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通过意味着混业经营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跨部门的金融创新产品往往会面临监管冲突和矛盾。这不仅不利于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也不利于经营类似产品的不同机构展开竞争，还可能会引发市场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影响金融稳定。为了避免产生这些弊端，在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有必要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央银行、财政部门的协调机制。

因此，尽管中国强大的财政实力和平衡外贸结构为中国抵御金融风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相信只要以东亚金融危机为前车之鉴，制定和落实正确的改革措施，中国必定有能力将爆发或感染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性的高速增长。

狙击欧洲货币的“危机弧形带”

从1992年9月15日到16日，欧洲各国央行注入上百亿英镑的资金支持英镑，但也无济于事。16日英镑与马克的比价又由前一天的1英镑等于2.78马克跌至1英镑等于2.64马克，英镑与美元的比价也跌到1英镑等于1.738美元的最低水平。在一切机关用尽之后，9月16日晚上，英国财政大臣拉蒙特宣布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并降低利息率3个百分点，17日上午又把利率降低2个百分点，恢复到原来10%的水平。

当金融风暴蔓延时，德国政府出于维持欧洲货币体系的运行而作出细微的让步，于9月14日正式宣布贴现率降低半个百分点，由8.75%降到8.25%，这是德国五年来的第一次降息。德国的这一举动受到美英法的高度赞赏，但为时过晚，一场更大的风暴在英国的外汇市场上刮起。

就在德国宣布降息的第二天，英镑汇率一路下跌，英镑与马克的比价冲破了三道防线达到1英镑等于2.78马克。英镑的狂跌使英国政府乱了阵脚，于16日清晨宣布提高银行利率2个百分点，几小时后又宣布提高3个百分点，把利率由10%提高到15%。一天两次提高利率在英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做出这种反常之举的目的是要吸引国外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对英镑的需求以稳定英镑的汇率。但是，市场的变化是微妙的，一旦信心动摇，大势已成，汇率变动趋势就难以遏阻了。

意大利里拉在13日贬值之后，仅隔了3天又一次在外汇市场上处于危机，马克对里拉的比价再次超过了重新调整后的汇率下浮的界限，意政府为了挽救里拉下跌花了价值为40万亿里拉的外汇储备终未奏效，只好宣布里拉退出欧洲货币体系，让其自由浮动。

欧共体财政官员召开了长达六小时的紧急会议后宣布同意英意两国暂时脱离欧洲货币体系，西班牙比塞塔贬值5%。从1987年1月到1992年9月，五年多时间内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只进行一次调整，而在1992年9月13日至16日，三天之内就进行了二次调整，可见这次欧洲货币危机的严重性。

在芬兰马克被迫与德国马克脱钩的情况下，还意识不到维持欧洲货币体系运行机制的迫切性，甚至公然宣布其绝不会降低利息率。等到外汇市场风暴骤起，才宣布将其贴现率降低半个百分点，但这只能给外汇市场上的投机者以这样的预期，即他们认为德国过去提高利率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现在降低利率仅仅是对通货膨胀的让步。

直到1992年9月20日，法国公民投票通过了其中心思想是把在文化政治上仍有

很大差别的国家建立成一个近似欧洲合众国的政治实体，其成员国不仅要使用同一种货币，而且还得奉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马斯特赫条约》，才使欧洲货币风暴暂时平息下来，英镑、里拉趋向贬值后的均衡的状态。

这场危机的过错不能全部归罪于德国，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尽管各国间各种经济矛盾日益加剧，但任何国家都不能一意孤行，各国只能在合作与协调中才能求得稳定的发展。世界正在朝着国际合作与政策协调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现在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所谓政策协调就是要对某些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共同的调整，对相互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进行联合的干预，以达到互助互利的目的。这主要是由于各国经济政策的 spill-over-effect(溢出效应)，即一国所采取的政策往往会影响其它国家的经济运行。由此，各国采取协调的经济政策就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各行其是，往往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这场货币危机给世人留下不少深刻的教训，仅就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稳定而言，也有重要的启示，这就是要加强国际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和配合。西欧金融九月风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共体主要工业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不协调。

第二波风暴：东南亚再掀飓风

泰国一银行行长差旺说：“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瞧着索罗斯这流氓强盗剥夺我们曾经拥有的财富，我们只想说，你不就是要钱吗？”

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也只能傻看着自己 50%甚至更多的财产无影无踪而去，据估计，从 1997 年 3 月到 9 月，马来西亚排名前 12 位的富翁，仅在股票市场就损失了 130 亿美元。曼谷人甚至还没来得及享受荣华，汽车刚下生产线，房子新刷的油漆还没有干，但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印尼音乐家邦尼勒古马赫为买一幢梦中花园而奋斗了 30 年，正准备迁入时，风暴来了，“我不得不退掉它。”他说。对所有的东南亚人来说，他们过去曾拥有的一大笔财富瞬间化为乌有。

1997 年亚洲货币危机起源于泰国，但是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都具备了危机爆发的充足条件。1984 年 11 月，泰国在外汇平准基金的协助下建立了固定汇率制度。泰国银行对这种制度的描述如下：

在 1984 年 11 月 2 日，泰铢对美元汇率每天是由外汇平准基金决定的，从上午 8：30 到中午，在预先宣布的汇率上，准备同商业银行进行买进和卖出美元。在 1984 年 11 月 5 日，为了减少贸易赤字，泰铢相对美元贬值了 15%。

泰铢盯住由美元、日元和德国马克组成的一篮子货币。尽管泰国银行从没有公

布一篮子货币的具体构成情况，但根据自 1997 年 2 月以来的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显示，其中美元占 84%；日元占 9%；德国马克占 7%。

1996 年 12 月泰国银行开始面临泰铢贬值的压力。据泰国银行事后描述，那一时期“基本面开始恶化，金融部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到处散布着泰铢将要贬值的谣言”。

随后大量资本流出泰国，泰国为说服投资者返回泰国，承诺大幅降低预算。泰国银行认为泰铢危机可以追溯到 1997 年 2 月，当时的经济数据显示泰国的出口大幅下降。对此，泰国银行又一次通过大力干预外汇市场，支持泰铢稳定了形势。

1997 年 5 月份，财政部长林日光宣布泰国无法维持平衡预算，因此将不能履行先前的承诺。市场很难接受这一消息。泰国银行立即面临投资者对泰铢和股票的疯狂抛售。

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面对投机商气势汹汹的进攻，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三管齐下，企图捍卫泰铢阵地，它们动用了 120 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大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铢的地位暂时性保住了。

对此，国际货币投机商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他们的招数只有一个：筹集资金，狠抛泰铢。索罗斯开始节节挺进。与此同时，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泰政府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帅印，泰政府此举，犹如在波涛汹涌的湖面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菲律宾成了受害者，比索汇率开始大幅起落。

同年 6 月份，投机商开始出售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一击。泰央行奋起还击。其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各种弊端一一暴露出来。为了稳定军心，6 月 30 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发誓归发誓，偏偏其金融市场像个扶不起的阿斗。此时的泰国央行已弹尽粮绝，仅有的 3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早已花光。就在泰总理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 13 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 20%，7 月 29 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 月 5 日，泰央行决定关闭 42 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已纷纷放弃了捍卫行动，开始屈服，一副任打不还手的样子。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沉沉浮浮，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投机商更是有恃无恐，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横行一时。

自 1997 年 7 月起,爆发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 年 7 月至 1998 年 1 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 30% ~ 5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 70% 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 30% ~ 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 1000 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之长,危害之大,波及面之广,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

这次袭击让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获利 30 亿美元,但他给亚洲国家造成的损失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数目。在 1997 年 7 月 26 日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索罗斯暗中操纵货币投机活动,从而使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破坏这些国家的货币稳定,摧毁东南亚国家努力了三四十年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并呼吁将这种通过恶意摧毁一国经济来牟取暴利的行为定为一种国际罪行。

然而,危机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从外部原因看,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据统计,危机期间,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 400 亿美元。但是,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近 20 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暴露出日益严重的问题。

正如索罗斯的看法,他并不能摧毁一国经济,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才有机会乘虚而入。所以真正应该为亚洲金融危机负责的并不是像他这样的投机者,而恰恰是亚洲各国的领导人。

日元国际化,有利也有弊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异军突起,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八条款国,从而开始了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之路。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离不开本国经济实力的支撑。在 1998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前,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加速,为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进入 80 年代,日本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日元国际化也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从日元的可自由兑换,到开放资本项

目。1980年12月，日本大藏省颁布了新的《外汇法》，实现了日元的可自由兑换。紧接其后，日本加速了金融自由化改革。1984年对外汇交易的两个规则作了修订，其中包括了外币期货交易中的“实际需求原则”。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外汇期货交易，而不受任何实体贸易的限制。第二个是“外币换为日元原则”。企业可以自由将外币换成日元，也可以将在欧洲日元市场上筹集的资本全部带回日本。此后，日本政府又在东京创设离岸金融市场，开放境外金融市场这些改革举措为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自由流通创造了条件，有力推动了日元的国际化。

就对日本本国经济的影响来看，日元国际化后，作为一种世界流通的货币，对本国经济有着双重的影响，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

首先，日元国际化有助于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使日本在国际商业、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舞台上能够自由活动，加强其经济活动的主动性和经济安全保障。

其次，日元国际化促进了日本金融业的发展。由于日元国际化的迅速推进，日本国内日元市场不断扩大，外国金融机构纷纷涌入，这使日本从提供银行服务或其他金融服务中取得利益。

日元国际化不仅仅对日本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很多方面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元的国际化，境内利率逐步与国际市场上的利率挂钩，随着汇率的波动，外国人手中持有的日元会迅速转换成其他货币，大量的资金会在日本外汇市场上兴风作浪，尤其在日元面临外在压力不得已升值的情况下，不少外国投资者会进一步增加对日本房地产业的投资，以图在日元升值时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日元国际化会加剧外汇市场的动荡，干扰货币当局有关政策的顺利实施。

其次，日元迅速国际化，境外日元急剧增加，对日元币值的稳定也会产生不利影响。20世纪末，欧洲货币市场有相当600多亿美元的境外日元，加上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日元，日本的境外日元已超过1000亿美元。这是一条巨大的资金游龙，如果日元的国际地位提得过高，日元很可能重蹈美元的覆辙：过多的日元流向国外，一遇风吹草动，难免发生抛售日元现象，甚至酿成日元危机；另一方面，若日元汇价波动频繁，则可能影响国内价格的稳定。

再次，日元成为世界流通的货币后，对世界经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所谓“有利也有弊”，日元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分为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第一，有利影响：

首先，日元国际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1999年创立的欧元以将近10年的实践显示出它具有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同样，日元的国际化亦将有助于国际

货币秩序的稳定。因为日元的国际化要求日元汇价保持基本稳定，这有助于使国际金融领域向有序化状态发展。随着日元国际化的迅速推进，将提供更多的国际流动资金，以弥补国际储备货币的不足，起到润滑世界经济的作用，使国际货币关系向多中心方向发展，以适应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多样化、集团化、区域化的需要。

其次，有利于在亚太地区形成“日元经济圈”。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它们对资金的需求会日益扩大，日本则处于提供这种资金的最佳位置。尤其是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设立，使亚太地区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和外国企业闲置资金都有可能被吸引到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东京离岸市场将如同一个不停工作的心脏，日元、美元、欧洲货币单位将像血液一样由这个心脏不断地进出，最终导致“日元经济圈”的形成。

再次，日元的国际化将促进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的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国际储备的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日本的短期资金市场及债券市场都有了很大发展。目前，日元已经以它较高的国际信誉和较稳定的币值受到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机构的青睐，它将被越来越广泛地用于国际经济活动中，这不仅会大大促进亚太地区之间的国际分工、相互投资和国际贸易，而且有利于整个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扩大。日元在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也大大增加，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增强了国际储备分散化和多元化的趋势，有利于国际利率和汇率的一体化和均衡化。

第二，不利影响：

日元国际化将会引起美元、欧元和日元三个货币中心之间新的角逐，使目前美国、西欧、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向金融领域转化和深化，从而增大了发达国家间货币政策协调的难度。同时日元国际化将使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在国际金融方面加深了对日本的依赖性。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欧元的诞生给日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大大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实力，日本转而追寻以区域金融合作为基础的日元国际化新战略。

尽管日元的国际化已经推行了30年，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日元并没有能够实现其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交易货币的国际化功能。这一点从日元与美元、欧元的数据对比上就可以看出。随着欧元的兴起、日本经济的急速滑坡，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在进入2000年后不进则退。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日元不仅与美元，即使与欧元也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在日本经济地位下滑的背景之下，日元的国际化之路还有很长的距离。

狙击中国：汇率大战，中国为哪般

华尔街搞货币战争的手法是比较强硬的。如果某国家不从，华尔街就会用武力相威胁，如当初华尔街拿苏联恐吓西德和日本，如今又拿中国恐吓东南亚。对于一些“乖”国家，华尔街就会用一些政治理念和一些利益诱惑来使它就范，对待俄罗斯，华尔街喜欢讲“市场经济”和“普世价值”，并加以经济上的援助、加入G8等进行诱惑。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出面，组织西方国家来对它进行休克疗法的“治疗”，同样地，对于东亚国家，最后也会面临这样的“治疗”。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可谓是软硬兼施，因为中国的独特经济地位，与美国的一些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欧元区出现了很多破绽，于是华尔街还是决定先解决欧洲。因为中国的干预，华尔街没能一次性解决欧元，于是在一段时间的周详准备后，美国开始转攻中国。但是在与中国的对决中，却发现中国不但很难对付，而且解决整个东亚连同印度的时机也还不成熟。即使是最激烈的朝鲜局势也不能把中国拴住。

精明的华尔街早就发现，最阻碍中国援救欧洲的反倒是中国内部问题：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单靠外资，还是不能把物价炒得这么高。而且纯外资炒作很危险，容易被中国查处，也容易被地头蛇暗算。因此华尔街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将其手法进行了一些改变。但威胁利诱仍不在话下，要么人民币升值，要么就进行贸易制裁，然而在对外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深知美国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人民币的升值会使得外商的投资成本增加，也有可能使得我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人民币的升值还会使得对外投资成本降低，并且使得出口面临困境，使得国内的工作机会外流，从而导致本国的产业空洞化。

华尔街狙击完欧元后，使得很多资金流向东亚，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那就会有大量热钱进入中国市场，从而达到吹大泡沫的作用。华尔街经过多年努力，在中国培养了不少思想上亲美的群体，经济上也培养了一些买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政策。但这些人在中国并不占主流，还不足以让政府制定有利于华尔街抢掠的政策。

其实，美国人清楚人民币升值后对美国来说逆差还是会存在，因为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需要大量的进口，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在美国，劳动密集型工业所产生的就业机会也只能提供给偷渡客，这种高强度、低工资的工作美

国公民是不屑去做的。

我们回头看看过去几次美国对别国货币升值的问题，别国的货币升值从来没让美国的贸易逆差减少过，也没有让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增加。在货币升值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国会都是给华尔街打工的，在义务地帮老板赚钱。每次逼迫别国货币升值，美国老百姓都没赚到什么好处，倒是华尔街赚了大钱。但是，美国政府也是能够得到一定的好处的，例如，如果这次华尔街赚了钱，它也肯定会想办法帮助奥巴马推行他庞大的经济复苏计划。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人民币升值早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否则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近几年，在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很多都不是我们出口赚的钱，而是国际游资。它们都是看到了人民币的升值前景，因此大量涌入中国兑换人民币。人民银行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被大幅推高，只好自己把这些外汇买了下来。这些外商换了人民币后再存到商业银行里去。商业银行增加这么多存款，就扩大贷款规模。这样就形成了乘数效应。后来，这样的钱越来越多，国内通货膨胀也越来越严重。因为这些购买外汇的钱等于是增发的人民币，如果人民币一直不升值，那么外汇增加多少，人民币就要增发多少。如果中国允许推高物价特别是房价，从而用通货膨胀的方式使人民币贬值，就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到了最后，央行被迫放弃跟美元的联系汇率，人民币开始升值了。2005年7月21日，中国央行宣布从即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的汇率不再只盯住美元，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人民币升值会使得外币相对贬值，从而使得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的价值减少，目前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在2万亿美元之上，且其中以美元国债居多，外汇储备贬值的损失就更为严重。同时，本币的升值也会吸引外资的流入，使得外汇储备增加。

面对人民币的缓慢升值，美国实在有点等不及了，恨不得人民币马上大幅升值。事实上，美国有些议员非要逼人民币立刻升值20%不可，除了为了中期选举外，还有就是华尔街的部分热钱一直在赌人民币升值。而这些热钱是有借贷成本的，每一天的利息都不少，自然等不起。中国这样做，肯定让这些投机客很恼火。中国并不愿让这些热钱大赚便宜，于是总是搞些假动作，等热钱外流后再升值。

如果目前这种快进快出赌人民币升值的大多是小基金和小公司，那还不至于让美国国会这么兴师动众的。关键在于现在背后的强大庄家是整个华尔街。欧元战争还没打完，就要对付亚洲。东亚的经济龙头是中国，如果人民币一直稳着，其他亚洲国家就觉得有盼头。只有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吹大资产泡沫后再一下子打下

去，这样才能让其他亚洲国家恐慌和绝望，这样华尔街的钱才好顺利地退出东亚。

还有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如西方国家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因素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竞争的无形之手。国外鼓噪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人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

地位提升：人民币如何走向世界

2008年12月，中国在与韩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的基础上，决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地区的货物贸易实行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1月又与香港、马来西亚，3月与白俄罗斯分别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所有这些举措，都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关注。虽然从金融学上看，人民币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并非完全一码事，但中国与白俄罗斯的货币互换实质上已经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版图从亚洲扩张到了东欧。

那么，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呢？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目前，人民币已在境外流通，但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说穿了，就是人民币可以在国际上自由兑换、交易、流通，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结算、储备货币。

从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以后，该国货币必然要走向国际化。究其原因在于，货币国际化能够带来诸多好处，如节约外汇储备、增加铸币税收入、优化外债规模和结构、扩大贸易和投资，等等。

其中最直接、最大的好处是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所谓铸币税，是指纸币发行面额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就可以通过发行人民币这种国际货币“从别国征收铸币税”。要知道，这种收益可是没有成本的。

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也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已被许多国家所接受，事实上，人民币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已经成为硬通货。近几年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情况及使用范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国家。人民币的流通使用主要是伴随旅游业的兴起而得到发展的。中国每年都有大批旅游者到这些国家观光旅游，因而在这些国家可以用人民币购买商品的购物店越来越多，可以用人民币兑换本国货币的兑换店和银行也开始出现。在韩国比较知名的购物商场、酒店、宾馆等每日都公布人民币与本地货币、本地货币与美元的比价。人民币同本地货币和美元一样，可以用于支付和结算。在韩国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办理人民币与韩币、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业务，也可以随时用人民币兑换欧元、日元、英镑等所有的硬通货。尤其在去年12月29日，中国银联宣布，从2005年1月10日起正式开通“银联卡”在韩国、泰国、新加坡的受理业务，使持卡人在韩国、泰国和新加坡可以使用“银联卡”进行购物消费，也可以在这些国家的取款机上支取一定限额的本国货币。从2005年12月开始又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和卢森堡五国率先开通了“中国银联卡”ATM受理业务。这一切，都表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而且使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得到进一步推进。

第二种，在中越、中俄、中朝、中缅、中老等边境地区。人民币的流通使用主要是伴随着边境贸易、边民互市贸易、民间贸易和边境旅游业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的。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支付货币已经在这些国家中大量使用，并能够同这些国家的货币自由兑换，在一定程度上说，人民币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区域性货币。在朝鲜罗津—先峰自由经济贸易区的集市贸易市场上，当地的摊主们无论是销售中国的商品还是朝鲜的地方产品，大都习惯于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人民币在朝鲜几乎所有的边境城市甚至在全境，已经成为人们结算货款、进行商品交易、当作硬通货储备的货币之一。在越南、俄罗斯、朝鲜、缅甸等国家，大多与旅游有关的行业、部门以及商品零售业均受理人民币，并且逐日公布人民币与本国货币的比价。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经贸往来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人民币区域化的范围也必将进一步扩大，区域性货币的地位也将日益巩固，进而推进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第三种，在中国的香港和澳门地区。由于内地和港澳地区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每年相互探亲 and 旅游人数日益增多，人民币的兑换和使用相当普遍。资料显示，目前在香港已有100多家货币兑换店和近20家银行开办了人民币兑换业务。很多宾馆、购物商场尤其是游人的购物点都报出人民币与港币的汇率并直接受理人民币。由于港币可以随时兑换成美元，实际上人民币也可以随时通过港币这个中介兑换成美元。据专家估算，目前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币已达700多亿元，成为仅次于港币的流通货币。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研究人员调查统计，人民币每年跨境的流量大约有 1000 亿元，在境外的存量大约是 200 亿元。中国人民币供给量约为 20000 亿元，这意味着境外人民币大约是人民币总量的 1%。由此可见，人民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广泛接受，人民币国际化处于渐进发展的阶段。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既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又可以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货币国际化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不确定因素。如何在推进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其对中国经济的有利影响的同时，将不利因素降至最低是我国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的事情。

一方面，我国经济实力还不够强、人民币国际流通量不足。一般认为，一国货币要成为世界性货币，其经济总量至少应该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 8%，而我国 2008 年年末这一比例还只有 6.85% 左右。人民币国际流通量不足，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还很小很小。另一方面，增加了宏观调控、现金管理的难度。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后，作为一种国际货币，人民币对我国利率、汇率、物价水平的影响作用会大大增加，大规模的货币需求可能会使得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陷于被动状态。更不用说，国际化后的人民币还必须承担稳定国际金融的任务，当类似于这次全球金融海啸来临时，必须挺身而出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

美联储“量化宽松”惹怒了全世界

据某媒体报道：G20 首尔峰会召开前夕，不少成员国官员对美国实行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表示不满，担心这一措施会阻碍全球经济复苏。但美联储还是宣布了新一轮量化宽松方案：将在 2011 年第二季度前购进 6000 亿美元的国债以提振经济。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是“靠人为压低汇率来刺激出口”，这一政策是“短视的，最终会损害各方利益”。

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日前严词斥责美国行事虚伪。他说，美国一方面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另一方面又通过印钞来压低美元汇率，这难以自圆其说。他表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注资的行为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且有损美国信誉。

俄财政部副部长德米特里·潘金表示，美联储采取的最新货币措施是危险的。他说：“美联储的行为可能导致形成新的金融泡沫，并使汇率失衡。这种措施的受害者不是美国，而是新兴经济体。”

量化宽松是一种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提高货币供应，可视为“无中生有”创造出指定金额的货币，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其操作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证券等，使银行在央行开设的结算户口内的资金增加，为银行体系注入新的流通性。

2010年11月10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声明，在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首月投放1050亿美元资金，购买财政部债券。声明写道，美联储定于11月12日至12月9日着手18次公开市场操作。至明年6月，除按原计划购买6000亿美元财政部债券外，美联储预计将从住房抵押贷款关联证券和机构证券投资中抽出2500亿至3000亿美元收益，再投资于财政部债券。

首月公开市场操作既包括市场先前预期的月均750亿美元财政部债券购买额度，也包括用投资收益购买的300亿美元债券。美国疯狂的印钞票的行为，使得各个国家持有的美国国债越来越多，而美元就会越来越不值钱了，美元贬值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美元正走贬值路线，美国“正执行弱势货币政策”。多国政要和财政官员指出，美联储重启印钞机旨在打压美元汇率、促进出口，同时将驱使热钱涌入新兴市场，这将使新型国家的经济遭受损失和打击。

当美联储2010年11月初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时，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惹怒了世界上多数国家。

自2010年4月份美国的经济数据开始令人失望，进入步履蹒跚的复苏以来，美联储一直受压于需要推出另一次的量化宽松：第二次QE2（量化宽松）。伯南克在今年八月份在杰克逊霍尔的联储官员聚会中为第二次量化宽松打开了大门。但他同时谨慎地指出，量化宽松不是一个成熟的补救办法。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量化宽松政策。费城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查尔斯·普洛瑟以及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托马斯·洪尼格今年就一直与伯南克存在异议，他们表现出了对量化宽松的强烈质疑。不过伯南克一直在试图获得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上次闭门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声明又将第二次量化宽松的大门打开了一点，声明指出美联储认为通货膨胀率低于目标水平，与美联储保持高就业率的任务不一致。随着疲弱的经济数据继续被公布出来，美联储将进行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明显。

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导致美元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热钱加速流入新兴经济体，加剧流动性过剩，助推资产泡沫，对其他经济体和世界金融体系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受欧市开盘后欧元/美元一波强势的推动，英镑/美元一举攻破1.6000关口并

触及6周高位，但汇价在攻破大关后的表现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强势。分析人士指出，在欧盟峰会结果出炉之前，多数投资者依然保持忌惮之心。10月25日纽约时段午盘，英镑/美元基本处于1.6000关口上方窄幅波动，早盘一度触及1.6040水平的6周高点。

BOE（英国央行）行长金恩表示，如果英国MPC（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未决定启动新一轮资产购买计划，那么英国的企业及家庭贷款下滑的情况将更为糟糕。他称：“我们采取量化宽松措施是因为我们认为存在通胀低于目标水平的实际风险。”金恩同时表示，相信英国央行可以利用量化宽松计划买入的英债到期后收入再买入新债，这取决于货币政策委员会。分析人士指出，为推动经济摆脱低迷的状态，英国央行在10月会议上宣布扩大量化宽松规模。如果经济表现继续不及预期，英国央行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购债规模，这将给英镑带来下行压力。

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香港地区的经济也造成了较为明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导致资本大量流入并可能引发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使香港的房价、股价都屡创新高。受制于香港特殊的货币局制度，美国的量化宽松可以说就是香港的量化宽松，香港监管部门只能采用宏观审慎措施为房地产市场降温，具体措施包括提高首付比例和加大开发的土地供给。

同时，量化宽松政策将加大“热钱”的流入，使得政府一直在汇改上坚持的缓慢升值和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双重目标的兼顾难度加大。今年6月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5%，外汇储备在9月底猛增至2.65万亿美元，第三季度累计增加1.94千亿美元，2010年至今，累计增加2.49千亿美元，相信在二次量化宽松之后，外汇储备的增速可能更为迅猛。美国此次量化宽松政策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其直接的影响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通过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加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流动性过多有利于资本市场的走强，增加了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监管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积极化解此次及以后可能再次出现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对我们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保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面对以上影响，针对美国第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各国政府的应对举措主要包括加息和控制资本流动两类。一方面，为应对危机中货币刺激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印度、澳大利亚等各国央行已在美联储采取第二次宽松政策之前就进行了多次加息。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十分担忧资本流入和本币升值，但不断攀升的通胀仍是政策制定者最为担忧的问题。因此，在美联储宣布第二轮政策的当周（11月的第一周），印度、澳大利亚和越南央行不顾热钱流入可能进一步加速的风险，纷纷宣布加息（分别加息25个基点、25个基点和100个基点，达到4.75%、6.25%和

9%)。然而，随着未来第二轮宽松政策的实施，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资本流入和货币升值压力将逐渐加大，可能会使各国短期内放缓加息步伐。另一方面，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宽松货币政策和本币升值已导致大量热钱涌入，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各项措施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来控制外资的流入与流出。

“棒杀”欧元：做空、再做空

据 CFTC（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发布的每周交易员持仓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 20 日当周，市场内作空欧元 / 美元的净头寸总计 186 亿美元，仅较之前一周下降 2%；之前一周欧元空仓超越 2010 年 6 月的峰值，达到 2007 年以来最强。2007 年时欧元 / 美元汇率波动在 1.19 附近。

交易员仍在担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官员尚未拿出长期解决方案，投资者猜测，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欧元下跌的可能性越大。就短线而言，市场人士表示，法国等欧元区评级最高的国家可能会面临主权评级下调，这可能会引发欧元下跌。标准普尔公司本月早些时候已将欧元区 15 个成员国的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则表示，计划于明年第一季度审查欧元区所有成员国评级。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在最近的一份对冲基金观察报告中指出，对于对冲基金而言，做空欧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受欢迎。

大欧洲一直是美国霸权统治世界的巨大威胁。美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多届美国政府的幕僚布热津斯基多次说过：美元是美国全球战略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欧元想抢班夺权，盘踞于美国的大财团们绝不会轻易放弃美元这个抽血的机器。欧元还没有诞生，美国就开始操纵“金融部队”——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始了对欧元的打击。对于美国来说，一个势力均衡的欧洲、不统一的欧洲，才能让美国在欧洲获得最大的利益。欧元一旦建立起来，势必对美元体系的霸权产生严重的动摇作用。伦敦—华尔街轴心与德法同盟之间的货币冲突日趋激烈。

无论做多与做空，美国资本的力量牢牢地控制着世界。国际银行家们的梦想就是如何打垮马克和尚未成型的欧元构想，决不能让新德国重建成功。1990 年，英国政府居然不顾伦敦金融城的反对，悍然加入 ERM（欧洲货币兑换体系），眼看欧元体系逐渐成型，日后必然会成为伦敦—华尔街轴心的重大隐患，国际银行家于是策划各个击破的打法，欲将欧元体系绞杀在摇篮之中。

欧洲从 1992 年决定欧元启动，到 1995 年欧元启动进入关键阶段，当时为了顺利推出欧元，就要把每个国家的公共赤字都降下来，以达到启动欧元的标准，整个

欧盟国家的货币都在紧缩当中。

在 1995 ~ 1997 年间，欧洲货币对美元却是大幅度贬值，如德国马克贬值了 25%，法国法郎贬值了 30%。这背后就是以美国财团为主的做空力量在搞鬼。那些美国大财团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欧元取代了美元，那么整个世界经济食物链就要被改写，他们的统治地位就会消失，这是美国资本所无法容忍的。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资本就开始了欧元有计划地做空。

第一步是英美经济学界对欧元的唱空。虽然英国是欧盟国家，但是英国没有加入欧元，这恐怕跟英国依附于美国有关。这帮英美经济学家就是美国财团控制的舆论武器，你想想，如果大家都看好欧元，那么美国财团为了自身利益做空欧元是那么容易的事吗？所以，通常大庄家——美国财团在操作前，都会事先通过舆论宣传武器进行所谓符合逻辑的宣传攻势，由那些学术权威出面，才能起到引导游资做空欧元，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任何事物都不会完美无缺，他们首先攻击的就是欧元区的软肋——固定汇率制度。对于欧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欧洲人颇为自豪，他们认为欧元的成功还有一层深远的重大意义，就是在浮动汇率似乎逐渐成为世界潮流的时代，欧元反其道而行之，成为支持固定汇率之中流砥柱，亦可能成为未来真正世界货币之先驱。

什么是固定汇率制度呢？比如，1 欧元等于 40.3399 比利时法郎，1 欧元等于 1.95583 德国马克等。这个兑换标准是固定的，这就叫固定汇率。欧盟的固定汇率被英美经济学界视为非常愚蠢的做法，因为英美经济学界认为浮动汇率才是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先生就有著名的“三悖论”：货币政策独立、固定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三者不能同时成立。比如：欧元区如果实行固定汇率，资本账户开放，那么就没有办法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而这也正是导致现在欧元区债务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英美经济学界认定：欧元区如果无法控制各国的独立货币政策，那么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展开舆论宣传攻势的同时，美国财团就开始发动对欧元的做空行动了。1995 ~ 1999 年间，美国互联网蓬勃发展，经济有了新的动力支撑，很多资金看好美国的经济。但欧洲经济被英美经济学家唱空之后，很多资金都对欧元的前景持怀疑的态度，究竟未来欧元是强势还是弱势，大家都不确定，再加上欧洲财政紧缩，机会比较少，在美国财团的带领下资本纷纷撤出欧洲，投向美国的互联网等新兴行业。这就顺理成章地造成欧元的持续贬值。而做空并不意味着一定赔钱，虽然美国股市泡沫四起，但美国财团早就布局，也就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资本撤离，欧元持续贬值，缺乏流动性，真的是雪上加霜。

美国财团使出了最厉害的第三招：战争。1999年1月欧元启动，1999年3月24日北约就发动了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爆发。战争一打起来，欧洲人还当了美国的帮凶，欧元就跟着一直往下掉。

如果欧元长期处于低位，而美元还处于高位，这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很不利，因为欧元、美元不正常的比价，使得美国的出口没法复苏，同时进口大量增加，美国逆差增加，美国国内工商业持续低迷。于是美国财团们在互联网热潮大赚了一笔之后，选择了美元的贬值之路，以发行美元来刺激美国的经济复苏。其实对于美国财团来说，世界仍控制在他们的手中，无论做多与做空，他们用资本的力量牢牢地控制着世界。

华尔街一直在慢慢地卖空欧元，建立空头仓位。三个月的时间，索罗斯们已经吸纳了足够的空头持仓。这其中还利用欧盟可能要救援的消息来做反弹，洗掉了看空的散户。

到了2009年12月，美联储的货币基数增速忽然从11月的4.29%降到了0.19%。于是2009年12月3日，华尔街开始发力往下砸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狙击欧元就这样开始了。

第二次建仓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美联储提前几个月就放出风来，说本·伯南克又要撒钱了，二次量化宽松的规模至少有5000亿美元。经济学家、财政金融官员都在激烈地讨论。

欧元闻讯大涨。到了10月份，欧元又涨不动了，于是华尔街又在建空仓。到11月3日，二次量化宽松的方案公布了，6000亿美元的规模，超过了市场预期。于是欧元突破盘整上冲，很多人跟着就追买进去了。2010年11月5日，对冲基金发威，将欧元砸出一根大阴线来。

最近两次狙击欧元的时机很有特点，都是在年底11、12月发动攻击。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年底投资者套现的欲望比较强，发现形势不好，容易跟风抛售；二是银行年底的回笼资金也会让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抛售。另外，年底开始狙击，可以让这些国家的年终财政数据比较难看，有利于以后几个月的攻击。



热钱战争：保卫财富，共反热钱

“野狼群”来自何方

在弱肉强食、狡诈冷酷的金融市场，只有像狼那样善于伪装、善于“猎捕”，这样才不会被其他的强者猎食。在当今水深火热的国际金融市场，热钱狼群是真正的强者。它们的正式名字叫“对冲基金”，是一种新的投资模式的代名词，起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美国，是基于最新的投资理论和极其复杂的金融市场操作技巧，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品，进行高风险、追求高效益的投资模式。

热钱野狼是怎样产生和出现的呢？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中美洲的加勒比海诞生以来，对冲基金在那个只有阳光、海滩、烧烤的地方享受着美好的日子，过着没有监管者、没有规矩、只有“狼族”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它们的一切行为都不受任何国际机构的任何监管。它们常年隐藏在暗处，其投资操作神秘不定，掠夺显露于明处的目标，几乎每次都是战无不胜。

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乔治·索罗斯，在这个拥有美国籍的犹太货币投资家身上，充分体现了犹太商人的精明和狡猾。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融天才”。从 1969 年建立“量子基金”至今，他创下了一个又一个财富奇迹，平均每年 35% 的综合成长率，让所有的投资专家都望尘莫及。他成为了美国金融界真正的一匹“领头狼”。但是他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前辈的经验和残酷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历练出来的。一场又一场的金融风暴中，使这些投资家练就了严格的行为准则和敏捷的行动力，形成了真正的“热钱野狼群”。

特别需要注意的有两点：（1）热钱是不分国内国际的，前两年风云一时的温州炒房团其实是国内的热钱，它们与国际热钱投机内地楼市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非常相似。如果它们出境投资或者海外避难，就是国际热钱；（2）实业的工商业资本与热

钱是有可能相互转化的，当实业资本将本来用于商业竞争的钱变成投资，那它就成为“热钱”，只不过它没有出境，暂时不算国际热钱。

本书所指“热钱”是那些从国外未经合法依规批准进入中国内地的国际投机资本。而进入中国内地的国际热钱数量和未来可能出逃的国际热钱数量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本地投机资本为了避祸国内金融危机而出逃，那也就成为国际热钱。从这层意义上说，未来出逃的国际热钱是有可能多于进入的国际热钱的。

国际热钱进入内地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其中主要有如下几类：

(1) 伪装成贸易顺差。一般与外贸出口公司合作，伪造并不存在的出口商品，或者夸大出口商品的数量和价格，比如，实际出口了 1000 件西服，却谎称 3000 件，每件单价 20 美元，却上报 100 美元。这样就有超过实际出口额的 14 倍的国际热钱貌似合法地进入内地；另外一种就是在时间上做文章，这批西服刚刚收到订单，按照常规，加工期三个月，海运一个月，出口到美国一个月，5 个月后货款才打过来，但现在订单刚到，货款就打来了。当然，以上手法需要中外双方事前协商好。

(2) 伪装为来自国际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国或地区的居民实体在其本国本地区以外的另一国的企业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这种投资既涉及两个实体之间最初的交易，也涉及二者之间以及不论是联合的还是非联合的国外分支机构之间的所有后续交易。外商直接投资一般有明确的投资项目，并且要被批准。然而，过去几年，中国各地政府对于外商直接投资非常饥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审批很松，而且资金入境后被挪用也很难监管。

(3) PE（私人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它一般采取风险投资基金的方式运作。风险投资基金的法律结构是采取有限合伙的形式，而风险投资公司则作为普通合伙人管理该基金的投资运作，并获得相应报酬等。开放这两种资本项目的本意是让它们帮助中国工商企业升级进步，但很多资金一旦入境，就方向失控。人们经常会诧异于风险投资的大手笔，对一个小网站都能一掷 3000 万美元，其实，双方却可能有为逃避监管而签定的秘密协定——1000 万美元用于网站投资，另外 2000 万美元投资方可以自由使用，被投资的合作方不得干预，那么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呢？去炒楼，炒股了！

(4) 国外亲友的赠款或遗产。由于中国有大量的海外华侨，他们与国内亲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各种汇款和遗产的馈赠的方式，将国际热钱伪装在其中汇入。

(5) 携带交易。这是最直接和原始的方式。雇佣人员随身携带外币或人民币，通过深圳海关等边境关口直接携带出入境。

国际热钱进入内地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花样翻新，千奇百怪。有关人士因此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以现在监管部门的力量，国际热钱是堵不住的，于是更松懈了监管。其实不然，国际热钱固然无孔不入，但是它们有一个巨大的软肋，那就是它们进入内地赚的是利润，但由于它们大多是伪装非法进入，一旦被抓获，监管当局有权罚没其所有收入。即它赚的可能是 20%，但亏的却可能是 100%——血本无归，因此这是一个极大的震慑。

热钱军团的“野狼”们是过去二三百年来残酷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历练出来的精英中的精英，在他们的祖父、父亲和他们自己的一场场血与火的生死大战中，已经形成了极为强大冷酷的神经，极为严格的行为准则和极其敏捷的行动力，并成为狼的基因代代相传。

你不要不服气，因为狼们都是经历这个过程挺过来的，他们在投资者的每一个成长阶段，都有过同样的经验和教训，因而面对每个市场信号和舆论时，他们对散户的每种心理反应和操作行为都了如指掌。所以，现在“羊群”和牧羊人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了解狼性，了解热钱之性，从而群策群力找到对付狼的方法，否则永远只能是狼的猎物。

经济杀手：热钱的真实面孔

有人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今，一千个人口中有一千个对热钱的想法。

某些“权威人士”至今仍不承认存在热钱，他们只承认有“长期投机性资本”，而 2006 ~ 2008 年上半年超常规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源于“合法的外汇流入”。那么，到底什么是热钱呢？

“热钱”源于英文的 Hot Money，又称 Refugee Capital（逃避资本），是充斥在世界上，无特定用途的流动资金。它们是逃避监管，为追求最高报酬及最低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短期、套利和投机。正是靠它，上世纪 90 年代末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一手制造了亚洲金融危机，在短短半年间掀翻了整个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

定义热钱的最关键要素有二：一是为了资本投机（包括汇率、股市、房地产、信贷、大宗商品，等等）获利，不直接参与物质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并以获取商业

赢利为目的；二是出入一国或多国的边境。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参考要素，即未经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合规认定的资本项目流入。这与中国出口企业卖完商品获得外商的购货款，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较长周期的工商业投资构成了根本区别。

海外大量的投机资金会以各种方式向新兴国家或地区输入大量资金，人为制造或做大经济泡沫，在泡沫行将破裂的关键时刻迅速撤资，获取丰厚回报，转嫁危机，影响输入国的经济稳定。热钱主要具有高收益性与风险性、高信息化与敏感性、高流动性与短期性和投资的高虚拟性与投机性等特征。

第一，高收益性与风险性。追求高收益是热钱在全球金融市场运动的最终目的。当然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因而热钱赚取的是高风险利润，它们可能在此市场赚而在彼市场亏、或在此时赚钱而在彼时亏，这也使其具备承担高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第二，高信息化与敏感性。热钱是信息化时代的宠儿，对一国、一地区或世界经济金融现状和趋势，对各个金融市场汇差、利差和各种价格差，对有关国家经济政策等高度敏感，并能迅速做出反映。

第三，高流动性与短期性。基于高信息化与高敏感性，有钱可赚它们便迅速进入，风险加大则瞬间逃离。表现出极大的短期性、甚至超短期性，在一天或一周内迅速进出。

第四，投资的高虚拟性与投机性。说热钱是一种投资资金，主要指它们投资于全球的有价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以便从证券和货币的价格波动中取得利润，即“以钱生钱”，对金融市场有一定的润滑作用。如果金融市场没有热钱这类风险偏好者，风险厌恶者就不可能转移风险。但热钱的投资既不创造就业，也不提供服务，具有极大的虚拟性、投机性和破坏性。

(1) 热钱的流入会对一国经济造成推波助澜的虚假繁荣。热钱的涌入在增加该国货币升值预期的同时，乘机在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其他市场不断寻找套利机会。如最明显的莫过于房地产市场。一些套利资本进入了房地产市场使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心存幻想，伺机炒作，操控楼市房价上涨。

(2) 热钱大量进入，加大外汇占款规模，影响货币政策正常操作，扰乱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2004年全年基础货币投放达到6600多亿元人民币，按照测算大约1000亿美元的热钱流入，因此，仅仅热钱流入就超过了全年的基础货币投放额。这迫使央行在公开市场大量运用央行票据强行冲销，仅2004年央行就发行了近1.5万亿元票据对冲，这大大增加了央行的操作成本，同时也使得我国货币政策主动性不断下降，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增加了通货膨胀的

压力。

(3) 热钱的流出，使经济剧烈波动，如果热钱大规模迅速流出，会使一些投机气氛较大的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如房地产价格迅速回落、债券价格以及股票市场大幅震荡等。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资金短缺，往往希望外汇流入。泰国在1997年前奉行高利率政策，大量热钱涌入泰国，泰铢贬值后，“热钱”迅速逃逸，使泰国的经济崩溃。

热钱在经济过热阶段大量流入；一旦结构性问题明显显露，或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它们会大规模撤离；在经济衰退时很少进入，经济复苏时也姗姗来迟。所以热钱流动会加大经济周期性波动，对流入国的经济过热和泡沫涌动产生推波助澜作用。

最近两年多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全国房地产价格涨幅在百分之十以上，远远超过消费物价指数，尤其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一些大城市，房地产价格接近一倍。即使严厉的宏观调控也没有抑制房价的急剧上涨，因此，不能排除一些套利资本进入了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甄别热钱以及确定热钱的金额大小并非易事，因为热钱的性质并非一成不变，一些长期资本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转化为短期资本，短期资本可以转化为热钱，关键在于经济和金融环境是否会导致资金从投资走向投机，从投机走向逃离。中国现行的固定的汇率制度和美元持续贬值的外部金融环境，造就了热钱进出的套利机会。

英镑贬值：热钱给英国带去的打击

英镑2008年贬值两成，有洞烛先机的投资公司趁势入市，施罗德投资管理在欧洲物色地产投资目标时，英国成为首选市场。现时很多资产管理公司预期，英镑跌势或告一段落。有投资公司透露，资金不断流入英国，包括退休金、保险及其它机构投资者投资者的资金。

英伦银行曾经表示，英国经济复苏时间漫长。事实上，英国失业率创工党自1997年执政以来新高，经济陷入衰退，过去一年镑汇持续贬值，到如今，投资者认为镑汇已经贬值两成，英国物业市场现投资价值，吸引资金流入英国物业市场。施罗德基金经理表示，英镑贬值令英国地产市场有吸引力，相对欧洲大陆，英国地产市场是投资目标。

花旗策略员报告估计，英镑是最被低估的主要货币之一，估计来年英镑兑美元升值18%，兑欧元升值11%。高盛预测英镑兑美元升值23%，兑欧元升值15%。

State Street Global Markets（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表示，资金已经流入英国，截至2009年5月13日为止，来自退休金、保险及其它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大量涌入英国。

热钱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是因为热钱能够破坏政策利率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蜂拥而入的国外资金为的正是将国内银行体系都注入充足的流动性，而银行也必然会通过这些资金来发放贷款。这就意味着，流入到国内的外资越多，银行体系的资金就可能更大程度地流入到错误的投资项目。

英国经济面对英镑的持续贬值，已经变成了汇市投资者心中的头号公敌。而英镑也对各种主要的货币呈现出了全面下跌的局面，但是经过连续多年吸引了热钱的流入，局势突然就发生了很大的逆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英国已经能够避免由于经济繁荣与下滑的周期性产生交替了。

1992年英国为保持欧洲统一汇率机制，高估英镑。然后，国际热钱便趁机大量抛售英镑。同时还买入了德国马克，使得英国几乎耗尽了2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才换来了英镑贬值15%，终于得以退出统一汇率机制，而国际热钱却从中净赚了20亿美元。

1992年2月17日，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欧共体的12国外长以及财长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中规定，由欧盟各国分成三步统一完成货币的工作。然而，在此协议签订以前，英镑就已经被严重高估了。其中有英国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也有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使得英镑必须要和马克等货币造成互相盯住的原因。正因为如此，英镑的回旋余地就显得更小了，而英国政府自然不会通过英镑的主动贬值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去摆脱萧条。就在协议签署以后，英镑和马克的汇率是1：2.95，但由于德国经济过热，使得德国央行不得不调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这给英镑又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此时英镑只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提升英镑利率，然后来稳固英镑在资本市场中的竞争力；另一种就是，在外汇市场上购买大量的英镑，然后来维持英镑汇率的稳定。然而，这两种选择又都是艰辛的。一旦加息只会让英国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进而英国政府也要背上沉重的外债包袱。其他的办法就是说服德国降低马克利率，以减轻英镑的升值压力，但是德国并不愿帮忙，而想要说服欧洲的其他国家，能够暂时容忍英镑的贬值使得英国经济有喘息之机的主意也被欧洲各国拒绝了。

到了1992年9月16日，也就是乔治·索罗斯在伦敦《泰晤士报》采访中所称的“黑色星期一”，危机便在此刻全面爆发了。当天，英格兰银行立刻将短期利率从10%提升到了12%，并宣布第二天再次将利率提升到15%，而所做的一切也

都是为了维持英镑。英国几乎是购买了大量的英镑去抛售马克，以竭尽全力与市场作战。

英镑贬值了，紧接着就完全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而就在1992年9月16日下午，英镑保卫战还是以失败告终，英格兰银行也取消了两次提息。正是因为这场危机迫使英国、意大利以及芬兰都从欧洲汇率机制中退了出去。此后，英镑对马克的汇率便开始不断地下降，到了1993年2月降至2.32。实际上，英国几乎是把它们所有的生涯和运气都押在了趋同交易中的交易者，但是却在那天也都被一举歼灭了。

直到2001年，面对世界经济都进入衰退的阶段，英国的经济却保持了增长。但是，这一次却不是那么幸运。因为央行和财政部都普遍承认，英国已经陷入了衰退，随之而来的就是利率的大幅下调。经济学家表示：“布朗首相靠借款摆脱经济困境的计划会促使投资者抛售英镑。但事实上，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未来的政府借款，而在于过去的热钱流入。”或者也可以说，信贷危机是全球性的，而所有人却都在囤积现会。因此，那些曾经还靠着借钱度日的国家正面临着很大的麻烦。

在面对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英国政府的借款规模也开始越来越大，国际收支也跟着提升。如从理论上讲的话，英镑贬值是必然的。正如英伦银行曾经表示，英国经济复苏的时间是漫长的。而事实上，英国的失业率自从英镑贬值开始就已创新高，同时经济也陷入了衰退。

日本失去十年：热钱对经济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几乎经过了30年的发展。在国际上，不仅低端产品有很强的竞争力，同时，在其他行业因为物有所值也在世界上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随着大量外资潜入到日本，为了可以预见的汇率利润，以及长期单方的预期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带动了大量的热钱进入到日本。其结果是由于热钱的不断进入，只能继续加大货币升值幅度。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最终形成了从热钱进入，到货币升值，再到继续吸引大量热钱的恶性循环。

自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面对国际汇率市场，日元也出现了兑各种主要货币的暴涨。同时，日元兑换美元汇率的形势，更是达到了顶峰的极限，几乎是创出了90.87日元兑1美元的新高。

同时，由于日本有一部分金融机构是陷在美国次贷危机之中的，这就形成了日本央行不得不向市场大规模注资以救市的局面。另外，更重要的是，日本经济已经连续出现了负增长。从技术上来讲，日本已经陷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再加上欧

美以及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滑坡。而国际市场存在萎缩成了严重的现实，以出口经济为主导的日本经济，自然就会遭受到更加寒冷的冬天。更加严重的是，日元的大幅升值，又给出口经济为主导的日本经济以致命的打击。所以，日本经济的发展一度呈现出了更加暗淡的景况。

日元汇率的异常暴涨，正是国际热钱回流日本达到高潮的一个重要标志。日本拥有着全球第二的外汇储备，同时，还有日本金融当局长期实行的零利率或者低利率的货币政策。

热钱逐步进入到日本后，日元开始快速升值。根据当时“广场协议”的相关规定，日元和马克都应该大幅度升值，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这五个发达工业国家都开始大幅度地抛售美元，继而形成了市场投资者一度抛售的狂潮，从而导致了美元的持续贬值。同时，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就快速下跌到了200日元左右，跌幅达到20%。面对此种局面，美国却仍然没有收手的趋势，美国财政的高级首脑仍然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使得美元对日元持续大幅度下跌。

1985 ~ 1987年，短短的3年时间里，美元兑日元的贬值程度就达到50%。甚至有专家认为，“广场协议”的签署，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一个阴谋。一旦，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外汇储备达到了让美国恐慌不安的时候，美国的一贯措施就是，用强权来施加压力。从而迫使这个国家货币不断升值，同时也让自己国家的金融投机机构寻找到适当的机会进入到该国的股市或者楼市等硬通货领域，再疯狂地制造泡沫，并一再抬高粮油期货的价格，以造成粮油等民众基本生活品的通货膨胀。等达到了广大民众的心理承受极限，自然就会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这样高层官员就会出现意见分歧，政局动荡也就出现了。

面对日本经济的基本面，其实并不支持日元的暴涨，却在一定程度上要承受日元暴涨的损害。那么，能够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日元暴涨，就只有是国际热钱的大规模集中并回流到日本后，推升了日元汇率。一旦日元的暴涨不可持续，等热钱全部集中回流完的时候，日元的汇率就会出现大幅度下跌，以同步于日本经济的基本面。

“广场协议”的签订直接给日本带来泡沫式经济的巨大影响。显而易见，自从协议签订实施以后，日本的货币币值就开始不断地上升。根据统计显示，在1993年，1美元兑换111.08日元，1994年是102.18日元。而日元升值趋势大体持续了10年之久，同时，日本所持有的美元资产也随之大幅度地贬值。根据日本机构统计，“广场协议”导致日本对外净资产汇率的损失累计达到了3.5万亿日元。

“广场协议”出现的负面影响连日本的股市都难以幸免。东京证券交易的所有总市值是其GDP的1.3倍，这就形成了全球最大市值的股票交易所。在1990年10月，日经指数便由最高点38915点下跌了20000点。到了1992年8月18日下降到了14309点，也可以说，基本上是回到了1985年的水平。这就出现了股票大跌，房地产也开始大跌的局面。

而房地产泡沫也形成了巨大的堆积。1985年，东京都的商业用地价格指数是120.1。到了1988年就暴涨到了334.2，在此3年间暴涨2倍多，甚至，东京都中央区的地价出现上涨3倍的局面，这就制造了世界上空前绝后的房地产泡沫。

日本政府与美国的压力以及日元升值的因素下，日本出口企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不仅利润大幅下滑，出口企业的产能也开始突然过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其他国内企业利润的下滑。日本政府为了刺激内需，大幅度地降低利率水平，并且还给予了房地产行业非常多的优惠政策。热钱也正是在此时又大量地进入到了房地产和股票领域。从而出现了日本房屋价格的开始抬高，股票也跟着不断上涨。很多日本企业普遍都因为企业利润的下滑与房地产以及股票市场的赚钱效益显现，大量涌了进去。到了1988年，东京中心地区的商业用地价格几乎变成了1983年的350%，住宅用地价格增长到300%，房屋价格也上涨了100%。股票由1985年的14000点左右，到1989年12月上涨至38915点。日本为了能够防止泡沫继续扩大，开始提高利率，以收缩贷款。

从此，日本经济开始进入了衰退期。或者说，当热钱大举进入到日本的时候，美国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1971年8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作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强迫其他工业化国家，其中包括日本、加拿大以及其他西欧国家的货币兑美元升值。日元随后升值到了17%。但是早在1970年，美元贬值预期就已经导致了大量的“热钱”流出了美国，从而导致全世界出现了大范围的货币管理失控。由于通胀严重以及商业领域急剧的动荡不安，使得全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因此而放缓了。

同时，也由于当时的日本已经逐渐变成了美国最主要的工业竞争对手，这就使得美国政府开始关注如何进一步“打压”日本，以迫使日元进一步升值。大量热钱也随之流入日本市场，日元兑美元的比价从1971年的1美元兑换360日元，上涨到了1995年1美元兑换80日元的地步。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热钱”的流入直接导致了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出现泡沫现象。1990年泡沫破灭之后，日元却仍然一路走高、过度升值。最后，日本经济只能走到通缩深渊，直至今日才慢慢复苏。

“宠儿”到“烫手山芋”：越南经济从天堂到地狱

越南，是一个土地面积只有 33 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 8411 万人的小国。然而就在 2006 年，它的股市由于 145% 的升幅而成为一个股坛神话，甚至升幅超过了正在疯狂中的中国股市。正当世界普遍都对越南市场一致好评的时候，大摩却在一份发表的报告中指出，越南正要面临一场类似于 1997 年泰国泰铢的“货币危机”。同时，也有分析师认为，越南已经出现了很多酿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包括高估的货币币值，以及在经济处于危险失衡状态的外汇储备。也正是这份报告又一次把越南推到了风尖浪口上。

越南在 1986 年 12 月开始启动“革新开放”政策，不仅实现了 GDP 快速扩张，而且还很成功地攀升到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显著位置，也是被称为第五大仅次于“金砖四国”的新兴经济体。甚至有专家将此视为“红河奇迹”。一直以来，越南革新开放的政策，伴随有经济高增长、外资高推动以及工业高比重的“三高”特质。与此同时，越南政府还采取了很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高通胀埋下了伏笔。忽然之间，越南国内出现了通胀高企、本币狂贬和股市的暴挫，罕见的金融动荡让这位亚洲的“高才生”有些承受不住。

当全球的投资者都还把越南当成宠儿的时候，越南却突然沦落成了烫手山芋。一夜之间，温情已逝，往日不再，一堆枯燥、诡异的数字开始出现在越南的天空上。有关数字显示，2008 年前五个月，通胀率已经同比上涨了 19.09%，粮价涨幅也超过了 40%。与 2007 年 12 月份相比，物价涨幅达到了 15.96%，创下了 12 年来最高纪录。而越南股市 2007 ~ 2008 年的暴跌指数，从 1170 点下降到了 379.12 点。同时，外汇市场的美元也对越南盾的汇率呈现出了持续下降的状态。

通货膨胀严重以及股市、楼市的暴跌，同时，还有越南盾的大幅贬值，越南的经济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天堂坠入了地狱。很多分析家普遍认为都是国际“热钱”惹的祸。也有人认为，这应该是越南内部的金融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一系列呈现出的状态都让人很担忧，一场类似于 1997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否又卷土重来了？

越南的经济体比较弱小，抗风险能力低，经济基础也比较薄弱。因为货币政策的过于宽松，导致了大量热钱涌入。FDI 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跨国投行正是趁机推波助澜推高了越南国内的资产价格，形成了通胀。分析越南金融危机成因，也有专家直言，其对国际热钱没有严格监管是主因之一。由于国际热钱的最终撤离使得越南经济崩盘。而在越南通胀恶化之际，美联储却同时发出了不再降息的通知，这就

相当于，对游走在外的国际热钱发出了号召，那么，自然就造成了热钱在越南经济不好以及美元走强的双重刺激下撤离，形成越南股市大跌 65%。几乎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越南突然就陷进了金融危机的行列，速度之快，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由于越南一直处于小幅升值的趋势中，所以出现了不堪重负的局面。在越南政府接受了外国专家的“以本币升值控制通货膨胀”建议后，就将越南盾和外币的浮动幅度由最初的 0.75% 扩大到了 1%。但是，快速的升值只会降低热钱获利的最终成本。或者说，它为热钱最后的获利得以了结而提供了方便。但是，如果热钱完成了套现过程，那么，本币的贬值自然就变得无法控制。越南正是因为汇率幅度的扩大而不断加快了热钱获利了结的步伐，最后，越南盾就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升值演变成了贬值，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快速贬值 2.6%。

面对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各方都对越南经济感到忧心忡忡。国际“热钱”的作祟正是造成越南经济滑向危机边缘的重要因素。国际“热钱”超速流入，使得信贷过度扩张导致经济持续“过热”。正是“资本的大量进出”或者说是热钱侵袭，使得债务危机、汇率呈现出大幅度的波动，以及国际收支严重失衡。

大量历史数据证明，热钱对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难辞其咎的。它不仅对人们经济生活的杀伤力巨大，同时，伴随着当今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热钱的短期追逐收益就变成了根本目的，热钱呈现出流量大、流速快以及影响深的新趋势。也有专业人士总结认为，热钱具备了高收益性、高信息性、高流动性以及高虚拟性等新的“四高特征”。

2008 年，越南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 144 亿美元，国际收支也进一步恶化。经济学家认为，越南已经达到构成金融危机的六个危险指标。这不仅仅是由于越南盾兑美元贬值 27%。同时，也是由于越南的很多项经济指标都已亮了红灯，从股市崩盘，到 CPI 高企，再到第一季度贸易的逆差高涨、财政恶化以及汇率贬值等现象。由摩根士丹利所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称，越南正面临一场“货币危机”。

越南经济形势的逆转之快，不仅让很多普通投资者都惊慌失措，甚至也让分析师们跌破眼镜。越南股市在半年的时间里，就跌去了一多半。从 2007 年下半年开始，通胀形势愈演愈烈，5 月份的物价上涨超过了 25%：那些由低利率吹起的楼市泡沫也开始在不断地破灭；同时，银行坏账增加，外资出现了出逃现象；贸易赤字也在持续扩大，2008 年前 5 个月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 144 亿美元……几乎所有的评委机构都对越南抱着深恶痛绝的姿态，甚至惠誉评级把越南的主权级降至负面。

即使在面对着越南危机已经开始全面呈现的时候，国际却还是对越南大放溢美

之言。当越南经济越来越恶化，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时，这些大行却又开始一致唱空，让越南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反热钱：驯服“狼性”是根本

热钱来无影去无踪，热钱的掌门人更是若隐若现、神出鬼没。热钱代表着一种丛林法则的思维模式、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思潮、一种弱肉强食的生活方式、一种“狼性”文化，甚至是某种文明的化身。近年来，借助美元贬值趋势、国际政治局势动荡、油价和大宗资源品价格高企，主要由私人资本构成的热钱所从事的投机活动愈演愈烈。

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具有极强的投机性、无序性和破坏性。目前，美国有1万多只共同基金拥有近4万亿美元资产，8000多只对冲基金拥有近1万亿美元资产，“迄今为止，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均被美国投机基金所攻击，使这些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而后，国际垄断资本还会收拾残局，廉价收购金融机构。亚洲金融危机后，危机爆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倒闭、破产成为普遍现象。国际垄断资本得以低价收购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而后者此时已无讨价还价余地。可以说，近30年来，每一次金融危机发生后，热钱都得到了长足的迅猛发展。

世界银行年度报告2006年《全球发展金融》指出，尽管油价高企、全球利率上调、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日益严重形成了种种不确定性，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流量仍然出现急剧上扬，2005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净流量达到破纪录的4910亿美元，驱动因素是私有化、企业并购、外债再融资，以及投资者对亚洲和拉美地区本币证券市场的强烈兴趣。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主管发展经济学的副行长弗朗索瓦·布吉尼翁警告说，“这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构成了难以应付的挑战。”

由于美国的经济衰退，使得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资本市场，中国从“宽进严出”转化为“严进宽出”，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严进宽出”，但是这些热钱依然可以通过贸易渠道和地下渠道流进中国市场。“严进宽出”根本就改不了“狼”的本性，要想使热钱不影响本国的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只有从根本上杜绝“狼性”。

在国际上，热钱的流动监管难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热钱不容易被政府控制的最大症结所在。到现在许多专门研究热钱的组织和机构也不知道那些热钱究竟在哪儿，怎么流通，更无法确切地知道热钱运作的相关具体步骤。在国内，只有严格控制和监管一些国内外资本账户进出的异常情况，才能更好地从流通渠道

上加强国内的监管，压制热钱在国内的活跃程度。

在热钱最为横行的 2008 年，随着热钱的洗劫，国内股市令 125 家上市公司的散户平均亏损了 4.34 亿元。随着 A 股的持续下跌，这些市值高达 1324.14 亿元的股票将变为 782.18 亿元，也就是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公司的市值损失已经高达 541.96 亿元，平均每家要亏损 4.34 亿元。

在目前的国际形势格局中，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不是美国独大，算是多元化的社会，但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则基本上是由美国这个大佬说了算。中国、俄罗斯等一些国家看上去在地缘政治享有话语权，其实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没有话语权。这样使得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话语权逐渐弱化，没有独立的经济和金融就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当美国把中国控制住之后，中国经济就不会再增长，甚至会面临崩溃。一旦中国的话语权消失就会重新回到弱国的角色，所谓的地缘政治上的话语权也就不存在了。

美国的一系列如意算盘是从 2006 年罗杰斯来中国开始的，他就是以投资教父的身份出现的，其大作一度成为中国基金经理案头的必读书。就是他，以有色金属高涨的现货市场带动了牛市，也就是有色金属股票的疯狂：而稍想一下他来到中国，实际上就是为了炒高中国股价。在有色金属之后就是石油，在美国期货市场和巴菲特一些人互相呼应，巴菲特买入中国石油，在高位抛售，造成价格恐慌，进而控制国际石油价格。石油之后就是商品市场，尤其是农产品市场，结果国际能源、资源、粮食价格暴涨。其实正是由于他的鼓吹，国内更多的资金才会投入到商品中，来拉高商品价格，提升新兴经济体的成本，引发这些国家的经济崩溃。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事实上罗杰斯一类人，就是美国虚拟经济实体的先遣队，还要被冠以投资家的美誉，就是让你心甘情愿地把财富送到美国人控制的国际资本手上。

美国就是以其强大的虚拟经济，也就是强大的金融实力对其他一些小的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至少全球的财富分配是按照美国的目标来流动的一个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会控制整个局面还要狠狠地赚上一笔，同时把对美国有战略威胁的国家财富，向其盟国或者对其危害小的国家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小国家，谁能和美国强大的虚拟经济实力对抗呢？新兴经济体只有在原有的美国指定的国际规则之下，以巨大的实力差距束手待毙。除非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新兴经济体联合起来对抗美国霸王条款的制定，否则新兴经济体永远是新兴的。拿实体经济去和美国的虚拟经济来对抗，一旦稍稍有一点成绩就会被美国所掠夺，然后再继续发展壮大，继续被美国的虚拟经济所击败。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惨痛教训就给我

们敲响了警钟。

反热钱就是要保卫我们的财富，也是为了捍卫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的价值观。热钱的背后有西方精英的强人逻辑思维，所以，欲反热钱，就要反热钱的逻辑思维，就要先拯救西方的精英思想灵魂。近期股市的上窜下跳是热钱在兴风作浪，是对中小投资者的反复掠夺，也是对我监管当局的无情羞辱。必须对热钱进行迎头痛击：我们拥有反击热钱的七种武器。公平与效率并不矛盾；对内开放应优先于对外开放。严格控制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速度，以控制热钱规模、提高热钱的偷猎成本，也给本土企业以喘息之机。

国际热钱撤出：阿根廷比索三天贬值 2%

2007 年 7 月下旬，在三个交易日内，美元对于阿根廷比索的价格几乎是一路飙升到了 3.1875，达到了自 200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阿根廷中央银行也在随后采取了措施，并在市场上出售了部分美元来回购比索，阿根廷比索才开始止跌回升。佛斯托的经济分析员说：“这次比索贬值，是出于国际投资者对世界经济的担心，他们也正在撤出高风险市场。”由于比索贬值的影响，阿根廷股市以及债券市场也都在大幅下跌。根据阿根廷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2007 年 6 月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仅仅是 0.4%。然而经济分析人士却指出，在阿根廷的一些省份，通货膨胀率几乎达到了 13%。

随着外资的迅速撤离，阿根廷政府稳定汇率，以遏制比索的继续贬值。2008 年 4 月，阿根廷中央银行开始向市场上抛售美元。4 月 26 日，阿根廷中央银行发表公告宣称，为了应对阿根廷金融市场出现的美元抢购风潮，阿根廷中央银行决定在 25 日抛售 3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一举动创下了该行在单日抛售美元的最高纪录。

阿根廷中央银行接着就实行了紧急入市的干预政策。在 2008 年 4 月 25 日，外汇市场开市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抛出了 1 亿美元的外汇。在此之后，为了稳定汇率又分批抛售了美元。当然，对于当天汇市来说，阿根廷中央银行几乎抛售了 3 亿美元的外汇。

2007 年 12 月 22 日，阿根廷中央银行在公布的报告中表示，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局势动荡，2007 年第三季度大约会有 44 亿美元的外国投资要撤离阿根廷，这是外资撤离最多的一个季度。由于全球金融市场普遍因为美国次贷危机而出现了剧烈动荡，所以导致很多外国投资者都纷纷从新兴市场撤离，这就给阿根廷的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根据统计，2007 年 7 ~ 9 月，阿根廷非金融部门撤离的外国投

资已经超过了 25 亿美元。

阿根廷经济学家埃尔南·法尔蒂说：“如果把外部市场的动荡除外，第三季度阿根廷的总统选举的不确定因素及国家统计局丑闻的困扰，加剧了外国投资者的担心，致使外资投资商大规模地将资金撤出。”同时，阿根廷央行的报告也曾说，在外资大举撤离的情况下，阿根廷货币的汇率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阿根廷政府就不得不多次入市干预，以确保汇率的稳定。

阿根廷央行制定的目标则是，要能够在短期之内将美元兑比索的汇率稳定到 1 : 3.20 左右。经济学家也警告说：“虽然阿根廷宏观经济基本面是良好的，但是由于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明朗，尤其是对于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不力。一旦政府不能在短期内稳定住市场，那么，很有可能会加速比索的贬值，从而造成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引发大量外资的抽逃。”

2007 年 12 月初，为了应对比索贬值给市民带来的压力，阿根廷政府提高了个人资产税的起征点。通过调整以后，中低收入阶层得以减免了个人资产税，而高收入阶层交纳的个人资产税却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阿根廷政府官员也介绍，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阿根廷就开始实施现行的个人资产税交纳的办法，当时，将免税额定到了 10.23 万比索，而个人总资产也是低于这个数的，这样就可以免去交纳个人资产税。当时的汇率是 1 个比索兑换 1 美元。但是到了 2001 年，阿根廷却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通货膨胀也在逐渐加剧，自然比索汇率就大幅度贬值，需要 3.14 比索才能兑换 1 美元，这就导致了很多人中低收入的阶层也开始要承担税赋的重担。

对于新税制的实施，将起征点提高到了 30.5 万比索，税率就可以采取累进制，分别为 0.5%、0.75%、1% 以及 1.25% 等几个档次，如果个人资产越多，那么税率自然也会越高。如此一来，个人资产税在通过新税制能够得以减免的同时，自然也加重了富人的税赋负担，等于是通过税收杠杆缩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尽管阿根廷政府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但是比索不断贬值的消息仍然频频传来。2007 年 7 月 26 日，阿根廷的媒体报道称：“最近三天，阿根廷货币比索兑美元的汇率贬值了将近 2%，最后，阿根廷中央银行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才能够扭转局面。”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逐渐趋于稳定，阿根廷总统选举结果已经渐渐明朗，外资在第四季度也开始向阿根廷回流，这就使得国内状况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但是同时，阿根廷政府要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以及财政政策。一旦公共财政状况恶化，那么投资者就将会再次失去信心，大量资金的长期外流，就会给阿根廷的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隐患。

组合出击：反击热钱绑架人民币

2007 年以来，来自欧美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强硬，这种声音并没有直接要求中国立刻实行汇率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而是说，中国必须加快人民币升值，因为贸易顺差太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绥靖政策的结果只能是恰恰相反。

在中国古代史上，凡是自己主动拆掉城墙的农耕国，无一不是全部粮食财富被游牧者劫掠而去；在现代经济史上惊人相似的是，凡是以制造业为生，贸然采取了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国民财富几乎无一例外都遭遇过热钱金融危机的洗劫。

一般来说，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形势在符合下列两个条件时就会导致国际间热钱大规模流入：首先是短期利率正处在波段高点，或还在持续走高，其次是短期内本币汇率蓄势待发，并且伴有强烈的升值预期。

眼下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恰好满足上述条件。“如今世界经济已失衡这种舆论已经铺天盖地，中国贸易顺差是罪魁，人民币低估导致贸易顺差，为赎罪，中国必须将人民币升值，而且是大幅升值。”中国外汇储备猛增，凶猛的热钱正在涌入中国。

“热钱”是一些商家为追求高回报、低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换言之，投机商博彩的筹码就是“热钱”。而中国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和美元的持续贬值造就了热钱进出的套利机会。

从 2009 年开始，热钱流入中国就有加速情况，但当时海外银行普遍处于“惜贷”状况，因此当时全球流动性并未得到完全释放，还处于蛰伏状态。随着经济复苏与乐观情绪蔓延，这种状况出现逆转。中国现在所面对的才是真正海外热钱冲击。同时，由于热钱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股市和楼市上升的预期，这种预期产生了一种推动作用，这些领域也成为它的主要瞄准的对象和目标。

目前热钱流入中国的渠道有 30 ~ 40 种之多，其中贸易信贷、短期信贷、FDI 以及地下钱庄等构成了热钱流入中国的主要渠道。第一，虚假的贸易信贷，在这一渠道中，国内企业与国外的投资者可联手通过虚高报价、预收货款、伪造供货合同等方式，把境外的资金引入国内；第二，外商投资进行增资扩股，外商投资企业在原有注册资金基础上，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项目等理由申请增资，资金进来后实则游走他处套利；在结汇套利以后要撤出时，只需另寻借口撤消原项目合同，这样热钱的进出都很容易；第三，收入转移，在不同地区间进行汇款等货币转换方式进行跨地区

操作，从而使大量热钱“自由进出”；其四，地下钱庄，地下钱庄是外资进出最为快捷的方式。假设你在香港或者境外某地把钱打到当地某一个指定的账户，被确认后，内地的地下钱庄自然就会帮你开户，把你的外币转成人民币了，根本就不需要外币进来。此外，货柜车夹带现金以及赡家款等都是热钱的流通渠道。

一方面，对于想赚取人民币升值、房价上涨等超值收益的境外资本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权威部门官员曾表示，外资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由于方式隐蔽，在账面上的表现似乎并不明显。但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解剖来看，确实有违规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与美国金融市场产生竞争，换言之，某些美国人乐见一个中国“世界工厂”，但未必希望看到一个亚洲“华尔街”。所以从那时起，将中国的亚洲华尔街扼杀在摇篮中，就像当年匈奴想把大汉朝卫青、霍去病的中华铁骑扼杀在摇篮中一样，对于某些西方金融大国来说，它已经是志在必得的战略目标。

从这个根本上讲，只要某些西方大国不愿意看到中国作为金融大国崛起，中国与西方的一场金融博弈乃至对决就在所难免，无非来得早晚而已。换言之，一场旨在最终摧毁中国独立自强的金融系统的新亚洲金融危机必然来临。而这个生死玄机就是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升值越多，汇率震荡幅度越大，中国战斗力就越弱，越容易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而西方金融铁骑就越彪悍，越称心如意，越处处抢占先机。

针对国际热钱的涌入，中央政府出台反击热钱的“组合拳”。

第一，热钱的最大软肋在于——在中国赚钱赚到的是利润，而如果我们能够科学厘定某些热钱的非法定义，不仅罚没其利润，更要罚没其本金，并得到有力执行的话，则热钱亏蚀的风险将大大高于其收益，非法热钱将会知难而退。因此，酝酿出台《反热钱法》这个重型武器，很可能成为新一轮宏观调控的胜负手。

尽快酝酿出台《反热钱法》，明确热钱的定义，借鉴美国证券监管的经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反热钱的行动中来，要求有关部门将每月所有超过一定数量（比如100万美元）的单笔资本流入全部向社会公布，鼓励媒体、律师等社会公众力量从中发现线索。热钱一经查实，罚没其全部本息，将罚没款的相当比例奖励举报人。

出台《反热钱法》将使中国获得调控内外部平衡的关键工具，对中国有利无害。而假如未来一段时间国内股市仍然强劲，而CPI、外汇储备继续走高的话，则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将确认无疑。

第二，坚持现有汇率制度，确保人民币币值稳定。

目前，强调人民币升值甚至变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为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的观

点甚为流行，这种观点并没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而是片面地强调提高开放度，过分夸大外资和国外势力的影响。

事实上，人民币升值时机尚不成熟，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也不具备条件，不能以市场化改革为口号，一味强调人民币汇率的完全自由浮动。目前，人民币升值不仅影响中国整个制造业的发展，更会吸引更多的热钱涌入，进一步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预期，如此恶性循环，受到损害的必将是中国经济主体。人民币汇率变为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更不可行，不仅容易推动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更给予国外资本炒作人民币汇率乃至操纵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走向之机，以汇率变动和热钱流向为手段，干涉中国经济发展，这将不利于维护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最终影响经济安全。

因此，在国内外汇市场交易尚未完全形成之前，人民币汇率不具备改革的现实基础。即使在条件成熟后，人民币汇率变为浮动汇率制，国家也不能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20世纪90年代，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外汇储备不够以及国家干预程度不够，无法抵御巨额的短期游资的冲击。中国应当以此为戒，在当前和未来热钱涌入的时候，顶住压力，不能任由人民币汇率自由波动，必须通过外汇储备等手段参与国际外汇市场交易，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向，从而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避免重蹈东南亚各国的覆辙。

热钱警报：高筑墙能挡住热钱洪流吗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约6500亿港元的“热钱”正流入香港，英国最著名的投资基金经理安东尼·波顿已于2010年4月创立了“富达中国特殊情况信托基金”，并募集4.6亿英镑资金进军香港；而“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亚洲的首个办公室也已落户香港，而这些热钱无不窥视着中国大陆金融政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伺机而入。

面对国际上的热钱涌动，中国已经着手打击热钱的进入，实行宏观调控的政策，就要弱化市场过度的投机性的利益导向；另一个方面，利用管理部门的手段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热钱。而非法的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包括在贸易和投资都没有真实性的交易背景，违背外汇管理法规的，这样的热钱是外汇管理部门的打击对象。而世界银行在近日发表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中警告，庞大的资金流入令股票市场、物业价格和其他资产价值受到刺激而飙升。热钱涌入将造成资产泡沫危机，有关当局应慎防亚太区再次爆发类似1997年的金融风暴。

热钱警报全面拉响，不允许炒作生活必需品。对于防止游资炒作现象现在可以采取几个方面的措施，第一，不允许炒作群众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粮油蛋等。第

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游资能炒作的产品肯定是供小于求的产品，比如炒作大蒜，是因为减产了，棉花也存在供需缺口。第三，建立一个专门的机制。应该对游资的动向有一个监控，严格制止它们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市场炒作，要建立专门的机制来防范。

国家住建部和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房管理的通知》，规定境外个人在境内只能购买一套用于自住的住房；在境内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的境外机构只能在注册城市购买办公所需的非住宅房屋。

至此，“热钱”警报全面拉响，监管部门也比之前更加“严阵以待”。为应对打击“热钱”违规流入，外汇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外汇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中对“外汇流入”做了比以往更加严格的监管规定，尤其还加大了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防范热钱的对策正在不断地完善当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必将起到阻碍热钱洪流的作用。

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降低热钱套利空间。热钱流动的最大动机是为了追逐国际市场上汇率变动利益差额，因此，只有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心理预期，才能阻止这种投机性资金的流动。一是要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在保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扩大汇率的浮动空间，破坏热钱对人民币的无风险预期；二是协调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减少本外币的利差，降低国际游资的获利空间；三是在对外贸易中追求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降低进口贸易中的各种壁垒，缓解汇率升值的国际压力。

完善相关政策，减少热钱投机漏洞。首先应该调整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取消外商企业在我国的超国民待遇，规范外资登记注册、项目审批、注销清算等程序，严格把好各个外资运作流程，杜绝违规操作。其次要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考核标准由量的多少转化到质的优劣上，预防热钱通过盲目引进外资的漏洞流入。再次要完善外汇管理政策，对大额长期预收货款、延期付汇、外汇应收应付款的管理进行完善，将其全额纳入备案管理范畴。

加强联合监管，建立热钱预警机制。热钱的监测管理是一项需要各部门联动配合的工作，加强工商、海关、税务、外汇、公安等部门的密切配合，改进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个人等渠道资金流入监管，继续严格控制短期外债增长，严厉打击地下钱庄和违规进入股市楼市的行为，为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争取时间和空间。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监测预警机制，对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反馈，并针对可能出现的形势逆转，提前制定应急措施，不断增强扩大开放过程中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

国内打击非法集资和游资的力度加大，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造成的空间也在加大，这样海外热钱与国内游资的互惠操作就更加流行。而热钱游资成规模后的出境就比个人资金容易得多，经常的手段就是在对外的经常贸易项目下进行交易，把正常外贸应得的利润在国内以人民币现金支付，让国内外贸企业老板也可以避税，然后就是大家看到的中国出口商品的利润奇低，地下钱庄在浙江表现得异常活跃，黑钱成为游资洗钱出境的中介。

由于国内的灰色问题，很多游资赚取的钱基本上是要逃往国外洗白的，同时由于境外的热钱要到境内炒作人民币的升值，而热钱入境以后赚钱的方式也与游资类似，这样它们就存在对冲的利益需求，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与各种对冲基金运作类似的对冲，即国内的游资利润直接以现金给了海外热钱的所有者，而海外的热钱直接把美元汇到游资操盘者的海外账户中，这样的货币对冲没有经过国际外汇清算系统，中国的外汇监管部门根本看不到外汇进出，由于游资经常是集中了大量的个人资金，有诸多的私人账户，从而使得大额的热钱资金隐匿于众多的游资人群中难以发现和监管。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加强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强化应用外资的能力就显得尤为关键。在国际经济金融动荡，不少国家面临形势逆转的环境下，国际资本持续流入我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积极培育创新金融工具，健全完善金融市场，增强资本市场消化外资的能力，将热钱转化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资源，把对国际热钱的被动防御变成主动防御将是更有效的办法。

热钱监管：预防为主，让“热钱”变“冷钱”

热钱，又称游资，或叫投机性短期资本，指为追求最高报酬及最低风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热钱”是为追求高额利润及低风险的短期资本，具有极强的高敏感度和高流动性，为逃避资本管制、降低资金运用成本，“热钱”又有很高的隐蔽性。恰恰是它的神出鬼没为流入国带来困扰。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还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都有其翻云覆雨的影子。

“热钱”在中国已成为一个相当敏感而热闹的议题。市场上对“热钱大量流入流出”的大量分析和测算并不准确且千差万别，却往往给市场投资者的预期、选择和利益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

高度繁荣和泡沫化的资本市场首先吸引热钱，也是热钱兴风作浪的首选；房地产市场因为需要的资金量大，热钱经常大进大出；凭借热钱雄厚的金融操作技巧、

市场运作能力和资金实力，它经常在商品期货市场操纵获利；当时机成熟时，热钱则可在黄金市场、民间金融市场乃至 PE 市场（投资市场）获取高额回报。石油、股市、楼市、粮市……任何大宗商品价格的涨跌都与热钱脱不了干系。2008 年油价的大起大落，全球股市的巨大动荡都与这只市场中的“黑手”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发展中国家，热钱充分享受到经济成长为其带来的暴利。从 2001 年至 2010 年十年间，流入中国的热钱平均为每年 250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同期外汇储备的 9%。“热钱”向中国流入是受多种因素驱动的：既可以规避国际金融动荡风险，也可以对人民币套汇套利，还可以对中国的股市、楼市进行投机。

过多热钱进入中国会加大市场的流动性，造成流动性过剩，而货币供给越多，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就越大。此外，热钱还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而投机资金进入股市、楼市后，容易制造泡沫。而热钱还会给股市造成严重伤害。2007 年的 G8 峰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继续呼吁各国加强对对冲基金和投机热钱的监管。

总的来说，预防热钱危机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强外汇监测体系，及早察觉外汇在本国的异常流动。

（2）注意政策、制度的可逆性设计，一旦热钱大量外流时，政策制度可以进行相应的应对和补救。

（3）保持理性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的平衡增长而不是追求过度的繁荣，始终是稳定国家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根本。

以越南为例，在经历热钱危机后，在金融开放进程上不再过于求大求快，而是通过制度化对资金进行约束，引导它为优化经济结构服务。央行不仅缩减了货币供应量，还对贷款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措施。此外，越南还计划对外国资本占有股份上限加以规定，据悉，目前越南的上市公司外国资本只允许最多占有 49%。在 2008 年 5 月，东南亚国家联盟 10 国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 3 国计划出资至少 800 亿美元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以帮助参与国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维护地区金融稳定，这无疑是构筑了一道强大的堤坝，以遏制“热钱”再度兴风作浪。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10 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被各界频繁估算的“热钱”规模和结构首次得到“官方解释”。中国证券报认为，外汇当局将“热钱”置于阳光下监管，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防范和避免对“热钱”的误读和曲解误伤中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举措意味着中国跨境资本管理更为透明，这也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重要一步。

中国证券报认为，将“热钱”置于阳光下监管、定期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监控统计，更是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一步。



风雨飘摇的全球股市

墨西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后，墨西哥逐渐活跃，并随着其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打算在拉丁美洲的舞台上大展身手。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墨西哥发生了一场比索汇率狂跌、股票价格暴泻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震撼全球，危害极大，影响深远。

1994 年 12 月 19 日深夜，墨西哥政府突然对外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 15%。这一决定在市场上引起极大恐慌。外国投资者疯狂抛售比索，抢购美元，比索汇率急剧下跌。12 月 20 日汇率从最初的 3.47 比索兑换 1 美元跌至 3.925 比索兑换 1 美元，狂跌 13%。21 日再跌 15.3%。

伴随比索贬值，外国投资者大量撤走资金，墨西哥外汇储备在 20 日至 21 日两天锐减近 40 亿美元。墨西哥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从 20 日至 22 日，短短的三天时间，墨西哥比索兑换美元的汇价就暴跌了 42.17%，这在现代金融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高估的货币成为墨西哥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在 1993 年之前，墨西哥国内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三位数。为了彻底解决通货膨胀，墨西哥政府决定推出新的币制。

根据美国的政策，在推出新币制之前，比索与美元比率是 1 : 3000，把旧币去掉两个零，比索与美元的比率就变成了 1 : 30。但是外界普遍认为，比索的这个新的比价被高估了，不符合墨西哥当时的经济发展，墨西哥的这种新币制的推出过于激进，相当于一口吃了个胖子。墨西哥政府把外界的舆论当做耳边风，没有听从经济学家的建议，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墨西哥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兴市场，爆发这样大

规模的经济危机让很多人难以置信。总结这场金融灾难，我们不难发现，危机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经济危机的急促爆发是外汇长期潜伏病变的结果。

对外资管理不力是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拉丁美洲，墨西哥按其领土面积和人口属第三大国，在 1968 ~ 1988 年间，有 4 届总统因经济危机而倒台。1988 年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上台执政，为刺激经济的增长，加速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进程，而私有化的实施需要大量的资金，为此墨政府放宽了对外资进入的限制。但是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没有对外资加以正确引导和管理，埋下了危机的隐患。

1988 年墨西哥政府实行进口开放政策，取消了外汇管制和进口限制，到 1994 年平均关税已低于 10%，致使消费品的进口急剧增加，而资本品和原材料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贸易逆差逐步增加。

1988 年贸易逆差 38 亿美元，1992 年和 1993 年分别为 238 亿和 234 亿美元，1994 年高达 295 亿美元。贸易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急剧上升，从 1988 年的 2.2% 上升到 1994 年的 8%，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大幅度上升，从 1987 年的 9.4% 上升到 1994 年的 31%。

实际上，墨西哥的发达程度尚不如韩国、马来西亚和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得多的美国、加拿大相比更处于不平等竞争的地位，就如同不同重量级的举重选手参加同等级别的举重比赛。墨西哥家业落后，也无像样的技术、先进的支柱产业，无法与美加竞争。它不顾自身经济能力，过快过分开放市场，最终导致国际收支逆差逐年扩大，外汇储备一降再降，动摇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引发金融危机。

塞迪略政府之所以在上台后不久就诉诸贬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汇储备不断减少，无法继续支撑 3.46 比索兑 1 美元的汇率。从 1991 年开始，在外汇市场上，比索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好在墨西哥政府暂时有效扭转了贬值的趋势，总算是有惊无险。而 1994 年可谓墨西哥的多事之秋，这时的比索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从 1994 年年初开始，比索就面临新一轮的贬值压力。刚开始，比索的稳定主要是靠政府的外汇储备勉强支撑。随着贬值压力的加大，外汇储备“弹尽粮绝”，国库亏空；同时，国际市场上美联储从 1994 年开始持续加息，引发全球加息热潮逃出这片是非之地，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归宿。墨西哥国内的资本告急，国内的政治局面也赶来凑热闹，不断有暴乱和武装暴动发生。

噩梦终于拉开了序幕。此时的墨西哥政府可谓内忧外患，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墨西哥的这次金融危机对股市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要知道，墨西哥吸收的外资有 70% 左右是投机性的短期证券投资。资本外流对于墨西哥股市如同釜底抽薪，

墨西哥股市应声下跌。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股票价格指数下降了6.26%；21日，继续下跌3%。12月30日，墨西哥IPC指数跌6.26%。1995年1月10日更是狂跌11%。到3月3日，墨西哥股市IPC指数已跌至1500点，与1994年金融危机前最高点2881.17点相比，已累计跌去了47.94%，股市下跌幅度超过了比索贬值的幅度。

作为墨西哥的前三大贸易伙伴之一，美国人开始沉不住气了。有经济学家研究表明，墨西哥市场的稳定关系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稳定，如果墨西哥金融危机照这样的恶劣形势发展下去，美国在墨西哥的贸易额将下降100亿美元。美国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很快就展开了初步的救援计划。1994年12月22日，克林顿政府决定向墨西哥提供6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1995年1月3日又追加了90亿美元。

巨额资金的到来并没有使墨西哥国内的情况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好转。1月10日，墨西哥股市又一路狂跌11%，后来被人们称为“黑色星期二”。其股票市场在1994年12月20日至1995年1月10日期间，股票价格按照美元市值蒸发了将近50%。

随后美国进行了二次救援计划，将200亿美元注入墨西哥外汇市场，以挽救一泻千里的比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向墨西哥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意为墨西哥提供178亿美元的贷款；加上国际清算银行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墨西哥总共获得了500亿美元的国际资本用以稳定金融危机。至此，危机正式宣告结束。

墨西哥当时盛产龙舌兰酒，危机过去之后，西方媒体给墨西哥金融危机起了一个很生动的名字，叫“龙舌兰酒效应”。意思是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经济危机时，危机的影响并不会仅仅局限在这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而是会波及它的贸易伙伴国，慢慢地渗透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由一个受害者，变成多个地区跟着遭殃。

很多年以后，金融学家还是谈“酒”色变，可见危机的恐怖程度。危机警示我们，经济自由开放有时候只是“雾中月，镜中花”，只要不适合自己的国情一切都是白扯，过早地放松资本管制和放开本国金融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安全。

泰国：“坏小子”一发威，东盟小虎成病猫

这场金融危机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谁也无法预料明天又会有哪个国家遭殃，谁也不知道一觉醒来，自己的国家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

在东南亚货币危机之前，泰国有“亚洲小虎”的美称。在1985～1995年近10年的时间里，泰国的GDP保持着8%～9%的高增长率，个别年份曾达到10%。作

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它自然吸引着全世界资本的目光。有一句话是这么来描述游资的，它们“要么锦上添花，要么落井下石，而不会雪中送炭”。在泰国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没有人想到有一天“亚洲小虎”会因为游资炒作一蹶不振。

泰国货币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行盯住美元为主的盯住汇率政策，即实行一种固定汇率制度。伴随着国外热钱的大量流入，如果游资要想进入泰国市场投资，必须要先在外汇市场上把外币兑换成泰铢。这导致国际市场对泰铢需求量大增，一时间泰铢供不应求。供求关系一旦失衡，必定会影响泰铢的价格即汇率。

泰国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泰铢兑美元的固定比价，不得不提高国内货币市场的利率，拉大与国际市场利率的差额。在国际金融学中，有一种投机行为——套利，即利用两个国家利率的差额来获取利润。显然，泰国国内利率和国际利率的差异满足了套利的条件，而且这种套利是无风险的，于是更加助长了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入，泰国国内的企业也纷纷从国际市场上大量借入资金进行这种无风险的套利行为。最终结果是 1997 年 6 月，泰私人部门的短期外债高达 980 亿美元，而当时泰国的外汇储备不过 380 亿美元。

泰国政府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步开放了资本市场，这样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热钱”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障碍地流入泰国，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泰国货币危机早在 1996 年已经开始酝酿。当年，泰国经常贸易项目赤字高达 GDP 的 8.2%，为了弥补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满足国内过度投资的需要，外国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股票市场，泡沫经济膨胀，银行呆账增加，泰国经济已显示出危机的征兆。

1997 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未偿还债务急剧上升，泰国金融机构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并且发生了银行挤兑的事件。5 月中旬，以美国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对泰铢发动猛烈冲击，更加剧了泰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1997 年 5 月，国际货币投机商（主要是对冲基金及跨国银行）开始大举沽空泰铢。对冲基金沽空泰铢的远期汇率，而跨国银行则在现货市场纷纷沽售泰铢。炒家沽空泰铢，分为三个步骤：以泰铢利率借入泰铢；在现汇市场卖出泰铢，换入美元；将换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当泰铢贬值或泰铢与美元利率差扩大时，炒家将获利。

一开始，泰国中央银行与新加坡中央银行联手入市，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动用 120 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投机商、大幅调高利率以提高炒

家资金借贷成本，等等。

但对泰铢汇率的攻击潮水般地袭来。货币投机商狂沽泰铢，泰铢兑美元的远期汇率屡创新低。1997年6月19日，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财政部长俺雷威·拉旺辞职。因担忧汇率贬值，泰铢的利率急升，股市、地产市场狂泻，整个泰国笼罩在一片恐慌中。

从纳华证券泰国总部传来的信息很不妙——相当数量的银行及金融机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已处于技术破产状态。纳华证券总部的高层们开始担心公司会否重组或兼并。

1997年6月27日，泰国中央银行勒令16家有财务问题的财务公司停业，要求它们递交重组和兼并计划。7月2日，在耗尽了3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泰国央行宣布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汇率重挫20%。亚洲金融风暴由此正式开始。此时，距泰国总理差瓦立在电视上公开讲话发誓泰铢不贬值仅仅两天。

此时，泰国货币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并由此揭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

泰国经济泡沫的刺破，泰铢的大幅度贬值，使其国内资本如同惊弓之鸟纷纷撤出泰国市场。许多正在兴建的大型投资项目停产，房地产价格崩溃，银行呆坏账浮出水面。货币危机转变为银行危机，进而演化成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作为一国经济状况的晴雨表，泰国股市难逃一劫，股市的泡沫也被吹破。在泰铢大幅度贬值期间，泰国股市同样出现了暴跌的行情。1997年8月31日，泰国证交所的上市公司市值减少了24.06%，与1996年同期相比，仅仅8个月就下降了60%。本来资金充裕的股市面临资金短缺，股市与汇市的相伴暴跌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墨西哥一样，泰国也在危机中损失惨重，国库里的外汇储备被人白白抢走了不说，金融体系的崩溃、人们信心的匮乏使这个曾经的小老虎变得弱不禁风。泰国股市从1992年至1994年经历了牛市，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泰国投资者的噩梦就开始了，股市持续性杀跌最低到达200点的低位，下降了将近九成，无数的投资者倾家荡产。

不过，泰铢的贬值也给了泰国一次危机过后喘息的机会，改善了泰国的贸易环境，实现了贸易顺差，国库又慢慢充实起来。经过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股票市场也开始回暖。可是，泰铢贬值后就再也没有升上去。

由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也面临着与泰国相似的一些问题，再加上所谓的“接触传染”效应以及国际投机者的不断狙击，泰铢的暴跌在东南亚各国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货币风潮迅速波及到整个东南亚市场。

1997年7月11日，菲律宾首先步泰国后尘，宣布货币自由浮动。菲律宾比索当天贬值11.5%，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印尼则宣布印尼盾汇率的波幅由8%扩大到12%；一向稳健的新加坡元也于7月18日跌至3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1.4683新元只能兑换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当天印尼盾再次贬值5%；8月16日，马来西亚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来的最低点。

东南亚外汇市场的震荡，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外资大量撤离，东南亚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国货币危机由此逐步发展成为更为广泛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港元联系汇率制也接受了严峻的挑战，中国香港特区政府采取果断对策，成功地捍卫了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但是，由于利率飙升，中国香港股市为此受到较大冲击。

在这场危机中，受害最惨的恐怕非泰国莫属，猛烈的金融风暴把这个国家一下子砸到了谷底。历史不忍回首，泰国的惨痛经历再次告诉我们：过早开放资本市场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不适用的，发展中国家要审慎对待国内的金融自由化进程，把握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节奏，切莫步伐迈得过快、过大。

中国香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风云变幻的股市是智者的博弈场。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大鳄把香港作为此次东南亚之行的最后一站，都说好戏还在后头，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在成功逼迫泰铢贬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先后失守后，他们已经积累了巨额的资本，可以说对中国香港已抱着势在必得的心态，想导演好这最后一场戏，掠夺完这一桶金之后，满载而归。

三个月之后，席卷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暴登滩香港岛——狼终于来了。

香港股市在1987年的股灾之后，经过4年的休养生息，逐步恢复了元气。于1992年重装上阵，再次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金融危机之前，香港的经济经过两年调整后，于1996年开始从谷底回升。1997年香港经济发展更快，前三季度的增幅分别为5.9%、6.8%、6.0%。

由于回归因素的刺激，香港房地产市场也兴旺起来。恒生指数更是屡创新高，1997年8月7日达到历史新高16673.27点，红筹国企股红得发紫。香港股市在世界股市中的排名也直线上升，跃居世界第六大股市。

当时香港股市及地产市场的泡沫，已到达最后的惊人的疯狂程度，以下是一些表征：

一张新楼认购证的转手价达250万港币；任何一家三四线股（垃圾股）传出被

红筹企业收购的消息后，股价当天就暴涨 100% 至 200%；每天十大上升股票排行榜中，70% 以上为红筹国企股；红筹国企股的狂飙，交易量的激增使得红筹国企股的证券分析员需求大增，等等。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种暴风雨前夜般的祥和，平静得让人不安，隐约中似乎一场酝酿中的危机正在悄悄向股市袭来。与香港市场热火朝天的炒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基金经理们此时表现得相当清醒，他们纷纷减持港股尤其是红筹国企股。其中就有老虎基金管理基金、索罗斯量子基金等。

索罗斯在香港打了一套组合拳，总共对香港市场发动了 3 次进攻，但是这套招数在香港特区政府的强烈狙击下打得异常艰难。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特有的联系汇率制度面临空前的考验。

香港的汇率制度比较特殊，采取的是联系汇率制度。联系汇率制度可以说是整个香港特区金融制度的基础，自从在香港实行以来，联系汇率制度以其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被视为一种近乎完美的汇率制度，几乎无懈可击，也从来没有人攻克过它。但是这种自信恰恰成为对居心巨测的国际炒家的一个致命诱惑，不怀好意的国际投资势力自然不会放过这条大鱼，他们认为联系汇率制度没有想像中那么强大，也想通过击垮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在自己的赫赫战绩中画上最浓重的一笔，赢得这枚最耀眼的“勋章”。

早在 1997 年 8 月份，投机商就几次试探性地对港币进行了冲击，8 月 14 日和 15 日，一些实力雄厚的投资基金进入香港汇市，他们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 3 个月或 6 个月的港元期货合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元对美元汇率一度下降到 7.75/1。7.75 被称为港元汇率的重要心理关键点。

香港金融管理当局迅速反击。通过抽紧银根、扯高同业拆息去迎击投机者。金管局提高对银行的贷款利息，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还回来，让那些借钱沽港元买美元的投机者面对坚壁清野之局，在极高的投机成本下望而却步。故在很短的时间内，即 8 月 20 日港市恢复平静，投机商无功而返。

1998 年 6 月 ~ 7 月，当“索罗斯们”看到恒生指数攀升至 8000 点高位的时候，估计心中正在窃喜，脑子里已开始打香港的算盘。

这批炒家并不会就此罢休，双方的血腥搏斗终不可避免。香港当局更是未雨绸缪，政策、舆论攻势双管齐下，提醒这批“金钱游鳄”不要轻举妄动。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态度极其明确：坚决维护联系汇率制的稳定。

国际投机者三番五次狙击港元的行动不仅志在港元汇价上获利，而且采用全面战略，要在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上获益，他们的做法是，先在期指市场上积累大量

淡仓，然后买上远期美元，沽远期港元，大造声势。待港府为对付港元受到狙击而采取措施大幅提高息口时，股票气氛转淡，人们忧虑利率大升推低股市与楼市，这时投机者便趁势大沽期指，令期指大跳水。

于是，股票市场上人心惶惶，恐慌性地沽出股票，炒家就可平掉淡仓而获取丰厚的利润。换言之，投机者虽然在港元汇价上无功而返，甚至小损，但在期指市场上却狠捞一笔。

对此，香港金融管理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的措施，一是动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吸纳港元，二是调高利息并抽紧银根。一番对攻之后，港股在连续下跌后中止住脚步并开始强劲飙升，主要是有中资及外地资金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推动大市上扬。中国电讯重上招股价以上水平，也产生一定刺激作用，令红筹、国企喘定并作反弹。加上祖国内地减息亦成大市上扬的题材，这些因素令恒指急速反弹。在股市强劲反弹之下，港元汇价恢复稳定。

香港特区政府在1997年9月份继续推高股指期货价格，迫使投机资本亏损离场。9月7日，香港特区政府金融管理部门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活动受限，当日恒生指数飘升588点，以8076点报收。

同时，日元升值、东南亚金融市场的稳定，使投机资本的资金成本和换汇成本上升，投机资本不得不败退离场。9月8日，9月合约价格升到8220点，8月底转仓的投机资本要平仓退场，每张合约又要亏损4万港币。9月1日，在8月28日股票现货市场成交结果进行交割时，香港特区政府发现由于结算制度的漏洞，有146亿港元已成交股票未能交割，炒家得以逃脱。

至此，这场惊心动魄的港币保卫战告一段落。在此次连续10个交易日的干预行动中，香港特区政府在股市、期市、汇市同时介入，力图架构一个全方位的立体防卫网络，令国际炒家无法施展其擅长的“声东击西”或“敲山震虎”的手段。

这场较量虽然以香港特区政府的艰难取胜而告终，但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香港特区政府的胜利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香港特区政府干预股市和期市两周，虽然将恒生指数推高了1200点，却动用了相当于将近千亿美元的港元，占了当时香港外汇储备的14%。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损失了20亿美元，占其资产总额不到1%。可能真的不能用胜利和失败来评价双方的角逐，在这场狙击与反狙击中，没有真正的赢家，也没有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但它所带给人们的震撼并不仅仅局限于这场危机本身，而是留下了更多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问题。

联系汇率制度的去留成为危机过后香港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香港特区政府认为最好还是保留联系汇率制度。如果要改变汇率制度，香港的金融市场必将面临一

场大的洗牌，尤其是香港刚刚经历了严重的冲击，汇率制度的改革可能会引发新的动荡。香港特区政府本着稳定的原则，坚持了联系汇率制度。最近十几年的事实证明，香港特区政府的选择是正确的，香港经济一直保持着健康的发展势头。

韩国：大马不死，不攻自破

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作为世界第十一大新兴经济体，世界第十二大出口国，也是东亚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加入“富人俱乐部”——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简称 DECD，由 24 个发达国家组成，韩国于 1996 年正式加入）的国家，是一个在 35 年里由贫穷走向富裕的国家。1988 年汉城（首尔）奥运会之后的 10 年时间里，韩国更是取得了不俗的经济增长，是“亚洲四小龙”中发展势头最强劲的一个。然而正当韩国人还在津津乐道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与荣誉的时候，刚刚席卷泰国的金融危机裹挟着灾难铺天盖地汹涌而来。

1997 年 7 月初，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遭到美国对冲基金的猛烈狙击。货币的动荡导致资本撤出这两个国家，随后又导致泰铢和印度尼西亚卢比的崩溃。

日本政府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经济会遭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这场金融危机对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因而认真地为这两个国家提出了摆脱危机的一揽子金融方案。但却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由于仍然得不到国际上的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混乱，并且它们的货币已经崩溃。这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且许多企业宣布破产。由于美国同欧洲盟友的联手，日本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由于到 1997 年 11 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仍看不到解决希望，韩国的金融问题出现了恶化的迹象。

起亚集团是韩国的一家汽车生产厂商，资产规模在其国内排名第八位，拥有 5000 家下属企业，是真正的“超级集团企业”。1996 年 7 月 15 日，起亚集团因无力偿还 10 亿韩元的债务而被银行宣告为破产对象。

地方法院为制止起亚集团的工人罢工，冻结了起亚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所有财产，引发了汉城（首尔）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双双下跌。在法院冻结起亚集团财产的当日，汉城（首尔）股票市场综合指数下跌了 11 点，此后几天，这种趋势继续蔓延，股市就跌落到历史低点，而汇率由 890 韩元兑 1 美元跌到了 913.07 韩元兑换 1 美元。这时候，外界普遍认为，韩国经济可能即将陷入危机之中。

1996 年 10 月，韩国双菱商务公司宣布倒闭。

11 月，高丽证券公司倒闭，这是 1963 年以来韩国首家倒闭的券商。

12 月，资产规模排名韩国第十二位的汉纳集团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宣告破产。

一系列倒闭案的发生，无一不对风雨飘摇的韩国金融市场造成一波又一波巨大的冲击。1997 年 10 月中旬，形势开始更加恶化。汉城（首尔）股市综合指数支持不住，跌破了 600 点的“心理防线”。11 月的韩国金融市场再掀波澜，股市持续低迷，历史新低不断出现，韩元的汇率也是连续创造新低。11 月 10 日 ~ 11 月 14 日，股市一直在 500 ~ 520 点之间徘徊，并创下一天下跌幅度 60.9% 的最大的纪录。

股市底线被突破，韩国政府面对紧急局势，决定挽回投资者的信心，实施救市措施。内容包括由政府出资，向韩国面临资金压力的投资银行提供优惠利率的特别贷款。对于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韩国政府也解囊相助，以解决他们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经济顾问委员会很快就讨论出一套韩国振兴金融市场方案，但由于反对党的抵制，方案并没有被通过。在强大的卖盘压力下，1997 年 11 月 17 日，韩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宣布，韩国央行放弃对韩元的干预，韩元汇价连续两天跌停。

此外，韩国股市进一步开放。接连提高了外资拥有韩国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上限，将其从原来的 23% 提高到 26%。允许企业一年发放两次红利，对来自日本、德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投资者免征所得税。

因为韩国的经济比其他所有受影响的亚洲国家的总和要大得多。华盛顿拒绝韩国政府金融帮助的请求，这是对韩国的一次重大打击。

当时的韩国新任财政部长林昌烈临危受命，制定了一揽子的救助计划。但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救助计划出台后的次日，韩国股市经历了历史上触目惊心的“黑色星期四”。汇市开盘刚刚 15 分钟，就跌到了 10% 的下限，韩元兑美元最后收市报 1139 韩元兑 1 美元，创下了单日最大跌幅的新纪录。

市场上的信心涣散在股市上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汉城（首尔）股票综合指数下跌了 2.82%，跌至 488 点。这一天，人们疯狂抛售韩元，抢购美元，银行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挤兑风潮，黄金也同时受宠，当天的金价一天内上升了将近一成。“黑色星期四”正式宣告林昌烈这位韩国新管家的新政策的失败，这第一把火还没来得及烧就被无情的市场给浇灭了。

到 1997 年 11 月下旬，由于本国货币的崩溃，韩国政府放弃了对韩元的保卫，关闭了外汇市场三天，然后请求 IMF 提供救助方案。在谈判了两周之后，美国和 IMF 才草拟了一份 570 亿美元的一揽子拯救方案。

这份救助方案对韩国提出的条件之苛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上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它声称要成为一个“应对 21 世纪金融危机的真正 21 世纪的方案”。

但是，这份方案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债权人，即向韩国提供贷款的华尔街投机者。这些投机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因为提供给韩国政府的资金都落入了他们的口袋。

然而祸不单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偏偏在这个紧要关口落井下石。它的做法虽然很简单——仅仅是调低了韩国企业的信用等级而已，但是威力却很大，韩国市场本来就信心不足，标准普尔公司甚至把韩国外汇债券信用等级也调低了四个档次，列入了“垃圾债券”的行列。这像是一枚重磅炸弹，足以把本来已经不堪一击的韩国市场彻底击垮。韩国汇市一开市，4分钟的时间里，就再次到了跌停板的边缘水平。而股市自然不会消停，也下挫7.5%。

韩国人估计之前会很难相信，他们国家的货币会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金融体系会面目全非，更不愿意承认他们引以为豪的“汉城（首尔）模式”有一天竟成为灾难的根源。

韩国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汉城（首尔）模式”本身的先天不足——外债过多。

截至1997年，韩国的外债总额为1045亿美元，与此同时，外汇储备不过292亿美元，这种严重的不对等才是危机的真正症结所在。随着韩元的贬值，韩国企业要还债就要拿出更多的韩元去兑换外币，这样外债数目的绝对值便会不断上升。企业还债负担加重，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连带着银行也纷纷关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受到重创，“汉城（首尔）模式”彻底失败，“大马不死”的神话彻底被打破，韩国经济此后低迷了10年之久。

然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场金融危机确实给韩国人上了一课：对美国的经济信任已经不复存在。在韩国陷入最可怕的金融困境的时候，美国只顾自己的私利，更不用说想要帮助它的盟友了。美国的目的是保护本国的债权人；打开韩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以难以置信的低价收购韩国的公司——全都是为了从韩国获得巨额的利润。此外，韩国人还得到了一个教训，即高负债率和对短期借贷的过度依赖是危险的做法。在金融危机期间，韩国2/3的债务是短期的，并且韩国公司的举债经营率极高。

日本：无情泡沫，引火烧身

有人说，从世界经济层面来看，日本是亚洲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失败者。要评选1997年的十大流行词语，“泡沫经济”肯定入选。正是“泡沫经济”为日本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温床，泡沫的破碎让日本人民接受了“血”的教训。

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后，日本经济开始复苏。始于1950年的朝鲜战

争使日本的工业再次繁荣起来，因为美国对朝鲜战争的介入需要大量的物资和其他产品。由于新技术的引入，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复苏一直持续着。日本的贸易政策增加了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上的份额。日本经济的这种增长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并且日本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从 80 年代开始，就经历着严重的贸易逆差，而这其中的主要来源正是日本。因此美国无需找寻些借口解决和日本的贸易逆差问题。于是，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和美联储主席保罗为首的代表团，开始与日本财长进行谈判。谈判的内容无非就是表达他们对当前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不满，日本出口的产品太便宜了，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日本政府应该采取措施缓解一下这个问题。

方法很简单，只要日元升值就可以了。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政府开始在市场上公开抛售美元，导致美元兑日元汇价大幅度贬值。

1985 年 9 月，日本与美国签订了《广场协议》后的三个月时间里，美元对日元的兑换比例迅速下跌了 20%，由原来的 1 美元兑 250 日元下跌到 1 美元兑 200 日元。但是让日本政府没有想到的是，美元兑日元却由此开启了其长达 10 年的“跌跌不休”之路。

为了弥补以日元定价的出口贸易中的货币损失，日本公司转而开始金融投机：更多的资金进入东京证券交易所，并且日经指数攀升到新的高度。由于持有许多日本公司的大量股份，日本各个银行的资本迅速增加。它们获得了对国际金融的支配地位：世界十大银行全都在东京设有总部。

固然日元的升值即美元的贬值，对日本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利的。但是货币的升值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涌入国内。随着这部分资本流入日本国内市场，极大地带动了日本投资的增长，进而拉动了 GDP 的增长。进一步来讲，这些国际资本大部分都被投资到了日本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从而使这两个市场异常繁荣起来。

据统计，1985 ~ 1990 年，日本股票和住宅用地价格的增长率分别为 31.1% 和 15.6%。1986 年，日本股票市场开始进入牛市，日经指数达到 13000 点。到了 1990 年初，日经指数飙升到了 38 915 点的高位。东京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总市值甚至曾一度取代纽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场。

日本国内的百姓确实在股市的“非理性繁荣”中赚得了不少钱，实现了个人财富的增加。他们感到兴奋，不认为这样下去会有什么不好。他们有些得意忘形了，当然没有也不会注意到当时的股票市场市值已经是国内 GDP 的 3.3 倍，这说明股价的大幅度增长没有实体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这种上涨不过是一种泡沫，正如人们的

美梦一般虚幻易碎，迟早是要破灭的。

1986年，经过长期的日元升值，日本政府一直主张和实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最终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大量资金被套。

1989年，东京日经指数达到4万点，因而成为全球投资者的最爱。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资本净值“超过了世界股市市值的42%”。日本的金融泡沫已经形成。

这些都是后来危机爆发的催化剂，1990年日本股市暴跌，1991年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下跌，标志着日本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日本如同是伤口上撒盐。其实，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经济已经持续低迷了7年的时间。自1992年以来，日本经济由于经济泡沫的结果而一直处于低迷之中。10年来日本GDP的年均增长率一直是1%左右，并且日本的经济出现了4次不同的衰退。日本的失业率从2%增至5.4%。在20~24岁的年龄群体中，失业率达到10%。对一个拥有终生就业保证的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异常高的数字。

日本在经济泡沫之后还出现了通货紧缩，因为物价和家庭收入不断下降。通货紧缩使家庭和公司部门难以偿还债务。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虽然不像其他东南亚国家，受到索罗斯的正面攻击，但是外围市场的乏力对处于亚洲经济核心地位的日本来讲，却足以使其陷入经济危机的致命沼泽而毫无招架还击之力。

东南亚金融危机很快就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化学反应。

日本金融危机最先是从小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开始的。从1990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总体不景气，不少银行和证券公司纷纷面临巨大的经营困境。这些金融机构大多都是靠股市和房地产发家的，但随着市场泡沫的相继破碎，这些金融机构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时间长了，自然捉襟见肘。经济又看不到好转的迹象，所以先后破产。

1997年11月，日本十大证券公司之一——三洋证券，因为贷款无法收回，形成了巨额的呆坏账，资不抵债，最终难逃破产的厄运。同月，在日本北海道地区市场占有率最大的银行——大型北海道拓殖银行宣告破产。该银行由于出现了储户挤兑的现象，资金周转短缺而被迫宣告破产。

1997年11月21日，山一证券总经理召开全体董事会会议，总经理野则正平含泪宣布：公司由于高达3.3万亿日元的负债，不得不向政府申请破产。

山一证券宣布破产当天，日本股市全面下跌，日经指数下跌了854.05点，以15867点收盘。美国纽约股市道琼斯指数下跌113点。同时，受山一证券破产的影响

响，欧洲各国股市也上演了不同程度的跳水。其中，伦敦股市下跌 1.8%，巴黎股市下跌 2.1%，法兰克福股市下跌 3.3%。

随着 1997 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尤其是山一证券的破产在国际市场上引发了很强烈的反应。山一证券的倒闭使很多人担心，日本金融体系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山一证券的破产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屋漏偏逢连夜雨”，受周边市场的影响，1997 年 10 月，日本的出口开始下滑。截至 1997 年 11 月，日本出口额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 20% 还多，其中对东南亚出口的下降占了很大的比例。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今消费和投资在泡沫破灭时就已经走下坡路了，对于日本来讲唯一的希望——出口，现在也无法支撑住日本经济了。日本失业率也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达到了 3.5%。金融机构倒闭后，金融服务业纷纷裁员，而且随着危机的蔓延，裁员会慢慢向其他行业转移，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的萧条乃至瘫痪。

日本的经验教训表明，日元升值在带来其国内金融市场资金充裕、欣欣向荣的同时，出口的减少造成传统制造业急剧衰退。如此看来，资本市场繁荣的背后是要以实体经济的损失为代价的。如果人们真正认清“泡沫经济”的短暂性和本质特征，中国股市从 6000 点的高位下挫也就不难理解了。

越南：最高的利率，最差的股市

提起越南，你能想起什么？是不堪回首的越战还是处于亚热带闷热湿润的天气。也许，你对于越南的印象仅限于此，那么现在你又可以增加一份对越南的印象了——他们的股市很差劲。

越南股市自 2007 年 11 月以来已经累计下跌了 55%，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随着 5 月份通胀率激增至 25.2%，越南多项经济指标均亮红灯：通胀持续高位运行、货币危机一触即发、股市市值横遭腰斩、财政恶化、汇率贬值。“连续 20 天，每天都是跌”，这不是股市奇闻，这种连跌近一个月的股票走势就发生在 2008 年 6 月的越南胡志明证券交易所里。

越南共有两个证券交易所，与 A 股一样也有不同的分工。在河内上市的企业基本上是“小盘股”，股本在 800 亿盾以下；而在胡志明市发行上市的，股本在 800 亿盾以上。两个交易所的交易时间并不统一，胡志明市证交所的交易时间是早上的

8:30 ~ 10:30, 河内证交所则是早上 8:30 ~ 11:00。下午两市均没有交易。

胡志明市证券交易中心位于胡志明市中心的第一郡, 2000 年 6 月 20 日正式开幕, 同年 6 月 28 日开始进行买卖。有 22 家企业挂牌交易, 总市值约为 1.44 亿美元。此后, 越南 VN 指数 (基准股指) 从 100 点一路上升。

2006 年, 越南股指涨幅高达 144%, 为亚洲之最, 牛气冲天的越南股市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投资者争相入市。2007 年 3 月, 越南股指登上 1170.67 点的历史最高纪录, 总市值超过 200 亿美元, 上市公司接近 200 家。当投资者还在为刚刚出现的大牛市感到欣喜若狂时, 越南股市正在悄悄创造着新的历史纪录。

2007 年 10 月, 越南股市调转方向, 从 1106 点开始了持续的下跌。到 2008 年 6 月 4 日收盘, 越南股市不出意外地收出了连续第 20 根阴线。基准的 VN 指数跌至 395.66 点, 为 2006 年 2 月 28 日以来最低点, 年内跌幅超过 58%。

就像乘坐一架没有保障的过山车, 2008 年越南股市就是在起起伏伏中度过。短短一年时间, 越南股市从高峰跌到了谷底, 可谓冰火两重天。面对越南股市一泻千里的悲惨遭遇, 仍有许多机构投资者继续看跌。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投资者对越南股市如此缺乏信心?

事实上, 胡志明证券交易所里股票的大起大落与越南政府的政策方针及越南经济发展格局密切相关。

近年来,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 越南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 被普遍看作亚洲蓬勃向上的经济体。2000 年以后, 越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始终保持在 7% 以上, 2005 年以后甚至超过了 8%, 增速仅次于中国, 国民生产总值在 2007 年达到 713 亿美元。2008 年上半年, 越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 6.6% 左右, 越南政府预计年底国内仍可实现 7% 的高速增长。

事实上, 即使美元兑各主要货币今年弱不禁风, 但兑越南盾却升了 1.4%。越南盾兑美元的 12 个月远期不交收合约的价格跌至 22550 兑 1 美元, 反映投资者预期越南盾兑美元 1 年内将大幅贬值 39%。

经济改革的推行为越南赢得新世界工厂美誉, 却同时带来经济过热的后遗症, 迫使政府把越南盾维持在偏高水平遏抑通胀。大摩甚至警告, 通胀和贸赤恶化, 该国或步泰国 1997 年的后尘遭遇狙击, 甚至连累区内爆发“货币危机”。

2002 ~ 2007 年, 越南社会投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递增, 分别为 33.2%、35.4%、35.5%、35.6%、35.7% 和 40.6%, 巨额的投资使政府财政赤字常年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 5% 的危险水平。2007 年, 政府财政赤字为 50 亿美元,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 2008 年第一季度的财政赤字比 2007 年同期增长了 78%。

同时,为使企业获得低息贷款,政府采取了宽松的信用政策,银行信贷规模飞速增长。2007 年信贷增长 54%,2008 年第一季度的信贷投放比上年同期又增加了 65%,远远超出越南央行将全年信贷增长率限制在 30% 之内的目标。

持续的高速增长背后必然存在经济过热。2008 年以后,越南的经济问题开始凸显,导致股市跌去近七成。伴随着越南股市下跌的是国际热钱的疯狂撤离。即使在越南股市已经降温的年初,活跃在越南股市中的资金量依然很大。

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和贸易赤字使越南盾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2008 年 3 月,政府将汇率的日浮动区间从 0.75% 扩大到 1%。之后,正如人们先前所猜测的那样,越南盾发生急速贬值,两个月内越南盾对美元的汇率下跌 2.7%,国际远期外汇交易市场预期,到 2008 年底,越南盾的贬值幅度可能会达到 30%。恐慌的人们将大量越南盾兑换为美元和黄金,由于对美元的需求增加,政府实行了外汇管制,投资者又纷纷涌向黑市抢购美元。6 月底,越南政府再次放宽越南盾对美元汇率的日波动幅度,升至 2%。

面对越南经济存在的问题,政府的反应是缓慢的,他们不愿中途放弃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和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愿就此打住经济的快速增长势头,不愿过早打击民众乐观的投资情绪,因而有力的紧缩措施迟迟没有推出,国内信贷依然在放大,经济依然在升温,政策取向的不明朗对投资者的心理预期造成了负面影响。

其实早在 2007 年底,越南的 CPI 就已经达到了 12% 的高水平,如果政府不是犹豫不决,而是及时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也许后来人们就不会把越南比做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泰国。

在外汇储备不足、经济严重失衡及高通胀夹击下,越南盾将面临庞大贬值压力。为遏抑通胀,越南政府已采取多个措施,包括要求银行减少贷款,暂停不必要的基建工程及增加银行存款准备金,以减少货币供应。

2008 年 5 月中旬,越南国家银行将越南基准利率由 8.75% 调升至 12%,再贷款利率和贴现利率同步调升至 13% 和 11%,并要求商业银行增加法定存款准备金。

尽管基准利率大幅提高了 325 个基点,但还是没有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如果把通货膨胀率考虑进去,越南的实际利率仍然为负。2008 年 6 月,越南国家银行再次上调基准利率,由原来的 12% 提高到 14%,商业银行的最高贷款利率调至 21%,越南成为亚洲最高的利率水平。

系列紧缩措施的出台表明了政府对抗通货膨胀的决心,受到了投资者的欢迎,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政府救市政策的干预下,到 2008 年下旬,越南股市一直处于上涨状态,回升近 30%,许多机构投资者重新入市。

此外，交易限制的放宽将使越南股市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除了股市有所反弹之外，2008年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6.7%左右。随着宏观经济积极转变的出现，人们的担忧慢慢消散。其实越南的情况并没有人们想像得那么糟糕，因为越南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完全放开，金融市场的结构也比较简单，除了股票和债券之外，还没有出现金融衍生产品，流入越南的资金主要从事直接投资，国际投机资本对越南的影响十分有限。与上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源头泰国相比，越南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虽然越南这次并没有陷入危机，但却为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出现问题的国家也会如此幸运。

欧盟：再次出手，股市能否止泻

2011年8月18日纽约股市开盘前，欧洲股市全面下挫的消息便已开始市场中蔓延，结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当日跌幅均超过3%。欧美股市暴跌波及亚太地区主要股市，投资者避险情绪强烈纷纷抛售，19日该地区主要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五”。

欧洲在应对债务危机方面措施不力，大大削弱了投资者对欧洲经济的信心，而美国同样也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因此，各方现在急于找出给市场“止泻”的“对症良药”。所谓的“症”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新一轮衰退。

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希腊的债务危机随即愈演愈烈，但金融界认为希腊经济体系小，发生债务危机影响不会扩大。2009年12月8日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为负面。

2009年12月15日，希腊发售20亿欧元国债；

2009年12月16日，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调为BBB+；

2009年12月22日，穆迪宣布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负面。

希腊的债务危机只是欧债危机的开始。除希腊外，欧洲其它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包括比利时这些外界认为较稳健的国家，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预报未来三年预算赤字居高不下，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盟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

为解决欧债危机、拯救欧元，欧元区17国领导人在2011年10月26日晚在布鲁塞尔举行4天来第二次峰会，商讨应对之策。由于谈判异常艰难，会议一直持续到27日凌晨4时多。经过一夜的争吵，欧元区领导人终于在“最后一分钟”拼凑

出一套应对欧债危机的综合方案。

该救市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欧元区领导人与欧洲银行业代表达成一致，同意对希腊债务减记 50%。作为交换条件，欧盟同意再向希腊政府提供 1000 亿欧元的救助资金。换言之，手握大量希腊债券的欧洲各大银行以放弃这些债券一半票面价值的代价换来了欧盟对剩余券值的担保，而希腊也得以保留继续获得融资的可能性。

二是关于欧洲银行业资本重组，为让欧洲银行业能够经得起希腊债务违约的风险，欧元区领导人一致同意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将欧洲主要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 9%，即在这段时间内欧洲银行须增资超过 1000 亿欧元。

三是关于欧洲金融稳定机制的杠杆化，欧元区领导人同意提高现有临时性救助机制的“火力”，以 4 ~ 5 倍的杠杆率向市场融资，以期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的规模扩大到 1 万亿欧元。

当然，这并不是欧盟联手合作的第一次。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早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潭，已经多次在欧盟成员国会议或 G20 峰会等国际会议上达成共识，实施救市计划，对疲软的金融市场进行注资。

2008 年 10 月 15 ~ 16 日，欧盟首脑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与会 27 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欧元区 15 国峰会于 12 日通过的应对金融危机战略，并呼吁全面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从而结束了在欧盟层面缺乏整体协调的局面。

根据峰会公布的有关材料与领导人讲话，欧盟联合行动方案可以归结为欧盟层面与世界范围两个层次。欧盟层面的主要措施，是对濒临破产的银行实行国有化，并对银行间的借贷提供政府担保。具体地说，一方面政府以购买优先股的方式向金融机构直接注资，另一方面由各国政府为金融机构新发行的中期债务提供担保。目前已有多个成员国根据这份行动计划出台了本国的大规模救市方案，出资总额接近 2 万亿欧元，相当于美国 7000 亿美元救市基金的 4 倍。

救市政策出台后，欧美股市出现一定的涨幅。但是由于，欧盟国家 2007 年底政府赤字高于 3%，包括匈牙利（5%）和希腊（3.5%），接近 3% 的包括英国（2.8%）、法国（2.7%）、葡萄牙（2.6%）和保加利亚（2.6%）。第一轮救市计划回应者寥寥无几，最终也未起到太大作用。

虽说欧元区领导人在三大核心议题上最终达成一致，超出市场预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场乐观情绪，但这次峰会显示，各国有强烈的解决问题的意愿，但是有关解决方案的实施仍然缺乏具体细节。外界普遍认为，这次峰会并没有拿出足以解决欧债危机的最终方案。当然，欧债危机已持续两年时间，市场也不奢求通过一次

峰会就能彻底解决所有问题。

此次欧盟推出了欧债救助的“新政”，给脆弱的全球股市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但新政是否有新意，是否是良方，还要推敲内容。

EFSF（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规模可能从 4400 亿欧元增加至 2 万亿欧元。可如果仍是防止重债国违约的信贷救助思路，只不过救助覆盖面扩至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后两年内大幅增加到期巨额债务规模，避免短期违约导致银行风险爆发。也就是说，还是“救急”，与救希腊等三国的思路并无太大区别。除了产生短期的市场刺激作用，对解救危机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

欧盟和欧元区峰会做出的决定值得欢迎，但仍需更多如何加强欧洲金融稳定机制的细节。而且，即便能够通过杠杆化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的规模扩大 4 ~ 5 倍，也只是拆东墙补西墙，借新债还旧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技术盘面来看，新一轮救市方案出台后确实在欧美交替盘面出现过一波小幅度向上拉涨的局势，在美盘期间受美指等外在因素影响，盘面呈现直线向下的局面，这也意味着在市场预期中，投资者对于后期的各央行的动作并不看好，从上周的收盘情况来看，虽然日线处于一个收阳的局面，但从 1 小时及 4 小时的趋势图来说，接下来向下的概率要远高于向上涨的动力。

金融大鳄索罗斯认为，欧盟实行的新政策不应该一刀切。欧元区可以建立退出机制，像希腊和葡萄牙这样规模不大的国家退出欧元区后，欧元仍可以继续存在。但如果像希腊那样的小国退出欧元区，也需做好准备，以保护债权人和银行储户的利益，保证银行不会破产。欧盟应建立相应规则，允许失业率高企的国家出现财政赤字，但德国拒绝区别对待，强调欧元区国家应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财政平衡。

要真正恢复市场信心，欧洲须纠正被“异化”的凯恩斯主义，不能将透支财政累积的高额债务仅仅停留在银行体系内或者维持政府的运作。要增加实体经济的投资，创造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欧洲各国政府需积极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引导银行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回归经济增长，扩大税收基础，增加财政收入，恢复市场对政府债务的信心。

大盘总体走势：低位震荡下行

21 世纪以来，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让人触目惊心，有的已经过去，有的还正在发生，这些风波让人们意识到股票市场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地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悲伤的情绪似乎总是多于喜悦，有时看似与股票市场毫不相关的

事情也会引起股票市场的动荡，风险可谓无处不在。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随时可能出现暴跌已经是股票市场数见不鲜的事情。可能是某国政府的一个小小政策变动，又或者是某个大型企业的市场收益下滑，各种或真或假的消息一出现就会立刻刺激股市敏感的神经，一天之内下降几百点也不足为奇。引发全球股市震荡的根源其实就在于次贷危机。

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业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直到2007年初，这种业务才由于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而被人们熟知。

2007年2月，汇丰控股为在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增加18亿美元的坏账拨备；美国最大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Countrywide Financial Gozp.（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收缩贷款；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New Century Financial（新世纪金融公司）公布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此后，“亏损”、“裁员”、“破产”、“股市下跌”、“注资”、“救市”、“降息”这些词汇不断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场由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引发的危机逐渐显现，并迅速向全球金融市场蔓延。凡是买了美国次级债的国家，就要被迫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埋单”，正所谓美国股市打个喷嚏，全球股市都感冒。

在美国，抵押贷款根据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来发放，许多人因为有过延迟付款、破产之类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因为收入较低、信用记录不全等原因而无法达到标准抵押贷款机构要求的信用评分，从而无法获得抵押贷款。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美国出现了服务于这类人群的次级抵押贷款。“次级”的称谓源于借款人较差的信用和较低的收入。与优良的借款人相比，次级借款人要承担更高的利息，并接受浮动利率和提前还款罚金。

从2000年开始，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采取了降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4年之内连续降息25次，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到1%，房地产市场一派繁荣，房价持续上涨，到2006年涨幅已高达80%。

极度利好的市场情况使人们在喜悦之余忘记了自己只是身在钢丝上表演平衡木的小丑处境。即便房价已经高得离谱，次级贷款机构和借款人仍都乐观地认为，即使出现还贷困难的情况，抵押房产不断上升的价值也足以弥补贷款金额，并可获得额外收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贷款机构对借款人的信用要求和首付标准也不断降低，甚至出现零首付的情况。

评级机构对大部分次级债券给予了“AAA”级的评价，诱人的高收益率使次级债券受到了商业银行、对冲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极大欢迎，他们还利用次级债券作为抵押进行再融资，次级抵押贷款通过证券化将风险分散到

了全世界。

于是，全球股市顷刻间大幅度下滑。2008年1月中，因市场忧虑美国经济衰退、美国次级按揭风暴无法受控以及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热罗姆·凯维埃尔涉嫌违规巨额交易欧洲股价指数期货后的巨额平仓活动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

2008年1月21日，当天被喻为“黑色星期一”，伦敦富时100指数创下单日最大跌幅，欧洲股市亦创下2001年911事件后最大跌幅，亚洲股市更最多下跌15%。上海综合指数下跌5.14%。美国股市当天休市，但其指数期货也录得大跌。当日法兴银行事件被揭发后，银行开始平仓，使欧洲的期指交易激增，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跌势，在连锁效应下波及全球。

1月22日，亚洲股市继续重挫。日经平均指数及香港恒生指数分别下跌超过5%及8%。恒生指数更大跌2061点，创历年最大单日跌幅。即使市场传闻美国将提前减息四分三厘至一厘救市，也无力反弹。当日上海综合指数更大幅下跌7.22%。

1月22日美国开市前约1小时，美联储宣布减息四分三厘，道指期货即时由下跌六百多点反弹至下跌百多点，欧洲股市也大幅反弹。当日上海综合指数大幅上涨了3.14%、港股更创下史上最大单日点数升幅，上升了2332.54点（10.72%），并重上250天移动均线以上。

1月24日，法兴银行完成平仓活动，并正式对外公布事件，欧洲股市仍然大幅上升，但香港股市却在15分钟内急跌超过800点，倒跌收市。

2008年中后期，股市仍旧持续下跌趋势，波及范围更加广泛。信用危机狂潮席卷全球金融市场，导致市场陷入一片恐慌和放款急冻，冲击全球经济景气衰退，拖累全球股市全军覆没。蒙受数十年以来最惨烈股灾冲击的股民，则试着研判最坏的情况是否已远扬，或股市看起来反弹却到头来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短暂回春。

华尔街崩溃了，遭遇沉重打击，被迫再融资高达万亿美元。与之对应，欧洲金融界却似乎奇迹般地安然无恙，以至于法国人可以高高在上地指责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失败与欧洲“贵族般优雅的”资本主义的成功。

不过，奇迹与骗局相差不过半步。欧洲在2008年前享受的繁荣，除了欧元区统一带来的推动之外，同样有房地产泡沫的“贡献”。2008年繁荣落幕，欧洲各国政府如同美国政府一样，负债规模急剧攀升。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是一个分裂的大陆：在欧元区的设计之下，欧洲被分裂为竞争力强劲的北欧与竞争力不足的南欧。持续逆差的南欧国家依赖外资来为政府赤字融资，债务占比迅速超越界限。市场的不安很快酿成希腊危机。

2011年8月4日全球资本市场再次全面下挫。道琼斯指数跌4.31%，暴跌512

点跌幅创 2 年半之最；纳斯达克指数跌 5.08%；伦敦 100 股指跌 3.43%；法兰克福 DAX30 指数跌 3.40%；巴黎 CAC40 指数跌 3.90%；上证综指跌 2.38%；东京股指跌 3.72%；香港恒生指数跌 4.29%；台北股指跌 5.58%……

欧美股市当天遭遇重挫，美国股市跌幅创下 2008 年次贷危机以来之最。受此影响，5 日亚太股市开盘后也普遍大跌，全球市场哀鸿一片。

如今全球股市继续暴跌，90% 以上的原因在于欧洲。欧洲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质量比美国同行更差，一旦欧洲金融机构受损严重，金融危机将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将欧洲送入衰退——这是欧洲股市之所以领跌世界的原因，也是环球股灾的真正源头。

欧元区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务问题持续发酵。2011 年 8 月 4 日意大利和西班牙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升至 6.19% 和 6.27%。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个已经接受援助的国家经验来看，一旦国债收益率达到 7%，就将要求外部援助。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称意大利具有稳固的经济基础，能够克服债券市场动荡。不过，市场却从负面角度来理解这番表态。投资者认为，意大利政府表态与之前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如出一辙，一旦一个国家反复声称自己信誉良好，说明其已经没有信誉了。欧洲央行已在二级市场上购买葡萄牙和爱尔兰债券，但没有购入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这引发投资者恐慌。

也许，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永恒的繁荣。以能量守恒来看，伴随着虚化的繁荣总是逃脱不了跌入尘埃的落寞。但是，每个国家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才能避免自己在跌倒时死得很惨。

跌声一片：A 股也难独善其身

如果欧洲金融危机是市场担忧所在，全球性股灾将会如此呈现：第一阶段，欧债（南欧）下跌而美债上涨，石油价格下跌而黄金价格上涨，欧元、澳元下跌而美元上涨——而这些现象，的确正在发生；第二阶段则是尚未完全暴露的图景，那就是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中国在 2012 年面临的挑战有可能比 2008 年更加严厉。

美欧“老大哥”再次伤风，全球市场也难免“喷嚏”。虽然市场短期内呈现超卖，但该注意到，更多不利迹象正在悄然滋生。

SMI（瑞士市场指数）一直被视作全球市场的可靠风向标，该指数连日下跌对全球股市是个“警示”信号。自从 2007 年以来，SMI 已经成为反映全球经济和市场状况的可靠领先指标。瑞士股市近期出现 11 年来最长的连续下跌。

跟踪发达国家股票的 MSCI（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世界指数过去一个月累计下跌超过 7%，股市下跌是因为数据显示美国消费支出创近两年最大降幅，制造业、就业等指标也发出疲软信号，投资者担心全球经济复苏可能陷入停滞。

不过，一些机构通过研究历史数据发现，中国股市可能较很多其他市场对美欧危机更具免疫力。彭博资讯统计了雷曼兄弟 2008 年 9 月份倒闭后 6 个月内，中国、印度和韩国等多个亚洲市场基准股指的百分比变化。中国上证综合指数在这段时间上涨了 2.9%，为 10 个主要亚洲股指中唯一上涨的一个。同期，孟买股市下挫 42%，台北股市跌 25%，首尔股市跌 24%。

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我们很难期待 A 股市场独善其身，表现优异。然而，如果横向比较，A 股市场的表现仍然让人有点失望：全球股市反弹时，A 股不温不火；全球股市下跌时，A 股的反应却相当灵敏。

从如今股市的表现看，A 股市场所处宏观经济环境相对平稳，但跌幅与深陷欧债危机的欧洲股市相比，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紧缩措施持续，中国股市也呈区间震荡走势，A 股形势也不容乐观。摩根大通中国策略师李民最近在报告中写道，中国股市短期内出现大幅上扬的火候还未到。该行认为，鉴于通胀前景，中国政府不大可能放松信贷。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将维持货币紧缩政策不变，即使该政策已到达“最大承受点”。

在本轮始自 2010 年 4 月 15 日的凌厉下跌中，A 股市值也迅速蒸发。截至收盘，A 股总市值为 20.3 万亿元，相比上周跌去 11755 亿元。

更重要的是，相比 4 月 15 日 A 股总市值的 25 万亿元，A 股总市值在股指期货推出的近 1 个月中，缩水了近 5 万亿元。而截至去年末上市的 1693 家上市公司，昨日最新的总市值为 19.5 万亿元，相比年初缩水 4.9 万亿元，缩水幅度近两成。

不仅如此，A 股估值水平也自年初以来出现较明显下降。据 WIND（中国金融数据库）资讯统计，全体 A 股整体市盈率水平已降至 20.27 倍，而今年初为 29.49 倍。其中，金融板块整体市盈率已降至 13.5 倍左右，采掘、化工、建筑建材等板块也降至 20 倍以下。

市净率的下降则更加显著。A 股最新整体市净率为 2.62 倍，而年初为 3.77 倍。且市净率最低的黑色金属（钢铁）板块市净率已降至 1.34 倍，建筑建材、金融服务两大板块也仅略高于 2 倍。

A 股的下跌与海外市场不容乐观的前景有密切关系。首先，欧洲债务危机状况延宕多时，愈加病入膏肓。此前有评论家揣测希腊是否将成为下一个雷曼，现在看来，希腊最多只能比肩贝尔斯登，无论是否施之援手尚在两可之间。目前欧债偿付

高峰尚未到来，而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欧元区大国的债务前途才是最终决定时局的节点。其次，美国经济前景堪忧，不仅关乎是否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更在于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党争肥皂剧背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或许已经无可避免。

海外市场不振，如何传导至 A 股市场？渠道之一在于流动性。欧美流动性抽紧，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宽裕局面结束。伴随着全球范围内风险溢水上升，美元汇率震荡见底，资产配置将从风险资产转向安全资产，资金回流美国。

此外，欧债危机在短期内不会得到平息，对 A 股市场也确实构成一定压力。通俗解读欧债危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不救不行，但救起来没个头，就怕最终把好人也拖下水”。如果希腊不是欧元区成员国，那么很可能出现像冰岛那样的“国家破产”，但由于希腊是欧元区成员国，事情就变得更加糟糕。如果希腊政府破产，那么大量持有希腊国债的银行将遭遇重创，甚至不排除会有银行也破产。如果不救希腊，后果是可怕的，但最可怕的是，如果救起来没完没了，会把原本情况尚好的其他欧元区国家的经济拖垮，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虽然这一事件目前尚未发展到这个地步，但全球股市却已经开始作出反应，上一周欧美股市的持续暴跌，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担心。恐慌情绪将继续影响 A 股市场，对 A 股投资者构成沉重的心理压力。

对于外患来说，中国并没有太多的能力来进行抑制，同样也没有权利来进行管制。目前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无论制造业指数、消费者支出还是就业指标等均大幅低于经济发展正常时的平均水平，引发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破净”和“破发”的阵容也在迅速扩大。各种数据显示，在外围情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作为众人眼中“优等生”的上证 A 股似乎并不能承载太多的期望，难以独善其身。

虽然国际股票指数走弱，但 A 股市场也不是“无端”受累。抛却资金面的因素，海外市场不振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显而易见。更进一步审视，A 股的变化也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放缓速度可能高于市场预期。这从本周公布的中国官方 PMI（采购经理指数）可见一斑，2008 年 7 月数值为 50.7，不仅继续低空飞过 50，也创下了两年多来的新低。

金砖四国中的印度股市 2011 年跌幅超过 16%，巴西跌幅超过 26%，而沪深 300 指数截至 8 月 10 日跌幅不到 10%。这部分是因为在 2009 年以来的大幅上扬中，世界许多国家股市反弹至前期高点附近，如德国股市创出历史最高，美国股市离历史高点不到 10% 距离，而沪深股市超过历史高点跌幅 50% 以上。

伴随着民间经济困境、利润增速下滑速度加快、银行业状况进一步恶化等预

期，明年中国经济难言乐观，也会带给股市沉重压力。鉴于来自宏观经济减速、企业盈利增速放慢的压力极其巨大，A股在2011年底或2012年初之前都将承压，寻底将成为主要任务。

面对大跌，各类投资者有各种反映：能够提早清仓，持币观望者自然可以闲庭信步，隔岸观火；能够从容调仓退守防御，自然也值得学习；能够狠心壮士断腕者，固然值得佩服；但在暴跌中看不清形势，且确定此前投资决策没有太大问题的投资者，何妨暂时做回鸵鸟，一动不如一静，等待市场幻象拨云见日，再做决断不迟。

股市依旧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但感觉却完全变了味道，跌停、套牢、反弹、救市成了最熟悉的词汇。应该说，中国股市的暴跌既是对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映，也是对自身泡沫和投资者不良心态的反映。许多股民并不关心上市公司的业绩，不注重长期价值，今天买了股票，明天就想赚钱，股市跌了就等待政府救市，风险意识淡漠，这样并不利于股市的健康发展。

下跌是一连串事件，伴随着A股估值中枢的下移，当前市场唯一悬念，或许就在于下周CPI是否再创新高。即使这一数值很可能揭示通胀见顶的拐点，但对于整体经济而言，比通胀更为严峻的问题可能正在到来。

养老基金对股票市场实行打击

假若你是股市的一名普通投资者，你会慢慢发现，自己是华尔街股票“零和”游戏中的一条“小鱼”，而在你的身边，有各种各样的“大鱼”——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等。这些机构投资者在华尔街的历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构成华尔街这部商业大片中最精彩的部分。所以，你不能忽视养老基金对于股市的影响。

养老基金与我们平时所说的养老金并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在西方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极为盛行的用于支付退休收入的基金，是社会保障基金养老基金的一部分。通俗来说就是退休人员所领取的生活费，就像现在我国离退休人员每月领到的生活费，是属于社会保险中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

养老基金通过发行基金股份或受益凭证，募集社会上的养老保险资金，委托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用于产业投资、证券投资或其他项目的投资，以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养老基金实际上是私人养老制度的产物，本质上属于一种非正式的养老金制度，但是由于美国的养老社会保险覆盖面广、标准较低，所以这种非正式的养老金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补充手段得以流行于美国社会。

2000年,美国各种养老金的总额已经达到了13万亿美元左右。欧盟成员国各种退休金积累总额也已高达数万亿美元。养老基金较大规模投资于股市,主要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养老基金掌握的股票比例,伦敦证券交易所已经达到10%,纽约证券交易所低于10%;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比例都已超过30%。养老基金股票投资比例最高的是香港,达83%,其次是英国达80%。

在美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覆盖了95%的雇员。但是实际上,其提供的养老金却仅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4%,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美国养老基金主要有三大来源:

一是雇主既定收益计划。一般来说,雇主会在信托基金中建立一个基金项目,以赚取收入并支付未来的退休金。雇主享有对委托的机构投资者“用脚投票”的权利,这就对受委托的机构投资者产生了投资收益压力,他们必须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能决策,而且要为决策提供必要的解释。这同时也提高了养老金的安全系数。

二是雇员既定贡献计划。在这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颇受欢迎的“401K计划”。根据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颁布的《国内税收法案》第401K节规定:雇员可以将其一部分税前工资存到一个储蓄计划中,这部分储蓄可累计至退休后使用。到20世纪90年代,“401K计划”的资产规模较之80年代翻了两番,在养老基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到20世纪末,参加“401K计划”的美国人超过了4000万,共积累养老基金1.7万亿美元。

三是公共雇员的养老基金。这些养老基金主要是为地方政府雇员或事业单位雇员所设立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共雇员退休基金系统。该退休基金由其投资委员会(专业投资机构)进行全权管理,为其成员谋取长期的经济利益,同时不为其他的政策目标和利益集团所干扰。

20世纪50年代养老基金进入美国股市以后,机构投资者的规模呈直线式上升,其在股市中的控股比例高达34%,而到了90年代则又升至48%,几乎掌握了股市中一半的财富。其中,养老基金的地位尤为引人注目。养老基金在整个机构投资者中所占的比例近50%,其投资在股市中的资产占总市值的20%以上,成为美国股市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大机构投资者。

据有关数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养老基金投资于股市的总市值为8682亿美元;而到90年代末,其在股市中的资产规模就迅速增加到2万多亿美元,在仅仅10年的时间内价值增长了2倍多。

如此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到股市中,不可能不产生震动性的影响。

资金规模巨大的养老基金对股市的影响与普通个体投资者的影响方式差别很大。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他们是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如果企业经营不善导致股票不再值得持有，那么该投资者将会抛售股票，当市场中的大量投资者都因为企业业绩不佳而选择抛售时，公司股票的价格将下跌，企业这时就容易成为被收购兼并的对象。因此，个体投资者的投资选择给了上市公司提高生产管理能力、增加企业价值的潜在压力。在这样的条件下，公司与股市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而对于资产数额庞大的养老基金来说，它们若大量地持有某支股票，则很难在不影响股票价格的条件下顺利地将股票抛售出去。因此，养老基金大多数时候对于股市的影响建立在更强的控制权之上。

在 20 世纪，养老基金曾迫使通用电气公司、柯达公司等大型上市公司更换其不称职的高级管理人员。

加利福尼亚公共雇员退休基金，控制着价值约为 4950 亿美元的公司股票，相当于全部上市公司股票价值的 8.4%，是全美最大的机构投资人之一，对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能够产生明显的影响。该基金每年都发布业绩差的公司名单，强迫有关公司改组董事会或撤换经理人员。

由此可以看出养老基金在上市公司业绩改进方面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养老基金在股市中的影响力已不再是买卖股票所带来的股价升降这个较浅的层次，而是深入到上市公司内部管理的根本层面了。

此外，养老基金具有资金来源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质，而且其资本转换的速率快、质量高，这使得它为股市提供了企业发展所需的优质资金，带动了资本市场的繁荣。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需要市场参与者对市场有足够的信心，而养老基金这种优质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是提高投资者信心的必要保证，也是推动企业投资行为的动力之一。这种促进作用表现在股市上，就是股市的进一步繁荣。

但是，养老基金也可能使股市动荡不堪。由于公司财务欺诈，美国退休基金公司股票收益大幅缩水，甚至是“颗粒无收”。这里的财务欺诈主要是指公司把巨额亏损隐藏不报，甚至把多年的亏损报为赢利，从而造成该公司股票价格不断攀升，但是最终一旦暴露，股价就倾泻不止。

安然公司破产给退休基金投资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安然公司的股票价格曾经达到 90 美元。2001 年 10 月 16 日，安然公司公布称，第二财季亏损达到 6.38 亿美元。该公司还称，由于安然财务总监安德鲁·法斯托运营的合资企业出现问题，安然公司股东持有的该企业股票市值缩减 12 亿美元。2001 年 1 月 2 日，安然公司宣布正式申请破产。安然股票在 2001 年 1 月 25 日还高达 81.39 美元，破产之

后，到2002年3月10日，只剩24美分。

这也为美国的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资本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养老金入市也不例外。养老金入市后虽然具有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但是绝对不能把这个作用估计得过高。当股市形势出现重大危机时，养老金应该及早地撤出来。如果让这部分肩负养老重任的基金去救市，其它资金“胜利大逃亡”，那才是最下之策。

救市效应：能否推动股市短暂上行

股市如同一面镜子昭示出各国经济的兴衰起伏。华尔街巨头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向法庭提交破产保护申请。利空消息就使得全球主要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

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5204.2点，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12.5点，跌幅达3.9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15日下跌2.74%，报收6064.16点。巴黎CAC40股指大幅低开后放量下跌，全天报收4168.97点，较前一交易日下挫3.78%。此前已受累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和外国资本流出的俄罗斯股市15日再次重挫。MICEX指数暴跌6.2%，RTS指数下挫4.8%。

美国股市周一大幅低开，随后一路下滑。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504.48点，跌幅4.4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挫4.71%，为911恐怖袭击后股市重开当日以来最大跌幅；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3.6%。

日本、韩国等亚洲主要股市则因节假日休市一天，暂时避过风头。

当下，惨烈的股市行情显示：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仍在以不可抵挡之势向全球蔓延开来。股市的连绵下跌，让悲观情绪在投资者当中不断蔓延。有投资者表示，割肉也要退市，不再打新股，不给股市“圈钱”机会；有入市10多年的老股民声称，入市以来亏损100多万元，最近清空了所有股票；还有很多坚守多年的“基民”放弃了长期投资理念，不惜亏损也要求将基金赎回。

如何重振市场的信心？有投资者希望政策“出手”救市。

救市的主体多为各国政府，既有曾经显赫一时的欧盟，有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众多新兴发展中国家。

最先发挥作用的还是各国的央行机构。欧洲各大银行在2008年9月15日当天即纷纷宣布向市场注入短期流动性。

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宣布以4.25%的利率向市场投放300亿欧元（约合430亿美元）“一日资金”，结果收到51份总额903亿欧元的应标书，足见各银行对资金的渴求多么迫切。

英格兰央行宣布额外拍卖最高 50 亿英镑（90 亿美元）票据，结果竟收到总额 241 亿英镑的应标书。

瑞士央行也宣布，将以 1.9% 的隔夜利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瑞士央行没有透露具体“供血量”，但表示将以一种“慷慨而灵活的方式”提供资金。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可能暴露美国、欧洲等地其他银行的风险，各国央行的注资行动旨在减少股票市场动荡。

随着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各国政府和央行的救市步伐也在明显加快。2011 年 9 月 8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抛出了规模达 4470 亿美元的就业促进方案；同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承诺将“竭尽所能”拉动经济增长。如此的高调“救市”姿态，引发了市场对于经济可能很快走出谷底的预期和猜测。

不仅是美国，近期全球各国央行都发出了集体维稳信号。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突生变数，从欧洲、加拿大到亚洲的 10 多家央行本周都不约而同地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并暗示将推迟紧缩甚至在必要时加大宽松政策力度。

美国就业促进法案的提出，是一项极具针对性的经济刺激措施。如果白宫和国会能够协力尽快通过并完善这一法案，美国经济可望迎来昭示新一轮快速发展的“卫星时刻”。不过奥巴马也提醒说，该方案仍可能面临在国会受阻的风险。

从股市的反应看，投资人似乎还不敢确信各国政府和央行的救市承诺能立竿见影地产生实际效果。亚太股市多数下跌，欧洲三大股市开盘后都下跌 1% 左右。美国标准普尔 500 指数期货盘前小幅波动。

2011 年 12 月，美联储宣布与欧洲央行等五大央行达成协议，下调美元流动性互换利率，向市场注入美元流动性，以避免欧元区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该消息刺激纽约股市大幅上涨。11 月份美国失业率下降至 8.6% 的利好也为市场注入上涨动力。受市场整体大幅上涨带动，中国概念股本周呈现强劲上扬走势，CHXN（纳斯达克中国指数）2 日报收于 162.85 点，全周上涨 8.5%。

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一直都在关注和期待中国如何救市。很多人将这一期待寄托在华盛顿召开的全球金融峰会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国务院在 2008 年 9 日出台了扩大内需 10 项措施，宣布将投资 4 万亿元人民币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外界舆论在评价 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时，丝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这也足以证明这项计划给全世界带来的震撼。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港台地区的媒体都对这条不同寻常的重大消息进行了报道。

在目前的全球危机中，中国近 600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所产生的影响将远远超越国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将帮助全球经

济度过金融危机，它不仅将在鼓励需求方面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还对中国经济自身有着许多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促进了股市的短时间快速回升。

在中国宣布这项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之后，全球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 10 日大涨。中国大陆股市上涨 7.3%，创 7 周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国企指数上涨 9.1%，而大规模支出计划的最大可能受益者之一的中国铁建上涨了 20.2%。东京日经 225 平均指数上涨 5.8%。巴西、智利和墨西哥股市也因中国出台支出计划的消息而急剧上涨。

然而在“印花税”这张重量级大牌已经甩出去后，管理层手中还有多少张牌可以出呢？而这些政策牌是否真正能起到“救市”效果呢？

虽然价格管制的出台将直接对一些上市公司起到利好提振作用，但从我国通胀高企难下的背景来看，要在奥运会前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考虑到越南等周边国家通胀压力不断增大，并造成了经济动荡，加之震灾后物价潜在的上行风险，国内宏观调控的政策还难以改变，加上限价政策使得部分企业难以向下游传导成本上升的压力，这会继续压抑上市公司业绩的增长，从而造成市场估值中枢继续下行。

多数救市政策的宣布都或多或少起到了提振经济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股市大盘的小幅反弹。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这种的救市效用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将全球经济拖出危机的泥沼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只有当经济真正恢复良好，股市才能够实现探底，进一步长时间的回升。

此外，对于当前市场而言，投资者信心的缺失，不仅是来自市场的下跌，也来自对市场一些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质疑。

公平、公正是股市发展的基本要求。如果对市场的公平性产生怀疑，投资者信心所受到的伤害也会越深、越持久。虽然在股市下跌时，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更加强烈，但即使股市出现上涨，这些问题并不能相应化解。因此，要重振股市的信心，需要的不仅仅是几个“救市”政策，更为迫切的是完善的制度、公平的规则。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信心，才能更强大持久。



悄然上演的黄金储备战

金本位制：金本位统治下的黄金世界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意在自救的经济政策，通过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严重损害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利益。美元内在价值的萎缩使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安全性、公平性和稳定性引起质疑和担忧。

于是，人们怀念起“黄金的年代”。1880 ~ 1913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政府承诺将各自的主权货币币值与黄金挂钩，并保证以固定的本国货币计价价格自由兑换黄金。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建立在各主权国家国内货币体系普遍实施的基础之上。

自从罗马帝国以来，文明世界第一次实现了货币的统一。商业和金融的统一，不是通过军事或者是乌托邦似的梦想实现的。金本位制作为唯一合理的货币体系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可。

金本位即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铸币平价来决定。金本位制于 19 世纪中期开始盛行。在历史上，曾有过三种形式的金本位制：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其中金币本位制是最典型的形式，就狭义来说，金本位制即指该种货币制度。

人们将金本位制看做历史上最伟大、最有益的改变。在资本主义时期，金本位制是各国的通货标准。这一制度可以增加财富、自由以及政治和经济上的民主。在自由贸易者眼中，它可以满足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资金市场交易所需的国际标准，

它是一种交换媒介，通过这种方式，西方工业主义和西方资本将西方文明传递到地球上最遥远的地区，摧毁了所到之处存在的具有旧社会色彩的偏见和迷信，播撒了新的生命和幸福的种子，解放了思想和灵魂，创造了从来没有的财富。

西方自由主义随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为各国联合起来形成共同体提供了条件，各国可以在这个共同体中和平地开展合作。

1834 ~ 1862 年，以及 1879 ~ 1913 年，这两段时期内美国实行古典金本位制，此间的价格极其稳定，美国的消费物价在 26% 的范围内浮动，在这 62 年内的开始阶段和末尾阶段，消费物价基本持平。在 1800 年，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达到 102.2，这一数字在 1913 年又下降到 80.7。1879 ~ 1913 年，美国 and 许多国家享有相同的金本位制。在这 34 年内，美国消费物价的浮动仅为 17%，平均的通货膨胀接近 0，平均每年的物价浮动是 1.3 %。

这一数字与不同时期的不同价格回旋有显著的差异，“一战”期间和“一战”之后的平均价格回调达 6.2%，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段时间的平均价格达 5.6%，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这个时期的平均价格回调是 6%。

在金本位制下，各主权国家的纸货币供给数量和增长率都严格受本国货币当局黄金储备的制约，国内价格水平受到严格控制，非常容易发行的时期最重要的货币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在股票和证券，这一稳定性非常有利于工业化。货币稳定尤其有利于债券的发行，并且利息很低。

在古典金本位制下，金融工具和市场才能令所有人满意，债权人、股东、债务人，最重要的是存款人都能从中受益。只有执行诚实的货币政策，货币面额等同于实际价值，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运行状态才能达到最佳。在货币不可兑换的体制下，市场容易转变成赌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目前的市场行为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只有当国内黄金产量或储备短期内急剧变化时，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才会有较大波动。由此，与黄金挂钩的各国货币间的汇率是固定的，通过黄金流入、流出，协调平衡各国国际收支的差额，最终导致各国国内价格水平的一致变动。在纯粹的金本位制下，各国的储备资产只有黄金，因此不必担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影响本国储备资产的价值损益。但是，所有参加金本位的国家都必须在实质上放弃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权利，承诺资本（黄金）的自由流动以换取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与各国货币保持稳定汇率的利益。

历史经验表明，实施金本位制可以长期保持较低的通胀，维持国内价格水平稳定。金本位制下，只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摧毁经济活动或新金矿被开采，才可能导

致一段时间的高通胀。根据大学波铎教授测算，美国在 1880 ~ 1914 年纯粹金本位制下的年平均通胀率只有 0.1%。美联储明尼阿波利斯分行两位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实施金（银）本位制的经济体的年通胀率平均只有 1.75%，而同期那些实行不可兑换纸币制的经济体，年通胀率平均高达 9.17%。

《货币炼金术》的作者刘易斯就十分偏爱黄金，在他的眼里“黄金是唯一有真实价值的货币，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人类抛弃了很多货币，而最终选定了黄金”。刘易斯认为，“软通货不是行之有效的货币制度，硬通货是唯一的出路，最好的货币制度是将货币盯住金本位的制度”。

怀念这段“黄金的年代”的还有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哈佛大学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巴罗，以及目前炙手可热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罗恩·保罗等。

其实，人们偏爱黄金只是相信以黄金为后盾的货币更稳定。因为货币当局没有办法印刷更多的纸币，也没有办法制造一场通货膨胀，从而从百姓手中盗取铸币税。

每当世界经济经历扩张—通胀—衰退的轮回后，特别是此次世界经济危机后，要求回到“黄金的时代”的呼声甚高。上一次认真研究重回金本位制的可能性，是经历整个 1970 年代高通胀和低增长的里根总统，尽管最终这一提议被否决。

毋庸置疑，重返金本位制确实面临重重困难。比如，国际黄金储量不足以支撑当前全球经济贸易投资的需求。但是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要求所有国际贸易都用黄金收支结算。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完全可由各国货币结算。还有恢复实行金本位制将额外产生的大笔交易成本和各国货币汇率重估发生的价值损益等都是棘手的问题。

如果黄金做本位币的话，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全球将面临通缩的风险。因为黄金实物数量有限，若用黄金做本位币，将出现货币不够用的情况。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金本位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创造信用，而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特别从 19 世纪开始随着工业革命产生，生产力不断发展，而且超越了国界，更注重信用经济，于是有了现代银行制度，所以金本位退出历史舞台有其必然性。

黄金博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财富角逐

黄金的意义，对个人来说是财富，对国家来说则是搅动世界的力量和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了许多争论和困惑，甚至在战后 50 多年，这些争论仍在继续。然而，其中最经常被人提及的还是与黄金相关。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黄金成为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个人和公司被禁止在世界各地进行黄金贸易。同时，因为其他国家购买军事装备时支付黄金，所以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不断增加。黄金在黑市的价格也暴涨，在南美、北美和欧洲的人们普遍收藏金币。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从犹太人手中抢走金、银、首饰和钱币，洗劫住宅，取走存折，连死者口中的金牙都拔走。如果想对纳粹所掠夺的财富价值做一个估测，可以用“二战”时纳粹贸易伙伴国的黄金储量作为参考。在战争期间，一些国家在中立国的保护伞下与纳粹继续进行贸易往来。

中立国从纳粹方面接受好处的另一个证据是来自瑞士各银行向瑞士财政部申报的总账。它从1941年的3.32亿美元猛增至1945年的8.46亿美元。其中至少有5亿美元来自纳粹德国。

“二战”期间瑞士曾经接收了价值4.4亿美元的纳粹黄金，其中3.16亿是纳粹从别国掠夺的。另外还有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从德国国家银行转到了两家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意志银行。这批黄金随后被卖到土耳其以换取外汇。另有超过3亿美元的黄金通过瑞士的中转，分别流入了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

考虑到南美在战后是纳粹残余分子的主要避难所，这些国家尤其是阿根廷黄金储量的变化也很说明问题。阿根廷的黄金储量从1940年的313.83吨增长到1945年的1064吨，增加了6.35亿美元。同样，巴西的黄金储量从1940年的45吨增长到1945年的314吨，价值为2.66亿美元。

据MEW（英国战时经济部）评估，默克斯的黄金宝藏仅占德国全部黄金的20%。根据1945年8月英格兰银行的估计，被占领国最多能从德国索回58%的被掠黄金。这还仅仅是中央银行的索赔，不包括私人的黄金。其余的被掠黄金在何处？

纳粹黄金在战争中战后被重新分配了，主要流向有：

- (1) 战争中纳粹用于购买武器和战略物资；
- (2) 战争后期被纳粹军官瓜分一部分；
- (3) 被纳粹分子藏匿，至今尚未发现（包括秘密银行账户和藏宝窟）；
- (4) 被盟军缴获，作为战争赔偿和战利品；
- (5) 现在仍有一部分被用于纳粹复兴。

但是从二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看，大部分的黄金都进入了美国的口袋。二战结束时美国如果没有75%的世界黄金储备，就统治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也不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虽然后来美元与黄金在形式上脱钩，成为真正力量

无穷的统治地球的工具，但黄金仍是可以威胁美元的重要“武器”。

1945年4月，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军，曾在德国图林根地区哥达镇西南的默克斯盐矿内，发现了一个天方夜谭般的宝库，宝库里面的景象难以用语言形容：一个有照明的、宽23米、长45米的密室内，有大量纳粹掠夺来的艺术珍品和多达100吨的纳粹黄金。有超过7000个作了标记的袋子，高度齐膝，足足码了20排，每排间距大约是1米。房间另一边有成捆的现钞，每捆的标签上都印有“梅尔默”的字样。这些箱子明显属于纳粹党卫军的化名账户。这是关于纳粹在欧洲所掠夺财富范围的首条线索。

据统计，宝库内包括8198块金锭；55箱金砖（每箱2条，每条重10公斤）；数百袋黄金器皿和制品；超过1300袋的金马克、金法郎和金英镑；来自15个其他国家的数百袋金银币；9袋珍稀的古代金币；德国马克现金；20块各重200公斤的银锭；银条、银盘子；1袋白金（内有6块白金锭）；还有从不同国家掠夺的110袋钻石和珠宝。

巴顿将军的发现还只是冰山一角。从盟国在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刻起，纳粹德国的三号人物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就知道纳粹必将战败。他花了9个月的时间来布置纳粹流动资产的出逃计划。

除了通过银行进行财产转移，纳粹党及其工业巨头还在中立国购买了750家企业。这些企业遍布全球，领域宽广，从钢铁、化工、电气到食品、制药、纺织，无所不包。企业分布如下：瑞士234家、瑞典233家、西班牙112家、阿根廷98家、葡萄牙58家、土耳其35家。

为了防止纳粹通过银行洗钱，将自己的掠夺合法化。美国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1940年4月10日由罗斯福签署的第8389号总统令。该令首先冻结挪威与荷兰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随后是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也包括中国和日本的财产。1942年7月，美国还颁布了一个黑名单。任何上了这份名单的个人或公司，其在美国的一切贸易活动都会被禁止。他们被认为对美国的国防造成威胁。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份名单上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增至数千人。

1943年5月，盟国发布了《伦敦宣言》。该宣言声明，盟国将不再承认被占领国家的任何资产转移为合法。因为盟国已经意识到纳粹正在以武力强迫被占领国的国民将他们的财产以买卖或者转让的方式转给他们。

1944年2月22日，美国发表了《黄金买卖声明》，宣布美国将不再承认任何涉及轴心国掠夺的黄金的交易。美国进一步表示，将不会再从任何一个未与轴心国断绝关系的国家购买黄金。英国和苏联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主导下，盟国于 1944 年 7 月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要求中立国家禁止任何被占领国的资产的安置或转移。8 月 14 日，英、美与瑞士签署了战时贸易协定，要求瑞士减少与纳粹的贸易往来。12 月 6 日，“安全港计划”出台。这份计划主要就是针对纳粹的资本而制定的。

虽然美国政府在世界上正为最大限度地防止纳粹资本的外流而努力，却并没有阻挡住纳粹资本进入美国本土企业。

根据美国国会的调查，美孚石油公司一直和德国公司尤其是法本化学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欧洲战争爆发后，法本曾紧急转让给美孚 2000 多项外国专利。以哈里·杜鲁门为首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 1941 年提出了一份报告，指控美孚石油公司不仅不顾国务院抗议、继续向轴心国出售燃料，而且还向德国公司提供其他大量战略物资，并秘密吸收德国资本。纳粹这项收购美国企业的计划之所以获得成功，某种程度上还要归功于美国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惧怕。

在 1949 年，美国财政部拥有 246 亿美元的黄金（以每盎司 35 美元计算），此时美国黄金的影响力处在高峰期，自从那时起，美元不断遭到破坏，预算和国际收支赤字似乎没有尽头，这一切说明政治家，尤其是他们聘用的不称职的货币经理人，不能留住这些黄金和其重要的影响力——黄金可以阻止通货膨胀的美元进一步贬值。

黄金价格产生机制：五大行聚首“黄金屋”

黄金长久以来一直是一种投资工具。它价值高，并且是一种独立的资源，不受限于任何国家或贸易市场，它与公司或政府也没有牵连。因此，投资黄金通常可以帮助投资者避免经济环境中可能会发生的问题。黄金投资意味着投资于金条、金币，甚至金饰品。投资市场中存在着众多不同种类的黄金账户。

黄金市场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在黄金市场上人们可以投资买卖金币和金条、珠宝、期货和期权、交易所买卖基金，甚至黄金证。与众多其它物品交易相比，黄金交易不但快而且价差低。伦敦和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黄金交易市场所在地。黄金市场的运作与其它投资市场以及股票市场类似。买卖每天都在进行，而价格受市场内经济条件的影响。

伦敦黄金市场历史悠久。早在 19 世纪初，伦敦就是世界黄金精炼、销售和交换的中心。1919 年，伦敦黄金市场开始实行日定价制度，每日两次，该价格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黄金价格，一直影响到纽约以及香港黄金市场的交易。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黄金市场价格均以伦敦金价为标准，再根据各自的供需情况

而上下波动。同时伦敦金价亦是许多涉及黄金交易合约的基准价格。

1919年9月12日，伦敦五大金行的代表首次聚会“黄金屋”——一间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的洛希尔公司总部的办公室，开始制定伦敦黄金市场每天的黄金价格。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五大金行每天制定两次金价，分别为上午10时30分和下午3时。由洛希尔公司作为定价主持人，一般在定价之前，市场交易停止片刻。此时各金商先暂停报价，由洛希尔公司的首席代表根据前一天晚上的伦敦市场收盘之后的纽约黄金市场价格以及当天早上的香港黄金市场价格定出一个适当的开盘价。

伦敦金价所以重要，与伦敦黄金市场在世界黄金交易中的核心地位密不可分。伦敦垄断了世界最大产金国——南非的全部黄金销售，使得世界黄金市场的大部分黄金供给均通过伦敦金市进行交易。

伦敦黄金市场上的五大金商在国际上也是声誉显著，与世界上许多金矿、金商等拥有广泛的联系；五大金商有许多的下属公司，下属公司又与许多商店和黄金顾客联系，这个范围不仅涉及伦敦黄金市场，而且扩展到整个世界，加上在定价过程中，金商提供给客户的是单一交易价，没有买卖差价，价格比较合理，所以许多人喜欢在定价时进行交易。

全球的黄金市场主要分布在欧、亚、北美三个区域。欧洲以伦敦、苏黎世黄金市场为代表；亚洲主要以中国香港为代表；北美主要以纽约、芝加哥和加拿大的温尼伯为代表。全球各大金市的交易时间，以伦敦时间为准，形成伦敦、纽约（芝加哥）连续不停的黄金交易，伦敦每天上午10:30的早盘定价揭开金市的序幕。纽约、芝加哥等先后开叫，当伦敦下午定价后，纽约等仍在交易中，此后香港也加入进来。伦敦的尾市会影响美国的早市价格，而美国的尾市会影响到香港的开盘价，而香港的尾市价和美国的收盘价又会影响到伦敦的开市价，如此循环。

目前世界上黄金价格主要有三种类型：市场价格、生产价格和准官方价格。其他各类黄金价格均由此派生。

市场价格包括现货和期货价格。这两种价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两种价格都受供需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干扰，变化大，而且价格确定机制十分复杂。

生产价格是根据生产成本建立一个固定在市场价格上面的明显稳定的价格基础。以现在的汇价估算，黄金开采平均总成本大约略低于每盎司260美元（1986年，南非黄金生产成本约为每盎司258美元）。实际上，随着技术的进步，找矿、开采、提炼等的费用一直在降低，黄金开采成本呈下降趋势。

准官方价格是被中央银行用作与官方黄金进行有关活动而采用的一种价格。世

界各国中央银行官方总储备量（各国中央银行往往是各国黄金的最大持有者）1998年大约为 34000 吨。按目前生产能力计算，这相当于 13 年的世界黄金矿产量，并且占已开采的全部黄金存量 137400 吨的 24.7%，这是确定准官方金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香港黄金市场等黄金市场的建立，全世界黄金市场已经连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交易 24 小时不断。由于受外部因素影响，世界市场上的黄金价格经常剧烈变动。只有中、长期的平均价格，因其中和了各种投机因素，才是一个比较客观反映黄金受供求影响的市场价格。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1976 ~ 1980 年间的 45 次黄金拍卖中，实现平均价格 228.56 美元 / 盎司，该价格非常接近伦敦黄金定价市场在同一时期的平均值。

市场条件在不断变化，然而黄金一直保持着它的购买力。就其相较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来看，黄金的价值一直很坚挺。相比黄金，其他货币随着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其购买力却在下降。

在刚刚过去的 40 年里，自由市场并不存在。在 20 世纪 60 年代，黄金市场受到压制金价的黄金总库的控制，而黄金总库听从美国财政部的命令。在那时，黄金价格完美地发挥着货币温度计的作用，它发出美元危机即将来临的信号。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财政部和 IMF 尝试利用拍卖活动控制黄金价格。不过，所有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由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于 1934 年规定的每盎司 35 美元的固定金价，在 70 年代却攀升到每盎司 850 美元。从 1981 年开始，黄金开始进入熊市，但是由于政府不时动用“看得见的手”，以及中央银行开展抛售黄金的活动，所以对金价的压制仍在继续。

20 世纪 60 ~ 70 年代的干预都失败了，鉴于这些失败经历，一般人原以为美国不会再触及它囤积的黄金，当时黄金的囤积数量已经缩减到大约 8100 吨。大家都觉得美国人更愿意让欧洲人卖掉黄金。

德累斯顿银行带来的金市震动

1971 年，在损失了大量黄金储备后，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1973 年，因美元大幅贬值的诱导，再次引发了欧洲各国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浪潮。

1975 ~ 1976 年间，高通胀率引发了美国和其他国家严重的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破产风潮是当时最突出的世界经济景象。为了平抑市场对黄金的投机需求，美国财政部宣布拍卖部分黄金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同出此举，并且要求成员国

“使用特别提款权”，作为记账单位，取代原先使用的黄金。当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黄金进入市场销售时，黄金市场价格创出了低价——102 美元 / 盎司。

就在美国财政部宣布进行第一次黄金拍卖的同时，美国人获准赎回罗斯福在任时期上交的黄金。那时的美国财政部仍然认为，美元比黄金牢固。

1974 年 12 月，在美国公众被准许以任何形式购买黄金的前几天，美国当局掀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卖空浪潮。由于美国政府害怕失去更多的黄金，所以 1971 年尼克松总统在任时黄金窗口遭到关闭，而当局现在担心的是黄金价格继续上涨，从而造成美元信用的进一步降低。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成员国的援助下，美国从 1975 年开始在世界黄金市场上发起了一场“卖空潮”，这场运动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均创下了纪录，根本目的在于说服世界主要国家的公众相信纸币强于黄金，这场运动的成功开展将确保过度发行纸币造成的通货膨胀局面可以无限期地继续存在。

1979 年上半年，黄金价格引人注目地涨过了 360 美元 / 盎司，但随后的超越众人想像力的黄金暴涨令世人目瞪口呆。1979 年夏季，世界通货膨胀情况迅速恶化，美国政府的债务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 1970 年的 4000 亿美元，经过 9 年时间翻了一番后继续增长，接近 1 万亿美元。

1979 年下半年，黄金价格不断刷新一个个百元整数单位，400 美元 / 盎司、500 美元 / 盎司、600 美元 / 盎司、700 美元 / 盎司，一个个令人炫目的、以前市场各方都不敢想像的价格被市场力量迅速创造着。

欧洲，从技术层面讲至少可能买到实金，购买黄金很难。很多国家实施繁重的增值税，这导致本来有心购买黄金的人因此放弃了购买念头。在美国购买实金也不容易，美国政府设立了太多障碍，迫使数百万想要购买黄金的人放弃了采购计划。

所有这些的努力都意在使公众相信黄金是“野蛮的遗迹”，人类利用才智创造了一种新的“合理的”货币体系，所以黄金已经过时了。很多欧洲人在这时也被洗脑了，他们再次相信美元的效力，跃跃欲试。

1975 年 1 月，首次黄金拍卖活动得到举办，200 万盎司的黄金在活动上被销售。同年 6 月举行了第二次黄金拍卖活动，共售出 50 万盎司的黄金。

1975 年 8 月，10 个主要工业国家组成的十国集团和瑞士共同决定，为了使黄金进一步失去货币的资格，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增加官方黄金储备，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黄金储量将减少 5000 万盎司，其中的 2500 万盎司应在 4 年的时间内售出。1976 年 6 月 2 日举行了第一次拍卖黄金活动，1980 年 5 月 7 日举行了最后一次拍卖，最后由德累斯顿银行获得了拍卖会的所有黄金。

德国德累斯顿银行出价购买美国财政部在 1979 年 8 月拍卖会上出售的所有黄金时，金价突破每盎司 400 美元的大关，该行的行动就像是引爆了一枚炸弹，随后黄金牛市进入狂躁阶段。

1980 年 1 月，当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事件发生后，黄金价格被推上了当时有史以来的历史最高价：852 美元 / 盎司。公众开始对政府处理货币的措施有所担心，他们经过很多年才醒悟过来，当他们最终醒悟时，已经没有力量可以阻挡黄金前进的势头了。

德累斯顿银行顺利购得美国所持黄金，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束。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黄金被强权政府所霸占和压迫控制下的世界货币制度，是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控制和束缚了黄金，美元想完全取代黄金地位的一种货币体系制度。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实际上是美元这种独霸企图的崩溃，黄金由此摆脱了美元的控制。黄金价格从当时官方固定兑换价格 35 美元 / 盎司，一直上涨到 852 美元 / 盎司，期间只用了不到 10 年的时间，总体涨幅高达 24 倍之多。

真实的情况是投资黄金，最重要的是判断黄金的价格走势。黄金市场的开放程度介于外汇和股票之间，投资者必须关注国际与国内金融市场两方面对金价的影响，尤其是美元汇率变动以及开放中的国内黄金市场对黄金政策的变革性规定。

在全球经济前景黯淡，股票、房产以及大宗商品等资产都出现了大幅度的缩水，经济前景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黄金以其良好的抗风险能力备受投资者的青睐。黄金市场从 2001 年开始的超长期牛市依然在延续。

20 世纪 70 年代黄金牛市的结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股票市场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开始进入长时间的牛市，导致很多股票估价过高，这种情况没有持续下去，后来得到调整。

自 1879 年起，美国就采用了金本位制，从那时至今，几经改变。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大众普遍接受一个事实，即美国必须脱离金本位制。

1933 年大萧条的影响还没有消散，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布了多条对黄金的限制性规定，包括禁止银行出售或出口黄金。罗斯福政府还增加了黄金的供应量，以使货币供应膨胀。1933 年 4 月，罗斯福下令上缴全部的金币和面值在 100 美元以上的金券，还以每盎司 20.67 美元的价格收取民众手里的黄金。

1934 年，政府金价涨至每盎司 35 美元——这一价格一直保持到 1971 年 8 月 15 日；这一天，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不再以特定的比例兑换黄金，这一举措完全取

消了金本位制。1974 年，福特总统通过法律允许美国人拥有黄金。

这些货币政策的改变使得之前一直处于掌控中的金价，突然之间可以自由浮动。投资者和投机商因而能自由接触并拥有黄金。其实，不管是哪种商品，只要其价格由长期人为地压低突然间变得可以自由浮动，那么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明显出现一个方向上的快速攀升甚至出现峰值。

劳动力逐渐成熟，涌现了一大批白领员工，他们纷纷成为薪酬更高的管理层。此时的黄金需求极大提高。然而，特别就黄金而言，需求被极大地压抑了，尤其是投资者对于黄金的需求。当金价能自由浮动时，供求关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推动市场发展；而当市场不断向前发展时，自然而然会有投机商闻风而来。所有这些因素——扩大的货币供应、通货膨胀以及急于买卖黄金的投机商——都到位了，泡沫即将成型。

此时市场中的黄金价格从人为操纵的低价迅速攀升，因为远低于均衡价的固定价格大大抑制了需求。此外，固定金价与供求关系隔离，也就是说无法与市场同步。与此同时，一些非美国籍的投资者却能以更灵活的价格来买卖黄金。

随着黄金价格的不断走高，人们翻箱倒柜地寻找可以出售的黄金。不管是爷爷的手表还是奶奶的戒指，都被从抽屉里、从纪念品盒子里翻出来。无论成色多少，14K、18K 还是 24K 的，只要是黄金，就能兑换成现金，大赚一笔。黄金投机潮推动了牛市的发展，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当时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的情况下，黄金被当做对冲。此外，黄金还成为投资宠儿，而美元急剧下挫。黄金价格攀升到了（当时）无法置信的高位，两天内上涨 50 美元，达到每盎司 447 美元之多，当周金价以每盎司 385 美元收盘。

《时代》杂志引用一位纽约黄金市场交易员的话说：“市场疯了。”

在通胀的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世界似乎处于灾难的边缘，未来的经济形势很不确定。如果世界恢复金本位制，那么当时的一切都不会发生。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它带来了各种危机和战争。这就是放弃稳定的货币——黄金的结果。

1962 年春发生了第一场调整风暴，实际在 1961 年秋季已经出现了密布的乌云，当时一些股票的价位已经达到极其荒唐的高位。1962 年春天，熊市来临，5 月 20 日，股市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急剧下挫，很多股票价格跌到 1961 年 12 月股价的一半，当天正是星期二，也因此被称为“黑色星期二”。

至 1973 年因美元大幅贬值的诱导，再次引发了欧洲各国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浪潮。这个市场浪潮导致西欧和日本外汇市场不得不关闭了 17 天。经过各国之间的紧急磋商最后达成协议，西方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同时黄金涨过

100 美元 / 盎司大关，是原来官方所规定兑换价格的 3 倍。

有分量的银行家甚至都认为，这次 20 世纪 70 年代的股灾不亚于 1929 年崩盘带来的后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整体局势仍然完好，过高的股价得到调整和纠正。从那以后，市场逐渐恢复，发展势头强劲，道琼斯指数在 1966 年创下新高，即 1000 点，同年 10 月仅回落到 744 点。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 10 年间，美国政府、财政部和美联储试图击败黄金，这场不必要的战争打起来是很艰苦的，将来总有一天历史书会对这场战争带来的损害进行描述，不过，战争的结局是以黄金的胜利告终。

美国不应该把黄金当做灾难性的金属去对抗，不惜一切代价地将它踢出货币体系，而应该研究如何利用黄金进一步扩大它的利益。美国政策制定者似乎应该将精力放在如何充分利用黄金上，而不是浪费更多的时间与之对抗，好像它是必须要摘掉的恶性货币肿瘤。

在黄金生产国中，美国的重要性位居第二，黄金开采业的繁荣显然对美国有利，也有利于其他很多行业和经济整体局势的发展，当然其他黄金开采国甚至整个世界也会从兴旺的黄金开采业中受益。

后来股票市场真的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局面。股票市场分析师和操盘手鲍勃·威尔逊认为，当时的股票市场与 1929 年的华尔街很相似。不久后，1969 年股票市场急剧下挫，1969 年春季的道琼斯指数下跌到 631 点，后来仅仅恢复到 1000 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熊市，1974 年 12 月，道指跌到 577 点。考虑到通胀率不断增加，股票市场的情况更糟，没有人认为当时发生的一切可能与黄金危机有关。在很多接受凯恩斯理论的圈子中盛行着反黄金的宣传。他们认为，黄金只是由 4 个字母组成的一个单词而已，黄金牛市彻底结束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黄金生产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市场对黄金需求量很大，在黄金首饰和具有投资价值的黄金产品方面表现更为明显，这种需求吸收了这段时期创新高的产量，从而稳定了黄金价格。在这段时间，瑞士投资组合经理人着手销售其客户持有的黄金，直到其客户几乎售尽所投资的黄金为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市场对黄金的需求，对于稳定物价起到的作用更为显著。但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媒体却在不断宣扬黄金已经失去通货资格的舆论。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德国和日本等国家迎头赶上，美国失去工业大国的地位，

外贸出现了无法承担的赤字，国债金额已到了危险的程度。至此，美国由全球最大工业出口国转为全球最大工业输入国，同时也由全球最大债权国转为全球最大负债国。1980年，美国政府征收的所得税之中，有30%是用来支付国债利息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黄金市场出现了名为“黑色星期五”的股灾，这是里根总统一手造成的经济新局面，其后的总统布什（两位布什总统都是同一路线），连同克林顿总统在内，基本上都是延续里根的经济政策。黄金本位制开始退出世界金融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美元本位制。

由于黄金价格高涨，黄金开采技术走向现代化，所以西方国家的黄金产量一时间增长很快，同时中央银行不再购买黄金。美国经济开始盛极而衰。

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根据葬于公元前4100~3900年间的埃及古墓里，发现镶有金柄的石刀和金项链，推断人类在6000年前就认识了黄金。可是1986年，在保加利亚瓦尔纳一处7000年前的墓地里，发现了一批金器。据考古学家的初步鉴定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黄金制品。

这样一来，人类认识黄金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1000年。人类最早发现的黄金主要是自然金和江河湖泊的砂金（亦属自然金），其发现都具有偶然性。

但也可能由于古埃及的金项链的缘故，人们对于金属首饰的热情大大提高，黄金的社会需求进一步增加。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黄金首饰越来越广泛地走进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将黄金打造成首饰进行销售的战略未见成效。将黄金打造成首饰的数量越多，越能反映出生产黄金的企业面临着窘境，打造成首饰的黄金越多，黄金的价格相对就越低，黄金生产企业的利润就越少，那么这些黄金开采企业的市场资本总额就相应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1987年（世界黄金委员会在这一年开始发挥作用）以来，黄金首饰出货量和黄金价格在超过14年的时间里一直呈反比。黄金价格一下降，黄金首饰的出货量就增加，反之亦然。无论哪种情况，鉴于这种反比的关系，很明显的一点是，推销黄金首饰的黄金生产商不会有利可图。

需求的增加也会引起供给的变化——这一经济学原理显然在黄金的供需上也适用。进入80年代，世界黄金产量出现明显回升。这主要是由于世界各产金国和地区相继找到了一些大型和特大型金矿，同时注意了老矿区的挖潜改造，较大幅度增加了黄金储量。尽管进入80年代，各国的金矿开采品位继续下降（南非1986年开采品位下降到5.81克/吨，美国1984年下降到2.1克/吨），但由于发现大型、特

大型和世界级大型金矿，且采用先进的采选冶技术（如大型堆浸场的投产），黄金产量逐年增长。

1980 年，世界黄金的年产量是 962 吨，而 1990 年的年产量已增加到 1746 吨。在 1980 年，南非是当时最大的黄金产地，产量达 675 吨，占世界产量的 70%，10 年之后这一数值又有所缩减，大约占世界的 37%；而美国的黄金产量已突增至 259 吨，是 1980 年的 8 倍；世界第三大黄金生产国澳大利亚在 1990 年生产了 197 吨的黄金，比 1980 年产量的 12 倍还多；加拿大 1990 年生产了 158 吨黄金，产量较 10 年前增加了两倍，当时位居世界第四位。

当黄金价格变得相对便宜时，更多黄金被打造成首饰。如果用于制造价值更高产品的黄金需求量增加，那么黄金价格会上升，同时对用于制作首饰的黄金需求缩减——无论价值更高的产品是什么，黄金生产商都应关注点放在市场上，而不是放在黄金首饰的制造上，正如数据所证实的，黄金首饰含有的价值相对较低。

在过去的几年中，随着黄金价格走低，黄金生产商从技术性的角度出发作出回应，他们积极寻找从地下挖掘黄金的新方法，而且他们也非常擅长寻找新的黄金储藏地点。虽然他们具备先进的技术，取得了卓越的勘探成就，但他们并未因此获得收益，他们的股东也未从中盈利。

市场上所有售出的黄金首饰并不都是低含金量的，很大一部分亚洲市场都需要成份较高，且手工打造相对较少的黄金首饰，其主要目的是用于投资。

20 世纪 80 年代的黄金政策在社会上引起的激烈讨论，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平息下来。现在回顾那段历史，不管是对私人财产还是对联邦储备来说，美国政府的重要性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政府没有像以前一样帮助传统制造业的发展，也没有寻求建立新型的技术产业部门，而是坚决地保护和支持银行和金融领域的企业，使它们避免各种市场风险或者将它们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黄金价格下跌的原因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黄金市场呈现出了单边下跌的走势。从 1980 年的 800 多美元/盎司一直下跌到 1999 年时的接近 250 美元/盎司。比 1998 年的均价下降了 5.3%，1999 年的均价是 20 年来最低的。

连续数月，纽约黄金市场闭市时，黄金价格一直低于伦敦市场当天的固定值，这又如何解释呢？纽约黄金市场每天最后一个小时、一分钟对于黄金的抛售正好抵消了海外黄金价格的上升。纽约贵金属经纪人日复一日地嘲弄伦敦黄金交易所，却

找不到解决之策。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贵金属价格处在交易区间内。不过，数据清楚地显示出，金价真正疲软之时正赶上瑞士威胁要销售黄金。瑞士故意或者说不知内情的情况下被诱进 90 年代最大的卖空陷阱。市场对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每年都超过 4000 吨，而黄金价格却不断下降，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黄金真的没有用了吗？

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炒作的成分。

中央银行是黄金的重要持有者，然而它们占有的世界黄金总储量却在缩减，而且它们的减持行动仍在继续。在 1971 年以前，所有新采掘的黄金没有被制成首饰，都流入了中央银行的金库里，不过从那以后，中央银行成为净卖方，尽管销售量很小。

但是中央银行作为卖家的作用一贯被夸大，它们的销售大部分由 BIS（国际清算银行）处理，这些被销售的黄金又流入其他中央银行的金库中，黄金销售带来负面效应来自媒体的恶意炒作，而不是销售数量造成的。中央银行带来的威胁性正逐渐降低，因为私营机构对于黄金的持有量显著增加，50 年前中央银行持有世界 70% 的黄金，而如今它们所持的份额不足 25%。

因为各个国家的央行把黄金借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又把黄金借给产金商和投机商。他们拿到黄金后就在市场上卖掉，然后把所得的资金存到银行里获利。贷金利率很低，通常一年期的只有 1% 左右，而银行的利率高得多，像美国银行的利率就长期保持在 5% 以上，加上黄金的价格又在持续下跌之中，这样产金商已经把 5 年甚至 10 年以后的黄金产量都拿出来做空。

1999 年，黄金年度产量约 2500 吨，与 1998 年产量相似，2000 年设定的年度产量目标也是这一数字。1999 年的矿产量是 20 年前的 2.5 倍还多，但是增长明显放缓。由于低价阻碍了很多项目的开展，未来的生产可能减少。纯粹捏造的矿产量继续大幅度地超过新的矿产量，这种情况主要源于官方销售黄金储备的做法。官方公布的销售黄金和相关的对冲活动似乎是造成金价在这一年里回调的原因。

此外，黄金市场上的如此走势与股票市场的下跌也脱不开干系。

通货膨胀持续了 36 年，在 1981 年发展到极致，商品价格和利息创下新高，当时证券很受欢迎。在 1982 年，股票市场上的普通股开始大涨，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 800 点推到 11000 多点，收益率约 1400% 以上。

在此期间，很多公司进行重组，世界股本市场全球化的趋势为股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股票受到极大的欢迎，所以大量共同基金得以组建，美国股票市场中这种狂热的迹象初次显现是在 1987 年 10 月，这种疯狂使美国股票市场遭受了有史

以来最大的重挫。不过，这一重挫是短暂的，强有力的货币政策使股票市场收复失地。从那以后民众开始认识到，通货紧缩趋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为了保护资金，最好将个人的储蓄分配到普通股股票市场上一些。

由于上述现象，昂贵金属的投资环境变得非常不利，至少在 1999 年前是这种状况。1999 年，多数商品价格走出谷底，开始上涨，这表明即将会出现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这点在原油价格上表现得非常明显。1998 年 12 月，原油价格降至谷底，也就是从那时起，其价格涨了 3 倍多。

当股票市场处于牛市的情况下，通货紧缩的经济环境当然不会刺激黄金需求的增加。不过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难理解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多处于萎靡状态的黄金价格。推进股票市场上涨的各种理由都有利于黄金的行情。货币系统中流动资金充足，货币仍在贬值，自“二战”以来美元购买能力受损，所以金价从每盎司 400 美元涨到每盎司 450 美元。看上去很合理，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不同的是，黄金需求量在 90 年代初开始超过新开采黄金供应量。

美国投资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概括了黄金市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发展：

澳大利亚黄金产量再次改变发生于 1991 年，当时的财务大臣保罗·基廷于 1988 年 5 月 25 日发表内阁声明表示，即将终结黄金行业不交税的情况。

1990 年黄金产出大幅增加至 244 吨/年，而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还仅为 40 吨/年。从 1990 年到 1996 年，黄金产出维持在 250 吨/年左右。之后，尽管黄金价格低廉，但因边际利润上涨和新矿开发，黄金产出大幅上升，1997 年达到顶点 314 吨/年。1997 年之后，因缺乏新矿开发，黄金产出再次下滑。

而后来二三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引人瞩目的巨大变化。最明显的是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涌现了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而外汇市场的发达，与古老的货币——黄金相得益彰。因为持有外汇，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益，而持有黄金不但不能从中获益，而且还需要为之付出保管费。这是黄金越来越不受宠的主要原因。

黄金战：争夺日益恶化

时值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由于在证券市场损失惨重，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稳定性较强的金融产品呢？投资者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黄金。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战争。世界性大战的爆发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或多或少都与黄金存在关联。

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使欧洲的老牌帝国元气大伤，但它们并没有甘心自动臣服于美国。英国人决心从支离破碎的货币困局中解脱出来，试图恢复“金本位”，以延续大英帝国的余晖。然而，在美国经济已经非常强大的情况下，英美经济实力已经此消彼长。

法国曾利用对富人所得税减税、对大众消费品加税的办法，一度获得欧洲资本家的青睐，而将资本转移到法国。到 1931 年，法国的库存黄金量攀升到英国的 5 倍。

德国虽然是战败国，需要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但它也坚定地走向金本位的道路，宁愿对战胜国赖账也要增加黄金储备，从 1924 年的 1.8 亿美元增加到了 1928 年底的 5.68 亿美元。

如果让这种势头继续下去，德国和法国复苏并重新强大起来并非不可能。这场始于 1925 年的奋斗，在 4 年后爆发的美国大危机的冲击下一败涂地。1929 年以后，它们遭遇了沉重经济打击，美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危机——1929 ~ 1933 年大萧条。

当美联储一统天下的黄金和纸币之后，美联储和国际金融家们从此就开始了诋毁黄金的时代。他们依靠战争摧毁了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通过积蓄绝对优势的黄金储备，依靠美国超强的经济实力，使美元登上了货币霸主的宝座。但他们并不准备把这个经验总结出来，让其他后发大国分享，而是要把它深深地埋葬起来，无数次地重复一个谎言：黄金从此一无是处，黄金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

目前世界黄金总储量为 37650 吨，约为世界黄金年产量的 13 倍。其中 1000 吨以上的国家和组织有：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中国（包括台湾、香港）、瑞士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述国家中以美国储备最多，为 8136.9 吨。百吨以上的国家地区有 32 个，不足 10 吨有 47 个。我国的黄金储备已达 1025 吨。从上述的数字看，实力强大的国家其黄金储备也多。这说明黄金仍是各国综合实力的标志。

黄金储备作为一国的经济保障，在一国的经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仍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所重视。适当数量的黄金储备对稳定国有经济、保持币值稳定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黄金是一项独特的资产，它不受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直接影响。

1892 年 5 月，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最活跃的工业股——国家绳缆公司破产。这一事件导致了整个证券市场的雪崩，然后开始了公众对银行如潮水般的挤兑。随后，万家公司和 500 家银行倒闭，失业率居高不下（超过 10%），工人罢工频频，整个美国经济岌岌可危。

在经济恐慌中，摇摇欲坠的哈利生总统下台了。新任总统是格罗弗·克利夫兰，他一上台就面临着棘手的经济问题。1894年，美国的小麦歉收，而欧洲则迎来了大丰收，美国农业收入减少，黄金开始外流。

美国财政部的状况也没有一丝改观，过度支出使得情况愈发糟糕。开始时，财政部还可以支付纸币，但后来连纸币都消耗殆尽了。财政部别无选择，只能开始以黄金作为日常的支付手段，结果黄金储备数额急剧减少。黄金储备战的失利使美国经济一度陷入困境。

中国有句话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黄金是国家战略储备的主体，是不容忽视的。例如美国的战备储备黄金占65.5%，荷兰45.5%，法国41.9%，意大利45.9%，瑞士39.9%，巴基斯坦32.6%，哈萨克斯坦22.2%，津巴布韦39.9%。

一国政府持有黄金会增长公众的信心。一些国家明确认可黄金对本国货币有强有力的支持作用。另外，黄金储备有利于提高清偿能力。各国官方的黄金储备主要作用是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一国黄金储备的多少与其外债偿付能力有密切关系。一国储备中若有黄金，评级机构也会对其开绿灯。因此，黄金储备有利于提高一国的资信度。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单位也如此，大家知道的“同仁堂”店中始终有100两黄金，就是为了增强信用度。

在20世纪90年代，黄金战争进入了可能是最后的但又非常惨烈的阶段。黄金资源非常丰富成为战争的主要目标。有关国家曾利用组建黄金总库对黄金价格进行操控，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有能力比较出黄金的操控者以及对黄金持敌视态度的机构，那就是调动其他中央银行控制黄金价格的美国财政部。

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导致美元贬值，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处于危险中，黄金起到了晴雨表一样的历史作用。当黄金价格开始上涨时，中央银行和国家政府显出不高兴的态度，他们公开建议并谈论抛售黄金。他们没有铲除“不适”的根源，相反要破坏这个晴雨表。

政府和中央银行控制黄金价格行为背后的基本原理是，黄金属于政治层面的金属。只要它们充当货币，那么统治者和政府就一直进行干涉。

一些想要尽快实现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为了自身近期的利益，脱离现实太远，过度自信且极度傲慢，所以他们不能解决危机，因为他们不理解黄金。他们忘记了市场始终会获胜，黄金是自由市场的选择。但是，就像每一场战争一样，结束时会出现很多失败者，而获胜者就是黄金购买者。

同时，“武器库”得到极大改进。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总库和70年代的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拍卖是中世纪的武器，这种武器可以比拟今天精准的系

统。昨日的武器是很直接的，每个人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今天的战争是秘密的、冷酷无情的。黄金开采业正在遭受的毁坏在某种程度上与车臣或者阿富汗目前的局势有对比性。

对抗黄金的战将都是有史以来金融界最富有经验、久经世故的人士。借助由大量贵金属和巨型投资银行组成的强大军队，他们对黄金发起战争，他们甚至处理以中央银行形式出现的“外国军队”，他们现代的武器系统，也就是衍生市场，使他们有能力一触板机就释放出巨大的火力。但愿这种火力不会转变成原子弹。

南非：“黄金之国”能否赢得黄金战争

产金国的黄金开采、冶炼等生产活动是直接增加整个世界的黄金存量的唯一来源，新产黄金的出售则构成黄金的初始供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产黄金量一直占世界黄金市场供应总量的一半以上。历史上黄金的储量和产量较多的国家主要有南非、苏联、加拿大和美国，称为四大产金国。

南非是四大产金国之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出口国，黄金出口额占全部对外出口额的 1/3，因此又被誉为“黄金之国”。

南非发现钻石不到 20 年的 1886 年，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叫乔治·哈里森的探矿者在南非德兰士瓦共和国与瓦尔河之间一个偏僻的牧场上（即现在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地区）发现了金矿。

黄金的发现是南非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南非从此将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而崛起。金矿的发现在南非引发了大规模的“淘金热”。大批黑人从各个黑人保留地带着渴望改变生活的愿望纷纷来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金矿淘金。不久，约翰内斯堡便从一个不知名的小镇逐渐发展成南非最大的工业城市。

现在的南非由若干大金矿组成七大金场，形成了一个绵延 500 公里的“黄金地带”。黄金开采在南非矿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占矿产品收益的 60% 以上，而且黄金也是南非的主要出口产品，年出口值占南非年出口收益的 40%，因而黄金价格的变化对南非的国际收支平衡影响重大。

南非金矿形成于 30 亿 ~ 35 亿年前，在兰德盆地形成了一条长 350 公里、宽 250 公里的金矿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兰德金矿矿脉。由于南非地下金矿的巨大储量，到 1898 年南非的黄金产量已占世界黄金产量的 27%，这一比例已超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使南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金国。

自 1905 年以来，南非已超过澳大利亚、俄国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

国，其黄金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1/3 左右。从那时起，南非作为世界头号黄金生产大国的地位保持了一个多世纪。

作为黄金主要生产商的南非需要注意黄金的其他层面，即象征意义与实际作用。黄金是 3000 年来的最佳货币。它在 19 世纪金本位制下变成世界货币，当时各国货币都按照黄金的价值来定义。黄金发挥货币作用时相当于一种巧妙的自动装置，它确保了完善的支付系统的运转，实现了自由市场上的自由、稳定、经济繁荣和持续增长。

没有一个系统比金本位制更加完善，一个自由、国际化、多元化的世界经济需要一种全球性的货币，黄金就是自由市场选择出来的那种全球性货币，因为它是最有效的货币形式。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黄金，就不可能重新建立起可以调动潜能的世界经济。没有黄金，很难或者说不可能重建一个全球货币体系，也就是说不可能建立起所谓的新的金融体系。而这点，正是南非需要了解的。

南非被金砖四国合作机制接纳为成员国，但这并不像高盛分析师当初提出金砖概念时那样，提示了某种发展前景，而只是一个国际关系事件；它可以视为四国对南非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一种认可，希望在今后的国际关系舞台上与之取得默契和协调，至于南非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是否将提高，则是另一码事。

许多人以为南非可以代表非洲，但实际上它对于非洲的分量远不如其经济总量所显示的那么大，尽管 GDP 占非洲近 1/4，但南非从未成为非洲的金融中心或学术和科技中心，除几个邻国之外，对非洲国家也没有多少政治影响力、文化吸引力或价值号召力。

南非必须认识到它正在生产最贵重的产品，这种产品将成为未来货币体系改革中不可或缺的根基。如果南非接受了这一理念，它应该认识到必须坚决捍卫自己的产品，坚决抵制忽视甚至摧毁黄金的邪恶同盟。南非必须熟知黄金在这 5000 年文明中逐渐形成的象征意义。

南非应该更加深入了解黄金的作用以及南非在这一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它应该为黄金而抗争，而不是让那些伪称黄金已成为历史的人取笑和诋毁它。南非最后应该采用一种前瞻性战略，在解决黄金问题上成为一股主导力量。它应该与同样开放且具有前瞻性意识的金矿财团联手发起一场公共关系的运动，重新唤起世界对黄金和金本位制的兴趣。

非洲所有主要黄金生产国都应该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南非也应该记得，在没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也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开拓国”美国是如何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实力的经济强国的。美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偶尔获得

黄金贷款的帮助取得成功的。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也吹到了南非，汇率一落千丈，兰特第一次大幅贬值（美金兑换兰特从1：4变成1：6.5），大部分华商积攒数年的财富一下子就缩水了大半。但噩梦还在后头，2001年，南非国内政治动荡，种族冲突加剧，政府连续降息3次，导致资金大幅流出，兰特瞬间跌至历史谷底，大幅贬值几乎达100%。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戳伤南非币，连续数年升值的兰特第三次遭遇云霄飞车。

南非的儿童贫困率仍然很高。该报告针对全球经济危机对儿童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儿童贫困率在南非仍保持着65.5%这一较高数字。此外，经济危机已经造成南非90万人失业，对贫困家庭的儿童影响最大。

虽然怀抱大量黄金，但是南非并没有因为大量黄金的存在而经济稳定。南非币的投机性很浓，对消息敏感度高，一有风吹草动，例如政局动荡、黄金减产，外资就撤得很快，南非币就会下跌。

美国的融资大部分是靠发行黄金担保的债券完成的。南非、俄罗斯和其他黄金生产国需要了解这一点，它们应该做的是，发行黄金担保的债券为经济发展提供财力支持，而不是以低廉价格出售黄金、挥霍财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应该这么做，这是它们未来实现经济复苏和繁荣的唯一机会。瑞士不具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自然资源，不过瑞士人的生活水平却是世界上最高的。与它相比，南非具有很大的资源和空间优势。

担任货币功能的黄金避免了通胀和腐败。黄金是实现自由社会的一个前提条件，它是流动性最高的产品，具有最佳保值的功能。它是最保险的产品，与他人没有责任关系。只有将经济置于自然法则下，才可能为南非和整个世界面临的难题找到一种长久解决之道。

中国与印度：成全球黄金最大买家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黄金需求趋势》报告称，2011年第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总量达到919.8吨，合445亿美元，仅略低于2010年第四季度447亿美元的最高纪录。除ETF（交易所上市基金）投资需求出现同比下滑外，金币和金条投资、金饰需求和工业需求均呈现明显增长。

从地域来看，中国和印度市场需求增长强劲。其中，印度需求量同比增长38%，中国同比增长25%，远高于7%的全球消费需求总量增长。两大市场金币和

金条投资量及金饰需求量占全球总量的 52% 和 55%。

黄金作为流通货币大约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历经时代变迁，虽然在国际贸易的结算中，黄金已经基本让位于纸币，但它仍是各国重要的储备资源和国际投资市场上的宠儿。尤其在东方国家，黄金具有巨大的需求。黄金不仅用于节假日或特殊场合时庆贺送礼、购买保存、佩戴展示，而且还被视为财富的日常象征。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为了刺激经济两度采取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虽然美元因为经济激励计划出现过短暂反弹，但最终在美联储低利率政策和美元印钞机全速启动的双重重压下，重返颓势。在此过程中，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信用受到质疑，而作为重要避险工具的黄金则越发受到青睐，不断刷新价格的历史新高。

近年来通过贸易顺差等途径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的新兴国家，面对弱势美元，势必将在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以外，拓展更多的投资渠道，而黄金可能会是这些国家央行重要的考量之一。事实上，近 10 年来，伴随着美元的下跌和金价上涨，ETF（黄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持仓量也呈现出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反映出黄金的投资需求在不断攀升。

印度每年进口大约 800 吨黄金，但只有财富排名前 40% 的印度家庭购买了印度市场上的所有黄金。其余 60% 的印度人可能同样崇拜黄金，但可能历来无力购买黄金。这批为数众多的人群意味着一个尚待开发的巨大市场。

从以往历史来看，印度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黄金投资市场。在 2007 年中，印度的实物黄金需求在全球总需求中所占比例为 61%。

可以看出，印度大部分潜在的黄金需求仍有待开发。为了满足市场黄金需求，WGC（世界黄金协会）已和印度邮局制定了一个分销金币及小规格金条的计划。印度目前在农村地区设有 700 个为 90000 名客户提供服务的邮政局，预计这个数字将会上升。在印度，正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财富创造浪潮”，有鉴于此，这个市场是值得开发的。如购买黄金的趋势得以延续，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印度黄金市场从 2005 年到 2025 年将增长 3 倍。

这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构想，因为除了邮局之外，很少还有其他实体拥有覆盖印度这个全球最大黄金市场所必要的网络及基础设施。

印度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市场，但在中国，购买黄金已变得非常重要，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黄金首饰市场。中国人不仅不断购买越来越多的黄金，而且他们更喜欢 24K 纯金。这种高品质黄金在诸如生日等特殊场合时作为庆贺的礼物相送，以及作为新娘在婚礼时佩戴的黄金首饰。

在 2010 年，有 660 万名新娘把购买黄金首饰作为她们婚礼仪式中所需筹备的任

务之一，因为这种黄灿灿的金属标志着夫妻百年好合的重要性。

黄金首饰珠宝在中国黄金销售中占很大比例，而同时中国人也可以在当地银行购买黄金。WGC 与全球存款规模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建立合作关系。他们开始提供让投资者按期买入黄金并积存起来的一项“黄金积存计划”。

黄金需求目前出现了一股值得注意的亚洲市场风潮——尤其是中印两国，而且黄金身价提高，正从西方国家的大众商品推销中消失。2011 年上半年，中国市场黄金购买量同比增长 90%。这是继 2010 年中国黄金需求增长 75% 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大幅增长。

中国黄金需求占全球的份额超过了北美需求（占 8%）、欧洲及俄罗斯（占 13%）、甚至中东及土耳其（总共占 12%）。

对黄金的需求并不仅来自于中国和印度的居民消费者，各国央行对黄金的看法也出现了巨大转变。继作为黄金净卖方多年之后，各国央行已变成黄金净买方。西方各国的中央银行基本上已“关上了水龙头”（即停止购买黄金），而绝大多数是东欧各国央行在购买。

仅在 2011 年上半年，官方机构的黄金购买量是 2010 年总购买量的 3 倍，达到 216 吨。

官方机构增加黄金购买量主要是由于央行 Central Bank Gold Agreement（黄金协议）各签署国黄金销售量减少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0 年底完成其黄金出售计划。此外，其他国家也纷纷大笔购入黄金，试图将各自外汇储备从美元资产分散至其他非美元资产。

就像许多个人投资者一样，外国政府宁愿到处扩张其财富，让其外汇储备多样化以减少其风险。通常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因为它被认为比持有其他的资产更稳定，而欧元成为第二大受欢迎的外汇储备，但黄金也不甘落后。该贵金属发挥着对抗通货膨胀引起的纸币贬值的重要作用。

它不像纸币一样，黄金拥有有形资产价值，其价值不依靠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

当 2009 年金融危机降低了美元的价值，欧洲债务问题促使欧元达到 4 年来新低点时，投资者和各国央行涌向像黄金这样的避险资产。

看来，各国央行购买黄金的行动并不是“对美元币值走向的一种下意识反应”，更多的国家对黄金有兴趣并且打算长期持有黄金。分析家怀疑中国将继续购买黄金，并可能在事实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买家。它只是没有自豪地透露它持有黄金储备的地位，但无论如何，中国是世界上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

日本：为何国民排队去卖黄金

当铺在中国悄悄兴起的时候，“质屋”（当铺）在日本则已经有些夕阳西下的感觉，车站闹市里的“质屋”，现在大多要改成“首饰循环店”等环保的新店名了。

东京银座有家特别著名的金首饰店——“田中贵金属”。这里的销售服务有个特点，从该店买的金银首饰，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可以返销给店铺。这本是促销的一个普通手段，但现在则有太多的人拿着田中贵金属销售的首饰换现金，更多的人则是拿着不知从哪里买的，早已经没有了购买发票的首饰。店里需要一点一点地鉴定，然后回收。来的人一多，自然就要让顾客等较长的时间。

因为来的人太多，最近田中贵金属店开始优先回购那些有该店发票的首饰。已经找不到发票的人，只好去街头找“质屋”卖掉。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东京街头，现在已经很少能够看到排队购物现象；排队卖出自己的金银首饰，真可谓是东京一景。

在600年前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一书中，Cipangu（日本）就是个黄金遍地的国家：“日本乃中国东1500海里之外，浮于海上之岛国。彼处盛产黄金，宫殿及民宅均用黄金制成，财宝横溢。日本人崇拜偶像，外观典雅，礼仪严格，但尚有食人恶习。”

书中特意提到的中尊寺金堂，堂中黄金包裹了所有柱子及整个屋顶。其实建设中尊寺的藤原将军，并没有炫耀财富的意思，只是为了让佛光永远照耀下去，才建设了这个寺院。其后的千年中，无数的战乱、天灾在这里发生过，但并无人去争抢这里的黄金，更多的是把中尊寺作为一种精神传承了下来。

作为一个贫金国家，日本国内市场所需的黄金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自1973年后，日本黄金交易商允许直接进口黄金。到1980年，日本黄金市场全部解禁，并迅速得到发展。日本是全世界最大的炼铜国家，铜冶炼过程中能生产出大量的黄金来。现代日本仍然保留有京都的金阁寺、岩手的平泉中尊寺金色堂等金碧辉煌的寺院，而且尽管经历过上个世纪80年代疾风暴雨般的泡沫经济，“黄金之国”在民间仍然普遍藏有大量的金货。

真可谓“有人漏夜赶考场，有人辞官归故里”，就在中国人狂买黄金之际，日本人却急卖黄金。受全球性金价高涨影响，位于日本东京的黄金专营店中，前来出售家中闲置黄金制品的人急速增多，以致商家提出了种种苛刻条件，拒收普通消费者拿来的各种首饰。

受美国国债级别下调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股市下跌影响，投资者纷纷选择期货交易来规避风险，导致期货价格持续上升。东京交易所 2011 年 8 月 11 日创下了期货历史价格记录新高。

2011 年 8 月 16 日的黄金收购价格为每克 45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374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0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83 元），相较 5 年前更是增长了大约 20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166 元）。“金续落”（黄金价格继续走低），“金大幅续落”，这是黄金交易网首页上的标题。题目做得短，让人看了更加焦灼，不知是不是泡沫快要走到头了。

进入 9 月以后，黄金价格降多升少，着实让手里还攥着金首饰、账号上记着黄金重量的人，心里更加焦躁不安。

同时，在东京银座的黄金专营店中，前来变卖金戒指和金项链等物品的顾客接踵而至，其中多为家庭主妇。所出售的黄金制品中，除了大小不合适的结婚戒指和金手表纪念品外，还有此前比较少见的金杯和金币等物品。

一家日本的专营店在 2011 年 7 月收购的黄金制品总值创下所有联营店月交易额的历史新高，达到了 2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662 万元）。8 月更是再次刷新纪录，仅上半月的销售额已达到 6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4987 万元），到店顾客达到上个月的 10 倍左右。16 日有的顾客居然等了近 6 个小时才完成所有手续。

钱多的时候，不能都买成股票，更不能只存银行，这时需要买一些黄金存起来。但真的到了要用的时候，由于黄金并不能立即兑现，兑现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去店铺等交涉，用起来很不方便。

日本黄金市场创立的初期，由于管理制度，实际运作方式都没有走上正轨，使得交易过程非常烦琐，因此，每天的交易量很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黄金的投资者大量出现，逐渐形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黄金交易市场。

近几年来，日本黄金市场发展更为活跃，再加上经济的日益雄厚，使得日本黄金市场已成长为推动亚洲黄金盘面波动的主力军。

希腊危机已经洞若观火，危机会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意大利、西班牙。欧洲经济出现了衰退，这时是风险到来的时候，欧洲人自然会将黄金卖出，金价狂跌，本是理所当然的。也有不少日本人是准备去旅行时不经意间买的金首饰，在用过了一段时间后，现在能换成钱，那么用这些钱去享受一番也合情合理。想用黄金来“投资”、“保值”的人在日本并不多。

当然，选择在危机持续的今天变卖黄金首饰的不止日本人。其实有一个人，更早地计算出了欧洲的经济危机程度。他就是美国著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早在

2011年1月，索罗斯已经预言“黄金进入到了泡沫状态”，3月索罗斯神不知鬼不觉地卖出了8亿美元的黄金。

20多年前，走在东京的街道上，也会看到东京人的疯狂，那时他们买过太多的包括黄金在内的商品。但时过境迁，现在东京人有了一颗面对黄金的平常心。看来，抢购黄金只能是一种乱象，一切过去以后，这种平常才能永久留存下来。

罕见行情：黄金和美元同涨

黄金自古以来就是最受信赖的支付手段，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中国制造业问题的凸显，国内不少资金化身为游资在投资市场游弋，寻求避险。除银行、股市、楼市等领域，外汇、黄金等也都成为这些资金青睐的目标。按照国际市场以往的惯例，当黄金上涨的时候，美元就会下跌；反之，当美元上涨的时候，黄金就会下跌。

为什么美元和黄金的走势是背道而驰的呢？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政府的操纵。美国政府想维持一个强势的、独一无二的美元，所以它怕投资人都跑去买黄金，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如果大家都把黄金作为避险工具去买，美元的国际地位就会一落千丈。因此美国政府几十年来进行运作的目的就是不让黄金成为一种取代美元的强势货币。

翻开美元与黄金的历史，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的精心策划下，美元取代了黄金，成为世界清算货币，美联储变身事实上的“世界央行”。有了如此有利的位置，美联储印美元不再受到黄金储备的约束，而全凭自身利益最大化率性而为。

美国仅直接外债就约为5万亿美元，被经济专家冷嘲为只用了一堆纸张就攫取了全球同等面值的财富。作为既得利益者，尽管握有世界第一的黄金储备，但美国始终高度警惕着黄金，尽一切所能去操控影响黄金市场。

那么怎么保证美元涨呢？如果大家都去投资黄金，美元就不会涨，所以美国政府一定要保证国际资金都进入美元市场，而不是去炒黄金。也就是说为了确保美元涨，就一定要让黄金跌。

美国政府豢养的包括高盛、摩根等华尔街的公司在内的国际金融炒家就是通过期货市场上买入或卖出，半年或者几个月之后交割，利用时间差来打压黄金价格。当美国政府决定让美元上涨，为了保证资金都流入美元市场而不去黄金市场，美国政府一声令下，这些国际金融炒家就在黄金市场大量抛售，而且是卖空期货，

半年或者三个月以后交割。它们这样把黄金价格打压下来，大家害怕了，于是钱都流入美元市场，美元上涨。

这就是黄金和美元投资存在的对冲关系。

然而，奇怪的是从 2008 年底到 2009 年第一季度，美元走势和黄金走势不再是相反的而是同方向的。

从 2008 年底到 2009 年第一季度，黄金和美元的价格走势竟然变成一样的了，这种情况以前很少发生。同样是在这个月份，美国道琼斯指数大跌，跌到 8000 点左右。

2009 年初，投资者们面对国际市场同时大涨的美元与黄金困惑不已。因为这一状况持续已经超过两周，国际金价更是持续坚挺在 900 美元/盎司以上。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投资机构在此情况下仍然一致看多黄金，瑞银集团将 2009 年黄金均价预估由 700 美元调高至 1000 美元，而 1000 美元/盎司也是高盛对黄金未来 3 个月价格的预估。

这显然是金融市场上一种极为反常的现象。把黄金交易所的交易清单拿出来看一下是谁在交易。很有意思，就是高盛，又是高盛，它是真正的国际金融炒家。高盛从 2008 年 12 月份开始竟然成了黄金买家。过去它一直是卖家，帮助美国政府打压黄金的。到了 2008 年底 2009 年初，汇丰银行竟然也成了黄金买家。

美国布什政府第一次提列的救市资金是 7000 亿美元，后来发现不够，奥巴马总统又提列了 7870 亿美元，后续还会提列 8.5 万亿美元，甚至高达 23.7 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面临持续恶化，而且恶化速度极快。2009 年 1 月 20 日，奥巴马正式出任美国总统。全球经济形势并未因此呈现止跌迹象，各种资金继续寻找着避险出口。

美国的政治目的说穿了很简单，就是借钱。美国要借钱，美元就必须保持强势才能借得多。美国政府现在面临着极大的借钱压力，所以要刻意地通过各种方法抬抬美元，让美元保持强势，以方便美国政府借钱。

通过有计划地指令国际金融炒家“配合市场的趋势”从期货市场买黄金，奥巴马政府在短期之内大幅度地抬高金价，进一步造成黄金投资者的恐慌。于是更多投资者会进入黄金市场抢购黄金。

消费者需要意识到的是“黄金美元同涨”局面不可能长期存在。

评级机构再次拿欧元区周边国家开刀，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周二将爱尔兰外币和本币国债评级由 BAA3 下调至 BA1，评级展望维持负面。原因是该国需要进一步金援的可能性提高，增强了投资者对欧债危机蔓延的担忧情绪。在华尔街和美国政

府的资源整合下，“评级机构”已经成为某些大国新的“经济大棒”，目前最有话语权的“评级机构”在美国，短期内评级机构格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美元的持续性贬值是战略性的。虽然，美国方面，两党双方在债务问题上依然是一副“针尖对麦芒”的架势。

投资者的保值需求依附于黄金、白银等资产，对金银价格形成一定的支撑。但这一轮债务危机的“被激化”，造成欧元下跌和进口成本上升，将近一步增加通胀的抑制难度。但如果美元持续坚挺，能够有效抑制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同时适度走低的欧元也能促进欧洲各国出口，帮助欧洲经济快速复苏的话，那么支持美元走强对欧洲经济短期而言并无坏处，毕竟欧债危机的主要债权国还是欧盟内部国家，达成统一的救助方案要容易得多。

因此可以判断，短期内欧债危机被无限放大、美国也随提高债务上限限期迫近而面临日益严峻的违约风险，避险情绪推动黄金上涨，对于黄金白银的避险需求所主导的这次价格反弹，背后受到了投机者的“操纵”。



产业转移的第四次浪潮

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世界工厂大挪移

根据资料显示，全球已完成了3次大规模的跨国和跨地区的产业转移，目前是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世界工厂”是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和制造业相对发达的象征。任何国家想要保持高度的发展势头或者维持竞争优势都是很困难的。因此，“世界工厂”这顶高帽子才被戴来戴去。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后期的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第一次科技革命完成后，英国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也是第一个“世界工厂”。当时仅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在19世纪前70年里，一直控制着世界工业生产的 $\frac{1}{3} \sim \frac{1}{2}$ ，世界贸易的 $\frac{1}{5} \sim \frac{1}{4}$ 。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出地是英国，目的地主要是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北美。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美国向日本和原联邦德国转移。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所带来的“特需经济”加快了美国对日本的产业转移。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巨大，原联邦德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建成了第三个“世界工厂”。也可以说，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了“世界工厂”的第二次变迁。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产业转移发生的主要区域在东亚地区。这次国际产业转移是由日本主导的，日本成为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主要的产业输出国，而东亚“四小龙”是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持续时间大约20年。20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日本为了应对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和日元汇率升值的影响，选择了一条对外投资、重构国内产业结构的国际产业转移道路。

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端于 20 世纪 90 年代至现在。这一次国际产业转移之所以独立于前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是因为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出地、转移的目的地等方面和前次产业转移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具备新的特征。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输出地,不仅有日本,而且有东亚“四小龙”,还有美国。产业承接地有东盟四国,但主要是中国内地地区。

中国人安土重迁是因为搬迁需要成本,包括人际关系等隐形成本。那么,“世界工厂”为什么要搬迁呢?马克思说过,资本家生产的最根本目的就是获取最大化的利润。因此,哪里成本最低,哪里利润最大——资本就会向哪里流动。随着大量资本的流动。产业从旧的“世界工厂”分散,再在新的地方聚集,就形成了新的“世界工厂”,我们中国人说这叫“水往低处流”。

“世界工厂”的变迁其实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典型表现。经济学观点认为,各国或各地区之前在生产成本、生产效率、技术条件,以及产业分工方面存在差异,这一差异被称为产业梯度。在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成本说”。他提出某国生产某种产品在成本上占绝对优势,而生产另一种产品,成本又占绝对劣势。因此如果生产占有优势的产品,并出口到他国,再从他国进口本国生产成本高的产品,能达到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但是“绝对成本说”是基于完完全全的自由贸易。

因此,“绝对成本说”仅仅是理论上的特例。1817 年,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意义深远的“比较成本说”。即使一国生产两种商品都处于劣势,也可以选择相对有优势的商品生产和出口,即相对梯度。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梯度的存在使得各国生产了不同的产品或者产品的不同部分,因此逐渐产生了国际分工。分工内容又随着国际贸易内容和资本流向变化,从而产生国际产业转移。国际分工是产业转移的前提或基本要素,却不是转移的动因。因此,我们可以发掘出另外两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超出其他国家,殖民地的作用是提供原材料,欧洲的其他国家是消费者,生产和加工几乎完全由英国包揽。然而随着工业革命扩展到其他国家,部分产业开始顺着“梯度”向其他国家流动。当德国、美国聚集了比英国更多的产业时,也就显而易见地成为了新的“世界工厂”。时至今日,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梯度”发生变化的结果。

第二个因素是国家产业升级的要求。对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高附加值、高利润的第三产业开始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将技术已经成熟的、附加值不高或者对环境破坏较大的产业向其他国家转移,是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

结果。对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接受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承担发达国家不愿发展的低附加值的产业，如原材料加工等，不但可以学到相对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还可以慢慢积累工业化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由于现在“圈地运动”或者是“殖民运动”已经不可能重演，这几乎变成了后进国家积累资本的唯一途径。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些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加工和出口来增加国民收入，提高内需，从而进一步推动本国工业的发展。因而，国际产业转移是你情我愿的自然流动。而且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能够承担的责任不一样，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也发生变化。这也会造成更高级的产业向内转移，更低级的产业向外转移。

产业转移大潮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催促之下，正加速度地由发达国家和我国沿海地区向我国中西部地区奔涌而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正成为产业转移的首选地之一。据测算，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情况看，到2010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要转出的产业，产值估计将达到1.4万亿元。

珠三角快速向长三角转移特别明显。2009年2月，中国服装协会产业集群调研组在浙江湖州织里镇调查发现：去年以来，织里镇新增童装生产企业800余家，绝大部分是从广东省转移而来。报告分析指出，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基础、商贸氛围、配套措施不能达到服装行业需求的时候，产业资源将率先向产业基础雄厚、产业链完整、政策环境优良、商贸渠道顺畅、物流交通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流动。这一梯度转移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将在未来几年中保持其发展势头。

各方信息显示，东南亚地区可能成为中国中西部省份所期待的“迎接东南沿海转移”进程中的竞争对手，因为这些东南亚国家对欧美出口能够享受最惠国待遇，同时这些国家在税收等政策上给予了国外企业相当大的优惠空间。目前到越南、柬埔寨等地投资建厂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已近千家，到孟加拉国投资的也有百余家，如江苏AB集团已在柬埔寨金边设立境外加工贸易企业，红豆集团也在柬埔寨控股兴建了西哈努克工业园。

世界工厂：让人欢喜让人忧

随着我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制造业及相应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制造”逐步引起世界广泛的关注，由此引发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不绝于耳。就连在电影《2012》中，地球上人类也是搭乘中国制造的“挪亚方舟”得以存活，虽然并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中国人拯救了世界，但是中国世界工厂的身份再次得到了印证。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比起改革开放前，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人民生活

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卡迈勒主席敲响了手中的木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成员。“中国制造”迈出了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看看“世界工厂”的生产成果明细，我们一定能够切身体会到这一增长奇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里，中国对外进出口产品总额实现了惊人的增长。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由此产生的大范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我国2009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对于2008年下降了3.9%，但比起1952年微乎其微的小量贸易额，增加了约1952倍，是改革开放初期即1978年贸易水平的近107倍，而相比加入世贸组织前即2002年的进出口量也增加了4倍多。

2002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达到952.6亿美元，同比增长27.2%，计算机、移动通信设备、家用电器类产品出口额大幅增加；发电设备、纺织机械、钟表、自行车等在2001年出口下降的产品，2002年也止跌回升。

站在今天这个时点，回想曾经为了在有电视的邻居家占个看连续剧的有利座位，变着法子讨好邻居家小朋友的趣事，今昔物质的多寡程度对比岂止“悬殊”二字可以涵盖。中国向来自诩为农业大国，被英国人用大炮敲开国门之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农业生产几乎处于荒废状态。在成为世界工厂的道路上，第一产业不仅自身实现了发展，粮、棉、油、糖的人均产量都出现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也为第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第三产业发展迅速，2009年第三产业增值142918亿元，其中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等都实现了几十倍的增长。

加入WTO，使中国很多行业过剩的产品通过国际市场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海尔在最初的发展时期，制造技术上不如日本，但是当把品牌打响之后，用品牌带动制造的海尔用20年走过了外国企业100多年的路。海尔的成功已经告诉我们，用品牌带动制造环节，不仅可以把我们变成制造业大国，还可以把我们变成制造业强国。2001年4月，美国南卡州坎姆顿市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命名仪式，这是为了感谢中国海尔集团给当地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当地政府决定无偿将原来的“协作大道”命名为“海尔路”，这是美国第一条以中国企业品牌命名的道路。

海尔就是中国家电产业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工厂”最为成功的案例。入世之后，国际市场的大门开得更大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也从小心翼翼的尝试变成更加激进的大步流星。在从“世界加工厂”到“世界工厂”的推进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具有相当品牌价值的“中国制造”的代表。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外国人老是认为中国货就是便宜

货、就是廉价货，那么我们就要进入（外国的）主流渠道，从（生产）低档的产品转到生产高档的产品，这一步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但是这种高档的产品只是开始进入某些国家，进入大部分（国家）还没有实现，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可见，世界工厂的内涵随着时间的变迁也在发生着变化，那么中国所成为的世界工厂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是日本《新华侨报》的一篇文章的节选：中国有世界上无可比拟的最吃苦耐劳的人民，但缺乏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有世界上最多的工厂，但缺乏世界级规模的企业；能制造种类齐全的产品，但技术先进且自主开发的产品很少；有庞大的生产能力，但难以造出技术先进的成套生产设备。

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还是一个初级产品加工基地，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

我们不去争辩中国到底是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加工厂，不去争辩什么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但是，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世界工厂光环背后的苦楚，却是不争的事实。

1997年7月2日，从泰国首都曼谷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泰国政府宣布，放弃泰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亚洲金融危机就此全面爆发。在这场亚洲金融危机的侵袭下，日本的工业指数出现了负增长，全球最重要的四大制造业基地，也就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有成千上万家工厂倒闭。

邓锦坤是广东东莞原乐趣玩具公司的总经理。作为东莞起步较早的玩具厂，他的公司曾经拥有60多款产品，畅销丹麦、美国、俄罗斯等国。然而，就是这个他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公司，却在2008年因资金周转困难而破产。

导致乐趣玩具公司破产的直接原因，就是世界最大玩具商——美国美泰公司的召回事件。这次因部分玩具磁铁容易脱落和涂料含铅量超标引发的召回事件共涉及2100万件产品，数百家玩具企业受到牵连。广东是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东莞的玩具产量更是占到了整个广东生产量的60%左右，受召回事件影响，许多企业因订单大幅减少、资金链断裂已经难以经营下去。

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内地的制造业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凭借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中国占尽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先机，“亚洲四小龙”的许多制造工厂在这场危机中迁移到了中国内地，同时国际市场的许多订单也被价钱更便宜的中国内地制造企业抢去。

这场危机让“中国制造”迈上了新的发展平台。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纺织、玩具、塑料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危机之后短短几年，电子元器件、电子显示器、精密仪器等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中国制造”正在提高自己的技术含量，逐渐从低层次、以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

境为代价的低效生产，向更多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过渡。

世界工厂是我们成为世界强国的必经之路，但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面临的现实很残忍。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我们的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原材料、设计创新、物流和销售品牌等均被外资层层布局，突破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实现产业升级，将产业向价值链的两端推进，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因此，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产业主导权：新帝国主义掠夺矿业

从2002年开始，世界资源商品价格闯过一个又一个高价位。在这次世界商品牛市的开端，中国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都付出了很大代价。于是，关于市场定价权、价格话语权的讨论和报道不绝于耳。

在连续6年的铁矿石谈判中，中方一直未能得到“中国价格”，这已经成为困扰中国钢铁业发展的一大硬伤。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在铁矿石资源上受制于人并非仅仅是定价权的问题，中国产业主导权的缺失才是问题症结所在。

中国缺失定价权只是一个表象，我们应该从产业运行和企业竞争能力上找原因。从宏观上看，国内一些行业存在结构性缺陷，中下游生产能力快速膨胀，造成上游资源商品需求紧张，拉动资源商品的上涨。从微观上看，则与中国企业还没有形成财团体制去参与资源商品全球配置有关。事实上，中国要争取的目标不是定价权，而是获得产业主导权。产业主导权集中体现为对产业发展和运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应变力。

支配世界产业主导权的是一个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结构最顶层，是掌握金融资本，支撑商品交易所的大银行、大财团、大基金，被称为“坐市商”；第二层，是掌握矿产资源生产企业、大贸易商；第三层是中小生产商和贸易商。这个结构实际是按照金融资本控制和运营能力排列的，而在中间第二层的大贸易商的地位相当关键。除日本有综合商社外，其实欧美国家也有很多以金融为后盾的专业商品贸易商。

以中铝和力拓谈判失败的案例来说。失利原因之一即是中铝缺乏主导权，在整个并购过程中不得不依赖于外国投行的操作。这样，中铝的一举一动在外国资本大鳄面前毫无秘密可言。相反，日本大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的时候就无求助于外国投行。

在上世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钢铁企业的资金、人才都很缺乏。铁矿石价格谈妥后，钢厂即专注于生产，随之而来的各类事务一律交由十几家窗口商社来代

理。这些商社进一步选出一家干事商社（如三井物产）来提供信息、协调船舶配送计划、参与矿山开发。与此同时，综合商社在对矿山出资的过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一般采取少量入股方式，其余资金的来源由有政府背景的日本输出入银行作为干事银行，把各个城市商业银行组织起来，以协调融资团的方式出资。

因为投资咨询本是日本综合商社服务功能的一大块业务。日本综合商社给客户做咨询，都是免费的。双方在咨询报告出来后，如果达成项目，启动了，综合商社还提供投资也承担风险。日本的大企业因此更愿意跟综合商社做生意和合伙投资，而不是听从那些西方投行的安排。因而，日本在钢铁业中一直牢牢掌握着产业主导权。

产业资本处于生产经营第一线，在对基本面的判断上比金融资本更有优势，当然，金融资本的专业性好于产业资本，因此，二者互有优势，相互影响。在未来的资本市场中两者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将呈现时合时分的情形。显然，美国等西方大国在金融资本方面占优势，并依靠自己的资本优势，在世界主要产业中拥有无可置疑的话语权。

英美资源渗入了多个中国矿业的领域。它利用子公司阿山帝黄金，以合作公司模式和曲线收购打入中国黄金业务。在铁矿石这个板块，英美资源避过了监竹最严的中游开采环节，而是选择了高增值的零售环节，旗下戴比尔斯更成为无人不晓的钻饰品牌，一方面英美资源每年向中国输入4%的铁矿石，并在青岛拥有自己的码头运送铁矿石；另一方面英美煤炭和中方的合作公司也为共同开发煤炭资源展开磋商。虽然英美资源的产业整合仍未产生具威胁的效用，但亦可预见英美资源部署并凯觐每个可入侵中国矿业的机会。如果中国矿企还未能及时在梦中醒觉自强反抗，相信外资攻陷中国矿业这个板块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我国正处于从初级制造向高端制造的转变期，中国经济正在做能不能取得产业主导权的事情。未来十年中，中国应该在细分产业领域取得话语权和主导权，接着资本主导权才能择机突围。

中国未来的竞争态势是取得产业主导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主导权，主要是标准和核心技术。只有技术很厉害，才能形成技术标准。中国很厉害，是因为中国制造的量很大，中国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如果技术跟上来，就会更有主导权。

二是市场主导权，体现在终端消费品品牌和资源商品的定价权两个方面。现在正在闹金融危机，资源商品的定价权恰恰是中国取得竞争力的一个关键领域。但是我们发现只要中国在材料上的供应量大，价格就低，这是因为中国不懂得高端运

作。价格控制力由于缺少多个环节，所以中国很少能说得算，这恰恰是失去竞争力的一个关键。而下一个十年就是要补上资源商品定价权这一课。

三是资本控制力。制造业一个特点是制造业与各个国家的崛起关系很大。在以往的制造大国中，只有美国和中国是大国。最近有篇报道说越南要赶上中国了，这是可笑的。我认为中国制造将来唯一的竞争对手可能是印度，越南、老挝等就只能在某一个领域赶上中国。中国的未来二十年还是要吃这碗饭，因为制造业主要在中国。制造业的生机恰恰是材料的进入，而这个过程的发生也恰恰是在中国。目前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的一些工厂都迁入了中国，这些国家的一些制造课题有了研究成果以后，必须到中国进行试验，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在研发方面的实力。

原材料价格上涨：浪潮背后的财富转移

中国是铁矿石进口大国，仅去年便进口 2.1 亿吨铁矿石，而澳大利亚 BHP（布鲁肯希尔公司）、Hamersley（哈默斯利公司）、CVRD（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垄断国际铁矿石海运市场 70% 份额的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之前长期向中国供货。

早在 2005 年 2 月 22 日，淡水河谷公司等与日本新日铁公司达成协议，将铁矿石价格提高 71.5%，并由此形成国际基准价格，中国宝钢集团在谈判后也接受这个价格。但是，BHP 集团却要求在 71.5% 增幅的基础上，每吨单价再上涨 7.5 ~ 10 美元，使涨幅达 103% ~ 114%，理由竟然是从澳洲进口铁矿石的船运费比从巴西少，因此需要加价使澳洲铁矿石与巴西的到岸价接近。

“铁矿石涨价风波”之所以举国关注，是因为按 BHP（必和必拓）要求涨价，每吨平均将上涨 50 多美元，如果以今年 2 亿吨的进口规模计算，进口成本将至少上升 100 亿美元。这些成本通过钢材涨价，会向下游厂商转移，迟早会反映在物价上，引起有关部门担心诱发通货膨胀的忧虑。

石油、铁矿石甚至包括粮食，都属于初级产品，初级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处于下跌行情。主要原因是二战前的国际贸易格局是帝国主义国家开拓海外殖民地，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初级产品有大量需求。一方面，通过对殖民地殖民贸易的方式获得资源，再就是通过战争，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为资源产品发动的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是处于对资源性产品掠夺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贸易中 60% 是初级产品，战后很多殖民地国家独立，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程度低，只能靠开发、出售资源，与发达国家交换，借此发展民族经济。二战后，德国、日本纷纷也走上贸易立国的道路，

通过在国际市场进行对外贸易换取自身发展需要的初级产品，比如，石油、矿石。这样，殖民国家与宗主国间的贸易，战后就演变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或者称为南北贸易，以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交换为主。从二战后到上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数目不多，人口只有7亿多，尽管其人均资源占有量和消耗量大，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量毕竟有限。发展中国家开发自身资源，通过贸易与发达国家换取工业制成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总体上看还是供多求少，所以二战后相当长时间内，南北贸易形成了剪刀差。

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初级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中国、东盟、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中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中国的变化在1992、1993、1994三年最为明显。

中国石油产量在上世纪80年代保持了2.3%~2.4%的年增长速度，到90年代下降到1.7%~1.6%。这几年石油产量增长速度又下降到1.2%。

1992年中国由粮食净出口变为净进口，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家，1994年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家。中国幅员广大，但人口众多，与世界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相比，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连续三个年份，中国在粮食、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方面满足不了发展需要，成为这类产品的净进口国家。

中国的石油进口如果按照石油消费增长速度分析，2000~2004年，石油消费增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速度年均均为6%，相当稳定，进口增大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萎缩。中国东部主力油田，比如大庆、胜利油田，都进入产能衰退期。大庆油田1998年产量是5600万吨，去年为4600万吨，五六年内下降了1000万吨。

目前我们希望西部油田和海上油田能够在产量上弥补这些油田下降带来的缺口，但短期内很难发挥作用。一方面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生产量的增长速度在下降，这样供需缺口越拉越大，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

此外，钢铁的蓄积量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比如盖楼、造车以及大量机械设备的产品中有大量钢铁，这些产品的钢材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这就是钢铁蓄积量。当金属人均蓄积量达到人均5~10吨时，就达到废旧再生金属的循环期。发达国家的钢铁生产80%是利用废旧金属，其余才利用铁矿石生产，这就是发达国家电炉炼钢工艺发达的原因。中国3亿吨的产能，利用废旧金属也就1500吨上下的规模，其中几百万吨还是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废钢，中国还没有进入废旧金属回收循环的经济时代。

亚洲国家的特点是人口多，人均资源少，这一轮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工

业化高潮形成对资源的新一轮需求，对初级产品需求必然放大，这个过程现在刚刚开始。中国还有 9 亿农民，城市化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投资需求旺盛，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的饥渴持续 20 年时间也不为过。这样，亚洲地区的经济崛起形成长期的资源需求，不仅仅针对石油和钢铁，还包括粮食以及其他金属、非金属。

现在价格上涨，就是这样一种长期趋势在价格上的必然反映。全球资源有限，需求不断上升，面对缓慢增长的资源供给，价格上涨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工业化水平到了质变阶段，国内的资源已经难以支撑其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在根本上改变了二战以来初级产品下跌的格局。

铜、石油等需求太旺，在“中国因素”的刺激下，国外基金大举做多，致使价格牛气冲天。伦敦期铜冲刺 3200 美元大关，引发国内铜价暴涨，国际油价也重回 50 元/桶以上。一个共同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多支付了大量成本。

看来，在获取国际资源上面，无论是增强话语权，还是借助期货市场规避风险，国内企业都需要“补课”。既然国家、企业要长远发展，眼光就必须放得长远一些，必须看到 5 年、10 年后的事情，如只顾眼前，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下，不可能经得起竞争。

产业链定位悲剧：识破跨国集团阴谋

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中国已经是制造业大国了，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目标是应该成为制造业强国。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其实有些问题。

说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一是工厂多，二是工人多，三是产品量多，但这样就算大吗？从产品来看，“中国制造”确实很多；但同是一个产品，价值量却绝然不同。在“中国制造”的世界名牌产品中，我们能拿到多少钱，占多少百分比？因此单纯看产量不能说明问题，要看价值量。从工业增加值来看，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也落后于德国，只有美国的 30% 左右，这样能算制造业大国吗？

其实，中国根本不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的真正老板是美国人，美国才是制造业大国。

今天的国际竞争已经不是企业的竞争，已经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全新的产业链的战争市场。以我们制作出口的耐克鞋为例，一双鞋在美国卖 50 美元。其实加上运输和劳动力工资支出以及其他成本开支，这双鞋只值 20 美元，那么为什么这双鞋能够卖到 50 美元？美国人这么聪明，为什么不

让自己人来赚这个钱呢？原因就在于制作一双鞋可能要造成 40 美元的环境成本。那些在制鞋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在美国可能使老板们多掏 80 美元的治理费用。

而在其他国家生产所破坏的环境、浪费的资源、剥削的劳动，对生产国而言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就算一时因为外来制造业投资，GDP 暂时涨上去了，生产国因此却多付了很多隐性成本。而且有些行业，如玩具制造等，明明是美国设计，在别国生产，生产国成本付出了不说，最后还因为种种“抽检不合格”被退货。

实际上，任何行业的产业链，除了加工制造，还有六大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正是这六大环节创造出了九美金的价值，而他们这六大环节就是整条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能够创造出最多盈余的一环。不过在现在的全球竞争格局下，这些最关键最赚钱的环节，几乎都不是生产国企业所控制的；少数企业意识到了，继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可悲的是，大多数企业和企业家还没有觉醒！

我们制造业的问题不是我们不勤劳，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一开始就定位在整条产业链结构中最没有价值的那部分。赤裸裸的事实证明我们已经失败了，因为我们被定位在价值最低的制造业环节，而这个制造业环节的特征就是耗费资源、破坏环境、剥削劳动力。而六大软环节，既不剥削劳动，又不浪费资源，更不破坏环境，却能创造出 9 倍的价值。大学生在这六大环节当中才能学有所用，才能替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不能把“大”和“强”做绝对割裂的理解，这样理解就降低了目标。应该说我们的制造业既不强，也不大，所谓只表现在它的产量上，一讲价值量就不大了。无论从科技含量还是附加值，有关中国已是制造业大国的说法都显得过于简单化，这种乐观的说法忽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差距。

中美制造业中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是产业基础薄弱。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产业的基础技术、共性技术薄弱，另一个是基础零部件质量差。基础技术、共性技术的研究，我国在科研体制改革中，这些研究大多被归到改为企业的院所中去了。院所改为企业后，由于缺乏经营经验，生存成为大问题。即使效益较好的院所，也不再把重点放在这方面的研究上。长此下去，原来就很薄弱的基础、共性技术研究会逐渐消亡。

产业缺乏基础是不可能健康发展，也不可能做大做强的。实际上要是做得好的话，我们完全有可能充分发挥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成为零部件的生产供应基地。一些制造业基础不强的地区，如能集中力量，突破一两个点，发展一些零部件生产，成为专门供应基地，也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随着技术的发展，迂回生产程度的提高，生产过程划分为一系列有关联的生产环节。分工与交易的复杂化使得在经济中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联结不同的分工与交易活动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企业组织结构随分工的发展而呈递增式增加。因此，搜寻一种企业组织结构以节省交易费用并进一步促进分工的潜力，相对于生产中的潜力会大大增加。

企业难以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分工与交易活动，不得不依靠企业间的相互关联，这种搜寻最佳企业组织结构的动力与实践就成为产业链形成的条件。

相对于国家主导经营形式的变化，眼下各行业针对 WTO 展开的、明显已经泛滥成灾的各类研讨未免显得太过恐慌，WTO 对于具体的一行一业的影响实在渺小、不足一道。农业大国变为制造业大国，更深层的意义是扛锄头的农民将会越来越少；而各类加工厂肯定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能够承受得起“制造”这付担子吗？

美国：创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就业

21 世纪是创新的世纪，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充满机遇和挑战。各国在创新的道路上你追我赶、各显神通。先行的发达国家不甘于没落，以创新为核心，力图维护长久建立起来的优势地位；后行的发展中国家则奋起直追，以创新为突破口，争取在新的形势下能够实现弯道超车。

美国历来以拥有优越的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而著称。长期以来，美国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无与伦比的创新环境。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的经济实力明显下滑，到目前也没有恢复，但其创新能力在世界上的排名仍然首屈一指。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指出的，美国经济之所以在 20 世纪领先于世界，正是因为美国在创新方面领先于世界。

2009 年是奥巴马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又时值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一场经济危机来临。为了让经济走出深渊，同时为长期可持续增长做好准备，对未来做出超前部署，美国政府再一次把“创新”作为利器，推出了这项《美国创新战略》。

《美国创新战略》是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科技政策办公室于 2009 年 9 月 21 日联合发布的，它建立在《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即《复苏法》）支持创新、教育和基础设施等的 1000 亿美元资金、总统预算、新的管理和行政命令计划的基础之上。该战略旨在激发美国人民的内在创造力，增强私营部门的活力，以确保未来的发展更稳固、更广泛、更有力。战略强调了一些关键领域，在这些领域，明智、平衡的政府政策可以为创新奠定基础，从而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带来共

同繁荣。

鼓励创新是美国政府一贯的政策主张，如 2007 年的美国竞争法、2009 年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等，均将创新作为刺激经济增长、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但此次美国创新战略的提出，并不仅仅是历史的延续，而是紧密结合时代背景，融入了新的特征。

通过简化和永久化的研发税收减免促进企业创新。奥巴马总统呼吁简化研究和试验税收减免政策，并使之永久化，从而为美国企业创新提供持续的动力。2011 财年预算承诺未来 10 年投入 1000 亿美元，以撬动更多的研发投资。

通过扩大对小企业贷款的支持和税收减免，并支持面向不同规模企业的完善的资本市场，来支持创新的创业者。除专利改革和“创业美国”计划以外，《负担得起的医疗法案》旨在消除创业的障碍，使美国人自行创业和加入新企业不会失去医疗保障。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彼此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为解决创新乏力等方面的问题，2010 年 6 月，欧盟通过了“欧洲 2020 战略”。其中的两个重点是，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智能增长”，以发展绿色经济、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日本在推动创新方面也不甘落后。2010 年，日本政府着眼于今后 10 年的发展，公布了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纲要（草案），把重点放在“绿色”（环境、能源）和“生活”（健康）领域，提出要以技术革新为重点，提高潜在增长力。欧盟、日本在创新领域集中发力，使美国倍感压力。

为了能使美国早日从金融危机的风暴中脱离出来，美国政府把增强国家的创新力作为新型战略提了出来，并对关键行业进行了适当的政策鼓励倾斜。

在某些行业和科技领域，仅靠市场不可能创造出预期结果。但这些领域对于国家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些领域包括清洁能源、健康信息技术、先进汽车技术、癌细胞的 DNA 测序、智能抗癌疗法、绿色建筑等有助于应对 21 世纪重大挑战的前沿技术领域。

这些是市场本身可能失效的领域，也正是政府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为促使这些重点领域产生新突破，美国政府将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包括要加大相关领域的投入。奥巴马总统提出要在未来 10 年投资 1500 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的研发和示范，这是一项历史性的重大投资，它将有助于掀起一场清洁能源创新的浪潮。美国在健康信息技术、先进汽车技术等重点领域的投入也会带动一些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政府一直重视“创新中心”的潜力，以寻找新机遇把有才华的科学家和创

业者联系起来，支持前沿领域的创新。这种理念支撑着美国能源部的能源创新中心计划，也推动“创业美国”计划建立新老企业家之间的联系。通过这些做法，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推动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2010年8月，美国政府发布了新版《横向合并指南》，将创新问题有力地纳入反垄断评估。另外，通过与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做法，《国家出口计划》对为美国生产商保障公平、开放的出口市场做出了持续的严格的承诺，使得创新型企业可以把业务扩大到全球，实现到2014年出口翻番的目标。“赢得未来”、“创新能力”、“竞争力”等词最近频频出现在奥巴马的讲话中，被普遍认为是其谋求连任的竞选关键词。

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不同，美中两国的创新战略也有所不同，难以直接比较和互相印证；但是，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作为世界上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其创新战略具有先进性和示范效应，可以为我国的自主创新战略提供一定的借鉴。

从2009年到2011年的两年间，美国创新战略经历了一次更新，其战略目标更加明确，战略措施也更为具体。面向未来，我国需要积极借鉴美国创新经验，继续完善自主创新战略。

欧盟：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

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困难时期，经济复苏步伐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伴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变革，全球体系加速转型、全球贸易治理加强、解决全球贫困与不公平需要各国和人民的共同努力，金融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还在延伸，全球贸易责任急需强化等。新设计增长方式，更具有包容性，对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包容性发展并非通过牺牲经济效率追求社会公平，而是要求让所有个体分享参与经济发展和获取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并暗含了通过社会公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之意。同时，包容性发展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概念，包括全球不同地域个体享有平等经济参与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和权利。

国际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欧盟经济，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且充分暴露出欧盟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存在各种瓶颈制约经济增长。经济金融危机前欧盟的经济发展就已落后于其他经济体，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欧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弱点以及不可持续性。

欧洲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一直结构性低于其主要的经济伙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过去 10 年间有所扩大的生产率差距。这些多是由于商业结构的差异加上研发与创新投资水平较低、使用信息与通讯技术不充分、欧洲社会中的某些部门不愿意创新、市场准入壁垒以及商业环境缺乏活力。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欧洲的就业率（平均占 20 ~ 64 岁人口的 69%）仍显著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女性就业率仅为 63%，与此相比，男性就业率为 76%。老年劳动者（55 ~ 64 岁）仅有 46% 的就业率，而与此相比，美国和日本该比例超过 62%。再者，欧洲劳动者比美国或日本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少 10%。

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欧盟劳动人口将从 2013/2014 年开始减少。现在 60 岁以上人口数量的增速是 2007 年以前的 2 倍——每年增加约为 200 万人，与此相比，此前是 100 万人。工作人口减少与退休人口比例增加相结合，将给福利体系带来额外的压力。

为了指导欧洲能够努力并稳步前进，欧盟共同达成有限数目的 2020 总体目标。这些目标应该代表智能、可持续以及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主题。在希腊公投演出惊险闹剧的背景下，G20 领导人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在法国戛纳落幕，会议拿出了一份《增长与就业行动计划》，决心采取措施，促进增长，创造就业，保持稳定，积极改革，推动社会包容发展。

“欧洲 2020 战略”提出的具体目标包括：使 20 ~ 64 岁的劳动者就业率达到 75%；将欧盟 3%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研发；将温室气体排放削减 20%；将未能完成基本教育的人数控制在 10% 以下，使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人群比例达到 40%；将面临贫困威胁的人数降低到 2000 万以下。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欧盟将启动 7 项发展计划。

相比较 2000 年出台的欧盟发展战略——“里斯本战略”多达数百个量化目标而言，2020 战略更加重点突出，目标明确，对跟踪和检验完成目标的进展和效果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此外，上述 5 大目标之间相互关联，互相促进，力图达到全面综合的经济结构调整与治理的目的。同时针对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着的不同国情，欧盟委员会建议各成员国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在实现共性目标的前提下，将之转化为符合成员国国情的政策目标和实施办法。

《欧洲 2020 战略》提出了 3 个相互加强的优先事项：即智能增长——经济发展基于知识和创新；可持续增长——促进经济更具资源效率、更加绿色环保以及更具竞争力；包容性增长——培育一个实现社会及地域融合的高就业型经济体。

为实现增长，欧盟在创造就业、增加科研投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教育

普及率和消除贫困 5 个领域制定了量化指标，并要求成员国予以落实。例如其中规定，在 1990 年基础上，将温室气体排放至少削减 20%，或者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削减 30%；把可再生能源占我们最终能源消费的份额增加到 20%；以及能源效率提高 20%。

此外，为应对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欧盟领导人决定加强内部经济治理，强化财政纪律和加强对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监督，加强金融监管，尽快推进相关立法，确保欧盟新的监管体系能在 2011 年初开始运作。

“2020 战略”的新意就在于提倡新的增长方式。它突出了三个“增长”，即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灵巧增长”，以提高资源效率、提倡“绿色”、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以扩大就业、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的“包容性增长”。

如果说“欧洲 2020 战略”是一个立足于长远的规划，其成功的保证是欧盟对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成效，是欧盟整体教育科技水平的提高，是绿色能源、低碳创新产业的形成的话，那么当前欧盟着力解决的平衡成员国财政、稳定金融和恢复信心的举措，就决定着这个新战略能否最终实现所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性的一步。

全球持续增长，意味着更应该强调包容性。从全球范围看，时代发展要求世界重新设计增长方式，以使发展更可持续和更环保，而这需要更多人的平等参与。随着时间演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全球发展的概念也在变化。过去，发展主要集中在提供更多资本，从而创造更多产出，最终在增长上得到衡量，各国追求更高的增长幅度。但是，现在世界普遍意识到，更高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可持续性。

当各国领导正忙于应对欧债危机时，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世界正面临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由不平等程度加深、失业及市场需求过低而导致的严重经济衰退。这种衰退绝不是仅仅通过几个经济刺激措施就可以解决的周期性问题，而是一个存在于现阶段发展过程中的固有的结构性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处在由过度追求 GDP 增长向寻求财富均衡分享的转型过程，就必须实现由“GDP 增长”向“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战略转移。

日本：优势产业与新领域增长战略

2009 年 12 月 29 日是东京证券市场上日经平均指数创下历史最高值 20 周年的日子。

1989 年的这一天，日经平均指数达到 38915 点。这是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日

本泡沫经济的终点，也是长期低迷的起点。2001 年小泉政府上台后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使股价和土地价格恢复上涨趋势，但去年由于美国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再次陷入低迷。

日本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摆脱代表雇佣、设备、负债的日本经济“三大过剩”的过程中，支撑日本社会稳定的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传统被打破。2002 年失业率达到 5.5% 后，日本国民的自杀人数也超过 3 万人。而这种趋势至今仍在持续。继去年以后，今年年末在东京也设置了临时接收被解雇人员的住处。

日本平成经济危机带来的 10 年大萧条，影响波及时间之长令人生畏，原因在于日本政府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实行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力度不够，财政政策考虑不长远，且对民间大量出现的投机行为没有有效的监控和治理，造成了从 90 年代初至今 10 余年的萧条。加上经济危机和海啸地震的双重打击，为扭转萧条的局面，日本政府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公布了到 2020 年的“增长战略”基本方针。

该经济增长战略的内容包括创造就业机会 476 万人，力争今后 10 年的实质国 GDP 平均增长率超过 2%，其发展重点将放在旅游、环保、医疗等新兴业务领域，着重发展新兴业务领域。

根据该战略计划，到 2020 财年日本 GDP 将从目前 473 万亿日元提高至 650 万亿日元（约 7.05 万亿美元）。当然这个目标对于近几年增幅最高仅为 2% 的日本经济而言可谓宏大。该战略还预计，日本将克服通缩这一经济增长障碍。

为实现这一目标，该战略指出，决策者应着重拓展有望带来额外增长的六大领域：环境及能源、医疗及护理、旅游、科学技术、促进就业及人才培养。到 2020 年环保、医疗、旅游等产业合计将创造逾 400 万个岗位。公共与私营部门在科技相关研发上的投资占 GDP 比例将超 4%。

日本还计划创造价值逾 100 万亿日元的新需求，其措施包括：鼓励医疗企业开展更多海外业务，推动技术创新以遏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吸引更多游客赴日等。此外，日本政府希望在未来 4 年内将失业率降至 4% 以下。

该战略有 3 个重点目标，分别是：2020 年将太阳能发电量提高到现在的 20 倍的“低碳革命”；充实医疗和护理服务的“健康长寿社会”；在旅游观光等领域“发挥日本魅力”。日本政府将提前在国家政府机关导入太阳能发电计划。政府的公用车将更换为混合动力车或者电动车，还将统一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的充电机器的国际规格。

为了振兴旅游业等，构造地方电视台制作向日本全国宣传其特产和旅游信息的

系统，促进引进乘员在百人以下的小型喷气机。

因目前日本经济复苏缓慢，且日本经济在过去几年中过度衰退，所以从这方面看日本的新战略略显激进。未来数年实际 GDP 年均增速可能仅在 1.0% 左右。因日本人口迅速老龄化将令该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持续承压，其影响幅度约为 0.5% ~ 1.0%。日本制定的 2020 经济战略的亮点就在于确定对优势产业的支持以及对新领域的财政扶持，从而改善日本的就业环境。

在经济战略中，把医疗、护理、健康相关产业发展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在全民医保制度下，以较低的成本向国民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健康长寿之国。通过大力推进生活创新（医疗、护理领域革新），步入老龄化的日本将刺激和培育新的服务产业、制造产业。

1. 推进创新性药品、医疗及护理技术的研究开发

推动具有较高安全性的优秀创新型药品、医疗及护理技术的研究开发。产学研机构要共同推动药品开发，促进新药、再生医疗等尖端医疗技术、远程医疗系统、医疗护理机器人等的研究开发及实用化。

2. 促进向亚洲等海外市场的扩展

在相继迎来高龄社会的亚洲各国，医疗、护理、健康等相关产业也将有较快增长。应把医药品的海外销售、以亚洲富裕阶层为对象的体检、治疗等医疗及相关服务与旅游业联合起来发展。

3. 强化医疗和护理服务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人口快速高龄化及医疗技术的进步，社会对高质量、多样化的医疗、护理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但是已有的制度或供应体制不能应对这一变化。日本应该强化医疗和护理服务的基础，以便使高龄者能够消除对未来生活的不安。

技术创新是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断地创新与变革使得产业集群化程度越来越高，从而形成整体的竞争优势。日本等发达国家主要是依托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无论从经济政策的内容还是后期确保制度落实的努力，日本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志于使自己国家尽快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并使自己能够在经济复苏中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国家形象。

与此相比，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起步较晚，各方面的积累并不能完全支撑技术创新的需要。因此，我们仍然需以大企业为依托，在促进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同时，还要针对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并制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及相互间的网络联系提供平台。

印度：班加罗尔的国际科技园

如果说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那么班加罗尔就是印度的硅谷。二者南北相望，共同承载着各自民族战胜硅谷、富国强民的渴望。

印度卡纳达克邦首府班加罗尔是以信息产业为支柱产业的新兴科技型城市，其信息产业，尤其是软件业的发展已经蜚声国际，不仅成为班加罗尔的主要都市型工业，还为班加罗尔带来了“印度硅谷”的美誉。班加罗尔软件业的产业规模与质量不仅在印度首屈一指，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流的。

1991年，印度政府在班加罗尔设立该国历史上第一个软件科技园——STPI（印度软件科技园），园区耗资60亿卢比，由卡纳达克邦、印度塔塔集团与来自新加坡的资金合建，邦政府占20%的股份，其他两家各占40%，至此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才乘上发展的东风。班加罗尔科技园企业由外国、本地及合作公司组成，已有高科技企业5000多家（1000多家由外资参与经营），软件企业1400多家。外国公司为其母公司提供离岸外包服务，本地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为本地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印度软件百强企业，前20位贡献了大部分的销售收入。

1997年，卡纳达克邦宣布其IT产业发展政策，成为印度第一个宣告发展IT产业的邦，并将发展的腹地选择在首府城市班加罗尔；1998年，班加罗尔的IT企业达到253家，项目投资总额为8.4亿美元。

1999年，IIITB（印度班加罗尔信息技术研究所）和KITVEN基金成立；2000年市内IT企业达到782家，项目投资总额11亿美元；2001年班加罗尔的IT企业已经超过900家，项目投资总额达到16亿美元。

2010年印度软件产业产值731亿美元，班加罗尔约占一半，班加罗尔市与软件相关的企业都集中于班加罗尔软件产业科技园。

根据报告预计，印度的IT和外包产业的年增长率将会达到30%以上。为了适应这一需求，班加罗尔、新德里、海德拉巴、金奈和孟买等城市将会在5年内雇佣100多万IT员工。其他印度城镇也会增加60万个IT行业的就业机会。

园区内有印度本地的著名软件企业INFOSYS（印孚斯技术有限公司）、WIPRO（威普罗公司）和TATA（塔塔集团）咨询公司等，国际知名品牌公司有通用、微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甲骨文、德州仪器等。全球500强中就有160多家企业由印度供应其全球营运点所使用的软件。全球软件开发评级CMM的最高等级

是五级，印度拥有 58 家，其中的 33 家就坐落在班加罗尔。

印度概念之所以这么热，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外企业发现了外包的极大魅力。它们发现，通过将办公支持等工作外包给印度公司，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有时，它们还将部分 Front Office（前端工作）也进行了外包。外包产业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据统计，包括软件外包在内的服务外包产业为印度创造就业岗位逾 230 万，产值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7%，占印度出口总额的近四成。被誉为“印度硅谷”的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是印度外包产业的中心。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曾在一次访印时说，21 世纪软件大国很可能在印度。一方面，这极大鼓舞了印度发展软件业的信心，另一方面，许多欧美技术人士担心饭碗被抢走。于是诞生了“班加罗尔化”一词，其隐喻是有许多人的工作被外包到了班加罗尔。

作为工业园的入住者之一，Infosys 公司最新财年收入名列全印度外包服务业的第二位。这家公司日前表示，2005 年第三季度公司的收入增长了 32%，达到 5.59 亿美元，年销售收入有望超过 20 亿美元。公司的利润也上升了 28%，而且其业务范围还扩展到了石油与天然气、保险和制药等新领域。为了开辟这些新市场，公司新招募了 3200 多名新员工，并争取到了 36 名新客户。

离岸外包业务是班加罗尔国际科技园的主要业务。不只是 Infosys 公司因此受益，整个印度外包产业的发展也依托于其软件产业的迅速崛起。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印度软件产业保持了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态势。1990 年，印度软件产业年产值总计只有 1.9 亿美元，到 2008 年已迅速增长到 521 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 36.6%。2009 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同比增长仍达 12.9%，产业规模为 588 亿美元。

班加罗尔的产业规模占印度整个产业的 36%。班加罗尔的成功与政府的支持和创新离不开。印度历届政府对班加罗尔的外包业发展给予了充分的政策扶持。政府在吸引外资和向世界宣传班加罗尔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放宽外资软件企业进入印度的壁垒，外方控股可达 75% ~ 100%，使班加罗尔成为跨国企业的进军目标。

印度政府对软件出口实行零关税、零流通和零服务税，允许出口商选择纳税方式，免除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税，允许其保留出口收入的 50%。2000 年进出口政策出台“促进出口资本货物计划”，对任何部门进口的资本货物都征以 5% 的关税。在此之前，对软件企业进口到岸价不超过 100 万卢比的资本货物实行零关税政策；为提高计算机软件的质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政府还放宽了对计算机进口的限制，大幅度降低关税等。

凡是软件产品全部出口的企业，免交所得税；对各种形式的软件出口收入（包括部分由 IT 带动的服务业出口收入），免征所得税，免税期为 5 年，每年的免税额以 20% 的比例递减；风险基金企业投资任何项目的所得，包括利息收入，均免征所得税。

上述的税收优惠政策，诸如免收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税，全部产品用于出口的软件商可免征所得税，吸引了大批知名软件企业在班加罗尔的投资。在企业资产方面实施的优惠政策有：外资控股可达 75% ~ 100%；允许进口计算机技术的企业资产限额从 2 亿卢比降至 100 万卢比。

在政府的支持下，班加罗尔有充足的发展空间，但却正在失去坚实的发展基础。尽管与硅谷渊源颇深，甚至获誉为硅谷的“后台办公室”，但班加罗尔的城市环境与硅谷其实相去甚远。伴随着城市人口由 300 万激增到 650 万，班加罗尔的水电供应持续紧张，房屋租金价格则不断上涨。

印度第三大软件出口商维普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齐姆·普雷姆吉曾说：“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基础设施问题严重。过去 5 年，班加罗尔的基础设施没有任何改善，我们也难以预见未来 5 年会有所改善。我们的公司在班加罗尔很难持续发展。”而随着包括大连在内的亚洲其他软件外包城市的兴起，班加罗尔的定位愈发尴尬。对于印度而言，这座城市也许正在退变为一个“甜蜜的负担”或者“幸福的烦恼”。

中国：走服务外包的集群之路

随着中国国内和离岸服务外包需求的增加，政府的进一步推动，未来几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十二五”行业发展目标未来我国服务外包行业发展趋势，既取决于现有的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也取决于国际、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而形成的新的市场需求。《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对未来几年我国服务外包行业发展问题提出了如下目标：

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优化升级的新要求，针对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立足我国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客观实际，鼓励发展具有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高创新性的 ITO（信息技术服务外包）、BPO（业务流程服务外包）和 KPO（知识流程服务外包）。巩固提升优势领域：坚持做大规模、做强实力、加强集聚、扩张优势，进一步夯实现有优势行业的发展基础，着力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力争在软件服务外包、IT 基础设施服务外包、金融服务外包、通信

服务外包、医药研发服务外包等领域实现较大发展。

2006 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收入总额达 118 亿美元，其中 IT 服务外包产业规模为 75.6 亿美元，业务流程外包产业规模达 42.7 亿美元。中国承接商所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约占整体产业的 12.2%，其他为国内服务外包的收入。其中，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达到 14.3 亿美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55.4%。

2010 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总收入将达 262 亿美元，其中 IT 服务外包受离岸服务外包带动，仍占更大的份额，约 65%；业务流程外包市场增长较快，离岸业务流程外包业务四年间将增长约 2.5 倍，但由于基数较小，至 2010 年对该产业的带动不大，约占 35% 左右。

中国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对发展软件外包产业的支持力度日益加大，另一方面是中国软件企业正在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新的产业分工链条之中，并已经将发展软件外包作为企业的战略选择。

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速，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呈集聚发展态势，以 21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重点，已形成“五大集群”和“东西映射”的良好格局，中国将在全球服务外包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形成的“五大集群”是指环渤海集群、长三角集群、珠三角集群、中西部集群和东北集群，“东西映射”则是指中西部地区与东部三大集群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合作的格局。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目前呈现出四大趋势：一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速，产业升级趋势明显，二是我国服务外包正逐渐形成带有自己特色的“中国模式”，三是离岸外包近期仍以软件服务外包为主，市场格局短期难以改变，四是在岸外包的需求将大量出现，地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细分服务的地域集中度上升。

软件外包业务向二三线城市转移。随着一线城市人力成本及商务成本的上升，软件接包企业将低附加值业务转移至二三线城市。转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二三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另一种是在二三线城市寻找长期合作伙伴。国内不少中小型企业组成企业联盟，作为大型外包企业的下游企业，获取软件服务外包的转包和分包业务。

依托十一个服务外包基地和国家六大软件出口基地（北京、上海、天津、深圳、西安、成都），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速，服务外包 / 软件出口集群已经形成，服务外包层次不断提升，服务外包价值链从低端向中高端转移，利润率也有所提升。吸引了全球软件外包市场的目光，进入成熟化、规模化发展阶段。但总体来看，中国的软件产业仍以国内软件市场需求为主，以出口外包为辅。但软件出口外包和 BPO 市场潜力巨大。

我国的信息技术外包起步较早，ITO 正在中国快速成熟，当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中国国内的 IT 服务外包市场是由硬件产品支持服务发展起来的，逐步拓展到软件开发、支持服务和 IT 运营服务。其中软件服务外包占有超过一半的比重，如果考虑到承接的离岸服务将达到 60% 左右。随着全球离岸软件服务外包逐步向中国转移，离岸 IT 服务外包所占比重将从 2006 年的 18% 上升到 2010 年的 30% 左右。

中国可以作为印度和其他 ITO 市场的另外的选择，但是整体市场成熟度还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市场。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成熟的差距存在于在华建立运营中心的大型印度 ITO 公司，特别是要使用中文来申请和服务时，或者是在同更大的更成熟的具有美国市场客户的当地中国公司。

近几年来，随着电信运营商的重组与转型、3G 网络以及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新型服务项目拓展等，推动了电信服务业的大力发展，促使电信服务外包市场和规模扩张迅速，并且保持持续增长态势。2009 年中国的电信服务外包市场规模达到了 451.4 亿元，比 2008 年的 351.0 亿元增长 28.6%，比 2003 年的 198.1 亿元增长 127.9%。2003 ~ 2009 年，中国电信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年均增长达到 14.7%。电信服务外包在众多服务外包行业中处于优势地位，并且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目前，中国金融服务外包主要集中在银行业和保险业外包两个领域。银行业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外包、灾难备份外包、银行卡外包和客户服务四个方面；保险业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外包、理赔勘查外包、营销业务外包等几个方面。

中国金融服务外包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类城市：一类是战略地位显著的城市，如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金融机构最为集中，发展金融业服务外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类是地缘优势明显的城市，如大连、深圳、广州、天津、苏州（昆山）、杭州等，这些城市借助自身的产业氛围，承接核心城市的金融溢出业务；一类是成本优势凸显的城市，如成都、重庆、西安、武汉、长沙等地，以低廉的人力成本及商务成本吸引金融服务外包业务转移。

改变政策扶持方式，提高政策扶持效应。从理论上讲，目前国家对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扶持已经非常优惠，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许多服务外包企业没有享受到，政策扶持没有得到应有效应。主要原因是政策门槛太高：一是只限于离岸外包业务，二是局限于国家示范城市企业，而广大在岸外包业务和非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企业被排除在外。这是传统的开放政策思路使然，即政策向涉外业务和部分地区开放倾斜。

中国加入 WTO 以后,传统的区域部门倾斜的开放政策思路已被全方位开放思路所取代,服务外包政策思路也应相应调整,由向部分地区倾斜向重点行业倾斜转变,从重点扶持离岸服务外包向支持在岸服务外包拓展。

越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目标

近几年,越南 75% 的纺织产品用于出口,其中有 55% 出口到美国,20% 出口到欧盟,10% 出口到日本。越南纺织企业还积极主动开拓日本、俄罗斯、中东地区等新兴市场。特别是东盟同日本签署的贸易协定生效后,越南出口到日本市场的纺织品将享受进口零关税待遇。此外,越南纺织企业越来越重视国内市场开发。据统计,每年越南国内纺织品消费需求高达 25 亿 ~ 30 亿美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南纺织、制衣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企业逐渐从中国、印度、泰国等传统市场转战越南。越南纺织产品质量高、品类全,供应稳定是吸引外商关注越南的原因。

20 年来,越南共吸引了 82 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前来投资,项目达 9500 个,合同额达 980 亿美元。外商投资对越南 GDP 的贡献率为 16%,如 2007 年为国家财政提供收入 15 亿美元,创造 120 多万个劳动就业机会。三星、LG、索尼、东芝等主要的日韩企业都在越南设有工厂。

其中,LG 的彩电在越南当地占有率名列第一,其工厂生产领域包括平板电视、显示器、空调、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等产品,并在当地销售产品。

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越南 2007 年吸收外商 FDI203.3 亿美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130 亿美元)156%,比 2006 年增长七成。其中亚洲地区占投资项目总数的 78% 和协议投资总额的 70%。居前五位的 FDI 来源地分别是:韩国(44.6 亿美元)、英属维尔京群岛(42.7 亿美元)、新加坡(26.1 亿美元)、中国台湾地区(17.3 亿美元)和马来西亚(10.9 亿美元)。据项目落地问卷调查,上述新增投资额中的 1/4,系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转移而来。

越南作为中国台湾长期以来“南向政策”的首选,非常有希望分流其部分投资回流。事实上,英属维尔京群岛为台资进入越南的一个重要中转地,若计算这一因素,则台商在越投资很可能位居第一。

驻扎中国大陆的台资也开始往越南“伸腿”。世界级电子外包制造商富士康集团也将其布点延至越南,已于越南北部海防市获得 1000 公顷项目用地;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富士康投资 8000 万美元的一家电子厂也已投产。据悉,富士康在越

总体投资规划不下 50 亿美元。

美国对越投资趋势亦不容忽视。美国在越现有投资额度不大，但据越南《劳动报》2008 年 3 月 20 日报道，当月越南、美国就双边投资和贸易框架协议协定举行专家级会谈，双方商定两国经贸合作的目标是：到 2010 年使双边贸易额达到 150 亿 ~ 180 亿美元，美国将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将增加进口美国的高端设备和先进技术；美国对越直接投资将超过 100 亿美元。

长期困扰美越两国的“橙色脱叶剂”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望获得解决。越南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即声称，越南战争时美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橙色脱叶剂，给越南的近 200 万人口带来严重健康问题。接触过橙色脱叶剂的美国退伍军人，都得到了赔偿，而越南人则没有。美国法庭也多次驳回越南原告，对橙色脱叶剂生产商提出的诉讼。

此外，日本对越投资也颇为踊跃。日本商界流行“中国 +1”的说法，即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应该在临近的东南亚国家中选择一个配套基地，以增加企业经营的灵活性，避免风险过于集中。比如在 2007 年底，日本数码相机厂商奥林巴斯宣布对在中国深圳、广州的两家工厂进行整合，关闭其中一家，将部分生产转移越南，投资 100 亿日元创办一家新的数码相机装配厂。

然而，在众多资金雄厚的国家将目光转向越南时，越南本身的劳动力供给却出现了状况。

胡志明市是越南经济的火车头，市内的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吸收了全国各地大量的务工人员。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每个春节过后都会为招工发愁。尽管纺织、制鞋、电子、通讯、零售等用工大户在春节前就着手招聘工作，但仍无法解决“用工荒”。2011 年春节后“用工荒”继续上演，虽然比 2010 年春节有所减轻，但缺少工人比例仍在 25% ~ 30%。

此外，就劳动力素质而言，越南也不具备优势，目前越南劳工薪资涨幅在亚洲高居第二。越南 8500 万国民中，公民识字率 94%，高中毕业生能使用英语进行基本对话。这样素质的劳动力，平均月薪不足 100 美元。

为此，厂家对于工人管理下足了功夫，在提高福利之外还增加了一些人情味，因此逢年过节也都能确保供货顺畅，也会适当地增加一点劳工成本。

纺织和制衣业在越南制造业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不但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还解决了一大批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劳动力就业难题。据几家纺织公司负责招聘的专员介绍，这些企业招聘工人的标准为初中以上学历。纺纱、织布、设备修理等熟练工人月工资在 130 万 ~ 160 万越盾（1 美元约合 2.1 万越盾）。

据越南统计总局数据显示，拥有 1000 名工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6%，而 77% 的企业为中小企业。为数不多的大型纺织企业每月向工人支付 230 万～270 万越盾的工资，其他中小企业向工人支付的工资大多在 100 万越盾左右。普通工人的工资为 140 万～150 万越盾。对于刚刚进入纺织行业的工人，公司一般会提供为期 20 天左右的免费技能培训，培训期间每人可领取 90 万的基本补贴。工厂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3 个月的试用期结束后，公司将为员工缴纳社会、医疗等保险。

虽然工资水平高于政府规定的 93 万越盾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但为了留住工人，一些中小企业已经将工资提高到 150 万越盾或更高，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但有企业负责人表示，随着近期越南政府将电价上调 15% 以上以及燃油价格的大幅上调，工人生活成本增加，实际招聘工资要远高于上述水平。

在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共同努力下，越南纺织制衣业越来越被国际市场看好。但随着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国家滥用反倾销措施加大对越南纺织品进口的限制，越南纺织制衣业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产业转移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引起发达区域的部分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地区，从而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由发达区域向发展中地区转移的过程和现象。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主动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各项工作，才能够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为让引进项目留得住、有发展，越南自己也必须在坚守政策底线的基础上，积极做好跟踪服务，使外来企业投资越南的热情不断高涨。

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不容乐观

在新一轮全球并购高潮中，发达国家实际上是在强化其在原有贸易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则被更加牢固地锁定在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进而掉入“国际分工陷阱”。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国际分工）指世界上各国（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是各国生产者通过世界市场形成的劳动联系，是国际贸易和各国（地区）经济联系的基础。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从一国国内向国际延伸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

社会分工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但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还没有从社会分

工发展到国际分工。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国际分工才发展了起来。

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分工不仅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世界范围内的商品数量，而且增加了国际交换的必要性，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

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决定国际贸易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而且还决定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内容。第一次科技革命以后，形成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分工。在这个时期，由于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出现了许多新产品，如纺织品、船舶、钢铁和棉纱等。

随着国际分工模式的演进，国际分工已经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产品分工发展到要素分工，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产品分工与要素分工并存的格局。产业间分工与产业内产品分工都假定要素同质并在地区间不流动，在资本等要素可流动的条件下，分工模式发生变革，分工更加细化。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就业岗位正在成为世界最稀缺的资源。近年来，发达国家夸大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其国内就业状况的影响。

有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约为 12%。2004 年全年进出口总量达到了 11547 亿美元，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 5497 亿美元，接近全年进出口总量的一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业务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巨大商机。国内生产企业也把眼光瞄准国际市场，从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中谋求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仅零售商品的采购，中国已成为沃尔玛全球第七大商品采购来源国。2002 年起，沃尔玛在中国的商品采购总额每年增长 30 亿美元，2004 年达到了 180 亿美元。沃尔玛还将全球采购办公室的海外总部设在了中国。

制度是“非中性”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是“非中性”的。发达国家完全掌握了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主导着国际规则的运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都被发达国家所掌控。

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主宰着这些组织的运行。没有发达国家批准，其议题或决策难以实施。发展中国家要参与全球化就必须执行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发达国家甚至要求发展中国家遵守某些连它们自己也无法遵守的规则。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很多场合下试图通过“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方式增加它们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意图，但是总体来说，国际规则的运行全部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掌握规则制定权意味着，发达国家可以更好地利用规则为本国的利益群体服务，同时也主导了国际分工格局。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与发达国家虽然都可能从全球化的产业链条中获得收益，但是它们获得的收益数量却是大不相同。

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充足的资金和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员；而发展中国家只有大量闲置的低素质、低技能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发达国家都能够从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是为了扩大市场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这不意味着发达国家不能够在国内生产。发达国家完全可以不与某个发展中国家交易，但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本国经济发展却不能不与发达国家交往。

国际分工收益的绝大部分由发达国家获得，发展中国家只能获得其中的一小部分。为了这一小部分收益，发展中国家还会进行激烈的争夺。它们竞相开出各种优惠条件，如税收优惠，允诺最大限度地开放国内市场，承诺遵守发达国家制定的严厉的经济规则，甚至做出政治上的让步。然而，发达国家的资金不可能流向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它们总是流向那些能够给它们带来最大收益且风险最小的国家。结果是有的国家开放了市场，却没有资金和技术流入。也就是说，虽然它们尽力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但并不能够在全球分工链条中获得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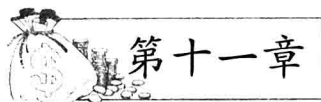
我国遇到的一系列国际经贸矛盾本质上都对对就业岗位的竞争密切相关。在贸易自由化引起就业岗位争夺的同时，投资自由化也引起了发达国家国内对就业岗位输出的忧虑。跨国公司的业务外移造成的岗位外流使发达国家内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共同走上反经济全球化的舞台。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与其它要素相比，劳动力是最难跨国界流动的要素。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避劳工问题奢谈分工利益是难以回应现实挑战的。

当代国际分工无疑是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都必须融入，任何国家不可能孤立于这个分工体系之外。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发展中国家谋求分工利益应有更现实的态度、更开阔的视野。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不拒绝、不排斥上述两种类型的发展模式。但是，必须看到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多处于产业垂直分工低端，一些地区的 GDP 虽然增长很快，但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国民收入。

我们的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不应长期停留在这一水平上，不应只依靠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而应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努力提高竞争优势，推进产业升级，改善国际贸易条件，在技术密集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升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全球化进程中的贸易冲突与合作

金融风暴改写世界贸易格局

1955 ~ 1970 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 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 116%，日本增加约 500%。1960 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当于西欧的 3 倍，日本的 10 倍。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实行一定的贸易保护。这一政策也使美国付出了代价。经历了 1948 ~ 1949 年和 1957 ~ 1958 年两次规模较小的经济危机和 1960 ~ 1961 年的经济衰退后，美国的实力进一步下降，日本和德国的实力不断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因其强大的经济地位而主导国际贸易的发展方向。二战结束时，美国拥有世界 50% 的生产能力和 70% 以上的黄金储备。1950 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 3 倍，西德的 4 倍，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 6 倍，日本的 30 倍。美国最初的政策是发挥自身的绝对优势，积极推行自由贸易，并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夺取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

以 1971 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这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运动不断发展。美国企业加速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日本、欧洲各国也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在 1966 年达 80% 以上，1971 年采用“浮动汇率”后，这一比例不断下降，到 2001 年已经下降到不足 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生产投资需求萎缩，任何贸易保护措施都无法把美国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然而，一场金融风暴正在彻底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格局。

进入 2008 年 9 月之后，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终于爆发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发展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恐慌程度之深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各国政府则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救市行动。不管这场危机最后如何演变，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必将出现重大变化。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影响。金融资本相对发达的经济体首先受到冲击，外资抽逃，股市缩水，货币贬值。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将令亚洲在全球贸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陷入经济衰退，且很有可能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此次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受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和美国经济和金融联系最密切的其他发达国家。即使西方国家能够解决当前的金融危机，由于信贷紧缩如此严重，经济衰退几乎难以避免。由于此次危机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引起的，金融机构的资产损失巨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资产价格可能会继续下跌，金融机构也会继续紧缩信贷以改善自身的财务状况，中央银行即使不断减息和扩大货币供给也没有用，因为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出现信贷紧缩、经济衰退、物价下跌的恶性循环。这种情况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的美国和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都出现过。

由于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和出口市场，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发展中国家。那些金融市场外资比重较大、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且出口结构单一、自身存在比较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的国家受影响最大，严重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就像部分东欧国家的情况就很严峻。那些国内经济规模较大、财政和金融状况稳健、外汇储备充实的国家抗风险能力比较强，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短期冲击后，有可能率先恢复增长，并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增长。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尽管这次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定冲击，但毕竟危机的发源地在发达国家，如果发达国家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状态，而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一些主要国家的带领下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东亚国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普遍较高；但即便如此，不同国家在外部冲击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也各不相同。

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东亚贸易分工体系“雁行模式”就逐渐成型。所谓“雁行模式”，其内涵是：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将成熟的或丧失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服装、玩具、塑胶制品、中低端电子产品等陆续转移到一些东亚新兴工业化

国家和地区。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开始加入到这一东亚分工体系中来，由此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贸易分工图景，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产业间贸易垂直分工形态。

然而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随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雁行模式”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

2001 年日本通产省《面对 21 世纪对外经济政策挑战》的贸易白皮书承认，亚洲国际分工体系从此进入一个“多元化、网络化”的时代。也就是说，除以往的产业间垂直分工外，还出现了产业（品）内垂直分工，以及某种程度的水平分工。

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 2009 年一季度以来，中日韩对外贸易都出现了明显下滑。但仔细比较后，又会发现三国贸易在外部冲击下的稳定程度明显不同。

目前韩国的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分别是日本和中国，中国是其主要贸易顺差来源，日本是其主要贸易逆差来源；日本的第一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中国和中国，近年来中韩两国都是其重要贸易顺差来源（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而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日本和韩国仅居第三和第六位，且基本上都是逆差。因此，当中国出口订单减少，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对处于供应链中游的韩国和上游的日本的进口需求，并且在供应链中所处位置越高，出口下滑势头越是显著。反过来，日韩出口下滑，未必会对中国有直接影响。

随着这场金融危机不断地深化，对其严重程度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2008 年初，国际知名投资家索罗斯曾说“这是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是与 1929 ~ 1933 年间的金融危机相比较而言。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这是与 1907 年的美国的银行危机相比。但这也为以我国为主导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契机。只有重新整合贸易分工体系，促进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双向自由流动，提高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才能有效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贸易保护主义阻碍国际贸易

尽管泰国香米的价格比国产大米的价格高出很多，但还是会有很多消费者前去购买，回家尽情享受香米特殊的米香。与此同时，我国新疆的哈密瓜也时常出口东南亚各国，让各国都能品尝上哈密瓜的甘甜。这就是国际贸易给各国消费者带来的

好处，它能够使各国互通有无，以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但是国际贸易的功能不仅仅是互通有无，它还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假如说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甲国和乙国：甲国土地肥沃且粮食产量较高，如果全国所有人都去生产粮食，一年可生产 60 万公斤；但该国在生产衣服上处于劣势，所有人都去生产衣服全年可生产 1 万件。而乙国正好与甲国相反，它在生产衣服上占优势，一年可生产 6 万件；但由于乙国土地贫瘠，产量不高，所有人去生产粮食全年只能生产 10 万公斤。

在这里我们假设甲乙两国不进行国际贸易，各自均生产粮食和衣服，甲国用一半的资源去生产粮食得到 30 万公斤粮食，用剩下的一半资源去生产衣服，最终可得到 5000 件衣服。乙国同样用一半的资源去生产粮食，剩下的一半的资源去生产衣服，最终可得到 5 万公斤粮食和 3 万件衣服。

通过上面的假设我们可以看到，甲国在生产粮食上具有优势，而乙国在生产衣服上具有优势。既然国际贸易不仅可以使各国的商品互通有无，而且还可以增加各国的物质财富，阻碍国际贸易有损于各国的利益，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中，还有那么多国家实行保护性贸易政策呢？

不同的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影响各国之间在国际贸易中的收入分配，还可以影响一国国内各利益团体的收入分配。但是，如果一个贸易小国提高进口关税，对该产品的世界需求情况没有大的影响，产品的世界价格保持不变，加征的关税只能由本国的进口商承担，最终只会使小国的社会福利受到损害。

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在限制进口方面，主要是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前者主要是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阻止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后者则包括采取进口许可证制、进口配额制等一系列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口。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较晚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常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达国家则多提倡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用来作对付危机的临时措施。到了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已不仅仅是抵制外国商品进口的手段，更成为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手段。贸易保护主义，无论新旧，其中心思想是一样的：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可能会影响到一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因而会引起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不同的反应。但新旧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更胜一筹，具有强制性强，对贸易各方影响大而直接，受约束范围广和表现形式多样等特点。

美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也是自由贸易的最热心倡导者，但它在贸易壁垒方面却也是最大的“两面派”：一方面对别国的“贸易限制”火冒三丈，指责欧盟农业补贴，抱怨中国对美国音像制品和鸡肉的进口限制，要求印度、韩国和日本降低关税，“改变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它的贸易壁垒措施已不止限于单纯的对某类、某国产品征收“两税”，而已上升到“国策”的范畴。

美国如此，其它国家也大同小异，贸易保护主义被赋予了更多“非贸易”的“附加值”，且因为效果强烈、反应迅速，被尝到甜头的各国一再记起。由于全球经济尚处谷底，各国失业率普遍较高，贸易保护主义在表面上可以减轻外国产品的冲击，保住更多就业机会“肥水不流外人田”，因此得到劳工阶层和低收入家庭的普遍支持，为争取这一大票仓，各国政客自然不惜垒起贸易壁垒来取悦，即使饮鸩止渴，也顾不得许多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工厂经营艰难、失业人口加剧。面对这样的局势，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迅速抬头，尤其是美国。2008年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17870亿美元的振兴经济方案，遭到各国激烈反对的“买美国货”条款也包含在内。加拿大总理在第一时间就明确表示反对，欧盟更是扬言进行报复，并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欧盟驻美大使布鲁敦直言，“历史已向我们显示关闭市场的后果”。他暗指美国的保护主义法律和欧洲的报复引发了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国更是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呼吁各国“通力合作，共度时艰”。然而，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从短期的、狭隘的利益观出发，纷纷出台保护性贸易政策。

欧盟在2009年在纺织品服装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标准，这些标准从技术等多层面上限制了区域外的产品进入该区域。美国以安全环保为借口，对进口的儿童消费品制定了更高的环保标准，并在进口安检方面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程序，使得进口安检程序比以前更为繁琐。2009年11月8日，日本厚生劳动省提出了食品卫生法修正案框架，该修正案的实质是为了保护日本本国的利益，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口。

贸易保护主义一旦实施，势必遭致对方的普遍报复，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深沟高垒，各自以邻为壑，最终导致大家头破血流的“零和效应”。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出发点和依据，是巨额的贸易逆差，然而正是这一巨额逆差，奠定了美国“第一市场”、“第一消费实体”的地位，确立了美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主导地位，巨额的逆差还使美元具有良好的流通性和循环性，而这又是美元得以长期稳坐国际结算货币地位的关键。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试图削减贸易逆差，无疑将动摇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

位，动摇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地位，这是得不偿失的。

为了抑制越来越严重的贸易摩擦，各国也开始纷纷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2009年2月举行的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与会者发表联合声明，呼吁避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我国一直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在2010年3月14日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总理温家宝明确指出：“我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自由贸易不仅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会促进世界的和谐，还能改变和提高人们的生活。”

一波三折的多哈谈判

多哈会谈是指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多边贸易谈判。2001年11月，世贸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人们称之为“多哈发展议程”，简称“多哈回合”。

多哈回合谈判的宗旨是促进世贸组织成员削减贸易壁垒，通过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特别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谈判包括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争端解决、知识产权、贸易与发展以及贸易与环境等8个主要议题。谈判的关键是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主要包括削减农业补贴、削减农产品进口关税及降低工业品进口关税三个部分。

多哈回合谈判是由全体世贸组织成员共同参与的多边谈判，但真正的谈判主角是美国、欧盟以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协调组”。各方原计划在2005年1月1日前结束谈判，但因分歧严重，谈判时间一再被延长。

多哈回合谈判旨在通过订立多边协议来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它涉及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规则、争端解决、贸易与环境以及贸易和发展等诸多领域，涉及世界65亿人口中的55亿、世界年出口贸易总额13万亿美元中的97%，是目前为止参与方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其重要意义和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多哈谈判是各国力量博弈较量的过程，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谈判中针锋相对。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乏力，谈判困难重重。面临着发展速度放缓、失业率上升、世界贸易下滑的局面，许多国家表现出对多哈回合谈判的强烈期待，希望通过多哈回合谈判，打破非农产品部门减让和农产品保障机制等谈判僵局，提振全球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尽管各国多次做出努力，

但多哈回合谈判的道路仍然困难重重。

世界银行曾经预测，若是 2008 年多哈回合谈判能够成功的话，可以产生 2870 亿美元财富，让 6600 万人摆脱贫困，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从中获利 860 亿美元。多哈回合谈判的意义既然如此重大，各国又非常重视，那为什么谈判的道路这样坎坷呢？尽管造成多哈回合谈判屡受挫折的原因很多，例如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阻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规则制定权的争夺等等，但其核心原因在于各国之间在关乎自身利益上的分歧严重，暂时还没有找到契合的交点。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纷纷为多哈回合谈判而奔走，希望多哈回合谈判有所进展。2009 年 9 月 4 日在印度新德里，40 个国家的贸易部长呼吁尽快恢复多哈回合谈判，争取在 2010 年底使多哈回合谈判能有个结果。在各方的努力下，多哈回合谈判终于在 2010 年 2 月 1 日重新开锣了。但由于各国之间的主要分歧并没有消除，美国的态度不明朗，使得原本乐观的形势又变得模糊起来。

农业谈判是 2006 年多哈谈判中最关键、也是最复杂的环节。它既牵涉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也牵涉发达成员之间以及发展中成员之间的讨价还价。40 多年来，农业贸易一直处于多边贸易规则约束之外。

长期的巨额国内支持、出口补贴和进口保护，甚至使欧盟的弱势产业——农业也变成了人为的出口产业。而本身有着比较优势的美国农业，在政府的出口补贴下，实力更为强大。欧美合起来给农业提供的支持和补贴平均每天高达 10 亿美元。这些地区农产品的大量出口严重扰乱了国际市场。

因此，减少国际农产品贸易扭曲的关键，是欧美减少出口补贴。另一方面，以日本和瑞士为代表的 10 国集团对农产品进口实施严密保护。例如，日本的农产品关税最高竟然达到 1738%。这些成员的关税减让承诺也影响农业谈判的进程。

农业谈判包括出口竞争、国内支持和市场准入三个方面。多边贸易谈判是双向的市场开放过程。每个成员、尤其是左右谈判进程的大国要保持出价和要价之间的基本平衡。这样，谈判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长期以来，美国和欧盟通过实施巨额农业补贴和高关税壁垒保护着自身农业利益，不仅严重扭曲了国际农产品贸易，而且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欧美削减农业补贴和降低关税，但欧美却不肯让步，致使多哈回合谈判久拖未决。2008 年 7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部长级谈判因美国和印度在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上拒绝让步而陷入僵局，谈判进程严重受挫。

发达成员目前每年的农业补贴总额已达 3000 多亿美元，其中，欧盟农业补贴

为 600 亿欧元，美国为 482 亿美元。美国是对农产品补贴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对农产品的补贴由来已久，并且补贴的种类繁多，主要是直接补贴、销售贷款津贴和反周期补贴。政府每年对主要农产品的补贴约 100 ~ 200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小麦、玉米、棉花、大米和大豆等农产品上。

2008 年 5 月 15 日，美国参议院又以 81 票赞成、15 票反对通过了《(2007 ~ 2012 年农业法案)》，决定在 5 年内向国内农作物种植业提供总额高达 2900 亿美元的补贴，其中直接的农业补贴为 400 亿美元，用于十几种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和价格保护。

多哈回合谈判的问题在于发达国家想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但自己又不希望做出牺牲，而发展中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股新生力量，积极参与谈判，维护自身利益，使得发达国家的美梦难以得逞。

在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问题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又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不肯松动。所谓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是指发展中国家可在农产品进口激增的情况下，采取提高关税等特殊保障措施以保护本国农业免受冲击。

多哈回合的失败对世贸组织及其维护的多边贸易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其前景再一次乌云笼罩。然而，最大的输家是世贸组织。本该做大的蛋糕无法再如预期那样增大，甚至还有可能缩小，分享蛋糕的人们的吵嚷声也久久无法平息。多哈回合谈判要想成功，各国必须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谈判的方式要改变。

尽管我国在谈判中的态度相对超然，但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无疑对我国非常有利，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努力将蛋糕做大。同时，我们应该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逐步增加影响力和控制力。例如，我们可以从制造业出发增强自己的控制力；加快培养熟悉世贸组织规则、英语流利及掌握谈判技巧的专业人才等等。

现代帝国主义的掠夺：索马里海盗的真正原因

索马里海盗，是一群专门在海上抢劫其他国船只的犯罪者。1991 年索马里内战的爆发，令亚丁湾这一带海盗活动更趋频繁，曾多次发生劫持、暴力伤害船员事件。多次的抢劫活动以及狮子大开口讨要的巨额赎金使索马里海盗成为世界上的“名人”。

自 2007 年索马里沿岸共有 37 起海盗劫持事件，而 2008 年将近 125 起，这造成 45 艘船只被劫持。劫持事件都是发生在重要的世界海运枢纽——苏伊士运河，那里承担着世界海运 10% 的负荷量。每艘船的赎金平均为 180 万美元，平均会扣留 60 天。2009 年 12 月，索马里海盗当选为时代周刊 2009 年度风云人物。

2009年10月19日，已经“销声匿迹几个月”的索马里海盗绕过多国海军把守的亚丁湾海域，到距离本土海岸700海里外远离传统护航区的印度洋上突然劫持了中国货轮“德新海”号，从而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切。

而与此同时，这些海盗们却只敢袭击美国的货船；如最新遇袭的美国货轮叫“自由太阳号”。海盗们向货船发射火箭弹并使用自动武器，船员只好立即向附近海域的美国海军战舰求救；最后海盗们快速逃窜。

2009年上半年，奥巴马在国际上大出风头，因为他派美国海军陆战队救出了被索马里海盗俘虏的美国轮船的船长。这个新闻在全世界播出后，美国的大国、强国风范表现得淋漓尽致，全世界为之叫好。同时，全世界包括联合国在内，一致谴责索马里海盗的恶劣行径，很多西方媒体的报道把索马里海盗形容成十恶不赦之徒。

索马里海盗已经绑架了无数的船只，也赚了不少钱。对索马里人而言，这绝对是个“高科技”行业，从业人口从100人增加到1000人，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索马里会成为“海盗之国”，海盗们竟然敢向这两个大国叫板？美国的一支部队和索马里人交战，索马里首都全城出动攻打美国人。索马里的民意调查发现70%以上的沿海居民都支持他们的行动。为什么？

索马里有五个部落，所以他们的国旗图案是五角星。他们也一直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并且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是文化古国。公元1世纪，索马里就已经出现港口，那时就开始跟罗马和希腊进行海上贸易。公元7世纪，阿拉伯的商人大量涌入索马里。

12、13世纪之后，开始形成城邦，当时的情形类似于我们的战国时代。到了15世纪，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时候，就到了他们的首都，当时叫木骨都束，今天叫做摩加迪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

到了19世纪，索马里的噩梦开始了。1887年，索马里北部被英国占领，成为英属索马里。1925年，索马里南部被意大利占领，成为意属索马里。一直到1960年，英国和意大利才从索马里退出，索马里成为索马里共和国。

从1887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凌辱这个国家。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染指索马里，美国总共投入8亿美元的援助，意大利投入了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这两个国家投入的援助加起来已经是索马里GDP的一半，可是索马里由于连年战乱，军阀割据，因此腐败横行，当他们拿到18亿美元的援助之后，大部分钱都进了私人的口袋。

很多美国援助的物品都被拿到黑市去卖，索马里老百姓生活更艰难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冷战结束，美国开始对索马里的土地失去兴趣，美国撤出，索马里

全线崩溃，变成了一个无政府的国家，内部更是由于连年战乱，老百姓民不聊生。

索马里有长达 3300 公里的海岸线，当地渔产丰富，整个非洲最大的渔场都在这里，盛产金枪鱼、对虾和龙虾等，是非常好的一块地。可是由于索马里处在无政府的状态，所以欧美各国的船队大量进入索马里，他们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灭绝性捕捞。当欧美国家的船进入索马里捕捞的时候，将大小虾蟹全部捕捞光，完全不给索马里渔民任何生存的机会。索马里的渔民被逼得活不下去了，于是组织自卫队，叫做索马里海防志愿者，目的就是驱赶这些渔船。

其实灭绝性捕捞还不是最可恨的，更可恨的是核辐射，他们把化工原料的废料全都倒在索马里海滩上，仅 2005 年索马里就有 300 多人死于无名的毒症。追溯这些毒物的来源，基本上都是欧洲的化工厂跟医药机构，还有意大利前殖民者生产的。

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于是去当海盗。

20 世纪 70 年代初，由于国有化政策过激，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索马里经济严重困难。连年战争给索马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2006 年底，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在埃塞俄比亚军队帮助下击败反政府武装，控制了摩加迪沙和索马里大部分地区，但此后反政府武装不断在摩加迪沙等地发动袭击。

近年索马里已有 110 万难民，首都摩加迪沙每月就会新增约 2 万名难民。由于难民不断增加，难民们生活没有着落，粮食价格飙升，过度的通货膨胀和干旱等自然灾害更加剧了国内危机。

2006 年 10 月，美国政府支持埃塞俄比亚出兵入侵索马里，推翻了当时的索马里政权。在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帮助下，在索马里组建了由美国支持的索马里过渡政府。但是，由于该政府能力有限，不能有效控制全国局势，仅能控制首都摩加迪沙，而全国大部分地区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形成武装割据，出现了几十支武装力量。一些海盗组织甚至得到了与临时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军阀的支持，使得他们能成为“乱世枭雄”，使索马里 2880 公里的海岸线成为海盗们的劫持生财的好去处。

解读奥巴马访华的礼物：贸易与成本大战

从 2009 年 11 月 12 日启程出访日本开始，奥巴马踏上了他作为美国总统的首次亚洲之旅。作为对亚洲的首次访问，奥巴马比他的前任小布什早了 3 个月。不仅如此，奥巴马还成为美国历史上就任当年即出访中国的首位美国总统。按照行程安排，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与中国这亚洲四国中，奥巴马在中国逗留总计四天三晚，时间最长。中国之行是奥巴马亚洲之旅的重中之重。

这位美国总统曾在 2009 年 4 月就对中美关系做出了“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表态。而在他亚洲之旅前，中美在双边贸易、人民币汇率、新能源、美国国债等方面存在诸多有待对话的问题。

所谓上海迪士尼是“中国给奥巴马见面礼”的说法则来自于美国《福布斯》杂志。2009 年 11 月 2 日，该杂志发表文章称：“为迎接美国总统奥巴马 11 月中旬的首次访华，中国政府不仅安排孩子们手捧鲜花在机场迎接，更为这位特殊的朋友准备了一份厚礼——价值 36 亿美元的迪士尼主题公园合同。”

无论是中美双方还是全球各国，都对奥巴马的中国之行极为关注。我们中国向来注重待客之道，有客人来一定要倒茶、拿点心招待，要请客人吃饭。所以奥巴马来访前夕，我们通过引进迪士尼来表达善意。那么，奥巴马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自从奥巴马上台以来，中美之间围绕着经贸问题就一直龃龉不断。就在奥巴马展开他就任总统以来首次中国之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媒体开始用“贸易战”来形容两国之间针锋相对的贸易争端。

继奥巴马政府在 2009 年 9 月份对中国进口轮胎的“特保案”亮出绿灯后，美国商务部于 10 月 7 日又宣布，正对从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此次调查是应数家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联合钢铁工人工会的要求进行的，这些企业和机构宣称由于中国无缝钢管不公平的低价销售，2008 年对美出口额较 2006 年增长了 218%，金额达到 3.82 亿美元。他们指称中国钢管的反倾销幅度为 60%，反补贴率为 30%，据此要求对中国无缝钢管征收 98.37% 的反倾销关税，并征收反补贴税以抵消中国政府提供的补贴。

此次调查所涉及的对象包括中国碳钢和合金钢质的无缝标准管、管道管和压力管等，主要用于天然气、水和其他工业液体的输送。

此举不仅可能导致两国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而且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进而给仍处经济危机影响下的全球合作带来重大挑战。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09 年 1 ~ 8 月，国外对我国救济调查涉案金额大约 100 亿美元，共有 17 个国家对中国发起近 80 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 50 起，反补贴 9 起，保障措施 13 起，特保案 7 起，同比分别增加 16% 以及 121%。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数量最多的是印度，22 起，美国 14 起，阿根廷 10 起，土耳其 6 起，欧盟和加拿大各 10 起。

经济危机的全球性影响，是诱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因素。在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消退，失业压力持续增加的情况下，许多国家为了保持特定行业的竞争力，尽早实现经济复苏，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不断走向世界的“中国制

造”，成为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以反倾销和反补贴为名，动辄施以惩罚的对象。

奥巴马总统曾宣称自己是自由贸易的维护者，决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但实际上他为了安抚政治上需要的美国工会阶层，而放弃对自由贸易的承诺。特别是随着经济危机对美国制造业影响的逐步扩散，美国国内对“中国制造”的抱怨和不满日益增长。

构成我国 CPI 中最大的一块是食品，占 34%，其中猪肉就占了 10%；另外一个大头是服装，占了 9%。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娱乐、教育、文化、居住、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个人用品、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烟酒等等。CPI 大战，也就是说，奥巴马对中国未来的通货膨胀将有更大的主导权。比如大豆，美国发起大豆战，淘汰了东北黄金大豆，当美国转基因大豆席卷中国市场之后，美国就开始控制中国的粮油价格。

奥巴马访华带来的另外一个礼物就是成本大战。美国依靠其在农产品方面的成本优势，试图控制我国的食物价格。

截止到 2009 年 11 月，美国人在广西已经种植了 1026 万亩的美国玉米。如果广西继续扩大种植，不久的将来他们就会从广西开始北伐，淘汰中国的玉米。我们已经给美国进口玉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因为我们的玉米出现了价格倒挂现象。我们提高了玉米收购价，但是饲料、淀粉这些产品价格却无法提高，因而造成行业全线亏损。

只要我们全面开放美国玉米进口，美国就将控制中国的饲料，控制了中国的饲料，就控制了中国的家禽和家畜的价格，同时控制了其衍生产品的价格，包括蛋类跟乳制品。如此一来，美国通过大豆和玉米就控制了我们 30% 以上的 CPI。

不仅如此，棉花大战也即将开始。我们 CPI 中的 9% 是服装，而服装的一个重要原料就是棉花。2009 年中国棉花缺口高达 200 万吨。从哪里进口？又是美国。

同样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巨额补贴，美国棉花特别便宜，只要我们开放美国棉花进口，我们的这些纺织企业和贸易商就会从中获得巨额利润，明年他们就会要求政府开放更多的美国棉花进口。等到美国棉花大量进口之后，最终将淘汰我们中国的棉花。中国的棉花被淘汰以后，9% 的 CPI 就会受到冲击。

中对美贸易战略重心不应仅放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技术性问题上，这不应成为奥巴马政府与中方谈判的较大筹码之一。无论是猪肉、大豆等农产品，还是中国手中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对有可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贸易伙伴，我国一定也要储备足够的可采取的措施。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应对摩擦中也要避免“授人以柄”。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正是这样的国际形势促使中美两国

关系向积极合作的方向发展，因为这符合两国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因此，中美合作是大势所趋，世界所望，尽管前途还会有曲折或坎坷，但总的趋势是继续向前，人们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将会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

希拉里和“同舟共济”：经济飓风下的贸易拉锯战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开始她上任后的首次出访，目的地是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这亚洲四国。按以往惯例，美国新任国务卿上任后一般会首先访问美国的传统盟友欧洲或者是中东地区，比如前任国务卿赖斯的首次出访就选择了巴黎和柏林，但这一次，希拉里却是打破常规，飞越太平洋直接来到了亚洲。

临行前，希拉里来到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亚洲协会，就美国的亚洲政策等问题发表讲话。希拉里在演讲中借用中国成语“同舟共济”，来说明发展美中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她说，“在同一艘船上的人必须以和平方式才能共同过河，这则中国成语在今天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美中建交 30 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她表示，中国取得的变化主要归功于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以及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在 21 世纪，19 世纪的“零和”理论已经不适用于中美关系。

希拉里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发展，因为美国也从中获益。现在两国的经济已经相互交织在一起，两国的未来也是如此。她认为，美国需要用新的方式来理解以新兴的影响力中心为特点、正在转变的国际秩序，美中接触必须建立在这种新的、更加复杂的世界秩序的语境之中。

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美国经济出了问题，中国也会遭受损失。同样，如果中国经济出了问题，不寻求与美国合作，美国的经济也会出问题，所以中美两国要“同舟共济”。

当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讲到希拉里和“同舟共济”：他是在号召国际社会通过合作，共渡金融危机难关。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讲述“同舟共济”这个中国古代的故事时，她强调的是中国应购买美国更多的国债。美国财政部公布，截至 2008 年底，中国持有 7274 亿美元美国国债，占美国国债总额的 23.6%，加上中国企业持有的美国企业债券，中国共拥有美国各类国债近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已成为中国美元外汇储备的主要投资管道。为了落实经济刺激计划，美国还继续需要中国购买更多美国的国债。

这才是希拉里“同舟共济”故事里面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而中国也因为缺

乏替代市场，购买美国国债也成为无奈的选择。2009年4月15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2月，中国再次增持46亿美元美国国债，到2月末总额达7442亿美元。

我们和美国人是在一条船上吗？经济危机来了，波涛汹涌，是不是全世界就只有一条船，全世界各国都在这一条船上？这显然是荒唐的。

以中国和美国来说，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我们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我们农民占70%以上，美国的农民只有2%；我国是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家，美国是第一外债大国；美国人一贯超前消费，中国人一贯高储蓄；我们有巨大的内需市场潜力，美国的内需市场潜力很小；我国政府有充裕的宏观调控资源，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早就债台高筑，只能借债，否则没有资源可以使用；这次金融危机美国是始作俑者，中国是受害者……因此，美国是美国的船，中国是中国的船，我们根本就不在一条船上。

希拉里虽然高度重视美中合作，但话里话外所表达的似乎是把这种合作作为权宜之计，只是为了共同渡过当下的金融危机。实际上，美国并未拿出和中国“同舟共济”应有的坦诚、信任和尊重。

希拉里出访东亚四国的线路图是：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中国。希拉里访问日本和韩国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美日、美韩的安全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在日本和韩国都有强大的军事基地。

美国在太平洋部署了两条武装力量岛链，全面封锁住中国的出海通道。第一岛链上就包括韩国、日本、台湾这些重要的军事基地。

希拉里访问印度尼西亚为什么呢？这是美国的另外一个全球战略新动向。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人口大国，而且物产丰富，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而且在美国忙于中东和发动对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以来，印度尼西亚在美国忽略中乘机崛起。美国打算利用印度尼西亚为它的代理人，通过所谓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向其他国家推销美国的价值观。

在结束访华时，希拉里指出，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出口市场，中国要继续出口到美国，先要确保美国的经济复苏。“如果我们（美国）无法将经济搞起来，对中国将不利。”她的逻辑是，只有中国救美国经济，才能继续利用美国的市场。言下之意是，中国需要出钱挽救美国经济，如果中国不出手相救，就会丧失美国市场。但中国的经验是，即使美国市场不错，也不一定会对中国充分开放。

美国正在经历着金融海啸的猛烈冲击，那里的经济乱象不断向世界蔓延，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对我们经济发展有

好处，中国也希望通过包括购买美国国债等做法，帮助美国经济很快复苏。同时，中国要谨慎、稳妥地进行操作，也不能把我国劳动人民辛辛苦苦赚的钱浪费掉，要按照实际情况，按照中国的利益来权衡这件事。

二十国金融峰会与贸易战争防御

不管中美两国各自如何解读其之间的关系，两国的合作还是受到广泛的关注。当奥巴马上任后，他将美中关系定调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有时候人们也把中美关系说成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前者是说，不管奥巴马心里怎么想，世界上没有比中美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后者是说，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多个双边关系之一。

G20 即 20 国集团，它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这一词的“正式”出现是在 2003 年 8 月 13 日的一份文字发表回应中，这是一份由欧洲共同体与美国针对坎昆与会的部长所提出的农产品共同提案。到了 2003 年 8 月 20 日，一份由 20 个国家所签署的文件，之后并重新发布，成为 9 月 4 日的坎昆部长级文件，此份文件针对之前欧盟与美国的农产品提案提出另一个可行的替换框架，此文件标示着是由 G20 所订立。

20 国集团第一次金融峰会于 2008 年 11 月 15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

20 国集团其成员包括八国集团各成员国（法、美、德、日、英、意、加拿大等 7 个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以及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20 国集团每年举行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旨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寻求合作并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在贸易协商中，这个集团催促富有国家终止对农场主的补贴，并且在它们所属的农业项目上反对自由化。G20 拥有全球 65% 的人口、72% 的农场主以及 22% 的农作物输出。

中国国家前主席胡锦涛在 2009 年 3 月 31 日出席金融峰会前接受采访时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国际金融市场仍处于动荡之中，全球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一是要尽快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切实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提振民众和企业信心；二是要采取符合各自国情的经济刺激举措，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实现保发展、保就业、保民生；三是要努力抑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有共识，中国最为关切），减少危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

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害；四是要按照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改革，避免类似危机重演。

自华盛顿峰会以来，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没有遏制住，现在正在各地蔓延，一些发达国家都传出“购买本国货”、“雇佣本国工人”的消息。这对其他国家起到了不好的示范作用，也挑战了 G20 峰会的作用。

现在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更加精明，它是符合规则的贸易保护主义，符合 WTO 规则的贸易保护主义，所以有经济学家提出没有想到在新的条件下，WTO 的规则竟然给了贸易保护主义这么大的保护空间；贸易保护从贸易向金融向投资领域扩散，比如美国这次经济救援计划里面有一项，实际上就是迫使这些金融机构把钱从国外抽回来，支撑自己，这是一种新形式的保护主义，并且没有什么规则来约束它。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峰会决定通过全球金融机构追加 8500 亿美元可用资金，用来为逆周期支出、银行资本充足、基础设施建设、贸易融资、国际收支平衡、新债替旧债和社会支持提供资金，从而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峰会还承诺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行动来促进和推动贸易及投资，将继续致力于多哈发展议程达成一个积极和兼顾各方的协议。

2009 年 4 月 15 日，美国财政部发表报告说，财政部没有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操纵货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

在非洲，中国是主要投资者。中国 10% 的石油进口自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和苏丹。中国还从赞比亚进口铜等矿产品，从津巴布韦和南非进口铂和铬。中国从非洲购买大量木材。

2009 年 5 月 19 日，中国和巴西签署了石油供应协议。中国向巴西提供 100 亿美元的贷款，换取未来 10 年来自巴西每天 20 万桶原油的供应。巴西从中国获得的贷款，将用于包括从中国购买货物和服务等投资。另外，巴西还和中国磋商在双边贸易中使用各自的货币结算。此前，巴西已和阿根廷签署类似协议。

除了加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合作，中国也非常重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近年来，为了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尽可能避免因美元贬值而遭受巨大损失，中国已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总额达 6500 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还将根据需要签署更多类似协议。

首先挑起贸易战的美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非常清楚贸易战的后果。在金融危机已经使国际市场大幅萎缩的情况下，贸易战只能使已经十分恶劣的贸易环境雪上加霜。这也正是伦敦金融峰会能够做出不搞贸易保护承诺的根本原因。

只要这些承诺和协议能够得到遵守，世界经济就有可能较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中。因此，各国必须尽可能克制本国的贸易保护倾向，国际社会也必须严阵以待，密切关注各国的动向，一旦出现贸易保护主义苗头，就要坚决加以抵制。但在现实经济条件下，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断上演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一片混战。为应对危机，需要各国齐心协力打好这场贸易战争防御战。

中美贸易保护争端：轮胎特保案

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 392 个案件来看，大约 45% 由欧美发起。发展中国家巴西、印度、阿根廷也比较积极。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针对中国发起的诉讼案有 14 起，其中美国起诉的案子有 7 起，欧共体、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起诉 2 起，危地马拉起诉 1 起。2004 年 3 月，美国诉中国对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 DS309（增值税），欧共体、日本、墨西哥、中华台北加入。这是中国首次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里当被告。这其中，中国与之过招最多的还是美国。

2006 年 3 月 30 日，美国诉中国采取措施影响汽车配件进口。

2007 年 4 月 10 日，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提出两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诉讼，指责中国打击盗版不力和限制美国电影、音乐和图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2008 年 12 月 19 日，美国诉中国政府向企业提供赠款、贷款和其他奖励措施。

自从 2002 年加入针对美国钢铁产品保障措施的诉讼后，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2007 年以来，中国向世贸组织提起三次诉讼，都是针对美国，分别是 2007 年 9 月 14 日诉美国采取铜版纸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2008 年 9 月 19 日诉美国对中国标砖钢管、矩形钢管、复合编织袋、非公路用轮胎等产品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2009 年 4 月 17 日诉《美国 2009 年综合拨款法案》中限制进口中国禽肉的第 727 条款。

中美贸易关系自从两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经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领域；二是中国没有优势的进口和技术知识领域。

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双边贸易摩擦也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贸易不平衡、纺织品特保、对华反倾销等问题构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经济利益的争夺、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流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等是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贸易摩擦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

来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最近几年最受人们关注的当属 2009 年的轮胎特保案。

轮胎特保案是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提出建议,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 3 年分别加征 55%、45% 和 35% 的从价特别关税。

根据程序,9 月 4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提交了关于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的最后建议报告。美国总统将于 9 月 17 日前作出是否采取措施的最终决定。2009 年 9 月 11 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决定对中国轮胎特保案实施限制关税,为期 3 年。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第一年将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加征 35% 关税,第二年加征 30%,第 3 年加征 25%。

该国际贸易争端备受关注,除了是由于身在经济危机尚未复苏的时代大背景下,加上处于奥巴马首次访华前夕,更在于争端双方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处理好了,对两国发展和未来经济走势会有良好的带动作用,处理不好可能“一亏俱亏”,最终是两败俱伤的结局。

根据中方统计,2008 年中国对美国轮胎出口金额约 22 亿美元。此案遭到中美业界的广泛反对。从经济利益上来看,美对华轮胎特保案应该是场“误会”,这从代表美国汽车生产商、零售商、轮胎进口商等诸多行业利益的多个组织的明确表态中可见一斑。若是从保护主义的惯性来看,这又可以看成是一场“闹剧”。

中国商务部官员就此案多次与美方相关部门进行交涉。此前,美国布什政府曾对中国发起 6 起特保调查,最终均未采取特保措施。2010 年 1 月 19 日,世贸组织是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当天召开的会议上设立针对轮胎特保案的调查组。中国代表团在会上重申,美国的所谓特保措施缺乏事实根据,违反了其在水贸组织中的义务。中方对美国政府的决定深感遗憾,认为这背离了 20 国集团领导人达成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识。

早在 2009 年 5 月,印度就曾跟风美国,发起针对中国产乘用车用轮胎的特保调查,但其在去年 9 月 30 日宣布中止该项调查。而最新的终裁结果让印度成为了 2010 年首个向中国轮胎行业挥起反倾销大棒的国家,同时也使对我国轮胎进行特保调查的国家数量突破了 10 个以上。

由于反倾销日益严重,贸易壁垒对中国轮胎行业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开始逐步显现。面对愈演愈烈的海外贸易救济调查,中国轮胎业并未消极等待。风神股份一位工作人员说:“反倾销并非偶然发生的事件,我们正在积极应诉。”

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国际战略格局。贸易摩擦不但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也都存在;不仅在战

略对手之间存在，在战略盟友之间也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国际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外贸持续强劲，美日贸易摩擦加剧。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采取数量上的自我限制措施。尽管日本按照世贸组织规定，没有必要这样做，但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日本只能自愿限制出口。

为了缓解贸易摩擦，中国采取了很多办法。目前中国已与 20 多个重要贸易伙伴建立了交流磋商、技术合作机制，增进了与主要贸易伙伴对口部门的了解，许多贸易摩擦得到妥善的解决。中美通过战略经济对话、商贸联委会等机制交换意见、表达关切，在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服务业开放等方面缩小了分歧，取得很多进展。为了缓解贸易摩擦，中国经常组织大宗跨国采购，以平息主要贸易伙伴对于对华逆差日益高涨的“抱怨”。

中国在世贸组织内做被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解决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方面，中国的态度尤其谨慎，尽可能采取谦让的态度，以争取更好的合作。老子曰：“强者示弱，大国必居下游。”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贸易摩擦的基本态度。

美欧牛肉争端：贸易争端解决程序

世贸组织各项协议及其自身的争端解决机制为解决贸易争端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解决途径。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的贸易争端中，美欧之间的争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受关注程度上都最为突出。关于注射激素的牛肉争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我们以这起争端为例来研究 WTO 的相关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

世贸组织成立后，美欧牛肉争端被再次提交到 DSB（争端解决机构）处理，这也是 WTO 受理的第一起关于 SPS（《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的争端。

含激素牛肉案发生在上世纪 90 年代，但其起因可以追溯到 70 年代。那时，法国曾在生产小牛肉的过程中非法使用激素。无独有偶，意大利在婴儿食品中也使用了含激素的牛肉。一些婴儿在食用后，出现了明显的异性特征。

此事引发了欧洲消费者的极大恐慌，他们强烈要求制定相关法律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随后，当时的欧共体理事会通过了一项指令规定，在 1982 年 8 月 7 日前，成员国禁止使用带有激素的添加剂饲养牲畜，禁止屠宰和销售此类牲畜及其肉制品和制成品。

美国农场为了让肉牛长得更快更肥，普遍使用激素饲养，欧盟按照规定禁止美国牛肉进入欧盟市场，这对美国畜牧业是种极大的打击。美国认为，美国农场使用

激素添加剂的方式与欧洲有较大不同，因此不会对食用者产生危害，并以欧盟的禁令缺乏科学依据，是“借技术标准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为由，表示坚决反对，并把欧盟告到了世贸组织。

世贸组织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绝对的权威，成员方出现无法协商解决的争端时，当事各方都不得采取单边行动对抗，只能请求世贸组织裁决。各成员必须严格执行世贸组织的裁决，否则将面临世贸组织授权的严厉报复。

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的程序如下：

（1）磋商：根据《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谅解》规定，争端当事方——美国和欧盟应当首先采取磋商方式解决贸易纠纷。磋商要通知争端解决机构。磋商是秘密进行的，是给予争端各方能够自行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

（2）成立专家小组：之后的美欧贸易牛肉纠纷在 60 天后未获解决（或 10 天内并未理睬），提起诉讼的美国方面可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成立专家小组。专家小组一般由 3 人组成，依当事人的请求，对争端案件进行审查，听取双方陈述，调查分析事实，提出调查结果，帮助争端解决机构作出建议或裁决。专家组成立后一般应在 6 个月内向争端各方提交终期报告，在紧急情况下，终期报告的时间将缩短为 3 个月。

（3）通过专家组报告：争端解决机构在接到专家组报告后 20 ~ 60 天内研究通过，除非当事方决定上诉，或经协商一致反对通过这一报告。欧盟在接到专家报告后，进行上诉。

（4）上诉机构审议：专家小组的终期报告公布后，争端各方均有上诉的机会。上诉由争端解决机构设立的常设上诉机构受理。上诉机构可以维持、修正、撤销专家小组的裁决结论，并向争端解决机构提交审议报告。

（5）争端解决机构裁决：争端解决机构应在上诉机构的报告向世贸组织成员散发后的 30 天内通过该报告，一经采纳，则争端各方必须无条件接受。1998 年，世贸组织裁定欧盟对美国 and 加拿大含激素牛肉的进口禁令是非法的，要求欧盟提供含激素牛肉对人体健康不利的科学证据，并规定 1999 年 5 月 13 日为取消欧盟有关禁令的最后期限。

（6）执行和监督：争端解决机构监督裁决和建议的执行情况。如果违背义务的一方未能履行建议并拒绝提供补偿时，受侵害的一方可以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采取报复措施，中止协议项下的减让或其他义务。如果世贸组织裁定某个成员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就可以授权受害成员采取报复性措施。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实行“反向一致”原则，即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只有所有成员都反对，才能阻止裁决的执行。也就是说，世贸组织的裁决不管有多少成员

反对，只要不是全体反对，就可以通过。如果败诉方不按照裁决的要求去做，世贸组织就可以授权有关利害方采取报复措施。授权报复优先在引发争端的同一领域进行，必要时可跨领域交叉报复。

欧盟拒绝执行这一裁决。于是，1999年7月开始，美国对来自欧盟的价值1.168亿美元的猪肉、牛肉、鹅肝、奶酪和芥末等食品征收100%的报复性惩罚关税。而加拿大则对欧盟实施了价值为1130万加元的制裁。

2003年10月，欧盟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要求，对以前发布的含激素牛肉的进口禁令作了些非实质性的修改，并提供科学报告说，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北美养牛业使用的6种激素中至少有一种叫雌二醇的物质是致癌的，肉类中即使只有少量残留也会导致恶性肿瘤的发生，而儿童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人群。因此，欧盟认为美加对欧盟的报复性制裁措施是没有道理的。但美加方面对此没有予以理会。欧盟在与美加磋商无果后，把它们告上了世贸组织。

美加不服，并继续维持对欧盟的贸易制裁。2009年1月15日，美国政府调整了对欧盟的贸易报复措施，覆盖了一些对欧盟利益影响重大的产品并大幅提高了某些产品的关税，以此向欧盟施压。

到2009年5月6日，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事务的委员凯瑟琳·阿什顿和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6日均发表声明，宣布双方已就牛肉贸易争端达成临时协议。根据这份临时协议，美国政府同意，取消因牛肉贸易争端原定自本周开始对欧盟产品实施的新制裁，维持现有贸易制裁水平不变，并在协议实施的第四年解除所有制裁。作为交换，欧盟承诺将向饲养过程中未使用激素的美国高品质牛肉进一步开放市场，提供免税待遇，协议实施前三年增加的免税进口量为2万吨，第四年增至4.5万吨。

1996～2009年，一场连续13年的欧美牛肉贸易争端终于落下帷幕。

香蕉大战：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效率

美国的时尚女性对来自意大利的路易·威登手袋情有独衷。但是从1999年4月份开始，想购买路易·威登手袋的美国人突然发现价格一下子涨了许多，不得不望而却步。路易·威登在美国的销量由此急剧下降，路易·威登公司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却也无可奈何。因为美国突然对路易·威登手袋加征100%的关税。路易·威登和美国的消费者们或许没有想到，这一切都缘于美国和欧盟之间旷日持久的“香蕉战”。

世贸组织成立以来，解决了数百起贸易纠纷，大部分案件的处理都比较及时，但有些案件本身比较复杂，处理的难度较大，执行起来也比较困难。这里我们以长

达 10 年的香蕉战为例加以说明。

1993 年,世界上最大的香蕉进口市场欧盟,为照顾在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英法殖民地,给予这些国家单方面的优惠政策,包括给予特殊的免税配额。欧盟在进口配额分配机制中把供应商分为几类,其中从传统洛美协定国家进口香蕉可以获得较多的免税配额。这一政策本身是根据以往签订的有关协议制订的,但却引发美国和一些拉美香蕉出口国的强烈反对。美国虽不是香蕉生产国,但两家美国公司控制着拉美国家大部分的香蕉出口,因此成为主要的利益相关方。

1995 年,美国和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巴拿马等 6 国一道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

欧盟和美国、拉美国家长达 15 年的贸易争端从此开始。1997 年 5 月,专家小组裁定欧盟的香蕉进口政策违背了世贸组织有关规则。欧盟不服裁定进行上诉失败后,提出了香蕉进口政策修正案,但未能让申诉方满意。此后,美国等起诉方连续 3 次上诉都打赢了官司。

第一阶段:

1998 年,美国提出了对来自欧盟商品的报复清单,提出在 1999 年对欧盟多种商品征收 100% 报复性关税,这些商品包括塑料包装材料、糕点、电池、贺卡、开司米毛衣、手袋、咖啡和猪肉等,年制裁额约为 5.2 亿美元,与美国公司所受损失相当。

双方的贸易代表一谈就是一年,这期间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光荣退役,由佐立克接任。应该说佐立克是幸运的,他上任几个月后,也就是 2001 年 7 月欧美贸易代表达成了协议,为长达 9 年之久的香蕉战划上了句号。

其实不止是香蕉战,各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多种多样,但是为了双方共同的利益,不伤和气的双边磋商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欧美之间长达九年的香蕉贸易战恰恰验证了这一点。只是,美国和欧盟达成解决协议并不意味着香蕉大战的结束,因为拉美国家的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

第二阶段:

2007 年 2 月,厄瓜多尔要求世贸组织再次审查欧盟的香蕉进口制度。2008 年 4 月,世贸组织裁定欧盟未执行裁决,要求欧盟继续调整其香蕉进口制度。

美国也于 2007 年 6 月请求 WTO 设立执行专家组,敦促欧盟执行裁决,并于 2008 年 5 月获得胜诉。欧盟对上述裁决十分不满,指出欧盟对非加太国家的贸易优惠协议已于 2008 年初到期结束,世贸组织的裁决属于无的放矢,因此欧盟将提起上诉。

欧盟和美国、拉美国家于 2009 年 12 月 15 日达成一项协议,结束历时 15 年被

称为“香蕉战”的贸易争端。双方的大使在世界贸易组织于日内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达成了这项协议。

15年，双方的谈判代表不知道已经换了几拨，最后参与香蕉大战的国家的领导人也换了好几次。如此可以看出此次贸易争端的解决效率实在不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就在于国际贸易组织内的缓慢的谈判机制。

卡拉·利特纳和西蒙·莱斯特对使用专家组等准司法程序实现争端解决的案例的用时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从组成专家组到发布报告的时间平均为277天，超过DSU（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十二条第八款规定的6个月的时限；从设立专家组到发布报告的平均时间为366天，超过DSU第十二条第九款规定的9个月的时限。依照DSU的有关规定，对于大部分争端的解决，从协商到请求设立专家小组、到通过上诉机构报告、获得补偿或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这还不包括国内受损害部门或产业游说本国政府将争议诉诸WTO解决所花费的时日。如此漫长的争端解决期限将为有关交易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关税贸易总协定时期的46年间，成员国提出的贸易争端案件共432起，而在WTO机制运行的将近16年间，成员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的贸易争端就达411件。这说明了成员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信心。但从时间比较上来看，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成立的头3年，贸易争端案件激增，1997年之后，虽然每年的案件数量略有波动，但总体上呈现递减的势头。

可以肯定的是，相比于关税贸易协定时期，WTO机制下的国家贸易争端解决效率大大提高了。世贸组织高效率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世贸组织裁定美国钢铁案的解决。2002年3月20日，美国以中国、欧盟、日本、韩国、挪威、新西兰、瑞士、巴西等国钢铁产品的出口严重损害了美国钢铁业为由，对这些国家的不同类型钢铁产品征收8%~30%不等的附加税，征收期为3年。欧盟等成员方在与美方磋商失败后，将美国告到世贸组织。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首次参与向争端解决机制的诉讼。

2003年7月11日，世贸组织裁定美国提高进口钢材关税违规，要求美国停止征收附加税，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授权报复。迫于国际压力，2003年12月4日，美国总统发表公告，宣布终止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204条款采取的保障措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及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愈加紧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利益的不一致，国家之间贸易摩擦日趋激烈。由此可以推测：大量贸易摩擦并没有通过WTO正式的司法程序解决，而是通过外交或直接的贸易报复等非正式手段来解决。



跨国公司占领全球市场“制高点”

跨国公司在没有国界的世界上角逐

如果把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一系列的互不相同但又互相关联的经济活动，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

在要素分工模式下，价值链中的每个生产环节放到最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的地点，国际分工的界限就由产品转变为要素。在分工模式转变中，跨国公司成为当代国际分工的微观主体，担当起全球经济的“计划者”、“组织者”的角色。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1600年的最后一天，它在英国王室的特许下成立。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初衷是同亚洲和中东地区进行调料贸易。不幸的是，在数个世纪的海外活动中，它那恶劣的行为给后来的西方跨国公司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东印度公司在远东地区不仅从事商业掠夺，还进行军事征服和鸦片贸易。1840年，鸦片战争将这一行为推向高潮，并把香港从中国的领土中分割出去。

根据2003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在世界上最大的100家经济实体中，有53家是跨国公司。这53家公司比120个国家还要富裕。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跨国公司的数量从3000家增加到63000多家，雇员达9000万人。“在这些跨国公司中，最大的1000家公司占据了世界工业产出的80%。”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工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开始下降，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服务业比重迅速上升。到2008年，美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已经上升到78.9%，而制造业已经下降到20%。服务业比重远远超过制造业，但工业依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后工业时代”的主要特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完成，跨国公司的技术和效率的提升已经放缓，竞争变得激烈。

企业的经济活动越来越离不开金融、保险、信息、知识和技术、法律咨询、广

告和促销、社会管理等各种商业服务。企业新的竞争方式和经营方式使得服务业在再生产中的功能增加了。它不再像工业经济时期那样主要限于实现商品的价值，而是为再生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撑。因此，提升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是“已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和方向。

跨国公司是我们把握这些“已工业化”国家经济地位的另一条线索。发达国家的某些大型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子公司，成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依靠雄厚的资金通过海外投资或并购建立庞大的工业帝国，它们或者成为生产单一产品的、规模宏大的生产群，或者成为控制从原材料到消费者市场整个产业链的支配者。总之，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了全球生产和贸易的最大载体。

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新趋势从利润收益来看，1980 ~ 1987 年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在平均水平以上，而日本跨国公司则在平均水平以下。这可能与日本为了加强竞争，在这段时期内大量投资进行科研创新活动有关，而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在销售额中的比重在这一时期都下降了。

2001 年，仅有 44 家在美上市企业称其收入中有 5% 以上来自中国市场，但到 2006 年，相关企业数量达到 108 家。

此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欧盟商会的相关调查报告也显示，80% 的受访企业表示，公司在华业务去年实现了盈利。而在 1998 年，约有 1/3 的在华跨国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对英特尔公司来说，去年中国市场对其全球总收入贡献率已达到 14%，高于 2000 年的 6.4%。今年，英特尔还专门成立了直属公司总部的中国子公司。英特尔中国区总裁陈伟铨表示，中国是英特尔在美国之外拥有业务最广、最全的国家。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许多跨国企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源泉，许多跨国企业也认识到，要保持全球竞争性就必须抓住中国市场发展机遇。

事实上，跨国公司主导全球采购和国际分工链条形成的格局源于整个世界格局的形成。当今世界，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主导并利用现行的国际规则，保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这些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共同主导世界，跨国公司就是它们在进行主导地位构建中的重要一步。

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建立更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烈愿望，但它们大都是现行不公平国际规则和由发达国家集团设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接受者，而且它们之间受益或受损情况又有很大的差别，因而谋求共同利益方面存在“集团行动悖论”。倘若想真正实现“一个声音说话”，尚需下大力气加深合作。

据统计，跨国公司已经控制了世界 GDP 的 40%、世界国际贸易的 60%、国际技术贸易的 70%、对外直接投资的 90%，同时，跨国公司在技术竞争中也处于绝对优势。目前，跨国公司掌握了世界上 80% 左右的专利权，基本上垄断了国际技术贸易；在发达国家，大约有 90% 的生产技术和 75% 的技术贸易被这些国家最大的 500 家跨国公司控制。

如果说发达的“已工业化”国家是控制全球经济的大脑，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就是从大脑延伸到整个身体、并传输指令的神经。后面这些数字说明“神经”和“大脑”的关系。据 2009 年统计，世界 500 强企业中，美国有 140 家，日本、法国、德国、英国分别有 68、40、39、26.5 家，其他发达国家 99 家。

在较长时期内，世界格局将出现稳定和均衡的态势，发达国家集团主导世界的局面也将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因此，跨国公司主导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格局的现实在短时间内将无法改变。

发展中国家要跳出“国际分工陷阱”，可能需要做出痛苦的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根据现有条件，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并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与别国的贸易，逐渐在全球分工中争取有利的分工地位。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各个国家还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实现发展和赶超。这是一个沉重的结论，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中石油以 54 亿美元购加拿大能源资产

中国海外收购的脚步突然加快。有数据显示，2009 年以来，中国的海外收购涉及资金高达 267 亿美元。其中，在油气资源领域，随着中航油表示有意收购韩国一家炼油厂后，中国五大国有石油集团已悉数出击海外。在这五家企业中并购“肚量”最大的当属老大哥中石油——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家及其企业也开始尝到其中的美妙与苦涩。中海油和海尔分别高调并购美国优尼科和美泰克，华为欲重磅并购英国马尼可，都以失败告终，但却大大开阔了中国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国际化视野，并得到了对国际市场游戏规则很好的历练。这也就有了中石油等企业的再次成功起航。

2011 年 2 月 10 日，加拿大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商——加拿大能源公司宣布同意将 Cutbank Ridge（峻岭油区）天然气资产的 50% 股权出售给中石油集团旗下子公司，交易价为 54 亿加元（合 54.4 亿美元）。该天然气资产包括 130 万英亩的勘探开发生产区、约每天 7 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处理能力、3400 公里集输管线及一座地下储

气库。早期阶段加拿大能源公司将继续承担合资项目的作业并负责相关产品的销售。

加拿大能源公司发表声明称，通过该交易，中石油将从加拿大亚伯达和不列颠哥伦比亚两省的 63.5 万英亩天然气田中获得 2.55 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日产量。不过该交易还有待于加拿大和中国政府的审批。

中石油多年来一直寻求与加拿大大型专业油气公司合作的机会，包括在加拿大的 LNG（液化天然气）和油砂领域以及在中国的业务合作机会。早在 2010 年 3 月，中石油下属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和壳牌子公司澳洲壳牌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宣布，以 35 亿澳元收购 Arrow（澳洲能源有限公司）100% 的股权。根据收购提案，合资公司拥有 Arrow 在昆士兰州的煤层气资产和国内电力业务，澳洲壳牌在昆士兰州的煤层气资产，以及澳洲壳牌在格拉德斯通市柯蒂斯岛拟建液化天然气厂。

这是中石油成为澳大利亚 LNG 第一大股东后，再次发力国外天然气布局。这是中石油加快布局国外天然气布局的又一重要举措。

由于发达市场成品油消费呈下降趋势，而成本又日渐高企，加上金融危机的打击，跨国石油巨头纷纷选择退出炼油业务。但是中国对能源特别是原油的需求还是旺盛的，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恢复，整个油气市场还将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经历经济危机后，2009 年 6 月国际油价重回每桶 70 美元，距去年下半年 30 美元的价格，涨幅超过一倍。石油是世界上价格波动幅度最大的产品之一，自 1865 年第一根石油管道铺设成功，“黑金热”启动以来，它数次在十几倍的价格落差中起伏。将周期性行业的波动风险，转化为超越性成长的机会，是世界石油巨头的常见发展路径。

此时正是难得的海外并购战略机遇期。中国石油也在积极慎重地优选海外项目，重点是和已开展业务的资源国以及国际石油巨头公司包括埃克森、雪佛龙、BP（英国石油公司）、壳牌加强合作。这是中国石油在发达市场争夺炼油份额的好机会，但其同样也会面临一定的挑战，为此需要仔细计算其中得失。

2011 年 11 月 15 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日前发布了“2011 中国 100 大跨国公司及跨国指数”，数据显示，2011 中国 100 大跨国公司海外资产总额 32504 亿元，占总资产的 21.10%；实现海外收入 31011 亿元，占总营业收入的 14.82%；海外员工 32.9 万人，占员工总数量的 4.17%。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分别以 5226 亿元人民币、5198 亿元和 3626 亿元的海外资产名列 2011 中国百大跨国公司前三甲。

自成功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日本大阪炼厂后，中国石油亚洲油气运营中心建

设已初具规模，但在欧洲市场才刚刚起步。为加快推进中国石油欧洲油气运营中心建设，中国石油上月宣布与英力士集团签署框架协议，对双方在欧洲建立贸易和炼油合资公司进行了原则性安排。中国石油拟与英力士集团设立两家合资公司，开展其与苏格兰格兰杰莫斯炼油厂和法国拉瓦莱炼油厂相关的贸易活动及炼油业务。

格兰杰莫斯炼油厂位于苏格兰福斯湾，可直接利用来自北海的原油和天然气，原油加工能力 1050 万吨/年，向苏格兰、英格兰北部和爱尔兰北部提供成品油。而拉瓦莱炼油厂则位于地中海沿岸原油贸易区，靠近马赛港和原油运输终端，原油加工能力 1050 万吨/年，可通过管道向法国、瑞士和德国南部提供成品油。

这两个炼厂分别位于欧洲石油作价中心的西北欧 ARA（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卫普）地区，以及欧洲物流集散中心的地中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规模适度，物流设施健全。而以中间馏分油（包括柴油和航煤）为主的产品结构也符合欧洲需求总体趋势及质量要求。

此举是该公司在欧洲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战略性投资，对中石油意义重大。中国石油目前正在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致力于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此次收购两个炼厂的部分股权，是公司在欧洲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战略性投资。此次交易如能成功实施，中国石油在欧洲的原油和成品油贸易将有炼厂依托，可以稳定货源，增强贸易平台，对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和市场配置，进入欧洲高端市场，建设欧洲油气运营中心具有重要意义，符合中国石油在欧洲建立更广阔贸易平台、成为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目标。

谷歌 7.5 亿美元收购一家手机广告商

4 年前，奥马尔·哈姆伊还是一个并不成功的创业者。哈姆伊创建了一个手机广告系统，从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个成就听起来很简单，但却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哈姆伊的网络能够绕开移动运营商对他们用户手机上显示内容的控制。AdMob（手机广告网络公司）在运营商内容控制上所打开的缺口，使得独立应用开发商可以从手机应用上获利。

现在，他已经成为了谷歌的最新武器，谷歌正计划将其网络搜索主导地位从电脑平台扩展向手机平台。谷歌斥资 7.5 亿美元收购了 AdMob，借此获得了哈姆伊在这一领域的专业经验。

自 2009 年 11 月宣布将收购 AdMob 以来，谷歌用了 6 个月以上的时间才完成对它的收购。

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对此交易进行详查之后，谷歌做了大量游说工作，试图说服反垄断监管部门批准这一交易。此前有消息称，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对谷歌收购 AdMob 的交易提起反垄断诉讼。联邦贸易委员会当时曾成立一个内部诉讼团队，为相关调查做好准备。此外，该委员会还向 AdMob 的多个竞争对手发出信函，要求他们就谷歌收购交易所造成的潜在影响宣誓作证。联邦贸易委员会之所以会反对谷歌的交易，是认为此交易将使手机广告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从三个削减至两个。

2010 年 5 月，FTC（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收购 AdMob 的工作已经完成。由于此次收购用股票交易方式完成，谷歌将会从公开市场购买价值 7.5 亿美元的公司股票。

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这一交易，是因为谷歌在该市场将会面临着来自苹果的竞争。收购 AdMob 交易的完成，使谷歌成为了最大的手机广告公司。

在谷歌宣布收购 AdMob 之前，苹果曾先于谷歌与 AdMob 就收购问题进行过谈判。但谷歌捷足先登，以高价收购了 AdMob。在谷歌宣布收购 AdMob 后不久，苹果于 2010 年 1 月份收购了另外一家手机广告公司 Quattro（夸特罗）无线。但是也就是因为这宗交易，最终说服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了谷歌收购 AdMob。

互联网广告为谷歌带来了超过 200 亿美元的收入，使得该公司有足够的实力大举投资媒体技术。

如果互联网广告对你的企业很重要，那么手机同样代表巨大商机。研究估计美国手机广告消费在 2009 年达到了 4.16 亿美元，相比 240 亿美元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微不足道。但是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企业都应该从现在开始关注手机渠道，尤其在越来越多传统广告媒介开始衰落时。

毫无疑问，手机成为人们大量消费的媒介平台。利用手机平台做广告的企业将比竞争对手占据更大优势。令手机广告与传统广告媒介，比如报纸、广播和电视甚至互联网不同的是其强大的受众接触力和关联性。由于消费者不管去哪儿都会随身携带手机，广告商可以随时随地对特定消费者推介有时间或地点选择的促销信息，并告知销售地点。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全球共有 46 亿手机用户：手机数量是电视数量的 3 倍，是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之和的近 5 倍。更重要的是，手机是双向媒介，除平面广告、视频前置广告和程序插带广告等形式外，广告商还可以通过订阅式短信息促销通知和搜索排名直接与用户互动。

研究公司 IDC（国际数据公司）预测，AdMob 和谷歌合力控制了 21% 的美国手机广告市场。AdMob 最大的竞争对手、手机广告网络提供商 Millennial Media（千禧传媒）占了 12%，其后是雅虎占 10%，微软则占 8%。分析人士大多认为，AdMob

收购案不仅对整个手机广告业的企业估值有重大影响（研究公司的报告显示，2009 年全球手机广告消费增长 74%，达到 9.135 亿美元），更可能因谷歌的竞争对手想要拉平差距而掀开类似的收购狂潮。

当然，一般的小开发者没法以 7.5 亿美元的价格把公司卖给谷歌，AdMob 收购案令很多人震惊：谷歌一直是手机广告的公开支持者——2008 年 CEO 埃里克·施密特在 CNBC（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Mad Money”（“我为钱狂”）节目中预言，手机广告收入最终将超过传统互联网广告——但谷歌之前主要将精力放在自主开发上，比如谷歌手机版 AdSense（允许拥有手机网站的互联网 AdSense 合作者在手机网站页面中添加广告）或与谷歌本地搜索服务相配合的手机优惠券。

当然，即使没有谷歌的认可，手机广告的未来仍然是灿烂的。随着消费者在外时间增加，在家中或办公室的时间减少，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都开始制定适合手机受众的内容，而这一群体越来越依赖智能手机、上网本、电子书和掌上游戏机来获取新闻和娱乐。手机商务也在兴起：2009 年感恩节手机网购大爆棚，通过 PayPal（贝宝）进行的手机付款量比前一年增长 650%，美国大型零售商的网站手机浏览量平均提高 388%，占前几位的是百思买（792%）、沃尔玛（740%）、西尔斯（492%）和梅西百货（447%）。

松下正式并购三洋：电池行业垄断地位将形成

1947 年，43 岁的三洋电机创始人井植岁男离开他与他的姐夫、义兄松下幸之助、他妻子的兄长松下电器原副社长、最高技术顾问中尾哲二郎等人联手开创的松下电器公司后，创办三洋电机。三洋电机与松下电器（现 Panasonic）之间的姻亲、纷争、纠葛、离合、盛衰，堪称日本家电工业史的一个缩影。

2009 年 11 月 5 日，日本电器巨头松下公司对电池巨头三洋公司进行的并购正式启动。松下表示本次收购胜券在握，强强联合之下，将目标瞄准世界第一。

并购通过公开股票收购的方式进行。早在 2008 年 12 月松下宣布将并购三洋时，就已与三洋的三家大股东——美国高盛集团、日本大和证券和三井住友银行就股份转让一事达成了共识。而上述三家大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已经达到 50.13%，所以，即使其他股东有反对意见，并购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

12 月 9 日，松下对三洋的股权公开股票收购正式完成，前者取得后者过半数股权。本月内松下将向三洋有关股东各方支付相应收购款项，正式将三洋纳入旗下，成为日本电器业的龙头企业。

松下白色家电的节能优势明显，三洋在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充电电池等技术上也遥遥领先，松下将力争在其创业百年（2018年）之际，变身成为一家综合能源厂商和世界第一的电机制造商。尽管为迎合监管机构的反垄断要求而剥离了部分业务，两家公司合并后仍将成为可充电电池、特别是镍金属氢化物电池领域中的霸主。

在家电市场的竞争中，松下和三洋各有布局，有的区域有其中一家品牌，有的区域两品牌都有覆盖，但仅仅一家独斗都没法赢，所以两家要强强合作。

两家合作框架的第一点就是要保持三洋品牌，“双方要对各自的股东负责，要保持品牌的独立性和经营权。至于这是否会影响今后对于三洋的资源投入”，中村五男强调，“在市场上松下、三洋是两个竞争对手，是完全分开的两家公司，竞争比以前更加激烈也有可能。”

洗衣机制造出身的日本三洋电机旗下洗衣机、电饭锅、空气清新机、吸尘器等白色家电产品，在日本以及海外市场畅销度不亚于其新母公司 Panasonic（松下电器公司）的同类产品，销售额增长势头也显得异常坚挺。

三洋锂离子电池位居全球首位，市场份额高达 30% 左右。太阳能电池方面，三洋同样拥有号称全球最高水准的光电转换技术。但是，锂离子电池方面，韩国三星以及中国比亚迪，受日元升值等因素影响，增长势头远远超过三洋；而太阳能电池方面，中国、德国制造巨头不断发力，将此前产量位居全球第四位的三洋挤出前十，三洋屈居第十一位。

围绕 Panasonic 公司完成对三洋电机 TOB（阳光收购）收购，引发的讨论不仅没有平息的迹象，反而呈现出“越来越热”的趋势。尤其是并购后三洋电机品牌及白电等重合业务是否保留，合并后是否能取得协同效应的最大化等问题，均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

松下的“脱胎换骨”举措，实际上有向数字家电领域实力大增的韩国阵营（三星、LG 为代表）示弱的意味；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收购整合三洋电机的太阳能电池、充电电池等能源业务，增强技术竞争实力，尽可能规避与对手的正面冲突，从而谋取某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太阳能电池及充电电池虽然是新兴业务领域，但是，在日本夏普、索尼等，韩国三星、LG 等以及中国、欧洲的巨头们的相继加大投资背景下，松下公司实现全球 No.1 的目标谈并不容易。

三洋电机品牌影响力将面临逐步收缩的可能。但同时他也强调，在不同地域市场、不同商品领域，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协同共生”空间。不过，对于三洋品牌的最终走向，佐野社长则表示：“没有考虑坚持（三洋）品牌造成集团整体收

益损失的问题。而是站在集团的收益性的角度考虑，是不是有必要保留三洋品牌。”这进一步暗示了，将来三洋电机品牌统一为 Panasonic 的可能性。国内像新大洲、比亚迪等电池生产商若要发展，还需要国家给予经济和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

新时代跨国公司的文化软竞争

2010 年岁末，在付出了一笔高达七位数的培训费用之后，万科的三十余位高层管理人员接受了为时两周的惠普商学院的洗脑。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享有业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万科正在被惠普“洗脑”。惠普商学院——这支潜行于惠普巨人般身影之后的“特殊部队”，正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独特之处。

惠普商学院成立于 2001 年 1 月，是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创办的企业商学院。惠普商学院成立的宗旨是通过分享惠普公司多年的成功管理经验，帮助惠普公司在华的重要客户及合作伙伴建立企业的管理优势，提高人才竞争力，使其更快地成长以适应中国加入 WTO 的需要。

惠普商学院的讲师绝大多数是中国惠普有限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及一线经理人，从总裁孙振耀先生开始，包括几位副总裁及大批高层经理都是商学院的授权讲师，他们均在惠普任职多年，并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经验和个人管理心得，在授课过程中，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个案与学员直接交流，使学员获得了传统高校院所鲜有的“第一手”资料与“实战”借鉴，因此深受学员欢迎。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通过向员工宣传统一的企业价值观而将他们凝聚在一起，这些价值观影响着员工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信念，促使他们积极地为企 业创造价值。沃尔玛制作过一个企业宣传片，其中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员工在微笑，不仅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也让内部员工感到大家庭的氛围。

目前，惠普商学院目前开设了两大类培训课程，一类是“惠普之道 MBA”，主要由 7 门核心管理课程组成，由惠普高层经理主讲，面对各类企业的高层领导。另一类为“惠普经理人必修课”，包括十几门管理及个人职业技能类课程，主要目标是企业的基层或中层经理。在此基础上，商学院还为企业提供管理培训方面的咨询服务，为企业度身订做“培训解决方案”。成立的四年里，惠普商学院总共培训了超过 5000 人次的职业经理人。

尽管 IT 与地产是风牛马不相及的行业，但惠普与万科的管理上存在不少的共性。比方，在组织绩效标准设定上，大家都非常强调部门协作。IT 企业提倡的流程

化管理自不待言，而房地产从土地储备到前期设计、市场定位、工程建设、销售，再到物业管理，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丝丝相扣，不可能独立完成。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

一般理解，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同样如此。

现在很多学者也在谈论，跨国企业究竟是要做大，还是要做强。韩国的大宇公司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在世界 500 强中排名 30 位左右，但是金融危机之后，也就两年左右时间，它就垮掉了。实际上，像大宇这样规模很大的企业，它的规模是用很多个缺乏竞争力的产业拼起来的。没有竞争力的话，风险来临时，很容易死掉。

跨国公司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的重要一点就在于提高自己的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的难点在于必须找到一种很好的方式去推动各部门的协作。服务水平协议就是惠普公司推广的一种有效的绩效管理方法。比如各服务部门之间，先签订一个服务水平协议，依据项目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衡量数据。比如在呼叫中心，会量化至要求电话必须在 4 秒之内接听，这样，4 秒的服务报酬肯定不会与 10 秒相同。

企业大学最早出现在 1955 年，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创立。一个被人力资源经理常常提及的是，在过去 18 年中，GE（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曾 250 多次出现在教室里，亲自向通用电气公司大约 18000 名经理和行政管理人员授课。同时，韦尔奇也认为，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培养了大批人才。

根据《财富》的统计，在美国，排名前 500 强的公司中，大多是跨国公司。而大约其中的 70% 都拥有形形色色的企业大学。企业如此热衷于创办企业大学，目的基本上都可以归纳为 3 条，即培养人才、推动企业转型及文化变革、满足企业对新技术提升的需求。

不过，今天的中国市场中，这股软力量已显得越发重要，扮演着砝码的角色，决定着生意场中的天平最终倾向哪一端。

跨国公司能够通过办企业大学，拉近与上游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已成“司马昭之心”。“关系”这个词在中国重要而敏感，有企业很坦率地说，其实运营企业和制造企业的沟通非常必要，关系在中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很多外企都似乎有意地安排自己的高级官员同时参加为客户开办的高层经理人

培训班，有的企业自己人的比例高达 1/3。同学一场，自然可以很直接地了解到客户对新技术的看法，对国外企业的评价、比较以及客户是怎么想问题的，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都是平时在高层公关中“渴”望而不可即。

1997 年，在国内最早成立的爱立信中国学院，其母公司对学院的描述中有这样如下词句：“为了培养中国未来信息通信产业领导人，我们必须充分理解中国的国情。要承认，某些商务实践也许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中证明行之有效，但照搬到中国却行不通。对我们来说，同本地院校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并与经验丰富的中国管理人员密切配合，是培养新一代中国信息通信业领导人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借跨国公司的眼睛看中国市场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正日益提高——在发达国家依然挣扎于经济泥沼之际，中国经济却依然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当世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为就业和经济状况担忧时，中国的许多消费者却变得越来越富有。如今的中国市场对跨国公司意味着什么？

目前年均支出在 7500 美元的中国家庭数已达 1 亿个。如果以每家 3 口人算，相当于 3 亿人。这 3 亿中国人与 3 亿美国人的消费能力旗鼓相当。而且，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势头，预计到 2015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将上升至 1 万美元，促使中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在 2011 ~ 2015 年间年均增长超过 10%，这一速度将远远超过美国。

中国将在未来几年迎来消费飞跃。高达 63% 的被调查者认为，企业最大的机遇来自增长中的中国市场；58% 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政府提高劳动者收入和刺激消费的努力将对其公司在中国的战略产生最为重大的影响；56% 的人表示，其所在行业的增长前景是左右公司在中国战略的关键因素。

让这些跨国企业高管对中国市场如此信心满满的，是中国消费者庞大的数量与迅速增长的消费水平。尽管中国消费者平均消费水平远低于美国，但部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已与美国持平。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后更加看好中国市场，他们希望依赖中国市场带来更多的营业收入。

金融危机下，全球经济都在下滑，但是中国市场的需求仍然强劲，这给各跨国公司很多创新的机会。可口可乐总是能巧妙地借势。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可口可乐的红色小罐子在奥运场馆随处可见；酷酷的黑色包装的零度可口可乐，则和 007 一起出现在广告片里，随着《量子危机》的上映而热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旗下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跨国公司进行了一次问卷调

查。调查表明,八成多的受访企业在华经营绩效,恢复到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中国投资环境的总体得分是金砖四国中最高的。为抢夺中国市场,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在2009~2011年3月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跨国公司在中国新成立了200个研发中心,加上在此之前成立的1100个研发中心,目前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落户的研发中心达1300多个。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刺激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创新活动。中国市场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区CIO(首席信息官)的创新实践逐渐在全球市场推广,令那些不甘于墨守成规的中国CIO们的地位也在跨国企业中得以提升。很多跨国公司正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大众汽车与Peugeot(标致)汽车公司几乎在同时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但迄今两家公司的经营绩效却截然不同:大众汽车自1985年来营业收入平均有77%的成长,目前每年销售近20万辆,商用客车市场占有率超过50%;相反地,标致汽车至1996年止每年仅销2000辆,至1995年来每年均亏损累累不得不退出市场。大众汽车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掌握消费市场动态,迅速调整产销策略以因应市场之瞬息万变。

该公司看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多数购车方均为企业,买车作为商用车,因一般百姓尚无能力购买私用车。针对此一市场,该公司迅速建立强有力的配销网及促销、服务系统,再逐渐销售扩张至规模经济。有能力降低售价、回馈经销商及鼓励再促销的情势下,公司便义无反顾,执行推动降低销售价格,因为上述策略的交叉运用相得益彰,使公司业绩远超竞争对手。

跨国企业仰赖合资企业的程度渐趋降低:跨国企业原来盼望以合资方式,能因为中国公司的“关系”而获得利益,但往往实质所得之利不如预期;而由于许多跨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已累积多年经验,对于大陆经济环境有相当了解,独资方式使管理阶层能有权力弹性调整策略,以适应竞争环境。通常,拥有的股权愈多,控制力愈大,对改善公司的竞争地位和追求更高利润也愈有帮助。

在跨国公司眼中,在中国市场最担心的就是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中国市场的竞争也许比眼下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更加激烈。成功者将需要更敏捷、更强悍、更有效率和更有耐心。跨国企业在中国竞争优势的削弱,主要表现在近几年人才的流动上。

近两年,那些具有双语能力、跨文化背景、能够在国内外工商界自如开展工作的本土人才,从跨国公司跳槽进入中国企业,让很多跨国企业感到“震惊”。如德意志银行中国区总裁跳槽至中国工商银行;百安居与微软的知名高管分别加盟阿里巴巴与盛大互动娱乐;耐克、阿迪达斯与彪马的人才进入安踏与李宁。

造成人才从跨国公司向本土企业流动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国本土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能够为人才提供与跨国公司相同甚至更优厚的工资待遇。第二，中国企业向海外扩张，可以为求职者提供极富诱惑力的岗位。第三，很多成功的中国企业内部机制多了一份灵活，少了一份刻板，管制者在设定自身职责与工作环境方面拥有更多自主权，这一点对求职者相当有吸引力。

越来越多的在华跨国公司官员承认，过去的竞争是在跨国公司之间展开，未来五年，在几乎每一个产业部门，跨国公司都将和本土企业血拼。所以，首要的任务是，甩掉包袱，重新出发。

对许多跨国公司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但这种状况预计将很快改变。报告对 70 家跨国公司财务业绩的分析表明，在 2010 年，只有 10 家公司在中国的收入占其全球收入 20% 以上。一半以上公司的中国市场收入占其全球收入不到 10%。但各公司均预期这种情况将会改变。只有 8% 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已经是它们最大的市场；17% 的公司预计中国将在 5 年内成为其最大市场；另有 21% 的公司预计这种情况将在 5 ~ 10 年内发生。

同时，部分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存在不适应或疑惑，甚至公开抱怨。这些抱怨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市场准入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面对危机，跨国公司强化社会责任

2008 年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瞬间席卷全球，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经济体都遭受不同程度影响，世界经济举步维艰，全球跨国公司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不少优秀的跨国公司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履行责任，热心公益，展现出“责任公民”的良好形象，同时也极大提升了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所有在华跨国公司应当以其为标杆，共同为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就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的这种“经济寒潮”面前，就在很多跨国企业想尽各种办法面对诸多困难和挑战的背景下，仍有很多像雀巢、微软这样世界最为著名和优秀的跨国公司，不仅没有消减履行社会责任的投入和行动，而且还更加强化责任意识，并将其视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指企业行为要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追求利润是企业发挥市场机制，创造社会价值的基本方式。在任何环境下企业都应自觉、主动地适

应社会预期的变化，对其负有的社会责任灵活地予以反应。企业如果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则同样会被社会所拒绝，这就是所谓的“责任铁律”。

早在18世纪中后期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现代意义上的企业责任论坛有了充分的发展，但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还未出现，实践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局限于业主个人的道德行为之内。1970年9月1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企业的一项、也是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在比赛规则范围内增加利润。社会经济观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第二目标，企业的第一目标是保证自己的生存，“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承担社会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他们必须以不污染、不歧视、不从事欺骗性的广告宣传等方式来保护社会福利，他们必须融入自己所在的社区及资助慈善组织，从而在改善社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我们不能忽略产品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仅将产品视为实现利润的工具，如果满足于这样，形形色色的“三鹿奶粉”事件还会不断涌现。企业社会责任并不否定追求利润，但企业更需要追求的是，如何有效地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

金融危机以及市场的持续低迷，使得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即使是跨国公司，也很难独善其身。在“全球性经济寒潮”的侵袭下，不少企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企业资金紧缺会使不少企业想办法生存下来，削减在慈善和公益事业上的投入，而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推进，不少跨国公司自顾不暇，裁员、合并、减产、出售资产的消息不断出现，企业社会责任似乎被搁置一隅。其实，对于跨国公司的长远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巨大错误。

跨国公司在为中国带来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理念和优质产品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丰厚的利益，然而一场前所未有的寒风使得跨国公司也面临巨大困境，如何摆脱困境、获得新生，它们迫切寻求着答案。一些富有远见的跨国企业正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其在华长远战略的重要一部分，通过积极参与公益行动来体现其在华价值。而金融危机恰好给它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所谓患难见真情，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在雪灾、地震这样的天灾面前，它们对于社会责任的坚持超越了“锦上添花”的初级阶段，更好地体现了“雪中送炭”的价值。

跨国公司不仅为抗震救灾和灾区重建贡献着爱心和力量，更是在环境保护、支持科教事业、援建农村发展、改善贫困地区医疗保健教育等很多方面做着贡献。例如伊顿中国的MESH计划，它将现有的项目整合到一体化的管理体系之中。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也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内容和形式的过程。

社会捐助一直是百盛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四川大地震后，百盛集团不仅为灾区捐款超过2100万元，又在2008年10月发起为地

震灾区儿童“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对于跨国公司，是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是在危机时刻，更应成为一种常态。据悉，10多年来，百盛直接和间接用于公益方面的捐款接近1.2亿元人民币。

巴斯夫公司自2006年起在中国企业和在华跨国公司中倡导“1+3”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家被称为“洋蜜蜂”的企业，立志要像蜜蜂一样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融为一体，不仅自身做好，努力履行社会责任，还要积极传播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共享优秀的、负责任的实践经验，使每一个企业都成为传播企业社会责任的受益者和传播者。

越是困难时刻，越需要企业支持慈善事业。如果企业此时削减这方面的开支，慈善和公益领域的资源就更加紧缺了。当然跨国企业不是简单的捐款救助，而是精心策划、认真组织，打出一套高质量的赈灾援助组合拳，彰显了崇高的社会责任。很多跨国公司已充分认识到了在危机环境中坚持甚至是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对公司长远发展的价值，不断增加责任承诺。

对于社会责任的执着也会给企业带来相应的回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关乎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大命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经营和品牌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尤其是长期效应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对跨国公司来说，在中国获得经济和市场方面成功的同时，积极参与能体现其企业社会责任的行动将成为它们能否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和未来竞争的重要砝码，从这个意义上讲，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对于企业来说，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能较好地应对困难，让自身较快走出危机，因此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有责任才能抗御危机，才能在危机中应对挑战，把握机遇，获得更大的发展。

新兴跨国公司如何占领全球化利益的制高点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公司的高管们显得比以往更加忙碌，成为海外并购谈判桌上的常客。金融危机引发的资产、股票价格下跌，似乎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打开了又一个机会窗口。

在很多方面，跨国公司是西方经济的独特发明。但就像多极世界里很多别的方面一样，它们不再是西方的专有物。迅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正以惊人的速度创造出自己的商业巨人。其中的一些公司已家喻户晓：比如韩国的三星、中国移动和印度

的 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瑞来斯实业公司）；另一些离这一天也不远了。这些公司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有着同样的规模和野心，但它们的流程和增长模式常常有异于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

EMMs（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是指总部位于新兴市场，而运营地点超过一个国家的公司。新兴经济体目前有 70 家公司登上财富全球 500 强企业名单，而 10 年前只有 20 家。仅在 2007 年一年，财富 500 强中新兴市场公司的数量就增加了 9 个。它们大力扩张，收购新公司，2006 年完成了价值 1280 亿美元的 1100 多项并购。

在埃森哲总结的体现世界多极化趋势的 5 个领域——资本、人才、资源、新消费者和创新中，EMMs 都显得游刃有余，并且经常大大领先于发达市场的跨国公司，它们有潜力改变西方和新兴市场的竞争基础。究其原因，埃森哲的研究显示在于它们掌握了三种非凡的能力：轻松掌控多种风险、掌握随机应变的艺术、与文化和本地化重要性合拍。

EMMs 一个显著的长处就是即使发展很大，它们还是能够保持小公司的外观和感觉。这一成就就可以归功于较少的官僚主义、重视本地管理层，以及通常较灵活的商业模式和流程。随着它们的成功，规则被改变了。这些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正在极大地挑战着传统的认识，同时标志着经济领域史无前例的巨变。

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金融业的海外并购，几乎全部血本无归。在资源领域，也有不少“抄底”失败的案例。以“买下”论，中国企业入世这十年不乏惊动世界的大手笔。但现在，企业家们已逐渐明白，单纯的“买下”并不等于国际化：内涵上的国际化远比外在的国际化重要；诉诸能力提升的国际化远比诉诸规模壮大的国际化重要。

一个企业真正的国际化过程，应该定义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以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正在从投资国际化的 1.0 阶段迈入运营国际化的 2.0 阶段：更多的企业不再片面强调做大做强的诉求，开始把“价值链优化”、“协同效应”作为国际化的清晰目标。

以此而论，已经有华为、联想、海尔等一批中国新兴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舞台上崛起，成为欧美传统跨国公司不可小视的力量。由于身处赶超的位势，这些新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成长路径和成长模式，与全球对手相比，有着迥然的不同。

2009 年，中央电视台评选年度经济人物时，将“百折不回”四个字送给 TCL 董事长李东生，以鼓励他对国际化探索的坚持不懈。众所周知，由于 2004 年连续收购欧洲汤姆逊公司和阿尔卡特公司，创业 20 余年没有过亏损纪录的 TCL，随后爆出 20 多亿元巨额亏损，公司一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这应是中国企业为国际化道路探索所付出的最大代价。

和 TCL 同一年震惊世界的还有联想集团，2004 年 12 月联想收购了 IBM PC 业务。与 TCL 起初的痛苦煎熬不同，联想在收购后的前三年业绩不乏亮点，直到 2009 年爆出巨亏。

事实上，无论 TCL 还是联想，2004 年的并购案例都并非一时心动，而是其各自国际化蓝图中的一个步骤，TCL 早在 1999 年就收购越南工厂开始试水海外经营，收购汤姆逊前，已在多处新兴市场有运营经验，并非初出茅庐。而联想早于 2000 年也确定了国际化的发展目标，只不过一直在伺机而动。但是同作为国际化 1.0 的代表，TCL 为何比联想“呛水”得更厉害？深层次的原因或在于，其战略与执行之间的鸿沟要大过联想集团。

与联想、TCL 通过海外并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模式不同，中国家电行业的领导者海尔，则采取了相对温和的一种国际化路径，即自建为主，辅以并购等手段。事实上，多数中国制造企业出海的第一个步骤都是产品走出去，难点在于第二步投资如何落子。其一是区域的选择，是选择新兴市场还是欧美成熟市场？其二是投资方式的选择，并购还是自建？

张瑞敏曾把海尔的国际化形容为三个走出去：产品走出去，品牌走出去，人才走出去。其核心思想是致力于在全球市场构建“三位一体”的布局（即设计、生产和营销的本地化）。简言之，在美国建公司就要像美国公司，从理念、管理到产品都要本地化，而不能像一个复制过去的中国公司，并将此作为海尔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指导原则。

关于区域选择，海尔的做法是“先难后易”，先进入美国这样的主流市场，再居高临下地布局到其它市场。在这一点上，它与 TCL 和联想异曲同工。只是它首先采取的是自建方式，在美国开工厂。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成就并保持卓越绩效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中国企业在高速地成长，并且正处在一个转折的当口——它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我们称作“多极世界”的新的竞争格局，在这一格局之中，新的经济中心和新经济力量的极点已经出现，与此同时，空前的机遇与挑战也接踵而来。面对着多极世界的崛起、本地优势的衰退、竞争不断加剧的市场以及以业绩为导向的股东，中国的企业必须积极地追求可持续的盈利性增长。

无论中联重科还是海尔，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全球化运营，而只是跨区域经营。埃森哲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王波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外相似，可分为出口导向—海外投资—价值链优化—全球运营四个阶段。

跨国公司优化价值链的方式通常有三种，其一，在异地复制现有业务。其二，沿价值链扩张，从现有位置向上游或者下游延伸。其三，价值链升华，到新领域开

辟新业务。目前，也有中国企业在尝试利用国际化资源，通过中国市场与海外市场的统合运营，进行价值链的优化。

中联重科收购 CIFA（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后，利用 CIFA 的渠道让自己的产品进入了欧洲市场，并与 CIFA 产品形成档次上的互补。另一方面，根据中国与欧洲零部件的比价，双方通过联合采购来降低采购成本。又如，海尔最近从松下手中收购了日本三洋白电业务。业内人士分析，海尔的国际化在欧美市场取得阶段成果后，正在把东南亚市场作为下一个攻克的重点。收购三洋部分白电业务后，海尔在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将形成 2 个研发中心、4 个制造基地以及 6 个地域的本土化市场营销架构，从而在东南亚市场建立竞争优势。

目前多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处于最初级的产品出口阶段，海外投资仍是方兴未艾，只有少数企业可以主动做到价值链优化，而真正做到全球化运营的中国企业几乎没有——受限于全球架构、品牌影响力、国际化人才储备上的差距，中国企业在有意识地整合全球资源的同时，仍需要进一步创新以突破自我。

跨国服务外包的动因与危机后的发展趋势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现代服务跨国外包迅速发展，既带来了历史机遇，也催化着一场新的竞争。

服务跨国外包使得服务在国际广泛流动，引起了对其他许多要素如人才、劳力、知识、文化、资金、市场等在全球范围内再开发、再配置，并且导致全球化进程中溢出价值在各地域各集团之间的再分配。全球服务外包的品种日趋丰富，业务范围扩展，交易规模扩大，单个项目金额可观，增长保持高速，参与企业和涉及国家不断增多，近岸外包更多地向离岸外包演进。

2009 年，全球 IT 服务支出出现了负增长，同比下降了 0.4%；业务流程外包虽然仍维持增长趋势，但增速比上年回落了 7.8 个百分点。令人欣慰的是，服务外包发展的大趋势和大背景没有根本改变，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服务外包需求已经明显回升。

IDC（互联网数据中心）预测，2011 年全球 IT 开支将增长 7%，达到 1.65 万亿美元，比 2010 年增加 1000 亿美元。后危机时期，随着竞争加剧、互联网广泛应用、跨国通讯成本大幅下降，服务外包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国际大企业暂时放弃或推迟了一些投资项目，贸易保护主义在主要发包国蔓延，全球服务外包产业经历了严峻考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后,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有效克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成长为全球第二大国际服务外包目的地市场。

服务外包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吸纳就业能力强等特点。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有利于我国改善贸易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就已经开始承接软件业务外包,但直到 2002 年以后,服务外包才呈现由点到面、由局部到全国的快速发 展态势,并迅速成为一个政府部门、产业部门和学术部门等各方面共同关注的经济现象。

2010 年,全国新增服务外包企业 3756 家,新增从业人员 78.1 万人,其中新增大学毕业生就业 48.6 万人,占新增从业人员的 62.2%。全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金额 274.0 亿美元,合同执行金额 198.0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37.0% 和 43.1%;其中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 198.3 亿美元,合同执行金额 144.5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34.3% 和 43.1%。

截至 2010 年底,全国服务外包企业 12706 家,从业人员共 232.8 万人,其中大学以上学历 165 万人,占 70.9%。产业发展中涌现出很多成长性很好的领军企业。如 ITO 方面,文思、软通动力等公司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员工突破万人,营业额达到 2 亿美元;BPO 方面,有以华道数据、爱诺信泰、柯莱特等为代表的金融后台服务企业,以九五太维为代表的呼叫中心,以太平洋、宅急送为代表的物流服务企业;KPO 方面,有以药明康德、康龙化成、保诺科技等为代表的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企业,以和声创景为代表的创意设计外包服务企业。

从发展趋势看,服务外包有进一步从在岸外包、近岸外包(国内或区域内部配置资源)向离岸外包(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发展,从单纯的软件外包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多环节的 ITES-BPO 以及更高层次的 KPO 延伸拓展的态势。

从发包方来看,从大企业扩展到中小企业,从小规模项目扩展到大规模项目,从以企业为主扩展到政府和社团组织等;从发包涉及的领域来看,从制造业外包扩展到服务业,从传统的汽车、电信等领域扩展到医疗、安保等领域。

从涉及的业务环节来看,从制造业中的服务环节扩展到服务业中的业务流程,从早期相对初级的 ITO 业务扩展到高技术、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的研发和设计等业务环节,从非核心业务扩展到核心业务;从涉及的具体企业关系来看,从附属的企业内部外包扩展到非附属的第三方企业外包,从向本国企业发包扩展到向外国企业发包。

我国每年大学毕业生超过 600 万人,计算机专业和软件专业的毕业生将近 40 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年轻 IT 人才队伍。

据 IDC 预计，2009 ~ 2014 年中国离岸软件外包市场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2.4%，比全球增速高 15.8 个百分点。外包咨询机构毕马威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服务外包市场发展迅速，预计未来 5 年将保持约 26% 的年复合增长率，或将赶超印度成为新的全球外包中心。

我国人才资源丰富，具备发展服务外包的良好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但应该看到，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自身在体制机制和发展环境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当前的重点是要整合各方面力量，加速实现从“成本导向”向“价值导向”的转变，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在规模和水平上整体提升。

相对于印度外包企业，中国的外包企业无论是规模、品牌还是接单能力，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中国企业想要切入并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需要迅速整合力量，扩大规模及行业影响力，而跨国并购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有规模、品牌优势的外包企业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寻求海外合作，提升海外交付能力，同时在海外资本的推动下，国内的外包企业开始大规模的并购和上市浪潮，通过行业整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第十三章

南北失衡的粮食问题

粮食危机：国际市场粮食供求矛盾加剧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维系人类生存的最低需求，然而，从2007年开始，全球粮食储量降到近20年的最低点，小麦、糙米、大豆和玉米期货都处于多年来最高点。海地因食品价格飙升引发骚乱，至2008年4月7日已有5人在骚乱中死亡。全球飙升的食品价格，导致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及、印度尼西亚、象牙海岸、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塞内加尔都先后发生骚乱或暴乱。因此，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它向人类发出了警告。

2008年4月22日，联合国世界粮食署执行干事希兰在英国举行的“粮食峰会”上指出，全球正在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大范围粮食危机。希兰将这场危机称为“寂静的海啸”，她表示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着世界上最具有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

IMF总裁卡恩表示，世界范围内的食品价格上涨如同金融市场危机一样，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国际社会首次将粮食危机与金融危机摆在同一个位置上并列。

2007～2008年的那场粮食危机令大家回顾起来仍然心有余悸。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基本农产品价格指数2006年上升了8%，2007年上升了24%，而2008年前3个月又同比上升了53%。世界银行也发表报告称，2006～2008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了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83%。泰国是世界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泰国米价2008年1月初售价在383美元左右，而到了4月底已经涨了近两倍，达到了每吨1000美元以上的历史高点。

2008年5月5日，数千名索马里民众在首都摩加迪沙游行示威，抗议粮价过高。示威活动后来引发暴力冲突，1名男子在冲突中死亡。受国际粮价上涨影响，

索马里国内粮价迅速攀升，许多家庭生活受到影响。2008年以来，索马里发生数起针对粮价的示威活动。

2008年4月21日，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举行大罢工以抗议食物价格上涨，有250名抗议者由于在公路和铁轨上静坐抗议而遭到逮捕。2008年头4个月中，印度的通货膨胀率翻了一倍，基本生活必需品如食物等的价格也大幅上涨。

海地首都太子港市中心发生的民众抗议粮食价格飞涨，迫使联合国维和部队发射催泪弹。海地总理爱德华也由于控制国内粮价飞涨不利，被迫下台。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粮价高涨，使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倒退。”在一些国家，粮食危机甚至引发了动乱，威胁到国家政局的稳定，使人民的境遇雪上加霜。柬埔寨、埃及、印度、印尼和越南则干脆禁止水稻出口。

联合国粮农组织曾预测说，到2050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加70%，才能满足届时可能高达91亿全球人口的需求。而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报告，2009～2010年度世界谷物产量预计比上年度下降1.52%至21.97亿吨，需求量较上年度提高1.73%达到21.84亿吨，当年谷物产量仅略比需求量高0.59%，而上年度产量比需求量大3.9%。

紧迫的需求必然造成价格的攀升，虽然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粮食价格趋于稳定，甚至出现短时间的下降趋势。然而从2006～2008年以来，全球粮食价格的持续暴涨，对世界粮食安全造成的冲击还在持续。世界粮农组织在2009年12月份公布的食物价格指数（由谷物、油籽、奶制品、肉和食糖构成）显示，全球粮食价格依然上涨。该价格指数在2009年11月份达到了2008年9月以来最高的平均168点。虽然这一数字比2008年6月粮食危机的峰值低21%，但在2007～2008年度达到最高点之前，该指数从未超过120点，而且多数时间都低于100点。可见，未来粮价上涨的趋势不可逆转，高需求、高粮价时代势不可挡。

那么，引发世界粮价高企的原因有哪些呢？

第一，世界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突破历史水平，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成本，造成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肥料和柴油价格的上扬以及运输成本的大幅增长。

第二，不利气候因素造成主要粮食生产国减产，出口量大幅下降。作为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的澳大利亚连续数年遭受干旱气候，小麦出口锐减，仅2007年的出口量就减少400万吨。同年，乌克兰小麦出口也减少300万吨。此外，孟加拉国遭受台风袭击，造成大米减产300万吨。

第三，由于世界石油价格的居高不下，美国、欧盟和巴西等国将大量原本出口的玉米、菜籽、棕榈油转用于生产生物燃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些传统农业出口大国的农业生产格局并降低了出口。美国20%的玉米已被用于生物燃料生产，欧

盟 65% 的油菜籽、东盟 35% 的棕榈油被用于生物燃料生产。这些政策的变化不仅造成了食物供给的减少，更引起了市场对于稳定供给的担忧和恐慌，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价格上涨预期。

第四，美联储的粮食危机。不断降息，房地产市场低迷等都释放了大量的投资资本进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由于市场预期国际农产品价格将维持高位，自去年 11 月以来，已有 400 多亿美元进入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投机炒作。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内，国际小麦的出口价格就增长了 130%、大米价格增长 98%、燕麦价格上扬 38%。世界大量的粮食贮备被掌握在实力雄厚的国际基金炒家手中。

第五，由于粮食价格在短时间内持续上涨，导致一些传统的粮食纯进口国，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加速粮食进口，以确保国内粮食供给；另一方面，一些出口国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也进一步加剧了供给短缺和市场恐慌。

第六，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巨额农业补贴严重扭曲了贸易，人为压低了国际农产品价格，致使发展中国家的中小粮食生产者和农民不得不放弃农业生产，转而生产其他经济作物，致使许多中小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自给能力严重不足，大量依赖进口来维持国内粮食供应。同时，多年来，自由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传播也钝化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农业生产的愿望，天真地认为世界粮食供应永远是充足的，可以完全依赖便宜的进口来替代国内生产，这也是许多国家对这次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准备不足的潜在原因。

2008 年的那场粮食危机已然过去，但它的阴影并没有远离我们。我们现在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如果再不正视粮食问题，不解决好粮食问题，席卷全球数十亿人口的粮食危机就可能卷土重来，不知又将会有多少生命因饥饿而终结，其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又将如何平复。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粮食危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与粮食相关的供给、需求方面的因素，如极端天气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人口增长、耕地减少、生物能源等；也包括非粮食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政治因素的作用、投机资本的炒作、高油价的推动等。这场粮食危机已经转化为一场粮食战争，在这个战场上没有硝烟，只有各种力量在幕后你争我夺，在严重威胁着全球的粮食安全。

粮食战争中发达国家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2008 年以来，粮食危机席卷全球，“世界粮仓”美国也未能幸免。2008 年 4 月，美国两大零售商——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和全美最大仓储式零售店“好事多”

突然宣布采取特别措施，对顾客购买部分品种的大米数量加以限制。

食品限购在美国实属罕见。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造成的影响更为广泛而深刻。在埃及首都开罗，为拿到政府救济的廉价面包，民众排起了长蛇般的队伍。在海地，食品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迫使总理下台。

粮食危机爆发后，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将矛头指向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是诱发粮食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美国总统布什甚至把目前的全球粮食危机归咎于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粮食需求增长。

粮食危机是否如布什所说由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需求增长所引起的呢？而发达国家在粮食危机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对农业的大量补贴，一直是世界农业和粮食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从2002年美国通过的为期五年的农业法案来看，美国每年对农业的补贴高达数百亿美元。欧盟也不例外。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坚持高额农业补贴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唱起对台戏，导致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

富国的高额农业补贴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形成巨大冲击，恶化了他们的贸易条件，甚至使贫穷的农业国家越来越穷困。以亚洲为例，亚洲国家曾盛产大豆、花生、葵花籽等油料作物。1995年以来，美国农场主靠政府巨额补贴廉价出口大豆。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持续走低，令亚洲豆农苦不堪言。这种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亚洲大豆生产逐步萎缩，一些大豆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全球大豆的生产中心也由亚洲地区转移到了以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美洲地区。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科纳雷雷指出，“富国对农业的补贴是发展的障碍，它削弱我们的经济，让我们的农民变得越来越穷”。他说，农业是带领非洲走出贫困的唯一途径，现在却遭受富国产品入侵的毁灭。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在谈及目前的粮食危机时也承认，富国的农业补贴扭曲了农产品贸易，伤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

农产品价格高涨使农业出口大国美国受益匪浅。美国农业部长谢弗预计，美国2008财政年度的农业出口额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010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190亿美元。

农业权威专家指出，此次粮食危机从酝酿、发展到凸显这几个阶段，无不与发达国家密切相关，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危机爆发前，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农业补贴政策导致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严重扭曲，极大冲击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市场，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全球粮食库存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

田纳西大学农业政策分析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商品化农产品的补贴,1998年以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其中80%流入到农民和农作公司。但分配结构极不均衡,最大的1%的农场,2003年平均得到了21.4万美元的补贴,最大的20%的农场,平均得到近1万美元的补贴。但多数中小农场补贴甚少,甚至没有任何补贴。

补贴状况的迥异,使得美国农场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小规模家庭农场则几乎悉数被逐出商品化农产品的种植领域。另一个结果是,农民的农场收入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2008年5月30日,拉美经济体系常任秘书何塞·里韦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极大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的积极性,是导致粮食价格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发达国家的农业资本化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冲击也不容低估。最近几十年,欧美等发达国家农业资本化程度不断加深,逐渐形成强大且集中的粮食集团和联合体。一方面,这些集团垄断全球粮食生产投入环节,使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生产性投入逐步集中,如德许特所言,美国孟山都公司和陶氏公司等大企业掌握着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种子、化肥和除草剂等产品的专利权,却让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者买不起生产资料,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这些集团致力于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得多数在资金和技术上不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被迫让出国内农产品市场,导致当地的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在探索粮食危机爆发的原因中,2008年6月18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一篇“专家称美国依靠粮食危机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文章,该篇文章写道:“今年世界粮食危机,成因已近乎教科书式语言:发展中国家需求量增大、气候变化与生物能源抢占耕地造成产量减少、资本投机与美元贬值使粮价居高不下。但实际上,一整套‘阳谋’却被国际舆论忽略了。”

“粮食危机背后的政治背景,比能源危机更为深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与经济研究所博士滕飞向《环球财经》表示。

由此可以看出,粮食危机是一场人为的危机,是一场由利益分配和再分配导致的危机。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说:“经济创造财富,政治分配财富。”政治经济学这一基本要义诠释了这场危机的实质: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由发达国家操控的政治问题。

因此说,此次粮荒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相交织,表层原因和深层结构性因素相混杂,把危机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少数几个国家的消费量变化未免有失偏颇。真正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对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深层根源进行反思,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解

决方案。抑制粮价上涨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已成为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所有国际社会成员特别是发达国家必须主动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推诿和转嫁责任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世界粮食交易与跨国粮商的垄断

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跨国企业，粮食产业领域也不例外。跨国粮商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对各国的粮食安全带来了威胁。中国市场作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对它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意义。

目前掌握全球粮食运销的是4家跨国公司——4家世界500强企业，即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业内称之为四大粮商。人们习惯根据它们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把这4家称作“ABCD”四大粮商。这四个占据世界粮食交易主要份额的粮食集团行事低调，关于它们的新闻并不算众多，但是它们对于世界粮食环境的作用却没有人能够小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告诫世人：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要说四大粮商控制了人类，多少有些玩笑，但是对于粮食的控制却是不争的事实，了解它们对于我国粮食产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总结性效应。

下面通过对ABCD四大跨国粮商的介绍分析，以及跨国粮商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透过生活中琳琅满目的商品的表面，发现其背后隐藏的跨国企业的身影，深究市场中各方利益的争夺拉锯战。

ABCD何许人也？

ABCD四大粮商，即美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根据首字母人们习惯上简称它们为ABCD。它们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是当今世界最有名的四大粮商，4家世界500强企业，也是4家百年跨国粮商。

四大粮商的经营范围已经遍及了从粮食种植到仓储、运输再到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并辅之以金融等支持性服务，而其产品更是囊括了谷物、油料、食品、饲料、生物燃料等门类。除了ABCD四大粮商之外，美国孟山都也是赫赫有名的农业巨头之一。孟山都致力于种子和农业基因技术研究，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转基因作物研发的相关技术都已经被孟山都等少数公司控制。显然，寡头垄断的格局在世界农粮领域已经形成，这些企业的经营目标不是利润，而是攫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面对主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这些跨国粮商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动地位，《环球

财经》杂志的编辑鲍迪克在 2008 年 7 月发表的题为《粮食政治》的文章中，引用了美国密苏里大学农业社会系教授赫佛南的观点：不同粮食生产者之间兼并、接管和联盟，组建了更为集中的粮食产业集团。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10 财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达到 106 亿美元，增长近 30 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农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由于看好“中国机会”，美国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投入巨资进行战略布局。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日本及韩国几家企业组建的合资公司，正投资两亿美元在美国西海岸兴建全球规模最大的粮食出口基地，该出口基地的目标是中国等亚洲市场。

美国企业眼中的“中国机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首先是中国的粮食安全将受到挑战。一是外国农产品的进口无疑会对中国农民和企业造成冲击，因为美国并不满足于目前的对华农产品贸易顺差，他们还野心勃勃地盯着中国大宗农产品市场。目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就一项申诉进行调查，针对的就是中国的粮食进口仅限于几种产品。中国的粮食安全面临的第二层挑战，是跨国粮商在中国粮食产业链上的投资布局。据调查，丰益国际和 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简称“ABCD”）四大跨国粮商都把中国作为企业扩张的重要目标，逐步在中国国内建立了上下游完整的粮食产业链。

中国作为世界新兴的高速增长市场，自然成为了各跨国粮食的必争之地。邦吉在中国经营三家大豆加工企业，并且在上海成立了贸易公司从事大豆进口业务，并将中国国内的玉米、小麦进行出口。ADM 在中国设立了动物饲料加工厂，并成立了贸易公司从事卵磷脂、黄原胶、酸化剂等特种食品成分的销售。嘉吉在中国的业务范围更是广泛，包括农业服务、嘉吉农业供应链、嘉吉食品配料和系统、嘉吉动物营养、嘉吉金融服务、嘉吉能源、运输及工业贸易等，在北京、上海、香港、天津、南京、镇江、武汉、成都、佛山等大中城市成立了多家涉及饲料、玉米工业、生物工程、食品、油籽、贸易等业务内容的公司。路易·达孚是第一个向中国出口棉花的国家。中国加入 WTO 后，也成为了有农业贸易权的第一家国外跨国企业，在中国从事棉花、糖、油籽压榨等谷物和油脂业务以及进出口贸易业务。

通过上面对 ABCD 四大粮商在中国的发展情况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家企业尤其是嘉吉，已经在中国的农粮市场领域拓展了很深的势力范围，留给我国企业的机会又剩几何呢？国内的农粮企业如何应对这些实力强劲的跨国粮商对中国市场的冲击，我国政府如何在遵守市场经济运行原则以及 WTO 规则的前提下对这些跨国粮商实施有效的监控，以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是我们现在、今后必须面对的非常严峻的问题。

国际粮商巨头凭借其资本、品牌、技术等优势，从原料供应、仓储物流、生产加工到市场渠道各个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展，对我国国内的农粮市场也造成了全链条冲击。这些跨国粮商在给我们带来资金、技术、品质的同时，也对我国的中小企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除了像中粮这样实力雄厚的国企还能与之较量一番外，很多企业被迫关闭或被收购兼并，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只在中国存在，很多新兴国家在市场逐步开放过程中，必然会面对国外成熟的跨国企业对国内市场的侵袭。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在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在开放市场的同时保护国内脆弱的经济体，维护自身的粮食安全、经济独立，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可以参考以下几种途径来加强本国粮食安全的保障，防止国际粮食垄断势力的威胁。首先，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考虑本国农业资源的特点，进行多样化、合理化发展。其次，发展果酒、减少白酒，降低粮食消耗量。再次，减少粮食产后加工和消费的损失。提高粮食产后处理水平，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加强节约粮食观念的宣传和教育，减少粮食消费中的浪费，提高粮食的利用效益，是缓解粮食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对进一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生物能源战略加剧世界粮食危机

2007年，尽管澳大利亚等产粮国因旱情出现减产，但整体来看，全球粮食产量呈增长态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最新数据，2006年全球粮食产量为20.129亿吨，2007年估计为21.085亿吨，增幅为4.7%。

但是，产量的增长抵不过需求的增加。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2007年度世界粮食期末库存将降至4.05亿吨，为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粮食需求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食品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国家将大量粮食投入生物燃料生产。自2006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飙升。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美国2007年底通过的新能源法案鼓励大幅增加生物燃料的使用量，预定到2022年增至360亿加仑。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后几年美国玉米产量的1/3将用于乙醇生产。汽车与人争吃粮食的现象正愈演愈烈。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齐格勒曾经警告说，一些国家将粮食转化为燃料的做法是一种“反人类罪”。他认为，农业作物应该首先用来应对饥饿现象，而不是生产生物燃料，美国等国把数千万吨玉米、大豆转化成乙醇燃料对贫困人口来说绝对是场灾难。IMF首

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呼吁，有关国家需要重新考虑生物燃料计划。

粮食危机正在多个国家引发新一轮抗议浪潮。目前农产品出口占美国农业总销售量的比例高达 25%。各国农业受美国廉价农产品冲击，很多已经崩塌。1995 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此后美国靠巨额财政补贴生产的大豆进入中国市场。2000 年，中国大豆年进口量首次突破 1000 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此后几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额连续攀升，而中国大豆生产却没有补贴，这种不公平竞争的结果使中国农民生产大豆越多赔得也越多。结果本土的大豆生产逐步萎缩，2006 年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比 2005 年减少了 25%，而 2007 年大豆种植面积比 2005 年减少 40% 左右。最近 10 多年里，中国大豆产量由原来的世界第一，退居为继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每多进口 100 万吨大豆，就可能造成 130 万农民“失业”。

粮食被大量用于生物能源，那么粮食价格肯定上涨，粮食价格上涨肯定会引起与工业品价格的竞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向农业，这样工业品的价格也必然会提高。为此美国采取两手策略：先是大量买入工业品，库存增加以防工业品涨价；同时廉价出口粮食，把各国农业挤垮，进一步让农业上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为了实现能源独立的目的，也为了得到“更加容易获取”的能源，美国在这两份能源法案中大力鼓吹其“生物能源计划”，即利用植物来提炼乙醇、柴油等动力燃料。有些读者这时可能会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嘛，使用生物能源既清洁又自主，还实现了可持续。的确，我们鼓励发展新型能源，倡导使用清洁能源。但问题在于，美国生物能源计划中用来提炼乙醇、柴油等物资的“植物”绝大部分是玉米等粮食。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用部分玉米去提炼乙醇对他们自然不是什么问题，但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其将本来用于出口的粮食拿去提炼乙醇，这对世界将意味着什么？

在这一轮涨价之中，许多国家都露出了自己最脆弱的马脚。2007 年 11 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 6.9%。其中，城市上涨 6.6%，农村上涨 7.6%；食品价格上涨 18.2%，连续四个月物价涨幅超过 6%。这显然是 2007 年底世界粮食价格上涨传导过来的影响。

亚洲各国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由于工业化占地导致耕地的消失，日本谷物的生产水平从顶峰下降了 33%，韩国下降了 31%，中国台湾地区下降了 19%。在过去的 37 年间，日本粮食产量由 1589 万吨下降到 985 万吨，包括饲料在内的粮食自给率由 77% 下降到目前的 27%，下降了 50 个百分点。2003 年韩国粮食自给率只达到

26.9%。这与 2002 年（30.4%）相比下降了将近 4 个百分点，世界粮食进口的头号大国并不是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而是仅 1 亿多人口的日本，排在第二的是不及中国人口 4% 的韩国。

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当别人好不容易发展起来一点工业规模的时候，美国又利用自己的优势发展生物燃料，一下子导致世界农产品价格暴涨，直击新兴工业国的软肋。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 15 亿人每天只能花费 1 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用来购买食物的。如果食物价格上涨 50% ~ 80%，很多人将会陷于饥饿之中。乙醇战略有助于美国维持超级强国地位。

尽管乙醇生产是赔本生意且实际上也无法满足其能源自足的目标，但美国政府仍然全力推动乙醇生产。这是因为乙醇战略对美国维持超级强国地位有利。美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有大量土地可以用来生产农产品和乙醇，把多余的粮食转化为燃料有利于减少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该战略对美国总体有利，但却伤害到缺粮的国家。提高农产品价格虽也造成美国通胀，但却可降低美国的农业补贴，从而降低美国政府的高额赤字。

粮食涨价对粮食进口国伤害更大。美国先大量购入低端工业产品，诱使亚洲忙于生产衣服、鞋子、电视。用低价农产品挤垮亚洲农业，然后在能源自足的借口下把粮食转化为燃料。减少出口，导致农产品价格暴涨，从而打击新兴工业国的经济。

多家国际机构研究显示，发达国家对生物燃料需求扩大，是近来全球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IMF 研究显示，最近一轮粮价飙升，近 15% ~ 30% 的涨幅由生物燃料需求扩大造成。难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专家猛烈抨击生物燃料导致全球粮食价格猛涨，将粮食转化燃油行为视为“反人类罪”。同时，对生物能源作物的种植必定会挤占原本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这样势必造成生物能源“与人争粮、与粮争地”的恶性局面。

2007 年国家出台《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出到 2010 年我国计划增加非粮燃料乙醇年利用量 200 万吨，乙醇汽油销售量达到 3020 万吨，达到全国汽油销售量的 50% 以上。

可见，我国鼓励发展生物能源，而且有针对性地大力鼓励非粮燃料乙醇，限制粮食乙醇。这样在发挥生物能源清洁、可再生的优势下，又不会对我国及世界的粮食消费造成压力，有效缓解了粮食问题的蔓延。我国这一政策倾向，说明我国政府对世界粮食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勇于承担起一个国家应负的责任，是负责任的表现。

为了扼制粮价继续大幅度增长，各国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粮食危机已经引起全球界的关注，2008年4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出席新闻发布会时，他宣布将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应对全球粮价上涨危机，并协调联合国各机构就此采取行动。

警惕美国用粮食做“武器”推高粮价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就是把粮食、石油、地缘政治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他的一句名言被人们广泛引用：“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粮食成为主导世界格局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制造粮荒具有更广泛的杀伤力和影响力，是任何武器都无法比拟的。

美国农业部原部长约翰·布洛克说过：“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20世纪80年代，当时苏联粮食歉收，再加上美国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迫使苏联在国际粮食市场大量采购。这时美国使用粮食武器出了狠毒的一招，他们通过法令在国内减少1/3的小麦耕种面积，促使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后来，由于苏联的解体，符合西方国家的愿望，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毫不犹豫地说：“苏联需要多少粮食我们都可以提供。”

美国政府一方面用巨额的财政补贴维持着大面积的休耕土地，另一方面用巨额的财政补贴收购粮食用于出口，以保持其持续的粮食生产能力，控制世界粮食市场的垄断地位。美国即使在农业连年丰收后大量剩余的情况下，也会对外声称由于来自国内粮农的压力，必须增加出口补贴，粮食逐渐演变成了美国资源战争的“核武器”。

美国政府从1995～2002年，共提供农业补贴为1140亿美元，粮食利润的1/3来自政府的补贴。2002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批准通过的“新农民法案”，计划今后10年内，为农业和畜牧业提供1900亿美元补贴，比旧的农业法规定的补贴增加了80%。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倡导自由贸易，可就农业补贴问题的谈判，从10多年前“乌拉圭回合”到今天的“多哈回合”，始终不能取得任何进展。

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一直都把操纵粮价作为转嫁经济危机或打击新兴经济体的有效武器。美国农业称霸全球的法宝，是一直奉行的粮食补贴政策。美国用粮食作为武器，维持其霸主地位，从中谋取全球性政治和经济利益。

美国粮食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和居民消费能力不足，这一问题必将导致其国内的粮食价格低廉，从而影响广大农民的收入与利益。因此，为了维护美国农民的利益，美国的粮食政策一直以价格支持和鼓励出口为重要内容。价格支持为美国国

内的粮食限定了最低保护价格，有效防止了“谷贱伤农”；而鼓励出口的政策为美国大量的剩余粮食找到了出路，创汇的同时缓解了国内的压力。美国政府对粮食出口采取的鼓励政策主要包括保护性关税、出口补贴和出口信贷等，通过这一系列农业补贴及出口促进政策，美国实现了粮食的 70% 用于出口，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输出农产品最多的国家。

出口促进政策及高度机械化的农业生产，使美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大量低价倾销，摧毁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粮食净进口国，从而为粮食危机埋下了伏笔。

除了利用粮食补贴政策敲开欠发达国家的大门，对其进行低价粮食倾销之外，美国还采取了进一步的策略——高价收购中美洲、非洲等地的单一农产品，这一招真可谓是阴险至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面对高价诱惑，这些国家的农民自然都会选择放弃粮食作物的耕种，转而种植咖啡、香蕉、甘蔗等能“卖个好价钱”的经济作物，再用钱去购买“低价”的美国粮食。长此以往，这些国家必将逐渐丧失其农业独立性，需彻底依靠对美国的粮食进口，一步一步走进美国的埋伏。

这是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警惕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农业是立国之本，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同时粮食也是一国重要的战略物资。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证一定比例的粮食自给率，就犹如被别人扼住了喉咙，国际粮食市场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使你喘不上气来，在国内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多米诺效应”。一旦粮食价格上涨或粮食出口国对粮食出口采取限制措施，这些国家的人民就很可能将面临着饥饿等社会问题，甚至造成国内的政治动荡，这也正是我们在 2008 年那场世界粮食危机中所看到的情境。

粮食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粮食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它的作用已经不再是填饱人们的肚子那么简单。在一些国家手里，粮食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渐渐成为它们重要的谋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工具，而美国正是这类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以粮食为载体和工具，利用其粮食补贴政策、转基因粮食和对其他国家的粮食援助与粮食禁运，在世界范围内倾销“美国食品”，企图影响甚至控制别国的粮食体系。

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操纵价格是一把双刃剑，这次石油和粮食的涨价确实引起了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但它绝对没有达到打击新经济体的目的，反而，使美国自身陷入了更深的、结构性的经济危机中去了。

虽然美国在粮食的政策上都打上了“和平”的旗号，如“粮食换和平”计划，等等。但是从本质来看，这些都是为美国的政治利益服务的。在 2007 年到 2008 年

这场世界粮食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利用自己在粮食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打击发展中国家脆弱的农业生产体系，维持其霸主地位，从中谋取全球性政治和经济利益。粮食作为资源战争的武器已不是什么新发现，西方国家企图用粮食作为武器控制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和国际关系中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中国粮食消费刚性增长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在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地区大力推广转基因大豆的种植。美国雄厚资金的助力加上转基因大豆易于生长的特性，使得美国、巴西、阿根廷一举成为世界上大豆产量最大的 3 个国家。2005 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进口达 2659 万吨，占全球进口量的 1/3。2007 年，中国进口大豆 3400 万吨，占全球进口量的 1/2。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中美两国的大豆之争就与美国的转基因大豆不无关系。

首先与传统大豆相比，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更高；而且在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下，转基因大豆价格较国内也更低。2004 年 2 月 20 日，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发的转基因大豆获得中国农业部发放的为期三年的进口许可，从而为美国大豆作为原料进入中国的榨油厂打开了一条通路。20 世纪 50 年代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随着国外转基因大豆潮水般涌入中国，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降低成本，提高产出，转基因大豆自然成为了众油商的首选。

但这种情况却对我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一方面，我国大豆的高对外依存度使我们失去了定价权，也失去了主动权；另一方面，转基因大豆对我国传统大豆种植体系的大力冲击很可能导致我国传统大豆种植业濒临崩溃，我国的农业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粮食问题也显得愈加重要。“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和粮食的经济地位可想而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必须建立在人们不饿肚子的前提下。而 2008 年国际粮食危机为中国敲响了警钟，随着下半年金融危机的蔓延，粮食危机不被人关注，然而全球粮食危机依然存在。我国对粮食生产的高度重视，促使我国粮食生产和消费都未出现危机迹象。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农产品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下跌，这也成为我国爆发粮食危机的不确定因素。

2008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 10570 亿斤，是 40 年来第一次实现粮食总产连续 5 年增加。连续 5 年增产，似乎使国人无理由对应对全球粮食危机，有个

乐观而明朗的态度。但是，应该看到，危机的引发因素都还存在，潜在的粮食生产危机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危机。吃饭是人的第一需要，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境下，更应该注意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人口多，粮食的需求量大，这决定了中国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要立足国内生产，坚持自力更生。但立足国内并不等于百分之百的由国内生产，而是基本自给，适度进口。粮食适度进口对保障粮食安全是经济、有效的选择。从长远看，适度进口粮食在经济上是划算的，进口粮食实际上就是进口耕地、进口水、进口资源，可以缓解国内耕地资源、水资源不足的矛盾，还可以保护国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当前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有必要、也有可能充分利用两个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没有必要继续实行粮食 100% 或高度的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同时也会发展创汇农业，积极促进农产品的国际交换。但粮食进口多少是适度的，即我国粮食生产多少，自给率是多少是适度的呢？才不会对国际市场造成冲击，并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已有报道认为，粮食进口规模在 5% 之内是“正常区间”，6% ~ 10% 是“绿灯区间”，11% ~ 15% 是“黄灯区间”，大于 15% 是“红灯区间”。我国粮食进口量如果超过 15% 以上，对中国和世界都将是一个考验，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

从长远角度看，我国要保障 16 亿人口的粮食安全，这条路怎样走？在 1998 年由中国农业大学提出了“123, 234 粮饲超高产工程”，并得到国家科委的支持，牵头组织全国各地长期从事作物超高产栽培和育种专家，成立研究协作网。至今已经开展了 8 年的超高产理论研究和超高产定位试验，使试验田单产大幅度提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23, 234 粮饲超高产工程”是粮食与饲料粮高产与超高产研究示范工程，通过高产、超高产育种、栽培与耕作技术，使我国耕作制度一熟区、二熟区、三熟区的粮食或饲料的综合产量，简称“123, 234 粮饲超高产工程”。“123”代表不同耕作制度区，“234”则代表单产水平。高产田自然条件、生产条件、农田基本建设等均较好，旱涝保收，是多年来国家和农民大量物质与劳动投入的结果。全国耕地除高产田以外，还有不少属中、低产田，其增产潜力大，但改造的难度也大。尤其是低产田分布在生态脆弱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民生活比较贫困，正是需要扶助和支持的地区。所以对高、中、低地区如何在改善和支持上合理协调，是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粮食消费趋势也会不断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深入地分析现实的情况，认真分析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适应粮食消费趋势的措施，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维护经济的安全。

粮食危机使俄罗斯地位增强

俄罗斯土地资源丰富，其耕地面积约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 8%。但在独立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的粮食供给却长期依靠进口。但随着俄经济发展，国力的增强，政府对农业扶持力度加大。

这种尴尬的局面终于在 2001 年被打破，当年俄粮食产量达到 8520 万吨，这不仅满足了国内粮食需求，实现了自给有余，而且使俄再次成为粮食出口国。2002 年，俄罗斯粮食产量更是创纪录达 8660 万吨，粮食出口 1850 万吨，成为当年第五大粮食出口国。虽然近年来俄农业生产有所下降，但总体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势态，粮食出口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其在国际粮食市场中的地位更加巩固。

据专家分析，俄农业劳动力成本和耕种成本远低于加拿大等国，每吨成本低于欧盟或美国同类品质小麦 20 ~ 50 美元，因此其小麦出口在价格上具有一定竞争力。同时俄政府也已将扩大粮食出口作为促进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大力推动。

近年来，俄罗斯农业取得较快发展，在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粮食出口也保持较高水平。按世界粮农组织的口径计算，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6 月年度俄小麦出口预计为 990 万吨，占世界小麦交易量的 9% 左右，为全球第四大小麦出口国，其在国际粮食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日渐增强。

上个世纪，俄罗斯曾是世界粮食出口大国之一。但在俄独立初期，宏观经济的滑坡及对农业投入的不足，导致粮食生产大幅下降。供应出现严重缺口，不得不向美国、欧盟等提出粮食援助。仅 1999、2000 两年，俄罗斯便接受粮食援助和进口粮食约 1200 万吨。但重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的地位依然是其发展经济、扩大国际政治影响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随着俄经济好转，政府逐步加大了对农业扶持力度，粮食生产得到较快发展，粮食出口不断增长，俄罗斯逐步恢复了自己在世界粮食出口市场上的地位，现已步入世界最主要的粮食出口国行列。

俄罗斯近年来所推行的粮食政策都是以稳定国内供给为中心，通过政策的变化来调整国内供给，稳定国内市场。俄罗斯对粮食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调整，主要也是取决于其国内市场的供求情况，并随着国内供给的变化进行调整。

在大力推动农业生产，不断提高产量的同时，俄政府也大力促进粮食流通领域发展。坚持粮食的宏观调控，实行在政府调控下的粮食市场化改革一直是俄罗斯重要的粮食政策。《俄罗斯 2008 年至 2012 年农业发展规划》作为未来 5 年俄农业发

展纲领性文件，其目标是通过平衡生产与消费、提供农产品干预信息和支持粮食出口来实现粮食供求平衡，以达到稳定粮食市场价格、增加生产者收入和促进粮食出口的目的。

2007 年，俄国内市场的面粉和面包价格受国际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大幅上扬。为增加国内粮食市场供应，稳定粮食价格。俄罗斯政府于同年 11 月 12 日起开始征收小麦出口税，税率是其海关报价的 10%，每吨不少于 22 欧元。由于国际粮价的涨幅一直高于关税的上涨，因此即使俄政府努力控制，粮食出口仍在增长，俄国内粮食供应依然紧张。俄政府不得不在 2008 年 1 月 29 日将小麦出口关税提高至 40%，每吨不低于 105 欧元。

与此同时，俄政府也正寻求通过其他手段干预出口。2007 年 10 月份俄罗斯政府曾宣布可能会成立一家国营公司，来加强其对粮食总体供应形势的监管，尤其是在出口方面。现如今，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之一，在世界粮食市场的地位不断提高，其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近年来，俄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法规政策，加大了对农业支持力度。特别是 2006 年底，历经 4 年讨论的联邦农业发展法先后获得议会批准和总统签署，使农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更加完备的法律基础。联邦农业发展法的出台，不仅明确了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也使其成为政府 4 个优先发展方向之一。

据俄联邦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07 年俄粮食产量为 8180 万吨，与上年相比增长 4%。其中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的产量为 4940 万吨，同比增长 9.7%。俄罗斯成为继欧盟、中国、印度、美国之后的第五大小麦生产国。按世界粮农组织的估算，俄粮食生产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还将具有较强的出口能力。据俄罗斯农业部公布资料显示，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1 月期间，俄罗斯共出口粮食 1290 万吨。其中小麦 1170 万吨，占出口总量的 90%。作为俄最主要出口粮食作物的小麦，主要出口至埃及、利比亚、意大利、印度、土耳其、突尼斯等国家。

高粮价下哭泣的非洲

当粮食危机的“龙卷风”降临时，受影响最严重的莫过于非洲了。目前，粮食恐慌正在折磨着非洲，应对粮食危机迫在眉睫。

自 2010 年以来，非洲东北部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等在内的地区遭遇 60 年罕见大旱，导致严重粮食危机。据联合国统计，有 1200 万

人因干旱缺粮而受灾，而索马里的灾情最为严重，约有 360 万人饱受饥饿的煎熬。

“非洲已经病人膏肓了，它还会饿下去！”长期关注粮食安全问题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胡靖对这场人类灾难并不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在解决非洲饥荒问题上，人道主义的援助不过杯水车薪而已。

为了呼吁更多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非洲联盟把 8 月 15 日定为“非洲声音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在过去 3 个月里，单在索马里南部已经有 2.9 万多名儿童死亡。据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估计，肯尼亚、吉布提、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南苏丹等几个国家受灾人数已经超过 1100 万，其中包括 200 万儿童。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非洲的大饥荒？

1. “内战腐败”致非洲陷入饥荒

从《联合早报》刊载的一篇文章，我们知道，“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政府去有效执法、为人民寻找谋生方式以及化解宗教与派系的冲突”。不难明白，无政府并不是一个非洲国家引发饥荒的充分条件，政府的腐败才是饥荒的直接原因。斯威士兰的君主不顾人们生活的水深火热，坚持用国际援助款购买自己的私人飞机，津巴布韦政府对生产劳动率高的农民实行压榨性政策，原因是因为他们向反对派提供了资助。

即使在正常天气和国家不乱的情况下，不少非洲国家依然缺粮。因此有些专家认为，“有些非洲国家饥荒的罪魁祸首不是坏天气，而是它的极差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政府农业政策。”胡靖坦言非洲各国虽以农业为生，却并没有大力发展建设农业设施和兴修水利。

基础设施条件包括运输和交通系统的落后与不完善是非洲饥荒背后隐藏的原因。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以及很多非洲国家都没有修建铁路，以公路运输为主，饥荒发生后，交通不便给运送援助物资造成极大的障碍，正如联合国索马里人道事务协调员鲍里公开表示：“交通和安全是物资未能送达灾民手中的两大问题。”基础设施落后和政府的腐败都是非洲饥荒背后的大地雷。

2. 国际粮商推动粮价飙升

非洲之角那极其坏透了的天气和内乱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然而除了天灾，这次饥荒则更多是源于人祸。内战本来已经使得很多人陷入了饥荒灾难之中，索马里反政府组织拒绝国际援助的做法却使得更多人迈向死亡，这就是人祸。

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产品价格在进入 2008 年之后快速拉升，主要粮食品种稻米价格创 19 年来新高，其中大豆价格达到 34 年最高，玉米价格达到 11 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 28 年来历史新高，整个农作物产品的价格涨幅达到 30 年来最高点。受

此影响，非洲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也进入了加速上升的局面。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截至 2008 年 4 月，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塞拉利昂的大米价格已狂涨了 300%，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喀麦隆等国的米价也上涨了 1 倍，索马里的高粱和大米价格在过去 11 个月就翻了一番，非洲大量进口的食用油、面粉及糖等的价格也都在一路狂飙。

粮食价格的急剧上升，使非洲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粮食自给率一路走低的非洲无疑承受着粮价上涨的巨大煎熬。20 年前，世界银行专门成立了非洲粮食保障工作组，提出要在 20 世纪末实现非洲粮食自给的目标，然而到目前，非洲许多国家粮食自给率却降到 50% 以下。除了玉米基本能满足地区需求以外，非洲 45% 的小麦和 80% 的水稻都依赖进口。非洲国家由此支出的进口成本以及民众所增加的消费成本可见一斑。

3. 跨国公司掠夺非洲土地

非洲国家政府的腐败还远远不止这些，大部分国家都出卖本国的土地给西方的跨国公司，迫使非洲国家的人民失去土地，逐步沦为“贫雇农”。这也就应验了泛非通讯社的判断“造成饥荒原因更多的是人祸”。

国际环保组织发布研究报告表示，目前，至少有 15 个跨国公司在 11 个非洲国家的 500 万公顷土地上种植生物燃料作物，以得到生物燃料的原材料。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粮食最为短缺的国家之一，有超过 1300 万的人需要援助。然而荒谬的是，政府却拿出至少 3 百万公顷的肥沃土地给那些富裕国家。”为了种植生物燃料作物，仅仅是 2007 年埃塞俄比亚就批准了 815 个和跨国公司合作的农业项目，而租赁出去的土地收益仅仅是每公顷每年 1 美元，有媒体笑称“非洲的土地卖得比菜还便宜”。

4. 人口基数过大，未来的粮食刚性需求

目前非洲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更加恶化了非洲的粮食危机，使本已脆弱的粮食供给神经变得更加紧张。资料表明，最近几年，非洲人口以每年近 30‰ 的速度增长，到 2008 年末将突破 9 亿人。而据国际有关人口学者推断，到 2016 年，非洲人口将达到 13.5 亿人。在粮食供给状况没有改善的前提下，人口的迅速增加势必使非洲已经严重的饥荒雪上加霜。

疾病尤其是艾滋病的蔓延极大地削弱了非洲国家农业的再生产能力。因为农民生病和死亡直接影响咖啡和香蕉等需要高人力投入的重要经济作物的种植，转而更多地种植甘薯、玉米等需要人力投入少的抗旱作物，这就改变了以往出口优势经济作物换取粮食的贸易模式，以至于不少非洲国家购买粮食的能力每况愈下。

非洲国家政府为缓解粮食危机压力的政策修正和调整也在有序进行。但是，短期的救助和政策缓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洲的粮食危机，加速非洲经济增长步伐和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力才是关键。非洲几个主要的地区性经济一体化组织——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讨论加快地区经济融合、组建覆盖全非洲的自由贸易区问题，但进展缓慢。粮农组织认为，有必要在这一进程之外启动一项特别议程，允许包括粮食在内的少数战略商品率先在全非洲实现自由贸易，以缓解该大陆所面临的粮食危机。

山雨欲来，各国纷纷出招救市

当粮食危机向世界各国拉响了红色的警笛，这一轮的粮荒引起了各个国家的重视，纷纷采取措施来缓解本国的危机。

稻米生产国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正在不断抬高米价：2008年3月，全球第三大大米出口国越南总理阮晋勇宣布，今年越南的大米出口量将减少11%至400万吨；越南粮食协会称，已要求其成员在6月之前停止签署大米出口合同。

哈萨克斯坦从3月初开始实行对粮食出口的限制措施；

俄罗斯将粮食出口高税率实施期限延长；

作为粮食出口大国的中国也相应地采取了措施，对出口大米征收5%的暂定关税；埃及则禁止在2008年10月前出口大米。

粮荒蔓延，中国、埃及、越南和印度，这四个大米出口量共占全球1/3的国家，开始收紧大米出口。在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菲律宾，正采取行动打击囤积大米；世界银行发出警告说“由于粮食和能源价格飙涨，墨西哥等三十多个国家可能面临‘社会动荡’”。

面对疯狂的粮食危机，大多数国家采取限制出口、控制国民购粮数量的措施，例如，美国的超市开始限制顾客购买大米的数量，巴基斯坦重新推出了早已废弃的定量供应卡制度，粮食出口大国哈萨克斯坦表示要完全禁止粮食出口。和这些国家应对粮食危机的方法相比，日韩采取的保护措施截然不同，它们通过拓展海外农场促进本国粮食安全。《泰晤士报》说，“日本已拥有超过国内农田3倍的海外农田，首尔也渴望实现同样目标”。

日本和韩国的粮食主要通过进口，在世界上，韩国是第五大粮食进口国。据统计，2007年韩国3/4的粮食依赖进口，每年进口粮食大约为1400万吨。面对庞大的进口量，韩国尝试去海外开拓农场，以减少本国为进口粮食所支出的费用。据资

料显示，1978年8月，为实施大米增产项目，韩国政府在阿根廷购买了2万多公顷土地，但由于未对土地系统进行调查以及因缺乏资金使土地荒废近30年，结果不太乐观。

粮食危机暴发后，韩国又紧密锣鼓地开始开拓海外农场。韩国媒体统计报道，截至2007年底，相继有29家韩国公司走出国门赴俄罗斯、蒙古、中国、中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垦田，但目前已有近半数企业撤出当地，其中进军蒙古、中亚和澳大利亚的企业全部撤出。12家进驻俄罗斯边疆区的企业如今只剩现代重工等5家企业和宗教文化团体坚守，拥有数百公顷到数万公顷面积不等的农田。据韩国农林水产食品部负责人介绍，如果不对相关土地的经济性进行彻底调查，项目就会失去推进的持续性。不能拿下一块土地就盲目进驻，各企业应考虑自身需要，重要的是实现农田和种植作物的最佳结合。

令韩国政府感到欣慰的是，经过多年经营，韩国企业在俄罗斯边疆区垦荒取得了一定成绩。目前有近3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韩国耕地的1/6。生产的无公害大米受到韩国消费者欢迎。东南亚和俄罗斯边疆区是韩国建立海外粮食基地的最佳候选地。不过，韩国农协首席研究员安相敦表示：“日本对韩国建海外粮食基地很敏感，韩国将不可避免地与世界各国与日本展开竞争。韩国企业可以进军缅甸、泰国、柬埔寨等日本企业较少进入的国家以及与韩国邻近的俄罗斯边疆区。”

日本和韩国一样，日本在美洲的土地开发很早就为人所关注。早在1899年，一家由日本官方资助的公司向秘鲁派出了农场工人，这是日本有组织地在拉美农业殖民的开始。此后的日本又在东南亚建了农场，80年代将垦荒范围延至中国等地。现在日本与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地的农场签订了玉米等饲料作物种植协议。日本在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左右。这些殖民点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日本市场提供产品。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外拓展农场的方式可以缓解粮食压力，保障国民的生活，但在“屯田”的背后，也会存在一些想象不到的问题。海外粮食生产涉及到的难题有很多，比如所在国是否愿意将生产出的粮食出口，当前粮食危机最严重的反而是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也希望保证粮食的供应，这样就很容易出现所在国人民与投资屯田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屯田的目标要想顺利达到并不容易。



第十四章

石油变局下的世界新秩序

石油：威力无比的超级核弹

自 1867 年人类进入石油时代至当今世界，石油对世界各国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没有任何一种物资像石油这样左右着世界各国及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石油在对人类社会近一个半世纪的控制过程中，人们用各种称谓来概括石油的重要作用，诸如“工业的血液”、“经济的命脉”、“外交的武器”、“国防的保障”等。石油对世界各国神经的控制主要表现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

石油是经济的命脉。稳定的石油供应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最基本条件。石油是经济赖以运转的血液，石油首先为国民经济提供能源支持，石油是当今世界第一大能源来源，如果没有石油，地球上的交通将陷于停顿，工农业将无法正常运转，整个国民经济将陷入瘫痪状态，人类整个社会系统将面临崩溃，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从而危及国家安全；石油同时还是上百种化工产品的化工原料，这些产品包括工业原材料、提供给农业的化肥等生产资料 and 人们生活中的各种日用品，由此可见，石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是当今文明社会得以存续的最基本物资之一。

石油也是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1973 年和 1978 年的两次石油危机，结束了西方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此进入“滞胀”时期。石油危机对国民经济的打击是非常可怕的。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使美国经济“缩水”1/3，通货膨胀率从 3.4% 上升到 12.2%，失业率从 4.9% 上升到 8.5%；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则使美、英的 GDP 负增长率分别为 0.2% 和 2.4%。在我国，由于前几次石油危机爆发时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还不高，因而影响不大。但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的日益紧

密，我国对石油的敏感度越来越高。以现在中国每天进口 200 万桶石油计算，如果国际油价每桶上涨 5 美元，那么中国每天就要多支付 1000 万美元，直接导致 GDP 下降 0.4 ~ 0.5 个百分点，石油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已被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

上世纪初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建立正是得益于英国海军在世界上率先使用石油取代煤炭作为战争燃料。石油比煤炭更为高效、清洁，而且便于携带和运输，所以在上世纪初自英国开始，石油逐步取代煤炭，成为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最基本燃料。

随着石油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石油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军事战略物资。

机械化战争打的是“钢铁”，真正拼的却是“石油”。获取稳定可靠的石油供应以保证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是克敌制胜的前提条件，有时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机械化时代的战争几乎都是围绕石油展开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依靠对殖民地石油资源的牢牢控制，保证了战争机器有充足的石油供应，从而为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时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感慨于石油之于战争的重要性，说：“石油就像血液一样重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石油成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最为重要的筹码。德国正是凭借罗马尼亚丰富的石油资源，以机械化的闪电速度奇袭横扫欧洲大陆。日本进攻东南亚，目的也是为了获取战争的战略资源——石油，到战争后期，德、日的石油供应几乎告罄，飞机、坦克都因缺乏石油而几近瘫痪，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并导致了轴心国集团的最后失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德、日因石油的匮乏而输掉了战争。

石油是当今能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石油进口国来说，确保石油价格合理稳定与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同等重要。只有在合理价格水平上的稳定供应，才能确保经济的平稳持续运转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此，可以说控制了黑金石油就控制了世界各国的神经。

世界大战：为油而谋，因油而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是石油资源的主要掠夺者，它控制了世界大片产油基地，成为世界石油霸主。

从 1914 年战争开始到 1918 年战争结束，对于军事战略的革命，石油起到了举世公认的关键作用。在空战、机动坦克战和快速海战的年代，安全可靠而又充足的新燃料供应日益成为成败的关键条件。

在 1914 年 8 月的前几个月里，英国突然陷入到被认为是现代史上最血腥、破

坏性最大的战争之中。根据官方统计，直接或间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达到 1600 万 ~ 2000 万之间，其中大多数（1000 多万）是平民。在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足以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中”，英帝国自己就有 50 万人直接死于战争，伤亡人数达 250 万。但是，很少有人谈起的是，英国地缘政治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击跨其工业竞争的最大对手德国，还包括通过赢得战争获得对宝贵资源的绝对控制。

到 1919 年时，石油这种宝贵资源已经被证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原材料。这是“大博弈”的一部分——造就一个世界性的全新的大英帝国，其霸权在 20 世纪上半叶将无人挑战，这是英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一项对 1914 ~ 1918 年“一战”主要战场的研究表明，确保石油供应已经成为军事计划的核心。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石油为现代战争的惊人机动性开启了大门。

1918 年，位于里海巴库的俄罗斯富油区成为了德国的重要军事和政治目标，同时，也是英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一部分。英国先发制人，于 1918 年 8 月至为关键的几周时间里，先行占领了这一地区，断绝了德军总参谋部关键的石油供应。巴库断油，对德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几周之后就缴械求和。仅在数月前，德国似乎已经击败了协约国。这无疑证明了石油在地缘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鉴于石油这种新燃料对未来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所发挥的重大战略性作用，所有大国都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战争结束时，40% 的英国海军舰队是用石油作燃料。战争开始时的 1914 年，英国投入到战争中的装备包括 105000 辆卡车和 4000 多架飞机，这一数字包括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的投入。英、法、美在最后的西线进攻中每天消耗的石油达到了出乎人们想象的 12000 桶。同一时期，法国军队只有 110 辆卡车、60 辆牵引车和 132 架飞机。到四年之后的 1918 年，已经增加到了 70000 辆卡车和 12000 架飞机。

法军征用了 3000 多辆烧油的出租车，满载士兵冲向前线，挡住了德国的攻势。德军统帅当时就给德皇发电报说：“我们已经输掉了战争”。让德国人失去最后希望的，是两年后的日德兰海战。尽管德国舰队的舰艇更大更结实，却输给了英国舰队，因为后者在战前按照海军大臣丘吉尔的建议，英军舰艇全都转用石油做燃料，因而以更快更灵活的优势战胜了德军。

如果说，石油决定了“一战”的胜负，那么，“二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石油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始终将夺取石油资源作为其重要的战略目标。1939 年，德军以闪电战占领波兰。1940 年春天，德军扫平挪威、法国等国家，其首要任务就是掠夺这些国家的石油资源，增加其石油储备。1942 年 6 月 22 日凌晨 3 时，德军

全线出击，进攻苏联，其重要的战略任务是要夺取高加索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并由此打通通往中东地区的通道，占领伊朗和伊拉克，控制海湾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满足其战争机器的需要。更伟大的胜利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如果能够打下斯大林格勒，德国人就能切断苏联的外高加索石油供应。但是德国人败了，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因为没有足够的燃油给养而功亏一篑，失去石油供应成为德国在二战中不得不投降的重要原因。

石油不仅是德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更是日本人发动战争的原因。在东亚，日本为了解决其日益加剧的石油危机，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侵占了东南亚产油基地。战争期间，日本从东南亚掠夺了大量的石油。由于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迫使只剩下最后3个月石油储备的日本不得不孤注一掷地偷袭珍珠港。之所以说孤注一掷，是因为日本联合舰队往返珍珠港所耗费的汽油相当于日本海军平时一年的油量。结果是日本赢了珍珠港，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因为日军在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同时，忘了摧毁瓦胡岛上美国太平洋舰队的450万桶燃油。最后，还是美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激烈争夺苏联的高加索（尤其是巴库油田），争夺罗马尼亚和印度尼西亚油田，猛烈破坏对方的石油运输线，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可靠、充分的石油，确保机械化部队发挥威力；另一方面是为了摧毁敌方的石油补给，让对方的坦克、飞机陷入瘫痪。二次大战以后的几场局部战争，同样散发着浓烈的石油味道。如1982年4~6月英阿在南大西洋马尔维纳斯群岛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争夺马岛附近海域丰富的石油资源。而打了50多年的中东阿以战争之所以至今看不到尽头，更是由于一方面有丰富的石油给阿拉伯国家做后盾；另一方面美国为了争夺和控制海湾石油而坚决支持以色列，因为中东地区的打打停停最有利于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也最符合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石油战略利益。

谁是油价飙升的“幕后推手”

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国际原油价格进入上涨通道。特别是在2007年下半年，油价涨势异常迅猛，涨幅超过预期，全年的累计涨幅超过了60%。进入2008年后，油价一直在100~150美元/桶之间徘徊，按不变价格计算已超过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历史最高点。高盛公司预测油价将升至200美元/桶，甚至250美元/桶。

高油价正在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并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给穷国带来沉重负担。对于谁该承担油价高烧不退的责任问题，世界上众说纷纭，有的将其归罪于中

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上升，有的说是由地缘政治因素引起，有的说缘于投机预期，美国指责欧佩克限制原油产量操纵油价，欧佩克则坚称美元贬值和国际投机活动推高了油价……那么，究竟谁是油价飙升的“幕后推手”？

1. 美元贬值是直接推手

国际石油价格的涨跌与美元汇率有很大关系。决定美元汇率的因素主要是资本的流向，流向美国市场的资金越多，美元的需求就越多，美元的汇率就会上浮，反之则下跌。

进入 21 世纪，随着美国债务和双赤字的增长，特别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受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美元大幅走弱。自 2007 年 9 月以来，美联储连续 7 次降息，利率水平总计下降了 3.25 个百分点，使美元一再贬值。

美元贬值使以美元标价的国际市场原油名义价格随之提高。作为主要计价货币的美元的剧烈贬值无疑成了促使近期油价大幅攀升的主导诱因。通过统计 2007 年以来纽约原油期货分别以美元和欧元计价的涨幅，2007 年 1 月 3 日至 2008 年 3 月 11 日，美元计价的原油期货上涨 86.5%，而以欧元计价的原油期货上涨 60.1%。有关研究证明，美元汇率转嫁能源和原材料的传递弹性接近于 1，即美元贬值 1%，进口价格同时上涨 1%，这表明美元贬值会造成油价同等幅度的上升。所以，美元贬值客观上推升了国际油价。所以说，高油价的直接推手是美元贬值。

2. 石油跨国公司的一种卡特尔行为

随着石油期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石油利益集团已从传统的石油开采、加工炼制企业扩大到从事石油衍生投机交易的一些华尔街投资银行。正是看中了石油的巨大利益，越来越多有实力的机构加入到石油行业中来。而且新进入的这些利益集团，已经不再从事比较费力的石油开发和炼油工作，而是直接进入石油期货市场炒作石油期货。在石油金融市场上挣钱比石油开采和炼油更加容易，更加刺激。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包括通过代理人操纵国家机器控制主要石油产地、在热点地区制造紧张局势、联手进行石油衍生交易投机等手段，控制世界石油资源和操纵石油价格。在它们的推波助澜下，国际石油价格大起大落，剧烈波动。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高盛、花旗、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已经成为世界石油期货的四大玩家，它们利用在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引导市场预期，从中牟取暴利。

根据业内人士透露，JP 摩根大通、高盛集团、巴克莱银行及摩根斯坦利控制了石油商品掉期交易头寸的约 70%。这些投行进入掉期市场，通过与航空公司及对冲基金进行掉期交易，从油价波动中获取暴利，以弥补期货市场的损失。这些大型金融机构正是 2008 年国际原油价格剧烈波动的主要推手。

3. 投机成分兴风作浪

近几年的国际原油市场跌宕起伏，名义油价屡创新高，供需等传统因素已很难对此作出完美的解释，投机因素越来越被认为是造成油价大幅波动的罪魁祸首。有分析家甚至估计，投机因素造成的原油溢价高达 20 ~ 25 美元 / 桶。

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完全由石油期货来决定，决定油价的不是市场上实时的供需关系，而是纽约和伦敦两大市场上的石油交易情况。期货交易商分为商业交易商和非商业交易商，商业交易商需要实际使用该交易商品，主要是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对冲以控制风险；非商业交易商则通过头寸交易和价差交易来达到赢利目的。

原油的市场容量大，流动性高，参与者众多，几个重要参与群体（石油巨头、投资银行和基金等）对价格的变动都有很重要的影响。研究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石油市场 2/3 的交易出自投机，纽约原油期货市场上投机资金控制的原油期货合约总量多达 10 亿桶，已经超过了美国原油商业库存和战略原油储备的总和。

根据美国期货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持仓报告，2007 年 3 月份以来，基金在原油期货上一直是净多单，基金持净多单达到较高数量的时候，往往都是油价出现阶段性高点的时候。2007 年原油期货涨幅达到 56%，与此同时，投机资金在石油商品期货中的净多头寸竟然增长了 2674%。另据纽约期货交易所统计，到目前为止，参与石油期货交易的基金已增至 8500 多家，其中不乏摩根大通、美林等大型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其交易额占油市总规模的 60%，期油每桶 100 美元水平上还累积着大量未平仓合约，国际炒家仍在伺机而动。可见基金介入是油价上涨的重要动力。因此，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中，投机因素占了相当大的溢价。

以前，提起国际原油市场，我们会想到著名的托拉斯组织欧佩克。根据经济学原理，由于垄断了全世界 60% 以上的石油供给，欧佩克可以通过增产和减产轻而易举地控制国际油价。事实上，在进入 21 世纪以前，欧佩克也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然而，随着国际期货市场的不断发展，欧佩克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已经变得越来越有限，今天的国际原油价格已经不再由传统的供求关系决定。

石油纷争：不宣而战的能源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仅在 1960 年就有 17 个非洲国家取得了独立，因此这一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这是人类大解放的幸福时代，其最大的历史贡献是瓦解了殖民体系，结束了工业社会的“蒸汽磨逻辑”。殖民体系崩溃的结果是：这些国家内部，原来由“侵略者说了算”的事情，

现在“自己说了算”。最显著的改变是，民族力量控制了国内的自然资源，并且还相互联合起来，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建立。1973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石油输出国组织”以石油为武器，对那些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进行制裁，结果触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使西方经济陷入严重混乱。

石油是经济发展的“血液”，是全世界各国发展强大的首要战略问题。尤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谁掌握了石油谁就主宰了世界！谁就能控制对手！对20世纪的人类来说，石油促使了资本主义与现代工业的真正发达；石油造成了世界强权与地缘政治的错综纠结。历史上的历次石油危机引发了怎样的政治斗争和国际冲突？现在全世界正在面临新的石油恐慌，石油消费大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

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加剧了这一历史性变化，决定性地改变了西方世界对全球经济特别是资源问题的看法和做法。军事占领被金融占领替代，资源金融异军突起，迅速成为主要的金融力量。以石油为例，第一次石油危机告诉西方：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

1. 英国独大时期

最早在中东地区取得石油资源权的国家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英法两国瓜分了中东地区。法国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则占领了包括埃及、约旦、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等国以及波斯湾沿岸的一些酋长国。不过，法国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起到主要决定权的是英国。

2. 美国与英法联合势力之间的争夺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积极参与中东石油资源的瓜分，要求取得中东石油资源的开发权。美国要求中东石油利权门户开放，而英法联合势力则要求维护中东石油的既得权益，双方不断地发生激烈的冲突。1928年9月，为了掌握石油定价权和生产限额，几大石油公司与英、法资本的石油公司之间签订了“红线协定”和“阿克纳卡里协定”，至此双方才停止了争斗。1930年，英波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州美孚石油公司3家石油公司之间签署了“关于欧洲市场的备忘录”，从而建立了国际石油卡特尔，瓜分了世界石油市场，自此步入了国际石油大公司称之为黄金时代的30年代。

3. 美国与英国并驾齐驱时期

此后，随着石油需求量的猛增，以美国、墨西哥等国为代表的墨西哥湾地区成了当时的世界石油中心。但是，虽然美国控制了世界石油工业的大局，但是在中东石油资源控制权方面，美国仅取得了部分开采权，还远远落后于英国的统治力。到1939年，美国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中东的势力范围，超过了法国，基本可以与英国

并驾齐驱。

4. 美苏争霸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格局是美苏争霸所造成的两极格局。由于意识到控制石油资源是称霸世界的前提，两国政府都开始采取积极措施争夺世界石油市场。

苏联石油资源比较丰富，其石油甚至略有出口，但是由于国内发展的需要，石油工业自此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事需要，苏联石油工业发展迅速，曾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忙于国内经济建设，石油工业发展放缓。随着冷战的爆发，苏联开始大幅度提高石油产量。与此同时，苏联还调整了石油销售渠道，不但继续向东欧输出石油，而且积极开辟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进而打破美国垄断石油市场的局面。

二战后，美国石油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到 1948 年，美国第一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由于苏联的干预，石油价格十分低廉，国际石油供应严重过剩。美苏争霸加剧了这种过剩情况，最终，各大石油公司纷纷降价，使得世界步入廉价油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美苏冷战导致的廉价石油，才成就了西方国家的“能源革命”，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大发展。

在对中东的问题上，冷战后，苏联很快意识到西方国家工业的发展离不开石油，绝大部分石油要靠进口，而中东将是主要的石油输出国，一旦掌握了中东石油资源权，也就等于控制了全世界的经济命脉。但是，美国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便先于苏联采取了战略调整。对美国而言，控制海湾石油是涉及国家利益的大事。因此，美国的中东地区地缘战略，是遏制两伊（伊朗、伊拉克）、控制石油、排斥包括俄罗斯等大国，独掌中东事务。

美国在中东的首个扶持对象是伊朗，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美国坚决反对伊朗实行石油国有化，并扶持了亲美政权。此后，美国便开始将目标瞄准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占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对美国来说意义深远。美国采取各种手段支持中东亲美势力，包括资金投入、军事支持等，而对于反美国家则毫不留情，通过军事打压、经济制裁等方式威逼利诱，不给苏联以可乘之机。

5. 现代石油战争时期

当中东国家觉醒的时候，它们开始用石油作为武器打击西方霸权势力。面对不断发生的阿以冲突，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减产、禁运、提价，西方国家的工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后西方国家不得不做出妥协，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

1980年，由于美苏争霸所导致的中东内部矛盾激化，再加上宗教冲突和民族纠纷等，两伊战争终于爆发。伊朗还是亲美派时，美国出售给伊朗很多最先进武器，但是巴列维王朝垮台后，伊朗成为反美势力，加上伊朗与苏联关系的缓和，让美国很不自在，于是美国主动向伊拉克伸出援手。以匡扶正义为借口，美国的军事力量堂而皇之地挺进海湾地区。中东地区从此便成为一个火药库，战争不断。

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美伊战争的发生，无疑都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结果。海湾战争的爆发，使美国迅速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苏联则不那么幸运。两次能源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80年代的油价大跌，这对于主要靠向西方出口石油赚取外汇收入的苏联来说无疑是毁灭性打击，美苏间的军备竞争又进一步加剧了苏联的经济负担，有学者分析说，正是迫于这些压力，最终导致苏联的彻底解体。只要中东的石油还在，霸权主义对石油的争夺战就会不断持续下去。

日本：为油奔波，夹缝中求生存

日本石油工业的致命伤是天然资源贫乏，国内原油生产仅能供应其总需求量的0.3%。基于极度依赖外部能源供给的能源消费大国特性，日本在处理与资源国的关系时，能源合作始终是双边关系的重心所在，其对外能源政策具有明显的独特性：既不张扬，小心翼翼，运筹于策，又不跋扈，推崇合作，缜密于行。在获取石油资源、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方面，日本的一些做法颇具特色——进口原油和在国内加工。

二战后，日本受到美国的经济支持，利用当时国际市场的廉价石油和对化工产品的大量需求，大大推进了机械、汽车、船舶、重工、化工等行业的发展。在迎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日本也成了对进口石油依赖最为严重的国家。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石油在日本能源消费中的比例高达88%。1972年2月26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文章说：“日本的崩溃不需要原子弹，只要停止供应石油一个月就行了。”可见，中东石油已经成了日本经济的命脉。

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存度很大，日本消费石油的87%来自中东进口。其中，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占日本原油供应量约55%。伊朗、印度尼西亚、卡塔尔和科威特合计占供应量的30%。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配合斗争需要，决定对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采取紧急制裁措施，削减石油供应，将石油产量、价格等方面的决定权收归国有，逐步提高石油价格，从10月15日以前每桶301美

元提高到 1974 年 1 月 1 日的每桶 11051 美元，由此，第一次石油危机随即爆发。

这次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的单方面提价，主要是针对那些被认为敌对的、发达的西方国家。由于日本在外交上紧跟美国，支持美国的中东政策，故被列入敌对国家，进口石油中的 97% 成了被削减对象，经济遭到了致命一击。与此同时，日本外交抉择随之陷入两难境地：若继续倾向美国，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将继续给予严厉的惩罚——减量供应石油；若转向支持阿拉伯国家，又怕得罪美国。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抓住了日本的这一软肋，于 1974 年 1 月发表“特别声明”，逼迫日本尽快作出抉择：要么支持阿拉伯国家，要么站在美国一边，支持以色列。日本所需能源的 78% 为石油，而石油的 80% 来自中东，因此日本经济无法经受减量供应甚至断油的打击。从“经济优先”考虑，日本被迫放弃了在中东问题上的“等距离”外交方针，转而支持阿拉伯国家，发表了要求以色列撤出所占阿拉伯领土的声明。

之后不久，中东原油售价继续上涨，致使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在这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经济再次衰退并最终发展成为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尚未完全复苏且需要进口大量能源的日本经济和社会生产雪上加霜，石油进口费用的剧增导致长期处于国际收支顺差的日本在 1979 年出现了 86 亿美元的贸易赤字。

面对急剧动荡的世界形势，让日本充分认识到石油安全的重要性。经过反复探索，日本政府制定了应付经济衰退的基本国策——综合安全保障战略。1979 年，日本的“新经济社会七年计划”明确指出，“经济安全是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的根本”，而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是经济安全保障的关键。日本认为，从长远来看，搞好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确保石油供应是日本考虑自身安全的首要问题，在这方面，日本与中东国家经济关系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日本同欧美国家的关系。

日本十分重视通过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来促进合作方的经济发展，日本根据中东产油国谋求改变单一经济结构和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的需要，以伊朗、伊拉克、阿联酋、卡塔尔等产油国为重点，通过贷款、兴办合资企业、参加产油国大型工程投标、经营成套设备出口等途径扩大经济合作，以求得长期、稳定、直接的石油贸易。另外，日本还千方百计地吸收产油国的石油美元。至 1979 年，日本吸收石油美元 100 亿，约占产油国石油美元总额的 5%。日本的这一举措进一步加强了它与中东产油国的经济联系，从而基本稳定中东地区对它的石油供给。

除政府外，日本私营企业也很重视对中东地区特别是能源和资源产业的直接投资。据统计：1981 年 3 月，日本对中东国家（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私人直接投

资额在矿业部门占 24%，在农、林、渔业、木材纸浆等部门占到 4.4%，在重、化工业和纺织工业部门占 27.1%。与此相反，这一时期日本向欧美的私人直接投资 42.6% 在商业、金融和保险部门，能源和资源部门只占 14.2%。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日本从中东进口了大量原油。据统计：1978 年日本每天从中东进口 400 万桶原油，占中东出口额的 20% 以上（同期，西欧占 44%，美国占 11.6%）。在日本进口的中东石油中，向八大国际石油公司购买的比例从 1972 年的 63% 减少到了 1978 年的 51.2%，而向中东产油国的国营石油公司直接贸易的比例则从 1.5% 提高到 8.4%。这些数字表明：日本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外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满足日本设定的排放目标，政府计划使日本对石油的依存度到 2030 年减小到小于 40%，运输部门现依存石油作为能源约占 98%，到 2030 年将下降到小于 80%。

日本正在致力于能源安全供应和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2004 年 6 月发布的基本能源政策，要求增加使用天然气和其他石油替代能源。为保证能源供应，将增大核能发电能力，扩大 LNG 进口，并加大从俄罗斯和伊朗进口石油作为石油供应替代来源。

2006 年日本从中东进口原油比上年减少 1%，进口量占日本消费量的 90.2%。中东以外的新供应来源包括安哥拉、苏丹、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中亚。日本最大的炼油企业日本石油公司，2006 年开始从俄罗斯的萨哈林一期项目进口原油。

伊朗：挟油气锋锐，能源外交亮剑

油气储量丰富的中东一直是美国实施其石油战略的首要重点地区，受到了美国各届政府的极大关注。美国新罕布什尔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克莱尔在其所著的《资源战争》一书中指出：“石油作为力量之源，超过它作为燃料的分量。控制了海湾，就等于控制了欧洲、日本和中国，等于让我们的手握住了水龙头。”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2011 年 7 月伊朗人口约为 7789 万人，居世界第十八位，可是化石燃料非常充足，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和生产量居世界前茅，算得上能源大国。基本上不生产煤，水力发电起色不大，核能消费量为零。

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非常丰富，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 12% 和 18%，仅次于沙特和俄罗斯，占了两个“世界第二”。素有世界的“大油库”和“大气库”之称。石油工业是伊朗经济的支柱、国家的经济命脉。石油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左右，国家外汇总收入的80%来自石油出口。伊朗2010年中东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为1018.00亿吨，占全球总量的54.4%，其中，伊朗石油剩余可采储量占世界总量的9.9%，占中东的18.2%。

另外，伊朗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29.6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二，占中东的39%。然而，石油贸易量远比天然气贸易量高，世界石油贸易量占石油总产量的65%~70%之间，而中东石油贸易量约占世界石油总贸易量的35%~40%。

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创始国之一，在欧佩克中是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欧佩克给伊朗的石油生产配额为318.6万桶/日，占欧佩克的13%。伊朗实际原油产量维持在400桶/日左右，近3/4用于出口，余者用于国内消费。

在伊朗石油工业发展的近一个世纪里，石油不仅为伊朗带来了财富和荣辱，也深刻影响了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纵观伊朗石油工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在石油国有化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石油工业的发展、石油的生产和出口规模与伊朗的政局变化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和中东产油区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以及国际油价的快速攀升，石油经济在促进伊朗国民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愈加彰显，同时一系列的政治因素又在影响着伊朗石油工业的发展。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原油需求的2/3靠进口，其中约17%来自中东。因此，自杜鲁门时代以来，美国一直将中东地区视为其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并称任何外部力量想控制中东的企图都将被看成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威胁。

自1979年伊朗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美国和以色列被列为伊朗的头号敌人。从此，美国的石油财团被迫退出伊朗，美国也失去了对波斯湾石油运输线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据美国能源部估计，从1979年到1991年，由于石油价格的暴涨和欧佩克对石油价格的操纵，使美国经济遭受的损失高达4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同期的国防军费支出。美国决策者认识到，确保能源安全是美国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确保中东地区的油路畅通是美国海湾政策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因此，必须不惜使用军事力量来确保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维护自己的利益，以获取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

然而，面对美国的各种想法，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作为强大的后盾，伊朗丝毫没有把美国放在眼里。1980年美伊断交后，美国曾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并对其采取“遏制”政策。对伊朗，美国面临三种政策选择：一是军事打击，强力制服。美国不时在海湾炫耀武力，而伊朗频频举行军事演习显示已严阵以待。二是制裁升级，压伊弃核。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1747号决议

是第二个对伊制裁决议，伊朗态度毫无松动。美国要求加强制裁，但德、法、俄、中在伊朗均有重要的经济利益，轻微制裁对伊朗影响不大，制裁过重会伤及无辜。美单方面加强对伊朗制裁，并继续推动通过新的制裁决议。然而国际社会普遍对制裁的实效产生质疑。三是通过谈判，政治解决。伊朗与欧盟间谈判断断续续一直在进行，伊朗也一直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合作。但伊朗总统内贾德表示，“伊朗核计划是一列没有刹车装置的列车”，“现在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已为时过晚”。

实际上，伊朗核问题归根结底是美伊之间的斗争，美国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变伊朗的政权，控制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遏制伊朗已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大重点，为终止伊朗的核计划而实施军事打击仍然是美国今后的一个重要选项。但是对伊朗而言，其核心利益是维护其在 1979 年后建立的新政权的稳固，而核技术涉及伊朗的国家安全、地区大国地位和国内的民意，指望伊朗放弃发展核技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伊朗在拥核问题上也没有退路，只能在拥核的规模和透明度方面作些策略性让步。这一次，伊朗让美国看清了一点：伊朗不是伊拉克，动武不是闹着玩的！

然而，更出乎意料的是，随着俄罗斯西向政策的失败与美国的日益骄横，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共同利益——抵御美国这个对手越来越突显出来。其实，中东一直是苏联向南扩张的重点区域。此前俄罗斯接连向伊朗、叙利亚这两个中东反美国家出售武器并加强双边关系，并不顾美以反对公开邀请哈马斯领导人访问俄罗斯，明显有培植亲俄势力、借机重返中东的考虑。而伊朗作为唯一一个沟通海湾和里海两大“油库”的国家，是俄罗斯重树大国形象、在中东和中亚扩张最重要的据点和地缘盟友，也是俄罗斯实现通过阿拉伯海湾进入暖水水域的夙愿的重要跳板。

在伊朗核问题方面，俄罗斯对伊朗给予了大力支持，有了俄罗斯的大力支持，有可能使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态度更趋强硬。在制裁绳索把伊朗越勒越紧的情况下，俄罗斯成为伊朗抗衡西方压力的最强有力的靠山。有俄罗斯为伊朗撑腰，伊朗在未来的核问题上将更难让步。

美国：“我是老大，我怕谁？”

一直以来，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都毋庸置疑，不仅仅是经济、军事方面，在能源方面仍然是老大，但是与经济、军事不同的是，经济和军事都是能够以具体的数据计算的，但是对于能源来说，美国以其独特的方式显示了它的老大地位牢不可撼。

国际油市以美元报价，以美国产西德克萨斯中油为主要标的，以纽约商品交易

所为主要载体，美国对油价的硬影响根深蒂固；美国金融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宏观调控手段成熟，投资银行、基金公司、跨国能源企业等机构力量强大，对油市的软引导不容忽视；美国与沙特等海湾能源大户关系特殊，也是全球主要地缘热点的主导力量，直接决定石油供给环境；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通过石油库存对油市的影响举足轻重；美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通过期货市场，借助库存、地缘等因素，适时释放影响油价的消息，在低点买入、高点卖出，对冲操作抵消高油价、弱美元给美国石油进口带来的损失而大量获益，美国主要投资银行每年此项收入均在百亿美元以上。高油价形成的巨额石油美元，源源不断回流市场较为规范完善的美国期货、证券和房地产等行业，近两年来，回流美国的石油美元已达数千亿之多。在当前次贷危机、市场需求低迷的情况下，石油美元有力地支撑了美国就业、消费和投资。

2000年，美国政府对出现的油价持续暴涨曾通过动用战略石油储备进行市场干预，成功地使每桶原油价格下降了近5美元；当2005年8月底油价突破70美元/桶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紧急动用战略储备进行干预之后，油市上涨势头马上得到遏制。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确实可以对稳定油价、恢复各国对世界经济的信心起到明显的作用。然而，今天当各方对高企的油价都在劝说美国政府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油价的时候，美国不仅按兵不动，小布什总统反而还公开表示，要在未来20年把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增加一倍，并称继续增加美国石油储备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使人们不得不思索美国的动机何在。

如今世界上80%的油田归国家所有，石油涨价，石油输出国自然获利增加。然而最让人难以理解却又千真万确的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竟然是此次石油暴涨的最大受益者，原因就在于美元是目前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描述为：全世界都在努力生产美元能够购买的商品，而美国生产美元。美国是在利用其核心货币提供国的地位，以印刷品的价格换取石油。也有专家说，导致油价轮番上涨更像是美国一手打造的经济战略，或者说更像是美国事先策划的阴谋。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说明这是美国策划的阴谋，但确实有国际投机集团共同趋利的行动。由于现代金融体系的缺陷，投机资本可以在共同追逐超额利润的目标下展开默契一致的行动。纽约和伦敦是全球最大的期货交易市场，却缺少有效的监管制度。无论是美国财长保尔森，还是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这些主管金融的人都不主张对石油投机进行严格监管。还有学者认为，油价飙升的主因是小布什政府对投机炒家的放任，是美国利益集团博弈所致，石油企业、金融家等利益集团获利，实体经济受损。

对于高油价美国“偷着乐”，因为它知道一个道理：“我是老大，我怕谁？”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等，并不会沦为高油价的埋单者，相反还将因此致富。而真正的埋单者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等。本轮石油危机只不过是先发国家对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的又一次经济上的“掠夺”而已。美国用各种手段来维持国际油价在高位运行，是因为高油价可以帮助美国转嫁次贷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这的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老大”在前进的道路上的确谁也不怕，因为当它遇到困难时，它就很自然的将风险又转嫁到了其他国家身上。其他国家却被迫替美国埋单，高油价确实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冲击。

第一，国家宏观调控难度加大，加息抑制通胀可能加剧经济减速，减息刺激经济又可能加大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处于两难之间。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能源价格飙升，美国 2007 年 11 月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3%，创 34 年来新高。欧盟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 2007 年 11 月的通胀率也达到 3.1%，创 2002 年欧元流通以来的最高水平。油价上涨对欧美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和居民经济活动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在全球股市、房市继续炒上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未来金价、粮价可能受资金热捧继续攀高。高油价使石油美元有增无减，全球流动性过剩难以改观。石油美元与国际炒家相互借力，在金融市场兴风作浪。各国对高油价承受能力不同，反映在汇率、利率政策上存在差别。而这种政策差别很容易给国际炒家提供可乘之机。

第三，高油价也让中国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之一。首先，高油价对中国的传导效应日益显现，加大了通胀压力。油价上涨容易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胀，带动物价总水平上扬。由于国际油价持续大幅攀升，2007 年以来，中国已 4 次上调成品油价格。国际能源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研究的报告显示，如果国际油价每桶上升 10 美元并持续一年，中国通胀率将上升 0.8%。油价带动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剧了中国国内的通胀形势。其次，高油价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导致上下游行业效益分化。进口原油价格上升带动相关行业产品价格上涨，造成中国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赢利减少、生产规模收缩、经济活力下降。油价上涨还改变了各行业间的利润分配格局，使上游行业效益相对提高，下游行业效益相应下滑，石油开采行业受益，石油加工等重化工业、交通运输及农业部门受损。再次，高油价促使中国国民财富净溢出，抑制了经济增长。目前，中国石油日常用量近乎一半需从国外进口，石油是中国单一商品贸易中最大的逆差项目。据估算，国际油价每桶上涨 10 美元，中国一年就要为进口石油多支付 100 亿 ~ 150 亿美元，GDP 增速至少放缓 0.5%。

中国参与国际石油贸易面临的挑战

西方学者曾测算，1973 ~ 1974 年的石油危机使世界油价从每桶 3 美元上升到 12 美元，使美国 GDP 下降 4.7%，欧洲下降 2.5%，日本下降 7%。IMF 有关报告指出：每桶原油价格每上涨 5 美元，将使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约 0.3 个百分点。欧盟委员会测算：如果油价每桶上涨 10 美元，则两年内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将减少 0.75 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则增加 0.6 个百分点。美国经济专家估计：国际油价每提高 1 倍，美国国内的 GDP 就会下降 2.5% 左右；每桶石油价格上升 10 美元，每年将给美国经济造成 500 亿美元的损失，经济增长率将减少约 0.5%。

过高的石油价格对石油进口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石油价格的稳定对于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性资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石油需求量不断增加。由于石油资源有限，中国的石油供需矛盾日益严峻。面对着石油进口量逐年攀升的局面，中国石油对外贸易问题凸现。

第一，参与国际石油贸易主体需要进一步多元化，贸易公司竞争力亟待提升。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需要逐渐打破国有贸易一统的局面，允许更多有资质的企业参与进来。另一方面，从事原油、成品油贸易的企业受体制与人才的制约，目前还只能以保障国内石油供应为其主要使命，全球石油贸易业务还不足以成为公司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也无法与国际大石油公司展开全面竞争。

第二，石油进口只能被动接受以美国和欧洲为主导的石油供需形成的价格，国际价格形成过程中没有客观、合理地反映我国石油的供需变化。虽然我国石油贸易量增长迅速并逐渐成为国际石油贸易中的重要部分，但这一因素在基准原油价格中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需求因素常常被错误的预期所夸大，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国际石油价格，而我国却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石油价格。

第三，适应多元化贸易方式的体制和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风险管理远远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石油交易机制。一方面，在目前形势下对企业从事国际石油交易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管，只能对企业参与国际石油衍生品交易实施限制；另一方面参与石油贸易活动的石油公司灵活运用衍生产品进行交易的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价格风险而无法主动、有效管理风险。

第四，参与多边国际能源合作机制的框架还不足以保障我国石油贸易的安全。国际能源合作机制中，石油是核心。我国有重点地参加了一些多边能源合作机制，

但碍于时间、制度、政治等因素的制约,目前还未完全建立起稳定、有效的能源合作框架,影响了安全、稳定、可靠的石油贸易战略的实施。

因此,对国际石油贸易形势的客观分析对于我国加快和完善石油市场的建设和提高国际市场上石油贸易中的竞争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石油价格整体走势肯定是会上涨的,我们必须不断给予它不能上涨的理由,才能让它不上涨,或者上涨慢一些;一旦有了一个上涨的理由,它会上涨很快。

中国并不是产油国,面对油价上涨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事实上,我国近期已备受通货膨胀的困扰,政府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快速上涨的国际油价却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火上加油”,使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任务更为迫切和艰难。

另一方面,油价上涨间接影响了通胀预期。一般来说,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的预期会支持国内的通胀预期,如果大家都觉得价格要涨,那么价格就一定会上涨。当然,影响程度和速度在不同地区和时间各不相同,伴随而来的通货膨胀影响相应地也不尽相同。

当前中国在国际石油贸易中主要面临着以下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从本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完善国内石油市场体系,提高中国在国际石油定价中的话语权是我国参与国际石油贸易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也快速增长,尤其是对最具战略意义的石油能源需求更是如此。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到2002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我国的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2006年我国的石油需求消费量高达3.49亿吨,占世界石油总消费量38.90亿吨的9.0%。然而,2006年国内石油生产量却仅为1.84亿吨,占世界石油总供应量39.14亿吨的4.7%,因而不得不在国际油价飙升的情况下进口1.65亿吨,致使海外依存度升至47.2%。由此可知,能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主要问题,我国石油对外贸易问题已不可忽视。能否保障石油供给的安全性、稳定性已成为我国贸易政策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国际形势来看,我国同其他国家的石油资源竞争日益加剧。

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发展,国内对原油的需求不断增加。但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国家之间的石油博弈在所难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与其他国家的石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

日本在全世界与中国争夺油源。东海石油勘探之争,俄石油管道之争将中日两

国“能源之争”暴露的淋漓尽致。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在能源资源上却是一贫如洗，主要能源产品（石油、煤炭、天然气）几乎全部依赖于进口，这种对石油进口的过度依赖造成了日本能源结构的严重缺陷。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不断加强。进口油气资源的同源性（从中东和前苏联进口比例都较大）、能源对外依存度的相像性（原油对外依存度都较大），再加上地缘政治经济的相关性，使得中日两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

中美在石油领域成为战略竞争对手关系。作为世界石油消费的头两号国家，中美必然会在石油资源领域展开竞争。表面上，中美之间的利益交叉点促使中美达成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美国也支持中国对石油定价权的要求，但是中国与美国石油进口来源地高度交叉重叠。近几年来，美国不惜使用武力控制世界石油资源富集地区并左右石油价格。中国也在加紧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加强与石油出口国的合作，增加石油进口来源。这种情况下，摩擦不可避免。

中印争油愈演愈烈。印度作为高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其石油消费潜力巨大，而目前印度的石油产量严重不足，70%的石油需求需要进口。为了保障未来的石油供应安全，印度一方面大力加强海外原油勘探开发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积极推行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面对油气供需的严峻形势，中印两国的原油竞争日益激烈，并且有不断升级之势。中俄供需互补，夹杂摩擦。

在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对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来讲，思考能源独立，应该是明智之举。

高油价是 OPEC 操纵的吗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给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石油消费国的危机意识日增。为了制衡石油输出国组织，并对国际能源政策进行协商，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率先倡议建立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国组织——IEA（国际能源机构）。

国际能源机构的活动特点就是在 IEA 集体能源安全体系中的跨政府调节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国际能源机构集体能源安全体系首先就建立在国家间相互协调的原则基础上。1974 年制定的《国际能源纲要》对这些原则作了详细规定。按照这些原则，IEA 的成员国必须拥有不少于 90 天石油净进口额的石油储备；此外，必须限制消费，在出现大规模供应中断的情况下，国际能源机构成员国必须动用储备，与其他成员国分享石油储备。依据《国际能源纲要》中规定的义务，每一个国家制定本国的石油储备和管理制度，本国公司和国际公司参与这些机制的运行。欧盟在自身

的框架内也建立了应对供应中断的反应体系，这一体系不但规定建立原油储备，而且还要求建立 90 天的主要石油产品储备。

2007 年 12 月 5 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 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部长会议上作出决定，OPEC 不会增加原油产量。消息传出，国际油价每桶上涨了 2 美元。之后，国际油价从 2008 年 1 月 2 日突破每桶 100 美元，用了不到半年时间，曾突破了 140 美元大关。人们对油价每一次自以为大胆的极限猜想，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很快被甩到了背后。油价向前猛冲，刺激了全世界的经济神经，所有的国家都在担心一个可怕的字眼——通货膨胀，所有的股市也都跟着瑟瑟发抖，高油价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深刻而全面的。欧佩克为了谋求高油价带来的利益见死不救可以理解，为何作为消费国组织的 IEA 也拒不出手？看来在油价飞涨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动机。有人把石油涨价归结于供需失衡，但似乎这并不是油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国际日需求原油数量是 86.7 万桶，而原油日供应数量是 86.6 万桶，要想让这 1000 万桶原油的差距来把油价推到如此高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产油国和石油消费国在 2008 年夏天于西班牙召开的世界石油大会上就谁应该对高油价负主要责任的问题吵作一团，代表们都在推卸责任。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高油价？油价暴涨的全部谜底究竟是什么？

6 年间，OPEC 国家从原油出口上多斩获 3 万亿美元。OPEC 秘书长巴德里明确表示，目前全球石油并不存在短缺问题。油价高企不是供需问题。OPEC 成员国的部长们也随声附和。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纳伊米表示，油价高企和原油产业毫不相干，目前全球原油市场供应充足，高油价的背后是紧张的地缘政治和炼油厂产能瓶颈所致。卡塔尔能源与工业部部长阿提亚认为，OPEC 不应该当高油价的替罪羊，推高油价的是国际金融投机活动，“国际市场情况超出了我们的控制”。

科威特能源与环境组织主席阿巴斯甚至指责，对 OPEC 不增产的质疑，实际上是投机集团试图操控油价的舆论造势。他抱怨说，高油价和 OPEC 没有关系，而石油输出国还得承担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然而，事实和数据却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故事。根据 BP 世界能源统计数据，2006 年，全球原油产量 39.141 亿吨，比 2005 年增加 1910 万吨。中东产量为 12.219 亿吨，占世界产量 31.2%，OPEC12 国生产原油 17.021 亿吨，占世界总生产量 43.5%。显然，OPEC 在石油供应上举足轻重。

“OPEC 对石油市场具有重大而关键的影响作用，世界石油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能源专家管清友研究发现，OPEC 组织成立之前，石油价格大部分时间处在这 146 年间平均价格线之下，而自从 OPEC 成立后，则处在平均价格线之上。根据 IEA（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 2010 年，世界石油净出

口将达到 21 亿吨，中东将包揽世界石油贸易增长的大部分，约占增量供应的 70%。石油消费大国还将继续任 OPEC 宰割？

据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全球石油的剩余产能大概为 300 万桶 / 天，这些产能基本上全部被 OPEC 所拥有，而沙特掌握其中的大部分。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市场研究所所长单卫国也坦言道，石油消费国想让原油价格降下来，而 OPEC 想让石油价格高一些。要解决这个矛盾，现在全世界居然冀望于矛盾的一方，即 OPEC 采取增产措施，“这恰恰反映了 OPEC 在石油市场的影响力。”据统计，目前，国有石油公司直接控制了全球 37% 的石油储量，而到 2030 年，全球近 3/4 的石油都将由这些公司控制。石油民族主义的兴起，削弱了各大石油公司寻找原油新来源的能力，却大大加强了产油国家对石油价格的操控力。

然而，20 多年的实践证明，美国巨大的战略石油储备对应付世界石油市场动荡和调控国内油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已成为稳定国内能源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历史上，总共有 4 次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的做法，而这些与小布什政府的现行政策相比较，可以形成鲜明对照。2007 年 1 月，当油价呈现加速上涨苗头，经济专家建议小布什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时，他非但不同意，反而宣称美国要在未来 20 年内把原有 7.27 亿桶石油储备再增加 1 倍。

之后，当美元受各种因素影响，2008 年 4 月下旬出现了企稳反弹的走势时，以美元标价的油价理当企稳下降，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看似巧合的事件阻止了油价的下跌：4 月 21 日壳牌石油公司称在尼日利亚的输油管道遭到袭击，公司原油日生产能力下降 16.9 万桶；4 月 25 日美国政府和军方发言人同时证实，美国军方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军舰开枪；4 月 29 日，小布什总统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继续增加美国石油储备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从这些看似巧合的现象中我们可以猜想得到，究竟是谁在导演着这场全球油价一路狂奔猛进的一幕。其实我们应该懂得，在能源消耗日益激增的今天，石油作为一种政治斗争工具，其油价完全被个别大国操纵，成为助其谋取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有力武器。而这个别国家就是美国！

石油储备：争夺石油定价权的强力武器

石油储备是应对短期石油供应冲击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本身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以保障原油的不断供给为目的，同时具有平抑国内油价异常波动的功能。战略石油储备制度起源于 1973 年中东战争期间。当时，由于欧佩克石油生产国对西方发达国家搞石油禁运，发达国家联手成立了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纷纷储备石油，以

应对石油危机：当时国际能源署要求成员国至少要储备 60 天的石油，主要是原油。20 世纪 80 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它们又规定增加到 90 天。

石油储备被公认为控制石油价格波动的主要手段，石油储备在油价上涨时抑制上涨，在油价下跌时缓解下跌压力。这是因为石油储备在各种市场波动传送到油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石油储备和商业库存在国际石油市场这个大系统中处于调节总供需量的地位，其数量变化直接关系到世界石油市场进出口的变化。如今，石油储备在国民经济中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 1997 年初开始，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等因素的影响，世界石油需求大幅度减少，OECD 国家的石油储备量开始持续上升，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石油储备量在 4.6 亿 ~ 4.8 亿桶之间小幅度波动的局面，1998 年 1 月一举突破 5 亿桶大关后继续扶摇直上，1998 年 8 月份到达 5.26 亿桶的高峰。石油储备量不断刷新历史纪录反映了当时国际石油市场供过于求的严重情况。虽然库存的迅速增加有助于大量吸收过剩石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石油价格暴跌的压力，但是油价的急落还是到来。到了 1999 年 2 月，油价跌破了每桶 10 美元的价格。

石油储备在当今国民经济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战略储备可以通过向市场释放储备油来减轻市场心理压力，从而降低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的可能，达到减轻石油供应对整体经济冲击的程度。对石油进口国而言，战略储备是对付石油供应短缺而设置的头道防线，但其真正的作用不在于弥补损失的进口量，而在于抑制油价的上涨。

此外，战略石油储备还有以下作用：

首先，可以给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能源消费方式争取时间。

其次，可以起到一种威慑作用，使人为的供应冲击不至于发生或频繁发生。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交替实行“减产保价”和“增产抑价”的政策时，战略储备能够使进口国的经济和政治稳定，不会受到人为石油供应冲击的影响。

一般认为增加储备量就可以抑制油价剧烈波动。石油储备的作用相当于一个调节进出口量的“水库”，这个“水库”变化主要受到供求差额、储备目标量、经营决策等信息流的制约和调节，它是一个积累性数量，与油价走势有相当密切的关系。20 世纪 80 ~ 90 年代，油价基本处于经库存调节后的相对平稳的收敛阶段。从 80 年代中期起，一直到 90 年代后期的十多年里，除了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的海湾危机中有很短的一段时期出现了每桶原油价格超过 30 美元的情况外，油价一般都在每桶 15 美元 ~ 25 美元的较小范围内波动。

鉴于石油是中短期需求价格弹性极低的商品，而在 80 年代初开始到 90 年代末的近 20 年的时间里，国际石油市场处于 OPEC 组织和西方石油大公司都无法完全控

制局面的情况之下，石油价格应该有相当大的波动空间。而这种大波动没有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是与主要石油进口国的巨大石油储备的存在和合理使用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建立和完善石油储备体制，是防止石油价格波动带来冲击的有效措施。

就目前来看，国际能源机构成员国有3种类型的石油储备体制，一种是政府储备，由中央政府储备，由中央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维持的石油储备，政府储备只能用于应急目的；二是公司储备，包括强制性储备和商业储备；三是机构储备，这是公共和私营部门维持石油库用于应急目的，根据“国际能源计划”协议，这部分石油储备通常是由公用或私营机构以成本共享合作拥有的方式用于应急目的的石油储备。政府储备和机构储备一般统称为公共储备。由于国际能源机构成员国石油供求形势和政策的侧重点不同，各国的石油储备体制也具有多样性。大体上又可以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只有公司储备的体制，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十一个净石油进口国石油公司储备，加拿大、挪威和英国三个净石油出口国没有国际能源机构规定的储备义务，但也实行公司储备制。第二种类型是政府储备和公司储备共有体制，美国和日本两个石油净进口国即属于这一类。第三种类型是公司储备和机构储备共有体制，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6个净石油进口国属于这种体制，丹麦没有国际能源机构规定的义务也实行这一体制。第四种类型是公司、政府和机构共同储备石油的体制，属于此类的有德国和爱尔兰两个国家。

在紧急情况下，国家能及时利用石油储备，减轻和限制石油武器或石油危机的冲击力，为解决危机和其他一系列问题赢得所需要的时间。同时，石油储备还有心理和威慑作用，既为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条件，也让潜在对手认识到石油储备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障石油供应，使其不敢轻易考虑动用石油武器这张牌。

我国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大国，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意味着我国的能源需求持续旺盛，而在当前，国际市场原油价已再次冲破每桶80美元大关，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国际投机资金很可能会继续疯狂炒作原油等大宗商品。

目前我国的石油储备能力远远不能适应石油企业 and 国家应付突发事件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完善我国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在国际市场争夺石油定价权对维护我国能源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长远看，我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石油储备经验。只有增加我国的石油储备，逐步建立我国的石油储备制度，分步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特点的石油储备体系，增加石油价格的谈判筹码，才能使我国经济在未来有序健康地发展。



大势所趋的低碳经济模式

绿色建筑：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超级引擎

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建筑排放量几乎占到了50%，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运输和工业。

目前，城市里的建筑碳排放比例更高，城市碳排放有60%来源于建筑维持功能本身上，而交通汽车的碳排放只占到总量的30%。住宅、商用建筑和公共建筑占全球总能源消耗的40%左右，成为能源消耗的最大单个组成部分。

以中国为例，统计数据显示，每建成1平方米房屋，约释放出0.8吨碳。另外，在房地产的开发过程中，建筑采暖、空调、通风、照明等方面的能源都参与其中，碳排放量也很大。

受全球能源危机影响，全面低碳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低碳技术、低碳城市、低碳经济逐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人提出的，之后被很多国家采用。它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与传统经济体系相比，可以在生产和消费中节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能保持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有3个原则，一是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经济在增长，温室气体排放降下来。二是一个过程的概念，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也就是说，你来衡量一个经济体，是不是低碳，现在很难说给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和传统的方式相比，其是低碳。三是要实现多目标，包括经济社会，不仅仅是碳排放的问题。

所以，在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上，建筑的“节能”和“低碳”注定成为绕不开的话题，这就需要大力建设低碳建筑，也就是“绿色建筑”。那么，什么是

“绿色建筑”呢？

所谓“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材料与设备制造、施工建造和建筑物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主要包括节能能源和节约资源两个方面。

节约能源。充分利用太阳能，采用节能的建筑围护结构以及采暖和空调，减少采暖和绿色建筑空调的使用。根据自然通风的原理设置风冷系统，使建筑能够有效地利用夏季的主导风向。建筑采用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平面形式及总体布局。

节约资源。在建筑设计、建造和建筑材料的选择中，均考虑资源的合理使用和处置。要减少资源的使用，力求使资源可再生利用。节约水资源，包括绿化的节约用水。

由于“绿色建筑”在世界各国还处于一个偏理念化的阶段，人们的认识度还不高，普遍存在着几个误区。

首先，绿色并不等于高价和高成本。

在楼盘销售以广告轰炸和概念炒作盛行的年代，“绿色建筑”也毫无例外地成为房地产商们朗朗上口的新词儿，以至于让人们误以为绿色建筑就是高档建筑。

实际上，“绿色建筑”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绿色并不意味着高价和高成本。比如延安窑洞冬暖夏凉，把它改造成中国式的“绿色建筑”，造价并不高；新疆有一种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它的墙壁由当地的石膏和透气性好的秸秆组合而成，保温性很高，再加上非常当地化的屋顶，就是一种典型的乡村“绿色建筑”，其造价只有 800 元 / 平方米，可谓价廉物美。

因为“绿色建筑”的标识不明确，人人都可以滥用，“绿色建筑”也就成为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提高房价的欺骗性概念。现在应大力推广“绿色建筑”的标识，通过对建筑的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室内环境的具体性能进行实测，给出数据，规定对生态环境的保障。把“绿色建筑”从一个简单的概念变成定量化的检测标准，对达到标准的给予“绿色建筑”的标识，这样伪绿色就会现原形，最终会退出房地产市场。

其次，“绿色建筑”不仅局限于新建筑。

新建建筑的节能只是执行问题，难度并不是很大。难度在于我国现在既有的 400 亿平方米建筑的节能改造，如何让既有建筑成为“绿色建筑”。

再次，建筑节能不只是政府的职责。

不是有鲜花绿草、喷泉水池、绿化得好的楼盘就是“绿色建筑”，每台电器设备在待机状态下耗电一般为其开机功能的 10% 左右；一盏 11 瓦的节能灯相当于 60 瓦的白炽灯亮度。这些节能小窍门看似细小，日积月累，却能节省不少能源。推广“绿

色建筑”不只是政府的职责，广大居民也是“绿色建筑”的最终实践者和受益者。

目前，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已经开始发展“绿色建筑”，有些国家甚至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

在日本，对于一个缺乏资源的岛国来说，能源就意味着生命，而低碳建筑就成为大多数日本建筑师当时考虑的出路之一。早在 20 年前，日本就已经开始在建筑界践行绿色低碳型的建筑。

在欧洲，近年流行的“被动节能建筑”可以在几乎不利用人工能源的基础上，依然能够使室内能源供应达到人类正常生活需要：并且，这在奥地利、德国等国家已经成为现实了。

在大洋洲，最影响绿色建筑需求的因素是公司社会责任感，而不是潜在的成本节约，因为租户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

根据数据显示，全球房地产建筑业的能耗占到终端总能耗的 40% 左右，排放相似比例的二氧化碳。中国每年有近 20 亿平方米的新建筑建成，只要中国提高建筑能效，全球在 2010 年可以减排 7.15 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 2010 年全球排放总量的 27%。

目前，低碳建筑思想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已写进国家的发展规划中。事实上，早在 2007 年，我国提出的《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 2010 年使单位 GDP 能耗比 2006 年降低 20% 的目标。当然，中国低碳建筑的发展还需要有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可操作的标准，同时也应有相应的政策支持。

所以，建设绿色低碳住宅项目，实现节能技术创新，建立建筑低碳排放体系，注重建设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有效控制和降低建筑的碳排放，并形成可循环持续发展的模式，最终使建筑物有效节能减排并达到相应的标准，是中国房地产业走上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开发商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低碳建筑已逐渐成为国际建筑界的主流趋势。低碳型的“绿色建筑”将成为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超级引擎，房地产开发也应该迎来低碳时代。

新能源车：助推低碳经济跑起来

长期以来，对于汽车产业来说，实现低碳排放、保护地球环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能源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无疑将成为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作为动力来源，利用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非常规的车用燃料”是指除汽油、

柴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乙醇、汽油、甲醇、二甲醚之外的燃料。

新能源汽车包括五大类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纯电动汽车（包括太阳能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其他新能源（如超级电容器、飞轮等高效储能器）汽车等。

以中国为例，看一下新能源车产业将怎样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动力，镍氢电池不被看好，即使是短期也是如此。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化进程比日本、美国等先发国家较迟，但中国不必重复它们“从镍氢到锂电”的技术发展路径。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已较为成熟，等到我国新能源汽车需求大量释放，动力电池领域或许早已是锂电的天下，镍氢电池有可能面临未上规模即遭淘汰的风险。此外，我们对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相关产业链作了较为详细的需求预测，我们发现国内正极材料领域已潜藏一定的产能过剩风险，未来行业竞争将异常激烈。

混合动力汽车是当前技术条件下新能源汽车的最优选择，在未来 5 ~ 10 年内都将是新能源汽车的主流。而新型混合动力作为最接近纯电动汽车的一类混合动力车型，已成为各大企业发展新能源汽车的重中之重。

我国已密集出台有关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预计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出台为时不远且补贴额度将参考公共部门购买标准。依此测算，在我国购买新能源汽车已具有一定性价比优势，这将有力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化。

预测 2015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可达 700 万辆，锂离子动力电池需求量将达 346 亿安时，相关产业链发展空间确实非常广阔。

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试点城市有上海、深圳、重庆、武汉、北京、长春等城市。

2009 年 12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会议决定，继续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由原来的 13 个扩大到 20 个，选择 5 个城市对私人购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给予补贴试点。

至 2012 年底，深圳计划累计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 2.47 万辆，在 13 个试点城市中数量最多。这 2.4 万辆新能源汽车包括 4000 辆公交车，家用车 15000 辆，出租车和公务车各 2500 辆。同时，深圳把家用车纳入新能源汽车的推广范围，2010 年初深圳开始运营纯电动出租车，启用社会示范充电站等创新举措不断，以此示范新能源汽车的效应和产业价值巨大。

深圳对新能源汽车的财政补贴将达 21 亿元，足见深圳政府对其扶持力度之大。据测算，至 2012 年深圳市新能源汽车销售收入将近 100 亿元，可带动相关产业实现年产值 800 亿元以上。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带动效应、社会效应和环保效应已经显现出来了，各地和各

个相关企业应该把握好这次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

此次针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做出的决定是国家促进消费的重要举措。在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将对整个汽车产业初步起到拉动转型的作用，但推广新能源汽车还面临市场的培育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建立完善等一系列问题。

我国的传统汽油机汽车技术与世界汽车技术存在不小差距，但是新能源汽车技术与基本世界同步尝试和发展。这对我国汽车产业与世界汽车同步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新能源汽车推广试点扩大到私人消费领域意义重大，对于整个汽车产业的带动作用将逐步凸显。新能源汽车的推广符合全球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要求。

新能源汽车推广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的培育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建立完善。对发展和完善这些配套设施进行补贴，势必点燃人们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热情。

推广新能源汽车将对国家大力发展汽车产业形成良性的促进作用。试点范围的扩大以及试点扩大至私人汽车消费领域是国家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的新举措，必将在全社会逐步树立环保、低碳、新能源的新理念。

如果新能源汽车得到快速发展，以 2020 年中国汽车保有量为 1.4 亿计算，这些汽车可以节约石油 3229 万吨，替代石油 3110 万吨，节约和替代石油共 6339 万吨，相当于将汽车用油需求削减 22.7%。2020 年以前节约和替代石油主要依靠发展先进柴油车、混合动力汽车等实现。到 2030 年，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将节约石油 7306 万吨、替代石油 9100 万吨，节约和替代石油共 16406 万吨，相当于将汽车石油需求削减 41%。届时，生物燃料、燃料电池在汽车石油替代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预计到 2025 年后，中国普通汽油车占乘用车的保有量将仅为 50% 左右，而先进柴油车、燃气汽车、生物燃料汽车等新能源汽车将迅猛发展。

现今，环境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也是一个切切实实应该脚踏实地去做的行动。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由节能减排带来的低碳经济必然成为世界未来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

而低碳经济正处于一个缓慢的起步期，从哪里开始，怎样开始，还处在理论的试探阶段。在这个阶段，新能源车无疑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群雄逐鹿：谁有权掌握碳交易定价权

《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催生了国际碳交易市场，而随着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碳排放额度的“金融属性”也日益突显，并逐步演化成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资产，即“碳信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球，世界各国陷入经济困境。为了走出这场风暴，美国以发展新能源作为投资重点，扛起了“低碳经济”大旗，欧洲及世界各国也纷纷将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场“低碳革命”正在悄然发生，逐步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低碳博弈在各国之间展开。哥本哈根大会上“硝烟弥漫”，全球三大气候阵营——欧盟、“伞形集团”、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唇枪舌剑，各个利益阵营表面上是就温室气体排放权讨价还价，实际上是要在未来的低碳经济中掌握控制权，在碳交易市场上掌握定价权。

作为商品，碳排放权具有特殊性。首先它是一种无形的虚拟品，只有经过核证之后才能成为商品；其次它不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因此其成本价格不是一般商品所具有的生产成本，而主要是巨额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再次它不单纯是某种商品，具有单一的经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国际政治博弈的产物。

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就将美国参与未来主导权争夺战的迫切心情表露无遗。他说：“美国有机会领导世界进行新的工业革命。但是我们在清洁能源的竞赛中落后了……中国一个月在清洁能源的投入就达到90亿美元，中国在高科技制造领域已赶超美国和欧洲。美国没理由把在高科技制造业领域的地位拱手让人。”

世界能源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何世红认为，除了争夺在产业层面上的主导权，在新的全球碳金融框架下争取主动权更是刻不容缓。可以说，碳金融主导权将是低碳博弈的最终目标。

那么，什么是碳金融呢？

碳金融是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或称碳融资和碳物质的买卖。碳金融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资融资、碳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

碳金融的经营理念是在经营活动中注重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利益，始终把“绿色利润”作为自己的目标区，把对环境的保护、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其活动成效的标准之一，强调金融部门应通过自身行动引导社会经济主体注重节约自然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

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以及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允许有减排责任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指标，以完成自己的责任。

由于发达国家减排一吨碳的费用比发展中国家要高出许多，发达国家乐于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温室气体排放份额。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后者可持续发展的减排

项目,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再抵消发达国家自身的部分排放。这推动了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形成。

目前,发达国家碳金融市场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壮大。

2009年6月19日,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预测,全球二氧化碳交易市场到2020年将达3.5万亿美元。据统计,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1180亿美元,这一数字为2007年市场规模630亿美元的近两倍(也有统计报告2008年全球碳排放市场规模达1263亿美元,较2005年增加了近11倍)。

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基于碳交易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远期产品、期货产品、期权产品等不断涌现。目前,全球已建立20多个碳交易平台,遍布欧洲、北美、南美和亚洲市场。发达国家都在厉兵秣马,围绕碳减排权,试图构建碳交易货币。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中国,碳交易及其衍生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中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

中国在这个“碳时代”中无疑将会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国家。

因此,中国应着重发展碳交易市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涵盖现货、远期和期货的碳金融体系,推出各类碳排放额度的碳金融衍生产品。最终通过碳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来影响国际碳交易市场价格的形成,掌握国际碳交易市场定价的主动权,引导全球碳减排活动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碳资本与碳金融发展落后,不仅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而且没有碳证券、碳期货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这使中国面临着全球碳金融及其定价权缺失带来的严峻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但是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只能通过CDM为欧美国家提供廉价的碳排放额度。”作为碳排放额度的最大提供者,却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毫无话语权。因此,中国在新的全球碳金融框架下争取主动权刻不容缓。

低碳真相：碳交易的玄机

随着气候变化危机的出现,全球都积极地采取措施应对,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寻找低碳能源,伴随之产生的就是以碳交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和大家曾经听说过的“空气交易”等的虚拟

物品交易不同的是，碳交易是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的，是切实可行的，而且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种产业。

简单来说，碳交易就是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作为商品来进行交易。当二氧化碳成为商品，被赋予了价值，便有了投资交易的可能。

碳交易是作为一种市场化的手段，让减排二氧化碳变得有利可图，这样企业参与碳减排也就有了积极性。事实证明，这种手段成本最低而且效率最高，最易被企业所接受。据统计，2008年，全球碳交易高达1200亿美元。

国际上碳交易如火如荼，而碳交易如今之所以被如此看重，是源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碳减排协议的制订，这些协议都对发达国家的碳减排量进行了强制要求。

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说：“有这么一种刚性约束目标在，碳就从一种无形的资产变成了可以交易的有形产品了，尽管这个产品是一张纸、一个数字，但如果你没有这样一张纸、没有这样一个数字，很多生产就不可以进行，很多经营活动就不能开展，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刚性的总量约束，使得它具有了某种价值。”

这给初涉足这一领域的企业十足的信心。下面就从微观的角度，以我国新成立的环境交易所为例，来讲一下，揭开碳交易秘密的面纱。

仅2007一年，我国国内就陆续成立了5家从事碳交易的交易所。

2008年8月5日，国家级环境权益交易机构北京环境交易所正式挂牌，这是一个专门为碳排放指标设立的交易平台，熊焰成为这个交易所第一任董事长。上任之后，他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有识之士来交易所做碳交易，“碳交易较之收税的好处是，能调动企业深层次的技术进步，反正是要减，技术投入进步了，降低了排放，同时还有收入”。

那么，一个真实的碳交易是怎样进行的呢？

一个经典的碳交易的案例：钢铁企业规模都一般大，每年要降500吨（二氧化碳）排放，A钢厂通过努力降了700吨，而B钢厂经过努力只降了300吨，这个时候A钢厂多出来的200吨指标是可以交易的，B钢厂必须再买200吨的指标，或者是认罚，这个交易就开始了。

随着碳交易机构的数目的增加，那么，实际中碳交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2010年4月的一个正常交易日，北京环境交易的交易大厅的人并不多，正在操作的也都不是碳交易。如今北京环境交易所开张已经一年半时间，但是交易记录却是少的可怜。2009年到现在，也就是成交三五单，刚刚处于概念和预热阶段。而就连这仅有的几单交易，更多的也只是象征意义。

这让我们不免疑惑，国际市场上热捧的碳交易为什么在国内受到冷落？

目前来看，中国的碳市场主要产品线就是今天的 CDM 在走下坡路。原因有 3 点：

(1) 新的减排指标还不明朗。2012 年，《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任务即将到期，新的减排指标还不明朗。失去了对碳减排的刚性约束，清洁发展机制这种碳交易自然无从谈起。

(2) 碳交易市场不成熟。清洁发展机制在走下坡路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在中国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CDM 在我们国家管理中被定义为双边贸易项目，就是买卖双方都定下来了，国家才给审核登记，因此市场化空间不是很大。”

(3) 政策审查繁复。中国的每一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除了要获得政府审批外，还要接受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审查。在这一审查环节上，近年来对于中国的项目有着逐年从紧的趋势。2009 年 12 月，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10 个已经具备资格的中国风电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被拒绝通过。

由此可见，要想发展碳交易，文章要作在清洁发展机制之外。当前，一种有别于清洁发展机制的，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产品——自愿减排，出现在了国内。在国际上通行的叫法是 VER。

自愿减排是一种基于慈善公益的投资行为，也就是一些机构和个人有减排的意愿，投资减排项目，既做了好事也能获得投资收益。“你今年花 1000 元钱在长城脚下种了 10 亩林地，你的钱帮助这 10 亩林地种起来，长起来成活了，你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公益作用，同时还能获得这块林地吸附固化的二氧化碳，比如说是 20 吨二氧化碳。这个权益是你的，在若干年后你可以把它（二氧化碳指标）卖掉，也许以后价格涨起来了，这对你还是一个有回报的投资行为。”

自愿减排这种碳交易方式在国外已经非常成熟。“VER 做得比较好的，应该是在美国，因为美国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因此美国企业政府开始启动了 VER 交易，美国现在碳交易上的主要产品就是这种 VER 产品，对中国也是很好的借鉴。”

在环境交易所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忙个不停。从产品开发、标准制定和销售渠道都在为自愿减排产品的推出做着一系列的准备。“我们把中国 VER 第一轮的产品，定义在森林碳汇，农村沼气。”

中信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我也是刚刚从沙龙上了解到碳交易市场上还有自愿减排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兴趣的。这样既能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做一定的贡献，又能获得一定的收益。我们觉得这个产品是不错的，想继续跟进。”

潘家华说：“碳的总量是约束的，只会不断减少，不会不断增加，发达国家的能耗很高，已经出现很多碳资产的亏空，发展中国家又急需大量的碳资产来保障发展的需要，所以作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间的一个金融意义上的产品来讲，碳交易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一种趋势。”

从门厅冷落的交易所，我们看到了欧美国家控制碳金融市场的战略，除此之外，近年来在低碳发展的主题下，国际上围绕新能源展开的竞争也是如火如荼。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成为国内很多城市热捧的朝阳产业，被当成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的法宝。

碳交易：清洁发展机制双赢机制的出现

政治家们人为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碳资产”的推动者，是《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 100 个成员国及《京都议定书》签署国。

这种逐渐稀缺的资产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出现了流动的可能。

由于发达国家有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因此产生了“碳资产”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不同。另一方面，减排的实质是能源问题，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极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高价差。发达国家需求很大，发展中国家供应能力也很大，国际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

《京都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碳交易基本原理是，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在 6 种被要求排减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为最大宗，所以这种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量为计算单位，所以通称为“碳交易”。其交易市场称为“碳市场”。

碳交易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它更紧密地连接了

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

“排放量可以买卖，应该说是世界范围内提升环境质量的一大创举。”因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 100 美元 / 吨碳以上，而在中国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碳交易活动，减排成本可降至 20 美元 / 吨碳。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积极进入发展中国家寻找合作项目，为碳交易开辟了“绿色通道”。

那么，如何在碳市场上进行交易呢？

根据 2001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达成的《马拉喀什协定》，一个典型的 CDM 项目从开始准备到实施直到最终产生有效减排量，需要经历项目识别、项目设计、参与国批准、项目审定、项目注册、项目实施、监测预报、减排量的核查与核证、经核实的减排额度签发等主要步骤。

一般来说，碳市场交易包括前期开发、碳资产开发、碳资产项目管理 3 个流程。

在前期开发阶段，要进行项目分析，即确定企业有哪些项目符合 CDM 的概念；要进一步收集信息，进行减排量的估算以及测算方法的确定；要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市场未来趋势进行预测并确定开发成本以及开发风险。

在碳资产开发阶段，要进行项目文件设计、卖方和买方政府审批、购碳协议签署、第三方认证、联合国注册等程序。

在碳资产项目管理阶段要重点做好 3 个方面的工作：要进行日常管理，主要包括流程的监控以及企业运营信息的获取；要根据实际产生的减排量，按照企业的要求分季度或年度出具项目检测报告；对减排量进行第三方认证，在联合国登记，最后进行碳资产交割。

在这些过程中，企业需要交付的费用包括第三方对项目的审核（1.8 万欧元），注册费（0.2 美元 / 年核实减排吨数），监测核查和核证费用（1 万美元左右），联合国 CDM 理事会征收的适应性费用（核实减排总额的 2%）、行政管理费（0.2 美元 / 核实减排吨数），中国政府征收的环境资源税（核实减排总额的 2%）等。

到 2009 年 3 月，世界上的碳交易所共有 4 个：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英国的英国排放权交易制、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国家信托。

由于美国及澳大利亚均非《京都议定书》成员国，所以只有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及英国排放权交易制是国际性的交易所，美澳的两个交易所只有象征性意义。

随着《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

规定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买家在“限量与贸易”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买主向可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

清洁发展机制双赢机制的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碳交易市场。

截至2007年6月11日，全球共有696个CDM项目成功获得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理事会注册，预期可产生的年均减排量可达到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印度、巴西、中国和墨西哥是全球CDM项目注册数目最多的4个国家，占据了全球CDM项目总数的75%。从项目的年均减排量来看，中国每年可以产生647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总额的44%。

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国具体的碳交易发展状况。

在发达国家，日本和欧美等国已通过碳交易取得了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如英国通过“以激励机制促进低碳发展”的气候政策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德国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做到了经济与环境双赢；美国堪萨斯州农民通过农田碳交易，获得了新的农业收入来源；日本则把碳排放权交易看作是“21世纪第一个巨大商机”，通过在世界各地大量购买和销售碳排放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入。

2009年，中国第一个碳中和企业诞生。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全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为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中国企业。

毋庸置疑，碳交易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一些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能给一些落后的国家以资助，但是谁能说这不属于一种资源掠夺。且这会限制落后国家一些工厂的发展，因为它们的排放量会被相应地挤去一部分，而且这一程度上将促进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使它们对如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研究有所忽视。

节能减排：不仅仅是责任，更是利益

在低碳节能的大趋势下，一些新兴的行业和商业模式以及革命性的新能源方式正应运而生，例如，能源服务、分布式供能、电动汽车、智能电网等新兴行业、新能源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风生水起。

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下一代经济体系的核心和基础，而由新技术推动的清洁能源和能效行业，将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全球性产业。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希望，世界各国将应对气候变化当成一个必须牢牢抓住的机遇而不是拖累，从而进行一场“哥白尼式的低碳革命”。他说：“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明确无疑的挑战，同时也将在下一个世纪里成为商业领域最强有力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只有在全球节能减排的大趋势下抢得先机，才能在向低碳经济转型时获得竞争优势。

目前，节能减排已被主要经济体当成了拉动经济走向复苏的关键。低碳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增势可观。

《斯特恩报告》预测，到 2050 年，低碳商品和服务行业的营业额将达 5000 亿美元。汇丰银行估计，2008 年该行业上市企业的营业额达到 5340 亿美元，已经超过了航天和防务工业的收入总和，增幅达到 75%，到 2020 年将突破 2 万亿美元。汇丰气候变化行业指数成分股公司的数量，已从 2004 年的 154 家增至目前的 368 家。最乐观的估计来自英国政府，它在《通往哥本哈根之路》的气候变化公告中表示，2008 年全世界低碳技术和绿色产业的产值已经达到 3 万亿英镑，英国在低碳行业的就业人口已有 88 万。

欧盟已经通过了以能源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气候、能源和经济刺激的一揽子计划，希望通过低碳转型带动经济复苏。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绿色振兴”计划，到 2020 年，美国将会把新能源比重提高到 30%，每年投资 150 亿美元到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源等领域，创造 500 万个绿色就业岗位。

在新兴市场国家，巴西总统卢拉上台后，大力推动扶持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把巴西变成了世界知名的绿色经济体。

印度也启动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行动计划，通过加码对风能、太阳能的投资，以求在传统的 IT 外包之外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中国，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也已经成为越来越鲜明的增长主题。

“十一五”计划将单位 GDP 的能耗降低 20%，而建筑节能的目标为 12 亿吨标准煤，占全社会节能目标的 21%。到 2015 年，单位 GDP 用水量将比 2010 年减少 30%，主要污染排放绝对量减少 10% 以上，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20%，森林覆盖率从 20% 提高到 22%。2005 年，中国环保产业总产值已经达到 2000 多亿元，且以年均 175% 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到 2008 年底，在 4 万亿保增长的一揽子经

济刺激计划中，将近 1/4 的资金被用于加强可再生能源项目和节能减排行动，而总额高达 3 万亿的新能源发展规划也已经起草完毕。

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 GDP 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 3 倍，德国的 5 倍，日本的近 6 倍，这个差距本身就是中国低碳经济巨大的发展空间。

当新能源革命来临之际，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加入这场“绿色长跑”的中国选手，不但有尚德、天威英利等新能源公司，还有远大空调、玖龙纸业、比亚迪汽车和万科地产等传统行业的企业。

这些企业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没有把节能减排当成自己的成本负担，反而把它当成了确保自己未来长期成功的竞争优势和重大机遇。

中国地产行业具有最佳公司治理结构和增长潜力的万科集团，则把节能减排当成了自己的下一根标杆，这其实将决定其住宅工业化战略的成败。今天，万科在工业化住宅的施工过程中可以减少用水 60%，减少建筑垃圾 80%，进一步缩短建造周期并提高整体运作效率，房屋的使用寿命也将大大增加。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普遍低迷之际，万科的销售利润仍能逆市上涨，节能减排带来的成本削减和质量提升，应该是重要的支撑因素。

低碳节能的大趋势对中国传统高能耗产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如何大幅降低能耗、节约能源，已成为电力、冶金、水泥、化工等传统高能耗企业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同时，这一大趋势也催生了新兴的行业和商业模式以及革命性的新能源方式，为中国企业跻身世界领先企业行列创造了新的机遇。

尚德太阳能一开始就成了国内光伏产业的领航者。2007 年，尚德总产能超过 500 兆瓦，产量超过 300 兆瓦，销售收入超过 100 亿元，名列世界光伏行业第二。按照尚德的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到 2012 年尚德公司成立 10 周年之际，将形成硅材料、硅基电池、硅薄膜电池、光伏组件和发电系统及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形成产能 5000 兆瓦，销售收入突破 1000 亿元，两者均将在 5 年内增长 10 倍。

中国的能源服务行业刚刚起步，行业的发展还存在一些瓶颈。例如：缺乏对节能效果进行客观公正测量评估的标准和行业认证；能源服务公司往往成立时间不长，成功案例和技能的积累不足；用户对能源服务的概念、模式、节能效果和相应的商业风险等认识不足，对能源管理外包持观望态度；能源服务融资难度大，同时，以工业客户为主的客户群回款能力较弱。

而能源服务市场启动最大的瓶颈还在于客户、技术和资本三者之间尚未形成良性结合。一般情况下，客户不愿意埋单，技术提供商在缺乏客户埋单保障的情况下不愿投入，资本在没有中间商担保的情况下也不愿介入。

如何突破这些瓶颈，特别是通过中间体（即能源服务商）使资本与技术实现很好的对接，为客户提供最有效的能效提升，资本如何从中获得必要回报，是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每一个市场都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低碳技术对亚洲国家超越发达国家实现所谓“弯道超越”——以后发挥优势来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是非常有利的，创造了非常好的机会。例如汽车，中国要想按照传统来超越西方发达国家要很长时间，但是在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领域，只要我们重视，就可以实现快速超越。

美国的“低标准”：减排目标遭非议

美国是全球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国家，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美国一直没有明确自己的减排目标。

2009年11月25日，在国际社会的施压下，也就是在中国公布自己的减排目标的当天，白宫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出席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在大会上宣布美国今后1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美国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2025年减少30%，2030年减少42%，2050年减少83%。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美国的减排目标呢？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国内是如何评论的。

白宫发言人对美国的减排目标首先做了自我评价：“这个临时目标符合国会两院（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法律程序，将对美国长期以来忽略的气候变暖问题做出贡献。”

美国前副总统、气候变暖的宣传者、诺贝尔奖得主戈尔评价说，奥巴马出席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宣布美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此举是美国在气候危机方面改变政策的关键举动。戈尔说：“那些担心美国放弃全球责任的人，应该从这些举动中看到希望，美国有信心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可操作协议，并为2010年达成全面协议铺平道路。”

《纽约时报》评论称，奥巴马在国际大会上做出减排承诺实际上是在下赌注：他在赌国会能在2010年通过与他承诺的减排目标相似的气候法案。国际社会有望在2010年达成一个国际性气候减排协议。奥巴马此前曾想放弃参加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但在其他国家和环保机构的巨大压力下，他不得不前往参加，并发表美国人认真对待气候变化协议的声明。

再来看一下国际社会是怎样看待美国的减排目标。

不管怎么说，比起前一届政府，奥巴马政府应对气候变暖问题的态度是积极的，也因此而获得了国际上的一些赞誉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德波尔对奥巴马参加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决定表示欢迎，并表示奥巴马的出席将对达成好的结果至关重要。在这之前，美国是唯一没有明确减排目标的工业大国，其在减排方面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世界自然基金会也对奥巴马参加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表示称赞，并呼吁美国将诺言付诸行动。该机构美国气候项目负责人说：“在这个重要时刻，奥巴马宣布美国立法支持减排非常关键。如果他能在大会期间一直待在现场，对于确保减排承诺非常必要。我们希望在协商的最后阶段，奥巴马和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能够回到哥本哈根。”

牛津赈灾会称，奥巴马亲自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宣布减排目标，对各国在哥本哈根达成协议非常重要。奥巴马总统已经发出信号，他已经准备好将努力达成一个气候协议。美联社评论称，奥巴马亲自参加峰会，有助于重塑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大国形象，改变布什政府8年以来的气候冷淡形象。

国际社会的赞誉实际上是一种“低标准”的肯定，很显然，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减排目标还相差很远。

专家推算，美国的减排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这与欧盟及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要求相距甚远。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2020年在1990年的水平上至少减排40%。尽管美国的减排承诺还包括2025年减排30%、2030年减排42%和2050年减排83%等阶段性目标，但这些承诺都遭到了广泛的质疑。

事实上，经过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的总量减排指标简直令人愤怒，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19吨，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0.7吨，也就是说，美国的减排的关键在于人均对能源的“铺张浪费式”使用。

奥巴马政府所制定的“相比较1990年减少4%”目标几乎是一个毫无诚意的目标，只需要通过鼓励民众储蓄、轻微加税节能以及跨国购买（排放额度）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不仅远低于欧洲和日本，从实现的难度看，也远远低于中国。

国会众议院去年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又称气候法案，内容包括促进清洁能源发展和经济转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同一主题的参院版本议案如果

不能在参院通过，气候法案就无法成为法律。参院版本能源议案撤掉减排条款，引起国际社会对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承诺的担忧，也令一些希望美国起表率作用的发展中国家失望。

欧洲联盟委员会气候变化专员阿图尔·伦格·梅茨格说，美国参院法案已经阻碍欧盟成员间关于是否提供减排目标的谈判，“这令欧洲的谈判和辩论不再容易”。欧盟去年承诺用 10 年时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至低于 1990 年排放量 20% 的水平。欧盟还声明，如果美国和其他“排放大户”能够采纳类似目标，欧盟可以把减排指标进一步提升至 30%。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发展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评论说，由于此前美国曾单方面撕毁《京都议定书》，按当前的排放规模计算，其 2050 年减排 83% 的目标极具操作难度。此外，即使美国做出新的承诺，也存在着回国后无法得到美国国会批准的可能。

鉴于美国前任政府单方面撕毁《京都议定书》的经历，同为发达经济体的欧盟对美国提出进一步减排的要求最为强烈。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与其他多数富国的减排目标和环保组织的期望相比，美国的目标不那么雄心勃勃。瑞典环境大臣遗憾地说，美国到 2020 年的减排目标不够高，之前的评估显示美国能做的更多。

欧盟缺乏诚意：减排责任不只是个数字游戏

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欧盟把自己减排的责任委婉地推给了其他国家。这不禁让大家感觉到减排目标也许就只是一场“数字游戏”。

欧盟自视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导者，在节能减排主张及实行方面一直积极抢占“制高点”，强调美国应承担减排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通过与欧盟有密切关系。但金融危机后，欧盟态度转趋消极，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尤其缺乏诚意。

2009 年 12 月 7 日，当时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的环境大臣卡尔格伦重申了欧盟的立场。他表示，欧盟是否做出减排 30% 的承诺还要看其他国家的行动，要到大会最后阶段才能决定。卡尔格伦同时认为，按照目前各方提出的减排目标，欧盟将不会把自己到 2020 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提高至 30%。

8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闭门磋商。10 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为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协调立场，敲定欧盟的最终承诺目标。

欧盟内部为是否做出更大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出现了分歧。

积极的声音表示，欧盟要为其他国家做出榜样，应该承诺到 2020 年，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排 30%。英国表示，仅仅说可以做或可能做并不够，希望欧盟各国大胆一点。英国声称，自己将推动欧盟做出至 2020 年减排 30% 的承诺。做出同样表态的还有欧盟委员会负责环境事务的委员斯塔夫罗斯·季马斯。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季马斯曾敦促欧盟为其他国家做出榜样，承诺到 2020 年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排 30%。

欧盟内部也有消极的国家。据悉，意大利、奥地利和东欧国家不愿做出减排 30% 的承诺。

在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应将减排幅度提高至 40%。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全球气候变暖不会至危险水平。显然，欧盟的承诺距此目标尚有差距。欧盟的谈判态度和减排诚意也因此遭到置疑。

欧盟一方面自己缺乏诚意，另一方面又敦促美国和中国等国家提高减排目标。

由于美国游离在《京都议定书》之外，欧盟特别强调美国应承担减排责任。2009 年 12 月 7 日，也就是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第一天，欧盟对美国提出的最新减排目标表示质疑。欧盟认为美国的减排目标太软弱，不足以预防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呼吁美国宣布更加积极的减排计划。2009 年 12 月 18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达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现场。但是美国方面坚持称，奥巴马总统不久前公布的减排目标已经非常可观，与科学家的期望相符合。

除了要求美国提高减排目标，欧盟还要求中国增大减排幅度，并要求中国接受强制减排和国际监督。

伞形国家：企图把自己的减排目标与其他国家挂钩

在全球气候谈判立场上，一些发达国家不同意减排双轨制，要求主要排放国不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一体参与减排，而且对减排一直消极抵抗。把这些国家在世界地图上连起来，呈一把雨伞的形状，所以被称为“伞形国家”。

这些“伞形国家”因其保守的减排态度受到许多环保组织的批评，被戏称为“撑伞逃走的国家”。

以美国为首组成的“伞形国家”曾经力量非常的强大，但随着日本、加拿大和俄罗斯先后批准《京都议定书》，而美国却孤立无援，形式上“伞形国家”瓦解了，力量大大削弱。

在气候大会上，“伞形国家”都承诺在减排方面的目标，但都无一例外地，以

与其他国家减排挂钩为基础。

对于发展中国家应承担的减排责任，伞形集团国家均要求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新分组，以改变京都气候机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气候责任“不公平的划分”，尤其使经济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气候变化义务。

美国提出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两类；日本建议将发展中国家分为需要做出减排承诺的国家、排放量不大但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等三类，分别对其规定不同的应对气候变化责任；澳大利亚根据 2007 年的人均 GDP 以及 2005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将非附件国家（发展中国家）分为“乌克兰小组”、“葡萄牙小组”和“土耳其小组”，相应承担《公约》下附件一和附件二国家的责任；俄罗斯认为当前的国家分组是过时的，主张运用诸如 GDP 等能够反映各国经济和社会差异的参数作为国家重新分组的标准。

对于发展中国家适当减排行为的核查，伞形集团国家均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为应做到“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但是对于何种减排行为应做到“三可”，各国有一定分歧。

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主张其涵盖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减排行为；加拿大建议获得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减排行为应满足“三可”要求；俄罗斯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尚有待进一步明确。

对于发达国家自身的减排目标，美国直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前夕才公布。在减排问题上，美国现任政府比前任政府态度积极了一些。不过，美国现任政府同样拒绝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力主各国自主减排，并坚持要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强制减排。

日本政府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的减排目标虽然比前任政府积极一些，但也是建立在与其他国家减排挂钩的基础上的。显然，日本的减排目标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质疑。

澳大利亚承诺到 2020 年在 2000 年基础上减排 5% ~ 25%，而这里提到的 25% 也是与其他国家挂钩的。事实上，澳大利亚的这个目标已被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两次否决。2009 年 12 月 8 日，在大会开幕式上，澳大利亚代表伞形集团向大会发难，想抛弃《京都议定书》，让所有国家都接受强制减排。

由此可见，各国的减排承诺其实都并没有诚意。不论是在时间上的拖延，还是责任的推诿，都说明了以美国为首的“伞形国家”减排诚意不够。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产生了两份官方文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长期合作行动计划的主席案文和《京都议定书》修正案的主席案文。出于不同的目的，欧盟和“伞形国家”纷纷提出，《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后，要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问题绑在一起谈。

2009年12月17日，中国、美国等各国领导人纷纷抵达哥本哈根，试图在谈判的最后关头打破僵局，弥合分歧，达成协议。但事情远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美国领导日本、丹麦、德国等20多个发达工业化国家（主要是伞形国家）在大会主办国丹麦迎接各国首脑举行的宴会之后，举行了一个会议并私下准备了一份文件草案。日本认为召开这个会议并起草“伞形国家文件”的原因是试图打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歧依旧的僵局。

中国和印度都对发达国家私底下进行的这次会议持保留态度，因为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认为，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必须通过正常谈判、讨论、审核而产生，“伞形国家”私下举行会议并提出文案的做法不是一种能确保取得成功结果的手段。基础四国强调，起草并通过大会成果文件的过程，必须是一个透明和包容的进程，参与协议的文本起草不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工作，也不是四国所欢迎的行为。如果在最后一刻起草一份文本，并要求通过，是不可能的。

大会的最后，在中美的运作下，最终达成了一个共12条的《哥本哈根协议》，这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协议认同对全球升温控制在2℃的共识，但没有明确发达国家2020年大幅减排承诺，没有形成对2050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共识，只是要求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应向国际社会通报。

哥本哈根大会后，“伞形国家”和欧盟都对美国表示不满，它们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剧。

（1）美国与欧盟。由于《哥本哈根协议》是中美领导人在谈判最后时刻，促使而达成的，所以，欧盟担心这会变成新的中美共治，并因此对《协议》和美国的做法非常不满。其次，美国政府“绿色新政”的实施和重新谋取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话语权的战略，加之美国特有的单边主义气候变化外交行动，导致欧盟和美国立场分化。此外，欧盟和伞形国家在减排这个核心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明显，发达国家内部已经形成裂痕。

（2）美国与其他“伞形国家”。美国以外的“伞形国家”对《哥本哈根协议》非常不满。加拿大宣称，这无异是一场“大屠杀”，必须撤回此协议。一位环保组织人士分析认为，伞形国家如此表态并不是真正对《哥本哈根协议》本身不满，而是认为自己被孤立在做决定权的圈子之外，对这种行为很不满。

小岛国联盟：激进减排方案导致发展中国家阵营分化

对于减排，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受危害程度不同，对空气污染的责任不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其实，早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发展中国家组织 77 国集团内部就出现了不一致的声音。77 国集团发言人告诉与会代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抛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很不高兴，在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保持态度一致。同时，塞拉利昂、塞内加尔等 77 国集团成员国却在内部会谈中表示，新兴经济体也应该做出一些承诺，并且审查自己的行为。

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发出不一致呼声最高的是“最脆弱”的国家——由 43 个小岛国组成的“小岛国联盟”。这些国家的减排主张非常激进，因为这些国家面临的危机最严重，最容易受到全球变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的危害。事实上，位于南太平洋的图瓦卢，已经有不少百姓背井离乡了。所以，小岛国的主张最激进，态度最坚决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联盟可以称为“减排急先锋”。

“小岛国联盟”是一个国际组织，成立于 1990 年。宗旨为加强在全球气候变化下，有着相似的发展挑战和环境关注的脆弱小岛屿与低洼沿海国家在联合国体制内的话语权。目前，它有 43 个成员国和观察员，包括新加坡及来自非洲、加勒比海、印度洋、地中海、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的小岛国。

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小岛国联盟”成员图瓦卢提出，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讨论法律约束力问题，并希望达成一个比《京都议定书》更为严厉的新协议。这一提议得到了库克群岛、斐济等“小岛国联盟”成员国以及塞拉利昂、塞内加尔等贫困非洲国家的支持。

“小岛国联盟”主席威廉姆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工业化国家中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必须为过去及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负主要责任。

要满足图瓦卢等小岛国的诉求，除了发达国家要更大幅度地减排，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也要加大减排幅度。这样，“小岛国联盟”不仅向发达国家开炮，还攻击了中国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

图瓦卢的提议遭到了中国、印度、南非等国家的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对此保持沉默。于是，图瓦卢代表要求暂时休会，将谈判往后延迟。

复会以后，图瓦卢代表眼见其提议可能无果而终，遂退出会场表示抗议。图瓦卢代表还表示，他们来到哥本哈根就是希望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因为这

关系到他们祖国的存亡。

2009年12月11日,“小岛国联盟”提出了一项气候协定草案,并称其为“世界抗击气候变化的最低要求”。它们以此来回应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忧虑。“小岛国联盟”称该提案名为“哥本哈根议定书”,它指出有必要将产业革命以来地球温度的上升幅度控制在 1.5°C 以内,要求“各缔约国同意世界的排放量到2015年开始减少,到2050年比1990年减少85%”。

虽然,此提案并未提出发展中国家减排的具体目标,但是提案要求发展中国家制定减排战略。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该提案提议用发达国家的援助设立“气候变化多国基金”。除基金外,该提案还要求发达国家提供减排技术等。

这样,“减排急先锋”小岛国联盟激进减排方案就导致了发展中国家阵营出现分化。图瓦卢的提议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此外,“小岛国联盟”还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宣布了一份关于捍卫地球气候系统以及确保小岛国联盟43个成员未来生存的建议。

格林纳达大使表示:“达成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以保证实现两个目标,《京都议定书》的延续;达成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来强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罗门群岛大使说:“我们的建议要推动修正案以确保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进行强化,并且希望能推动成立一份新的议定书以使美国也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佛得角共和国大使说:“我们相信,我们的建议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将现有的很多国家提交的建议汇总成一份明确的法律形式,既强化《京都议定书》的延续又确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对抗气候变化及其恶劣影响中的首要地位。”马尔代夫部长认为:“这份建议不仅会帮助世界各国适应气候变化,也会帮助我们实现成为碳中立国的目标。”

“小岛国联盟”副主席、所罗门群岛代表柯林·贝克态度坚决地表示,不会接受较为温和的减排协议。他说,对于任何高出 1.5°C 的规定,我们都不得不考虑像拆迁、赔偿、移民这样的问题了。对一些国家来说,我们讨论的是完全沉没。我们谈论气候变化已经20年了,但不幸的是当它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时候,带来的是危机。小岛国联盟不会接受一份没有说服力的协议。

中国代表团也曾多次表态,支持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谈判应当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减排双轨制下进行,不应抛弃《京都议定书》。

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就图瓦卢的提议发表评论说,中国与小岛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也都是全球变暖的受害者,这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坚实基础,过去是这

样，今后也仍然会这样。

中国对最脆弱国家表示同情和理解，认为作为最脆弱的国家群体之一，小岛国联盟对这个问题表示强烈的关切，是正当和合理的。但是，尽管发达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这样的法律文件中就率先减排、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等做出了一系列承诺，但行动与承诺之间差距非常之大。中国代表表示，包括小岛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协调立场，一致向发达国家要求兑现承诺。

事实上，一边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快发展，一边是发达国家想逃避历史责任，这就注定了“小岛国联盟”的激进主张不会得到广泛支持。

发展中国家：决不接受强制减排

发达国家企图逃避历史和现实责任，并企图让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以牺牲经济发展权为代价和它们一道被强制减排，甚至要让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对此，发展中国家一致表示，反对一切强制减排。

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面临气候变化最直接的不利影响，不能采取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标准。另外，发达国家迄今做出的减排的承诺，与它们应当承担的义务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待还相距很远。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和中国有着非常明确的态度。

印度反对以减缓经济增长为代价执行具有约束力的碳排放。印度环境部长表示，印度不会接受规定排放峰值年（峰值年是指设定一个国家必须开始减排的日期）的协议。虽然印度计划在 2020 年前将碳强度削减 20% ~ 25%，但不会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他还说，这两个问题是不可谈判的，不存在妥协，这些问题绝对属于“红线”。减排目标是自愿和单方面的，不依赖于大会的结果。

中国认为让发展中国家也承担强制减排责任毫无道理。2009 年 12 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在哥本哈根贝拉会议中心介绍了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主张及举措。中国自主确立的行动和目标极具挑战性，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是不以任何其他国家的行动为前提的，也不容谈判。对自主采取的国内减排行动，中国已经建立了系统的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并且愿意根据相关的国际标准继续完善，愿意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形式适时对外公布我国减排行动及其效果，但不接受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资源采取的自主减缓行动受国际核查的提议。

下面以中国为例，具体的说明一下我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

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接受强制减排，还要求

中国进一步提高减排目标，并接受国际监督。会议最后时刻，发达国家又称中国“阻碍会议达成协议，是麻烦制造者……”

欧盟首先向中国发难，要求中国进一步减排，并企图以此来推动美国的减排承诺。

欧盟谈判代表在气候大会的一个发布会上说，中国不久前提出的 202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是内部目标，欧盟的减排目标也是内部目标。既然来到哥本哈根，应把各自的目标放到谈判桌上来比较。瑞典环境大臣兼欧盟首席谈判代表表示，美国和中国所提出的减排目标，速度太慢，在欧盟眼中算不上相应行动。

对此，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反驳欧盟说，中国的目标是单位 GDP 二氧化碳减排 40%，这是国内目标，而欧盟将自身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跟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目标相比，这是不厚道的，并表示“中国自主采取的行动，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

事实上，已经谈判了这么多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要求发达国家要出资金和技术，到现在为止，资金没有落实，技术没有落实，又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们做得更多呢？

面对发达国家的发难，中国立场坚定，决不会接受任何强制性减排目标。因为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必须对全球气候变暖承担历史性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此来保证任何一项关于气候变暖的政策不会制约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

美国方面的要求和态度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2009 年 12 月 9 日，参加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美国代表斯特恩发表声明，言辞尖锐地拒绝向中国提供气候变化援助资金。这一声明令与会的许多国家的代表感到震惊。托德·斯特恩说：“我认为不会有美国的公共资金流向中国。我们要把公共资金引向其他最需要的国家。中国有足够的钱来支持自己的减排行动。”他还坚决否认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应为历史上的排放进行补偿。

美国还要求中国应接受强制性减排目标，否则向中国征收碳关税作为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坚定回应，美国发出警告，如果中国不在国际减排措施上“合作”，就有可能遭遇美国国会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其中包含发达国家有权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2009 年 12 月 12 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高级别会议上再一次重申：“中国不接受任何新达成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中将‘主要发展中国家’纳入到绝对量化的减排指标中。”

此外，中国愿意通过南南合作、双边合作的形式为小岛国联盟、非洲国家和其

他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支持，没有期望来自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资金会流向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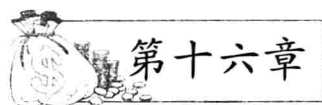
18 日，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领导人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发表了题为“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主张和举措。

中国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在水电装机容量、核电在建规模、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和光伏发电容量方面，中国都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是世界上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中国持续大规模开展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大力增加森林碳汇。目前中国的人工造林面积达 5400 万公顷，居世界第一。

中国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与任何国家减排目标挂钩。中国有 13 亿人口，人均 GDP 刚刚超过 3000 美元。按照联合国相关标准，中国还有 1.5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尽管如此，中国始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战略任务。

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中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把法制作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中国是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截至 2009 年上半年，中国单位 GDP 能耗比 2005 年降低 13%，相当于少排放了 8 亿吨二氧化碳。

总之，中国在承诺强力减排的同时，也坚决捍卫自身的发展权。2009 年 12 月 19 日，发达国家“让主要发展中国家以牺牲发展权为代价接受强制减排”的企图并未得逞。不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一斗争可能会在以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重演。



资源为王的大国追逐战

资源争夺战：世界进入资源为王的时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企业受困于资金的缺乏，开始大量聚拢资金，都坚持“现金为王”的观点，因此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开始遭遇“雪崩式”的惨跌。

2009年下半年开始，很多国家政府放开银根，并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致使市场上逐渐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迹象，因此大宗商品开始一路上涨，市场整体趋势出现了逆转。世界又进入“资源为王”的时代，一场“资源争夺战”再次拉开了序幕……

2010年年初，华尔街的投行们发动了一场欧元狙击战，最终使得欧元在与美元的对抗中败下阵来，由希腊债务危机引爆了欧元危机。面对欧元危机带来的强势影响，整个世界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比美国次贷危机严重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比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是世界资源危机。然而，当世界各国认识到这点的时候，美国早就在资源危机发生之前就已经早先一步，赢得了掌控资源危机的主动性。因为美国提前认识到，这个时代说话算数的不是“现金之王”，而是“资源之王”。

早在里根总统时代，当时的农业部部长约翰·布鲁克就曾对媒体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一件比原子弹更厉害的武器，它能够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联系在我们身上，而且他们还不会再捣乱，这件超级武器的名字就叫做粮食资源。”从约翰·布鲁克的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政府早就已经认识到，在现代世界格局中，资源战争远远比货币战争、武力战争的杀伤力更大、更广泛。

毫无疑问，石油、铁矿石等紧缺资源已经成为了当今各个国家最为关注的对象。石油资源又被称为“经济血脉”，足以突显它的重要性。每一次油价的上涨都会带动大宗商品的价格反弹。2009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全球市场

上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也陡然上升，尤其是资源类商品的价格出现了报复性上涨。自2002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新一轮强劲增长，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区钢铁需求大增，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亦强劲增长，导致铁矿石供应相对偏紧，助推铁矿石价格节节攀升。2000年以来，世界FOB（铁矿石长期协议价格）增长了5倍，澳大利亚哈默斯利粉矿从2000年的27.35美分/干吨度上涨到2008年的201美分/干吨度，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球团矿从2001年的50美分左右上涨至2008年的220美分。印度的铁矿石价格同样飞涨，铁矿石价格指数在1994～2003年的10年间基本维持在100～200之间，从2004年开始大幅上扬，从当时127直冲至2008年8月的1293.7，增长了十倍之多，目前虽有回落，但仍处于1176的高位。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事实——资源争夺战迫在眉睫，资源为王时代迅速来临。

众所周知，在“现金为王”的时代，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本国的发展而选择贱卖资源。现在我们就能够预见，在这个资源紧缺的年代，这些国家肯定会为用贱卖资源的方式换取纸币储备的行为而追悔莫及。其实仔细想想，这本身就存在极大的谬误：当货币的载体是实物的时候，货币就是万能的；而当货币的载体变成纸币的时候，货币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都知道纸币如果抛开实物载体，它就是一堆废纸。自从纸币诞生以后，几乎每一个政权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滥发纸币的倾向。在当前这个资源紧缺的年代，纸币是可以无限制地滥发的，但是资源却不是随便就可以再生出来的。

当前一些国家已经好多年没有增加黄金储量了，而这些国家的外汇大部分是用美元来储备的。为什么不选择安全性比美元高出很多倍的黄金呢？答案是，政府潜规则。因为这些国家政府的外汇储备部门以黄金来储备，不论金价上涨多少都跟这些政府部门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们储备的是资源不是价格，所以这些国家政府部门是不会有收益的。但是，将外汇以美元来储备的时候就大大不同了，因为美元一旦升值，这些政府部门就会获益颇丰，而美元贬值了却跟这些政府部门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赚不赔的买卖谁不愿做啊？可以说，这种制度上的漏洞使得国家财富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损失，而这种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现金为王”的发展策略显得越发不合时宜——“资源为王”才是当前时代的最佳发展策略。

当“资源为王”的时代再次降临的时候，全球各个市场对资源的争夺直接引发的问题就是很多资源不丰富的市场将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大宗商品的价格快速上涨，从而在一些市场引发了一轮较快的价格上涨趋势，通货膨胀的压力骤增。

作为大宗商品的计价单位的美元，一旦资源价格上涨，必然会导致美元的走弱，

也就是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美元就肯定会走弱。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前世界各国都施行低利率的经济刺激政策，这也使得通货膨胀的压力大大增加。资源不同于货币，是真实的财富，投资资源可以使得货币保值，有效地避免资产的大幅缩水，在资源投资价值凸现之时，往往就是通货膨胀压力预期增强的时候。

“资源为王”时代的到来，不仅让世界经济发展的节奏更稳定，对提升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也更加有利。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源为王”时代的到来，能够使得原本就两极分化的世界经济格局程度加深——发达国家因为占有资源的手段远比不发达国家要多得多，最终可能导致发达国家占有更多的资源，而不发达国家因为占有资源的手段有限，获得的资源也就有限，可能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趋弱，但是世界各国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这对于刺激市场消费来说非常不利。而且“资源为王”的发展策略会导致资源被看做储蓄财富的单位，很多国家一味地追求大批资源的进口，从而使得大宗商品的库存量加重，导致市场链上出现很多的“阻塞点”，又为以后的市场健康运行埋下了隐患。

资源博弈：揭秘资源角力中复杂利益链

这是一个“资源为王”的时代，而这又是一个资源日益紧缺的时代，正是这样的矛盾使得“战争”无处不在。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能够拥有多少的话语权，不仅要看现在的综合国力，还要看未来的发展潜力，而资源就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不断挖掘发展潜力的助推器。只有资源储备雄厚的国家，才能拥有一个辉煌的发展前景。当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大国开始崛起的时候，原来的国际格局已经开始改变，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将成为过去。表面上看起来国际分配格局愈来愈公平，实际上，一场关于资源的博弈战却刚刚拉开了序幕。

2009年7月5日，力拓上海办事处的4名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罪被拘捕。与一般人想象不同的是，这次定义的“国家机密”不是属于政治、军事、外交领域，而是纯粹的经济领域。据报道，近年来由于以力拓为代表的国际铁矿石垄断商通过窃取情报形式几乎完全掌握了中国国有钢铁企业的有关核心信息，从而在铁矿石谈判中清晰洞悉了中方的底牌，中国钢铁企业累计损失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为这些钢铁企业累计利润的两倍。

实质上，“力拓”事件最为直观和鲜明地说明了国际势力在有关资源和与资源相关的环境问题上与中国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角逐。就在不久前，美国和欧盟扬言

将对中国控制国内稀土出口向 WTO 提起诉讼, 欧盟和日本则对中国限制出口焦炭大光其火, 一再扬言报复。稀土是金属冶炼中不可或缺的添加剂, 号称“工业维生素”, 中国储藏量占全球的 90% 以上, 中国控制稀土出口等于扼住了欧美国家高科技军事制造工业的咽喉。焦炭的生产门槛极低, 但由于焦炭生产将极大地破坏环境, 故西方国家早已停产。一旦中国为避免国内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减少向西方国家出口, 西方的重化工业就会立即面临困境。

资源是衡量财富和生存权的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一国拥有的资源越多, 就会越富有、越强大。因此, 政府应该不惜负债竭力鼓励资源进口, 不主张甚至限制资源不对等的商品 (尤其是奢侈品) 进口。

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资源。除了挖掘本国资源以外, 对外贸易是资源财富的真正来源。因此, 要使国家变得富强, 就应尽量在贸易中实现资源净流入。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获得资源净流入, 而且任一时点上的资源总量是固定的或者减少的, 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正处于产业结构加速升级之中的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资源争夺中矛盾激化, 已经导致和正在导致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随着资源危机的不断深化, 不让资源外流成为国家竞争的关键, 国家有多少资源总量决定了国家的实力, 社会人均能够控制和享有多少资源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志, 各国对待国际贸易的真实原则是资源重商主义: 重视资源的流入限制资源的流出。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根本数据在于美国以不到世界 5% 的人口消费了世界约 45% 的资源, 美国资源消费比重超过美国的 GDP 全球比重一倍以上, 这才是富裕的表现!

世界各国实际上都是在尽量让资源流入自己国家, 限制资源流出, 看重资源在贸易中的地位, 而中国在取得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后, 也从原来大量出口资源换取外汇转变到非常关注海外资源的开拓了。中国限制稀土金属的出口还引来了 WTO 诉讼, 历来限制中国商品出口的国家, 这次却反对中国限制出口的政策, 原因就是外国需要资源流出。而各国对于资源的采购, 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补助, 就如我国现在要支持开拓海外资源一样。

鼓励资源流入、限制资源流出的思路, 与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是一致的, 只不过关注的对象从贵金属变成了资源; 各国追求资源的净流入, 追求资源的贸易顺差, 并且通过资源流入的贸易改变世界的财富格局。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响亮的口号了, 而各国在台面下怎么做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资源重商主义就是一种对于资源的彻底的保护主义, 而一个国

家不断地推行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的背后，实际上是要他国开放自己的资源（包括市场资源）。贸易中的资源不平衡远远不像贸易顺差、逆差的数字那么明显，公开讲资源重商主义在国际政治上会处于被动，谁也不会说破阴谋，谁也不会放松谋求资源，资源的竞争就与战争一样兵不厌诈。一个国家最后变得富有还是贫穷，根本上是由资源的流入和流出所造成的。中国在清朝的时候 GDP 占世界的 35%，而历史上积累的资源更多，但是中国怎么很快就成为了穷国呢？有人会提到鸦片贸易中的白银出超和对外战争赔款，但是《霸权博弈：独立视角透视全球幕后体系》一书中做了深入分析，关键还是在于中国被殖民掠夺期间资源大量流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以国家信誉发行的货币在贸易中置换中国带有资源性质的实银，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外汇管制，造成中国大量的财富外流，最后强盗们把东西抢走给我们戴上一个东亚病夫的帽子还说我们本来就贫穷。

各国的资源重商主义的本质就是谋求利益，世界在发展，它所面临的资源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也是人类的生存压力和生存竞争。在等价贸易的幌子下，如何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本国更大的发展成为了当今世界大国之间争夺的主要动力。

铁矿石之争：储备资源就是储备财富

铁在人类的文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铁制工具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农业文明得以发展起来。自从 19 世纪中期转炉炼钢法发明以来，铁这个农业文明的重要支柱开始成为新的工业文明的一大支柱，铁变成钢以后，其强度和延展性等性能都有了飞跃，使这种古老的材料焕发出新的生机，开始在对材料有更高要求的工业经济中发挥主体材料的角色。钢铁被誉为工业的粮食，没有钢铁，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的工业体系。

据美国矿业局和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世界矿石资源总量超过 8000 亿吨，折合金属量超过 2300 亿吨。从全球的分布来看，北半球的铁矿石总量在 1237 亿吨，工业储量为 600 亿吨，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 63% 和工业储量的 64%；而南半球的铁矿石总量为 725 亿吨，工业储量为 330 亿吨，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 37% 和工业储量的 35%。其中，欧洲的铁矿资源最为丰富，其总的资源量为 622 亿吨，工业储量为 350 亿吨；南美洲其次，其总的资源量为 462 亿吨，工业储量为 188 亿吨；北美洲的铁矿石总量为 444 亿吨，工业储量为 149 亿吨；接着是大洋洲，其铁矿石的总量为 191 亿吨，工业储量为 109 亿吨；亚洲铁矿石总量为 171 亿吨，工业储量为 102 亿吨；非洲的铁矿石资源最为贫乏，总量只有 73 亿吨，工业储量为 33 亿吨。分国

家来看，前苏联是铁矿石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总量达到 517 亿吨，其中工业储量为 281 亿吨；其次是巴西，其铁矿石总量为 260 亿吨，其中工业储量为 160 亿吨；中国则位居第三，总量为 260 亿吨，工业储量为 109 亿吨；紧接着是澳大利亚，其铁矿石的总量为 181 亿吨，工业储量为 107 亿吨。此外，美国、法国、瑞典、南非等也都有非常丰富的铁矿石资源。

铁矿石作为钢铁生产的原料，是世界上重要的矿物资源。自然也成为一国的战略物资，铁矿石虽还没有像石油那样短缺，但由于其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其价格将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如果铁矿石的价格过高，将直接推动钢材涨价，而钢材作为许多重要产业的材料，其价格必将传递到产业链的下游，推动汽车、铁路、机械、飞机、轮船、建材等成千上万种产品涨价，通货膨胀在所难免，这对于依靠价格体系来调节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的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都将是不得不考虑的。如果因铁矿石这一基础原材料的涨价带动的通货膨胀不能得到很好的遏制，那么国民经济就将偏离健康运行的轨道，高涨的价格将直接扰乱市场的资源配置，或者压低钢铁企业的利润空间，或者推高下游产业的产品价格，而普遍的价格上涨将直接降低人们的购买力，进而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严重时还可能因下层人们的生活困难而引起社会动荡，后果不堪设想。因而，保障铁矿石供应，抑制其价格过快上涨，已成为国家的战略课题。

然而，和其他任何资源一样，铁矿石这种重要的原材料在全世界的分布并不均匀，这对于拥有较少铁矿石资源的工业国家来说，意味着在这一重要原料上依赖于他国，并且常常受制于人。在当代社会，由于技术进步，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从而大大提升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能够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制造出大量的工业产品，这些工业产品就是财富的标志，它们能够使人类的生活更舒适、更便利，通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换体系，任何握有大量资源的人都能够换回自己想要的一切，他不必再去亲自劳动，去利用这些原料制造自己想要的物品，而只需将这些原料卖出去就可以换回大量所需的物品。因而，资源已经具备了财富的属性，它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必需，是财富创造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因而谁控制了这些重要资源，谁就等于拥有了大量财富。

2007 年 12 月，有消息传出，美国私募基金百仕通集团正在与一家实力非常雄厚的财团达成联合协议，制订了一份向世界铁矿石巨头之一的力拓集团发出收购的要约，以对抗另一个世界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此外还有一家中资基金参与了百仕通集团的这一“大规模联合行动”。虽然百仕通极力否认，但是关于铁矿石资源的争夺已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如果百仕通集团认定他们开展对必和必拓的“大规模联合行动”的消息属实，那么势必对中国的钢铁企业造成巨大的冲击：一直受到各方关注的铁矿石谈判问题会变得更加敏感，中国钢铁企业对资源的控制将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对于中国钢铁行业的整合也会造成难以估计的影响。根据“蝴蝶效应”原理，如果中国钢铁企业对于铁矿石资源的掌控不力，就会引发中国整个钢铁行业的巨大波动，从而引发与钢铁行业有关的其他行业的巨大波动，最终影响到整个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任何一个资源问题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深远影响。同样，对于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资源问题都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命脉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生铁产量一直处于大幅增长中。2000年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对于铁矿石的需求大幅增加，国内产量无法满足需求，钢铁企业需要大量进口铁矿石，因此进口铁矿石的数量连年递增，进口量占需求量的比重亦逐步提高。1999年，进口铁矿石占总量需求的28%左右；2008年，我国进口铁矿石达到44414万吨，同比增长15.8%，占比总需求量达到58.9%，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中国铁矿石的采购来自18个国家，其中8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由于我国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这导致了国外铁矿石巨头利用垄断资源提高价格使我国进口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扬。我国对澳、巴两国的矿石进口比重有所减少，而从印度进口矿的比重有所增加。

中国经常从国外进口许多铁矿石来生产生铁，而国外的铁矿石近年来十分的不稳定。如今，我国铁矿资源遇到了一些难题，如易选的铁矿资源越来越少，给选矿造成一定的困难。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先进的技术及设备来推动贫铁矿的开发和利用。

水资源争夺战：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人类的生存发展一时一刻也离不了水，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地球上的水只有2.5%适宜饮用，而且水资源分布得极为不均衡。2006年底，80个国家宣称国内水资源短缺。全球人均拥有7500立方米的水，欧洲人均拥有水量为4700立方米，亚洲的该指标为3400立方米。各国的人均耗水量差异很大，欧洲和美国就相差数倍。据联合国评估，目前每年的淡水缺口为2300亿立方米，这一数字到2025年将上升到1.3万亿~2万亿。一些资料显示，再过1/4个世纪，2/3的地球人将遭遇水资源不足的问题。全球每年有近600万公顷的土地变成荒漠。水资源不足会导致卫生条件低下，世界上每天大约有6000人因此而丧生。在逾20%

的陆地上，人类活动已经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负荷。水质也在恶化，近 95% 的工业废液年年不受监管地被倾倒入江河湖海中。酸雨在很多国家早已不罕见了。如果污染势头得不到遏制，水也许会变成不可再生资源。

早在 1995 年，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斯梅尔·萨拉杰丁就曾表示，下一个世界的战争不是石油战争，而是水战争。在 2006 召开的、讨论气候变暖问题的一次峰会上，当时的英国国防大臣约翰·里德警告说，随着水资源地沙漠化、冰川消融、水库污染等情况愈演愈烈，爆发武装和政治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认为，全球水危机危及世界安全，英国军队应当做好参与解决因水资源耗竭而引起的武装冲突的准备。

预计今后几十年，北半球的俄罗斯、美国以及北欧各国的水资源将比较充足，但在此之后，全球水资源不足或恶化的现象将逐步凸显，最终必然导致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各国“自扫门前雪”的国策将进一步明朗化甚至赤裸裸化。各国都会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水资源优势，在农业发展上立足根基，并以此为制高点来确立本国的经济大国和强国地位。水资源的丰沛与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发达的基础性标志之一。

在美国海洋中心起草、于 2007 年 4 月提交美国总统的一份报告中写到，水资源不断减少是国家安全的一项严峻威胁，一些退役的海军和陆军将领提醒总统说，美国未来将被卷入一系列严酷的水资源争夺战之中。因此，美国并不坐等水资源形势在全球范围内恶化，它准备借助武器独自支配那些迄今仍与邻国共同利用的水源地。2006 年美国宣布有意利用配备机枪的水上巡逻队保护大湖地区。由于周围区域人口数量和工业活动急剧增多，五大湖污染程度不断加重，水位日益下降。为进行训练，美国在湖岸附近建立了 34 个射击场，举行多次演习，每次都要射出成千上万发子弹。

在中亚，早在苏联时期就发生过因水源地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只不过当时它们被控制住了。出于一系列原因，局势如今持续恶化。据预计，再过 15 ~ 20 年，中亚地区的水资源至少会减少 1/3。据 2007 年 9 月公布的一份联合国报告显示，巴勒斯坦居民每人每天的水消费量还不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确立的最低标准。水资源问题已经与其他一些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由于水资源的分配极其敏感，致使双方的对立不仅多年处于胶着状态，而且日趋复杂。

东南亚的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与邻国围绕水资源之争的摩擦就从未停歇过。新加坡的国土狭窄平坦，基本上没有什么保水储水能力，对水资源的需求大部分依赖于马来西亚输入。有关引水价格的谈判旷日持久，激烈的讨价还价日趋尖锐化。

2002年，新加坡的军方曾经暗示，在必要时采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两国的军事对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只能维持现状。

中国在近几年加速开发西部时强调西部地区要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历史机遇，高度重视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开发利用，突出抓好生态系统建设，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利作为西部开发的主要内容和关键措施，既是基础设施建设，也是生态系统建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首先就是要解决好水的问题。

非洲东北部人口的增加和降雨量的减少，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助纣为虐”，加剧了非洲大陆的动荡不安和战火频发。

形势的发展已表明，水资源的多寡已成为各国在解决诸多国际问题时的锐利的杀手锏和举足轻重的筹码。水资源争夺堪称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有专家认为，世界性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之所以会频频发生，不合理或不恰当的水资源开发政策难辞其咎。据联合国推测，世界上约有1/3的人口生存地区存在水资源不足现象，至少有10亿以上的人口的饮水安全得不到保障。到2025年，几乎全世界的所有角落都会出现水资源匮乏的问题。生命离不开水，水与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解决全球水危机最终有待于人类的共同努力。

自古以来，人类就是在水的滋养下生存和繁衍，今后也将同样依赖于水资源而继续存在和发展。无论社会如何进步，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不可让水环境的恶化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因为那将造成人类无法承受的恶果，并最终导致一切人类文明化为乌有。如果说过去的水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的无知导致的，那么今天，我们已经逐渐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说已经造成的水污染及水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我们疏于管理的结果，那么今天，我们已在水环境治理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果说已经完成的治理工作在遏制水环境恶化方面起到了可喜的积极作用，那么今后的工作将更加艰巨和繁重，需要更完善的立法支持、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以及更持久的全方位投入。水环境的现状要求我们不懈地坚持治理工作，已取得的成绩激励我们更有信心地将治理工作开展下去。

稀土角逐战：谁来保卫中国的稀土资源

稀土是“稀土元素”的简称。而稀土元素，实际上是镧、铈、镨、钕等17种稀有金属元素的统称；习惯上，上述17种元素中的任一元素，都可称之为一种稀土元素。18世纪末，稀土被人类陆续发现。稀土与当代的尖端武器密切相关，最显

著的是，用含稀土材料制造的战机、坦克、导弹等武器，精确度高、杀伤力强。在工业领域，稀土素有“工业维生素”之称，被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技术、机械、能源、环境保护等重要领域，涉及人类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同“稀有金属”的名字所昭示的那样，对于这类稀有资源的争夺，各国早已展开或明或暗的较量。而对战略金属的高度重视是从西方国家开始的。根据欧盟的数据统计，2007年，中国的稀土冶炼分离产品出口到47个国家和地区，排在前几名的依次是日本、美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德国、英国、韩国等。而这些国家很早就开始悄悄储备战略金属。

欧洲：在稀有金属资源当中，欧洲最为看重的包括钨、钼、钽、锆和稀土。这些稀有金属应用于半导体、照明、太阳能等常见商用领域。同时稀有金属在欧洲还常被称为“战略金属”，因为它们在国防建设中也有广泛的用途。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纸面上拥有广大殖民地的丰富矿产资源，但它很快发现德国和美国等竞争对手早已钻进了它的“矿产仓库”。欧洲同美国共同参与的海湾战争是二战以来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战争，这使得欧洲各国清楚地认识到了战略金属的重要性。例如，钴是军用飞机和导弹的关键材料。制造一部喷气发动机需要使用408公斤钴，这是因为喷气发动机用的超耐热合金中含65%的钴。

美国：美国里根政府制定的《国家物资和矿物方案》规定：“必须执行物资和矿物政策计划，以确保一旦爆发战争和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美国有能力派出和支持战斗部队，也不会因为缺乏关键原料而受影响。”1982年，美国“战略矿物原料特别工作组”以总统的名义，向国会提交一份长达33页的报告，指出必须采取行动，加强储备，还要着力开拓全球资源。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美国的稀土储量居全球第二位，但美国从1999年就已逐步停止开采本国的稀土资源。

日本：从1983年起日本开始建立稀有金属储备制度和基地，储备制度同样采取官民合作。日本稀有金属几乎全部依赖海外进口，并且供给渠道存在较大风险。国家储备量的目标是42天的国内基本消费量，占储备总量的70%；民间储备量的目标是18天的国内基本消费量，占储备总量的30%。

韩国：2008年7月，韩国知识经济部决定增加稀有金属储备，将采取官方和民间企业合作的方式，不断提高稀有金属储备规模，到2012年将稀有金属储备种类由2008年的12种，增加到22种，规模由2008年的满足国内19日使用量，增加到满足国内60日使用量。

然而，就在世界发达国家开始增加稀有金属储备的时候，中国却相继“打败”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范围内战略金属储量大国和生产大国。钨主要用于平板显示

器、半导体数据传输、航天制造等领域。我国铟储量居世界第一，占全球供应量的80%。钼被称为“战争金属”，我国储量居世界第二，占全球供应量的24%。我国的稀土储量世界第一，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93%。此外，我国的钨储量世界第一，钒产量世界第二，仅次于南非。近年来，大规模贱卖稀土，会使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受制于人。据专家估计，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和出口规模，最迟在未来50年内，我国就有可能沦为稀土资源贫困国。到那时，我国再想从其他国家进口稀土，必定会四处碰壁。

对此，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战略金属对应的就是战略产业，存在量对应的是需求量，需求量大，战略金属就更为稀有。中国在这方面一直重视不够。我们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稀土，可我们没有从战略角度出发看问题，没有好好珍惜，卖了祖传的家当，损害了自己的经济战略安全。现在，中国应该好好把握手里的战略金属，不能有矿就开，该封存的就封存。另外，中国还没有控制战略金属的条例，而且，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应该声明不遵守某些条款。发展要有长远眼光，不要一代就把后代的饭都吃光了。”

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戴旭也说：“战略金属关系到大国的未来，谁能拥有战略金属，谁就掌握了未来技术的资源，把握了未来的命运。中国在这方面教训深刻，我们用‘卖土’的价格廉价卖了20多年稀土。中国必须上升到战略高度，以国家名义管理控制战略金属资源。”

为改变我国稀土被大量贱卖的不利局面，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5年5月，政府取消了类稀土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2006年11月，政府又对稀土氧化物征收出口关税。2009年5月，国土资源部下发《2009年钨矿锑矿和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的通知》，宣布暂停稀土等种矿藏的探矿权和采矿权申请一年。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从多处着眼和下手。由于稀土行业的管理涉及国土资源部、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以及各大央企、地方政府、民企，甚至是非法开采的矿主，关系错综复杂。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建立稀土国家战略储备制度，并恢复国家稀土领导小组，在制度的指导下协调稀土产业政策的落实。对国内的稀土企业也应进行强势整合，在国际上形成强大的话语权。只要集中采矿权，产量便易于控制。并加强稀土资源开发的宏观调控，严格限产限采，防止稀土“变相出口”。

实际上，在这场国际性的稀土角逐战中到底谁来保卫中国的稀土资源是一个非常明知故问的事情。因为，除了中国人自己，还有谁来真正为你保卫，美国、日本等国家说要替你保卫稀土资源，你又会真的相信吗？

冰雪覆盖的北极成为大国争夺的新战场

2007年8月6日，美国海岸警卫队“希利”号重型破冰船悄然起锚，从位于美国西北部的西雅图港驶往北极海域进行科学考察。4天前，俄罗斯北极科考队出动深海潜水器，探查4000多米深的北冰洋海底，并安插一面钛合金制造的俄罗斯国旗。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军事大国的做法表明，它们都已经将目光延伸到了北极。然而，分析人士认为，这并不是为了做科学研究，而是看上了北极这块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北极已成为大国争夺的“新战场”。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被冰雪覆盖杳无人烟的北极会成为大国争夺资源的“新战场”呢？首先，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北极是一个冰天雪地且美丽至极的地方，它有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比拟的独特魅力，更为重要的是北极的冰层下埋藏着难以估计的丰富矿物资源和很多有待进一步认识的自然资源。换句话说，北极就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资源宝库，它势必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

1909年，比利踏上北极点，并向全世界宣布，这里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净土。很快，北极就成为了欧美国家的探险家和航海家们最热衷的地方，进而逐渐成为了世界上很多大国所觊觎的一块地方。

经过近百年的科学考察，北极早已不再是冰天雪地的代名词，这里是地球上仅存的极具开发价值而又尚未得到真正利用的多彩世界。有专家估算，在北冰洋冰盖以下，除了潜力巨大的渔业资源外，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黄金和白金等重要矿藏，仅石油储量就多达数十亿吨。面对这样一个“聚宝盆”，以美国和俄罗斯为首，外加同处北极圈的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等，无不跃跃欲试。

1983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美国的北极政策》议案，强调“美国在北极地区有着独特的关键性利益”，北极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资源及能源开发、科学调查和环境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北极考察和政策法》，把美国对北极的科学研究、经济利益和战略考量三者联系在一起。

虽然有着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道浩瀚无垠的天然屏障构成了美国的“防护层”，但是随着人类飞行技术越来越发达，美国人更是将北极看成了自己应对空中打击的又一道坚实屏障，所以北极在美国人眼里就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的战略要地。

然而，除美国和俄罗斯之外，地处北冰洋周边的加拿大、丹麦和挪威等国家也相继宣称对邻近的北极一些地区拥有主权。期间，加拿大与丹麦在北极汉斯小岛归属问

题上的争执，还曾引发诸如插国旗、搞军事演习等主权宣示行动，不仅给彼此关系造成紧张，而且使得北冰洋这片原本宁静的水域俨然成为大国争夺的“新战场”。

尽管北极周边国家都声称对北极部分地区享有主权，但直到今天为止它们又都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当今世界，北极水域成为被争夺的目标不过是强国争夺战略利益的一个缩影。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提高，大国争夺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随着世界资源争夺气氛越来越浓，各个国家对北极地区的争夺也开始激烈起来。2010年春，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乔·步夫就对着媒体公开发表了自己对北极地区的看法，他认为：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已经开始快速解冻的北极冰层很有可能在25年之后就消逝，因此这为对北极地区所蕴含的丰富自然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可能，那么新一轮“北极战争”将迅速拉开帷幕。而就在乔·步夫对外宣扬他的“北极战争”论的时候，美国的核潜艇已经开进了北冰洋。

如果北极的冰盖在25年之后彻底消逝，那么这一地区的广阔水域将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水域。而这也表明，“西北通道”和“北方通道”将直接连成一线，从加拿大的海岸一直延伸，经过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联通西伯利亚的交通线，那么到时候将形成一个北冰洋通道。而这个新建立的北冰洋通道能够将亚洲、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航线距离缩短8000多千米，大大提升海上交通运输效率，并将对世界的贸易格局产生变革性影响（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的作用将有所减少）。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北冰洋上占世界25%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将成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眼馋的肥肉。甚至有国际情势分析专家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就会在北冰洋上爆发，战争的导火索就是北极地区丰富的资源储备。

然而，无论水上水下，北极的自然状况都极为复杂。因此，无论是谁，在开展冰上航行以及深海探测等活动时，都需要一系列高精尖的技术设备作为依托。眼下，美俄等国积极染指北极水域的行为更多的是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来体现的。据报道，俄罗斯科考队的此次插旗活动就耗资约400万美元。而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审议拨款1亿美元用于维护海岸警卫队的3艘破冰船，并准备加大投入再造2艘重型破冰船，其主要目的无非是增强探索和掌控北极地区的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水平的竞争已成为美俄两国尽显其能，争取在北极独占鳌头的最大着力点。

实践表明，国际间的种种竞争说到底还是各国生产能力及其科技水平高与低的竞争。北极水域成为被争夺的目标不过是列强争霸世界的一个缩影。随着人类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提高，大国争夺的对象将不再局限于地球的某一个角落，而是正在把手伸向一望无际的遥远太空。

南极注定是一个让大国为之争吵不休的地方

随着地球资源的日益缺乏，地球上寒冷的南北两极渐渐成为很多国家争夺的焦点。两极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矿产资源，随着全球气候不断变暖，两极地区冰层融化，开发两极自然资源的想法已经变为可能。当世界大国开始对北极下手的时候，同样具有着丰富资源的南极自然也难以逃脱大国的视线。

南极被人们称为第七大陆，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被发现、唯一没有土著人居住的大陆。然而，关于南极的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争论早在南极探险时期就已萌芽了。1908 ~ 1946 年间，先后有英国、澳大利亚、智利、挪威、阿根廷、新西兰、法国等 7 个国家依据所谓的“发现论”、“占有论”、“扇面论”等理论正式宣布对南极的部分地区提出领土主权要求，而美国和苏联则再三声明其保留对南极提出领土主权要求的依据和权利，从此揭开了南极领土主权要求和争夺的序幕。

作为最有影响的大国，美国和苏联虽然都没有提出主权要求，但两国不承认其他国家南极的划分，并声称保留自己提出主权要求的权利。

事实上，美国和苏联对于南极大陆也是觊觎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南极大陆上测绘与勘探最多的就是美国，当时美国对南极大陆总面积的大约 80% 进行了测绘与勘探，如果按照被国际社会发现的发现权原则去执行，美国无疑也占有着非常有利的地位。苏联也不甘示弱，声明如果没有它的参与，南极版图的任何解决它都不予承认。1946 ~ 1948 年间，美国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南极考察活动，每次都派出了大批军舰和科学家。苏联军舰和供应船只也奔忙于南大洋之上。

为防止竞争演变为战争，各国竞相解决方案，但没有哪个能得到各国一致认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提出南极由联合国托管，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 8 国一致反对。1948 年初，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美国与其他 7 国共管南极，建立一种对南极的共同主权，意在排斥苏联。此举遭到苏联、阿根廷、澳大利亚、智利等国的反对，只有英国和新西兰支持。一时间，南极问题陷入僵局。

1948 年 7 月，智利外交部法律顾问埃斯库德罗建议，南极主权之争至少需暂停 5 年，应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科考人员可自由进入南极大陆，并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被称为“埃斯库德罗宣言”。但是，当时“冷战”盛行，各大国的政治家们都没有心思去认真思考这位法学家的建议。

1948 年，英国南极半岛的霍普湾基地毁于火灾后，阿根廷马上在距英国原基地不远处建立了自己的考察站。因霍普湾地理位置良好，英阿都希望把它控制在自己

手中，于是便发生了 1952 年的霍普湾冲突。

显然，如果南极的“游戏规则”迟迟确定不下来，类似霍普湾的事件势必重演，因为如果美苏也卷入纷争，南极大陆必然成为多种矛盾的焦点。

因此，经过数次磋商，1959 年 12 月，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挪威、阿根廷、智利、日本等 12 国签订《南极条约》宣布暂时“冻结”相关国家对南极的领土要求并禁止提出新的领土要求。1991 年，相关国家签订《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决定全面禁止南极的矿产资源开发活动 50 年，使南极争夺在表面上暂时趋于平静。而到 2009 年，正值《南极条约》缔约 50 周年，南极跳跃缔约国通过了《南极条约五十周年部长宣言》和《国际极地年与极地科学部长宣言》，重申继续冻结南极领土主权、南极仅用于和平目的，承诺《南极条约》无限期有效，南极科研自由，鼓励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建立极地长期观测体系以提高对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检测与观测精度。有分析人士指出，英国首先将南极领土争端加温，目的显然是在修订《南极条约》时争取更多的主动。这也预示着新一轮的南极大陆争夺战又将拉开序幕。

从表面上看，两极地区领土争端源于一些国家间始终存在争议的领土纠纷和某些国际条约中的漏洞为一些国家所利用，但其更深层次原因则源于世界各国对能源的激烈争夺。就拿南极来说，南极地区面积巨大、冰盖厚达数千米、自然环境恶劣，导致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南极到底蕴含多少资源知之甚少。但就目前科考人员已掌握的资料，在南极蕴含着铜、铁、铅、锌、金、银、锡等数十种矿产、近千余处矿床、数百处大规模油气田。铁矿是南极最富有的矿产资源之一。据科学家们勘测，在查尔斯王子山脉南部的地层内，有一条厚度达 400 米，长 120 ~ 180 公里，宽 5 ~ 10 公里的条带状富磁铁矿岩层，矿石平均品位达 32% ~ 58%，是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富铁矿床，初步估算其蕴藏量可供全世界开发利用 200 年，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富铁矿藏。此外，南极还有着世界最大的煤田，估计储量超过 5000 亿吨。南极地区还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石油储量约 500 亿 ~ 1000 亿桶，天然气储量约为 30000 亿 ~ 50000 亿立方米。

各国关于极地主权的争夺表面上是各国利益的争夺，但实质上还将影响到全人类的利益。中国目前对极地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第二十四次南极科学考察即将于 2007 年 11 月中旬启动。这次科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在南极内陆冰穹 A 地区建立中国第三个南极科学考察站进行选址测量。邓小平 1984 年为南极考察的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这是我国极地工作的根本宗旨，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北极工作。

欧美强国加紧争夺非洲石油资源

石油作为分布极不均衡的战略资源，总会引发大国的激烈争夺，即使是素有“被遗忘的大陆”之称的非洲也不例外。非洲最早的石油开采始于1910年的埃及。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区于20世纪50年代末陆续发现油田，7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开采。据《青年非洲》杂志报道，截至2005年底，非洲各国已探明石油储量为1351亿桶，比1980年的533亿桶增加了153%，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11.1%；非洲大陆石油日产量约达1000万桶，占世界日产总量的近12%。专家预测，到2010年，非洲的石油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的比例有望上升到20%。非洲已探明石油储量仅次于中东和南美洲。不断探明的油田和巨大的开采潜力使非洲在世界石油产业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俨然成为诸大国开拓油源的重要战场。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也是世界第六大石油输出国，日产石油约250万桶。由于本国技术力量薄弱，尼日石油资源主要依靠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勘探开发。目前在尼日利亚的西方石油公司主要有英荷壳牌、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法国的道达尔等公司。这些公司的石油产量占尼日利亚石油总产量的95%以上。

赤道几内亚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油田，在一缺资金二无技术的情况下，该国政府与西方公司达成协议，以石油偿还外国石油公司的投资，外国石油公司则向赤道几内亚政府支付一定比例的石油收入，作为用地费和税款。目前，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在赤道几内亚的3个油田日产量为26万桶，占该国石油总产量的近70%。

非洲另一产油国加蓬目前有明显开采价值的石油区域已被欧美公司瓜分完毕，余下的是一些环境恶劣的区域如深海区、原始森林和沼泽地等风险大、开采成本高的区域。

20世纪中叶，大多数非洲国家摆脱了政治殖民，但经济和文化仍受制于人。虽然非洲已成为重要的石油生产地，但技术和资金是西方公司控制非洲石油的两大法宝，因此，西方列强通过大型石油公司对非洲的经济控制和资源掠夺有增无减。

1955年，葡萄牙石油公司在安哥拉发现石油。1956年，法国公司在阿尔及利亚、壳牌与英国石油联合在尼日利亚、法国赤道非洲石油公司在加蓬发现石油。在战略层面，欧盟一方面着手组建包括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油气大国在内的“泛地中海能源共同体”，同时以“技术换资源”，凭借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主动为非洲援建燃气电厂，希望以此换取后者的油气资源。在地域上，欧盟以北非为战略要点，目前已建成3条连接北非与欧洲的油气管道，还在规划从尼日利亚到阿尔及利亚的跨

撒哈拉油气管道。近期，欧盟进口非洲石油的四大客户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对西非尼日利亚、刚果（布）、赤道几内亚等国也加大了投资力度。

相较于欧洲各国，美国在非洲石油竞争中后来居上。21 世纪开始，美国称非洲石油是“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利益”，希望借助非洲油气资源减轻对南美、中东石油的依赖，提出在 2015 年使非洲石油占其进口总量的 1/4。

2003 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并强行占领了这个产油大国，而这也被看做是世界资源战争开始的序曲。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全球的资源安全便开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就在美国对西亚等石油资源大国开始实施战略“围剿”的同时，西方世界的那些强国们也开始将自己的手伸向了非洲大陆。很快，非洲大陆及其近海产油区便成为了一块欧美强国眼中“猎物”，一场以石油资源为争夺目标的战争在这里悄然打响。

2002 年，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强国联手斥资 37 亿美元修建了一条石油管道，这条石油管道长达 1080 千米，从乍得油田一直延伸到喀麦隆的出海口，被一些经济人士称为“乍得一喀麦隆抽血管”。在“乍得一喀麦隆抽血管”于 2004 年建成之后，欧美强国对于西亚石油国的资源供应依赖程度有所降低。在北非地区，西方强国的石油公司在利比亚、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新开发了 60 多处新油田。而在毛里塔尼亚、冈比亚和纳米比亚等以前被认定为没有石油资源的国家近年来也勘探出了好几个大油田，而这几个大油田也没有逃脱被瓜分的命运。近年来，非洲整体政治形势日趋稳定，战乱正在一点一点地从非洲土地上消失，发展与和平成为了各个国家的共识，而这些谋求快速发展的非洲国家也积极和欧美强国拉拢关系，希望在欧美强国的帮助下得到快速发展，而这也成为了欧美国家瓜分非洲丰富石油资源的一个契机。

毫无疑问，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非洲石油资源争夺战中，美国人无疑又一次成为了主角，又一次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近十年来，美国对非投资的 2/3 都流向油气等能源部门，总计超百亿美元。美国的竞争手段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充当非洲能源警察，高举“良治”大旗，督促产油国更加公正透明地分配石油收入；以投资、援助、贷款等为诱饵，迫使产油国遵循美国主导的世界石油市场规则，对产油国的石油贸易和投资条件暗加干涉。另一方面，加强军事存在，确保产油、运油安全。直到 2007 年，美国更是设立了非洲司令部，东非（吉布提）、西非（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两大军事基地逐渐成形，拱卫美一非石油通道。美国还通过军售、军演、反恐等密切与尼日利亚、安哥拉等产油大国的盟友关系。地域上，美国以几内亚湾沿岸的尼日利亚、刚果（布）、赤道几内亚、安哥拉等为战略要点，争取控制

西非诸国。

其实，早在 2002 年，美国国务卿赖斯就访问了加蓬和安哥拉，而在当年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时任总统的小布什也集体会见了 10 个非洲石油国的领导人。之后，尤其在奥巴马上台之后，这位第一个非洲裔美国总统更是表示出了对“非洲兄弟”的亲近。在 2010 年的 G20 峰会上，奥巴马更向 18 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参加在 2011 年 8 月份于华盛顿举办的纪念非洲国家独立 50 周年的欢庆活动。目前，美国已经控制了安哥拉、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加蓬和刚果等国家的石油资源。美国已经掌握了非洲石油资源总比重的 16%，很显然，这距离它们 2015 年 25% 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日本挑战海洋，努力加强海洋资源大国的规模

日本真的没有资源吗？其实不然，在日本的周围，有着一望无际且蕴藏有丰富资源的大海。如果充分利用高水平的探测及采掘技术，便能够以较为有利的条件从其他国家采购资源。而进一步使用这些技术，将日本近海海域变成资源宝库也并不是梦。

位于亚洲大陆东岸外的太平洋岛国——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 3900 多个小岛组成，面积只有 30 多万平方公里，和中国的云南省差不多大。但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开始一直是世界公认的第二号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科学研究能力居世界第三，同时也是当今世界第四大出口国与第四大进口国。日本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就是这个已经稳坐发达国家之位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资源紧缺的困扰。

长期以来，日本的众多资源确实严重依赖进口。2007 年，日本的能源自给率若不包括原子能仅有 4%，包括原子能在内也只达到 18%。2008 年，日本国内天然气生产量仅相当于日本年消费量的 4%，原油开采量只相当于国内消费量的 0.3%，国内煤炭的自给率降到 0.7% 以下。日本的木材蓄积量在发达家居第二位，但出于保护国内环境考虑，日本目前国产木材的自给率也仅为 30% 左右。

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各国对稀有金属等资源争夺正愈演愈烈。对资源小国日本而言，确保稳定的资源获取是当务之急。因此海洋资源备受关注。可以说，海洋中的矿产资源已经成为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据报道，日本的领海和专属经济海域面积位居世界第六，是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之后的海洋大国。在日本的海底沉睡着许多海洋资源。

上世纪 90 年代，有研究报告说，在日本领海内可燃冰的蕴藏量，相当于可供日本使用约 90 年天然气的量。可燃冰的发现将日本推上资源大国的行列。可燃冰是甲烷水合物的俗称，即作为天然气主要成分的甲烷在高压低温的海底或冻土下凝结成冰激凌状。

2007 年，经济产业省对位于静冈县和歌山县近海的南海海沟地区进行了调查，发现这里蕴藏着 1.1 万亿立方米的可燃冰，相当于日本 14 年的天然气消费量。同时，利用可燃冰的技术也不断成熟。2008 年 3 月上旬，日本和俄罗斯合作从水深 400 米的湖底回收了可燃冰。根据这些实际成绩，日本政府 2008 年提出在 2018 年度确立可燃冰的实用化技术，从 2019 年开始进行商业生产。

而且，目前已确认，日本近海海域就蕴藏有大量的甲烷水合物。甲烷水合物是甲烷分子在低温高压条件下被水分子包围形成的固态物质。据估算，在日本近海海域区域，蕴藏有相当于日本 100 年天然气消耗量的甲烷水合物，作为新资源，甲烷水合物受到了极大关注。甲烷水合物中的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开发及利用方法相同。因此，与石油和煤炭相比，从甲烷水合物中提取的甲烷燃烧时排放的二氧化碳及大气污染物比较少。独立行政法人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的“二十一世纪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开发计划”推进组组长磯部人志更断言：“目前日本在甲烷水合物的研究开发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实际上，沉睡于日本近海海域海底的，并不仅仅只有作为能源资源的甲烷水合物。据称，在日本近海海域，还蕴藏有丰富的稀有金属等金属矿物资源。《日本经济新闻》有报道称，根据日本国家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开采公司的初步调查，南鸟岛附近海床蕴藏高科技产业需要的稀土矿和锰、钴、镍、铂、钽等矿物。这些海底岩浆喷出的锌、铜、金和稀有金属沉淀后则形成了海底热水矿床，在日本附近，主要分布于冲绳海域、伊豆及小笠原海域等水深达 700m ~ 2000m 的海底。据推算日本周边海域的海底热液矿床资源量为 5000 万吨。日本近海约 20 年前首次发现海底热水矿床，迄今为止在伊豆和冲绳海域共发现了约 15 处。从 2008 年开始，日本政府就着手进行开发海底热水矿床方面的调查，目标是在 2019 年度前确立起商业化所必需的技术和完成经济性评估。并且，为加紧勘探和开采，日本政府也已决定直接管辖这项工作，将之写入 2011 年度的政府预算案中，并为此追加了 6.6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5320 万元）的预算，开始以商业开采为目的对这一区域展开调查。

日本虽然被称为“资源小国”，但如果发达的日本利用已有的先进技术和已有的资源，再加上迅速的政治决断以及强有力的资源外交，那么日本的“资源实力”肯定会得到显著提高。但贪婪的日本并不知足。

就在日本人从海洋里找到了解决稀有金属的丰富资源之后，石油又成为了困扰日本人的一个难题。日本虽然是一个海洋资源大国，但是其海洋资源中的石油资源并不是很丰富。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早已经将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的地位输给了中国。

当前，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和日本在东海石油资源的开发问题上不断产生的纠纷。东海一直都是中国重要的战略能源储备基地。但是，石油天然气资源匮乏的日本却一直虎视眈眈。在浙江宁波东南方的“春晓油田”本来在中国的领海范围以内，但是日本却以“春晓油田”靠近双方的中间线为由要将中方起诉至海牙国际法庭。在东海问题上，钓鱼岛已成为日本和中国不断发生纠纷甚至摩擦的“漩涡中心”。日本人为了力争成为海洋资源大国，遏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给其带来的“巨大威胁”，于是与中国在海洋资源的分配上争得愈发激烈了。

2005年10月，在中日的第三轮磋商之中，日本提出了在中间线两侧共同开发的议案。从表面上看，日本的这一做法就是为了争夺东海的石油资源，但是实际上却是日本有意令资源之争扩展为领土之争。日本的这一方案被中国否定了，中国的立场始终很坚定：明确宣誓对于钓鱼岛等领土的主权，同时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和日本关于东海问题的争议将会长期存在，而日本要努力加强其海洋资源大国规模的野心，也是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必须严加防范的。

资源争夺战是中国输不起的“最后战争”

美国前国务卿黑格1980年指出，“资源战争的时代已经开始……仅铬铁矿（的供应）危机就会使美国100万人失业，冷战实质上是一场资源战”。矿物资源过去一直是，今后仍将是世界各国采用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军事的手段争夺和控制的对象。

对矿物资源控制权的争夺，从历史上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美国、欧盟、日本的对外行动从来都是受利益驱动的，从来不是道义性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1928年间，美国和英国控制着当时世界已知煤蕴藏量的53%，铁矿石蕴藏量的48%，石油蕴藏量的76%，铜蕴藏量的79%，铝蕴藏量的81%，铅蕴藏量的74%，还有数不清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控制着地球大部分资源。德国、日本、意大利为了与欧美列强争夺矿物资源控制权，拓展生存空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工业国间利用军事力量争夺资源不是好的方法。因此，二战之后，需要一种新国际贸易秩序进行全球资源再分配。1944年7月在美国的布雷

顿森林召开国际货币与金融会议，由工业强国建议成立国际贸易组织，来调节世界经济经贸关系，并把它命名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从 1996 年 1 月 1 日起，由 WTO 取代关贸总协定。

在这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实际商品交换时，由于生产技术垄断，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严重不平等，在一国没有技术生产一种必需商品时，必然被对手攫取超额利润。美国和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控制着飞机、轮船、汽车、铁路及各种主要家用电器、计算机、摄像机、通讯、机械、新材料、能源、医疗设备、航空航天等全部先进技术，掌握商品与矿物资源定价权。它们对第三世界资源拥有国一致大肆吹嘘经济全球化、市场能合理配置资源等理论，以获得全球矿产资源的稳定、安全、廉价供应市场。但美国和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均对本国矿物资源实行最严格的计划经济，并都建立了战略资源储备制度，禁止、限制开采本国资源，并在获取他国资源上煞费苦心，不惜血本。

国际形势的发展无一不在向世人宣布“资源为王”的时代已经到来，面对这样的形势，作为资源大国的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成为一个资源强国。换句话说，身处于“资源为王”的时代的中国，绝对输不起这场资源战争。

矿产资源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国家安全的保证。我国只有钨、稀土等少数几种矿能满足国内需求，绝大部分矿产资源相对贫乏，像石油、富铁矿、铜矿、铬铁矿、铝、富锰、钾盐等大宗用量的支柱性矿产则严重短缺，无法满足我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巨大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加入 WTO，由于资源危机意识薄弱、缺乏战略层面的规划和调控，一些人受政府应只考虑税收增长，只要在中国当地政府缴税就是中国企业的错误思想引导，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过度强调出口创汇，盲目招商引资，从而使我国矿产资源严重流失。

2008 年 12 月 30 日，纪念有色金属工业改革开放 30 周年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坚持不断地深化改革，调整体制机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发挥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全面提升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国际合作的层次、规模和水平。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党委书记康义指出，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有色金属工业成功实现了从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

早在 2000 年 9 月 28 日，国土资源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六部门颁布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非油气资源探矿权、

采矿权市场，允许外商独资进行勘查，允许外商购买国有企业的探矿权、采矿权，并可以依法转让。

此后不久，国务院制定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领域。云南、四川、陕西等重要西部矿业省份，还制定了具体的甚至是更为优惠的外商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地方法规。同时，我国黄金产业的“十五”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到，要引进外资开发国内黄金资源。

加拿大的AFCAN（阿富堪矿业）公司间接控制了青海滩涧山金矿，它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持有大柴旦矿业有限公司85%的股份，中方合作方为青海海西州大柴旦金矿和青海第一地质勘查大队。该金矿项目第二期也已开工，建设规模为年处理矿石80万吨，年产黄金3吨多。

全球第三大黄金公司南非安格鲁阿山帝黄金有限公司与四川省地矿局在成都签署协议，在四川平武地区进行风险勘探，寻找金矿。据介绍，这将是继四川省地矿局与世界500强企业南非英美资源集团子公司英铂公司签定中南铂镍矿资源风险勘探合同后，中国和南非在四川的又一重要合作项目。

安邦集团2009年1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正当中国为能源、矿产资源短缺等问题大伤脑筋之时，越来越多的韩国人的身影出现在中国的各处矿山上，他们瞄准了各种矿产，包括稀土等中国特有的战略资源。据悉，为了重点开发中国的矿产资源，在过去几年里，韩国人和为他们提供合作的中国勘探人员一起，已经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编出了让专家吃惊的700页的中国西部7省矿业资料。除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之外，韩国最大的几家财团，如SK、三星、LG等，也先后加入开发中国资源的“角斗场”。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资源战争，这次资源战争不同于以往的资源战争，因为这场资源战争是在资源日益紧缺的形势下开始的。换句话说，当前的这场资源争夺战是中国输不起的“最后一战”。倘若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主动权，那么此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受制于人。

非洲买矿记：获得海外资源何其难

2010年7月12日，在伦敦上市的非洲矿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同意山钢向该公司旗下位于唐克里里的矿石项目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100亿元）。根据双方的协议，山钢将通过投资获得唐克里里项目25%的权益。

这是继中铁物资成为非洲矿业第二大股东之后，国内钢铁巨头对非洲矿山企业

进行的巨额投资。此时，引起业内人士较大的反响。据了解，唐克里里铁矿项目位于西非的塞拉利昂境内，目前探明资源储量为 105 亿吨，平均品位 30% 左右，据称是“全球已探明的符合 JOR（澳大利亚矿产储量联合委员会）标准的资源量最大的磁铁矿”。中国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对山钢到非洲开矿有些担心：“非洲铁矿远不如澳大利亚资源条件好，而且要运回来距离远，要经过马六甲海峡，那里是索马里海盗经常出没的海域。”不过，他认为，中国企业到非洲去买矿也有好处，这样可以减轻对国际三大矿山的依赖。

非洲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充满勃勃生机、发展潜力巨大、前途甚为光明的大陆。非洲绝不像某些西方媒体所宣传的是贫穷、肮脏、落后的大陆。拥有近 8 亿人口的非洲总面积有 3029 万平方公里，其中，森林覆盖率为 21%，草原占 27%，水利资源丰富，蕴藏量占世界的 40%。非洲享有“自然资源库”之美称。

非洲矿产资源极其丰富，但尚未得到很好开发利用。报道称，几内亚的铝矾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24%，铝土矿的产量占非洲的 94% 和世界的 14%；南非的铬矿储量占世界业已探明总储量的 80%，世界对铬的需求的 43% 来自南非；世界第五大铬矿生产国为津巴布韦。非洲铜矿产量居世界第五位，2000 年产 60.6 万吨，主要生产国为赞比亚、刚果（金）和南非。在钻石方面，世界钻坯的 50% 来自非洲，非洲博茨瓦纳的钻坯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25%，南非占 7.5%，刚果（金）占 3.5%，纳米比亚占 1.9%。在全球铁矿的产量排行榜上，南非名列第八（产 3300 万吨），毛里塔尼亚的产量则也高达 1140 万吨。南非和加蓬分别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锰金属生产国；加蓬锰矿储量约 2 亿多吨，占世界总储量的 25%，尚可开采整整一个世纪。全球黄金需求的 30% 来自非洲，南非为世界上第一大产金国，占总量的 19%，其金矿储量则占世界总储量的 35%；非洲其他的产金国有加纳（占世界总产量的 3%）、津巴布韦（占 1%）、马里（占不到 1%）、几内亚和坦桑尼亚。在磷酸盐产量方面，突尼斯居世界第五位（占总量的 5%）；在磷酸盐的储量方面，摩洛哥居世界第一，它也是世界第一大磷酸盐出口国，占世界总出口量的约 40%。全球所需钛金属的 30% 来自南非。此外，非洲的铋、钴、石棉、铀、锂、钽、铍和铌的产量也名列世界前茅。

然而，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真正属于非洲人自己的时间并不长。自 15 世纪开始，西方殖民者对非洲进行了 500 年的疯狂掠夺，从黄金、象牙、香料到罪恶的奴隶贸易。直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丰富的资源才重新回到非洲人手里，“开发”也取代“掠夺”，成为非洲人说得越来越多的话题，因此，到非洲买矿也变得越来越难了。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在 20 多个非洲国家开展了地质钻探方面的工作。此外，科特迪瓦、刚果（金）和南非都是我们合作开采矿业的重点。现在需要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以便在矿业资源开发的合作中开辟新的领域。

在具体做法上，世界上大多数矿业公司的做法都是先实行登记、勘探，在找到矿源后再吸收资金，通过股票发行的办法筹集资金，或以合资合作共同经营的方式进行开发。这种方式虽然存在风险，但是可取。选择一些重点的国家起步，然后逐渐向周围国家辐射发展，这是中国要实施的新战略。矿石可以返销，有剩余还可转口第三国。面对中国资金短缺的现状，中国投资一般采取机器设备、技术和劳务入股的方式，采取补偿贸易的途径与非洲国家进行合作。

2004 年南非政府颁布的新矿法规定，从 2009 年开始执行权利金征收制度。按照提交的权利金草案，国家将以收入为基础对不同矿种征收不同的费率：例如金征收 3%，铂族金属征收 4%，金刚石征收 8%。据专业人士预测，实行新的权利金制度后，每年政府的矿业税收将增加 10 亿美元。新的权利金制度对提高国家财政收入有利，但对矿山企业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矿业公司和矿产管理部门都抱怨税率太高，尤其是金。专业人士认为，以收入为基础征税将威胁到小型矿山的生存，同时该行业吸引投资也受到影响。南非矿业协会称，南非新的权利金议案将使金矿企业支付比目前高出 3 倍的税费，从而将加速该国金产量的下降。南非矿业协会表示，矿业税费的大幅上升将使金矿企业举步维艰，严重危及南非作为全球重要金生产国和世界最大铂族金属生产国的地位。目前政府还在重审该议案，可能会做出部分调整。如何调整人们拭目以待。但有一点恐怕不会改变，那就是矿山企业所要负担的政府收费一定会提高。

电力不足也是目前影响南非矿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据南非媒体报道，南非 2008 年采矿业第一季度产量下降了 22.1%，是 40 年来的最低水平。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电力供应不足造成一些矿山停产。另外，电价提升也将大幅度增加矿山企业的负担。南非的电价应当属于世界最低之列，这曾经是吸引矿业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近年来由于国内能源供应紧张以及受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增长等因素影响，南非国营电力公司向能源主管机关核准其在 2008 年大幅度调涨电价（超过 50%），南非政府已经决定将电价提高 27.5%，并且立即从 2008 年开始实行。该举措令用电量大的矿山企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对矿业投资的负面影响也较大。

除此之外，近些年来南非的社会治安问题也较多，特别是针对外国人的抢劫或骚乱，包括对中国人的袭击也时有报道。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还没有对其经济产生明显影响，但以后可能会显现出来。各国投资者应当给予一定的关注。

印度：非洲大陆上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2008年4月8日，首届印度—非洲论坛首脑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幕。作为金砖四国中的两个国家、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亚洲经济的两大“引擎”，中国和印度与非洲的合作关系带动了一股亚非贸易投资合作的潮流，这种“南—南合作”关系彻底打破了传统上由经济发达国家领导国际商贸合作的“南—北关系”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非洲大陆的国家密度是最大的，平均每个国家与四个邻国接壤。非洲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地理和经济基础对发展不利的国家。40%的非洲人生活在内陆国家。非洲不仅人口密度低，而且内部运输成本高昂，估计接近其他发展中地区两倍。非洲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石油。非洲增长动力部分来源于初级商品的全球价格上涨，而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世界性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拉动，特别是中国和印度。

非洲是印度的近邻毋庸置疑，中印非之间的友好贸易往来是由“丝绸之路”连接。“丝绸之路”最早是从四川、云南、缅甸、印度之间开始的，后来由陆海两路伸延到欧洲与非洲。中国早在西汉时代就有商人从广东航海到印度次大陆的“黄支”（大概今天的孟加拉国）及非洲的“已程不国”。明朝郑和下西洋，庞大的舰队在印度沿海各国进行外交与贸易活动，还有船只访问与沉没在非洲。当今世界，交通发达，距离缩短，世界各国彼此“互联互通”，中国与印度和非洲国家加强往来也都是自然现象。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年能源需求速度均以两位数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而石油依存度接近60%。目前中国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非洲两大地区。近年来中东局势不稳，在中东地区参与大型能源项目开发面临诸多风险。因此，非洲成为最受中国青睐的能源开发地区。非洲被誉为“第二个中东”，其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233.8亿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12%，到2010年有望上升到20%。目前非洲大陆原油日产量达800多万桶，约占世界原油日产量11%，到2010年，非洲石油产量在世界石油总产量中的比例有望上升到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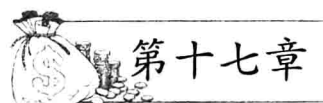
印度对于非洲战略也非常重视，印度的石油产量并不高，随着印度的经济起飞，能源的需求将更大，由于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中国一倍以上，有关机构预计到2025年，印度对石油的消费水平，将和中国相当，但这个占世界人口总数16%的国家，其石油储量只占全球的0.4%。有专家预计，在海外油气资源领域，

不久的将来，印度将是中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现在中东的石油早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控制，虎口拔牙式的战争和与虎谋皮式的谈判都是不现实的，能够带来资源想象力的只有非洲大陆了。

与中国相比，印度角逐非洲也有巨大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印度的经济也正在崛起，发展速度不亚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印度的快速崛起在一段时间后必然带来国内基础建设的高峰，会造成对于钢铁、有色金属等资源的巨大需求，就如现在中国的钢铁等资源需求让世界惊叹一样，印度经济发展了，一定也是如中国这样急切地全球寻找资源，反而发达国家现在对于这些资源的需求没有那么紧迫。在这样的争夺中中印在世界的对撞就要升级了，中印未来的资源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此一定要有深刻的认识。

其实，中国与印度两国之间的竞争已经展开。首先，中非贸易正处于激增阶段，中国是非洲最大的亚洲贸易伙伴，2005年中非贸易额达398亿美元，而印非贸易额只是中非贸易额的一个零头。其次，高层之间缺少紧密联系也对印非关系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中国领导人频频出访非洲，先后与非洲各国签署了156项文化交流协议，超过50多个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非洲交流，超过170多个非洲文化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印度高层领导人对非洲的访问稀少，上次印度总理对非洲最大的国家尼日利亚进行访问要追溯到1962年。中国是更有活力的非洲出口目的地市场。1999年至2004年，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年增长为48%，对印度为14%。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出口目前有10%是输出到中国，有3%左右输出到印度。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产品输入国。中国政府最引人注目的决策是，《中国的非洲政策》白皮书于2006年1月在北京发布。印度裔及欧洲裔移民已经实质性地融入非洲工商界，中国在非洲进行投资，大部分是外派高级管理人员前往非洲大陆。中国企业与印度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别，非洲中资企业在业务战略上谋求加强对生产链的全程控制，企业属于独立王国类型，溢出效应较为有限。印资企业的非洲投资战略则是更多地融入本地市场，在经营中大量采用非正式渠道，甚至融入当地政治经济的层面。

一个大国的崛起，竞争最激烈也最关乎国家兴亡的就是与同等级别国家的竞争，同级别的国家发展了一定成为你的死敌，而比你发达程度高很多的国家和显著不如你的国家，反而与你打不起来。从当今世界的资源紧缺情况来看，这个世界的资源是不可能同时保证中国和印度这样超级人口大国的经济需求。而非洲是世界唯一可以有想象空间的地方，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有赖非洲的资源，非洲部族的复兴也有赖于这些资源，而这些资源又有西方殖民者在此长期经营，非洲即将发生的资源争夺一定是极其惨烈的，我们与印度竞争的成败才是民族复兴最大的考验。



世界能源的现状、危机与开发利用

日益激化的全球能源问题

众所周知，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人口问题的实质，在于人口的增长超出了自然资源的承载负荷。人类对自然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和自然资源供给相对有限的矛盾，贯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同样，能源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时一事的产物，它是长期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激化的体现。如今，我们所利用的能源主要包括石油、煤、天然气、水电、风能、核能、太阳能等，其中绝大多数矿物能源属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条件。

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大规模、高强度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创造了灿烂的工业文明。然而，事态也难以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为了争夺对世界资源和能源的控制权，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成倍增长。1901 ~ 1997 年的 97 年间，全世界采出的矿物原料价值增长了近 10 倍，其中后 20 年为前 60 年的 1.6 倍。据 1950 年国家的统计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能源消耗成正比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 1000 美元时，人均能耗在 1500 千克标准煤以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4000 美元时，人均能耗在 10000 千克标准煤以上。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没有节制的大量消耗，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基础遭到了持续削弱。

随着各国对能源的需求量增大，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为了争夺世界资源及能源的控制权，持续了 40 多年的冷战。中东的石油，南部非洲丰富的黄金、金刚石及其他矿产，扎伊尔的铜矿等都成为超级大国争夺的对象，引发了一次又一次局部战争。冷战之后，独霸世界的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而这个战争的背后，当然是争夺石油！由此不难看出，人

类对资源及能源的争夺将长期存在，世界也永无安宁之日。尤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发生的两次席卷全球的能源危机，震惊了全人类。

然而，伴随着全球的能源危机的爆发，一系列相关问题也随机出现：

第一，全球资源及能源的供需矛盾不断发展，中长期资源及能源的供需形势日趋严峻。如果把视线从能源资源总量这一因素转向更深一个层次的能源结构、地域分布、政治环境等方面，便会发现能源世界仍是一道充满危机的难题。目前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了一大部分。且有 2/3 的世界石油储量集中在波斯湾地区。这一点令西方十分担忧，一直是各国的一块“心头病”。然而，在对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利用过程中，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生产和利用是形成局部空气污染以及产生酸雨、温室气体等地区性环境问题的根源。世界将难以继续过量承受超过临界值的污染物了，这些污染，是由总计达 20 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运行时的矿物燃料燃烧时排放出来的。目前尚无法处理这些每年向大气排放的 60 亿吨的碳，而现在这一数字还在继续增大。

第二，全球资源结构将面临重大调整，资源分配方式可能会出现重大转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得尖端技术领域将成为 21 世纪核心产业。被称为“太空金属”、“电子金属”、“超导金属”的稀有稀土金属将成为未来新兴产业的材料基础，世界社会基础资源结构面临着又一次重大转变。与此同时美国独霸世界资源的时代将告结束。各大国间为争夺下一世纪领导权而进行的以稀有金属为核心的世界资源争夺将进一步展开。

第三，全球未来资源及能源的争夺将更加激烈，局部战争难以避免。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获取与控制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水、能源和矿产的战争是国际紧张和武力冲突的重要因素。近代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31 个国家共 15 亿人口卷入了战争，战争中伤亡人数达 3100 万人。其中死亡 1000 万人，军费支出和战争损失共计 3877 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述数字均成倍增长。战争时间长达 7 年，参战的国家和地区超过 60 个，战争总伤亡超过 9000 万人。直接军费支出 1117 亿美元，物质损失 3 万亿美元。

实际上，资源这个全球性问题的存在绝非孤立，它总是同人口、环境、经济、社会等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构成当代全球问题的基础。而资源这个全球性问题，它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它是近年工业化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过度消耗的产物，并发展成为遍及地球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家的全球问题。进入本世纪以来，人口剧增与经济发展的压力，正在超过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基础所能承载的极限。

2008 年 4 月，日本《经济学人》周刊提前出版的一期刊登文章说，世界粮价急

剧上涨，固然有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市场混乱进而促使投机资金流入粮食市场等因素，但不能忽视供不应求造成世界粮食库存急剧减少这一主因。此外，这与近年来原油等资源类产品价格高涨也不无关系。今后，围绕着有限的粮食资源，很可能展开一轮争夺战。

在油价暴涨的背景下，世界已开始使用生物燃料作为汽油的替代品。美国已开始用玉米为原料生产乙醇和用大豆油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巴西也在大量利用甘蔗生产乙醇。由于粮食生产无法满足旺盛消费，世界粮食市场供求关系日益紧张，整体库存急剧下降，导致全球粮价持续攀升。今后，各国之间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争夺战将愈演愈烈。迄今一直作为普通商品的粮食，因此而开始具有政治商品的特征。

随着自然资源迅速耗减，越来越多的物种濒临灭绝，矿物能源日渐枯竭，矿产资源严重短缺，海洋健康损害严重，未来资源宝库面临浩劫。淡水资源不足，森林资源持续赤字，水土流失加剧，气候变化异常，各类灾害加剧。人类所面临的已是一个满目疮痍、不堪重负的星球。

巴基斯坦出现严重的“电荒”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南濒阿拉伯海，东、北、西三面分别与印度、中国、阿富汗和伊朗为邻，是一个能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全境 3/5 为山区和丘陵地，南部沿海一带为沙漠，向北伸展则是连绵的高原牧场和肥田沃土。巴基斯坦属于热带气候，气温普遍较高，降水比较稀少，年降水量少于 250 毫米的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 3/4 以上。

巴基斯坦是一个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然而面对较快的经济发展，巴基斯坦能源紧缺的问题再一次暴露出来。一是缺油，其占能源总耗约 30% 的原油主要依赖进口；二是天然气虽有一定储量但消耗量也大，约占整个能源消耗的 50%，不能满足其经济发展增长所需。巴重视发展水电但开发不足，本国生产的水电电能只占总电能能耗的 13%，煤电和核电在其能源构成中加起来所占比例不到 7%。

此外，巴基斯坦地区的能源产能较低，巴基斯坦能源产业技术也比较落后，勘探、开采、提炼、输送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使得产能效率较低。2004 年、2005 年、2006 年各财年，它的 GDP 分别增长 5.1%、6.4% 和 8.3%，其对能源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对能源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对能源的进口依赖度较高，年进口原油约 780 万吨，石油制品约 520 万吨，煤约 280 万吨，总金额约超过 50 亿美元，约占财年进口总额 30%。能源供应不足已成为今后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2007年夏天,巴基斯坦迎来空前的“电荒”。据报道,巴基斯坦遭遇严重电力短缺,每天断电2~12个小时,在多个城市已经引发数起骚乱。巴基斯坦官员承认,目前国内电力供应比需求少了将近20%,短缺的电力大约为3000兆瓦,相等于25个发电厂的发电量。而这些发电厂因为技术问题、燃料短缺和配电系统老化等问题无法投入运作。巴基斯坦水电发展署一名高官形容称:“这是巴基斯坦史上最为严重的能源危机。”

正是巴基斯坦国家的先天缺陷和后天不足,使得巴基斯坦国危机连连。自2008年初以来,巴基斯坦已经面临严重能源危机。不但汽油、柴油、煤等燃料价格飞涨,而且全国各地每天都在拉闸限电,就连首都伊斯兰堡也不例外。仅以位于市中心的伊斯兰堡市F7区为例,每天早中晚共停电6次,每次1小时。在其他地区,拉闸限电的现象更为频繁。卡拉奇及其周边地区电力短缺最严重,市内每天停电9个小时,周边地区拉闸限电的时间则超过12小时。

这种能源短缺的状况令人苦不堪言,电力短缺也成为巴基斯坦国内主要不安定因素之一。全国性的电力短缺情况已十分严重,在卡拉奇等商业重镇,民众因频繁断电示威不断,已演变成多起暴力冲突。有分析说,缺电问题对政府应对危机的考验可能超过处置“大法官事件”等政治事件,处理不好将引发不测事件。这一涉及广泛的民生问题暴露出某些政府部门管理低效。据说,巴基斯坦有25家发电站因技术问题、燃料短缺和配电系统老化而关闭,造成至少2000兆瓦的电力短缺,是缺电问题的主因。

巴基斯坦政府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都收效甚微。截至2008年,因为巴基斯坦水坝水位下降,以及布托遇刺案后发生的暴力事件破坏了两条主要电力线路,致使巴基斯坦的电力供应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2008年1月1日,信德省的两条主要输电线路在爆炸中被破坏,造成电力供应缺口1000万亿瓦。突如其来的停电,霎时几乎让所有产业陷于瘫痪,所造成的损失将会表现在出口减少和进口增长等方面。巴基斯坦发电总装机容量为19845万亿瓦,其中1/3是水力发电,其余主要靠天然气和燃油发电。而巴基斯坦电力公司表示,水力发电厂的水位与去年相比下降了32%之多。

2008年1月2日,政府下令所有炼钢和卷钢厂即日关闭,同时要求数百家纺织厂减少生产,目的是省下850万亿瓦的用电,从而对工业造成了巨大损失。2008年开始的电力供应不足,刺激钢铁材料价格提升25%,也令政府的收入大为减少,因为钢铁产业原本每月可向政府缴纳12.8亿卢比(2050万美元)的销售税。巴基斯坦国内市场对钢铁产品的需求量约为720万吨,其中卷钢需求450万吨,扁钢需求

270 万吨。炼钢厂停业所导致的钢材供应缺口，使得不少加工厂难以为继，进而影响了建筑行业。受钢铁行业停顿影响的失业总人数高达 39 万人。

2008 年 7 月，电力价格的上调，导致纺织工业大伤元气，现在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同时银行利率从 7% 提高到 15%，纺织企业也过上了雪上加霜的日子。

为应对当下的能源危机，巴基斯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新政府上台后加快了水电站、火电站和核电站的建设，同时与伊朗和印度等国商讨购电事宜，在全社会范围内号召民众节约能源，伊斯兰堡街头已挂满了“节约电力、支持新政府”的宣传标语。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巴基斯坦的能源危机既有全球大形势的影响，也有本国能源企业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因。在未来几年内，巴基斯坦可能仍将面临电力紧张问题。

中国作为巴基斯坦的友好邻邦，也为巴基斯坦解决能源危机，特别是克服电力短缺付出了巨大努力。仅葛洲坝一个企业就为当地提供了 1000 多个就业机会，帮助山区里的许多年轻人，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提高劳动技能。2011 年，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了尼勒姆·杰勒姆水电工程的大型项目，这个项目将见证着中巴传统友谊，把工程建设好，能够有效缓解巴基斯坦当前电力供应紧张局面，巴基斯坦人民对此寄予厚望。

欧盟的日子也不好过

欧共体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12 国面积为 236.3 万平方千米，人口 3.46 亿。1992 年欧共体 12 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68412 亿美元。欧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1992 年外贸总额约为 29722 亿美元，其中出口 14518.6 亿美元，进口 15202.7 亿美元。

欧盟成立后，经济快速发展，1995 年至 2000 年间经济增速达 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1997 年的 1.9 万美元上升到 1999 年的 2.06 万美元。欧盟的经济总量从 1993 年的约 6.7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02 年的近 10 万亿美元。

目前，欧盟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的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欧盟不仅因为新加入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而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容量，而且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的国家集团和商品与服务出口的国家集团，再加上欧盟相对宽容的对外技术交流与发展合作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欧盟可以称得上是个经济“巨人”。2010 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 16.106 万亿美元，

人均 GDP 32283 美元。

随着欧盟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欧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方，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者，能源需求有一半左右需要进口，其消费量占世界能源总消费量的 15% 左右。

欧盟可谓是个耗能大户，其人均耗能量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虽然欧盟各成员国已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能源生产、运输、分配和科研等一整套体系，特别是核能工业技术和生产居世界领先地位，基本保证了其能源安全供给，但是矿物燃料资源的逐渐枯竭、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环境保护对能源生产更加苛刻的限制、能源市场国际化的加剧等众多的因素正在威胁着欧盟能源的安全供给。

世界经济的发展有一个最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市场国际化增强。从 1993 年欧盟统一市场的开通开始，1994 年东、西欧能源宪章的签定，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皆反映了世界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深刻变化。

欧盟能源产量的减少，将使欧盟的能源进口从 2007 年的占其总耗电量的 50% 增加到 2020 年的 75%，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更为突出。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每年以 4% ~ 5% 的速度递增，欧盟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的负担无疑将会越来越重。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其能源需求势必大幅度增加，这些国家又能有多少能源供应欧盟？欧盟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皮耶巴尔格斯也多次强调：“任何形式的依赖，尤其是能源依赖都将使欧盟付出沉重代价！”因此，如何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成为欧盟的当务之急。

自 1992 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国际会议后，各国政府、国际机构都已积极行动，支持大会的决议，纷纷制定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计划，承担自己的国际义务，为建设一个无公害的、清洁的世界而共同奋斗。欧盟承担了自己应尽的义务，于 1993 年制定了欧盟《可持续发展规划》。经济发展需要能源，能源生产又不能破坏和污染环境。在这种新形势下，欧盟将面临重新调整能源工业结构、加大科研与技术力度、寻求新的能源开发途径的考验。

然而，近年来，由于石油价格猛涨以及有些产油国局势不稳、特别是俄罗斯能源争端造成一些欧盟成员国能源供应量下降等因素，促使欧盟国家重新审视其能源政策。

2006 年新年伊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争端导致中欧和西欧国家天然气供应中断，促使欧盟将能源政策确定为需要优先考虑的政治问题。

“未来 20 年内欧盟超过一半的能源供应将是洁净能源，包括核能在内。”2006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向欧盟提交的能源远景规划草案中曾强调，应减少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的依赖。

长期以来，欧盟所需天然气中约有 30% 依赖从俄罗斯进口，其中大多途经乌克

兰。包括斯洛伐克、希腊、捷克共和国在内的一些欧盟成员国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奥地利的依赖程度略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也是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大国，俄罗斯天然气在这些国家的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42%、25% 和 30%。欧盟委员会的分析显示，到 2020 年欧盟 2/3 的能源需求将依赖进口，其中 3/4 的天然气需要依靠进口来满足。

2011 年 12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2050 能源路线图”，即实现欧盟到 2050 年碳排放量比 1990 年下降 80% ~ 95% 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据欧委会介绍，欧盟将通过 4 种路径的组合来实现这一目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使用核能以及采用碳捕捉与储存技术。

在路线图中，可再生能源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欧盟预计，到 2050 年其可再生能源占全部能源需求的比例将从目前的 10% 上升到 55% 以上。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欧盟同样雄心勃勃，希望大力发展节能技术以降低能耗。欧委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京特·奥廷格说：“只有采用新的能源模式，才能保证我们的能源系统在未来具有竞争力与可持续性。”欧盟预计，到 2030 年其初级能源的需求将比 2005 年的峰值下降 16% ~ 20%，到 2050 年时下降 32% ~ 41%。至于核能，欧盟对成员国是否使用核能持中立态度，但其设计的一个情景预计核能仍将在未来的能源版图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即到 2050 年核能占全部能源需求的比例仍将维持在 15% ~ 18% 之间。

欧盟还将大力发展碳捕捉与储存技术，特别是当核能及可再生能源不能大量替代现有化石燃料的情况下，更会通过碳捕捉与储存技术实现减排的目标。欧盟预计，碳捕捉与储存技术在化石燃料使用比例较高的情景下将有助于减少 32% 的碳排放，在另一些情景下将有助于减少 19% ~ 24% 的碳排放。

从能源成本结构看，欧盟将从目前的高燃料成本、低设施支出转向高设施支出、低燃料成本。设施支出包括电厂、电网、工业能源设备、加热及制冷系统、智能电表、绝缘材料、效率更高的交通工具、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等。欧盟预计 2011 ~ 2050 年，用于电网系统的建设支出将高达 1.5 万亿 ~ 2 万亿欧元，同时化石燃料进口的支出将大大低于目前的水平。

美国能源的“新生命线”

1909 年，美国第 26 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卸任后，带着猎枪前往非洲大陆猎奇。当他返回美国时，满载着自己射杀的狮子、大象和犀牛的样本。此后，只有卡特、老布什和克林顿等几届美国总统踏上过非洲大陆的土地。在美国人眼中，非洲大陆是充

满危险的蛮荒之地。因此，这片广袤却充满战乱的大陆也被美国领导人遗忘了。

此后，非洲大陆等了 70 年，终于迎来了第 46 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 1979 年对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进行的正式访问。卡特的访问令美非关系升温，但随后的伊朗人质危机使卡特政府无暇他顾，非洲大陆再次淡出美国外交的重点。1993 年 1 月，老布什在结束总统任期前也对索马里进行了“闪电式”访问。

1998 年 3 月，比尔·克林顿率一个近千人的庞大代表团对加纳、乌干达、卢旺达、南非、博茨瓦纳和塞内加尔 6 国进行了“旋风式”访问，堪称迄今为止历届美国总统中最为风光的非洲之旅。由于克林顿政府在外交上开始关注非洲，并给予了一定的实质性援助，所以非洲国家对克林顿十分热情。

其实，美国对非洲的战略是随着非洲政治经济地位以及美国在非洲战略利益的变化而发展的。从冷战结束初期，非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到克林顿政府对非战略重心由政治逐渐转向经济，直至当前，美国在继续对非洲援助的同时，把加强与非洲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作为对非战略的基础，加大对非洲的关注和渗透，并注重通过发展和外交保障美国的民主和安全利益。

2001 年 911 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国际安全形势变得更为复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一时期，非洲在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和能源安全利益迅速提升。美国担心非洲大陆的一些特有条件，包括混乱的边界、地区冲突、武器泛滥等，将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的新的温床，因而将非洲作为其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

此外，911 事件使美国认识到，过分依赖中东石油存在较大风险，因此更加重视石油供应多元化，保障其能源战略安全。非洲发现大量优质油气资源，这些资源离美国更近，运输线路相对更短，并且从非洲到美国东海岸运输线路相对于从亚洲到美国西海岸运输线路更为安全。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评估，2015 年，美国从西非的石油进口在石油进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将从 2000 年的 16% 上升到 25%，美国对非洲石油领域投资占其对非洲总投资的 2/3。正如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沃尔特·坎斯坦纳所述：“非洲石油对我们来说是国家战略利益，并将随形势发展而变得日益重要。”

面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小布什政府对非洲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一方面将非洲视为反恐的重要合作伙伴，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高度重视美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利益，继承和发展了克林顿政府加强双边经贸关系的对非战略。除了继续实施克林顿政府制定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外，小布什政府还提出一系列对非洲援助和经贸合作计划，如千年挑战账户、非洲全球竞争力计划、总统艾滋

病紧急救济计划、总统防治疟疾行动计划，以及水行动计划、结束非洲饥饿计划、刚果盆地森林伙伴计划、清洁能源倡议等四个可持续发展计划；建立“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贸易与经济合作论坛”，搭建双方定期进行贸易和投资磋商的平台；相继推出《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修正案，扩大对非洲国家提供的经济贸易优惠等。

近十多年来，非洲经济增长较快，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美国打破法国和英国对非洲传统市场的垄断，对非贸易明显加快，2006年的对非贸易总额已近900亿美元，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另外，非洲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更为美国所重视。美国媒体认为，非洲地区的石油相当重要。非洲，这个在美国外交中备受冷落的角色，如今在华盛顿决策者心目中的战略重要性正在日益提升，个中原因就是石油。

美国2/3的石油需求依靠进口，如今大部分是靠沙特阿拉伯、墨西哥、加拿大和委内瑞拉供应。不过，非洲国家在这个名单上的地位开始上升。尼日利亚现在是美国第五大石油供应国，安哥拉位居第七，这两个国家打算大大提高生产能力。尼日利亚是非洲唯一的OPEC成员国，在2007年之前，其日产量达到300万桶。据报道，尼日利亚现在正考虑脱离OPEC；刚刚实现和平的安哥拉，预计在今后五年内将石油生产能力提高将近50%；石油生产小国赤道几内亚计划将其石油产量提高两倍，新的石油资源不久也将投产；塞舍尔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认为，它们在几内亚湾发现了蕴藏量巨大的近海油田。目前，埃克森—美孚公司正在铺设一条耗资37亿美元的输油管道，把乍得新的石油供应输往喀麦隆的大西洋海岸。乍得的这个项目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私人投资。谢夫隆—德士古石油公司也计划在今后五年内投资200亿美元，扩大其在非洲的石油生产能力。

美国副总统切尼说，非洲正在迅速成为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地。几内亚湾正在成为美国的“一条新的生命线”。因此，保障那里的石油和天然气安全生产和运输，已成为美国的重要关切之一。

众所周知，小布什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发动的反恐战争既耗损了美国的经济实力，也严重透支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对非战略上，继承了以往美国政府以加强经贸联系为主的对非战略，在继续对非洲援助、加强对非洲投资力度的同时，通过经济、政治、外交等途径在非洲推行其民主和良政理念。为了表示对非洲的重视，2009年7月10日，奥巴马对西非国家加纳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并阐述美国新政府对非政策。在访问加纳过程中，奥巴马总统利用“民主、机遇、健康、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来阐述美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承诺美国将继续对非洲援助，支持发展，为更多人创造机遇，同时强调非洲国家应致力于推行“良政”。在安全领域，奥巴马认为发生

在非洲的冲突对全球安全构成挑战，美国将借助外交、技术协助和后勤支持与非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明确表示美国非洲司令部是为了应对冲突对非洲乃至世界带来的共同挑战，加强美国、非洲和世界的安全。

俄罗斯用能源“套牢”欧洲

苏联解体后的头几年，国际石油市场原油价格一直在低水平徘徊。1991、1997 年，国际石油价格一直处于 19 ~ 20 美元一桶的水平，1993、1994 年为 15 美元左右一桶。低油价导致了俄罗斯的财务危机，企业大量拖欠款项，国内社会矛盾迅速激化。1998 年，当国际市场俄罗斯石油价格跌到 11.83 美元时，俄罗斯再次爆发了经济危机，最后迫使叶利钦不得不在 1999 年底辞职。普京当政后，国际石油价格一路攀升，2005 年最高曾达到 75 美元一桶。上帝就是如此眷顾俄罗斯，不仅给了它茂密的森林、浩瀚的湖泊，还给了它丰富的油气和各种矿物资源。随着美国对伊拉克开战，国际油价一路飙升，至今已疯涨到每桶 140 美元左右。俄罗斯是走运的，依靠石油出口获得巨额美元，政府不仅补发了拖欠多年的工资和养老金，偿还了巨额外债，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而且经济连年增长，国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和支持率持续大幅走高。

曾几何时，俄罗斯失去大国尊严，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在与美国和西方打交道时一再让步，成了世界上的二等公民。经济上的“咸鱼翻身”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使俄罗斯逐渐找回了失去的尊严，大大刺激了其重返国际舞台的决心。俄罗斯通过发展资源经济，尤其是制定新的能源战略，鼓励和支持能源工业发展，不仅巩固了能源工业在世界能源领域中的地位，还大大加强了在国际上的外交影响力。

2008 年，当时离正式卸任俄罗斯总统一职仅剩不到 4 个月的时间的普京，对俄罗斯政务丝毫没有流露出懈怠之意，也不因马上就要离开克里姆林宫而黯然神伤。相反，普京目前正忙着打出一套“能源组合拳”，又一次游刃有余地与欧洲天然气用户玩起了“管道战”。

2008 年 1 月 17 日至 18 日，普京对保加利亚进行了访问。有人说这很可能是普京此次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出访，所以他此行意义不一般。的确，普京通过此次行拿下了“铺设从中亚和里海地区向欧洲输送能源管道的重要门户”——保加利亚。

在普京访保期间，俄保两国签署了 3 项重要能源协议：共同铺设“南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协议、《布尔加斯—亚历山德鲁波利斯输油管道项目合作方成立国际设计公司的合同》和关于新建“贝列内”核电站的协议。这些能源协议的签署得到了保加利亚官方的高度评价，保总统珀尔瓦诺夫说：“保俄两国签署的协议为两国关系

带来了积极的和质的突破。”而保总理斯坦尼舍夫则称：“这些协议实施后，不仅给保加利亚，同时也给巴尔干地区的能源安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样，俄罗斯完成了对巴尔干地区能源管道的部署，普京在开展能源外交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拽住保加利亚后，普京又继续积极游说塞尔维亚。1月25日，俄罗斯工业和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在克里姆林宫与塞尔维亚基础设施部长伊里奇签署有关石油天然气领域的政府间合作协议，俄总统普京、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以及访俄的塞总统塔迪奇和总理科什图尼察出席了仪式。

据悉，俄塞能源合作主要内容有三：其一，塞尔维亚将加入南部天然气管道项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从南部天然气管道中向北分出一条主要支线，它穿过塞南部地区，向欧洲供气；其二，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出资5.86亿欧元收购塞尔维亚石油工业公司51%的股份，并承诺在2012年前向NIS（国家创新系统）投资大约7.3亿美元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其三，俄在塞境内兴建地下天然气储备库，将塞建成俄能源向南欧供应系统中的中央运输枢纽。

实际上，加强俄欧间能源联系、扩大对欧洲国家天然气出口规模，是俄罗斯能源战略的一个优先考虑。然而，由于天然气管道过境第三国而使俄长期以来受制于人，特别是乌克兰、波兰以及前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同俄龃龉不断。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加紧与德国磋商并开始修建不过境第三国而直达进口国的“北部气流”计划。

在“北部气流”天然气管道项目中，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拥有51%的股份，而德国E.ON（意昂集团）和巴斯夫公司麾下的Winter shall（温特斯豪公司）各拥有24.5%的股份。据悉，荷兰Gasunie（国家天然气管网作业公司）将通过从德国两公司各购买4.5%的股份来获得这个旨在建造一条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中的9%的股份。

的确，俄罗斯在欧洲铺设天然气管道网，普京的“管道战”，为其赢得了更多政治上的主动权。俄在确立其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优先方向、战略目标及实施取向时，首先考虑到双、多边关系中能源合作的地缘政治意义。一方面，一些涉及国际能源合作的决定，如里海油气的开采与运输项目，俄罗斯的大型投资项目的采纳，等等，同俄罗斯的长期地缘政治利益均具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保障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对外经济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涉外政治问题的解决。地缘政治利益和对外经济利益的相互交织和错综复杂，充分体现在了俄欧、俄美之间的能源对话以及远东和西伯利亚大型能源项目的实施中。俄罗斯正是利用了手中所拥有的能源这张牌，在国际能源市场一波又一波的良好行情下，既为自己谋得了超额的经济利益，又扭转了自己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

而在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等国的合作中，俄罗斯也开出了非常有诱

惑力的条件。一方面，合资公司的股份均为五五开，从而打消了这些国家担心俄罗斯以大欺小的顾虑；另一方面，俄罗斯还允诺投资兴建大型地下储气站，此举提升了这些国家在欧盟能源网络中的地位。之后，俄罗斯开始采取更积极、更活跃的外交政策，除了在欧洲加强同德、法等国的合作外，在中东和拉美也展开了积极的外交，诸如在与伊朗的谈判中，俄犹如伊朗核问题不可绕过的调节者，它积极阻止对伊朗进行国际制裁；在独联体地区与美进行公开博弈，成果显著。

谁在散布“中国能源威胁论”

最近几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1993年中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的石油，并有逐年递增的趋势，这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国际石油价格大幅度波动，持续攀升。国外一些势力将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进口石油增长，甚至有人鼓吹“中国能源威胁论”，以“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中日东海冲突”为导火索，毫无根据地说中国将争夺世界油气资源并导致冲突。

实际上，这些说法与事实是严重不符的。美、日等国抛出的“中国能源威胁论”，究其原因，只不过是想从能源角度出发，来鼓吹中国对全球（其实是它们自己）造成了威胁，其主要目的仍然不外乎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中国是维护世界能源安全的积极因素。

一直以来，美、日都是消费和进口石油的头两号国家，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石油的消费和进口也日益增加，并大有赶超美、日的势头。面对这种情形，美、日当然倍感不悦，于是便及时抛出了“能源威胁论”，企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获取石油的速度。

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按照这样的速度持续发展，长此以往一定会削弱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正如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邓肯·亨特曾经说过的，如果中海油得以成功收购优尼科，那么，中国对美国在中亚地区利益的影响力将大大增强。从里海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的输油管道，优尼科都有投资。也就是说，如果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就会增加，从而严重影响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更无法容忍的事情。

而对于日本来说，日本是不折不扣的经济大国，但也是一个资源小国。为了得到足够的资源，日本可谓是不择手段。近年来，中国经过勘探发现东海蕴藏着大量的石油资源。根据相关国际法，东海的石油应完全归中国所有，但日本根本不理睬

什么国际法，声称拥有东海石油的主权。对有争议的海域，中国建议搁置或共同开发。然而，日本不但不接受中国大度的建议，还完全不顾中国的反对，开始单方面进行海底资源的调查，最近甚至批准一家日本公司进行开采。为了使其这一行动显得更加合理化，日本找到了“中国能源威胁论”这么一个自认为完美的借口。

其实，世界人民的心里都十分明白，“中国能源威胁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对能源的需求也不断增长。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政府坚持立足国内，开源与节约结合、节约优先的能源方针，一方面千方百计增加能源生产，一方面千方百计降低能源消耗，较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1978 ~ 2005 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年均增长 5.16%，支撑了 GDP 年均 9.6% 的增长速度。中国能源自给率一直保持在 90% 以上，比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高 20 个百分点，比美国高 30 个百分点左右。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发展中的能源问题，并没有对世界能源造成威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次，中国既是能源消耗大国，也是能源生产大国，进口只占中国能源消耗的一小部分，中国解决能源主要立足于国内，目前中国的能源需求总自给率高达 94%。因此“中国的发展，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世界能源安全造成威胁”。

再次，中国虽然是能源消费大国，但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和进口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2005 年，人均一次能源消费，世界平均为 1.65 吨油当量，日本、美国分别为 4.13 吨和 7.97 吨油当量，而中国仅为 1.18 吨油当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4、日本的 1/4、美国的 1/7。因此，有些人“随随便便”地说消费水平和进口水平低的中国对世界构成了威胁，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能源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国际合作而获得能源安全保障，需要互通有无，加强合作。全球石油安全的关键，不在于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石油消费会不会增长，而在于世界石油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在于人类是否能够通过开发替代石油和新能源来满足对能源的需求。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测算，2020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达到 52 亿吨，比 2005 年增加 13.4 亿吨，而同期石油供给能力将达到 53.8 亿吨，增加 14.8 亿吨，世界石油市场供略大于求的格局不会改变。

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受到石油价格暴涨的冲击，国际社会加强了替代能源和新能源的研究开发，并取得积极进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煤制油、生物质燃料油以及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氢能等都会有令人振奋的发展，人类将满怀信心地迎接后化石能源时代的到来。

能源危机下的各国应对之策

能源是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能源的使用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导致了全球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全球变暖、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等现象都给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些都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面对日益加剧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问题，各国政府都纷纷采取相应措施，以化解这场后果严重的灾难。目前，各国的能源战略均反映了两大明显的政策导向：一是鼓励开发利用新能源来替代传统石化能源；二是倡导节能降耗，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现在以美、英、德、日四国为例简单介绍一下各国在能源危机下的应对策略。

一、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其人均能源消耗量居世界之首。随着世界能源的日益匮乏，节约能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

2005 年 8 月，美国公布了能源新法案，在鼓励美国本土能源生产的同时，也从立法上提出了促进消费者节约能源，使用清洁能源的可行措施。

新法案的重点是鼓励企业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无污染能源，并以减税等措施，鼓励企业、家庭和个人更多地使用节能和清洁能源产品。该法案提出，在未来 10 年内，美国联邦政府将向全美能源企业提供 146 亿美元的减税额度，以鼓励石油、天然气、煤气和电力企业等采取清洁能源和节能措施。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阳光，缩短电灯照明以及家电使用的时间，该法案规定，从 2007 年起，美国将原有“夏令时”的时间再延长 4 周，使每年的“夏令时”长达 7 个月。

为减少汽油消费，美国政府提出了新的轻型卡车油耗技术标准，2011 年将全面实施。预计这一计划的实施最终可以使美国每年减少汽油消费 1000 亿加仑。

不仅如此，对于消费者，新法案还推出了 13 亿美元的个人节能消费优惠预算方案，并提出消费者购买家用太阳能设施开支的 30% 可以用来抵税。对购买汽油—电力混合动力汽车的消费者和在住宅中使用节能玻璃、节能电器的居民减免税收。居民在住宅中更新室内温度调控设备、换节能窗户、通过维修制止室内制冷制热设施的泄漏等，也可获得全部开支 10% 的减免税收优惠。

美国这一法案的实施，通过技术和政策的支持，节约现有资源，合理利用可再生资源，从小做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保护全球环境。

二、英国

英国曾是欧洲的石油生产大国，经过多年开采，逐渐由一个石油输出国变成进口国。目前，英国所需煤炭半数依赖进口，面对越来越紧张的能源形势，英国政府通过提供更好的信息支持、政策激励和法规管制，鼓励更多地节约能源。

2003年9月，英国政府建筑部门实施了一项“绿色建筑”计划，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在今后10年内建设100万栋绿色建筑。这种新型住宅采用太阳能电池板、洗澡水循环处理等节能装置，所耗费的能源仅仅是传统建筑的10%。不仅如此，在2000到2004年间，英国政府共拨款6亿英镑，帮助全国400万燃料贫困家庭改善能源利用效率。

为加大节能力度，英国还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立法和政策来引导节能。为鼓励家庭节能，英国政府还实行了对采用节能锅炉、节能家用电器以及节能灯的家庭提供补贴的政策。为鼓励商业和公共部门实施节能措施，政府开征了气候变化税，对企业节能提供补贴，要求私人天然气和电力供应商作出能源效率承诺，促使企业向可持续和低能耗发展。此外，英国政府自2001年起每年拿出5000万英镑建立“能源效率基金”，鼓励企业节约能源。

三、德国

德国是一个能源紧缺的国家。为了摆脱对进口和传统能源的长期依赖，该国近年来将能源政策重点放在了节约传统能源和发展新型能源两个方面，以期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发展。

德国实施以节电为重点的节能战略。根据《欧盟能源消耗标示法规》，德国制定了产品能耗标签制度，对市场中销售的家用电器进行节能性能分级，规定电器上必须贴有节能等级标签。实践证明，消费者普遍愿意购买更加节能的产品，这也促使电器生产厂家不断开发新的节能技术，不断推出更加节能的产品。不仅如此，德国政府积极鼓励居民和企业节约能源。2002年起，德国开始对汽油、低硫柴油和电力消费征收新的生态税。

对于房屋建筑的节能德国政府也十分重视。2002年，德国颁布《节省能源法案》，法案规定，新建筑必须符合最低能耗标准。通过该法案，德国对大量的老建筑采取了更换设备的措施，极大地减少了能源消耗。多年来，政府通过制定和改进建筑保温技术规范等措施，不断发掘建筑节能的潜力。

德国政府极为重视提高全民的节能意识。目前，德国大约有300个提供节能知识的咨询点用于向大众普及节能知识。德国能源机构负责组织全国的节能知识宣传，并设有专门的节能知识网站。

四、日本

日本是一个本土能源非常匮乏的国家，几乎所有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都依赖进口。因此，日本政府在节约能源方面十分重视，并不断通过立法来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1979年，日本颁布《节约能源法》。该法根据能源消耗的多少对能源使用企业进行分类，要求高耗能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节能管理机制，并任命节能管理负责人，向国家提交节能计划，经审核后，定期向相关部门提交节能情况报告。对于节能达标的企业，政府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而对于未达标的企业，政府会公布该企业的名称，并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通过各项严格的措施，日本大幅度提高了企业的单位能耗产出。

此外，该法对办公楼、住宅等建筑也提出了明确的节能要求，制定了建筑物的隔热、隔冷标准。从2003年4月开始，新建或改建项目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节约能源的具体措施。在2007年3月底之前，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办公楼和住宅等，必须将建筑物的热、冷损失系数降低20%以上。

加快完善能源储备机制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历来备受世界各国所重视。对一个国家来讲，能源是工业的血脉，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随着武器系统杀伤力、精确度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对能源的消耗也成倍增加。因此，国家必须建立自己的造血机制，建立自己的血库，才能保证血脉畅通，才能维持国家实力稳定上升。

一、美国

1973年因为中东战争所产生的石油危机，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对西方国家实施禁运，导致美国国内石油产品供应紧缺、价格飞涨，最终使美国经济陷入长时期的严重衰退。这一次吃亏了，美国也长记性了。之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倡议下，于1974年成立了国际能源机构。美国前总统福特于1975年12月22日签署了《能源政策和储备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授权美国能源部建立和管理全美战略石油储备，目的是为了在此后发生类似事件时，可以对美国能源市场起到保护和缓冲作用。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整个建立过程耗时近10年。从1976年开始建设，1977年第一批石油开始入储，到1986年石油的储备量达到了5亿桶。以后一直稳定在5

亿~6亿桶之间，最高年份是1994年，达5.92亿桶，可供应82天。1999年的石油储备为5.67亿桶，此后，克林顿政府战略石油储备政策发生了一些改变，几次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以调控石油市场和平抑油价。到2000年底，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5.41亿桶，为1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如今美国拥有7.0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从1976年到1999年底，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累计投资212亿美元，其中159亿美元用于购买原油，53亿美元用于储备设施（包括近4亿美元日常经费开支）。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设计容量达7亿桶，石油储备平均成本价格在每桶27美元以上。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政策又一次调整。布什政府认为，作为美国经济命脉的石油供应，一旦由于突发事件发生中断，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在2001年11月中旬，布什就下令能源部迅速增加战略石油储备，“为防止石油供应中断采取最大限度的长期保护措施”。目标是2005年将战略石油储备增加到7亿桶，达到目前战略储备能力的极限。

此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迅速增加，当年12月份即增加到5.5亿桶。到2002年底，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猛升到5.99亿桶，2004年3月又增至6.59亿桶，2005年7月份美国能源部的报告说，美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达到6.933亿桶，并将提前实现布什政府到2005年9月将之增加到7亿桶的目标。这也是该储备启动30年来首次接近“满仓”。

美国充足的石油储备库容和较为完善的决策体系，使得其战略石油储备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着稳定市场和应对供应短缺等重要作用。可见，完善能源储备非常重要。

二、德国

德国是世界上第五大能源消耗国，但其能源的天然储量除褐煤以外均相当贫乏，特别是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几乎为100%。

20世纪70年代，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德国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石油是德国人重要的日常消费品，因此消费物价指数持续攀升；另一方面，原油是德国诸多工业部门的主要原料，成本的上涨使相关企业生产大幅滑坡，造成失业增加。2004年德国石油消费量为1.24亿吨，天然气消费量926.8亿立方米。为摆脱对进口及传统能源的长期依赖，德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面调整能源战略，并建立了完善的能源特别是石油储备和应急机制。

通过提供国家补贴和低息贷款的方式，德国政府鼓励开发和使用水能、风能、太阳能及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以降低石油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德国《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电力公司必须以政府制定的保护价购买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目前，石油在德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已从1973年的55%降至38%。专家估计，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占德国总发电量的20%，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

到 50%。同时德国政府通过提供优惠税率鼓励使用天然气，目前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使用比率已由 1993 年的 4% 提升到 10%。

不仅如此，德国政府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参与到国际能源机构框架内的多边合作之中。德国政府积极建立地区性及国际性能源合作机制，鼓励德国能源企业到国外发展，通过贸易及投资等形式与石油开采国建立相互依赖关系。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进口的石油 2/3 来自中东，如今已降为 20%。目前，德国从四大洲近 30 个国家进口石油，最大供应国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不足 20%。

截止到 2010 年，德国的石油储备规模已经发展到 4000 多万吨，储备可用天数约 120 天，储备品种包括原油和成品油。此外，炼油企业、石化公司、电力公司根据自身需要和实力均建立了各自的生产性和商业性石油储备。

三、中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基本能源消费占世界总消费量的 1/10，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然而中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3 年人均石油开采储量只有 2.6 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 1074 立方米，人均煤炭可采储量 90 吨，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 11.1%、4.3% 和 55.4%。

长期以来，能源问题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国家能源安全及能源管理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目前正处于由周转型储备向战备型储备转变的过渡期，因此，加快建立完善战略能源储备制度就显得更为重要。

而在加快完善本国的能源储备制度的道路上，中国应吸取发达国家关于能源储备方面的经验教训。首先要完善法规建设，依法有重点、有阶段地建设储存基地，形成以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能源企业为骨干的国家、企业、部队三级储备体系，明确各自的储备任务和所占比例。其次，科学规划储备基地。在基地的选址上应有纵深，既保障一线，又能考虑到二、三线的纵深需求，便于形成梯次保障，以提高战时生存率和持续保障力。第三，储备的数量、品种、方式应符合中国国情。既要搞清成品资源情况，又要搞清隐形资源情况。以此为基础进行储备基地布局规划，使中国的能源战略储备与未来作战需求相适应，从而达到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

能效时代，节电势在必行

工业革命以来至 20 世纪，人类经济的突出特点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中心和重点的。在劳效经济主导的时代，谁的物料成本低，谁的劳工工资低廉，谁能够获得便宜的土地，谁就能够赢取足够的利润空间。那些“三来一补”和“来料加

工”型企业的成功，关键就在于对劳效经济特征的成功把握。然而，企业一味追求廉价的劳工和便宜的土地，已经越来越难以成功了。在能效经济时代，“节电器”将成为必需品。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传统产业经济增长放缓、网络经济泡沫不断破灭之际，节电行业专业市场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的最大亮点，在运用小资本攻克大市场几乎已不可能的今天，节电行业专业市场中的奇迹不断，更被称为“杠杆投资理论新思潮”。

一、德国

在德国，能源匮乏，石油、天然气等主要依赖进口。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德国经历了被称为“黑色时代”的严重电力危机。为避免历史重演，从 1992 年起，德国开展了节能运动。

实际上，电力消费是能源消耗的大头，因此，节电就是减少煤和天然气的消耗，所以德国把节电看成是一项重要国策。2004 年 8 月，德国出台了新的《可再生能源法》，保证未来 20 年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给予一定的补贴。新法规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应占德国总发电量的 20%。同时，政府还将继续实行经济刺激措施，用优惠贷款及补贴等方式扶助可再生能源进入市场。为鼓励开发利用太阳能，政府实施了“10 万个太阳能屋顶计划”，并为此提供优惠贷款。2004 年，水力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超过德国全部电力供应的 10%。

德国还根据欧盟《能源消耗标示法规》制定了产品能耗等级标签制度，规定电器上必须贴有欧盟能源标签，使公众在购买家用电器时能识别电器的耗电情况。政府的节电政策，迫使一些技术落后的高耗电企业不得不改变生产模式，朝“省电、高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

二、泰国

泰国能源较为缺乏，所需能源一半以上需进口。为应对能源危机，泰国政府提出了“全民节能总动员”。

时任泰国总理他信身先士卒，每次离开办公室都会随手关灯、关空调。为使节能意识深入人心，他信政府将 2005 年 6 月 1 日定为“全民节约能源总动员日”，号召全民齐心协力节约使用能源，泰国全国包括北部最大城市清迈、中部著名旅游城市帕塔亚等泰国用电集中的地方也都参加了此次活动。结果显示，仅 5 分钟泰国全国就节约 4.4 万度电。

泰国能源部还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三项节电措施：第一，要求全国各地约 7700 个大型加油站从午夜至清晨 5 时关门停业。第二，自晚间 10 时起关闭户外商业广

告牌的照明灯。预计该项措施一年可节省能源费用 6000 万 ~ 7000 万泰铢。第三,在不影响民众安全的情况下,关闭全国公路线部分路段的路灯。能源部估计,如果节能活动进展顺利,泰国全国一年可减少 2 亿多美元的支出。

三、巴西

巴西拥有世界水量最大的亚马孙河,水力资源充沛,全国 92% 的电力来自水电。正常年份,巴西电力供应充足,电在目前生产、生活条件下还用不完。但节约的风气已在巴西逐渐形成,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节省电力计划”是巴西政府推行的节电措施的主要内容。该计划由政府电力部门制定机电设备的统一耗电标准,对耗电上限作出规定。任何耗电产品,只有在取得节电资格证书后,才允许生产和上市销售。如在空调生产销售中,只有按规定在机身上贴上能效等级的产品,才能进入商店。该等级依据能效分为从 A 到 G 的 7 个等级,所有在巴西市场销售的空调产品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格力空调就是在取得“A 级节能标签证书”后才顺利打进巴西市场的。

政府每年还对企业进行节电检查和评比,对先进者颁发证书表示鼓励,对落后企业给予黄牌警告,严重的甚至会取消其生产资格。电力管理部门还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对不同周期的计划项目进行跟踪和监督。

2002 年,巴西东南部、中西部 and 东北部水库上游雨量不足,水库的储水量下降到了最低水位,巴西政府下令实施更严厉的节电计划。经过调研,政府设定了人均用电标准,规定所有生产单位和居民都必须节电 20%;一旦用电超过了限制,电费将成倍增加,超限严重者要受到 10% ~ 30% 的罚款,甚至断电。

限电计划让人们养成了节电的习惯,尽管巴西电费较低,但夜晚走在大街上,街边的大楼往往都是漆黑一片。据统计,在 9 个月的限电期间,巴西全国共节电 2600 亿度,相当于 720 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与所有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国由于电力行业缺乏竞争,从而导致了电力的不均衡发展,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长期性的电力短缺。据日本能源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电力缺口是 9.93%,到 2010 年将剧增至 15%。而且每年政府都在节电改造上投入巨资,以求有效地解决中国在电力资源上潜在的隐患。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剧,中国的企业也不断地感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如何加强成本控制也成为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应当吸取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国的国情,制定更好的节电措施。纵观中国节电市场,无论是工业、商业市场,还是家庭市场,对于节电的潜在需求都是惊人的,据美国专业能源机构的研究预测,中国将在三年内取

代美国，一跃成为世界节电市场中的最大买家。在 21 世纪这个能效时代，节电已经势在必行。国家要想取得较大的发展，就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而且要每一步都要走得稳健。

北冰洋暗战升级的醉翁之意

2007 年 7 月 9 日，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马索林元帅在远东勘察加半岛的彼德罗巴甫洛夫斯克市宣布俄罗斯已经决定拨款 90 多亿卢布在堪察加半岛新建最现代化的核潜艇基地，并在太平洋沿岸新建水面舰艇基地，为未来航母部署做准备。

北冰洋是冰雪覆盖的一个地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里是一块非常纯净的土地，有很多的北极熊和海豹出没，这里是它们生活的乐园，但是现在很多的世界海上军事强国也开始觊觎这块纯净的土地。除美、英、俄等军事强国的身影频现之外，一向平和的加拿大武装力量也开始介入北冰洋之争，其接连举行的军事行动令各方侧目。早在 2002 年和 2003 年，丹麦先后两次派遣部队进入北冰洋上一座荒芜的小岛，并在岛上升国旗，以宣称自己对该岛拥有所有权。加拿大军官也一再宣称：“我们要坚决保卫自家后院，防止他人觊觎。”这使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北冰洋地区突然之间又变得这么热闹呢？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下，这一块地方到底有什么值得大家去争夺的呢？

实际上，北冰洋变得如此“炙手可热”，很大原因是该区尚未开发的丰富资源和冰盖的融化。这些国家看中的当然不是白茫茫的冰川，而是沉睡在大洋海底的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它们争先恐后地去北极“插旗”，都是为了未来的能源“圈地”。因为科学家估计，地球上 1/4 未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可能就藏在北极厚厚的冰川下。而从目前每桶原油 100 多美元的高价看，在北冰洋发现能源的回报无疑将是巨大的。虽然根据现有的国际法，北极不属于任何国家，北极周围的 5 个国家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挪威以及丹麦，在北极地区都只拥有各自沿海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但随着北冰洋海底矿产资源的逐渐被发现，以及北冰洋冰层融化，开发北冰洋底的自然资源成为可能。所以，北冰洋沿岸的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挪威和丹麦，纷纷加入北冰洋争夺战也就不难理解。因为它们都瞄准了北极海域的丰富资源。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报告显示，仅在俄罗斯领海范围内的北冰洋所蕴藏的矿物价值就高达 2 万亿美元。俄西伯利亚北部还有 10 多亿立方米的可采天然气。而加拿大已在北极圈内开采钻石，以后产量将达到全球钻石产量的 10% 以上。北极还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能源储备是重要的战略储备。石油能源在

当今世界经济中几乎可以呼风唤雨，俄罗斯国力的复兴，敢与美国叫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拜丰富石油资源之赐。美国合众国际社分析说，俄声称拥有北极主权的真实目的，是想长期地保持它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可见，有些国家确实想把北极资源作为自己的“战略储备”，因为目前条件下，开发北极资源经济上尚不太合算，那么，只要能争取到对北极拥有主权，把它的资源储存着先不开发，作为战略储备，这有利于自己保持未来的战略优势，岂不妙哉？这一块原本使人们望而生畏的地方，也许不久之后到处将耸立着石油钻探平台，航行着油轮和捕鱼船。

其次，北冰洋为亚、欧、北美三大洲的顶点，拥有联系三大洲的最短大弧航线，是美俄两国核潜艇和远程轰炸机攻击对方最快捷通道。北极的“西北航道”也是各国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因为全球变暖导致这些水域的冰盖融化，使无数自然资源曝光，与此同时，它还是一条穿越北极群岛的有吸引力的航线。联合国 2006 年公布的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说，全球变暖将在不久的将来使北冰洋地区一年有 5 个月适航。西方气象学家甚至预言，如果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继续，最早 2015 年，普通商船夏季可独自航行北冰洋。一旦如此，北冰洋只适合水下活动核潜艇的历史将成为过去，许多水面战舰也将行驶北冰洋。而且与通常的巴拿马运河航线相比，走西北航道可能使北美西海岸与亚洲之间的航程缩短 6500 公里。商业运输成本大大节省，是商业利益非常可观的“黄金水道”。

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扩张主义传统的国家。从最初小小的莫斯科公国到如今的世界大国，其间一直都伴随着扩张领土的冲动与行动。

一直以来，俄罗斯都被形容为国际社会中的“北极熊”，而北极熊是北极地区最凶猛的动物，2007 年在这场北冰洋的暗战中可以看出，它是真的想“名副其实”了，意图一举将北冰洋彻底揽入怀中，不容其他国家分一杯羹，这既是俄罗斯继承民族历史传统之举，也是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

然而在北冰洋看到机会的远不止俄罗斯一家。就在俄罗斯宣布将会拨巨款新建海军基地的同一天，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表示，将派出 6 ~ 8 艘巡逻舰在这片“加拿大水域”巡逻，并将修建一个深水港，作为加拿大的海军基地和商运码头。据介绍，这些巡逻舰能在一英尺厚的冰层中自由航行，舰上还配有专供直升机起降所用的平台。

西北通道是指从北大西洋经加拿大北极群岛进入北冰洋，之后再进入太平洋的航道，它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捷径。之前由于常年冰封，西北通道一直无法用于商运。但随着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层消退，西北通道的通航潜力越来越大。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和马六甲海峡都因其巨大的商业、军事价值，给相关国家带来无数利益。与之相比，西北通道的意义更加明显。

加拿大长期声称对西北通道水域拥有主权，而美国则坚持认为该区域属于公海。虽然美国的军舰和潜艇此前经常驶入西北通道，但由于并不涉及太多利益，加拿大一般都不做追究。可现在不同了，巨大的商机和石油利益近在眼前，其立场也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转变。面对与美国的潜在争执，加拿大的态度十分强硬。“需要维护我们对北极的主权时，加拿大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利用它，要么失去它。没错，这届政府决定利用它。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维护我们在北极地区的主权。”

中亚国家与周边大国的双边能源合作

狭义的中亚国家包括四国，即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还包括哈萨克斯坦的南部、中国新疆、阿富汗北部等地区。中亚地区各种矿藏丰富，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品种比较齐全，煤探明储量为 1624 亿吨（1972 年），集中分布在卡拉干达、埃基巴、马斯图兹、图尔盖、日兰奇克、楚河、伊犁河大型煤田。此外，还有铁矿、锰矿、铜矿、钾盐等矿藏，其中铬铁矿探明储量有 2 亿吨，仅次于南非、津巴布韦居世界第三。吉尔吉斯斯坦的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特别是稀有金属汞、铋的储量可观。乌兹别克斯坦的矿产资源主要是铜矿、铅锌矿、钼矿、钨矿，因种棉花被称为“白金之国”。中亚是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蕴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里海东岸及湖底。此外，费尔干纳的石油以及布哈拉和希瓦的天然气有比较丰富的储藏。然而，石油、天然气的最丰富的储藏在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水电资源丰富，尤其是塔吉克斯坦的水电资源达 6400 万千瓦。

在现代这个“能源为王”的时代，拥有丰富能源的中亚地区必然成为一个热点地区，世界各国都希望从中亚地区获得足够的能源支持。截至 2005 年初，中亚国家石油探明储量为 40 亿 ~ 60 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5 万亿 ~ 6 万亿立方米。丰富的油气资源和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使中亚在俄罗斯的能源战略和能源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亚各国邻邦的周边大国自然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周边各国都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一、俄罗斯

近年来，俄罗斯国力日渐恢复，以能源为手段振兴大国地位、实现国家复兴的战略日趋明确。在此种背景下，俄罗斯意图通过各种手段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双边或多边能源合作，力图重新恢复在中亚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使中亚的能

源服务于俄罗斯的大国振兴战略。

2007 年 5 月 12 日,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罕默多夫在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巴什市举行会晤。当日, 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发表联合声明说, 三国已同意在里海附近新建一条通往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管道。

显而易见,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能源战略目标最终还是服从于俄对外能源政策的根本目标, 那就是“使俄罗斯从单纯的原料供应者转变为可在国际能源市场执行独立政策的重要参与者; 巩固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 最有效地实现俄能源综合体的出口潜力, 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实现能源对外经济活动的非歧视制度, 包括许可俄罗斯能源公司进入国外能源市场、金融市场, 获取先进的能源工艺技术; 在互利条件下, 吸收合理规模的外资进入俄罗斯能源领域”。

二、中国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能源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 尤其是石油供需矛盾更加突出。数据显示, 2000 ~ 2009 年, 中国原油消费量由 2.41 亿吨上升到 3.88 亿吨, 年均增长 6.78%, 原油净进口量由 5969 万吨上升至 1.99 亿吨, 对外依存度也由 24.8% 飙升到 51.29%。同时, 中国石油进口源和石油运输线相对单一, 进一步加剧了国家能源安全的风险。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而且中国的原油需求将越来越大, 未来在原油进口方面预计会越来越多。”新疆大学经济学教授何伦志说。然而, 中国原油生产却呈现下降态势。2009 年国内原油产量 18949 万吨, 同比下降 0.4%, 相对于 2004 ~ 2008 年 2.3% 的年均增速而言, 原油生产明显减缓。

据了解, 我国是世界第六位的石油生产国, 1992 年前一直向日本等国出口石油, 从 1993 年起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大于出口量, 中国开始变为石油进口国, 1999 年包括石油产品在内, 中国一共出口 1362 万吨, 进口 5743 万吨, 现在每年进口量超过亿吨。“当然, 石油进口增长主要原因是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 石油的需求也在增加。同时消费结构的变化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兰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新才说。

2011 年 4 月 18 日至 20 日, 土—乌—哈—中天然气管道运行协调委员会第四次协调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开。四国七方共同商定 2011 年下半年及 2012 年一季度供输气和维检修计划, 以及生产运行安全平稳的保障策略, 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内天然气市场供应与土库曼斯坦供气的生产平衡。4 月 19 日晚, 中亚天然气管道哈国一号压气站第二台机组成功点火。这标志着全线年输气能力提升至 177 亿立

方米，又上一个台阶。哈国一号站的建成和跨国管道运行协调机制作用的发挥，进一步增强了这条战略通道向国内平稳输气的保障能力。

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西起哈萨克斯坦阿塔苏镇、东至中国新疆阿拉山口的中哈原油管道工程二期工程已于 2005 年底建成，2007 年已向中国独山子供油接近 500 万吨。2008 年 6 月 27 日，中国—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管道正式开工建设。3 天后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也动工。7 月 9 日，中国至哈萨克斯坦天然气管道开始修建。这三条管道最终将连接起来。随着这三条天然气管道项目的破土动工，一条西起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穿越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在中国新疆的霍尔果斯入境，通向中国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工程雏形已现。中亚天然气管道预计 2009 年底实现单线通气，2010 年实现双线通气。土库曼斯坦作为中亚天然气储量最丰富的国家，2008 年 8 月再次与中国签署框架协议。按照该协议，土库曼斯坦每年将向中国出售 4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多于此前约定的 300 亿立方米，几乎是西气东输目前年输气量的两倍。通过这一系列的合作，中国在未来 30 年内的天然气供应将进一步获得保障。

美国 PFC 能源咨询公司的李遥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飞速发展，确保自身能源安全必须成为中国政策制订的首要目标，从地缘关系和能源潜力看，中亚将成为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支点。2011 年 12 月，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即将开通，土库曼斯坦已承诺每年向中国供气 400 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也承诺供气 300 亿立方米，未来这条管道每年将向中国供应 7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几乎等于 2008 年中国的天然气总产量。

开发新能源：人类最后的抗争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能源资源供求失衡态势，作为传统能源的煤、石油和天然气在一二百年内将面临枯竭和耗尽，面对传统能源危机，一些发达国家未雨绸缪，制定应对传统能源危机的发展战略，研究开发新能源。从 1990 年至 2002 年，世界发达国家风力能源年发电、太阳能电池的年生产量分别增长 24.5%、17%，地热年增长 4%。相比之下，世界石油使用量在同一时期仅增长 1%，煤炭使用量则下降 1%。

新能源资源是指科学已经认知蕴含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功能性、囿于技术和经济因素过去不能被合理利用、通过技术经济的进步可以被合理利用的天然物质，包括天然

气水合物、天然纳米矿物、二次资源、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新能源资源作为常规能源资源使用的时候,表现出三方面的特征:对传统能源资源功效的替代作用,利用方式上对环境更加友好,以及带动新兴产业的崛起,对国计民生有重要意义。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积极制定新能源经济政策,包括新能源经济发展计划;政府财政给予资金支持;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不断加大研究开发的力度等等。这些国家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因国情的不同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区别,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一、进一步加大对太阳能的开发利用

太阳能正日益成为传统能源的替代能源,各国对太阳能的研究与开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些发达国家还在太阳能电池市场进行着激烈竞争,美国居领先地位,日本居第二位,欧洲居第三位。

进入 21 世纪,太阳能更是得到广泛的开发利用。德国政府宣布将兴建 10 万个太阳能发电屋顶的目标,为此,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皮尔金顿太阳能国际公司创建了一个合资企业,在德国兴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设施。意大利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太阳能电池发电,其目标兴建 1 万个太阳能发电屋顶。日本政府已实现安装 7000 套屋顶太阳能发电系统。美国太阳能电池的应用已经从备用电力系统扩大到照明、安全系统、长途通信等范围里。美国能源部利用太阳能大规模加热水的最新技术和太阳光集中反射的原理,通过融化盐来储存太阳能。在俄亥俄州利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生产热水,为该州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福特汽车公司利用太阳能为车间取暖,每年创造经济效益达数十万美元。加拿大蒙特利尔安装了吸热面积达 10 万平方英尺的太阳能系统,并在为印度和日本安装类似的系统。

二、燃料电池的开发利用

燃料电池生成电能是依靠氢氧的电化学反应,它的生成物是水,因此不排放温室气体。电池的部件少、噪音和震动小,可建在人口稠密地区。另外,燃料电池的利用效率高。用它建成的发电站,其能量利用可达 45% ~ 65%,如果将余热也利用起来,总的利用率高达 80%。

日本与国际燃料电池公司联合开发大规模生产燃料电池的技术已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联合推出两个大公司,并给予政府补贴,进一步加大开发。日本的东芝、富士、三菱等公司进行联合,计划到 2010 年安装容量为 2000MW 的燃料电池发电站。德国奔驰集团、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以及一些石油公司正在开发以燃料电池为动力的汽车,它们认为这项技术对开发不全依赖矿物燃料的下一代高效汽车至关重要。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宣布,已经开发出一种远程燃料电

池电动汽车，行程达 500 公里。

三、风力发电稳步发展

欧洲的一些国家在应用风能上走在前面，丹麦目前 10% 的电力来自风能，西班牙的纳瓦拉省达到 22%，荷兰的风车制造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从各国风力发电的发展水平来看，德国风力发电的增长居世界首位，其次为西班牙、丹麦和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印度在风力发电方面居领先地位，目前其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900 兆瓦，预计在今后几年内，印度通过制造高技术风力发电机组，风力发电将会有有一个大的飞跃。随着风力发电装机容量的不断扩大和开发技术的不断改进，风力发电的成本由过去的每千瓦 2600 美元下降到 700 美元。风力发电成为世界上最廉价的电源之一，在一些国家风力发电与燃煤发电相竞争。

四、潮汐电站开发出现新生机

潮汐动力作为未来进一步开发的新能源，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潮汐动力开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中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国 IT 动力公司开发了小型潮汐涡轮机，90 年代该公司设计和制造了旋翼叶片直径为 3.5 米的潮汐涡轮机，功率为 15KW。在此期间加拿大政府的国家研究委员会研制开发潮汐动力涡轮机，并在墨西哥海湾发电。菲律宾政府计划投资 1 亿美元建造 30 兆瓦的潮汐电站。一些国家的专家认为，今天潮汐电站的前景看好，有很多海域存在着每平方公里产生 10 兆瓦以上电力的潜力。在亚洲，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各岛屿以及我国和日本海岸流动的海流都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欧洲，潮汐电站的场址多达 106 个。英国政府、挪威政府已经投入不少人力财力研究开发潮汐动力，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五、向太空取能源的步伐加快

为了应对传统的能源危机，一些发达国家还把眼光瞄向太空，并制订了一些措施和技术方案，向太空要能源的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各国科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主要包括：（1）建立“氦-3”同位素热核反应堆。这种反应堆中没有中子辐射，也不会给环境造成危害。据俄罗斯专家介绍，月球上的“氦-3”储量足够人类使用 1000 年。现在美国和俄罗斯的专家正在进行论证。（2）让月球为地球提供能源。美国休斯顿能源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指出，从长远看，月球是维持地球所需能源的重要保证。月球从太阳获得的发电能力高达 1.3 万兆瓦，如将其中的 1% 的太阳能加以利用并送回地球，就足以取代地球上使用的矿物燃料能源。（3）在太空建发电厂。欧洲航空防务与航天公司研究证明，利用太阳能电池在离地球 3.6 万公里高处直接在太空中“收集”太阳能后，可将能量集束成激光光束直接发回地球。美国公布的开发月球和火星计划，也有类似的设想。

能源民族主义逐步升级

2011年9月，在安永发布的2011年全球矿业和金属业的主要战略性商业风险中，资源民族主义由去年的第四位上升至第一位。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2~18个月中，至少有25个国家通过税收或特许权使用费的方式，增加或宣布有意增加其政府所得。这显示，以资源为标的的民族主义正在广泛上升成为国家意志。

能源民族主义，或称资源民族主义，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掌控能源和资源。说白了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早在以资源掠夺为特点的殖民时代结束后，民族独立的热潮使资源国有化几乎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道义责任。一系列外国企业在跨国能源并购中被当地势力挫败的事件使人们看到全球能源市场的新变化。上世纪70年代，“能源民族主义”曾经盛极一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出于政治目的拒不提高产量，直接导致油价高涨。80年代，日本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崛起促使美国和欧洲大企业采取一系列针对日本的措施。近年来，随着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能源企业国有化的浪潮，国际上惊呼：“能源民族主义”又见抬头。

其实，能源民族主义从未远离。很多国家、公司和组织，在需要时都曾把这面大旗祭出，攻无不克，屡试不爽。从俄罗斯天然气巨头Gasprom（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到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沙特阿拉伯，从南美到非洲，从欧盟在开放各国能源市场斗争中的妥协，到当年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在美国国会受阻，总离不开“能源民族主义”的身影。

实际上，能源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新趋势。有研究认为，资源价格走高时，资源生产国倾向于增加国有成分；资源价格走低时，资源生产国倾向于吸引外资开发。而在当前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的情况下，资源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一块顽石，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以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为基点打牢财政基础，以抵御外部经济风险。

诚然，迅速增长的需求使世界能源格局转变为卖方市场。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国有能源企业将在跨国交易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各国政府将发挥各自的政治影响力以支持本国企业。无疑，有政府支持的企业在收购中会处于更有力的地位。这是一种新的“实力加市场”模式。国家石油公司因控制世界已探明储量越来越多的份额，以及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影响日益增强，正在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主要力量。而一些西方大石油公司虽然通过合并成了国际能源领域的巨头，其作用却在相对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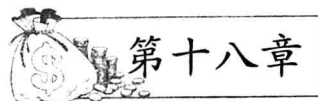
按照综合指标对世界石油公司进行评价，在 2006 年的前十大公司排名中，有 5 家公司是国有石油公司；按照储量排名，在 2006 年的全球前 10 大石油公司中，除俄罗斯的卢克石油公司外，其余都是国有公司。前 10 大石油公司控制着世界 80.6% 的石油储量，但其中埃克森—美孚、BP、雪佛龙、康菲、壳牌五大国际石油公司仅仅拥有世界石油储量的 3.8%。国家石油公司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储量，并生产和提供着世界大部分的石油。2006 年这十大石油公司的平均储采比是 78 年，其中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的储采比最高，为 173 年，卢克石油公司最低，是 24 年。而埃克森—美孚等五大国际石油公司的储采比只有 11 年，仅为国有石油公司的 1/7。因独享本国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权力，国有石油公司对私有公司参与勘探开发活动的程度有着绝对的发言权和决定权。

2008 年 3 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一项法律草案，该法案的出发点，旨在限制想进入俄罗斯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外国投资者。法案限制领域共 42 个，包括石油、天然气、核能、战略矿物资源开采、航天航空及其他和国家安全相关领域。任何外国私人公司如欲并购上述限制领域任何一家公司超过 50% 的股份，必须得到由俄罗斯经济官员和安全官员组成的委员会批准，而外国国营公司须报批的门槛则更严格。俄国家杜马建设与土地关系委员会主席马丁·沙库姆称，该法案“一方面可确保有力保护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有利于建立一个稳定透明的外商投资环境”。

就此不少国际评论家认为，这是俄罗斯近年来日渐强烈的“能源民族主义”情绪的集中表现，目的是在能源这一利润丰厚、战略意义重大的领域内排斥外国资本。实际上，所谓能源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俄能源资本大洗牌的一种肤浅表象。

2007 年 9 月，欧盟委员会公布的一项“能源业反垄断新规定”，这才是让俄方决定下“逐客令”的真正原因。根据这项新规定，欧盟内投资能源生产的企业必须将其能源运输网转让给其它独立公司，以确保新进入能源行业公司的竞争力，而非欧盟公司如想进入欧盟能源或能源运输项目的投资者行列，也应同样遵循上述规定，且根据互惠原则，其母国必须给予欧盟能源企业以相同的市场准入。

一直以来，俄罗斯都有凭借产业优势和“天然气欧元”向欧洲进行产业扩张的强烈愿望，但在该规定公布后，俄国家杜马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当即表示，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着手限制外国能源企业进入“对等的俄罗斯战略经济领域”。此次俄方的新法律草案，正是在上述一系列国际能源资本博弈后，一次顺理成章的摊牌，而非单方面突如其来、心血来潮的表现。



新世纪的新型战争

新世纪战争新趋势：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竞露锋芒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这早已为人熟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战争的形态和方式也发生了多次根本性的改变。进入 21 世纪，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信息化战争实现了“从以往物理信息战到今天精神信息战的拓展”。世界战争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新趋势。对抗双方不仅在有形战场上激烈拼杀，而且在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这无形战场上的较量同样惊心动魄。

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作为实现和维护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脱颖而出，成为信息化战争中独立的作战样式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斗争手段。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以人的思想意识为目标，旨在通过战场物质技术手段或各种信息媒介，从政治上、精神上巩固加强己方，争取中间力量，分化瓦解敌方，为夺取战争胜利营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主动态势。

上述“三战”各有特色。舆论战面向大众，可从政治上体现己方进行战争的意志和主张，通过造势、震慑、离间等策略，为心理战、法律战提供有利于己的舆论环境。心理战侧重影响敌方情感意志，因此它并不单纯运用信息等“软性”手段，有时亦可动用武力等“硬性”手段来达成目的，如以震慑性军事打击动摇敌方继续抵抗的意志和决心等。法律战主要面向世界，对战争性质、战争合法性等的判定具有重要作用，为舆论战、心理战提供法理基础。

但是，“三战”之间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在实际操作中它们互为条件、互为支援。唯有实现三者的最佳结合，才能产生政治、军事所需要的综合精神效应，最大限度地扩展军事行动的政治影响力和精神杀伤力。

“三战”的整体功能在于：表明战争性质和己方的立场态度，广泛争取道义支持和力量支持；显示军事实力和动武决心，瓦解对方战斗意志；在信息施放上采取真假并用和虚实并用，致敌心智错乱或盲目行动。不难看出，“三战”统一于战争的精神系统对抗之中，对于争取人心、改变双方整体力量对比具有重要作用。

“三战”既体现“攻心为上”的传统兵法，又是传统攻心战质的飞跃。传统攻心战主要是接敌分化、散发传单、战场喊话、感化俘虏，始终处于战争对抗中的辅助地位。信息化战争中的“三战”，主要依靠非接触手段，利用文、图、声、像、光、电、磁等高科技手段来施谋布势，并且以大众传媒作为其广阔施展的舞台，具有空前的社会影响力。

“三战”已经走到战争的前台，成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军事打击之外的重要作战样式。这主要表现为：“三战”拥有专门的指挥控制系统和专业作战力量；超越军事作战人员对象，超越军事交战空间；在时间上同军事行动进程相比有较大的提前和滞后等。“三战”地位凸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军事高科技的发展，战争毁伤力空前加大，战争获胜代价也大幅提高，作为战争的指导者，不得不考虑战争的后果，因此，不再单纯追求攻城略地的目标，而倾向于选择军事打击与政治、心理攻势相结合的方式，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三战”日渐成为战争指导的一门新艺术。

从发达国家军事变革情况来看，“三战”力量趋于专业化、集约化、信息化。目前，美军的第四心理战大队配置了卫星测向定位、广播信号自动跟踪、计算机网络、虚拟仿真等先进技术装备，拥有400多名各类专业人员，能用35种语言作战，具有全球机动作战能力。英、法、德、日等国也有相当专业化的“三战”力量队伍。可以预见，“三战”队伍建设将成为各国未来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由于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地位作用和复杂程度的提高，不论大国小国，也无论强国弱国，都对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十分关注，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教育训练已是世界瞩目。美军《心理战条令》就明确规定：“心理战训练作为联合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种类型的作战演习（演练）中均可有效地实施。”“当心理战训练能够为军事和政治行动紧密而又完美地结合起来提供一种催化剂的作用时，就可以成为作战准备行动成败的关键。”从国内外军事教育训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来看，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教育训练呈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趋势，设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布莱格堡就是美军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教育训练的重要基地，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之所以很快将伊拉克军民的战争意志消耗殆尽，短短20多天取得了主要战场的胜利，除了高强度军事打击外，其凌厉的舆论战、心理

战、法律战攻势功不可没，而这又得益于他们平时的教育训练。

不得不承认，新的战争实践表明，不论是战争对抗中的强者还是弱者，无一例外地都很重视“三战”，但是，要想真正打赢“三战”，就必须首先夺取“制信息权”。

在现代战争中，信息劣势一方往往被动，而信息优势一方则有能力先声夺人，甚至强词夺理。伊拉克战争前，美国通过大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舆论，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使之国内民众的支持率由先前的 23%，上升到正式开战时的 55%。

当然，信息劣势一方实施不对称战法，巧打“三战”也会收到好的效果。索马里军事强人艾迪德，将在大街上拖动 19 具美军士兵尸体的录像打进美国新闻媒体播出，结果，失望而愤怒的美国民众迫使本国政府很快决定从索马里撤军。

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军事在变革，使“三战”不断获得新质力量，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警钟：中国，我们所认知的信息战

信息社会，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被嵌入计算机信息网络之中，这一方面进一步增加政治的透明度，提高政治民主化水平，另一方面也将使政治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发展，使不同阶级之间、社会集团之间，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沟通的渠道剧增。

因此，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过程中，我们应学会利用各种传媒打信息战。讲国家安全，不能离开政治安全。政治是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为维护其根本利益，建立起阶级统治，组织和巩固其国家政权，并运用国家政权治理国家而进行的全部活动。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信息。信息既是增强国家凝聚力，巩固国家政权的权力，也是分化国家凝聚力，威胁国家政权的武器。

广义的信息战，包括宣传战、舆论战、心理战，是影响、控制、攻击对方决策观念和认知系统的作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作战。这样的信息战，本身就是政治战。只是作战的武器是信息。于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样的交战就愈激烈、愈频繁。

具体地说，现代传真机和计算机、文字处理机、电子排字机、数字化显示器、电子网络、卫星以及其他相关技术，几乎把整个人类相互关联、融合在一起，相互不断地提供各种数据、图像符号信息。媒介系统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以往那种单一媒介、单一频道、单一出版物或单一技术的影响，从而将打破国家集团对信息的壟

断，使社会集团和个人有了直接参与全球某国或本国政治活动的机会，对政治的冲击增强，使政治的不安全性相应增加，政治权力在分散中默默发生转移。

过去，地理位置近成为人们结盟的基础。然而，随着因特网的出现，地理位置的远近失去了作用，将来越来越被看重的是共同的利益。这对迄今为止按地理位置划界的所有机构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对传统的国家和业已存在的利益集团来说也是威胁。这将彻底改变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公民通过网络可以更多、更容易地介入政治，他们的权力空前增加，政治家必须习惯公民更多、更直接地参与政治，某些全球性问题就是在没有代表国家的政治家们的参与下也完全可以解决，网上虚拟团体可以利用网络向决策者施加压力，同样，公民也能以击点鼠标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就可以逃避政治，其结果可能使政治的本质发生根本变化。一个压抑民主的政府试图利用传统媒体来封锁消息，欺骗民众的想法必然会在网络的公开性面前碰得粉碎。

信息联盟的诞生，淡化了人类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也使得人类活动的空间更加广泛和自由。人们不需要出国、移居来满足欲望，可以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就各取所需。人们相互之间要么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联系，要么是在局部范围内建立联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国家活动的空间就减少了，国家扩张的势头将得到遏制，政府自由的程度因政治“硅化”而大大减弱。

信息时代，还使得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限趋于模糊。于是乎，国家政治安全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和冲击。许多国家的政府在运筹本国的政治方略时，不得不考虑国际政治影响。同时，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也为那些霸权国家推行强权政治提供了更多、更经济实用的手段和途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一旦国家的政治安全受到威胁，各国也应通过各种方式来维护本国的安全。一旦情势激化，战争在所难免，但是，在现代社会，一个新的战争方式也开始慢慢浮出水面，那就是“信息战”。与宣传战、舆论战、心理战这三战不同的是，这将是一场真实的战斗。但不同的是，它已不再是面对面对接的战争。

打信息战，军人的作用是在传统战场以外的后方掩体内，科学家的实验室，机关的办公室，甚至回到家里的工作室，遥控操纵信息化的先进武器，指挥或参与看不见战场的信息战。军人失去了在短兵相接中冲锋陷阵表现英雄壮举的机会。

信息战的主要武器之一是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简称 C4I 系统，它的作用是获取对方的信息。C4I 系统的发展非常迅速，将向容量大、速度快、功能稳定的方向发展，为指挥员快速处理、分析、评价所获取的信息，对各级部队实施及时准确的指挥与控制奠定了基础。小型化、家庭化也是 C4I 系统发展的趋势，使军人回到家里去打仗成为可能。在家里，他们就能参阅国家及军队的各种档案，向任何

图书馆借书，同大型电子计算机中心进行联系。可以在家中参加各种会议，包括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可以参加这样的会议，必要时，专门的服务机构还可提供同声传译。通过电传复制装置可以交流图纸计划、图片和信件，而且数分钟后，真迹复制件可送到收件人手中。高级指挥官在家中能目睹千里之外的战场态势，必要时，可以利用无线设备指挥到每个单兵。C4I 系统的发展前景使建设以家庭为中心的信息化军队的设想趋于现实。军人可以散布在家中或地球的任何地方完成战争的过程：搜集、研究、整理有关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提出报告或做出决策；迅速传输决策并检查执行情况；组织军内外协同和各项保障，等等，从而使军队集隐蔽、快速、效率于一体，为胜利奠定了基础。

随着各种信息器材的不断突破，杀伤武器的发展，未来战争的作战规模将越来越小，国家在整个战争准备过程中也应当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加速军人迈向家庭的步伐。现代机器人，能模拟人的感觉、手工操纵和自动移行能力，完成人赋予的多种任务。机器人的传感器在某些场合下甚至超过人的能力，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替代人在室外和战场上干危险的、重复的和服务性的工作。再从信息战的本质意义上看，也应该是一场在室内进行的战争。只是由于受到通信的限制，目前尚无可能使军人大规模地涌入家庭。信息技术还在一日千里地进步，正是“回家打仗”的生命力之所在。

总之，信息社会的国家安全已不再只是军事意义上的侵略和反侵略，而更多的是彰显综合实力竞赛中的国际地位。

金融资本大战：一个华尔街的幽灵——高盛

高盛集团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最有权势的投资银行，它成立于 1869 年，经历两百多年的发展，从当年的马夫门面店到今天的华尔街大佬，从一间地下室一个雇员到如今上万亿美元资产的影子操控者，高盛经历了无数次风雨沉浮，走过一个多世纪洒满鲜血的征途，终于登上全球金融的巅峰。

从 1929 年起，世界上任何一次大萧条和对美国之外的国家进行的狙击，高盛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高科技股到高油价，高盛主导了大萧条后的每一次市场操作。

2008 年的金融危机，高盛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自杀式地搅乱市场，释放病毒一般的债权引诱市场上当，最后将雷曼跟贝尔斯登一举击败。尽管与华尔街金融震荡相比，“迪拜世界集团”的债务似乎有些不值一提，但其透出来的事实却更

加残酷：如果说雷曼债务引发华尔街金融震荡是市场经济体制及资本主义的信用破产，迪拜世界集团债务则说明，政府信用原来不那么可靠。

实际上，早在 2008 年第三季度美国次贷危机肆虐之时，迪拜正在建设世界最高楼的埃玛尔地产股价就已下跌了 80%，到了 2009 年初更是有大批英美籍金融从业人员离职返乡，大批浙江商人也纷纷撤回投资。因此，迪拜债务危机不是一个“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一个“何时爆发”的问题。于是，在某些人眼中，迪拜债务危机成了一张随时可以“打出去”的王牌。

从 2007 年迪拜商业交易所正式启动开始，经过几年的发展，这所纽约商业交易所与迪拜和阿曼政府之间的合资公司，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海湾最大的能源期货市场。

2008 年 8 月 11 日，迪拜商业交易所发布了一份声明，该交易所通过发行新股向六家投资者共计出售了 20% 的股权。六家投资者中包括两家美国投行、三家能源交易公司和石油巨头壳牌旗下一家公司。事实上，交易所声明中的美国投行就是全球两家最大的商品交易机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很显然，高盛一直是石油市场的庄家，入主迪拜商业交易所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将石油的钉子直接插到中东的心脏。

再来看看迪拜的债权银行，这些银行都是向阿联酋提供贷款敞口最大的债权银行。在迪拜世界未来五年到期债务名单中，分别为高盛、高盛盟友三井住友银行（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高盛同时持有该银行 12.5% 股权）、盟友巴克莱、花旗。这一次高盛持有的债权并不多，可是三井住友银行持有迪拜世界 2.25 亿美元。这里面的关系也就毋庸讳言了。

实际上，阿联酋一度因迪拜而成为中东国家的市场化榜样。继阿联酋的迪拜之后，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均以此为标尺繁荣自身市场。事实上，中东产油国一直试图摆脱市场形态贫瘠的状态，而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能源需求大户如中国之间则具有非常完美的互补：中东国家提供石油，中国提供市场机制。遗憾的是，在两者之间，一直没有完成各取所需的对接，从而导致迪拜走上了奢靡特色为发展路径的不归路。

迪拜的畸形繁荣，除了为当地旅游业带来廉价的就业机会之外，在培育本土市场发育方面并没有多大贡献，相反，迪拜成为了华尔街的“销金窟”：华尔街为阿联酋政府理财，然后由美国坐庄开赌，石油国家的显贵们成为赌桌两旁的赌徒。任何一栋摩天大楼，从规划到设计、建筑和管理以及流水作业全由美国及华尔街掌控。美国作为庄家、发包方、施工方等，不但使石油财富从赌桌上如同使“老千”般被吸走，而且还通过奢靡之都缔造过程的各个环节将石油美元席卷而去。一切符合程序，合规合法几近无可挑剔。

阿联酋以石油储量为抵押，不断地在赌桌上、工程结算环节以美元沽出，这一

结果就是阿联酋的石油储量不管有多少，已悉数成为美元债权。迪拜债务危机的结果，只能是之后漫长的还债过程，而什么时候还清债务，则由美元说了算。阿联酋由此进入经济主权或主权财富的沦丧。

从某种意义上，迪拜的摩天大楼越高，石油美元财富的经理人就越有机可乘。迪拜的繁荣不但使华尔街资金经理大赚特赚，更是养肥了美国等强国建筑商的胃口。特别是迪拜这一无原材料生产能力之地，任何建筑材料都需要进口，而从进口到建筑落成，以华尔街主导的所谓实体经济部分，则可以从这一过程层层盘剥。换言之，迪拜无论多么现代或豪华，沙漠中的“神话”不属于阿联酋人民。

隔山打牛，这是高盛的惯用招术。历史也总是那样的惊人相似。当年中国航油大王陈久霖，陷入高盛的圈套之后，高盛并没有立即站出来逼债，而是它的盟友三井住友银行出马，这一次日本人再次充当马前卒，表面上站出来将债务推迟六个月，事实上就是在告诉大家，这已经是最后的期限了。日本人一出马，最大债权人汇丰、渣打还不胆战心惊赶紧要债！迪拜陷入逼债漩涡已经无可避免。

这一次迪拜危机爆发，使得整个欧洲的金融机构陷入恐慌，股市稀里哗啦地下跌，其实这就是高盛要的效果，欧洲已经逼近了金融危机第二波，这也是美国政府要求达到的目的，现在高盛捧出来的奥巴马要处理阿富汗问题，他需要通过欧洲人的手来打压欧洲人自己，进一步达到打压中东的酋长们，那是美国国家利益问题。当然中东人之所以很嚣张，主要是他们太有钱，能源太多，这一次高盛的行动，可以让美国政府一箭双雕：干掉欧元，拿下中东能源。

也正是这场迪拜危机拯救了近期危在旦夕的美元信心。而从长远看，任何新兴市场危机都有助于美元强势地位的确立，而这正是经济严重萧条的美国推行超宽松货币政策所最需要的。分析表示，911事件之后，中东资金就大规模移出美国，转而在迪拜等地投资原油和大宗商品期货，而随着迪拜金融中心的破灭，这部分资金有望重回美国，托起美国房市。

产业资本大战：世界很小，必和必拓很大

2010年2月11日，必和必拓发布半年财报，截至2009年12月31日，半年时间内，该公司实现净利润6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16.4亿元，净增134.4%，这一数字已接近中国68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全年利润的总和。而根据中钢协2009年末提供的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68家大中型钢铁企业2009年利润比上年下降31.43%，全年销售利润率仅为2.55%。正如有国外媒体报导指出的，2010年以来，以必和必拓

为代表的国际铁矿石三巨头态度显得非常强硬，它们要在 2009 年度价格基础上再次上涨 40%。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必和必拓呢？

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是以经营石油和矿产为主的全球著名跨国公司。近年来，它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资源公司。该公司在全球 20 个国家开展业务，主要产品有铁矿石、煤、铜、铝、镍、石油、液化天然气、镁、钻石等。在 2003 ~ 2004 财年度，该公司实现净收入 340.87 亿澳元，名列澳大利亚十大企业名单之首。2004 年 8 月 26 日，该公司宣布其市值达 583 亿美元。

一、石油必和必拓

说到必和必拓，可能我们就不得不提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发生在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的故事了。面对国内出现的矛盾，阿根廷政府为了转移老百姓的注意力，竟然在 1980 年派兵攻打福克兰群岛。这场战争对于阿根廷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1982 年，阿根廷和英国为群岛主权归属爆发战争，最终阿根廷战败。战后马岛实行“自治”，总督代表英女王行使权力。阿根廷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但英国拒绝同阿根廷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2010 年 2 月底，英国迪塞尔石油公司在马岛附近海域进行石油勘探和开采，又引起阿根廷政府强烈抗议。据悉，当时该公司因油气储藏质量不高而放弃了该处油井。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大西洋南端，专家估计马岛海域蕴藏多达 600 亿桶石油。

很显然，早在 30 年前，英国就知道马岛这里有石油，所以它不可能放弃这块岛屿。但是让人疑惑的是，早在 2010 年 2 月份，英国政府就已经向必和必拓等四家石油公司颁发了开采许可证，但为什么最后竟然让本国的迪塞尔石油公司负责石油的勘探工作了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必和必拓的英文名字，即 BHP Billiton，BHP 翻译成必和，Billiton 则翻译成必拓。原来必和是澳大利亚的公司，而必拓是英国的公司。因此，必和必拓就是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和一家英国公司合并的结果，而澳大利亚这个曾经的英国殖民地，是现在的英联邦国家！

二、矿产必和必拓

我们都知道，铁矿决定了钢铁工业的成本，铝矿决定了铝的成本，而钢铁和铝几乎决定了建筑、汽车、飞机、火车等几乎所有工业制成品的成本。必和必拓 BHP 公司的矿山位于澳大利亚西部皮尔巴拉地区，分别是纽曼、扬迪和戈德沃斯。这三个矿区的总探明储量约为 29 亿吨，目前铁矿石的年产量为 1 亿吨。在亚里南部，还有未开发的 C 采区，保有储量 45 亿吨。

2009 年，中国的钢铁企业协会和铁矿石供货商谈判，一个叫做必和必拓，一

个叫做力拓，一个叫做巴西的淡水河谷，其中必和必拓的铁矿石占了40%，比例最大。当时的谈判结果是，中国决定用现货价格进货，而不签长期协议合同。但是仅仅过了一年，三大铁矿石公司就不同意了。它们说这玩意儿赔钱，于是它们决定要以现货价格为基准和中国谈判。也就是说，中国过去通过哪个价格便宜就买哪个货的有利条件，被三大铁矿石公司给剥夺了。在这其中，必和必拓实力最为雄厚。它在加拿大拥有超过10000平方公里的钾肥的开采权；在埃塞俄比亚，拥有17000平方公里的开采权。

另外，根据相关报导，1999年，中国与蒙古国最大的铜矿擦肩而过，最终被力拓集团曲线拿下；2002年，必和必拓曾派人游说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和钢铁企业，邀请其参与开发旗下矿山，最终无果而终。业内专家因此叹道，“与这些大的矿业巨头相比，中国企业明显缺乏长远的目光。”

按照粗略估算，自中国开始铁矿石价格谈判以来，钢铁行业为此付出了超过70000亿元人民币的代价，而钾肥行业5年间进口化肥的金额也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实际上，中国企业始终在寻找着突围的机会。

2008年年末，中铝收购了力拓9%的股份，成为力拓最大的单一股东。实际上，中铝与力拓的合作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力拓是全球第三大多元化矿产资源公司，中铝则是中国的大型国企，两者之间有着诸多合作需求。在国际金融海啸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大公司陷入困境，纷纷向中国公司发出求助信息。中铝与其他中国大型国企一样，执行“走出去”的战略，扩大资源来源，在海外扩展业务。

2009年2月12日，中铝宣布通过收购可转债的方式再度注资195亿美元，使得其对于力拓的控股权从9%上升到18%。然而，必和必拓和力拓的股东重合人数超过70%，因此可以看做是同一家公司，面对这种情况，必和必拓是绝对不会让中铝取得力拓的控制权的。于是，为了使中铝和力拓的交易谈崩，必和必拓不惜血本。必和必拓以每小时400澳元的价格雇用说客，对澳政府进行高层公关。他们到总理陆克文、财政部长韦恩·斯万、资源部长马丁·弗古森以及他们的顾问处进行游说。结果财政部基本上接受了这些建议，认为中铝投资入股力拓交易将危及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必和必拓甚至花了大量血本，说服了澳大利亚上议院的反对党领袖。反对党领袖的出面，使得澳大利亚老百姓对收购事件产生了极度的反感。最终以中铝的失败结束了这场对决。

必和必拓与产业资本之间无形之中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关系让产业资本大战有着必然的命运，不管世界各国多么挣扎，在竞争的背后总有一股力量左右了最终的胜负。

转基因大战：来势汹汹的产业资本孟山都

2010年1月6日，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启发教授宣布，转基因水稻最迟五年内走上我们中国人的餐桌。转基因这个词对于世界人民来说并不陌生，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如此。那么转基因水稻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转基因稻米可以释放出某种物质，可以把虫子毒死。因而使得农药用量下降。这让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这种物质可以将虫子毒死，那么人呢？在这样的科技流程背后，究竟谁是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呢？

说到转基因，就不得不提到一家农业公司，它的名字叫做孟山都。在孟山都的官方网站上，孟山都是一家农业公司，“我们通过创新和技术为全世界的农民带来成功收益，帮助他们生产更健康的粮食、更好的动物饲料和更多的纤维；同时，我们致力于减少农业对环境的破坏”。这家农业公司是美国《商业周刊》评选出的2008年十大最具影响力企业，更占据了全球90%的转基因种子市场，中国每年有80%的大豆依赖进口，但所有进口的大豆中，90%以上都是采用孟山都的技术种植出的转基因大豆。

然而，十几年前的孟山都并不是什么农业公司，孟山都公司成立于1901年，它最初是以生产人造甜味剂（糖精）起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孟山都进入了医药领域生产阿司匹林药品，后来靠销售石油化工品和生物武器暴发，最后成为破坏环境的农药甚至原子弹的铀提炼等化学污染产业大鳄。

越战时期美军使用的生物武器“橙剂”，就是当时孟山都的主要产品。而美军就是用这个“橙剂”把越南游击队用来藏身的茂密森林，烧成了光秃秃的山坡。“橙剂”中含有剧毒“二噁英”，“二噁英”号称世纪之毒，其毒性是砒霜的900倍，80克可以致80万人死亡，可能诱发癌症、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生殖系统紊乱和发育障碍等一系列疾病，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越战期间美国喷洒在越南的6000万升落叶剂“橙剂”中含有336公斤二噁英，直到今天，这些剧毒物质仍存在越南当地的土壤、空气和水源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越南人民。同样，这些剧毒物质也存在于美国越战老兵的身体里，为此，孟山都和陶氏化学等生产厂商被迫向受害的美国越战老兵赔偿1.8亿美元。

1990年，孟山都将所有有关化学制品的业务转移给一个新成立的名叫Solutia（首诺）的公司，也将很多化学污染诉讼留给Solutia。和曾经的跨国生化巨头杜邦、陶氏化学一样，孟山都也摇身一变，彻底告别了不光彩的过去，变成了一个完全彻

底的跨国生物技术巨头，也成了世界主要粮食作物的转基因种子的专利持有者和控制者。

其实，早在 1981 年的时候，孟山都就已经开始转向生物技术领域，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孟山都的科学家终于研制出一个经过人工修改的植物细胞，这是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改变了植物细胞的基因，实现了生物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

1985 年，孟山都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保饲，一种含有 RBGH（牛生长激素），可以增加牛奶产量 20% 的兽药。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兽医药品中心的官员审阅了孟山都提交的牲畜实验研究数据。在孟山都递交给 FDA 的报告中，一些科研人员发现，通过参照组对比，接受激素注射的动物生理发生了异常显著的变化。奶牛的卵巢长大了 30% 以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生殖问题。孟山都号称，这个激素对人体无害，还有许多好处。然而美国预防癌症联合会主席塞缪尔·爱普斯坦则认为，牛产生极高的乳腺癌发病率，牛奶会变浓。然后，牛奶中还会有抗生素，用于抑制牛的乳腺炎，很厉害的广谱抗生素在牛奶中。最后，IGF1（胰岛素一号促生长因子）会剧烈地增长，过高的 IGF1 水平会增加乳腺癌、直肠癌、前列腺癌发病的可能性。但孟山都对很多疾病的关键问题毫不关心，利益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最后孟山都不断游说 FDA 主管官员，进行强势公关，最终绕开了兽医的检查，获得产品的上市批准。

其实，保饲得以在美国市场销售，是因为孟山都很多前高级雇员后来都进入 FDA，并影响和掌握了审批程序。就像一个螺旋门，它不仅存在于农业领域，还存在各个领域里。前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孟山都旗下一家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前美国对外贸易特使麦克坎特卸任后去了孟山都董事会；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曾在孟山都任职；此外，还有孟山都的一些高级官员调入美国环保署、白宫、FDA。这种玩弄政治和法律的高超手段，使得孟山都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十分微妙。

实际上，转基因就是一场阳光下的投毒事件，其危害绝不亚于三聚氰胺之于中国人的健康隐患！孟山都利用手中的钱财为自己铺路，继续获得更多的利益。当西方市场被一一吞进之后，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自然不能放过，如何打开中国大门？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从 2001 年到现在，中国广西已经和美国的孟山都在广西推广了 1062 万亩的迪卡系转基因玉米，玉米作为继水稻之后的广西的第二大主食农作物，至今还是广西 5000 万人口当中 1000 万人不可缺少的主要口粮。玉米在美国只是作为工业原料来种植，譬如说生产酒精、新能源。而广西广大农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已经种了 1062 万亩。

奥地利政府在 2008 年 11 月 11 日发布的科学研究报告，首次证实转基因玉米会导致小白鼠繁殖能力下降。研究结果显示，在长达 20 周以上的持续喂养评估实验中，研究人员往被喂养饲料当中只放了 33% 的转基因玉米，结果小白鼠从第三代开始，体重、体长和数量都明显地减少。2009 年法国科学家继续揭露了孟山都 NK603 和 MON863 型转基因玉米，能让老鼠的肝脏、肾脏和其他器官受损，导致例如尿毒症或者肾衰竭、肝中毒等严重后果。

更需要注意的是，转基因这样的有毒体更大的危害在于，它的毒素是可传染的，就像放射性物质一样，它会使得原本无毒的食品也被传染。2005 年 4 月 13 日，绿色和平组织公布了一份震惊世界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所提供的资料，我们综合估计湖北 2009 年最少有 950 ~ 1200 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10 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 20000 ~ 25000 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 10000 ~ 12500 吨。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普通大米种植区，因此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由于转基因大米与普通大米外表无异，而且没有标示，湖北省和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还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转基因大米，对公众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

在利益面前道德似乎早已经沦落，在产业资本巨鳄的眼中更是如此，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转基因大战中，无疑孟山都立于不败之地，面对这样的困境，世界各国政府都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焦炭大战：“焦炭出手，打击矿石”的幻象

2009 年，由于中国更多地关注“铁公机”的建设，所以钢铁的需求量特别大，而铁矿石的价格又如此之高，导致整个中国国内的钢企在获取铁矿石这个问题上“集体无力”。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跌宕起伏，一波三折。2010 年初，铁矿石谈判本该进入逐步升温的“预热期”，但业界却一片“风平浪静”。来自业内的消息显示，澳洲三大矿商近来明显减少了与中国的接触，转而将谈判的主要力量放在日本，这可能导致中国定价、议价话语权的又一次旁落。因此，中国自己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找寻着一种新的路径——“焦炭出手，打击矿石”。

目前世界上所有的钢铁厂都必须使用的两种原料是铁矿石和焦炭。长期以来，焦炭都被看做是中国钢铁业的“杀手锏”，是制衡铁矿石谈判的有力筹码。作为焦炭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希望通过控制焦炭的出口，来影响全球的钢铁产量，进而影响钢铁业对铁矿石的需求，然后从铁矿石的供需关系上制衡这些矿业巨头，

间接地增强我方铁矿石谈判的话语权。实际上，这是媒体和业界的一个美好想象。

一直以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受制于人。一方面它们会指责我们低价倾销，另一方面还会指责我们限制销售，简直是欺人太甚。那什么叫低价倾销呢？从1996年到2006年间，中国的焦炭出口增长了14倍，但都是低价出口，并没有换回任何的好处。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焦化企业非常多，山西那一带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企业，因为互相竞争，就用低价向欧盟出口焦炭。到1999年的时候，欧盟就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到了2004年3月份的时候，暂停反倾销调查；到2005年的时候，反倾销措施终止了，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2006年烽烟再起，当时国际原材料价格开始疯狂地上涨，欧盟又要求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2008年作出裁决，实施反倾销税。

我们被制裁后作出了积极反应，2008年，中国对焦炭出口两次提高关税以降低出口。结果到2008年底，全球的原材料价格大跌，而中国的焦炭价格高出全球价格，出口锐减，同比减少了95%以上，对欧美出口全停滞了。但是欧盟联合美国又向WTO提出诉讼，指控我国对包括焦炭在内的工业原材料采取出口限制措施，认为中国应该提高上述产品的出口配额数量或降低出口关税，以增加出口。

全世界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定价权之战。我们铁矿石谈判为什么这么惨？因为没有定价权。换成焦炭呢？我们曾经想过，如果铁矿石给我们这么高的价格的活，就还它一个更高的焦炭价格来作为报复。然而可笑的是，我们从来无法拉抬焦炭价格，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焦炭的定价权，我们的定价权也在慢慢地流失。从2007年到2009年的这段时间，中国焦炭出口量到2008年已经开始大幅下滑，2009年下滑的幅度大概超过95%，而我们进口增加了1200%。这个节点是在2008年的八九月份。你看好不好笑，当2009年我们增加进口的时候，你发现价格上升了。当我们以前一直出口的时候，价格很低。

按理说，提高出口关税减少出口的时候，价格也会跟着上升的。但是2008年8月，我们提高出口关税的时候，出口就应该要下跌了，那么价格就应该上升了吧。结果你会发现价格从9月份开始下跌，为什么？因为定价权已经拱手让人了。我们提高了关税，出口下跌了，它们就不高兴了，就开始操纵打压我们的价格。而2009年开始中国成为焦炭进口国之后，它们又开始拉抬价格，造成我们进口的损失。

山西是中国生产焦炭的很重要的大省。而焦化企业在山西虽然很多，但它们并不齐心协力，就跟铁矿石的贸易商们一样，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一个统一的行动，这个联盟只是形同虚设。即便统一行动也没用，等你真正统一的时候，你会发现价格不是由你决定的。如果全部统一行动，就是别人定了价之后，我们再来出口

或者进口。不统一行动呢，就是自相残杀，价格就更差。

西方各国实在可恶，它们自己把焦炭厂关了，放到中国来生产，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承受多少污染？之后，它们还来怪我们，说我们生产的焦炭不是低价倾销，就是限制销售，我们怎么做都不对。这让我们不禁要为自己辩驳，你们自己又为什么要关掉焦炭厂呢？让我们生产，然后还怪我们不对，最后说我们的焦炭厂制造二氧化碳，还要我们缴纳碳关税形成“低碳美元”回流美国，帮助它们发展经济，我们真惨啊，我们受到的剥削和清朝相比似乎改善不大。

十年间，焦炭的命运都可以拍一部电影了，整个一场焦炭的闹剧！它们就拿焦炭作为手段，就跟对待玩偶一样来操纵我们。是否出口仿佛已经使我们无法选择了，你卖或者不卖，话语权不在于你，而在于那些“外人”……

这场由中国人自己发起的焦炭大战，最终胜利的又是谁呢？它让中国更加焦虑。

汇率大战：美国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平坦。围绕汇率问题，各国之间纷争、摩擦不断。一时间，有关“货币战”的言论甚嚣尘上，人民币汇率其间也承受较大升值压力。

2010年11月初，美联储又抛出总额达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政策刚出来，就使得美元大跌，市场担心全球流动性过剩状况进一步加剧。其实，当年9月、10月间美元汇率的持续走低，就已将多国货币卷入升值漩涡。

面对美元贬值，日本政府通过干预汇率使本国货币贬值。为缓解经济过热、通胀及资产泡沫压力，巴西、印度、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加拿大、瑞典等部分发达经济体央行纷纷加息予以应对。

“未来数年，这一挑战会长期存在！过度泛滥的流动性冲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造成汇率利率波动以及贸易摩擦升温”，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这在原本不平衡的全球经济结构中又增加了新的不平衡因素”。

由于当前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依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面临的外部流动性过剩局面依然存在，热钱流入、输入性通胀等风险很可能继续积聚。如何在货币政策基调不同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考验着中国经济决策者和管理者的智慧。

在目前极为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背景下，中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将继

续组合发力、应对风险，预计下一阶段除了货币政策施展组合拳外，中国还会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提升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化解风险提供良好的支撑。

明眼人十分清楚，“货币战”纷争背后，其实是一些发达国家出于本国经济和政治的需要，持续将压力向外转嫁。有些国家话锋直指中国，以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

进入2011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就开始对人民币进行了炮轰。3月份，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就宣称，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从而加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威胁要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此后，“人民币汇率低估”的言论不绝于耳。

其实，造成世界和有关国家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形成的，人民币汇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而中国自2005年7月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到2009年底，人民币汇率就已上升了约21%。鉴于此，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表示，即便人民币和其他亚洲主要货币升值20%，最多只能帮助美国出口实现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1%的增长。

无疑，汇率压力的背后，是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针对的都是中国出口产品。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容易引发国内经济风险。“主要发达国家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持续增强的情况下，国际流动性持续流入国内，在加大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压力的同时，也增加了流动性管理的难度。”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如此表示。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老百姓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国内物价上涨。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外汇占款呈现出快速增加态势。逐月激增的外汇占款背后，藏匿着热钱大量涌入的身影，并进一步加大国内基础货币供应量，导致通胀压力加剧。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10月末中国外汇占款达218454亿元，较9月增加5190亿元，创出30个月来新高，仅次于2008年4月新增外汇占款5251亿元的历史最高纪录。

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方向，农副产品领域也成为炒作的对象。从“豆你玩”、“蒜你狠”，到天价“黑茶”，都有游资疯狂炒作的影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指出，发达国家通过量化宽松的货

币政策转移危机，会抵消我国收紧银根防止通胀的政策效应，并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

一边是国际上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货币战”热度不减，一边是通胀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更多挑战，“十二五”即将开局之际，多重风险正考量转型路上的中国经济。

可以说，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继续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仍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人民币不能在短期内大幅升值。正如中国代表在 2011 年 10 月第六届中欧工商峰会上所说，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 20% ~ 40%，中国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工人将失业，农民工将返乡，社会很难稳定。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对世界绝不是好事。

然而，这场由美国主导的汇率之战，对美国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美国它的真正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呢？汇率纠纷之所以产生，与其说是某些国家“阴谋”或“阳谋”的产物，不如说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可预见的，必经的阶段。之所以会产生汇率纠纷，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之间，新兴经济体之间都存在复苏速度和力度的差异，因此必然会导致各国间不同步甚至相反的宏观政策选择。

如果理解了“汇率战”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各国对汇率纠纷的现实应更多抱以“同情的理解”，无论是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中国的渐进汇率改革，还是日本的直接干预措施，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各自经济环境考虑的“不得不为”。但由于经济全球化，一国内部政策的外溢效应越来越大，因此在主要经济体之间出现宏观政策的差异、博弈、纠纷乃至妥协，均是势所必然。

汽车大战：美国版《潜伏》

2009 年，随着电视剧《潜伏》的热播，社会公众对谍战题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潜伏”成为当年最为风行的流行词汇之一。然而，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想到，“潜伏”与谍战并非只是电视剧中的专有题材，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谍战身影更是频频闪现。巧合的是，就在《潜伏》令国内观众唏嘘不已的时候，一场在美国上演的真实版《潜伏》大戏已经拉开了帷幕。这出谍战戏将刚刚兴冲冲地登上全球汽车销量霸主位置的日本丰田公司推到了火山口上。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眼下，这句广告语所标榜的全球汽车业的标尺——日本丰田公司，正深陷在一个由“脚垫门”、“踏板门”、“刹车门”等引

发的大规模召回泥潭之中。可能你们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是开丰田车的。丰田汽车全世界质量排名第一，在2010年竟然遭遇了滑铁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给我们带来了沉重的思考。

2010年1月21日，日本丰田公司宣布召回约230万辆在美国市场销售的8种型号汽车；1月26日，丰田宣布暂停在美国市场销售的8种型号汽车并同时关闭部分生产线；1月28日，丰田再次宣布从美国市场召回109万辆汽车，从中国市场召回7.5万辆汽车；1月29日，丰田宣布从欧洲国家召回180万辆汽车；2月2日，丰田宣布从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召回18万辆汽车；2月4日，丰田宣布从日本和美国市场召回27万辆丰田旗下的普锐斯汽车。即使最资深的行业专家，也从未见过哪家公司同时有这么多车型的汽车陷入危机。

其实，这是一场美国对付亚洲各国的惊天大阴谋！那么美国为什么要针对丰田，而不是其他的日本品牌呢？因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汽车卖得不好，就会关掉工厂，就会造成汽车工人失业。而这不仅仅是汽车公司工人失业的问题，还会造成其他零配件工厂工人失业，因此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失业问题波及的后果，将会造成几百万工人的失业。据估计，如果三家公司都关掉的话，起码造成300万以上的人失业，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所不能允许的，因为他是民主党的总统，他是蓝领阶层的代表。当时就是以汽车工会为首的这些蓝领工人把奥巴马送入白宫的，他今天当然要回馈这些老百姓。所以奥巴马必须从日本最高质量的丰田汽车下手，只要它垮了，不但救了美国汽车工业，而其他日本的品牌还不如丰田，因此可以有效地波及日本其他品牌。

按照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在美国，丰田事件被普遍描绘为一家以产品质量取胜的汽车巨头正在遭遇一次难堪的挫折；但是在日本，媒体在报导这件事情的时候，口气却完全不同。许多日本报纸认为，这件事情是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紧张关系和美國人对日本企业敌视态度的再现。这两条报道的差别不是没有道理的，要知道，就在2008年，丰田汽车以897万辆的销量超过通用汽车，夺走了通用占据77年之久的全球第一汽车制造商的宝座。同一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风雨飘摇。临危受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会听任丰田公司占据全球汽车业霸主的位置吗？

然而，在汽车召回的这条道路上，美国汽车召回的历史最长，从1966年开始，美国就对有缺陷的汽车进行召回，至今美国已总计召回2亿多辆整车，2400多万条轮胎。2010年1月份之前的六个月，总共有216起召回事件，丰田6起，其他的基本上也都是美国的汽车。从历史上看，占据汽车一次召回数量第一名的是哪家汽车

公司呢？美国《福布斯》杂志提供的数据显示，是福特公司。2006年4月，因为某种原因召回了720万辆车。第二名是通用，1971年12月召回了670万辆车。第三名还是通用，1981年2月因为某种原因召回了580万辆车。第四名又回到了福特，2005年9月因为某种原因召回了450万辆。第五名还是福特，2009年10月召回了450万辆。第六名是丰田，因为脚垫门事件，召回了426万辆。第七名也是丰田，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召回了200多万辆。所以，从历史上的召回事件来看，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汽车在召回。从最近的召回事件来看，大部分也都是美国的汽车在召回。可是，“大问题”的美国汽车公司却没有陷入巨大困境，却偏偏要一再为难“小问题”的丰田。因为美国针对的绝不只是丰田的问题，只要丰田这一次被狙击成功，本田、三菱等日本汽车公司会被一并拖进来，随后，索尼等非汽车行业也会被拖进来。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是继自1985年的日美汇率大战之后，2010年美国精心策划的又一场大战，是一场全新的、过去从未经历过的贸易大战。

随着丰田的召回事件越演越烈，美国国会好像也在扮演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这次，不像20多年前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时，国会议员当众砸东芝电视那么野蛮，而是站在维护美国和全球消费者安全的“法官”立场上，来“审判”丰田的“罪行”。如果人们的想象力丰富一点的话，可以勾画出一幅美日汽车大战的图画，就在三年前，丰田与美国通用汽车为争夺世界第一还打得不可开交，形成了所谓从产品到网络的“立体战争”，烽烟遍布北美欧亚，在中国的市场竞争几乎是“白热化”的状态。

面对这次的丰田“召回门”，如果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会不会是美国国会要报复丰田抢夺通用世界最大汽车销售王呢？当然，这样的阴谋论仅仅是揣测。不过，这次美国国会的强硬姿态至少说明，在对待企业竞争的问题上，美国不会考虑意识形态，不管是否是盟国还是别的阵营，都不会手软，因为他们举着保护消费者“替天行道”的大旗，会收获巨大的政治利益，同时也为美国企业扫清竞争障碍。

文化大战：当孔子遭遇阿凡达

所谓“文化战争”，不同于一般单纯意义上的文化之间的争斗和碰撞，而是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文化大战，只不过和血肉横飞的世界大战相比采取的是另一种形式而已。应当看到，现在的世界并不太平，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凭借其军事、经济的实力，在世界各地炫耀武力，致使战火不断，使人们的生活得不到安宁。对此，人们有切肤之痛，但却往往忽略另一种战争，这就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一场新的战争，属于软刀子杀人的文化战争。这场文化战争同样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动的。它们凭借其实力向世界各国输出其文化产品，就如当年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一样。现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其精神产品、文化产品，如美国大片等。这场文化侵略的后果要比当年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后果严重得多。

一直以来，中国和美国都在各自向对方进行文化渗透。两者的文化渗透活动有着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方法，有些不同的效果。美国人喜欢拍科幻片，以激发民众的想像力，总是向前看；国人喜欢拍古装片，做任何事总喜欢往后看，说的话在老祖宗那里看是否能找到典故，做的事在老祖宗那里是否找到依据。

美国人喜欢拍科幻片，重视科学技能教育，不断往前看，把新发明发现用在生产中，生产力不断提高，国民经济水平高了，藏富于民，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员只管维护社会尽可能的公平，很少搞公营，没有年龄和官位权威，只有学术权威，官为民选，民为大，官为小，官为民服务，与我们的习惯正好相反。国人喜欢拍古装片，重视人文教育，特别是传统文化。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作为虎年春节贺岁档的一部国产大片，《孔子》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正式上映，成为第一部与《阿凡达》正面对抗的影片。在其他国产影片纷纷“闻《阿凡达》之风便逃”的大势所趋下，《孔子》却反其道而行，希望在《阿凡达》热潮慢慢退去的间隙里获得上佳表现。也许路开始已选错，结果还是错，《孔子》首周只有 2800 万的票房，而《阿凡达》仅用了 38 天的时间就将同门大师兄《泰坦尼克号》在 12 年前创造的单部影片全球票房 18.45 亿美元的纪录彻底变成了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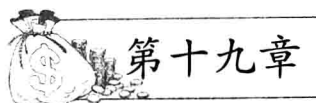
《阿凡达》之所以热映，靠的不只是 3D，不是简单的主人翁，不是故事情节，而是真的打中这个时代的灵魂，或者叫做“集体人格”。而这一点是值得中国导演学习的，要想真正做成一部大片、好片，众多的商业点不是噱头，抓住最根本的东西才是王道。

在这两部大片的较量中，从票房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似乎美国更胜一筹。而中国文化渗透的效果可能要到较长时间以后才会显现出来，这是由渗透的形式决定的。它需要时间的积累，积跬步，成千里。人是能动的，他会在不经意间将文化传播开来，这种传播更加细腻，效果也会更好，正所谓“润物细无声”。

孔子不仅影响了国内人，也在慢慢地影响全球人，孔子学院在各国纷纷建立。据报道截至 2011 年，国家汉办在全球 105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350 多所孔子学院和 500 多个孔子课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有成效，但却遮住了人们对于真实处境

的认识。首当其冲的就是成本，新华社报道说，每个孔子学院的成本就是 10 万美元。换句话说，不算在中学里开办的孔子课堂，仅仅是孔子学院的成本就有 2800 多万美元。在财政部网站中标公告中的“网络孔子学院网站”，中标金额则高达 3520 万美元。如果花掉这些钱真的能提升中国形象，促进中外交流，那这钱花得也值了。可是现在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处境却非常尴尬。孔子学院主要就是在三个地方——东南亚、欧洲，还有北美。

面对孔子学院的尴尬处境，我们又不得不思考究竟该如何真正地推广中华文化的理念，中国的导演们以后要开始把真正地理念用形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击中这个社会最关切的话题。面对这场国际化的文化大战，中国人不能松懈，文化渗透可能比直接的枪林弹雨更具有威力！



世界经济大趋势将去向何处

纸牌预言，经济危机还将持续 10 年

自 2008 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一直不正常。从 2008 年的雷曼兄弟倒闭拉开的全球经济危机，到现在的欧债危机，实际上，都是金融危机蔓延的“余震”。然而，美国经济有没有走出低谷？欧债危机会不会拖累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全球经济又会走向何处呢？

和大部分金融危机后的复苏类似，此次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较慢。

2011 年，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宣称复苏两年后，美国 GDP 的规模仍然低于其在 2007 年危机前的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对 1978 年至今的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如果美国某季度经济 GDP 增长率不到 1%，则随后出现经济衰退的概率达 50% ~ 67%。糟糕的就业形势更是鲜见好转的迹象。2009 年和 2010 年的失业率分别为 9.3% 和 9.6%，不但远高于 2000 ~ 2008 年 5.1% 的平均水平，而且高于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 2011 年 8 月，就业净增加为 0，失业率仍维持在 9.1% 的高位。

可见，美国经济还远远未走出低谷，目前面临着两个困境：一个是经济层面的困境：经济陷入由房市不振、消费不足和失业增加的恶性循环造成的短期复苏压力，又面临由去杠杆化带来的长期增长困境。另一个是经济政策层面的困境：财政货币政策既要足以刺激经济复苏，又要避免加剧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既要推动金融改革，又要防止动作过快窒息复苏。

因此，美国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在刺激经济复苏和防止政策不可持续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

未来，美国经济复苏有两种可能的情景：一种是借助长短期优势，美政府通过采取适度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和推进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结构改革，使美国经济

稳步走出低谷；另一种是政策处置失当，没能有效整合各种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和资本，导致经济复苏乏力，步日本后尘。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欧债危机，而欧洲的这次债务危机将会是导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原因之一。

欧洲债务危机源于希腊债务危机。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并成为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线。2010年2月4日，葡萄牙政府称可能削弱缩减赤字的努力及西班牙披露未来三年预算赤字将高于预测，更是导致市场焦虑急剧上升，欧元遭到大肆抛售，欧洲股市暴跌，整个欧元区正面临成立11年以来最严峻考验。由于市场对欧元区国家债务危机的恐慌心理加重，投资者近日纷纷抛售欧元区资产，多家机构均表示看空欧元，并认为欧元兑美元可能跌向1.30附近。欧元区部分国家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区域经济复苏前景黯淡。

欧洲债务危机迫使欧元区采取财政紧缩政策，随着危机蔓延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务危机已经不仅仅影响边缘经济体了。随着欧洲一些大型的国家经济体受到压力，整个欧洲有可能会再次经历经济衰退。另外，对全球经济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2011年8月的时候，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证据就已经出现两个月了。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在过去一个半月内大幅下滑。对很多散货承运商来说，目前的水平无利可图。远东到北美的集装箱货运运费在夏季高峰期也非常低。全球贸易很有可能在过去两个月一直收缩。由于库存因素，生产指数滞后于贸易指数。在过去四周中，全球生产指数都指向收缩。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让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各国纷纷采取对策，来渡过这次历史上又一次的惨重的灾难。

2010年6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发表文章，他预测，一些国家过早的开始对财政紧缩政策担忧，导致政府决策失误，这可能会触发经济史上的“第三次大萧条”，而且萧条期或许将持续10年。

在世界经济历史上，只有两次经济衰退在当时被广泛地描述为“大萧条”。第一次是在经历了1873年的经济恐慌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市场不稳定时期；第二次就是1929~1931年金融危机后大量失业人员无法就业的困难时期。

保罗·克鲁格曼曾经提前五年准确地预测出亚洲经济危机和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可谓是经济学领域的“大预言家”。克鲁格曼对经济学家们动辄以复杂、抽象的数学理论推断经济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经济衰退很普遍，但经济大萧条却很罕见。

克鲁格曼“总是超前别人两步”，他预测，未来“第三次大萧条”将由决策失误引起，世界各国政府现在均表现出对通货膨胀的过度担忧，但是事实上，真正的威胁却来自通货紧缩；各国领袖都在宣扬收紧开支的必要性，而人们面临的真正问题却是支出不足。

2010年之后，欧美各国失业率、尤其是长期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且并没有迹象显示失业率在短期内能够迅速下降。而同时，美国和欧洲似乎都正在走向日本式的通货紧缩困境。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决策者都日益关注财政紧缩计划并且趋向于按传统观念平衡预算。各国过早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和退出经济刺激，那么为这一政策埋单的只能是那数百万的失业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要持续几年处于失业状态，甚至有一些人永远无法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不管是19世纪的长期低迷还是20世纪的大萧条，它们都并非发生在经济持续衰退时期。相反，当时都包含了周期性的经济增长，但那些经济改善并不足以弥补最初经济衰退带来的损害，如今的情况看起来更接近19世纪经历的长期低迷期，尽管形势没有像20世纪大萧条时期那样严峻，但本次大萧条的代价，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对受失业困扰的人民来说，仍然是巨大的。

全球经济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过度开支，还是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出口，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无法解决，因为其政治体系都无法当机立断。所有都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乱世，而这很有可能会持续10年。

美国当老二，谁敢当老大

从世界大趋势来说，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永远独霸天下的。五百年前，中国一枝独秀，占领着世界中心的地位，保持着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这局面也正是从五百年前开始被推翻。

荷兰率先夺得了世界武力的大旗，横行天下。后来是葡萄牙，接着是西班牙，紧接着被英国人夺取了霸权。从20世纪开始，美国就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霸权天下，一直统治到今天。但是，美国也不是一直都会统治下去。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崩溃，第二大房贷公司破产被清算。

那么，美国的经济是否从此进入衰退期，然后崩溃呢？就像苏联一样，一日之间解体呢？如果真的解体，美国会独立成十三个州吗？如果这样的话，美国就跟苏联一样，马上沦为三流国家。到那时中国会当上老大吗？

2011年11月4日，G20（二十国）峰会在法国戛纳闭幕。下面就以这次峰会为

主线，来详细谈一下美国“世界老二”地位的确立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2011年，第六次G20峰会顺利结束。这次峰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各国达成了多少实质性的协议，而是美国被确认为世界老二。这对于“美国决不做第二”的奥巴马来说，应该是一个最严厉的精神打击。

其实，美国成为“世界老二”，早已成为客观事实，只是没有人愿意公开谈论，这也叫“选择性失忆”。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欧洲出于“责任”方面的考虑，继续让美国承担“世界老大”的责任，而自己继续“搭便车”。

纵观这次G20峰会，中国之所以公开美国“世界老二”这一事实，而且反复强调“欧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对美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方面的作为表示失望。

美国已经不配戴“世界第一”的帽子。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很简单，目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完全是由于美国的“欺诈”和战争造成，但是，在全球携手摆脱危机的过程中，美国采取的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无赖做法，今天指责某个国家操纵汇率，明天要求某个国家开放市场，而自己呢，今天增加某个产品的进口税，明天出台个“量化宽松政策”，以邻为壑，转嫁负担。这样的国家继续做老大，只能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祸害！在这种情况下，把欧洲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事实讲出来，无疑是希望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在全球携手摆脱危机方面发挥“更多的领导”作用。

其次，给欧洲鼓劲打气。

欧洲，也就是欧元区、欧洲国家联盟，目前面对比较严重的债务危机。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都在债务危机中煎熬。日前，尽管德国和法国已经就扩大欧洲拯救基金达成共识，但是，从希腊最终放弃的公投提议中可以看出，欧洲依然缺乏信心，而欧洲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洲的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中国的稳定增长。面对欧洲的严重局面和信心不足，中国公开讲出“欧洲是第一大经济体”的事实，并相信欧洲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无疑能够提振欧洲的士气，引用中国总理的一句话“信心比金子还珍贵”。

最后，表达了与欧洲合作遏制美国无赖做法的愿望。

欧洲成第一，美国成第二，中国无疑又回到“老三”的位置。对于中国而言，自认“老三”并不是太难的一件事。因为，中国始终没有被“老二”这一位置搞晕，中国始终对其“发展中国家”状况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自中国“被老二”后，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声音越来越大，而美国则越来越采取不负责任的態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开“欧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事实，显然有这样的

考虑：新科老大与“老三”联合起来，共同遏制美国的无赖，共同推进建立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

中国历来在峰会中开展的双边会谈有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正式会谈。有会谈场所，代表团主要成员陪同。包括中法元首会谈、中俄元首会谈、金砖国家元首会谈。第二个层级是非正式会谈，无场所，随意找个椅子坐坐，简单对话。比如中美元首会谈。第三个层级是交谈，也就是寒暄，在会议间歇，见面客气几句。

由于中国已经把美国放到“老二”的位置，所以，在此次峰会上，大大降低了中美元首会谈的层级，美国被安排在第二层级，非正式会谈，新闻报道也很简单。这在 G20 峰会召开以来首次出现。

中国一向重视中美关系，把搞好中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此次刻意降低会谈层级，说明中国已经没有耐心听美国说“好话”，对美国的不断冒犯表现出极大的厌烦和蔑视。

峰会中，层级最高的首先是中俄元首会谈。会谈不仅属于多边场合的正式会谈，而且内容广泛实际，包括中俄共同维护中亚安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等。可见，中俄联手遏制全球霸权主义的趋势势不可挡。

再就是中法首脑会谈。作为此次峰会的东道主，萨科齐为会议取得成功作了大量努力。中国重视此次会谈，置于正式层级，表达了希望法国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促使欧洲承担起“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责任的愿望。

总之，美国在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世界老二”！以经济上的“老二”的经济能力支撑其“全球霸主”地位，显然难以持续。那么，誓言“不做第二”的奥巴马，将如何做好“世界老二”？谁又会是未来世界的老大呢？

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到 2022 年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尽管全球各个地区金融风暴和冲击不断，造成速度减慢，但是经济增长的势头从来没有改变过。

自 1978 年到 2007 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 9.7%，2008 年前 3 个季度是 11.5%，加上前 28 年平均 9.7% 的速度，意味着中国连续 29 年经济增长超过了 9.7%。这在当代世界非常少见，我们追平了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持续高速增长时间最久的记录——日本的 29 年。

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过 20 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大体上都开始进入了长期的停滞萧条期，那么中国在追平了这个最长的记录之后，是不是也要面临着一个长

期的萧条甚至停滞呢？还是会继续保持增长呢？国际国内很多人士都关注这个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预测：“中国到 2030 年，如果经济仍然保持不低于 7.2% 的速度增长的话，那就意味着仍然保持高速增长。”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过 20 几年的高速增长，都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成为了当代新型工业化国家，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中国大陆同样经过 29 年的高速增长，但是离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有非常遥远的路。也正是如此，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我们还能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动因。

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关键是效率。中国现在是双重转轨，提高效率，一是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有一个是体制的转轨，从原来的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个转换越深刻，资源越是更大比例地从国有垄断领域转入到混合的多种所有制特别民营经济介入其中的竞争领域，资源配置的方式越是从行政政府配置为主转向市场竞争配置为主，这个转换程度越大，资源效率就会越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表示说，“不要因为当前的某一些短期的冲击就担忧中长期中国经济的发展蓝图，我认为到 2020 年之前中国经济都是持续增长期。”主要也有两方面的理由：

首先，目前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并没有因为 30 年的时间有所削减，而是还有很大的空间；尽管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非常高，但是我们开放的深度和内容还在挖掘；同时，相对全球来讲，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城市发展还将持续下去，并带来很高的投资，这些都将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其次，“入世”以来，特别是北京奥运会以后，中国的现代服务经济和全球服务经济都将会快速发展，加上新劳动力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快速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明显提高，这将对中国的总量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还将持续 20 年。得出这种判断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第一个因素，就是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会释放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

2009 年，中国人口城市化率只有 46.6%。按照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高约 1 个百分点来计算，到 2030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 65% 左右，届时城市化任务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在未来 20 年，中国还将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

第二个因素，就是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发展非常不均衡的国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另一个是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但恰恰正是这种不平衡，会促进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加强消费潜力的挖掘，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余斌同时给出了避免经济增长陷入低迷应该进行发展方式转变的方法，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消费扩张。要从过去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增长，逐步转变为消费扩张。未来经济发展需要更注重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只有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才会有城乡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有 13 亿人口，届时，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实现了这样的转变，即使国际环境再发生变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会相对较轻。

第二，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要从过去过于依赖工业制造业的快速扩张，转变为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过去三十年，中国从供不应求、短缺经济、凭票证供应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中心，这说明过去中国处于一个工业制造业的快速扩张时期。未来，中国还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尚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变为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

第三，资源节约。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是依赖于资源的充分供给和价格低廉，但现在资源越来越短缺，价格越来越高，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显然难以为继。况且，从环保的角度看，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全球已经逐步形成共识，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为环保、低碳做出努力或调整。

第四，高端竞争力。目前，中国的产业竞争优势主要是在制造业环节，具有明显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但是制造业又是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的一环。未来，中国必须加大研发设计投入，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在营销领域需要建立品牌、渠道、服务优势，通过向研发、营销方面延伸，来打造在产业链中高端以及附加值比较高的环节形成中国的竞争优势。如果完成这些转变，在传统竞争优势被削弱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将会迎来新的竞争优势。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教授黄有光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甚至更长，当然这个速度不见得一直维持在 10% 以上，不过即使比这个低，例如 7%，这也是高速增长”。

当然，三农问题、贫富差距和滥用权力、贪污等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很可能造成不好的结果，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解决好这些问题正是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

一个前提。

至此可知，中国社会各届对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都持乐观的态度，而且，这个发展的时期有可能会到 2022 年左右。

危机过后，欧洲辉煌难以再续

金融危机过后，整个世界就没消停过，尤其是欧盟。如果说“冰岛国家破产”、“爱尔兰经济危机”、“雷曼兄弟破产”让欧盟经济备受冲击；那么，2012 年 5 月迅速升级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仿佛产生了滚雪球效应，使得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无不惊呼“主权债务危机‘狼来了’”！欧盟多国财政吃紧，欧元急速下跌，股市剧烈动荡，整个欧盟陷入了泰山压顶般的窘境。

2009 年末，希腊政府宣布，国家负债高达 3000 亿欧元。这相当于该国 2375 亿欧元国内生产总值的 126%，远超欧盟设定的 60% 警戒线。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各成员国财政赤字不得超过 GDP 的 3%。而实际情况却是，欧盟 27 国的财政赤字相当于欧盟 GDP 的 6.8%，欧元区 16 国 2009 年的财政赤字达到欧元区 GDP 的 6.3%，与 2008 年 2% 的水平相比大幅提高。就连光景不错的德国、法国也没有循规蹈矩，英国的财政赤字也占到了 GDP 的 11%，整个欧盟没有一个成员实现财政盈余。

有经济学家惊呼：欧盟面临的这场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仅是一场病，而且是一场大病。欧元区能否稳住？欧元还能不能存在？欧盟会不会分崩离析？那个曾经灿烂的“欧洲梦”还能圆吗？

面对危机，欧元区以及整个欧盟正在抓紧协商如何在危机预警、协调步骤等方面统一行动，同时各自加紧“自救”，准备“勒紧腰带过日子”。

希腊、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等，均已推出了财政紧缩计划。综合来看，不外乎“开源”与“截流”两个途径。“开源”方面主要是增税。一国的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一般都会占到八九成，欧洲各国为了保证“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行，税收更是普遍不低。如今为了消弭危机，增税是一个绕不过的坎儿。

然而，“欧猪五国”采取的财政紧缩措施，引发了民众不满，激发了他们另寻“救世主”的迫切心情。2011 年初，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剧增问题愈加突出。4 月，葡萄牙也在同样经历失业率上升、债务评级降低、罢工潮风起，不得不向欧盟求助。

2011 年，爱尔兰首先“换将”，新总理恩达·肯尼发誓要带领爱尔兰“安全上岸”。6 月，葡萄牙新总理帕索斯科埃略一上台就表示要坚守承诺，采取一切有效措

施解决债务危机。11月，希腊和意大利也分别迎来本国新总理，拥有欧盟机构工作背景的资深经济学家帕帕季莫斯和马里奥蒙蒂。他们作为技术官僚在特殊时期“备受推崇”。同月，西班牙新首相拉霍伊以压倒性优势胜选，标志着欧盟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欧猪五国”均已弃旧迎新。

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因财政恶化被戏称为“欧猪五国”，在欧盟国家中欠债率与财赤率都较高，并且五国政府领导人都在2011年更迭，成为欧债“炮灰”。

那么，谁又来拯救欧债呢？

在深陷危机的各国为争取救援基金、解决因削减福利支出导致的社会矛盾而不断努力时，欧盟也在连绵不绝的峰会中探讨着各种“救火”的可能性。

2011年8月份，德法两个欧元区最大经济体的首脑进行了首次紧急会晤，决定联合提议建立欧盟经济政府，并敦促欧元国厉行节约。经过场场“拉锯”，在欧盟12月8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峰会上，联合提议最终通过。除英国以外，所有欧盟26国都表示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强化财政纪律，采取欧洲统一国库、严格监督欧元区财政及赤字等政策，标志着欧盟拯救欧债危机进入新阶段。

债务危机迟迟难以化解，这令西方制度弊端暴露无遗。西方一系列社会矛盾表明金融经济危机已经衍化为社会政治危机，许多制度弊端暴露无遗。

在经济制度方面，（1）发展模式走向极端化。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光有看不见的手，没有看得见的手。欧洲的德国莱茵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特点是实行高福利，但这需要高增长支撑，而金融危机后则难以为继。（2）结构性弊端凸显。在西方国家，金融服务业已取代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但金融业缺乏实体经济的依托，使得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成为当前西方经济的最大“病灶”。

在政治制度方面，国家利益让位于党派利益及政客的个人利益，以致“议而不决、决而难行”。

在社会制度方面，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穷人给富人埋单，中产阶层受到挤压，“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这一现实的写照。

欧债危机的爆发与持久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深层次根源来说，和西方经济丧失内生动力密切相关。

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黄金期后，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增长动力减少，科技创新未有突破，传统产业又向外转移或日趋式微，竞争力日渐丧失。加上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步入衰退，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刺激经济，于是债务

短期内骤然膨胀。

欧洲经济很可能进入衰退期。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悲观预期，欧洲经济可能需要十年才能恢复。欧洲各大企业的 CEO 对前景也多半表示悲观，认为这一波风暴将重创区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在做“过小年”的心理准备。

2011 年，35 岁的法国年轻主妇亚历山德拉在巴黎老佛爷橱窗前久久徘徊，但最终还是咬咬牙选择了“eyeshopping”（只看不买）。“今年圣诞节我不会购买任何礼物了，但我会为家庭准备一顿圣诞大餐，在圣诞假期后，给孩子们购买实用的小礼物。”尽管她现在的收入能够让孩子们过一个不差于往年的圣诞假期，但是考虑到来年所有商品都将涨价，她还是收紧了家庭开支。

亚历山德拉的经历就是欧洲家庭的缩影。由于欧洲各国政府实行财政紧缩计划、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甚至加大所得税增收力度，因此，这个圣诞对欧洲家庭来说似乎要比以往“寒冷”。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来临后，少数利益集团特别是金融垄断集团靠政府渡过难关，社会大众特别是底层民众却要承担危机的后果——失业和福利减少，贫富差距也越拉越大。

对于老百姓来说，从“苦日子”过渡到“富日子”，自然欢喜；从“富日子”再回到“苦日子”，是个问题。希腊已经发生过 250 万劳工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潮，英国也是罢工屡现。外界甚至担心欧洲会因为过度削减开支而危及经济复苏，到头来反而加剧危机。经济复苏要花钱，债务危机要还钱，欧洲各国遇两难，曾经的辉煌难以再续。

崛起中的强国：地缘政治的图景在变化中

“地缘政治”，是一国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形势，制定和实施战略措施的政治行为。地理因素是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

当今，从 GDP 总量来说，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由于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中国不得不负起一些带有全球性的责任。虽然，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不仅仅是中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反映，也是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即对国家安全和反霸权主义的需要。但是，从国际社会的期望来看，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早已大大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范畴，东方的强国正在慢慢的崛起。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吧。

中国的邻国是世界上最多的，而且情况复杂，东边有日本、韩国，北方有俄罗斯，南部有东南亚岛国，比如印尼，西有印度和巴基斯坦，漫长的北方边境先是和蒙古接壤，然后是俄罗斯，直到太平洋，这里有无数的海港，历史上发生过大量的海洋贸易。

在理论方面，“地缘政治”是国际关系中极富活力又极具争议的理论，它主导了20世纪国际政治的全过程。

当今，“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必须创新思维、更新观念，以新地缘政治取代传统地缘政治。

而“新地缘政治”就是在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对以国家中心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地缘政治”进行批判和反思的一种新的思维和理念，故称“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其核心点是，超越以国家或民族主义为视角的现实政治，把世界作为整体来思考。

那么，在实践方面，伴着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的巨大，目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情况是怎样的呢？

● 中国和美国。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主，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但现在则不同，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由于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体系内部，而欧盟毕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尽管中国离美国力量的距离还非常之远，但目前中国和美国是最接近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向整个体系负责，但站在这个体系顶峰的则是美国。中美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但又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两国之间有合作，又有冲突。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之间尚看不到任何足以使美国动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的矛盾或冲突。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国正一心一意从事和平建设，不想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更不愿同美国打仗。

中国和欧洲。中欧之间没有根本战略利益的冲突，不存在历史遗留的严重问题，对世界的看法有更多共识，经济上具有很大互补性。中国对欧政策不会变，也不会厚美薄欧，亲美疏欧。中国对欧洲的积极态度也从未改变，热切的盼望着深化合作和互利共赢。

中国和日本。亚洲之大，世界之广，为中国、日本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山不容两虎”的思想违背世界发展潮流。坦率地说，世道变了，中国已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贫穷弱国，日本也不再拥有对华发动战争的条件。世界大势，人民意愿，共同利益，都是“中日不再战”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和俄罗斯。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十分明确的，不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

盟，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不支持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反对另一国或集团。中国会继续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是建筑在两国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关系，是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也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关系。

中国和周边国家。周边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富邻和安邻”是中国对周边的长远的根本大策。中国曾受尽列强的欺凌，有过惨痛的历史遭遇。因此中国明确地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中国和亚洲。中国地缘政治的重心在亚洲，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的大后院。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在世界事务上扮演一个大国所应当扮演的角色，那么就首先不仅仅要成为亚洲大国，而且要有实实在在的能力来处理亚洲问题。在亚洲，中国的陆地和海洋地缘合而为一，处理不好亚洲地缘政治，中国很难崛起成为大国。

中国和非洲、拉丁美洲。中国的资源外交主要是同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年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这些区域实行。中国在这些区域有大量的投资，主要是国家资本。同时，中国高层也频繁而高调地访问这些区域。给西方的感觉是，中国的确崛起了，其影响力已经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这里人们看到的也是中国的强烈意愿和这些区域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

中国的海洋地缘。首先，中国附近海域的部分大陆架可能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在钓鱼岛附近的海底，据说可能有一个相当于中东石油储量 2/3 的大油田。所以钓鱼岛问题，不仅仅是领土主权问题，还有重大的能源资源利益。其次，中国在南海地区面临的争端也非常突出。中国周边其他国家在那里已占领了 40 多个岛礁，当然对于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岛礁争端，中国会本着友好协商的基本原则，尽可能处理好，避免出现擦枪走火。最后，海盗的威胁。中国在一些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的利益越来越大，比如马六甲海峡、索马里海域等。现在我们每天有近 100 艘大船要通过索马里海域，将来会更多，所以这些地区的安全畅通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近年，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开始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国家领导人也开始以新的理念来谋划对外政策，为此先后推出了“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两大“地缘政治”理论体系。

以新安全观为核心的安全理念。冷战结束后，中国就开始探索一种超越冷战思维的新型安全理念即新安全观，其核心是以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新观念和新战略来维护和促进地区与国际安全，强调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重手段综合维护

国家和国家利益。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传统安全观的创新和超越，是立足国家安全但更关注国际安全的新型地缘政治观。

以和谐世界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构想。和谐世界理论的核心是“政治上平等、民主，经济上合作、共赢，安全上协作、互信，文化上交流、共进”，目标是通过和平共处与加深合作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最终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首次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高度，超越了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传统视野，本质上也属于新型地缘政治观。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已逐渐认识到“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共同应对所面临的挑战。

人民币会不会成为基轴货币

随着人民币价值的飙升，“1 美元兑换 5 元人民币时代”的标准也是指日可待，人民币正在全球各地发挥着强大的购买力。

2008 年初，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经商的张先生在美国纽约购买了 1 栋公寓，并在新加坡乌节路购买了 1 个商铺。他表示：“纽约的公寓价格比 1 年前下降了 20% 以上，再加上人民币价值上升 10%，因此用比原来少了很多的价格购买了公寓。”另外，中国企业正在“猎取”美国的中小企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国企业家正在推进收购经历资金困难的 6 家优良中小企业。

美元价值是美国经济力量的象征。然而，美元价值一波动，曾经平息的“美元霸权主义告终论”就会抬头，蛊惑人心，扰乱社会秩序。

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豪斯曼表示，“作为基轴货币的美元的地位某一天突然下跌，这种事情是很难发生的。”原因之一是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惯性。由于自身经历所积累的熟练性和方便性，他们不会轻易中断以基轴货币为基础的交易，所以以基轴货币立足的钱币在发行国经济力量削弱之后也会在一段时间里独占霸权地位。

19 世纪曾为基轴货币的英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的产业生产力曾在 1880 年之后落后于德国，在 1900 年之后落后于美国。但是，英镑霸权一直维持到了布雷顿森林体制成立的 1944 年。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元地位不会发生动摇。豪斯曼等人也承认，自 1971 年里查德·尼克松总统宣布中断兑换黄金之后，美元地位呈现出了慢慢削弱的趋势。上世纪 90 年代社会主义墙壁倒塌，美国经济复活、霸权复原，但是在扭转大势上也

表现得力量不足。

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美元为主导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重大问题，人民币正迎来历史性机会。

那么，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否会撼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从历史上来看，每次大的金融危机对当时货币体系的冲击不可小视。1967 ~ 1968 年，英镑退出与美元并肩的历史舞台，世界货币体系转变为美元“一币独大”。1977 ~ 1978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但是，尽管美元目前一路下跌，但全世界仍愿意持有美元，主要是因为美元有广阔和深厚的金融市场，这是欧元或其他货币不能比的。

纵观历史，货币和军事力量霸权在同一时期落下帷幕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希腊、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帝国、英国等的货币霸权与军事实力没落时期相似，而不是与经济力量没落时期相似”，所以“美元霸权的终结将发生在美军力量失去最强地位之时”。

如果货币体系有了灾难的话，那么，美国就会失去财政节制，即想发多少国债就发多少。这样，就形成了把债务（美国国债）转嫁到其它国家的体系，所以美国感觉不到太大的疼痛，继续增加债务也是必然结果。当美国把继续增长的债务转嫁给世界的时候，看不到明显的破绽。

而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的国家正是“基轴货币国”。因此提倡新的基轴货币是触及美国致命弱点的大问题。为了不引起美国的愤怒，各国都极力慎重地回避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成了危机后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这很可能是中国读到了大的变化，虽然还不清楚它的走势，但已经预见到终将由人民币或别的货币来代替美元成为基轴货币的趋势，遂才向美国的美元统治抛出牵制球。然后，采取稳步而顺利地向世界炫耀存在感的战术。所以，中国并不担心购买的美国国债因美元贬值而减分量。

相反，中国把此次金融危机视为良机，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世界应该考虑创设新的基轴货币的问题！很显然，中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成为与美元并称的基轴货币。

当然，只要美国不肯抛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只是我们需要牢记的是，世界上终于出现了欲在美国的“美元霸权统治”下凿开“一个蚁穴”的超级大国，并发出了它的第一声呐喊。

虽然到现在仍存在着对中国的悲观论和傲慢论，但是重画历来由欧美国家支配的世界地图却是历史潮流。总之，如果不完全抛弃从前那种所有事情都以美国为中心观望的世界观，是看不到核心的。

就像东京市场的投资家们满心期待中国政府发表追加的经济计划一样，在美国、欧洲，现在所有的投资家们都非常关注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一语道破其心理的话，就是即便采取不符合传统自由主义国家的经济伦理的手法，也要让中国拿出有效的经济计划来牵引世界经济。

中国领导人看到这些，理所当然地更加相信自己的做法得到全世界认可的日子为期不远。

首先可以肯定，把世界的期待和支援作为后盾，中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完成内需型经济成长。显而易见，中国企图战略性地利用从世界各国涌来的顺风，扩大经济的成长路线。如果中国抓住了这样的大趋势，就可以断言中国经济悲观论不会成真。

那么这时，中国就应做大做强人民币，努力发展人民币基金；扩展人民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给人民币持有者创造投资渠道，这些措施均有利于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

将来，人民币体系内亦有很大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前途光明。中国应该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最终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为基轴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相互制衡的全球金融稳定三极。

过度虚拟将主导 21 世纪金融危机

2007 年 4 月 2 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这是一场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的序幕。2008 年 6 月份开始，美国两大房贷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被国有化，美国国际大投行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倒闭，美林证券被收购，而美国国际集团命悬一线。

那些日子，身处金融领域的人们，在大家的谈论中，除了“金融危机”之外，“虚拟经济”则是众说频率最高的词汇。

“虚拟经济”是相对“实体经济”而言的，是经济虚拟化（西方称之为“金融深化”）的必然产物。经济的本质是一套价值系统，与由成本和技术支撑定价的物质价格系统不同，资产价格系统是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的一套特定的价格体系，这也就是“虚拟经济”。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逐步产生的，同时它的产生天然就是为了促进“实体经济”更好地发展。自“虚拟经济”诞生起，就利用其固有的诸多优良特性为“实体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比如,“虚拟经济”可以为“实体经济”动员储蓄,提供融资支持;可以转移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可以更好揭示和传递“实体经济”的信息,提高“实体经济”运作效率;通过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促进社会整体运行效率。

但是,在推动实体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虚拟经济”自身的大规模扩张。

这样,过分虚拟的金融膨胀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制造了虚拟繁荣。雷曼破产引发的全球经济突变,使相关利益主体的“太大不能倒”变成理所当然的拯救危机的政策焦点,危机制造者变成首先被救助者,过度虚拟的经济挟持拯救政策引发了严重的道德风险。

那么,过度虚拟具体是怎么产生的呢?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例。

首先,在现代市场经济体中,证券交易是金融活动的主要部分。为了适应融资与发展金融业务的需要,美国出现了包括衍生金融产品在内的证券多样化,金融产品日益增多。这些产品可以在资本市场迅速变现,由此发挥交易媒介功能,具有“准货币”性质。

美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华尔街大公司在垄断利润驱使下不断实行花样百出的“金融自由创新”,多种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和推向市场。人们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取投机利润,在市场上为哄抬虚拟资产价值而相互博弈,由此形成了金融资产交易中资产价格的膨胀和泡沫化。

其次,在证券交易带来资本市场自我膨胀的同时,衍生金融产品的滥用更是加剧了金融资产的泡沫化。例如美国利用住房抵押贷款,开发出了若干次的重复抵押证券。这样,一项始发债券交易,就生长出了达到其实在资产价值数倍、数十倍的后续衍生证券交易,从而导致一种倒金字塔式的虚拟资产不断自我扩大机制的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

再次,金融业中通行的强激励机制,也是形成金融资产自我膨胀与泡沫化的助推器。

华尔街不少金融高管在天价的报酬刺激下,头脑发热,丧失风险事业所必须的经营谨慎性,千方百计寻找和设计出能“赚大钱”的金融工具,在金融活动中“不惜冒险一搏”,其“畸化”行为影响和造成金融活动中的不良势态,强化了金融泡沫化发展和金融运行的不稳定性。

在将大部分普通人的收入流资本化(发放房地产按揭贷款)开发殆尽后,华尔街又将目光盯上了一些根本不合格的人的收入流,这就是美国1000万贫困或信誉不好的穷人和新移民的收入流,对这些有瑕疵的收入流进行资本化,其发放的抵押贷

款就叫次贷；进而华尔街又在次级抵押贷款收入流基础上创新推出抵押贷款证券、债务抵押凭证等众多金融资产，每一次收入流重新资本化，都创造出了新的虚拟资本，这种新虚拟资本代表原来的货币资本距离初始借款人贷款就更远一步，虚拟性越发增强，长年累月积累下来，造成了美国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泛滥。

货币信用实际上就是一种衍生经济，其扩张速度与规模一定要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不能任其自我膨胀，形成货币信用过度扩张。

实践证明，当国民经济活动中超出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交易活动量过度增大，特别是金融虚拟资产交易量过度扩大，也就是说，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和泡沫化以后，就会产生泡沫经济或者金融危机。

近十多年来，美国经济过分地虚拟化，特别是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泡沫越吹越大，越吹越远，终究逃脱不了破灭的命运。

对此，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尤其一定要保持清醒，绝不能重复发达国家金融业自我膨胀的模式。

“虚拟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如能驾驭和正确运用它，就会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降低经营成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整个经济运行效率和实体经济效益。

21 世纪，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趋于发达是必然趋势，具有积极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功能，“虚拟经济”也将会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

如果过度膨胀“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使全球经济误入歧途失去稳定发展的基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第四波科技浪潮下的国力竞争

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思维创新和社会演进共同成就了人类的发展史，当前，世界正在全速跨入“科技和创意”双驱动的知识社会。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向世人呈现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巨大力量。

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扑面而来，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以纳米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的突破已显端倪，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以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开发尚未利用的或可再生资源取代已近耗竭的稀缺自然资源为指导思想，成为科技革命的第四波。

从人类前进历程折射出发展的规律来看，科技进步推动了产业经济的兴起与壮

大，产业壮大支撑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推进社会的转型，在社会转型中又涌动着制度和文化的创新，由此科技—产业—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相互耦合，相互推进，共同凝聚形成前进的车轮。

当今，经济时代的转换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突破和人的思想解放引发的，并以社会结构的变换作为保障。社会结构由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结构转变为同代人为主的小家庭结构；信息技术的突破又促使工业经济时代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结构也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为转折点，被称为“产业经济发展阶段”。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人类社会逐步走向“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社会，用知识的观点看组织，就会把人们看做是收益的创造者。在知识组织内部，学习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资本和程序，而不仅仅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生产流程由观念驱动，有时是混沌不明的，出现了“视界经济”；管理的权力取决于人们知识的相对水平，而非其在组织中的等级职位。

纵观人类发展史，全球经历了科技革命的四次浪潮。

第一次科技革命。以 18 世纪 60 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为标志，蒸汽机为欧美等国的工业生产中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人类社会的生产突飞猛进。蒸汽机的发明，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第二次科技革命。始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在本次科技革命中，科学与技术结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电气、电子技术全面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三次科技革命。20 世纪中后期以来，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一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及 20 世纪 60、70 年代开始随着因特网的发展带来的信息化的革命。

第四次科技革命。主要表现为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为代表的先导性技术和产业的高度融合、交叉、全方位渗透，其中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高度渗透融合形成的复合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要素。

科技第四波中的纳米技术、生物流动创造了机遇，具有竞争优势的先发国家高居产业链的高端，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为主导的知识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或是以高附加值制造业为其产业重点，试图将后发国家置于产业链的低端，成为它们的能源、制造加工基地。

后发国家要在全球化进程中避免产业的低端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持续动力并赶上先发国家，必须立足于新一轮的技术、新一轮的产业，用新一轮的创意催化经济发展。

那么，在第四波的科技浪潮中，世界各国都采取哪些措施来进行国力的竞争呢？

日本方面。日本出台了未来开拓战略，提出要建成世界第一的环保节能国家，并在太阳能发电、蓄电池、燃料电池、绿色家电等低碳技术相关产业市场上确保所占份额第一。

英国方面。2009年4月，当世界正遭受金融危机沉重打击时，为帮助英国经济尽早复苏，英国政府制定了一份战略计划——《建设英国未来——新产业新工作》，提出将会主导21世纪的产业革命，英国将会确保科技水平在世界名列前茅。

印度方面。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经济发展势头依然良好。印度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大国一样，明确提出科技立国和科技强军的方针。这既是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其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

美国方面。根据奥巴马公布的能源政策，美国将逐步实现能源供给的战略转型，计划在未来10年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研究；促使政府和私营部门投资于混合动力汽车、电动车等新能源技术。此外，美国还将发展智能电网产业，全面推进分布式能源管理。

俄罗斯方面。目前，俄罗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纳米技术及核能技术，努力保持在航天领域的强国地位，力争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为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方面。在历史上，曾失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工业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的机会，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从1820年的约1/3降至1950年的约4.5%，而在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获得了参与权，成为引进者、采用者、学习者、追随者和有限的创新者，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第四次工业和科技革命的内涵将是‘绿色革命’，因此，在实质上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研发速度正在迅速加快。例如在可再生能源及相关领域的国际发明专利已经跃居世界第七。

未来10年，中国必须融入全球第四波科技浪潮，发展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支柱的先导“绿色”产业，打造先导产业集群，领军亚洲板块崛起。

传统思维已不适应全球化时代

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格局的转换，发达国家的相对实力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相对实力上升。但是，这种实力变化仍处在量变阶段，至多算部分质变，远未到质变的程度。而新兴大国崛起，并不是以西方国家的衰落为前提的。

以中美为例，中国的崛起是美国最大的挑战，这已是美国战略界的共识。当然，美国战略界的看法，是受传统现实主义思维的影响，而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适

应全球化时代。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 2000 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一般视修昔底德的专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其最早的思想源头。修昔底德最早提出了权力的概念，认为正是“雅典人权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这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也最早提出国际政治是强权政治的理论，即“强者做凭其实力可以做的事情，而弱者接受其所只能接受的东西”，因此，在这种强权政治中，生存是各国追求的最低目标。其后，众多的思想家和学者如马基雅维里、霍布斯、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人则为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另外，在美国，也有一些人拥有创新思维，认为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机遇。这从中国 30 年崛起进程可以看出。美国并没有随着中国崛起而衰落，反倒是从同中国的合作中获取巨大利益，客观上有利于美国维护其战略利益。

中美之间的合作正是全球化的一个表现，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人类历史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新的思维的参与，同时，也会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从而更好地适应全球化。

首先，全球化正改变着我们思维赖以参照的坐标系。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对民族文化造成深刻的冲击。换言之，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和学术现象，正在重塑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学术研究，改变我们的思维所赖以参照的坐标系，要求我们同时具有民族性和全球性的双向思维。

长期以来，建立在领土疆界之上的民族国家一直是我们进行思考和分析的基本依托和主要坐标，全球化的进程正在无情地撼动民族国家的传统疆域。

全球化是一种穿越国界的过程，全球性是人类对民族性的一种超越。它既要求我们进行民族的思考，也要求我们学会全球的分析。民族国家仍然是我们进行比较分析的主要坐标，但全球社会也同样应当是比较研究的基本参照。

其次，全球化要求我们特别重视前瞻性思维和理论创新。

背逆性思维是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言必称三王，行必提尧舜，理想的时代必定在古代。即使欲对传统有所突破，也要“托古改制”。带着沉重的怀古情结来观察和评判现实，一看到或听到新的观点和理论，往往不是冷静的分析，而是根据原有的标准进行指摘和抵触，这是我们的传统思维定式。

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延伸，是对传统的超越，无情地摧毁了过去的各种理想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过去的和现存的每一种社会生活模式都暴露出其固有的缺点。

它迫使人们进行前瞻性的思考,要求我们把理想模式建立在未来,而不再是过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理论的创新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创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动力。

纵向思维使我们能够学习历史的经验,但片面的纵向思维容易把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历史经验中,总是拿自己过去的经验与现实进行比较,觉得自己现在是如何之好或如何之坏,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对现实的虚假满足或极度憎恶,不是夜郎自大,就是自暴自弃。前者使人看不到自己与别人事实上存在的差距,后者则使人看不到自己身上具有的优势和长处。

全球化要求我们在进行纵向思维的同时,特别重视横向的比较思维。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跨国性,它迫使人们更多地进行横向的思维,即跳出自己狭隘的历史经验,将自己的经验与别人的经验加以比较,虚心向其他先进者学习,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既不夜郎自大,沾沾于自己取得的成就,又不妄自菲薄。

最后,全球化要求我们打破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进行综合的思考。

简单的两分法思维方式长期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其特征是把两种事物截然地对立起来,似乎有你无我,有我无他。全球化既不是单纯的同质化,也不是简单的碎裂化,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既是普遍化,又是特殊化;既是民族化,又是世界化;既是分散,又是整合。全球化是一种真正的“对立统一”,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势却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取其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既不符合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更会对现实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全球化正在摧毁目的论和宿命论的现实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在封闭的环境中长时期的静止不变。

目的论和宿命论是一切宗教和神学的哲学基础,它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假定一切事物、一切行动都有其终极目的,人们无法超越预先设定的最终目的。一切封建迷信和个人崇拜归根结蒂也是由这种宿命论和目的论派生出来的,这要我们进行过程性的综合思维。

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必须对外部世界开放,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全球化不是一种目标,甚至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它迫使民族国家不断地对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进行创新,使改革和创新也变成一个持续的过程。

总之,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生活,正在改变着中国文化

和中国学术。全球化将现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所以，学习现代的西方文明并不等于“西方化”，正如学习现代的东方文明不等于“东方化”一样。

在全球化的今天，应建立多维坐标的思维体系来看待现实问题，从多个方面来考虑问题，提升自身的全球化思维强度。

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与全球治理的再选择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果之严重，为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所仅见，对国际关系的冲击不亚于一场战争。这场“不流血的战争”与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流血战争叠加，把美国拖入了空前的困境。尽管目前美国“一超”地位仍无人能企及，但其软硬实力相对下降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头强劲，“金砖四国”、“展望五国”、“金砖十一国”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目前发展中国家整体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已达 41%，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75%。发展中国家首次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研究世界经济重大问题并共同作出决策。

西方占主导的国际体系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状况正逐步得到纠正。这是新形势下全球治理制度重构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昭示着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趋势。

2010 年将开启一个新的十年，站在这个时间窗口回顾过去的十年和展望未来的十年，历史往往会在激荡起伏中留给我们太多的启示和思考：

1998 年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一个新起点，历经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它们执行了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带动下，迅速崛起。十年之后的 2008 年，当这个世界再次面临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略的经济力量。一定意义上，这个十年对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正是“崛起的十年”。2008 ~ 2010 年应该被定义成“危机应对之年”，在这两年时间里，全球各国极其罕见地携手共治“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国则成为最先摆脱危机，走出“大衰退”泥潭的国家之一。

虽然危机的余波未了，但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世界经济正迈入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并将重新拉开一个“十年大幕”。

“后危机时代”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呈现多极化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国家集团看, 1998 年东亚金融危机时, 发达国家是国际债权人, 新兴市场国家是债务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 这一局面根本扭转, 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力量对比出现了一个新的平衡。

从单个国家看, 美国“无就业的复苏”和“欧洲五国”的主权债务危机预示着原有的主导国家正在经历艰难的调整。在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的 GDP 总量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尽管这仅仅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复苏与增长态势。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格局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多极化的洗牌。

长期以来, 世界银行的现有 184 个成员国中, G7 国家集团占有的投票权高达 40%, 美国一家占据着 16.38% 的比例。因此在重要决策需要 85% 以上多数票通过的规定下, 美国就可以否决任何一项决策的通过与实施。有趣的是, 一直以自由民主进行标榜的美国, 在国际组织中却是完全不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参与权的。IMF 成员国的地位同样失衡。再看 IMF, 金融危机之前, 欧盟拥有 IMF 32.2% 的投票权, 美国和日本各拥有 17.1% 和 6.2%,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 24 个成员中, 有 7 个来自欧盟。全球治理结构与国际经济力量发生的巨大变化并未同时改进。

因此, 全球必须探索一种新的合作框架, 目前看来, 未来面临着三种选择:

第一种, “中美共治”下的 G2 模式。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等部分美国学者呼吁的所谓“中美共治”之所以引起关注和争论, 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大国经济体”和“大国贸易体”, 年均 GDP 增长率在全球经济历史上保持着最好的增长记录。

但是, 同样需要正视的是: 首先, 在货币与金融、军事上与科技上以及国际规则制定权三个方面,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仍旧是巨大的。其次, 美国仍然是现行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中的最大受益者, 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储备的地位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赢得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而中国在金融不发达、人民币没有实现国际化的情况下, 也只能被迫吸引美元资产。

第二种, G20 取代 G8。

1999 年 9 月 25 日, G8 财长创造了 G20 机制, 即 20 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 这个论坛包括 G8 的八个成员, 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等 11 个国家和欧盟,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列席会议。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85%, 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2/3。

目前看来,2008年雷曼倒掉和次贷危机全面恶化以来,在不同时点、危机的不同阶段,共召开了三次G20峰会,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到匹兹堡峰会的三个不同时点里,世界经济局面不断改观,信心不断恢复。

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在危机的时候,一些关键的共识也越容易达到,可以说,危机往往是改革的催化剂,使一些新的思想、措施和机构从幕后走向台前。G20就是如此。

然而,虽然从G7/G8到G20,国际社会出现从一极到多极的积极转变,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得以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G20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这个组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清晰的执行力和存在的合法性,协调能力也十分有限,其次,成员数目多,效率相对低下。相比G8集团,G20可以说是分歧更多。各国之所以愿意并能够在危机时采取合作的态度,也是为了能够尽早走出危机,一旦危机过去,国际利益自然让渡于国家利益。

第三种,改革IMF。

从目前的国际机构的架构来看,以IMF为基础进行改革,被视为是最具有可操作性,也最具有更广大的代表性的建议。然而,要想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IMF还面临着多方面的改革,如决策机制与决策权力的分配问题、投票权份额的计算方式等等。

总体上,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国际合作与协调需要一个更加广泛、更具有实施能力的平台,当然中国也需要认真考虑她在国际组织与机构中的重新定位。

用中国的视野
看世界
以世界的眼光
看中国

世界经济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看懂世界经济，才能看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当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就业者发现工作岗位变少了，竞争更激烈了；贸易商发现生意越来越难做；房产商发现房子不好卖了；投资者因为股票不断下跌蒙受损失；决策者发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了，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余地变小了……大家难免感叹：难道是好日子到了头？难免追问：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人说，是华尔街金融家的冒险游戏，把全世界都拖入了经济的冬天；有人说，是美国为了自身的核心利益，滥用霸主的权利，用美元绑架了世界经济；有人说，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早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有人说，世界经济本身就遵循着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期定律……答案五花八门。要想获得比较客观公正的答案，就需要看懂世界经济，弄清其来龙去脉。

为了帮助人们全面系统地看懂世界经济这盘大棋局，我们特编写了这部《看懂世界经济的第一本书》。本书将当今世界格局及其历史渊源娓娓道来，并从源起、主导因素、影响范围以及未来走势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和介绍，希望能使读者掌握看懂世界经济的理论、方法，能客观公正地看待当下经济形势、社会热点。通过阅读本书，读者能看清各类波谲云诡的经济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真相，了解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发展脉络和未来走向，以便更有效地规避风险，把握机会，找准自身的位置，作出有利于自身的抉择。

出版人：方 鸣
责任编辑：白 豫
封面设计：李艾红

ISBN 978-7-5113-5001-5



9 787511 350015 >

定价：29.80元